牛津英国通史

〔英〕肯尼思·O.摩根 主编

王觉非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牛津英国通史

〔英〕肯尼思·O.摩根 主编

王觉非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目　录

附录

编者前言

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乃至独一无二的特色，早已被国外的观察家和国内的评论家所公认了。海外来的访问者，从15世纪遍布各地的威尼斯的大使们，经由伏尔泰、托克维尔等知识界的人士，直到20世纪美国的新闻记者，都深信英国社会具有其特别的性质。这一观点同样也为近代英国本国的编史家，如温斯顿·邱吉尔和乔治·奥威尔① 这两个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上彼此对立、但都是爱国者的人所采纳。但是，讲一讲英国人的“英国精神”是比较容易的，去给它下个定义却很困难，更不用说去对它进行解释了。除极少数人外，那些企图对它的性质进行概括的人，顶多只能说是勉强地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G.M.特里威廉的杰出的、概括性的《英国史》，该书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1926年出版。特里威廉在此书中集中论述的主题是那些他认为英国在许多世纪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经验——在地理上与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及因而造成的在海权上的中心地位；巨大的社会流动性和封建制度很早解体，使工商企业易于产生；从乔叟和威克利夫时代起一往直前发展的连续不断的文化连续性；特别是那个对维多利亚后期的老自由主义者（像特里威廉等人）来说弥足珍贵的主题，即在经久不衰的议会制度和法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和法的长期演进。英国作为一个本身安全可靠而又充满活力、

v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英国作家，曾在驻扎在缅甸的皇家警察部队服役，后转向社会主义。写有自传体散文《猎象记》、《绞刑》及政治论文《通向威根码头之路》等。——译者

外向型的岛国，逐渐走向向世界殖民并加以开化的道路。特里威廉的这些论题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同样，在20世纪后期这个更为痛苦和备受折磨、人们对民族和种族的陈旧偏见充满疑虑的时代，对特里威廉的论题也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如何去理解英国历史经验的主要实质仍然像往常一样迫切而又迷人。

本书的目的是分别剖析从最早的罗马时期到20世纪后期英国整个历史中那些主要的经验。书中对“民族性格”这一变化不定的概念将不予探讨，因为即使仅仅考虑英吉利一个民族，这个问题也将是难以解决的，同时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等不同的传统包括进来，问题就几乎不可能解决了。本书宁可去理清这些大不列颠岛屿上世代相传的主要政 vi 治、社会、经济、宗教、智力和文化现象，这也是有经验的学者们试图去研究的问题。本书的插图，不仅仅是孤立的装饰品（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作为在阐述历史时对关键性历史事件予以解释性的重要资料。因而，所谓英国的“民族性格”问题，或它的缺少问题，只可意会，不可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留待读者自己去作出结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本书是由十名专业历史学家密切合作写成的，无疑是多位作者的集体成果。这样一种集体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单凭一位像特里威廉这样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就有能力和信心从容处理所有英国历史各个方面问题的时代，在1914年以后的若干时期中，也许已随着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起消失了。确实，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人物现在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在这本书中，英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由一位该领域的专家加以深入地探讨，不过，他总是将他的研究成果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地进行叙述。本书的基本前提是，它是论述大不列颠的历史，包括两个分开的、多种文化的岛屿，而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事实上，在十位著者中有三位

威尔士人，两位苏格兰人，这可能有助于达到上述的目的！再者，关于英国在地理上和其他方面与欧洲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在书中经常提及，同时对英国与海外别的民族在经济、智力、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这些有助于形成各有关国家历史经验的事件也在多处说到。都铎时期以来，驱使着英国进行探险、殖民和征服的动力，逐步促成世界上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帝国的建立，同时也赋予英国历史发展一个外向型的外貌。在本书中，英国仍然以学生们所熟悉的岛国的面貌出现。不过自从罗马军团第一次到达以来，这个岛屿狭隘的孤岛性经常受到更为广阔的来自大陆欧洲和以后来自北美、非洲、亚洲和澳洲的转变过程的影响。

在这些章节中将显示，旧的陈词滥调如何被近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所消除。12世纪中叶的“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的混乱局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宁静，读者们所熟知的1066年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像瓦隆布罗萨①的秋日黄叶一样消失了。再者，那种认为英国历史不像别的不十分幸运民族的历史一样，是没有波折、平静绵延发展起来的观念，也须严加斟酌。英国人民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有时是暴力的和革命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急速的变化。从本书中可以看到，那种关于宁静的、平稳的演进过程的概念，即使就英格兰而言，更不用说克尔特各民族混乱、四分五裂的历史，都是近乎神话的说法，只配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它就像关于从阿瑟②时代以来许多世纪中存在“黄金时代”的浪漫故事一样的不足为信。

---

① 瓦隆布罗萨(Vallom brosa)，意大利中北部村镇，著名的修道院所在地和避暑胜地——译者

② 阿瑟(Arthur)，即阿瑟王，传说中克尔特人的军事领袖，可能历史上实有其人，约生活于6世纪。曾率领不列颠人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他的名字后来被列入多种传说之中。——译者

正像彼得·萨尔韦在此书中所写的那样，在5世纪初罗马人最后撤退之前很久，罗马不列颠就呈现出经常的、交替发生的社会动乱和重新调整的景象。约翰·布莱尔描述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王朝的混乱现象和城市生活的急剧发展，直到最后以哈斯丁斯的暴力冲突为终结。关于中世纪早期，约翰·吉林厄姆描绘了一个在法国和英国土地上发生的伴随着不断失败的征战传奇故事；与此同时，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到了13世纪后期，它几乎已到了阶级战争的边缘。虽然阶级战争得以避免，但正如拉尔夫·格里菲斯所述，紧接着法国的长期战争之后，英国国内也出现了贵族骚乱，同时国内正从瘟疫和社会反叛中恢复起来。正像约翰·盖伊所揭示的，在后代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人看来，都铎时代是弥漫着金黄色光辉的时代，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标志却是：人口增长形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极度压力、宗教冲突以及外国入侵的威胁。这种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紧张关系遗留给了斯图亚特王朝，约翰·莫里尔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在这一世纪之中，尽管国内法纪废驰的现象有所减少，仍发生了两次内战，弑君、成立共和国、王政复辟、和一次革命，在每次事件之后，都出现了令人惶惑的、难以忍受的挥霍浪费。保罗·兰福德在有关章节中指出，乔治时代表面上的安定、繁荣和文化扩张，让位于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商业和技术上的爆炸性的骚乱，以及从美洲殖民地、共和制的法兰西传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爱德华·吉本，这个记述了安敦尼及其继承者的罗马帝国的温文尔雅的历史家，他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在他所钟爱的法国的雅各宾人群面前，从欧洲消失了，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根据克里斯托弗·哈尔维的解释，19世纪初期，英国确实设法避免了当时袭击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狂热，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结构和合法的社团方面产生的大规模的混乱现象，以及阶级关系上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分裂，这些情况使马克思异想天开地认为英国站在革命

的门槛上。正像H.C.G.马修所指出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英国迅速地从世界博览会①时的盲目自信走向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时代的烦恼之中，这时存在着社会紧张、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失常和民族不安全感。本前言著者所写的1914年以来这段历史，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压力，英国被猛烈地夺去了在阳光下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英国历史并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界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和谐一致、一个接一个不断扩展的连续不断的历史，也不是一部从讲究身份地位走向互相协同的历史，而是一部富于戏剧性 viii 的、五光十色的、而且常常是暴力的历史；这一古老的社会和文化被人类以往的政治、经济和智力的动荡和骚乱撕成碎块。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国曾是人类纷争的一个场所。

同时，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还可以产生一种清晰的印象，尽管这种印象的确切含义为何还难以捉摸，这就是在罗马时期以后和诺曼底时期以后，一种“英国精神”总是留存了下来。这种“英国精神”的若干要素，无需细述也能在几个世纪之中追溯其踪迹。它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在罗马入侵之后留存下来的克尔特基督教特性；反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小型画像和雕刻上的艺术繁荣；由诺曼底王朝和安茹王朝所创造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在14世纪的诗歌和建筑中出现的生动的英吉利民族意识，甚至在都铎王朝末期，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内聚力意识等。与此同时，那个伊丽莎白时代到处抛头露面的威尔士人约翰·狄伊②，创造了一个含混的名词“大英帝国”，它也表明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样，在麦考莱的那个著

① 186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译者

② 约翰·狄伊(John Dee，1527—1608年)，占星家和炼金术士，受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宠信。——译者

名的“保守的革命”—— 1688 年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中，说明在 17 世纪的上层政治的底层仍存在着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在 18、19 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安定，和工业、运输、交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甚至在本世纪的政治、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民主进步，都使已明显存在的民族意识更为加强。在英国历史中，联合更胜于分裂，阶级战争，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事实上在中世纪后期并未发生过；而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近代工业时期会发生的暴力革命事件，幸而也未曾实现。英国人能够把早在 17 世纪的政治革命中和 18 世纪工业革命中的极度紧张状况加以消除、吸收。这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它说明了英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根源，在我国的历史中，协同一致正像冲突一样，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在许多世纪中以不同的方式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厄尔斯特人联合在一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未能把坚忍不拔的、始终不屈不挠的南爱尔兰人包括进来。爱国主义思想的明白、公认的象征继续留存了下来，这就是，国王、议会、法律程序、帝国的遗产、鼓励个性和家庭生活的隐秘性，对娱乐和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集体热情等。但是，同样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也许是，不同意见的批评以及以它的另外形式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平等派、丹尼尔·笛福、威廉·莫里斯、R.H.托尼、乔治·奥威尔等，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均而斗争的自由战士。同时，他们中的每个人也都几乎是以一种宗教热忱献身于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精华，以及他们的历史和命运。当历史学家拿这种在许多世纪里的民族连续性来否定反复发生的中断和危机时，他也许能使英国人把他们的过去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从而使他的观点为人所信服。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后，更能明白地、清醒地、热情地理解甚

至热爱他们自己的社会，相邻的民族和国家，和他们所面对的世界。

肯尼思·O.摩根

1983年11月于牛津

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

（约公元前55 一约公元440）

彼得·萨尔韦

1 不列颠历史的开端

罗马统治不列颠时期，不列颠人口与其在中世纪人口高峰时期相当。罗马当时是统治着东从土耳其、西至葡萄牙、南自红海、北达泰恩河甚至更远的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四个世纪来，不列颠一直是这个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公元43年克劳狄发动征服不列颠战争之前，不列颠就与罗马发生了关系。即使在最后脱离了罗马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列颠仍是罗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章所探讨的就是这足足500年的不列颠历史。

不列颠社会的起源远在罗马统治不列颠以前。罗马人在不列颠见到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产生的。到罗马征服不列颠时，不列颠文化差不多要比罗马落后1500至2000年——不过，史前史学家对各种细节的争论还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在罗马征服前的铁器时代末期，不列颠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十分类似于罗马人在西北欧发现的那些社会形态，并且已具备了我们概而称之为"克尔特文明"的文化和语言形式。在罗马帝国未能涉足的一些不列颠地区，这种文明基本上保持不变；帝国疆域之内，克尔特文明的基础仍然存在，但在各方面都罗马化了。总的说来，这与现代史上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方法不同。

我们为什么不从罗马征服前来开始本书的叙述，或者如一些

现代作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将罗马不列颠包括在“史前史”里呢？原因在于，罗马不列颠时期和罗马征服之前有着质的区别。就我们必须十分依赖考古学而言，认为罗马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初期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研究属于史前史范畴有一定道理。然而，对不列颠这一时期的研究决不能仅仅依赖考古学，不能把对实物的解释和对文字材料的研究分割开来。的确，当时或者接近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数量难以与稍后时期相比，但这些材料已足以证明一些问题了。再者，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个有文字社会的一度大而常规性的成果的非常可观的遗存，这些遗存一般仍是那个时代真实的载体，不像那些辗转传抄了许多世纪而得以幸存的希腊和拉丁文字资料那样带有不可避免的讹误。在不列颠发现的文字材料大多数是以碑文形式刻在石头上，也有其它形式，它们构成了研究罗马不列颠时期的主要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还包括制造品上的商标，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虽少但正在日益增多的私人信件和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其它文献材料，以及普通人日常读写所遗留下来的遗物。罗马货币是罗马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对此研究是一件高深和困难的工作，但极有价值。政府掌握发行的通货不仅作为金钱，货币上的文字和肖像也是作为一种经常性群众宣传的强有力媒介，今天商业电视中反复出现的广告宣传就是这种方法的翻版。应该承认，城镇居民的阅读能力要比罗马化的乡村高而普及；但是军队中采取强制性培养阅读能力的做法，这种能力也是许多其它社会阶层必须具有的。它不像历史上其它时代那样被限制在少数人或者一个特别的阶级中。

罗马不列颠时期和前罗马不列颠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罗马不列颠社会是个有文化的社会；直到中世纪末，罗马不列颠的文化水平可能一直是最高的。另外，与这种文化水平相关的是罗马不列颠已是个由法律条文所主宰的社会，尽管这些法律实行起来常常

既腐败又无效，但它却紧密地制约着个人和国家、人与人的关系。罗马不列颠是一个越来越由写在官方文件中的规章和程序所主宰的社会，因此它和处在铁器时代末期的不列颠相比差距大得惊人。在那一时期，即使在这个社会的顶层，虽然罗马奢侈品输入不列颠已成为显著特征，但总的说来，除少数铸在金碧辉煌的货币上的文字外，其他的文字材料仍然非常稀少，铸币上的文字一般都是拉丁文，铸币者们一般是罗马人。

公元前55年和54年尤利乌斯·凯撒对不列颠的远征拉开了罗马征服不列颠的序幕，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已是势在必行。罗马把任意扩张其统治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从凯撒开始，不列颠在罗马人意识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不列颠来说，罗马时期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对不列颠移民，而且也是指不列颠作为一个国家从史前跨入了历史。

一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对于该国人民怎么样生活有着很大影响，不列颠也不例外。不列颠突出的地理特征是有“高地”和“低地”[3]的明确划分——粗略地说，也就是不列颠北部和西部与南部和东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历史分析中有被滥用的危险。再者，不列颠人显示出具有相当大的改造地理环境能力（有时是有意识地），通常是为了某些目的如开发燃料。自然条件也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特别是海和陆地相对水平线，给海岸线和内陆地形及水位带来了很大影响。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气候还是地质运动难以确定。总之，我们掌握的罗马时期的一些证据表明，那时不列颠的气候与今天大同小异。在公元1世纪，由于“海水退却”，一段时期相对高的海平面降低了，为开发提供了新的土地。3[4]世纪时相当湿润的气候的冲击看来反映在欧洲许多地方洪水泛滥上，它给不列颠较低的地方、河流和港口带来了严重问题。由此看来，这一时期气候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前人们普遍认为不列颠大部分土地原本为森林所覆盖，后来才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砍伐殆尽，这种看法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到罗马征服不列颠时，虽然仍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但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人口要比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1066——1689)多两三倍。一部分森林被砍伐，开垦的土地和中世纪末土地面积差不多。大约从公元前1300年起，铁器时代的景观已大致形成：山寨、零星的或一系列庄园组成的村落(四周常有栅栏环绕)、广阔的年复一年使用的耕地、森林以及一片片大面积的牧场。在凯撒进入不列颠前的600年里，不列颠尽管带有岛国的若干特色，但都具有大陆铁器时代各阶段的各种特征。这种情况在史前史学家中引起了一场难以统一的争论，即这种相继变化历史的原因，到底在于由一些相对来说数量不多但却有影响或有征服力量的新来者（如诺曼底人)对不列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还是由于通过交往和贸易进行的相互交流。无论原因是什么，在凯撒时期，凯撒注意到，



罗马不列颠时期的犁耕

他所到过的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各部落非常类似于他在高卢所接触到的部落。另外，考古发现向人们展现了一些比较落后的部落居民，但他们看来都说克尔特语，并拥有着基本类似的文化。

与我们看到的克劳狄时的不列颠部落制度相比，凯撒入侵不列颠时的部落制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这次罗马入侵不列颠期间，部落制度还是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在高卢南部，土著部落大都由王制演进到民选官员和部落理事会制，但凯撒到达北高卢时，当地部落基本的政治形式仍是王制。在不列颠，尽管出现了两个国王联合或分而治之的现象，但王制一直延续到克劳狄时期。社会明确划分为军事贵族和占人口一大半的普通农民。祭司和巫师成为第三种集团，他们的地位及其功能尚有争议，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克尔特人以好勇斗狠闻名，他们既进行部落之间的战争，也热衷于部落内部的残杀。在高卢有着各部落首领定期聚会的传统，但在不列颠除非面临巨大危险这样罕见情况，克尔特部落才会联合起来选出一个领导人。这时还谈不上"民族"情感。

到了凯撒时期，南不列颠与北高卢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发现的类型表明两地人民和货物往来主要有两条航线。这时最重要的航线是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在古代统称为阿莫利卡）与西南不列颠之间，尤其是经过多塞特郡亨吉斯特伯里角的一个港口。另一条航线是从位于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上诺曼底和低地国家到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凯撒还谈到，他对一个高卢统治者既在不列颠也在他自己领地上行使权力"印象很深"。凯撒不仅发现不列颠的游兵散勇常常与高卢军队并肩作战反对他，他也被那些从罗马逃来的亡命之徒与其不列颠的朋友和亲族共同挫败过。

要了解凯撒征服高卢和发动对不列颠战役的动机，我们应简

单地了解一下这时罗马的情形。公元前二三世纪的200年里，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城市国家扩张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国家，但它仍袭用传统的政府形式。这个政府从理论上说是民主的，有着人民大会和每年选举一次的执政官，但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公职总是由一个数量相对很少的贵族把持着。元老院名义上是咨询机构，但逐渐成为政府的中枢；它主要由执政官和曾经当选过合格的执政官的人组成。最高官职是两个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几乎完全由元老院阶层中的一个更小的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中各家族都拥有特权。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紧密相连，它们极其重视对宗族祖先崇拜和捍卫光大宗族荣誉。古典世界的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人的名誉——他同等人对他的看法——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罗马，宗族的责任和个人的野心，不断地推动着每个贵族，去追求公职或者去同鼎执政官的宝座，以光宗耀祖。

荣誉主要来自法律和军队这两个领域的成功。一个元老院议员的生涯通常包括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占有职位。在两者之中，赫赫战功能够赢得更大的威望。占有某些资深职位，即使位于执政官之下，也具备统帅军队和统治外省的资格。凯撒同代人，集雄辩家、政治家和伦理家于一身的西塞罗在谈到个人怎样才能获得最伟大的地位时明确断言，扩张帝国比管理帝国更为光荣。

在古代世界，征服战争常常会给征服者带来可观的利益。通过征服，巨量财富流入罗马，仅适合于意大利小邦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现在已日益难以驾驭成为地中海帝国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和诱惑。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体制正在土崩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旧习俗已无法应付新局面。过去是谋求进入极少数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之列，现在则追求独享权力和荣誉。

一个罗马大贵族所具有的突出威望长期以来包括他所能控制的人数。的确，全体人民将他们自己看作贵族的"依附者"。当"保

护人"成为社会的一大特征时，这对像不列颠或是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行省就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到公元前1世纪，因为特别战争而服兵役的旧公民军已由职业军代替。元老院犯了致命的错误，它不是让服役的新兵们从国家那里取得报酬，而是让他们依赖于他们的统帅来获得役金，特别是其退休后的口粮。周期性内战的条件已经具备，共和国在劫难逃。已经形成的这种观念、实践和社会关系将使罗马在恶梦缠身中度过它其余的岁月。对于不列颠来说，这不仅是在随后的帝国历史中将直接影响它的命运的大事件，而且是罗马人在把他们的价值观传播到他们所统治的人口——特别在土著民族的统治阶级身上时取得的巨大成功。的确，创造一种共同的上层阶级文化是帝国自身成功运转的关键，但在许多方面又是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史反映出这种历史的基本脉路。

尤利乌斯·凯撒征服高卢应从罗马共和国末期权力争夺战方面来看待。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两次远征不列颠，也不知道他是否确有征服的打算——尽管这与他渡过莱茵河对日尔曼人进行惩罚性袭击有些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战争对未来的影响。尽管我们因此再也没听到不列颠人在高卢进行战斗，但就直接的军事意义来说，成果并不显著。因为高卢的骚乱，凯撒既难以继续推进他在不列颠取得的胜利，也无力利用不列颠部落短暂联盟降服的好处。

对于罗马人来说，不列颠是一个遥远的、要渡过一个令人生畏的"海洋"才能到达的近乎虚幻的岛国。那时罗马人还难以适应地中海以外的潮汐环境，凯撒在不列颠的冒险无疑给罗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不列颠是个新世界，而在两场轻而易举的战役后，凯撒将其纳入罗马版图。从此，在那些渴望在沙场上建功立业的罗马人思想中，神秘的不列颠始终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并且对

于尤利乌斯家族后继的成员们，凯撒已经创造了一个目标并有过先例。其次，凯撒的经历——不仅在不列颠也在其它各地行军生活中无数次出生入死——为未来从事远征的统帅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

凯撒也为介入不列颠事务树立了重要先例。他既接受一些强有力的国王们降服，又保持与其它国王的友谊。罗马还在不列颠征收年贡或年税。凯撒还将一个从不列颠逃到高卢投奔他的年轻王子安置为埃塞克斯的特里诺文特国王。这个王子的父亲被卡西维洛纳斯杀害，[①] 后者曾被不列颠人同盟推举出来领导他们反对凯撒——但现在他被禁止干涉特里诺文特的事务。所以，如果罗马决定采取行动，罗马就会声称它拥有若干霸权，包括索取钱财的权利和保卫它朋友们的义务。（除非涉及自身利益，否则罗马往往并不这样做，那些名义上受其保护的小国家并不懂得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生活的基本规律，结果自蹈不幸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很看重先例，在凯撒之后，这就更加突出。

凯撒之后的20年，连年内战困扰着罗马世界，内战结果是共和国的终结和凯撒养子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掌权。当凯撒从前在高卢的朋友康米乌斯加入大暴动时，对于这个自己一手扶植为高卢阿特莱巴特人的国王的人，凯撒并没有亲自前去镇压。暴动失败后，康米乌斯逃至不列颠——以前他曾在此充当过凯撒的代理人——并在不列颠的阿特莱巴特人[②] 中建立了一个王朝。这时罗马对不列颠缺乏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的是，我们正在开始考察不列颠各部落并探讨这里一些王朝的历史，康米乌斯的例子特别耐人寻味。他统辖着一个罗马人建立的高卢

---

① 卡图维洛奈部落的首长，公元前54年罗马入侵不列颠时，领导了反对凯撒的斗争。——译者

② 不列颠的一个部落，其领域包括汉普郡和伯克郡的部分地区。——译者

阿特莱巴特“被保护”王国和塞纳河北岸的英吉利海峡边的摩里奈，当时从贝尔盖人[①]集中居住的缪斯河西岸到不列颠的航线要通过这一地区，这样他就控制了航线。稍早于凯撒进军不列颠，看来就已经开始了从高卢的贝尔盖人居住地区迁徙到不列颠的移民运动，在凯撒征服高卢过程中，移民速度可能加快了。

在公元前1世纪的南不列颠，贝尔盖文化占统治地位，就连那些非贝尔盖人的部落也是如此。生活方式正在改变。随着人们活动的多样化，例如制陶已成为手工业者的行当，社会的劳动分工变得更加显著。不列颠技术进入一个高峰时期，这特别表现在金属制品上，它们都铸有卷曲流畅的花纹和纤巧生辉的彩饰，不过这种技艺集中反映在军事首领武器或神殿的装饰品上。在大多数贝尔盖化的地区，土堡常常代替了建于低洼地上的大村落，土堡周围有时修有名符其实的连绵不断的用于防御的土木工事。这些土堡可以视作为罗马城镇的雏形，尽管用地中海地区的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有些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国王住所。今天不列颠地形最令人感兴趣的变化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农村土地使用模式开始广泛地出现，特别是在凯撒和克劳狄（公元前54—公元43年）时期。土地的疆界定期变化和土地定期使用。考古学家们日益感到这一时期可能是一种沿袭至今的土地划分模式的开端。当然，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和拥有它的主人已几经变迁。从这种可信的假设来看，当时不列颠地形的基本风貌一直存在到今。

在第一次远征前，凯撒就在海上消灭了控制往来于阿莫里卡和西南不列颠之间船运贸易的布列塔尼的维内蒂人舰队。考古学表明，大致此时，从贝尔盖人聚居的高卢地区到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航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从这时起，从塞纳河到南安普顿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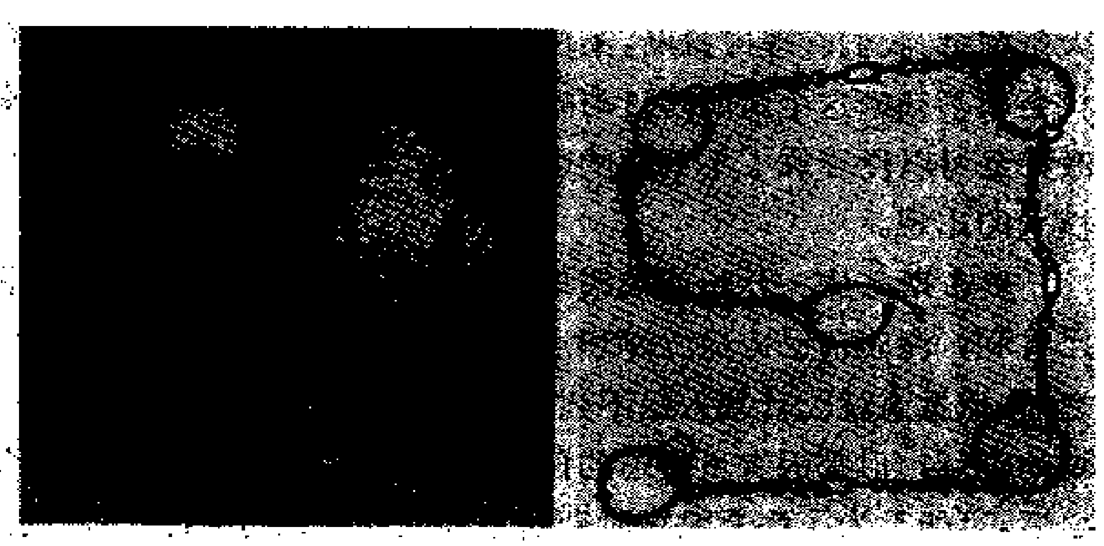
① 属高卢人，公元前2世纪居住在莱茵河下游，曾多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公元1世纪侵入不列颠，占据从怀特岛到布利斯托尔湾的地区。——译者

的海路，从布洛涅到肯特的短途横渡以及从莱茵河和低地国家到埃塞克斯的港口都变得十分重要。今天在不列颠的上述地区找到最巨大的财富和伪造品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确，从公元前 12 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出兵对荷兰和日耳曼进行征服的时候起，新近变得重要的与不列颠的北线联系日益突出。虽然奥古斯都把帝国扩大到易北河的设想最后没有实现，但从这时起大批罗马军队常驻在莱茵河畔。不列颠向帝国出口谷物、皮革、牲口和铁，这对于当时罗马军事活动至关紧要。最新研究表明，不列颠农业技术和效率都是很高的，至少在谷物生产上，除了维持当地人民生活外还有大量剩余。我们有理由推断，莱茵河畔的罗马军队的需求所提供的机会和不列颠这个新的跨过海峡的罗马行省内部市场的形成，刺激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不列颠的财富骤长、社会的变化以及新农业模式的出现。

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凯撒留给人们的记忆对自己有利，深感自己应建立军事声誉。早在最后击败马可·安东尼之前，他看来就已计划入侵不列颠，他至少作出了不下两次实施计划的尝试，但都因有更紧迫的任务半途而废。然而，公元前 26 年之后，可能是为了恢复凯撒时期对不列颠的征税问题，罗马通过已经在进行的谈判发展与不列颠的外交关系，而在同时，为了提高自己在罗马角逐的资本，奥古斯都乐于仍给人留下打算立即征服不列颠的印象。奥古斯都统治晚期或在其继承人提比略统治时期的作家斯特拉波证实，不列颠人在进出口贸易中要向罗马交纳重税。斯特拉波说，罗马没有对不列颠进行轻而易举的征服，是因为考虑到毋需占领就得到不列颠交纳的税收更为合算，这看来反映了当时罗马反对征服不列颠一派的观点。斯特拉波不无深意地补充说，不列颠人当时实际上未对罗马构成任何威胁。

康米乌斯的一个儿子廷康米尤斯续承了他的不列颠王位。大

约在公元前15年，这个位于塞纳河至南安普顿航线不列颠一端的举足轻重的王国，一反常态转而寻求与罗马的友谊，其因可能在于，中心位于哈特福德郡的一个卡图维勒尼人的部落不断强大起来。到底是他们从较小的氏族中吸取力量还是以卡西维勒尼人作为后盾而强大起来仍难以确定；但是，直到克劳狄征服时候的不列颠历史主要是卡图维勒尼人的扩张史。此时罗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廷康米尤斯和另一个国王被驱逐出不列颠以及他们寻求奥古斯都庇护，都被仅仅看作是奥古斯都有行使对不列颠统治权利的依据，或是用作罗马斗争的宣传工具。的确，各种



不列颠贵族使用的银杯(左)和项链

迹象表明，卡图维勒尼人谨慎地不流露出对罗马的公开敌意。和平对于海峡两岸的统治阶级都是有利的。不列颠贵族一直享受着从罗马帝国进口的货物，同时罗马的作家感到，值得一提的不列颠出口货单表明，不列颠人不仅一直通过重要军需品供给罗马军队来换取奢侈品，另外，不列颠的金、银、奴隶和猎狗也流入罗马皇帝以及罗马富豪权贵们的私囊。公元9年，在日耳曼地区受挫以后，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提比略制订了对帝国之外事件不干涉的原则——这与奥古斯都早期实践完全相反。当时不列颠与罗马实际关

系令人满意的程度可以通过一种尺度反映出来：卡图维勒尼人的国王库诺贝利努斯侵占了从前凯撒庇护的特里诺文特人土地，但罗马人并没有给予惩罚，后来这位在莎士比亚笔下被称为辛白林的国王又将其王国中心迁至科尔切斯特。库诺贝利努斯现在有效地控制了通往莱茵河的航线。在不列颠，他可以废置其它王国的国王。通过征服或其它手段，他的王国的力量和影响继续扩大。 12

罗马征服

罗马和不列颠相互容忍的形势无疑有利于罗马。当性情反复无常的盖约（卡利古拉）继承了提比略王位时，卡图维勒尼人——他们也许并不为其他不列颠人欢迎——开始打破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就在这时，库诺贝利努斯放逐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结果他的这个儿子投奔罗马并正式表示服从于皇帝。于是盖约不仅要求不列颠投降，还下达了入侵不列颠的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取消这个命令，但这仍然意义重大。当时入侵的组织工作已经做好，整个惊人的军队集结措施已经开始执行，这并非演习而是真正的行动，它使罗马公民忆及他们的未竟之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3

盖约被谋杀使他的叔叔克劳狄非正式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克劳狄从前因皇族其他人抱有的错误看法而遭轻视，他们认为他神智不健全。实际上他兼通各种常识，明白事理，具有近乎古怪的创造性思想，对历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并且对罗马传统抱有深深的敬意。他继位伊始就面临一起严重的军队叛乱，因此建立军功、赢得荣誉和在罗马获得崇敬成为他的当务之急。自然，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放弃不列颠为他提供的沙场建功的机会的，他不仅要利用这一机会完成以前奥古斯都和盖约取消的入侵，甚至要超过尤利乌斯·凯撒所取得的成就。对于皇帝个人及家族荣誉来说，现在都可谓良机。

干涉还需要一个借口，借口的理由还需充分，这是罗马必不可少的惯例。现在库诺贝利努斯已死，他的王国落入他两个好战的儿子之手——卡拉塔库斯和托戈都穆斯，所以从东部进入不列颠并不理想。南部的廷康米尤斯王国已缩小至海岸线一带，此时由于内部发生政变放逐了廷康米尤斯的兄弟费里卡，入口处也关闭了。费里卡按照由来已久的做法投奔罗马皇帝。整个不列颠充满对罗马帝国的敌意，两岸之间有利可图的交通也受到威胁。同凯撒一样，克劳狄可以应一个不列颠亲王的要求采取行动。

凯撒征战时依靠的是长期在他的麾下斗志昂扬的将军和乐于献身的士兵。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们创建的新的正规常备军仍然依赖将军，但已是更多地基于严密的组织、训练及其建制的长期稳定。此时，作为军队支柱的罗马军团只从罗马公民中招募，他们大部分来自意大利。渐渐地公民殖民地在意大利之外者的行省设立，为军队提供了兵员。每个罗马军团建制在5000人以上，主要是重装步兵，辅以小股骑兵分队、石弩以及其他一些战斗器械。军团也配有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和行政人员。还有一些具备读写能力的特殊士兵以便完成各种各样的管理工作。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辅助"军大多数人不是罗马公民，他们是由土著人组成的非正规军，由本族首领率领加入行省正规军团，这些军团的统帅都是罗马人。每个行省军团人数一般是500人，有骑兵、步兵或混装步兵，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稍次于罗马军团。不过，在古代世界，罗马军团和辅助军享有的待遇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有定期的工资，有保障的职业以及退休后的口粮。教育、训练和自我提高的种种机会——还有得以自肥的私利——使其成为社会变动的一支主要力量。无论是正在服役的还是已经退休的士兵都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举足轻重。辅助军中服役的官兵退休时就享有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儿子也有加入罗马军团的资格。军队成为没有文化的蛮族人

14

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一条绵亘不断的纽带，也是罗马帝国同化新伙伴的最重要的一个酵母。

公元 43 年，罗马开始进军不列颠，出动了 4 个罗马军团和大约同样多的"辅助军"，人数共达 40000 人。与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不列颠的军事力量仍然带有原始特点。贵族仍是不列颠常备武士，他们最喜欢的作战工具是战车，他们乘着战车在战场上旋风般地进攻或快速撤退，他们的驾车技术极为娴熟。骑兵在社会中的地位难以确定：他们可能是那些自己有能力备马参战的男子，但不清楚他们生活中主要职能是否就是战斗。不列颠军队的士兵主要是招募来的农民。他们不像罗马军队那样身着盔甲，而是衣衫褴褛，身上没有任何防护，只是依赖速度、士气和锋利的长矛。在他们接近罗马军阵之前，许多人极易于在罗马人雨点般的标枪下丧生。在白刃战时，他们的长矛在队形密集、手拿短剑的罗马步兵面前相形见绌。克尔特军队打败罗马军队常常依靠突然袭击、伏击和绝对优势的兵力来歼灭罗马一些孤立无援的军队。在阵地战中，他们完全不敌罗马军团，罗马统帅也想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决战，或者将他们围困于城堡之中以便利用攻城工具和大炮来歼灭他们或是通过饥饿使他们投降。与罗马人作战的不列颠农民士兵最大的缺陷也许是他们一身二任，他们一年之中只能有很少时间可以参加作战。如果遇到持久战，那么随着田地抛荒，饥馑就会到来。相反，罗马军队的供应体制保证了罗马军队只要天气允许就可以随便作战多长时间，也能够建筑带有防御工事和丰富储藏的军营来度过持久战中的冬天。这种供给体制可以使罗马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和提供长期占领所需要的军事基地。面对这样的对手，不列颠进行了时间如此之长、困难如此艰巨的抵抗实属难能可贵。

一些不列颠部落激烈地抵抗过罗马入侵，其它部落无疑对于

卡图维勒尼人在南不列颠的霸权毁灭幸灾乐祸，它们有的轻而易举地就投降了罗马或是站在罗马人一边。战争结果，11 个不列颠国王对皇帝称臣，皇帝胜利进入科尔切斯特。为了征服不列颠，克劳狄动用了帝国的精锐部队，并动用了象队。罗马恢复了共和国时期的凯旋式来迎接这位不列颠的征服者，克劳狄自豪地宣称扩大了帝国版图，特别因为这是继地中海征服后又一次对海洋的征服(这并不夸大，起初军队还反对渡海作战。)

到公元 47 年，克劳狄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远及塞文河和特伦特河的不列颠领土。现在将不列颠纳入罗马帝国的正式行省一事提上了日程。不列颠总督享有很高的地位，总督位置将为卸任执政官保留，总督还将统帅比其它行省更多的军团在此统治。在不列颠行省成立的前 50 年，在此任职的罗马人应是经过挑选、拥有特别声望的人。这不仅因为在不列颠可以通过军功赢得荣誉，而且直至公元 4 世纪末期，不列颠的富庶美名仍然使罗马垂涎欲滴——尽管我们从未有什么数字来比较从不列颠获得的收入与在不列颠的防务和行政开支。到公元47年，作为胜利者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不列颠的矿物资源开采已经开始(银藏量最丰富的门迪普丘陵直到今天在国家控制下仍在开采)。如果罗马满足于它有效控制的不列颠地区，本可以省了麻烦和减少花费，但是即使好战和喜怒无常的北方和威尔士部落并未构成对南部和平发展的威胁，也很难说罗马扩张的欲望就能长期被抑制住。事实上，入侵后的两三年里发生的若干事件就使罗马踏上了另外一条历史进程。

罗马在各行省总是将行政开支尽量地统统转嫁给那些效忠于它的各地。克劳狄尽可能地利用那些可以信赖的“被保护”国王们去进行统治——这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包括老王国费里卡在内的南部不列颠一部分富裕地带交给了考吉都努斯来统治，此人并不是不列颠人。诺福克的爱西尼人被当作“盟友”看待。罗马与统

辖地区之外的布里甘特女王卡提曼杜阿达成非正式的谅解(布里甘特人是一个由大多数北英格兰民族组成的大联盟),目的是避免 16 行省受到北方部落的袭击。这项政策的成功一方面表现在卡提曼杜阿将逃亡的卡拉塔库斯交给克劳狄,另一方面是考吉都努斯长期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他在后来的不列颠危机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总督原打算主要通过部落来管理行省其余部分,按照罗马地方政府单位(邦, civitates)的构成方法重新组合,贵族们形成议事会,拥有地方行政机构——罗马宪政的缩影。实际上,这种地方行政机构往往通过机构调整而成。此外,不列颠的财政长官的书面命令也在行省内部推行。这些行省的地方财政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很清楚,地方财政长官对于王室土地和王室专利商品负有特别责任(皇帝自然占有被击败的王国的王室庄园以及通过继承和没收的方式得到其他土地);但是他们也成为对皇帝的军事和司法代表总督的牵制。地方财政长官与总督的摩擦频繁而又并非完全无意。

根据罗马对外部骚扰作出反应等一系列事件可以肯定,不列颠行省的疆界将不会限于公元47年所征服的不列颠南部。罗马 17 不仅开始反击骚扰,也解除了行省之内不列颠人的武装。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帝国境内禁止平民携带武器——在罗马时代,日常安全是至关紧要的事。解除不列颠人武装最后肯定要发生,可是对于那些主动降服罗马的人来说,他们对此难以接受。爱西尼人举行了暴动但被武力镇压,这使附属国的真正地位暴露无遗。曾驻扎在科尔切斯特的罗马军团在公元49年由一支老兵组成的罗马军团接防,这支军团下一步任务就是进行扩张。罗马打算使科尔切斯特成为帝国祭祀的一个地方——罗马和皇族旨在维持不列颠行省忠诚于帝国的正宗崇拜——让老兵们成为镇压任何可能叛

乱的堡垒。实际上，科尔切斯特现在是一座没有戍军的公民城市。或许就在此时，伦敦作为供应港口建立了。很可能，从一开始罗马就打算在适当时候使伦敦成为不列颠的行政中心。从前，人们猜测这只是商人们的偶然决定，实际上十有八九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埃塞克斯海岸的重要性现在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战，按照罗马的设计，处于日益形成为交通枢纽的伦敦不久又成为商业中心。

50 年代是城市发展的十年。只有农业偏远地带没有多大变化，至少在表面上，农业朝商品经济方向进展仍然缓慢。到 60 年代，随着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着手制服北威尔士的好惹事生非的部落，行省发展开始走上轨道。哪里出问题啦？为什么行省居民在罗马的老朋友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领导下开始成群结队疯狂地毁灭罗马的一切？

我们仅有罗马单方面的记述，就这也可看出行省政治中小自玩忽职守大至十恶不赦的腐败。塔西陀精辟地谈到不列颠民族特征："不列颠人负担着征兵、贡俸和其他一些对罗马帝国的义务，他们没有怨言，但这都是以得到公平对待作为条件，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已到了极限，要知道他们忍耐的限度是受人统治而不是当奴隶"。不能把公元 61 年事件的责任都归结到作为不列颠传统戏剧中反面人物的罗马地方财政长官。总督应分担其中部分责任，但问题不能到此为止。我们难以直接指责此时在位的小尼禄，因为有两个"好"顾问，即"完美无缺执政官"布鲁斯和哲学家兼戏剧家的塞涅卡左右着他。他们两个人中至少塞涅卡极有可能知道即将在不列颠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突然冷酷无情地索回他不断借给不列颠头面人物的高利贷巨款。来自不列颠的各种报告充分表明不列颠要发生危及他的投资的骚乱。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对罗马的不满主要来自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布迪克的丈夫普拉苏

塔古斯是位受罗马保护的爱西尼国王，去世时将其半数财富馈赠 19
给皇帝以期保住他的王国及其家族。然而地方财政长官和总督的代理人却把这个行动看成是敌人无条件的纳贡，并进而没收了国王的全部财富，赶走了庄园中的贵族，进一步加重税收和征兵。特里诺文特人也遭到了侮辱：一方面罗马殖民者——受到服役士兵积极支持——侵占其土地和肆意凌辱，另一方面用作提高对皇帝忠诚的帝国祭礼负担也落在贵族头上。他们（或许也包括其它邦的贵族）正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命运，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是重申克劳狄曾对他们作过的有关权利保证和拒还塞涅卡的贷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帝国祭礼的神圣的克劳狄庙竟成为不列颠人仇视的焦点。

作为对布迪克抗议的回答，布迪克遭到鞭打，女儿被强奸。布迪克统治的部落和她的邻居特里诺文特人被激怒了，加上其它的城邦的支持（很清楚没有考吉都努斯），女王率军横扫南不列颠，烧毁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翁（靠近圣奥尔本），对被抓住的罗马人或罗马同情者都施以酷刑，无情打击在不列颠的罗马残余部队。罗马的不列颠总督几乎丢掉了整个不列颠。在罗马彻底取胜后，总督抓住了布迪克，他对不列颠的惩罚较之布迪克对罗马人的惩罚有过之无不及。一时看上去似乎不列颠行省毁灭与否完全操纵在罗马人手中。的确，尼禄在他的某一统治阶段——可能更早，也可能就在此时——曾倾向于一劳永逸地放弃不列颠。后来两个因素使不列颠仍然成为罗马行省存留下来：一个名叫克拉斯西纳斯的具有高卢血统的杰出的行省地方财政长官来到不列颠，另一个因素是罗马召回了总督。

在布迪克暴动平息后的十年里，罗马不列颠战后恢复进展得较慢。一些证据表明，在尼禄所指定的最后一位不列颠总督任内，恢复速度开始加快，但公元 69 年殃及整个帝国的内战（“四帝之

战”)的爆发重新点燃了将军们争夺帝国统治的欲火。然而，战争的结果是出现了几位称弗拉维的皇帝的生气勃勃的新政府。对不列颠来说，这意味着行省的复兴和罗马权力的扩大。塔西陀说：“大将和大军们来了，我们敌人的希望破灭了”。

在内战使罗马世界疲于应付的同时，布里甘特人中爆发了一次内哄，它使卡提曼杜阿失去了王国的统治权，罗马军队也卷入其中。不列颠从此不再平静。由布迪克和从前布里甘特人的骚乱已经动摇了的罗马对附属王国的政策现在最后失去了信誉。这几年里，甚至考吉都努斯也可能得到罗马人的年金而退休住进豪华的菲什伯恩别墅。到公元 83 年或 84 年，相继到任的一些第一流的总督使罗马军队推进到苏格兰最北部并派军在高地边缘戍守——
20 并严格推行苏格兰的罗马化。塔西陀在描述他岳父阿古利可拉的书中用了下述概括了弗拉维时期不列颠的整体特征的话：

> “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他们有着随时作战的充分准备)由于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阿古利可拉对于修盖庙宇、公共场所(fora)和私人住宅(domus)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他奖励那些勤勤勉勉的，饬斥那些游手好闲的；因此居民不再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动的竞争来响应他的鼓励了。他使酋长的儿子们都接受通达的教育。他不喜欢高卢人的勤勉，而对不列颠人的智慧表示特别的嘉许，因此，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另外，他们还以穿着罗马人的衣裳为荣，穿拖袈(toga)之风大为流行。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porticus)、浴池和优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却由于没有经验而称之为文明。”

从一定程度上说，弗拉维时期的这种城市化并不完全成功。122 年，皇帝哈德良驾临不列颠，推动了不列颠更为牢固和规模更大的城市化发展，原来的建设方案被实施或恢复，大量新的建设着

手进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公元 70 年到公元 2 世纪 60 年代是作为罗马帝国一部分的不列颠开始真正成为具有罗马和自身双重特征的时代。罗马中央采纳了新的方法，将日常行政管理权力或多或少地普遍移交给那些取代了旧的附属国的不列颠地方贵族。这种把土著吸收到罗马体系中来的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它赢得了土著贵族的支持，尼禄时期曾因丧失了这种支持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塔西陀书中值得一读的内容。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在公元 1 世纪后期和 2 世纪初叶及中期，罗马不列颠城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邦拥有了市区中心；广场和大会堂提供了市场、法院、市府和会议室；罗马世界的公共浴室为市民提供了消遣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场所，自动的供水，纪念帝国伟人和地方精英的公共纪念碑，另外在有些地方还有剧院和竞技场。这种考古证据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表明一般都是地方名士们(地方议事会成员或因个人名气)自己负担这些社交娱乐和设施建设费用，国家和皇帝则分文不出。同一地方有联系的富有的奴隶主出于慈善对城镇偶尔也会慷慨解囊，或者在帝国朝廷中为城镇发展出点力。只在极少的、同时也是大肆宣扬的场合下，皇帝才会通过他们的代表给城市一笔赞助。

自然，相对说来人数很少的罗马化了的土著贵族不是城市发展依赖的唯一力量。随着城镇生活的广为传播而出现的乡间“维拉”① ——在这个阶段，土著们的住宅大都被朴实却舒适的罗马房屋所取代——表明不列颠的小乡绅们仍然同土地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小乡绅非常可能仍然住在自己庄园里，他们的财富里也为许多普通农民分享。这个时期，从军团退役的老兵主要集中在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少数城市：科尔切斯特、林肯和格洛斯特。因而，整个来看，一支由官员、专业人员、商人和熟练工匠组成的充满活力

21

① 维拉，拉丁文为villa，是指一种与农业相连的农村居所。——译者

的人群的出现同样起着推动城镇蓬勃兴起的作用。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大都是从帝国其他地区来的移民和造访者，许多官员则是因短期服职来到行[22]省。尽管如此，克尔特人仍占罗马不列颠人口绝大多数。罗马军队的士兵也不断从他们驻扎的行省来充实兵员。像他们大多数同代人一样，不列颠人在服罗马兵役时没有高人一等的罗马公民权，但作为退役老兵，他们得到了罗马公民权和丰厚的退伍金，这些不列颠人逐渐地明显形成了罗马化社会核心力量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主人们让奴隶从事商业活动，罗马世界频繁给予奴隶自由或允许他们赎买自由权扩大了熟练劳动人口，也增加了商人的数量。无论农业劳动者的条件怎么样，在熟练的和有知识的人口中社会流动程度必然很高。当大部分不列颠普通百姓无疑仍以务农为生时——我们要知道工业也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帝国早期城镇逐渐变成了公众生活的中心，为内陆的穷乡僻壤提供了交换和服务的场所，也给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创造了发展的广泛机会。

因此，哈德良复兴已逐渐废驰的弗拉维皇帝们实行的种种制度就具有重要意义了。但是他对不列颠行省大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哈德良是个不知疲倦、具有非凡个性与精力的人，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行省旅行中度过的。他是为数不多的经过深思熟虑而反对帝国扩张传统的皇帝之一，因而不受罗马贵族的欢迎。很难搞清楚到底是由于内耗还是计划本身的缺陷，他的各种庞大计划成少败多，在不列颠至少可以举出三个重要例子。罗马扩张至顶点以后的30年间，既因为别处需要军队，也由于不列颠北部的军事活动严重受挫，罗马沿着其军队撤退时的界限修建了哈德良长城。这种政策符合哈德良限制帝国扩张的倾向，长城的设计也极具有创造性。然而，通过对早期建设史进行详细研究，我

们可以看到，部分上是由于这一原因，哈德良在位时期建造计划一再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要想完成原来的设计，必然超出原计划中的开支、时间及预算许多倍。与此类似，向东盎格鲁低地进行的农业殖民，牵涉到一项大面积的水利工程，但几年之后许多农场纷纷失败。哈德良时代的伦敦既有破旧的弗拉维时期的广场和大会堂，也有取而代之的两倍于一般设计的复杂建筑。在高卢和别的地方，哈德良为帮助城市建设公共建筑进行了干预。伦敦的情况可能与皇帝本人在公元 122 年访问伦敦有关，经他支持，这一时期伦敦城内建造了一座坚固耐久的堡垒——这种情况在罗马城以外的帝国城市并不常见。但是后来，在哈德良在位时期，一场大火几乎使伦敦化为废墟，由于重建不力，到公元 2 世纪后半期，伦敦日益显示出颓败的迹象。

哈德良时期的边疆是从泰恩河到索尔怀谷，这是不列颠行省 24 历史上明确规定的界限。不过，哈德良之后至少发生了三次向北的征服战争，其中两次都是御驾亲征。较长时期内，军队驻守地点一直在哈德良长城之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该地区。无疑，在 138 年哈德良去世前的几个月内，正准备进行一次对苏格兰新的入侵。到公元 142 年，继哈德良出任皇帝的并不好战的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的军队已在可以建功立业的不列颠逐鹿场发动了一次征服，这很像克劳狄当年的情形。远至泰恩河河谷的苏格兰人入罗马之手，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新建立了一道较短和简单的直线屏障。今天沿着我们熟知的安敦尼长城仍可以凭吊当年精心建立的纪念性石刻浮雕，它们记载着罗马进行无限扩张的最后阶段的激情。

在安敦尼统治的这一初期，我们看到的城乡发展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在其他地方，一般认为帝国处于安定和繁荣的黄金时代。在商品经济和大范围长途贸易基础上，不列颠也已充分纳入了帝

国早期的经济运行体制。从文化上说，罗马时尚盛行，古典艺术和装饰被广泛采纳。从历史来看，罗马征服对不列颠最重要的艺术冲击或许是带来了各种造型艺术风格，特别是雕刻、壁画和马赛克工艺，以及五花八门的技艺和手工业——例如珠宝、陶器、家具和名目繁多的家用商品。罗马不列颠的第一流艺术品在数量上无法与南高卢相提并论，但确实存在。然而，普通的工艺品应用得十分普及。正是这些手工艺品，而不是那些幸存的高级艺术品揭示了自前罗马时期铁器时代以来在不列颠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仅从罗马的陶制品就可以看出不列颠是一个既与从前截然不同也与今天相当不同的"浪费的社会"。

上述一切影响了不列颠人最深层的心理意识。这种罗马和不列颠之间的相互潜移默化，我们可以从宗教上看到最有说服力的根据。从罗马国家正式的宗教仪式——特别是朱比特、朱诺和密涅瓦——和新近才出现的帝国祭礼，加上从西部和东方传入的五花八门的宗教到当地克尔特人的各种崇拜，罗马不列颠真可谓是一个宗教大观园。外省人一般都保留着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习俗：一个名叫狄奥多拉的希腊女祭司在科布里奇用本族语言向推罗的赫拉克勒斯半人半神像献上一个祭坛；尼德兰的士兵们在哈德良长城边的豪斯斯特兹也为他的本族女神阿莱西雅格·鲍狄希里亚和弗里加比斯、比达和菲米连纳建立祭坛。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出现了古典的神和克尔特神祇们的"合成"或者说"融合"。这是一个困难而无法弄清的过程，因为克尔特宗教不像罗马那样把神祇分得很清，但却非常广泛。很显然，这种"融合"并不是表面现象。举例来说，一个名叫卢修斯·马西斯·默姆的占卜者为了祭祀苏里斯·密涅瓦——不列颠的温泉健康神祇和罗马智慧女神融合而成的神——在巴斯建立了一座带有神殿和若干浴室的祭坛。占卜者的职责是通过祭祀牺牲的内脏来预卜未

26

来。这种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的古代习俗要追溯到意大利宗教中的早期埃特鲁斯坎分支，但在这里又和一个半克尔特神祇发生了联系。再就是在赫林岛，一个前罗马铁器时代的主要神殿很可能与费里卡王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可能由考吉都努斯委托的一个高卢建筑师用罗马的材料加以重建。这是一个考古学家们熟知的遍布不列颠、高卢和罗马日耳曼地区的被称作“罗马—克尔特神庙”的一批与众不同的神龛中的一个特别的例子。这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克尔特人从前存有的建筑类型在罗马建筑中的地位。这些建筑有诸如矩形、圆形或者多边形等各种结构，一般都是箱式形状并带有一条同心环绕的“回廊”，同时常常位于有时保存了前罗马时代以来的圣园里，这些园林有着圈定的地界，很快就受到罗马人的欢迎。

还有一种并非正式的情形，例如我们在韦尔代尔发现，一个骑兵军官为了能够捕捉到以前谁也没有提到过的“奇重无比的野猪”而向西尔瓦纳斯(一个罗马装束的克尔特乡村神祇)献礼，在格里塔桥，两位妇女为当地仙女设置了一个祭坛。这些情况典型地反映了无论是克尔特人还是罗马人都有自己各种深信不疑的地方神祇。罗马人顺利地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土地上的各路神灵。很清楚，即使为了得到神佑，他们所表现出的急于知道神的名目和崇拜的热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深刻的内涵是对灵魂的信奉和安抚自己的需要。这种精灵崇拜是罗马宗教的核心。这一点与不列颠宗教非常类似，精灵崇拜主要是信奉炉灶、家庭、家族和祖先的各种地方化的神灵，还有每个地方的和万物的神灵。从时间上看，早在奥林匹亚古典诸神广泛流行之前，精灵崇拜就已经存在了。咒语是用黑色素写的，一些咒语不堪入耳。从靠近包尔道克的克劳特霍尔出土的极其令人注目的金属盘子上反写着(巫术中的惯例)一条预言：“特此诅咒塔西陀，她将腐烂如同污血”。因此人们在发掘格 27

洛斯特郡阿利的一座神庙时，发现这里带有咒语的书板数量是整个罗马世界其余地方咒语书板总数的两倍，决非偶然。从古典时期的一种资料中我们得知，不列颠人热衷于宗教仪式。罗马人所作出的特别贡献，就是提供了新的工艺和建筑形式来表达宗教感情，使用罗马文字也使不列颠人的宗教活动中的各种情绪变得清晰和持久了。在同等意义上折射着罗马法律的罗马宗教活动有赖于每一个条例和每句话都得到精确无误的执行。尽管罗马化的不列颠人在表达自己的奉献和咒语时用词极力模仿罗马人，但却无法摆脱本族仪式固有的种种倾向性。

在入侵苏格兰之后，安托尼努斯·皮乌斯在罗马世界其他各地没有再发动扩张战争。到2世纪60年代，形势开始发生变化。158年前后的不列颠形势日益变得严峻，有证据表明，布里甘特人曾遭到镇压，但这种对南苏格兰占领的计划只有冒险地将比利牛斯半岛驻军调来才有可能；另外看起来安敦尼长城还一度失守。或许在一次惩罚性的战役之后，罗马人就轻而易举地再次征服苏格兰，罗马军队紧接着又全部退到哈德良长城一线。在下一个皇帝即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蛮族对帝国边疆压力的局势变得日益严峻。罗马人的主动权已经丧失，但他们历经几个世纪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对一个从大陆来的旅行者来说，不列颠与北高卢一种特别醒目的差异在于它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是齐头并进的，可罗马人征服不列颠还不到100年。常备军的存在将使异乡人意识到不列颠总督最关心的事总是防务：这里有三个罗马军团，两个分别驻扎在西部切斯特的要塞和南威尔士的卡那伦，一个驻扎在约克的北部。另外，不列颠还有一大批辅助军队，他们大都忙于控制行省内那些表面上太平无事的山地部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建立了网络相联的要塞并在大道上巡逻。南不列颠最醒目的特点是存在着城墙。

城墙的修建并不是(在某个时期)对一起特定的危机作出的一般反应。它的建立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早始于公元1世纪像温彻斯特和维多拉米翁这样的城镇，到3世纪70年代它们仍处于发展之中。到公元2世纪初叶，三个盛名显赫的殖民地建了城墙，城市之间的竞争因素可能使其他地方受到震动。但是，建造城墙的原因只能在于某种足够重要的、可以消弭皇帝的不快，以致他允许建造可能落入敌人或暴动者手里的城堡的因素(地方要为修城墙出钱，但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同时，即使不列颠本身三番五次地构成对罗马的挑战，建筑城墙也有其长远的考虑，这样才不至于被皇帝中止以致半途而废。缺乏防御工事的维拉将难以统治混乱的乡村。



罗马大道

因此担心农民暴动也是一个原因。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让军团驻扎在行省里，还是让辅助军驻扎在他们应该呆的地方，都是因为担心蛮族从外部的入侵和行省里的山民暴动。位于大道上的城镇无疑成了这些流动作战的部落和乱党明摆的靶子。在古代世界，

除非带有攻城器械和能维持一次长期围攻的必需后勤支援，或者城镇内部有人接应，否则城墙在某种程度上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城墙是市民防御反叛部落最好的手段，城墙在不列颠盛行也反映了它与高卢不同之处即内部暴动始终是它最大的威胁。

建筑城墙需要很长时间，有时还要迅速地加以修补。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带有土木防御工事的不列颠城镇附近明显地出现了日益迫近的危机迹象。例如在赛伦塞斯特，好像由于紧急情况打断了本来缓慢的建筑工程而抢建了防御工事，匆匆修建了一个土堡用来与已建成的雄伟的城市石门和连绵的塔楼呼应。这一时期的危机虽然有帝国皇帝候选人之争，最大的可能还是在180年前后与蛮族入侵边疆同时爆发的暴动。遭到破坏的地方非常多，一个罗马将军也战死了。在193至197年参加帝位之争的不列颠总督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这场危机中最多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并无多少表演。

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的野心所产生的重大事件却无疑揭开了帝国新时代的帷幕，同时不列颠的命运与它隔海相望的近邻高卢也分道扬镳了。29 要不是天限人寿，马可·奥里略在多瑙河两岸的战争也许会实现他征服多瑙河北岸中欧地区的目标，但实际结果却标志着势不可挡的蛮族对帝国西部侵蚀的开始。皇位继承体制在180年崩溃，这个体制100多年来曾造就过一些很有甚至极有才干的皇帝。不久，马可之子、鲁莽的康茂德继承皇位，他同时点燃不列颠和多瑙河地区的战火。在不列颠和其它地方，皇帝试图严肃军纪，但不得其果。一时又出现了皇帝们走马灯式的轮换和内战频仍。尽管这种局面不久就结束了，但其结果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也给整个帝国体制带来了其它深远的变化。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高卢败北之后，人面铁心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然而，康茂德远未

能恢复以前一百年中的忠诚美德，他所采取的延续他自己的王朝的战略使军队利益至高无上。

3世纪的皇帝们不再寻找合法统治的借口。在2世纪时，皇帝们还都怀着不同程度的诚意来努力控制政府的内政和军事职能，现在元老阶层已屈服于职业军人。军队日益为职业军人出身的职业军官所控制。随着外省人越来越多地成为罗马公民，从前的罗马人和没有公民权的外省人的区别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晰分明的新阶级结构——上等人和下等人。意味深长的是士兵们属于上等人。到3世纪中叶，通货膨胀如同脱缰之马使罗马货币的信用一落千丈，过去那种仅有少数主要的生产中心、以基于商品经济的长途贩运为手段来联系整个罗马世界的经济模式日益由更加地方化的各种工业所取代。

表面上看，3世纪的最初25年，依据武力镇压，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及其王朝使帝国重新稳定下来，但实际上其自身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3世纪中叶，随着军官们忠诚的变化，皇帝接连被刺，皇帝又像走马灯式地更换起来。过去突出的个人野心追求加上罗马士兵追随统帅的心态都越发不可收拾。此时，随着蛮族人对帝国东部和西部的袭击，罗马灭亡的警钟已经敲响。在东方，新近崛起的生气勃勃的波斯帝国俘虏了皇帝瓦勒里安，同时日耳曼人接连不断地洗劫没有城墙的高卢城市，也使罗马难以利用驻扎在莱茵河两岸的常备军给予其城镇和领土更多的保护。到260年，帝国的很多地方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

从前人们认为，尽管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大陆上被塞维鲁击败导致罗马取消了不列颠的驻军，从而为一次大规模的蛮族人侵敞开了大门，但在此之前，不列颠已经受过类似的蹂躏。考古发现推翻了这种假设，在塞维鲁晚年，不列颠北方部落对于边疆的骚扰的确使其感到在不列颠发动一次新的征服战争很有必要。

罗马雄心没有衰减。这时，罗马人的打算是完全征服苏格兰，完成对不列颠整个岛屿的征服。确实有理由说，塞维鲁王朝在不列颠的利益使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的不列颠行省复兴了。或许由于皇帝亲自造访的关系，伦敦地位升高了，不仅有了新的公共建筑，而且修建了不列颠最长的城墙。在塞维鲁时期，伦敦码头一度再现连绵近达一英里之长的宏伟风貌。在策划战争时，皇帝行营可能在约克。自从2世纪80年代初蛮族入侵失败以来，安敦尼长城以北的很多堡垒进行了修建，不过其中很多堡垒还是荒废了。有理由认为，从前在伦敦行使的一些政府职能已经在约克行使了，或许时间还要在安敦尼重新征服苏格兰之前，这次征服进一步扩大了不列颠的交通联系。早在3世纪，军团堡垒附近发展起来的城市 32 因为罗马荣誉殖民团队的移入而抬高了身望。因此并不奇怪，在塞维鲁时期某个难以确切断定的时间，不列颠被划成两个行省，伦敦和约克分别为两个省府所在地。这种结果是与罗马减少总督控制军队数量的新政策相一致的，却成为骚乱的诱饵。

原计划对苏格兰的征服撤消了——这是在取得很多巨大胜利之后，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皇帝去世，其二是皇帝继承人受到各方面压力。尽管如此，边疆安全目的还是达到了。整个不列颠没有出现帝国其它地方的各种灾难。发展正在缓慢进行，城镇仍然有生气，维拉如果说没有扩大也仍然与以前差不多。从制陶业这个古代工业标志来看，不列颠的工业由于大陆陷入内忧外患而收益不浅。但与预料相反，一些公共建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例如对洪水过后形成的沼泽地进行的恢复工程。不列颠的防御工事陆续被整修一新，南部和东部的海岸线一带建筑了新的堡垒，在布兰卡斯特和雷卡尔弗的这种工程可能出于控制不列颠到大陆航线的意图，当时蛮族的海盗威胁还不是十分突出。在高卢，公元260年日耳曼人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大——不过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罗马的中央政府对此失去了控制能力。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拥戴着一个独立的皇帝，共同形成了所谓的"高卢行省帝国"。在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时已经有这种组合的前兆，后来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新出现。然而，就当时来说，占有军事力量强大且未受到削弱的、仍然和平昌盛的不列颠，尽管价值被天方夜谭地夸大了，对高卢皇帝们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安慰。

帝国晚期的不列颠

在3世纪70年代，迫在眉睫的帝国崩溃危险——所谓迫在眉睫是事后才有的认识——避免了。在那时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头脑中根本没有罗马可能陷落的概念。皇帝和想要成为皇帝或皇帝的制造者们进行着无休止的谋杀，但确有若干士兵出身的杰出皇帝恢复了对蛮族的军事均势，废除了重叠的行政机构，着手修补国家习惯的和制度化的组织。这种努力的确带来了效果，使得帝国体制在帝国西部又持续了两个世纪（本来还可能再长些），在东部维持了12个世纪。274年，皇帝奥勒良消灭了高卢帝国，不列颠又再度受辖于中央政府。然而，随后不列颠的命运就与从前独立的西北地区的高卢部分大不相同。据文字资料记载，276年高卢的城镇仍无城墙，蛮族的几次入侵就蹂躏了十五六个城镇，后来又被罗马人夺回。在法国东北部，考古学显示，一个包括大型农舍和庄 33 园以非常密集形式而著称的地区却在3世纪末叶一个维拉跟着一个维拉地人去楼空。这些房舍以后再也没人居住。

不列颠和高卢的对比是鲜明的。在3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建筑物，没有出现普遍忽视建筑的现象，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日益倾向于认为，一批数量骤增的新建筑特别是维拉在270至275年前后曾被扩建，很多维拉也得到了改善，例如在科茨沃尔德丘陵西部边缘的威特卡布和弗罗塞斯特宫的维

拉。上述现象引起一个有趣的假设：有过一次从高卢到不列颠的"资本转移"。虽然这个理论尚无有力的证据，但稍加修正还是很吸引人的。无疑，人们长期认为在4世纪达到高峰的罗马化不列颠别墅时代实际上开始于3世纪70年代，但地主们从他们位于废墟之上的高卢庄园"抽出资本"却不大可能（换言之即高价卖出）。罗马在3世纪末收复这些庄园后将此作为荒地转交给政府迁来的移民。"资本转移"论点带有一种十分狭隘的土地占有制度观念，其中含有一条没有明说的假定，即典型的行省地主仅拥有一个庄园并在维拉里打发大半生时光。真正的情况是，罗马世界中的上层阶级普遍拥有一个以上的庄园，在这里土地财富是富有和地位最有力的表征，他们常常同时在帝国各地拥有土地。以这时的不列颠和高卢为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形势危险时，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的地主决定把他们的住处从高卢搬到一个可以最为安全地置放他们财富的避难所。在帝国时期的高卢行省，那些较为谨慎的地主可能已经开始了这种转移运动。一小部分零散的证据表明，在276年后高卢城市最后建筑城墙时，这些环形城墙尽管非常坚固，但一般都很短（不像不列颠），与其说是城墙倒不如说很像那些非常坚固的要塞。因此，如果再没有与城市有切身地方利益的达贵官人们解囊赞助保卫城区的基金，这种城市在战争中的后果可以想见。

从建筑上来看，这些高卢式的要塞城的城墙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不列颠城墙很相像，但是高卢的城墙一般只限于城市，一般的镇上都没有。南不列颠海岸线建有大量的新要塞——一律都是由高的石墙和巨大突出的塔楼组成，从前的要塞，例如布兰卡斯特和雷卡尔弗，都按照这种形式现代化了。在较晚时期——5世纪——这些要塞统归撒克逊海岸的一个统帅指挥，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要塞本来就是为了抵抗撒克逊海盗的防御体系。这可能把时间搞

颠倒了。有证据表明，奥勒良的继位者普罗布斯通过在不列颠和高卢建立数量相当的海岸要塞进一步控制了海峡两岸，但其主要 34 目的至今还不清楚。从普罗布斯不止一次平息的不列颠反叛的严重势态可以想见此时的“撒克逊海岸”主要用来保持帝国内部稳定而不是作为边疆的防卫。不列颠是帝国的主要财产——在帝国危机四伏年代更是如此，要想保住这笔财富，控制海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种观点通过一件令人震惊的形式得到验证：287 年，负责清除出没于海峡一带海盗骚扰的一名罗马资深军官卡劳希乌斯涉嫌放纵海盗抢劫，然后将其擒获来私吞赃物。案发之前，卡劳希乌斯率军反叛并控制了不列颠，不列颠再次落入土皇帝之手。这件事被渲染夸大了，其实包括卡劳希乌斯在内，没有任何罗马人在卡劳希乌斯称帝之前或之后有把不列颠从罗马帝国中分裂出来的想法。卡劳希乌斯也是很典型的，他只是温和地要求与其帝国同僚们一样享有同等的铸币权和恩惠，事实上他的帝国同僚们也控制帝国其余部分，只是没有他这种分庭抗礼的恶名。由于海洋的屏障，卡劳希乌斯政权显得相当巩固。卡劳希乌斯最后被其亲信阿利克塔斯赶下台并加以杀害，时间是 293 年，当时他在布格涅包围战之后丧失了大陆的立足点，不过罗马中央政府最后控制不列颠还在 3 年之后。海峡再次证明是一道得天独厚的天然防线。

除了士兵们士气不旺和运气不佳导致了阿利克塔斯失败——原因还包括不列颠戍军对阿利克塔斯的事业缺乏热情，同时 296 35 年不列颠叛乱者们面对的是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在这短短的几年间，罗马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我们才把这段时期称之为“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是改革的领导者。他打着像奥古斯都这样罗马先辈的幌子，贯彻他创议的改革措施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创建一套四帝制度，有两个称为“奥古斯都”的

正帝和两个称为"凯撒"的副帝，"凯撒"是"奥古斯都"的自然继承人，目的是整治帝国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各行省面积一再缩小，将其组成"主教辖区"，受制于一个称为代理人的新的平民军官阶层，总督们（不再统帅军队）对他们负责。在新统帅率领下，相当于从前编制两倍的军队巩固了边疆。皇帝还在其下级中广插耳目以防国内阴谋和军队叛乱。行政机构空前膨胀。凡此种种，对艺术、时尚和风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100年中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人力短缺问题现在被通过对劳动力转移的严厉控制和形成许多世袭职业解决了。土地问题最为严重。共和国晚期那种依赖对外战争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奴隶的庄园体制，在帝国早期已经普遍过渡到雇佣大批订有短期租约的自由租地农。3世纪糟糕透顶的经济环境对帝国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促使了土地的转让。面对这种情况，戴克里先在法律中正式承认了隶农。政府制订详尽的物价立法（如关于不列颠的粗呢外套、地毯、啤酒价格），试图解决——无效地——通货膨胀问题。行政机关人员的工资部分或全部由实物代替。其外，一方面行政官员的津贴已与工资相等，另一方面，从前必须从自己工资中拿钱购买装备的军队官员从此由国家工厂供给。为了支付改革费用，税收飞涨。为了防止社会等级中某些必须交纳特别税的阶层逃税，这个新的冷酷严密的社会还在不断地绷紧。

296年，西方的凯撒即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重新征服了不列颠，新秩序在不列颠雷厉风行地建立起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从阿利克塔斯雇佣的节节败退的法兰克军手中及时地解放了伦敦，这振奋了士气，还在许多方面被作为胜利的吉兆。

混乱大都发生在南方。经过短暂的战斗，阿利克塔斯就被打败。在北方，根据考古材料，君士坦提乌斯热情地建设军事设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修复敌人造成的破坏，而有其长远打算。和

平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并且也没有故意打破的意图。君士坦提乌斯有自己的盘算。的确，就君士坦提乌斯本性来说，即使这种暂时的克制也难以忍受。过去发生的那些声势浩大的苏格兰战役对野心勃勃的罗马皇帝们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例外。一旦时机成熟，他随时准备去苏格兰一显身手。的确，他一成为奥古斯都就不失时机地准备这场战争。到306年，他已经置身于这场战争之中了。文字材料提及他取得了对皮克斯人的一次胜利（皮克斯人名称第一次作为罗马在苏格兰的敌人出现在文献中）。在安敦尼长城的格拉门德和从泰河边古老的塞维鲁时代的要塞中发现的陶器表明，君士坦提乌斯按计划扫荡了高地东部。像塞维鲁一样，君士坦提乌斯最后回到约克并在那里去世，也像塞维鲁一样，他死时继承人就在身边。

君士坦丁大帝是通过军队发迹的，约克城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的目击者。这是一起令人难以理解的纯属偶然的事件，主要起因于一个名叫克鲁克斯的日耳曼国王，他曾是君士坦提乌斯的主要盟友之一，他强烈反对戴克里先改革思想。由此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结果使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君士坦丁不像戴克里先那样恪守传统，但像戴克里先那样有能力在最广阔的空间进行思考和行动，他在戴克里先保守但却巨大的改革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了随后几个世纪的帝国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4世纪前半叶是罗马不列颠的“黄金时代”，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里基于前几个世纪打下的基础，也是3世纪70年代已经显露的长期发展趋势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兴旺昌盛持续到4世纪40年代，也有可能直到4世纪中叶才结束。认为君士坦丁的垂爱将不列颠繁荣推上了顶峰难以自圆其说。我们有一些理由这样假设，君士坦丁像他父亲一样也回到不列颠建

树军功。我们当然知道，部分是巩固他的统治缘故，他将过去由卡劳希乌斯创建的伦敦铸币厂扩建成帝国铸币中心。不过，正是君士坦丁将伦敦更名为“奥古斯塔”，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可怀疑这个在约克发迹、分享过哈德良昔日兴建各种建筑时的愉悦心情的君士坦丁，会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挖掘约克要塞壮丽的护城河。

4 世纪不列颠的大型维拉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从社会和经济来看，晚期帝国西部的财富分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由大土地贵族为一方，皇帝、宫庭和军队为另一方对权力的瓜分极为显著。这些力量互相冲突，但逐渐趋于融合。在他们之间，城市中产阶级和乡村小贵族几乎什么都得不到。在帝国里，新秩序的负担37往往最为沉重地落在地方议会即库里亚大会成员身上。曾经作为荣誉的地方议员现在成了一种世袭的负担，逐渐变得想不当议员也不可能了。

然而谁是这种罗马化不列颠大维拉显然很富裕的主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从别处迁至不列颠的富有移民。如果是元老院成员或相当地位的帝国官吏，他们有免于担任地方议员职位的特权。不列颠还奇怪地保持着带有岛国影响的用于教育用语的拉丁文表达形式，这表明土著贵族仍然是社会中重要的成员。十分可能，在前一个世纪里，他们非常例外地没有受到大的打击。这又使人们极想知道，君士坦丁是否可能给过不列颠土著贵族以特别的优待。

这些维拉的设计样式、精致程度和面积各不相同。它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与 18 世纪的英格兰乡村房屋媲美。它们有某些普遍的特征，较为显著的如：材料经久耐用，中间有取暖设备（一般用木头，有时用煤），玻璃窗户，嵌有花纹的地板，一般配有一间或好几间设备齐全的浴室。农用建筑彼此相接，与乔治亚人的建筑相似，

很可能他们土地相互接壤。从罗马文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维拉的主人来说，维拉具有着重要的"经济"能动性，有的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的可能只是提供娱乐场所而已。有意义的是像温彻斯特、切德沃恩和利河以北一带的大维拉都不是孤零零的，而是构成一大片金字塔式层层叠叠小维拉中的塔顶。一些从铁器时代以来就有的简朴维拉仍然存在，经过修缮或是由新的中小维拉替代。这也是不列颠一部分有力量的小乡绅幸存下来的最好证 38 据。无疑，一些小维拉消失了；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时代，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也是自然规律。这个时代的维拉实际上日益成为不列颠常存的风貌。

维拉拥有的主要设备大都相同，因此出现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假设，受残存的克尔特风俗的影响，两个家庭或两个所有者普遍合用(或分用)一套复合维拉。一种难以站得住脚的简单解释认为，在罗马世界一个有地位的绅士旅行中都带有一批相当多的仆人和朋友作为随从，乡居之间的相互拜访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对于旅行者来说，关于乡村客店的传闻令人生畏，只要有正常社会交往的人都宁愿从一个熟人那里再到另一处的朋友的维拉去投宿。大多数不列颠维拉都处在城镇方圆十英里范围之内。它们与城镇的社会联系甚至超过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这种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它们的经济影响一样重要。

我们不知道大的维拉的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从早在2世纪出现的一个罕见的维拉和村舍的例子来看。它们与后来那种庄园维拉和村舍相似。在4世纪，很可能不列颠还没有戴克里先所说的隶农——或是法律的改变影响不到这个帝国中长期处于平静的地区的形势。虽然有向更大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小的土著风格的农舍仍然占绝大多数。一个较大的变化是装璜大维拉的各种行业兴旺起来。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地区性的"

马赛克技师学校——拥有工场的商号或合资的商号集中地分布在赛伦塞斯特、切斯特顿(沃特牛顿)、多切斯特(多塞特郡)、亨伯河上的布拉夫，在南部某些地方也较为集中。其中一些用易腐材料作业的职业可能也是用类似的方式经营——例如壁画师（他们的作品正好幸存到我们今天仍然懂得其重要性和质量的程度)、家具制造者以及一些主要为富有的户主们衣食住行提供服务的行当。

古代乡村不仅仅只有农业——也不仅是为富人们无病呻吟提供消遣的场所。3 世纪长途贩运贸易的中断较之帝国其他各地更强烈地激发了不列颠的工业活力，例如在南恩谷盛极一时的制陶业。3 世纪已开始发展的汉普郡大型制陶工业到 4 世纪已发展到相当于南恩谷的规模——汉普郡的制陶业大多位于后来艾丽斯·霍尔特的王家森林地区，同时占据了伦敦市场，空前地繁荣起来。

在晚期罗马帝国初叶，帝国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它与39新行省的总督很配套。帝国最重要的决定从米兰发出（此时皇帝发现他在米兰比在罗马方便)。324 年前后，皇帝开始从君士坦丁堡发布指令。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时候开始，为处理日常公务起见，中央政府设在莫赛尔河畔的特里尔。住在特里尔的高卢罗马高级地方长官是处理有关不列颠民政的首脑。不列颠的“主教辖区”代理人向他们负责。这些罗马长官统管不列颠、西班牙和南北高卢事务。不列颠代理人的总部无疑设在伦敦，在他之下有四个行省总督；他们治下的四个行省分别是恺撒里亚的马克西姆(可能以伦敦为基地)，前大不列颠(赛伦塞斯特)，恺撒里亚的弗拉维(林肯?)和后大不列颠(约克?)。每个总督都有自己一套人马。除了负责民事，这个组织极其重要的军事职能是负责供给，包括管理新的国家工场（例如据记载在不列颠有一种制造罗马军服原料的纺织厂)。一份 5 世纪文件记载了不列颠代理人得到了高级军功章，这表明至少在那时不列颠还拥有军队的统治权，这是极其例外的。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掌握军事供给的是平民，这就形成了平民对军队的潜在的控制。从社会地位来看，新的行政机关高级官员都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罗马中层和上层社会。成为一个不列颠的代理人也许是这种职业生涯中升迁的重要阶段，我们所知道的担任这个职位的官员都是些有前途的人。到5世纪，行省的高官厚职只从外省人中招聘，不得由本省人担任的政策仍然一如既往，大多数人 40
还希望能在帝国朝廷中供职。

行省的财政机构与帝国早期大不相同。尽管财政总部又设在伦敦，但从前的行省地方财政长官已经废除了。各不列颠行省的总督都负责向代理人交纳实物税，市政议会迫于压力一再加重每个纳税人的负担。另外两个权能分开的财政机构独立于代理人，这两个机构都有一个"主教管区"的主管官员，直接向帝国财政部负责。一个机构管理现金税收，控制货币发行权，管理矿山和其它经营部门。另一个机构负责遍布在不列颠的皇室财产以及向皇室报告那些作为皇帝代理人实际控制皇室财产的地方官员的情况。这两个机构事实上常常密切协作并在必要时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还求助于行省总督的武力。

军队的指挥机制不再与行省有必然联系。同时，新型军队划分为戍守要塞的军队或称边防军(limitanei)和新的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它代替了罗马军团和辅助军的旧式军种。新的野战军地位和待遇更高些。在不列颠，虽然军种已换、但军队仍然 41
没有大的变化。边界线没有发生太大的移动。这时，驻守不列颠的军队被划为边防军种，要求它只作区域性防守，不驻扎在野战军可以随时火速调防的地方。边防军的指挥者称为统帅(dux)——如全不列颠统帅。另外，野战军一般归官衔较高的军事教官(comes rei militaris)领导。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只拥有一支中央野战军，但他的几个好战的儿子都拥有好几支大型野战军，甚至高级将

领也拥有这种力量。其中一些野战军成为常备军，军事教官统领一些较小的特别野战军。

野战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那些仍然保持原来性质或已经改革的旧式部队，另一部分是新军。日耳曼人在新军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四世纪，也有许多个别的日耳曼人应征入伍。在帝国西部，包括军官团在内的正规军中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几乎平分秋色。例如在367年，蛮族人打败了一个名叫富罗法迪斯的日耳曼血统全不列颠统帅。到4世纪末，日耳曼将军们日益占据更多最高军衔的席位。虽然对于这些日耳曼人来说，取罗马姓名不再时髦，但他们的思想和野心丝毫不亚于他们的罗马同仁。然而从文化上说，4世纪日耳曼的这些军官与那些在文职部门工作的同一级别的罗马人的差别还是明显的，后者除对日耳曼人厌恶和蔑视外，还在文化上对日耳曼人有重大的偏见，这不仅表现在某些皇帝及其官员身上，罗马上层平民也是如此。在皇帝、朝臣、新富有者以及仍然沉溺于昔日罗马光荣的旧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正越来越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君士坦丁平衡策略的最后一个砝码是教会。罗马的传统公共宗教应付公众事务绰绰有余，但没有为个人留下内容。安敦尼时代和平的破产和3世纪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广泛要求一种能为个人现世生活提供慰籍和意义、为来世提供更美好生活的宗教。随之，由于同东方的密切关系，也带来了东方各种各样的神秘宗教的广泛传播，这些宗教具有神秘的启示和个人与神的沟通内容，哈德良曾亲自朝拜过希腊埃琉西斯神殿的古代圣地。很多神秘的宗教开始受人尊重，进而被接受。军队和商人两个集团基本上接受波斯的太阳神米特兰教祭，该教坚决坚持高度忠诚和纪律及其紧密兄弟会组织符合商人和军队的理想和利益。它不像基督教在政治上受猜疑，所以也不受迫害，在不列颠，它的小教堂是排外和封闭的，

是军队和商人团体的专利——如在鲁德切斯特、卡拉堡和哈德良长城上的豪斯斯特兹要塞，在伦敦也是如此。然而，它的弱点是太封闭了，也禁止妇女加入，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一个社会阶级。它的仪式相当近似基督教，这在基督教徒们看来是渎神的。基督教盛行期间，伦敦和卡拉堡有很多迹象显示，米特拉教受到基督教的攻击。4 世纪，这种宗教逐渐销声匿迹。 42

最近对罗马丧失在不列颠统治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基督教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在不列颠的普及程度和根基较之我们从前的认识有过之无不及。有意义的是，探讨这个问题不需要从 5 世纪和 6世纪再回溯到 3 世纪和 4 世纪。公认的事实是 4 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颠没有什么影响，当然，3 世纪不列颠的确有过基督教的殉教者——圣奥尔本死在维鲁拉米翁，圣尤利乌斯和圣阿伦死在卡利恩。不列颠成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他的前妻是圣・海伦娜即君士坦丁的母亲，在最后一次对基督徒大迫害中，她在自己的辖地给予基督徒以保护并挽救了教会）统治的帝国中的一部分，从而没有导致不列颠出现早期的对殉教者崇拜，但是另一方面，这却吸引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们纷纷从帝国的危险地区来到不列颠寻找乐土。不列颠维拉居住的人也因此不断增加。

在“米兰敕令”使教会合法化一年之后，不列颠出现了主教，四个不列颠行省的首都全都成为他们的教区。在此同时，不列颠出现了在罗马帝国已经常见的最原始类型的捐款盘（在沃特牛顿发现），其年代肯定在 4 世纪初叶。这些事实使我们联想到君士坦丁大帝带来的根本变化。随着 3 世纪专制主义增长，也伴随着皇帝断断续续地引进一神国教的尝试。从君士坦丁时候起，罗马政治中主要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也在个人方面不断增长）就是观念化。遵守国教的风俗仪式来证明忠诚已经不够了，因此作为新国教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新信仰。对异教传播的容忍也一度延续。 43

尽管在整个4世纪罗马贵族中有一支强有力的派别强烈要求宽容，但这种宽容还是逐渐结束了。这些贵族之所以要求宽容是因为他们既把旧宗教视作为罗马自身的轴心，同时也用其对抗朝廷。同情这些贵族的异教皇帝曾几度登基，但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仍然为时短暂。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认定皇帝有责任保证宗教信条统一，教会内部发生了具有重大未来影响的进一步革新发展。从4世纪中叶起，国家对异教迫害成为政治忠诚的又一新的内容。

肯定会令我们惊讶的倒不是最近研究表明的在4世纪不列颠很大程度上的基督教化，而是这种基督教化程度还不够高。我们沿着这条线索看看不列颠教会显而易见的性质。有关城市基督教和乡村异端教义的旧概念当然站不住脚。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不列颠城市的教堂由上述主教们主持。一座在西尔切斯特带有城墙的小型独特的教堂，在殉道者墓冢上建立的很普遍的墓地教堂以及在维鲁拉米敦、坎特伯雷和其它一些地方的公墓都是例证。不过，4世纪罗马化的不列颠基督教徒的巨大墓碑与维拉主人有关联，例如在弗雷普顿和黑顿圣母教堂上的马赛克或在卢特斯通的壁画都反映了这种联系。考古证据的分析表明，基督教影响范围是不均衡的。多切斯特的一个公墓表明这里有着一个人口众多且富有的基督徒社团，周围的维拉主人们也是其支持者。类似于此的一些公墓就要差得多。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洗礼盘并不是出自城市而是出现在乡村和移民村落，它们很可能是那些有土地的乡绅们的财产。大部分洗礼盘在东盎格利亚出土，说明帝国晚期时洗礼盘在此还是个人财富的象征。

君士坦丁通过将寺庙的钱财布施给教会和抽取城市财政款项沉重地打击了异端崇拜和城市。一方面，4世纪的财富不断落入大地主之手，另一方面，国家及其机构也是分赃者。在不列颠，维拉

成为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特征，其主人们站在基督教发展前列也就使人不感到吃惊。鉴于这些情况，基督教化的证据显得不均衡 44 也很正常。如果一个地区的基督教力量依赖于本地地主是否是个热心的教徒(具有政治野心)，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如果建立教堂和基督徒的墓碑依赖于从前掌握公共寺庙以及城市公共活动供给的富有生气的城镇议事会，那么布施本来可能更为公平些。很清楚，359 年出席雷密涅会议的主教很多是来自不列颠的成员，但是由于无法知道其成员名单，所以也就不清楚他们是否来自城市。有意义的是我们还知道一些关于这些赴会差旅费筹集的困难。那么，如果城市基督教社会是虚弱的——或者说君士坦丁提高基督教地位以后的一百年里基督教影响却开始了衰退——在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还会在不列颠幸存下来吗？或许在西罗马帝国，蛮族最后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基督教的地主阶级取得了和解成为基督教延续的红线，如果这同样也发生在 5 世纪的不列颠，那倒是可能的。要知道，5世纪与 4 世纪大不相同，基督徒相当平均地散布在农业人口中。因为人口大都以农业为主，我们可以设想基督教仍然广泛地传播着，至少也是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确，晚期罗马帝国的乡村教士文化水平低于他们的城市同行，社会形象也很模糊(在乡下，甚至主教的地位和地主们的附庸差不多)，这种情况也许使乡村教士既有别于农民又得以使教会以及基督教信仰保存下来，最后教士又成了土地所有者。

4世纪不列颠的维拉社会能维持其与帝国其它各地迥异的灿烂的过去繁荣时间有多长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详细地描述了 360 年不列颠边疆附近蛮族人的一系列攻掠，他写道，那时“恐惧的帷幕笼罩着行省”，他特别指出，“连年战祸已经使各行省民穷财尽”。基于城镇考古材料，有一种看法认为在 350 年各行省已经是形同虚设(对此评价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一般来说，

这种历史画面与该世纪前期形成强烈的反差。

认为“黄金时代”仅与君士坦丁统治相始终有一定道理。337年君士坦丁死后，帝国在动荡不安中一分为三，分别由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以及君士坦丁二世来治理。不列颠成为最年轻的君士坦丁二世的统治区域。由于分赃不均，他在340年袭击君士坦斯，但遭到惨败。随着不列颠卷入战火，就是长时间的兵连祸结。战争带来的国破民穷——可能还有内讧——也许反映在343年冬君士坦斯亲自率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非凡又出人意料的壮举，从幸存的资料还可以看出，北部边疆潜在着入侵的[45]威胁。根据阿米亚努斯提供的时间，到360年，边疆困境肯定已变得很尖锐，这时苏格兰人从爱尔兰、皮克特人从苏格兰纷纷撕碎与罗马人的协议；从阿米亚努斯记载中还可以看出，由于他们的威胁，罗马人曾同他们在外交上寻找协商解决方法（按照惯例，罗马人还带着黄金予以补偿）。364年，他们一再入侵，现在还不仅仅是他们光顾不列颠，随同来的可能有爱尔兰的“阿泰科蒂人”，以及撒克逊人。我们后面将详谈367年蛮族人入侵，这时长期以来的外部蛮族骚扰发展到了顶点。不过，至少同样坏的事件还发生在罗马统治的领土中。

350年，君士坦斯在宫廷阴谋中死于非命，一个名叫马格嫩提乌斯的日耳曼族军官成为皇帝。帝国西部在君士坦丁唯一幸存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领导下正与东部打仗。马格嫩提乌斯的三年半统治对基督教徒来说其后果是一场灾难。不过，他还容忍各种异教徒。如我们所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镇压基督教的异端视为自己的职责，同时他也敌视异教信仰——为了迫使异教徒屈服，他重新采用死刑的惩罚。另外，他还因迁移设在罗马元老院的古代胜利圣坛，从而激怒了元老院。随着他取得最后的胜利，不列颠受到特别的监视。一位名叫保罗斯的人被任命为帝国行政档案

总部首领就含有在不列颠捕捉异端的目的。他因不列颠人的黑色幽默而得到一个确切的绰号“链子”。他的主要任务是逮捕曾经支持过马格嫩提乌斯的某些军人，不久他又擅自扩大权力进行恐怖统治，伪证在其统治中起着主要作用，甚至大多数最忠诚的官僚也为之不寒而栗。君士坦提乌斯自己在不列颠的代理人马蒂纳斯勇敢地起而反抗保鲁斯，但事败身亡。自然，牵涉进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变故中的许多大家族在这种政治漩涡中难以幸免，更不用提那些直接卷入时事政治中的人了。皇帝对这些证据不加深究就批准诸如没收财产、放逐、监禁、拷打甚至处死等各种惩罚。平民和士兵道德风气败坏无余，从而导致他们在抵御现在正以泰山压顶之势而来的蛮族入侵时软弱无力，而在同时仅财产没收就必然对不列颠农村繁荣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最黑暗的时刻367年到来，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阿泰科蒂人侵入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袭击了高卢海岸，帝国中央指挥机构——皇帝瓦伦提尼安当时在北高卢——和统辖不列颠的高级官员在蛮族猝不及防的打击下被俘，不列颠的常备戍守军的统帅被解除了武装，负责海岸防守的教官被杀。这些互不联系的蛮族竟能统一行动令人吃惊。虽然守卫北部的土著边防军叛变只是这种形势必然发生的一种事件，但却说明了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无知的蛮族人事实上具有超群的武装力量和外交能力，这就是他们能统一行动的原因。随着大批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虽然路人皆知他们不忠于罗马），他们轻易地掌握了罗马军队部署的详细情况和罗马作战方法。充满活力的蛮族领导能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他们虽然文化背景各异却能同心协力地进攻罗马，他们从互 [48] 相隔离甚远的内陆打来，却对自己攻击对象能清楚地划分——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项绝对秘密的协议。罗马人当然称之为一起密谋，的确很难说罗马人是凭空臆造。

不列颠一度散布着以小股形式出现的蛮族武装，他们抢劫、破坏、抓人甚至随意杀戮。靠近大道的乡村尤其难以幸免这种灾难，而且不是所有带城墙的城镇都进行了抵抗。民事权威和军事纪律都荡然无存。军队中开小差的士兵也成了打家劫舍的游兵散勇，有些队伍声称——不可信地——他们在度假。政治投机主义者抓住这些机会来图谋私利。不列颠成了高级罪犯流亡的伊甸园，罗马一恢复对不列颠的统治就扑灭了一起有详细记载的流亡者组织的阴谋，但有证据表明，不列颠教区的一个行省(不列颠已从 4 个行省成为 5 个行省)曾一度落入叛乱者之手。

面对不列颠这种混乱，瓦伦提尼安派遣了一支在军事教官率领下人数虽少但却强有力的精锐特遣力量，这个教官名叫狄奥多西，是后来的罗马皇帝格拉提亚努斯的父亲，狄奥多西大帝的祖父，他自己的父亲曾是君士坦斯时不列颠的一个教官。在帝国晚期，这种特遣部队成为帝国处理紧急情况的常用方法，至少不列颠曾经到达过这种部队(360 年)，也许还不止一次。这时，这些部队一般是由同盟者组成。从 4 世纪末起，在本族国王率领下的蛮族游兵散勇以至整个部落加入罗马军队已习以为常。因此后来常常将勉强拼凑起来的正规军和蛮族盟友们混在一起，组成特遣部队，有时是与蛮族军队订立契约让他们单独去打一次特别战役或者完成一个行动。不难展望，随着 4 世纪以来这种军事实践的发展，无疑到 5 世纪蛮族人已不是某些从外部闯入的不怀善意的外邦人，而是罗马世界生活中活生生的一部分。为维护帝国的秩序，罗马人采取以夷制夷办法。另外，蛮族人还出现在内战的战场。

狄奥多西领导的这次战役以及随之在不列颠的重建既辉煌又彻底。他大赦了伦敦，重新召集了戍守的军队，赦免了逃兵，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又诞生了。蛮族战犯逐一受到惩罚，撒克逊人在海上也被击败。从各行省巧取豪夺的财产归还原主。在一个新的

代理人领导下，民事权威恢复了。落入叛乱者之手的行省被光复，为纪念瓦伦提尼安以及他的东部战友和兄弟瓦伦斯，该省被命名为瓦伦蒂亚。堡垒重建了，化为虚墟的城市又恢复了战前的面貌。

根据考古材料，大约在4世纪中叶，通过在城墙外部增建突出的外部塔楼对不列颠城防进行了广泛的重建，这无疑应归功于狄奥多西的创举。当然，从设计的类型和筹备来看，地方议事会成员都一再出钱出力并承担着责任。对于4世纪中后期城镇的环境来说，这种一直起作用的环形城防有着重大作用。修建这种相当宽的城墙不可能仅仅是当作军事战术据点，在危急时期它甚至作为逃来的乡村居民避难所。为了战斗修建坚固的军事工事无疑也是值得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到350年时不列颠城镇已经"烂熟"的概念到底是指什么？认为4世纪和2世纪城镇属于同一类型无疑是错误的，自然，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城镇都按同一种方法发生改变。中央政府和现在由不情愿当选的议员组成的议事会吞食了城市的财政收入，这导致公共建筑年久失修以至闲置不用。在上层阶级成员们不负担市政义务的同时，4世纪立法机关一再试图阻止现在已经成为世袭职业的阶层成员从城镇中迁出。无限膨胀的官僚机构成为社会的新因素，并且还在无休止地发展。五个总督，他们的行政人员、家人、卫队和许多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员都需要住房。还有由巨额津贴支撑的拥有无数官员的臃肿机构和挥霍浪费的排场。在这种等级制度中，每一个等级都期待着最终能够在晚期帝国宫廷奢华无度的挥霍之中拾到牙慧。曾经只是一般城市而在4世纪成为行省首府的特里尔和阿尔同其它行省首府一样都不遗余力地修建宫廷以及其它政府办公的建筑。由大见小，我们可以设想，在不列颠许多城镇也会同样大兴土木。事实上，考古已经证明，在很多地方性大城镇有着与伦敦和卡马森不同的建筑。维鲁拉米翁的城镇一直发展到5世纪中叶，在罗克斯特也一样，不过建

筑风格却迥然不同。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的城里有许多耕作过的开阔地，并不是以断壁残垣为代表的衰败而是新式风格的花园和庭院。的确，在伦敦和约克，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皇帝们不时踏上不列颠都在考古学揭示的历史中留下了印记。

很明显，狄奥多西的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考古上看很清楚，许多维拉仍处于为人占用的状态。一些扩建了，另一些的建设还得从头开始。虽然个别戍守部队要少于从前，哈德良长城仍然被坚守到罗马统治最后崩溃。东北海岸线建立了一套新型的报警系统。虽然 367 年战争中断了许多工业的生产，实际上在这些工业恢复活力和制造能力后，原有的工业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到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某些异端宗教圣地消失了，但有些圣地仍是崇拜的场所，同时还有一些圣地派上了新的用场，某些可能为基督徒所利用，这都是不足为奇的。369 年以后的 40 个春秋虽然不如本世纪早期灿烂，但不列颠列岛并没有历史学家们谈到的那种 50 和 60 年代萧条无望景象。要了解在 409 年发生在不列颠的历史事件，懂得 4 世纪末叶罗马不列颠并没有日落西山尤为重要。

两起觊觎皇位的重大尝试都从不列颠发起，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两个重要的历史标志。382 年，一个名叫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在威尔士传奇中称之为马森威莱提格）的将军打败皮克特人后获得了声誉，紧接着又利令智昏地自称为皇帝，并统治了高卢长官名下所属的帝国部分版图——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达五年之久。虽然这时不列颠的一些堡垒，如设在佩索恩和威尔士的一些有名的堡垒都荒废不用，罗马第 20 军团从切斯特撤离，但也难以完全肯定地认为马克西姆斯的征战和最后败于狄奥多西大帝之手决定性地影响了不列颠军队的防御能力。在 392 至 394 年之间，不列颠表面上卷入了另一起宫廷谋反，在这非常时期，狄奥多西丧失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不过，这起事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参与其

中的一个法兰克血统的将军登台，使帝国西部的那个软弱无能的[49]皇帝成为了他的傀儡。395 年狄奥多西之死使帝国西部政府统治权力取得了新的平衡，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狄奥多西的几个儿子一起继承了其父的江山，西部是霍诺里乌斯，东部是阿尔卡迪乌斯，这标志着帝国两部分政府模式根本上分道扬镳时期的开始。在东方，政府权力自然由皇帝牢牢控制，或者由他首席民政长官来执掌。在西部，植根于自身庄园的强有力的土地贵族与统帅军队的职业军官互相竞争。花了 3/4 世纪的时间，双方逐渐得出结论：在西部，没有皇帝他们也能设法过下去。

罗马统治的终结

已故皇帝狄奥多西的首席副将是汪达尔人，名叫弗拉维乌斯·斯提利科，在有效地控制了西方的同时，他又提出了对东部统治的要求。在斯提利科、霍诺里乌斯、帝国西部元老院以及在阿拉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之间的阴谋、反阴谋和长期内战促使了西罗马帝国逐步崩溃。在不列颠，斯提利科发动的对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的战役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到了 5 世纪初一些军队就调往别处。我们不知道这种调动的数量如何，但 402 年大量新币不再进入不列颠无疑证明中央已经停止供应仍然驻扎在不列颠的正规军和行政官员的开支了。极端不满的情绪出现在不列颠也就不足为奇。406 年，军队在不列颠走马灯式地三次更换了皇帝。在 406 年的除夕，大批蛮族人越过莱茵河。中央政府将高卢长官行政机构撤至阿尔，无暇处理不列颠的篡权者们。

第三位篡权者一如继往占领了高卢和西班牙，曾一度被霍诺里乌斯不太情愿地视为合法的同僚。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不列颠的驻军是否已全面减少，不过正规部队进一步从不列颠撤出是可能的。君士坦丁三世的西北帝国最后降下了罗马对不列颠统治的

旗帜。不过在这个帝国最后灭亡之前，不列颠已经摆脱了它的管辖，从此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帝国统治。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这种分离过程的内容了解甚少，但我们可以将有关的史实拼凑起来略见其貌。408年，由于君士坦丁大部分军队在西班牙，因此他对蛮族进攻不列颠无能为力。409年，在不列颠血统的统帅领导下的军队叛乱（和由这位统帅故意煽动的高卢一带的蛮族骚乱）与包括撒克逊人在内的敌人重新发动对不列颠的袭击不谋而合。当时，不列颠人举行起义——同时高卢地区发生起义——驱逐了君士坦丁的统治机构。不列颠又成功地打败了蛮族入侵者，从此彻底粉碎了罗马统治的桎梏。

50 不列颠人是怎样赶走入侵者，之后其农村状况又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材料，只能是个一直被探索的课题。有若干的事实暗示，斯提利科和霍诺里乌斯曾经采取某些步骤，以期鼓励地方的防卫组织自筹防卫资金。在君士坦丁官员被废黜之后，不列颠肯定没有了正规军，为军队服务的严密的行政机构自然也不会再得到人员的配备和金钱的资助。在帝国晚期，有土地的阶级既反对征募农业劳动力到正规军中，又抵制征税。在5世纪，其它地方停薪的军队不是溃散就是原地务农。大约在455年以后，帝国西部正规军的最后瓦解过程仍然方兴未艾。在没有中央政府的不列颠，409年后的岁月里成群的蛮族人被雇佣作战。其中一些人可能还是由君士坦丁三世或是斯提利科带到不列颠的。

那种认为不列颠人还出现过皇帝或者又重新形成了中央政府机构的观点没有充分根据。不仅是因为不列颠人几乎没有人有资深的公职经历，即使不列颠人赞同5世纪帝国西部其它地方的有地阶级的观点，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重新承受那种他们自己摆脱了的供应帝国官僚体制的负担。1世纪不列颠总督弗拉维乌斯在此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使土著贵族们确信同罗马人建立关系有

益无害。认为409年的事件摧毁了有地阶级的地位也缺乏说服力，然而，至此不列颠地主阶级很可能已经不再认为帝制、官僚和军队是保证他们富足生活方式的最好方法了。在君士坦丁三世驾崩之后，霍诺里乌斯的官员们在高卢进行的残酷政治迫害也使他们对帝国心灰意冷。

在“地位名望”(Notitia Dignitatum)这一计划给不列颠设置军事和民政职位的文件表明，到5世纪帝国大臣仍决定要恢复对不列颠的统治——如同在过去历史中常常出现的场景那样。实际上，只是在从425年到429年这段短暂的时期里，罗马军事干涉不列颠再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到那时很多富裕的罗马行省人民特别是大部分高卢人开始与蛮族结盟或接受其统治，以求得安适稳定的生活，人们对战争已经厌倦。

倘若蛮族人仍然讲道理，对于不列颠乡绅们来说蛮族人的行为举止实际上要好于罗马人。不过，如果没有那些在4世纪越来越依赖军队、行政机构、城市教会的工作机会、庇护人以及市场的虚弱的中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阶级，不列颠脱离罗马这样大的变化必定是灾难性的。对不列颠罗马时代遗物的考古研究可作凭证。在5世纪初期，大型的制陶工业突然停产，到420至430年间，铸 51 币业也不再正常开工。顺便提一句，这些事实说明很可能直到5世纪罗马人才从这些工场中撤出而不是在此以前。然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维拉普遍为暴力所破坏，反而有很多迹象表明稍后的城镇仍非常活跃。在林肯郡，我们发现5世纪时一条主要街道还被粉刷过。在伦敦，一间房子中取暖用品的灰烬里有着从地中海区域进口的陶器，还有其他证据都表明5世纪初叶罗马人还正常地占领着不列颠。在维鲁拉米翁，处于同一场所的鳞次栉比的重要建筑物令人吃惊地都有一种新的自来水管道来供水，而安置这种水管的时间不会在5世纪中叶之前。

脱离罗马统治后的不列颠据说处于暴君或篡权者统治之下，恰当的解释应是那些填补了合法权威垮台后所遗留下真空的达官贵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有的是地主，有的是军事强人，甚至还有受邀请前来统治的罗马人或蛮族人。在格洛斯特，一个富有的武士葬礼是按照不列颠人的风俗而不是撒克逊人的风俗进行的，可能代表了一个僭主(tyrannus)，或者一个地方供养的condottiere。在罗克斯特，5世纪富有想象力的木质建筑物可能是这种领导人的指挥部。

429年，一个活跃于罗马上流社会的杰出的高卢裔罗马主教圣格尔马努斯，为了反对异端访问不列颠。在维鲁拉米翁，他同“炫耀财富”、衣着花哨、喽罗成群的不列颠达官贵人公开进行辩论。大约在446年或447年，虽然峰火四起，他再次以同样方式访问了不列颠。因此，至少在5世纪40年代，不列颠的生活方式仍然非常类似于“后罗马”或“后帝国”时代的西罗马帝国各地。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约 440 —1066 ）

62

约翰·布莱尔

拓殖时代

有关 5 世纪和 6 世纪的资料非常少，甚至在这里就可以立即列出全部资料的目录。这些资料非常不充分，因此这里必须清楚说明它们的种种欠缺。一部分是考古资料，这大多是从异教徒墓地中挖掘出来的器物。尽管这些材料准确无误，但所能说明的问题很有限。另一部分是一小组文献、编年史和若干残缺不全的篇章。这些资料中唯一具有份量的古代作品是修道士吉尔达斯在 6 世纪 40 年代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不列颠的毁灭》，它的写作目的是用最忿激的言语来谴责他那个时代的种种罪恶。加罗的诺森布里亚修道院的一位名叫圣徒比德的修道士在 731 年写成了杰作《英吉利民族的教会史》，该书的价值超过了有关 7 世纪至 8 世纪早期历史的所有其他资料，虽然蛮族入侵与比德自己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他却提供了一些言之有据到了惊人地步的传说。除此之外，仅有的叙述资料是由后人编纂而成的编年史片断、一些诗歌和欧陆作家偶然留下的材料。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后期撒克逊年代记，它被汇总为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逐年简约记载了不列颠南部王国发生的事件。早期编年史远不如晚期的编年史可信，6 世纪后半期以前的编年史结构有着疑点。

因而，没有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起源的较原始资料。原因是显

而易见的：在日耳曼人到达不列颠的最初两个世纪里，他们还是文盲。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不列颠人带有敌意的眼光、外国人的一知半解以及日耳曼人自己真假参半的传说来了解他们的早期命运。6世纪末以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作出明智的推测来了解。

53 考古学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显示，在410年以前的某些岁月里，不列颠有过日耳曼武士。特别是沿着泰晤士下游河谷从牛津郡到埃塞克斯海岸线的罗马后期的墓地中，发现有罗马军队中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雇佣军通常穿戴的背带附件殉葬品。如果这些军队真地驻扎在不列颠——他们肯定在高卢驻扎过，那么5世纪中叶的入侵者可能同他们那些已经来此生活了两三代的同族人联合起来。5世纪和6世纪英格兰移民的建房特征是带有山墙柱的小屋，在靠近泰晤士河畔的马金的一个大型遗址发现了两百多所这种房子。有人认为，驻扎在这种建筑里的是400年前后移居而来保护通往伦敦的要塞的雇佣军。如果属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持续不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罗马不列颠时期。

后来几世纪的英格兰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到达这里的时间比这要晚几十年，乍看起来的确是从5世纪30年代以后才真正有大批的日耳曼移民的。在考察这段非常重要进程之前，自然要问谁是54 入侵者？他们想要干什么？第一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它出现在比德从一个已不为人知的出处引用的惊人地有理有据的篇章中，这也是为今天的学者所公认的答案：

> 这些入侵者来自三个强有力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和怀特岛的居民以及韦塞克斯王国中一部分居住在怀特岛对面，今天我们仍然称他们为朱特人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的后裔。从现在称为古撒克逊的撒克逊人地区来了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除此之外，从居住在位于朱特人和撒克逊人王国之间的称为盎格鲁斯的盎格鲁人中繁衍了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迈西亚人以及所

有诺森布里亚人(即定居在亨伯河北岸的移民)和其他一些盎格鲁部落。盎格鲁斯地区据说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是废墟。

考古学证实了比德的分析。从英格兰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与从北德意志和丹麦半岛南半部出土的器物如出一辙。在东盎格利亚，5世纪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瓮与在撒克逊人居住地发现的骨灰瓮属于同类陶制品，肯特人的陶制品和珠宝与朱特人的同类物品类似。斯切莱斯威克东北的一个地区今天还被称之为盎格英。我们还可以在比德的名单上加上弗里斯人，他们与撒克逊人融合在一起，5世纪初撒克逊人就与沿海的弗里斯人移民杂居。甚至比德关于若干早年移民离开乡土的描写，也在靠近韦塞河入口处的费德森威尔德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大约在450年，这里一个由木质大建筑组成的村庄被遗弃了，显然是海平面上涨带来的后果。55 由于不列颠低地的肥田沃土，加上该地区居民还特意招募国外的雇佣军，这种海岸线一带的移民浪潮也为从大陆移民不列颠提供了一种解释。

比德对他所处时代各王国的民族成份划分得过于简单了。肯特国民也许主要是朱特人，可是其他重要民族肯定认为他们不是"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考古学也没有显示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划分。到6世纪后期，那时各王国已初具雏形，边界地区的民族成份往往还是很混杂的。例如，东盎格鲁人和朱特人最好的金属制品相似，另外，东盎格鲁王朝看来属于瑞典人。长途的海上交通无疑削弱了种族的联系，为了适应早期移民者的需要，也发展了与故园不同的新型村落和社会组织。例如，在费德森威尔德的长方形的宽敞大厅与英格兰发现的形状各异的简陋矮小、室内凹陷的小屋形成对比，这值得注意。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特人都大致如此，因为他们都同属于广义上的同质文化圈中的南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和法兰西北部地区的民族。他们最早的著名诗篇所包括的英

雄传奇是以丹麦人和弗里斯人作为背景的。7世纪早期的一个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人和高卢人的金银财宝，基督教进入英格兰是通过一个肯特国王与法兰克公主的婚姻。不列颠脱离了罗马帝国，却加入了与罗马帝国有很大不同的另外一种国际共同体。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很明显，较之于文明的罗马人，他们是蛮族，可是他们有着令人惊讶的严密制度。公元一世纪，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谈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其英格兰远亲后裔。正如《日耳曼尼亚志》所述，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之中，各种血亲的和贵族的权利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粘合剂。

在故土，他们的血亲集团结合得非常紧密，在英格兰仍然如此。通常，某个男子的家族及其隶属关系就使他们成为一个移民团体，并且作为土地分配制度中的一员分享各种资源。这样扩大了的姻亲关系对移民团体特征的影响，通过无数个从-ing和-ingham以及-ingtan词根的地名表现出来。哈斯丁斯(Hastings)意思是"哈斯塔(Hasta)人民"，雷丁(Reading)即"雷德(Reada)人民"，沃克海姆(Workingham)即"沃卡人(Wocca)的农田"等等。虽然现在认为并非全部这些名字都来源于第一批移民的称呼，但许多这些名字无疑反映了这些地方开拓时间之早和重要性，并且还与大片土地有关。它们还表明在领土被明确限定时，地名常常以那里居住的部落组织的名字来称呼的。社会在发展，但氏族忠诚仍然是这种社会的核心。安全依赖于血亲复仇，如果其氏族成员受到伤害，不进行复仇那将是永恒的奇耻大辱。在塔西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有通过杀人凶手向受害者亲属赔偿金钱来满足受害者所在的氏族的荣誉。根据受害者的等级，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列举了"抚恤金"的高低。国王也不断地鼓励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惩罚。

塔西陀也强调指出了日耳曼人对他们贵族的忠诚。有时，他

们也有世袭的国王，但在战场上他们通常是由选举出的酋长率领。[56]“对于酋长来说，战场上偷生和后退都是毕生的耻辱。对于士兵来说，为酋长而战和保护酋长……则是他誓忠的核心。”九个世纪之后的991年，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多，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被维金人击败。经过长期的基督教化，英格兰现在已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不过，在当时一位诗人献给一个失去统帅后的士兵的诗句中，无疑还回荡着塔西陀时代日耳曼人的遗风：

我发誓我将寸步不让
我将勇往直前，
为我的战友和贵族复仇。
让敌人的鲜血来洗雪耻辱
坚强的战士，死而后已，
——如果我是一个失去贵族的逃兵，
无颜去见父老，我会受到烙铁
尖刺或身首异处的惩处。

很清楚，对君主的忠诚有时与对血缘忠诚发生抵触。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和君主们的权威，后来国王们倾向于增加贵族的权力。阿尔弗雷德的法律规定，“遭到无端袭击”的男子可以“以自己出生的那个父系氏族的名义进行战斗，但不得以此名义来袭击贵族”。基于上述两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贯极其重视遵守诺言和誓词。

他们主要的神祇就是后来成为挪威神话中的神的提尔(Tiw)、窝丹(Woden)和索尔(Thor)。他们后来把它们用作表示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的星期名称而沿用至今，同时有一些也转化为地名，如图斯利(Tuesley，萨里郡)、文兹伯里(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以及瑟斯利(Thursley，萨里郡)。据推测，这些地方还是祭祀中心。甚至在

皈依基督教后，英格兰人还将教会一个主要节日以他们往日的神祇埃奥斯特来命名。像日耳曼人的那些圣地一样，这些神龛地处僻远地带，一般都在森林中或是在山上；有些地名就含有神龛(hearg)的意思，如佩珀霍罗（萨里郡）和山坡上的哈罗。由于后来教会委员会禁止崇拜“石头、森林、树林和井”，可以推断，这些活动肯定带有英格兰的异教崇拜特征。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这种宗教看起来与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异教大同小异。

对于约600年前的事件，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谈得太多。据吉尔达斯说法，为了消除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骚扰，“骄傲的暴君”沃尔蒂格恩统治下的不列颠人雇佣了第一批撒克逊人来保卫他们的东部海岸。又据比德和其它一些资料，撒克逊人是由名叫亨吉斯特和霍萨两兄弟领导。他们在450年前后来到不列颠，建立了肯特王国。尽管这已相当晚了，但传说与考古证据非常吻合；如果在罗马统治下就有日耳曼雇佣军安居在一处，不列颠各国也完全可能会继续同样的政策。然而，据吉尔达斯的说法，雇佣军发动了叛乱并袭击了他们的雇主，随后就是旷日持久的打打停停的战争，最后以550年左右不列颠大胜告终。战场在一个称为蒙斯巴多尼库斯的地方，但其准确位置仍难确定。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其它一些酋长抵达不列颠南部海岸，他们是后来几位国王的半传奇式的祖先：447年艾尔到了苏塞克斯的艾尔，495年瑟迪克和辛里克到了韦塞克斯。

这段岁月中，一位今天人人皆知的人物不用说就是阿瑟，遗憾的是阿瑟却是最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验证的一个国王。真正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纯粹传说中的两三个片断在后来几个世纪被记录下来，围绕着这个名字的种种传奇是12世纪以来虚构出来的。就历史真实性来说，我们只能认为有过一个名叫阿瑟的军事领袖，他与蒙斯巴多尼库斯战役和随后一些战役有联系。可能有过这样

一位酋长或霸主，他是将从前罗马行省中的不列颠人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拼凑起来的最后一位人物。我们无法得知的重大政治事件实在太多了，因而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测。

吉尔达斯说，蒙斯巴多尼库斯战役赢得的和平持续了50年，一直到他生活的时代，这时，出现了暴君统治的五个不列颠王国。虽然不能肯定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把其势力扩张到后来英格兰地区，但从西南部山顶要塞的重新修缮可以想见，这里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小规模军事对抗。从墓地发掘出的资料证明，整个这段时期，入侵者从泰晤士河谷向上游，从东盎格利亚向西，从韦塞克斯向北，一直在朝内地稳步推进。《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了韦塞克斯的撒克逊人在6世纪50年代推进到威尔特郡，到577年占有了南米德兰大片土地，赢得了戴勒厄姆一役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同时，其它一些英格兰王国也脱颖而出：它们是东盎格鲁、东撒克逊、迈西亚以及伯尼西亚和代勒的诺森布里亚各王国。到6世纪末，我们又有了值得信赖的史料作为历史的依据，看到入侵者已牢固地控制了不列颠半壁江山。

土著居民发生过什么变化呢？6世纪苏格兰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不过，移植到西海岸的爱尔兰人（未来的"苏格兰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名叫达尔里阿达的稳固的王国。几个世纪以后，达尔里阿达的一个国王组建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苏格兰国家。北部的不列颠王国有三个：中心位于邓巴顿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索尔韦湾的雷杰德王国，利兹地区的埃尔姆特王国。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皮克特人的野心由于在685年的一次重大战役失败而收敛。的确，扩张是以牺牲土著不列颠人作为代价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幸存下来，6世纪末期和7世纪期间雷杰德和埃尔姆特却没有逃脱被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的命运。

不列颠主要的飞地自然是威尔士。来自东方的难民无疑使该

地人口大增。基督教徒们也幸存下来，随之存在下来的还有某些明显的罗马文化痕迹。6世纪期间，在此建造的小修道院即使不是上百也有几十。从威尔士东南部发现的契约表明罗马庄园的功能仍然延续着。圭尼德、达费德、波伊斯以及格温特王国一直存在到550年左右，一些较小的王国存在到5世纪末。吉尔达斯笔下的暴君中至少有两位曾在威尔士统治过，即圭尼德的马格罗卡努斯（马格温）和达费德的沃蒂波（圭西法），前者是“头号恶魔，争权夺利和阴谋陷害的大师”。沃蒂波的墓碑至今仍矗立在达费德的一座教堂墓地里，它证明吉尔达斯的责骂是真实的：

58

> 你的头发已在变白，因为你坐在一个充满诡计的王位上，从上到下粘满了形形色色的谋杀和奸淫。……你就是沃蒂波，一位善良国王的不孝之子，蒂默台人的暴君。你的灭亡之日已经来临；你为什么还嫌你犯下的如此滔天罪行不够尽兴（你如同酒徒嗜酒一样乐于施暴）——还是你情愿玩火自焚？你为什么为实施暴行不惜用你自己也难以正视的丑行来加重你那卑鄙的灵魂？

康沃尔、德文以及萨默塞特形成了不列颠的杜姆罗尼亚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它的国王和其他地区的国王一样坏：“杜姆罗尼亚的肮脏母狮生下的小暴君君士坦丁”。虽然康沃尔存在到838年，但它的居民因受到7世纪和8世纪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的压力而向后退移。由于这种征服发生的时间较晚，幸存下很多东西。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旧城，特别是埃克塞特、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尔切斯特，往日的生活方式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流入5世纪和6世纪。这些郡的许多大教堂都源自克尔特人。1978年到1980年在韦尔斯发掘出土了一系列从罗马后期的陵庙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总教堂的宗教建筑。如同在威尔士一样，这儿较小的教堂一般可溯源于克尔特人的修道院属地（llan）或是以殉教者陵

园为中心的墓地(merthyr)。

估算到600年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牢固统治的地区中不列颠人幸存下来的情况是最困难的任务。1086年的英格兰人口大概只相当于罗马不列颠后期人口数的一半，甚至这个人口数还是经历 59 10世纪和11世纪增长才达到的数字。很清楚,5世纪和6世纪人口减少无疑是剧烈的。许多人退往西部，另一些人亡命至布列塔尼，传染性疾病可能也是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更具普遍意义的是,罗马化的不列颠人无一例外地承受了社会崩溃的厄运,人口下降本身也就可以认为是他们社会瓦解的最清楚的标志。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人幸免;有很多迹象表明,这时人口中也会有很多不列颠人的成份,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有时候(例如肯特人的早期法律中)这些不列颠人成了农民或者农奴式的庄园劳动力——这有助于解释罗马土地制度的因素如何进入了英格兰社会。有意义的是,英格兰人说的Wealh一词(Welshman即不列颠人)逐渐成为"奴隶"的意思。这使人弄不清Walton这一地名是指"不列颠人居住地"还是指"奴隶居住地"。自然,无论到底有多少不列颠人,他们都在英格兰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盎格鲁撒克逊人既没有接受他们的文化,也没有接受他们的语言。

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可是他们对于破败的罗马时代的城镇只有由迷信引起的恐惧，这种观点传得太远。英格兰人懂得ceaster是什么(该词的应用具有极其显著的连续性),他们一般也知道其罗马名字;Mamucion成了Mame-ceaster(曼彻斯特),Venta成为Ventam-ceaster(温切斯特)等等。城镇处于交通系统的中枢,其城墙又很坚固,它们成为酋长们设置指挥部的理想地方。一些城镇也许一直还行使着它们地区的行政功能。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就存在着城市生活;罗马城镇并

未被完全废弃，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却消亡了。

为什么较之于罗马高卢，罗马不列颠在蛮族移民入侵中更深地湮没于历史之中？一个原因是，两地的移民不同：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较之盎格鲁和撒克逊人更为熟悉罗马社会。另外，不列颠人本身在5世纪初期和6世纪中叶期间发生过重大变化，威尔士最早的诗歌显示了一种与撒克逊人的社会非常相象的不列颠社会，同样通过忠诚来维系整个社会，强调财富、献礼以及在酋长之下亲兵的伙伴友谊。即便撒克逊人不涉足不列颠，情况也可能是：罗马文明虚弱不堪，无法延续下去。

七世纪

乍看起来，7世纪初叶的英格兰分成了一些大的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韦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迈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包括伯尼西亚、代勒和稍后一点的林赛）。不过，实际情形并不是如此。各王国都是从混战中逐渐崭露头角的。例如，米德尔塞克斯可能就是一个未见记载的较大的中撒克逊人领土瓦解后的遗产。还有一些数目不明的更小的部族居住在大王国之间或是就在这些王国之内，一些像伍斯特郡的赫威赛和威尔士边疆的马格赛特王国都有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后来逐渐成为大国统治者的“儿王”或“郡长”。还可能有过许多其它类型：如，在7世纪70年代萨里王国有一个名叫弗里苏沃尔德的“儿王”，他的先辈很可能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偶而也有一些地方分离主义的迹象以及对强权的不满。比德说，在643年，林赛的修道院虽然知道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是一个“来自另外一个省份并统治过他们”的圣人，但却拒绝在此安葬他的遗体。英格兰的国王人数在600年可能有几十。

大国经历了权力消长和更叠的过程。比德和其他一些资料提到一系列从王国争雄中脱颖而出的霸主（Bretwaldas或Bryten-waldas),他们在作为霸主时都行使着对全部或者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权。无论霸主是不是一种正式职位（看来值得怀疑），但是一个国王建立起一种很大的(即便说是短期的)政治霸权肯定是可能的。比德列举的前四位霸主分别是苏塞克斯的艾尔、韦塞克斯的塞林、肯特的艾特尔伯特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他们在7世纪20年代前后成为霸主。我们不能说他们所行使的权威一定会超过自己的国界，不过我们知道，626年雷德沃尔德带领一支军队假道迈西亚将诺森布里亚击败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内。第五位和第六位霸主是两位诺森布里亚统治者，埃德温(616—632)和奥斯瓦尔德(633—642)。他们都是比德心目中以胜利者面目出现的基督教国王典范式的英雄。我们从他们那儿开始清楚地了解英格兰各王国的关系。

诺森布里亚向西扩张导致迈西亚与威尔士人结盟。632年，信奉基督教的圭尼德不列颠人国王彭达一度战胜了诺森布里亚人，但第二年，奥斯瓦尔德恢复了霸权，卡德瓦伦被杀死。威尔士始终支持彭达。642年，奥斯瓦尔德在远离故土的奥斯韦斯特里征战中战死。这件事，附带他同韦塞克斯国王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权力和军事活动远远超越了诺森布里亚的疆域。比德著作中一组威尔士的早期诗篇提供了敌对一方的说明：因为比德的英雄是威尔士人的侵略者。在为一个来自波伊斯王国并在彭达麾下服役而战死的名叫辛代伦的贵族的挽歌中，我们可以一瞥不列颠人眼中的诺森布里亚人。

为了保护遭受敌人蹂躏的特伦城，
我的兄弟辛伦、辛代伦、辛雷斯，
死于敌人刀下

……

62 鲜血在大地上流淌

荒芜的土地上满目凄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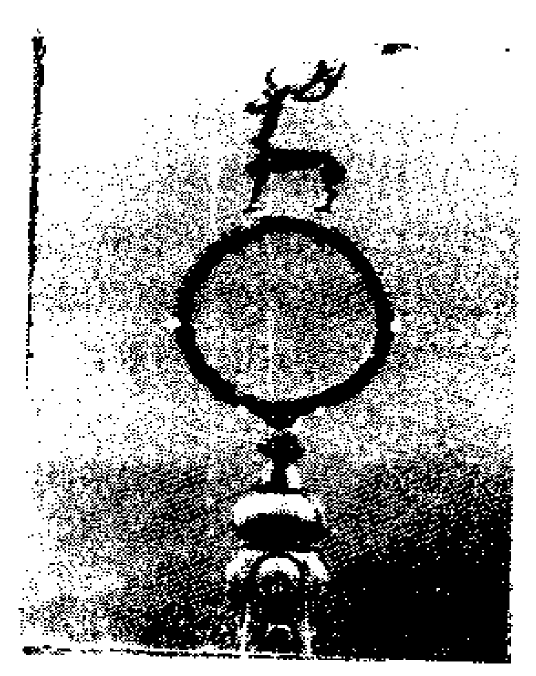
自从撒克逊人杀死了

波伊斯的辛代伦和艾尔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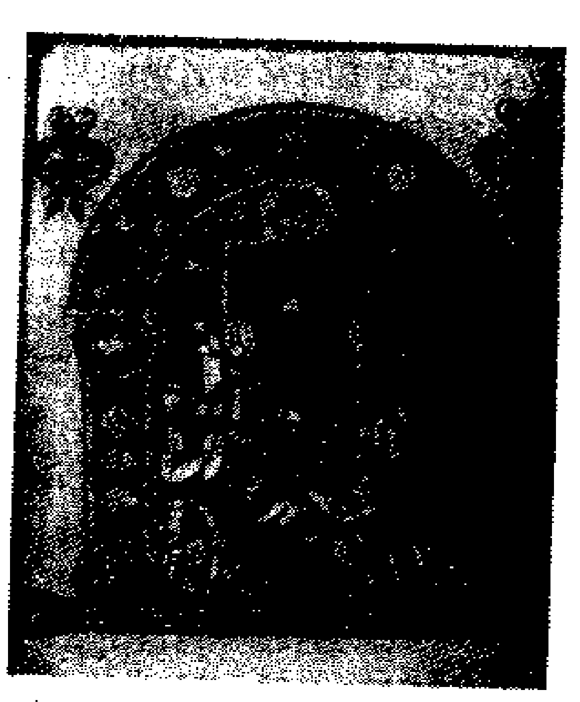
辛代伦的府第、房顶漆黑

655年，诺森布里亚的奥斯威击败并杀死了彭达。奥斯威是比德笔下第七个霸主，他因而对其他王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正在兴起的明星是迈西亚。迈西亚的贵族不久就驱逐了奥斯威，并选择了彭达的儿子伍尔夫赫尔作为他们的国王。到了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赫尔看来已经控制了英格兰南部各王国。679年，他的继位者在特伦特赢得了胜利，从而最后结束了诺森布里亚的扩张。然而，在南部，迈西亚的强权被韦塞克斯的国王锡德瓦拉突然打破，锡德瓦拉在685至688年短暂的统治时期还兼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他及其继位者艾纳在韦塞克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强国，它将左右后两个世纪英格兰的命运。

在七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霸主虽有可能，但想要维持较长时间却很困难。为什么国王像走马灯式地变动？一个原因是权力和征服依赖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又为酬礼的厚薄所决定；礼品要以财力作为基础；财富又可以通过权力和征服来得到。社会充溢着各种各样的世仇；由于王国继承权的随意和不确定性，许多王室成员和贵族背弃了自己家族去投靠慷慨而志同道合的君主。比德说，代勒的奥斯威国王“高大英俊，出口成章，风度翩翩，对贵族和普通人同样仗义疏财，因此每一个王国都有许多贵族蜂拥前去充当他的家臣”。这种社会体制不可能稳定，当一个国王患病、贫穷，就意味着众叛亲离。如果他的继承人能够侥幸逃生，也就变



萨顿胡权标(可能属于雷德沃尔德王)



宫廷乐师环绕着的大卫王(见于770年左右坎特伯雷的一份手稿)

成"儿王",或是一个新君主的扈从。

1939年,在东盎格利亚海岸的萨顿胡发现了一座大型王室墓葬,使我们得以真正懂得国王的堂皇意味着什么。该墓葬日期是在7世纪20年代左右,可能是位居比德的霸主名单中第四的雷德沃尔德国王之墓。他被葬在一个大土冈下的船式棺材里,身着盔甲,随葬的有他的武器和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宝。黄金和宝石装饰品可能是在北欧地区发现的最好的一种,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陪葬品来自于范围极广的地区。一块非同寻常的用于礼仪的磨石很可能是国王的权标。从萨顿胡的墓葬来看,对于王室财富作如下诗意解释并不夸张:金钱得失兮,王国兴衰哉!

英格兰社会就从一开始存在着军事贵族,他们很可能具有某种领地。但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扈从及"塞恩"① 与国王的联系比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还要紧密些。他们要伴随在国王的 64

① 塞恩(thegn),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贵族,可译为"领主"。——译者

左右，作为国王的军事活动的见证，在国王的王宫里生活。如果有必要，为国王战斗，万死不辞。贵族的生涯有着强烈的公社色彩，国王的大殿成了满足酒足饭饱的乐土，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的人间天堂，这种景色充溢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之中。比德最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种生活氛围。在为那位敦促埃德温国王接受基督教的诺森布里亚贵族撰写的著名篇章中，比德写道：

> 国王陛下，在我看来，这个世上的人生与我们不可确知的时间相比就是这样。冬天，您正和您的首领、塞恩们坐在酒席旁；大厅中央的炉火烧得正旺，整个殿内暖融融。殿外雨雪席卷着漫山遍野。这时，一个麻雀从一扇门里飞进殿内，又迅速地从另一扇门飞了出去。它在殿里呆了短暂的时刻，躲过一阵狂风暴雪，获得这一瞬间的温暖平和之后，就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又投入了凄厉的风雪之中。我们的人生稍纵即逝；对那些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我们一概不知。

在国王或者贵族宫殿里的这些人给文学提供了对象，而这种文学又反映了这个时代：职业行吟诗人诵说的各种英雄史诗。幸存的断篇残章中有一篇重要的史诗：《贝奥武尔夫》。这篇史诗事实上出现较晚，历经改写，可能是写给教士们聆听的。不过，这篇史诗向我们展现了七世纪英勇的、尤其是异教徒世界的贵族的情况，虽由基督教徒作了篡改，但保留了原始的线索。诗中英雄贝奥武尔夫是逃亡到丹麦国王哈罗斯加麾下的扈从。哈罗斯加以慷慨赏赐财宝和贵重武器著称，因而吸引了许多贵族武士来为之效力，从而强大起来。诗中描绘的当时政治舞台充满着暴力和动荡：失去支持的国王立即随同其王国一起灭亡。当时的社会具有浓厚的忠诚和复仇的风气："对于人们来说，应该选择的是为他的朋友复仇而不是长期地悲痛哀悼……赢得光荣，死而后已"。贝奥武尔夫与之战斗的对象是非基督教愚蠢世界里的居民，即恶人和暴徒。在

他牺牲时，他的扈从们在他的遗体上铺满了财宝，安葬在一座面对大海的山冈上，同东盎格鲁人将他们的国王安葬于萨顿胡岬一模一样。诗中咏叹说：

那时，武士们骑着马围绕着墓冢，

……

他们称颂他的刚毅和指挥才能，

他们为他扬名，

一个人在称颂他的朋友时应该极力褒扬。

……

他们说他是全世界国王中，

最高贵、最优雅的，

对他的人民最善良，对于荣誉最渴望。

不过，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有的不仅仅是战争、原始的忠诚和好大喜功。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令人瞪目的井井有条的世界。65 使英格兰国王在中世纪中期异常强大的各种制度，在7世纪甚至更早已经形成；新的领主们之所以能够非常快地获取权力，"地方政府"的效率是重要原因之一。到10世纪，出于法律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英格兰各郡划分成"百户区"。至少在早期一些王国中，从较大的互相毗邻的区域形成了百户区，其面积在50到100平方英里，它们在7世纪中叶显然已经存在。这些百户区早就在肯特郡和萨里郡得到证实，不过新近研究表明诺森布里亚、迈里亚、韦塞克斯、苏塞克斯也有这种行政区划。这种完整得惊人的乡村行政区划体制产生的原因，仍是早期英格兰历史中尚未解决的一大问题。它是否如同许多人认为的一样，是罗马化一克尔特人的遗产？它是不是6世纪霸主带来的产物？或许是各王国移民社会背景中共同成分自发进步的结果？无论答案是什么，百户区无疑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治世界中一种奇特的稳定基础。

每一个早期行政区的中心都是一座王家采邑主房屋或屯(tun)，它由一名地方官员管理，国王和他的家臣时多时少地也来光顾。今天，每个郡都存在过好几个这样的遗迹，一些遗址的地名就因此得出，如金斯顿(Kingston)，其它的地名倒不明显。正是这些"中心地点"，而不是城镇亦或村落，构成了撒克逊社会早、中期的主要地方中心。分散在区内的居民希望在国王巨大的府第及其周围建筑处安身，可以享受法律和政府的好处。根据一种复杂的征收体制，他们也得纳税并承担一些公共负担，计算土地的单位是"海德"(hide)，从理论上讲，每海德等于养活一个自耕农及其全家所需的田地数，这通常就成了实际的农田单位。各种义务看来也是通过海德进行摊派。若干海德组成20或更多种的负有特别义务的组。地方中心的国王代理人从一些组中收取谷物，从另一些组中收取小牛和马驹，从其他组中收取蜂蜜、蜂蜜酒或者少许日用品。

由此看来，早期的行政区划既是用来组织开垦也是用于司法管理的。一种经济上有专门分工的地带的体制适合十分落后的农村的情况，这些农村之间地理条件差别悬殊，存在着大面积尚未开发利用的公有牧场。因此，撒克逊时期中期的国王们准许开发大面积土地就不令人奇怪了；这些早期"采邑"常常保留了他们由以形成的行政区域的内部结构。因此，不同的"维拉"或小镇都同采邑的中心有联系，形成了"复合庄园"；在英格兰许多地方，这种庄园到12和13世纪仍居主导地位。一些历史学家最近证明，这种组织(与威尔士早期组织肯定相类同)起源于克尔特人。农村机构存在着一些连续性是十分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只是从某种广义上来说，不能夸大。使"复合庄园"衰落的正是增长和社会变化，而不是征服。假定不列颠人民并没被全部赶走，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入侵者差不太多，那么，如果一种与现存材料相符合的模式

66

没有能延续下来，就令人奇怪了。

对于分散、无组织、人数相对少的农业人口来说，这种模式也是适合的。早期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农或下层农民(ceorl，该词即现代英语中的 churl，但不含贬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耕种海德的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整个 7 世纪和 8 世纪农民们自由到只是国王的臣民，实际上他们还有领主。正像从前恩赐土地给俗人随从那样，在皈依基督教后，国王恩赐大量土地给教会。作为司法和财政上的私人单位的采邑，其起源并不清楚，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格兰社会刚刚形成它就出现了。据 7 世纪晚期的资料的记载，领地被分割成“领主土地”(产权直接属于领主)和农民土地两种，在领主土地上耕作的人很多是奴隶。在庄园制早期，像国王那样从基本没有改变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的小土地拥有者那里收税的领主是不多见的。这时不存在 10 世纪那种成群的带有依附性质的佃农等级，也不存在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的同强大领主有密切联系的有组织的“乡村公社”。考古表明，在撒克逊时期中期的英格兰，大多数农庄互不往来或者是结成很小的组织；甚至作为社会联系中心的地方，也看不到后来村庄地形中常见的井然有序的街道、草地和纵横的阡陌。今天看来，中世纪公用地制以及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条状土地中的私人土地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演变而成的。7 世纪的英格兰尚未出现后来才完善的“乡村公社”。

31

一种外来影响力量即基督教会，在 597 年进入这由国王、亲兵和农民构成的非常传统的社会。伟大的格雷戈利教皇首先倡议了使英格兰人皈依基督教，据说他在罗马曾见过英格兰的青年，断言他们为“安祺儿而不是盎格鲁人”① 。格雷戈利知道肯特国王艾特尔伯特的王后是一位法兰克基督徒，于是派出由一位名叫奥古斯

① 安祺儿(angel)在英文中和盎格鲁人(Angle)谐音。——译者

丁的罗马修道士率领第一个传教团去肯特王国传教。艾特尔伯特起初犹豫不决，不久就皈依基督教。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起第一座修道院。由于过高估计了罗马化不列颠人的生活方式对蛮族的影响，格雷戈利一度计划在伦敦和约克设立大主教职位。当601年奥古斯丁被委任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格雷戈利承认了政治现实。最初，传教很迅速。604年，在罗切斯特建立了第一个教区。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伦敦为他们建筑了一座献给圣保罗的大教堂。与此同时，在肯特也建筑了好几所修道院，其样式几乎是罗马教堂的翻版。

不过，国王及其亲属只是表面上皈依基督教，基础很不牢固。东撒克逊人不久就抛弃了基督教并驱逐了他们的主教。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虽然受过洗礼，但是他对基督教态度仍模棱两可，因为据比德说，他既去教堂也去异教的圣地。诺森布里亚的情形也是如此，埃德温国王接待了罗马传教士波莱纳斯并与他的塞恩们在627年接受了洗礼。但是，仅仅在五年后，当他战败身亡，他的继承人就背叛了基督教，波莱纳斯不得不逃走。虽然教会很快在英格兰的王室宫廷中取得一席之地，但它要想超越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而蓬勃兴起，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基础。

令人吃惊的是，传教最为成功的并不是格雷戈利的传教团，而是原始的孤单自立的克尔特人的基督教会。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基督徒仍可能对英格兰人有过某些影响，但并不具有重大意义。奥古斯丁看来是个相当傲慢、缺乏灵活性的人，他触怒了威尔士的主教们，从而未能赢得他们的合作。在北英格兰人中间取得重大传教效果的使团却是从爱尔兰来的传教士，他们到了英格兰，又来到诺森布里亚。

由于圣帕特里克及其助手的努力，在6世纪初期，大部分爱尔兰人都信奉基督教。修道院成倍地增长，以致于全部爱尔兰教会

逐渐都依照修道院方式组织起来。“地方”都以修道院为中心，修道院院长成了各地的管理者。主教仍只是在形式上发挥他们精神上的职能，他们缺乏正式的主教管区，并处于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因此，典型的爱尔兰传教士是些从属于故乡某个团体的云游四方的主教。爱尔兰教堂的富丽和精巧要远超过威尔士。在6世纪和7世纪，他们一直向高卢、法兰克、苏格兰和英格兰派出传教士。一个名叫哥伦布的传教士来到苏格兰，他使北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南皮克特人已是基督徒了），并在563年前后在艾奥纳岛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当基督教国王奥斯瓦尔德在633年控制诺森布里亚时，他很自然地向艾奥纳派去了传教团，因为他曾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中度过流亡生活。 68

爱尔兰主教和僧侣云游四方的简单生活使他们能够与人民进行全面的接触。奥斯瓦尔德的主教艾丹具有使诺森布里亚永久皈依基督教的能力。在林第斯法恩岛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后，他在每一个王家土地的村落都建立一座教堂，从这里向周围村民传教。比德说，艾丹总是步行传教，并以平等人的身份与路人交谈。就这样，一些修道院建立起来。不久，诺森布里亚教会就壮大起来并影响到其他王国。迈西亚的彭达虽然信奉异教但允许从林第斯法恩来的传教团进入他的王国传教，他的儿子在635年受了洗礼。奥斯瓦尔德和后来的奥斯威所取得的霸主地位也有助于诺森布里亚教会对其它地区的基督教传播。635年，奥斯瓦尔德对韦塞克斯国王辛尼吉尔斯的影响使后者接受了一个名叫比林纳斯传教士主持的洗礼。比林纳斯成为西撒克逊的第一个主教。由于奥斯威的影响，东撒克逊人也重新皈依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个曾在爱尔兰教会受过训练的名叫切德的诺森布里亚主教。到660年，仅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仍然信奉异教，但不久他们也改宗了基督教。

爱尔兰传教士的热情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从长远来看，罗马教

会的权威对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决定性的。由于教皇格雷戈利的目的没有实现，因而英格兰各王国的克尔特人教会也就没有接受罗马的教规。在今天看来，主要的症结是些荒诞不稽的琐事——应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在长期孤立时期，克尔特人已经采用了不同于罗马的计算方法。当两种教会发生联系时，结果不可能没有矛盾之处；在诺森布里亚宫廷，国王奥斯威按爱尔兰教会定的日子庆祝复活节，而这时他的妻子按肯特教会规定的日子仍在守斋。问题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宗教信仰以及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于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664 年），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放弃了爱尔兰教会的规定，赞同罗马的规定，极少数死硬派的克尔特分子回到了艾奥纳。这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英格兰各王国的教会可以在一个大主教之下联合起来成为一支团结的力量了。

在 7 世纪 60 年代，教会仍然为各种难题所困扰，组织不统一，主教少得可怜，一些主教的任命不具法律效力。664 年，还有一些主教死于瘟疫，他们的死又使东撒克逊人再次叛宗离教。669 年，教皇派来一个名叫西奥多的大主教，他是小亚细亚人。这个令人吃惊的候选人（当其他几个主教不愿去英格兰担任大主教时，他成了唯一的人选）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代管教区的牧师。在 30 年的任期内，他使主教管区的结构合理化了；从前各地主教管区都是不明确的，在那些由爱尔兰传教士们努力而信奉基督教的王国可能还没有主教管区。目无秩序的主教受到惩戒，不确定的权威不是被树立起来就是干脆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们制订的全部条例都被宣布无效。672 年，在赫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颁布了教会管理的第一批基本教规。

69

大多数教士接受了西奥多带有恩惠的统治，但在里彭和后来又在约克任主教的难以应付的威尔弗里德却拒不接受。虽然他坚

定地信仰正统的罗马基督教理论，在惠特比接受了罗马教会的复活节，但对诺森布里亚教会威胁他的权力十分不满。他与西奥多以及接连几个国王之间的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使他两次遭驱逐，两次向罗马求教，还被流放和监禁过。同时，他还设法向弗里斯人传教，使苏塞克斯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在迈西亚建立了几所修道院。从他的扈从和巨大的财富来看，威尔弗里德非凡地将圣徒和世俗贵族集于一身。只有一个生气勃勃并且本质上唯利是图的教会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物。

西奥多任主教时期是修道院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仍然在延续，但罗马的方式对于像林第斯法恩和惠特比这样的克尔特人大型宗教团体的影响正不断扩大；在圣卡思伯特，爱尔兰的传教士们的独居和苦行已与罗马修道生活和戒律观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建立的新修道院可说是不列颠 70 的几个世纪中最为壮观的。某些方面，韦尔茅斯和加罗教堂最令人叹服。这两个教堂由本尼狄克·比斯科普建立，他本是个诺森布里亚贵族，后来遁世成为修道士。比斯科普曾五次到罗马，并和其他修道士将地中海地区教会文化带到了诺森布里亚。比德就是比斯科普的同伴中的杰出一员，比德描绘了比斯科普是怎样让高卢工匠按照他毕生喜爱的罗马风格修建了一个教堂，并装饰了许多富丽堂皇的绘画和添置了各种家具，还建有一个藏有大陆资料的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要使农村的教会工作得以开展，尚需建立某些牢固的基础；说这时基督教信仰已经深入到农民中间，令人难以相信。许多人将会对下述情况感到意外，早期传教的成就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团体取得的。今天来看，传教工作和主教布道显然都是牧师们的活动内容，而不是修道士，但在 7 世纪和 8 世纪，即使不是克尔特人教会，也很难按照这种说

法来一概而论。英语中mynster（修道院）一词用来指从名符其实的本尼狄克教团到既小又松散的牧师团体的各教会机构。教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斯科普亲自为加罗教堂制订了教规），标准也发生了同样的更动；实际上，除那些最大的宗教团体外，我们对其它宗教团体的活动一无所知。到750年，逐渐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格兰已有了几百个小的“修道院附属礼拜堂”，它们带有名符其实的重要的布道功能，为那些可以称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体制服务。

那些逐渐被称为“老式礼拜堂”的出现要早于大量的普通地方教堂，服务的区域也更大些。反映这方面的资料较晚才有，而此时这些“礼拜堂”已濒临消亡，起的作用在日益减少。因此我们对它们的布道工作所知甚少。只是知道它们曾有过这方面的功能，看来神父团体抑或那些严于律己的修道士代表是在一个限定的“教区”里四处向地方公社人民布道的。这种修道院附属礼拜堂的教区居民向它交纳什一税，并不得不在此为他们的孩子洗礼，为自己送终。没有国王的庇护和推动，这样复杂的体制不可能这样快就形成了。波莱纳斯和艾丹在王室土地上的乡村中布道。因此在王家村落上建有许多大教堂也就不足为奇了。什一税可能是根据当时存在的税收额制订，一些国王将建筑这种礼拜堂作为一项政策，例如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在655年就是这样做的。国王有着一套有组织的地方政府体制，教会也照搬不误。虽然最后在修道院附属礼拜堂中出现了成千个小礼拜堂，从而代替了前者的功能，但这种修道院附属大教堂的教区将为英格兰教会在乡村的未来发展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如果说国王们帮助了教会的发展，那么教会也加强了国王的地位。异教徒战争领袖们的子孙逐渐视自己为上帝指定的代理人。再经过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一个新国王的加冕就非常类似于一个主教的任职仪式。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来的是识文断字；

国王们已能修改并系统地阐述类似于文明世界法规的部落习惯法。比德说，肯特的艾特尔伯特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法来制订了他的法律。艾特尔伯特法典以及七世纪后期肯特和韦塞克斯的法典都是本地传统和从大陆借鉴来的东西的结合物。无论它们的实际用处如何(这种作用令人怀疑)，制订这些法律的国王们显然想使自己显得高深莫测:法律制订者都是以古典模式为参照的。随着这些王国越来越向罗马和高卢的影响敞开大门，王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对于统治者来说，主持正义和管理王国内部事务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不仅仅是为了打胜仗。虽然7世纪法典带有很长的罚金和刑罚条目，但字里行间已突出地体现着国王权威。

从英格兰最早的教堂的情况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早期城镇的风貌。6世纪的统治者们很可能就将其指挥中心设在罗马不列颠时的城镇和要塞。7到8世纪的统治者也自然将这些地点作为修建总教堂和礼拜堂的理想场所，坎特伯雷、约克、曼彻斯特和伍斯特总教堂都是建在罗马人的防御工事里，635年，第一任韦塞克斯主教得到了泰晤士河畔的多切斯特的罗马要塞，在此建立了主教辖区，比德称之为城市(civitas)。王室宫殿和教堂建在荒凉的古代废墟上，而不是建在他们所属的城镇里。那个时代组织程度最高的共同体无疑是总教堂和礼拜堂，手工业者、商人，仆从和乞丐都蜂拥至此。城市生活复苏的最早征兆与大教堂密切相关，它们有的位于罗马时期的城镇里，大部分是在没有前史可查的 72 各个场所，这并不是巧合。从时间上说，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向坎特伯雷移民的最早的考古资料稍晚于奥古斯丁去那儿建造教堂。最近在北安普顿的考古发掘证明，城镇的中心是一所建于8世纪大教堂中的礼拜堂和大厅以及与此相毗连的建筑物。9世纪晚期的比德著作译本把urbana loca译为“教堂地区”，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城镇”。大量的英格兰城镇开始时是作为大教堂的所

在地，随后才汇集来大批世俗居民。

迈西亚霸权：

8世纪初的英格兰与7世纪初时相比已有较大的发展，统一的英格兰王国仍然杳无踪影，但英格兰人现在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种族和文化单位。比德对此的认识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强烈：他最伟大的著作《英吉利民族的教会史》这一书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易于为人忽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分担的共同命运，他才能设想一个"英吉利民族"。但是否存在一些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正在日益健全呢？这一问题不易回答，尽管有较多的资料也一样。一方面，那些显示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机构和概念并不新鲜，而仅仅是第一次被记载下来而已。另一方面，显示其虚弱一面的王朝混乱可能也不新鲜。比德及其同时代人也许掩盖了这些事件。至少可以说，作为老式的"霸主"，8世纪时的迈西亚国王像他们前辈们一样强大；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合法性，这使得他们的权力更稳定，更能发展。

73

迈西亚的艾特尔鲍尔德（716—757年）继承了伍尔夫赫尔赢得的许多影响。从现在发现的一些记载国王敕封的成文契约，我们知道了国王如何称谓自己。艾赫尔鲍尔德的头衔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尽管并不新奇，一份契约称他为"不仅是迈西亚王而且是称为南英格兰的各省之王"，这个称号印证了比德所作的下述断言，早期的霸主"据有亨伯河以南的各省"，这一论断可以在下述范围内得到证实，即诸契约表明霸主能影响到肯特郡的事务，并控制着伦敦。但韦塞克斯仍然保持独立，还有诺森布里亚，它由比德的庇护人切奥尔乌尔夫统治着。迈西亚的霸权从未达到亨伯河以北。

艾特尔鲍尔德的继承人奥法（757—796年）是阿尔弗雷德以

前最强大的英格兰王，一旦他的地位得到稳固（这花了好几年时间），他在除诺森布里亚和韦塞克斯以外所有王国中的所作所为就更像是一位直接的统治者而非一位高高在上的领主了。此前的国王已翦除一些小的王朝，而奥法则翦除了大的王朝。他完全控制了肯特（只在8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例外），并待肯特王以仆从之礼。他曾取消肯特王埃格伯特的一次敕封，并说他的大臣"竟胆敢没他的首肯就封赏土地，实乃大谬"。798年，肯特王朝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奥法的继承人，但遭到失败。此后，这个古王国被永远消灭了。苏塞克斯的末代国王充当了奥法的一个首领，我们从契约中发现，奥法也曾在西撒克逊王国领土的萨里分封了一名迈西亚贵族。在东盎格利亚（虽然在这里后来又重新出现了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简短地记载：794年，"是年，迈西亚王奥法命将艾赫尔伯特（王）斩首"。在韦塞克斯，国王的权力和传统更强大：从786年到802年，该王国只承认迈西亚的庇护，在此期间该王国君主的身份似乎比肯特王还要暧昧。

奥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约上使用简单和绝对的"英格兰王"称号的统治者。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写给他的一封著名信件加强了他的地位。查理曼平等地称他为"最亲爱的兄弟"，并提及"你及艾特尔雷德的王国之诸主教区"云云，似乎迈西亚的奥法和诺森布里亚的艾特尔雷德是英格兰仅有的两个国王。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系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份文件的意义可能被夸大了，但在高卢人和南英格人之间，以前一直保持着大量的联系）。奥法肯定很愿意被人认为是另一个查理曼，不管王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地位之形成肯定是与国外扩张相一致的。787年，奥法以庄严的仪式封他的儿子埃格夫里斯为迈西亚王。9年后，诺森布里亚照搬了这项仪式。国王半神化的身份变得日益强烈。

这并未使王朝更为稳固。王位继承仍未固定。在奥法死后很 74

久，国王还是从王族中“遴选”产生。每位笼笼统统地具有资格的候选人，只要有后台撑腰，就能觊觎王位。8世纪中叶，迈西亚、韦塞克斯、诺森布里亚都被王朝倾轧搅得一片混乱。奥法由于努力保证王位继承，对待他的亲戚像对待其邻国一样地残酷。当他的儿子埃格夫里斯在他本人死后不久也去世时，诺森布里亚的学者阿尔昆认为这是报应：“父孽现降临其子，君不见父为其子确保王国所造之孽何其多也”。

这句评语主要是对奥法的挖苦，但在迈西亚诸王统治下确实开始形成一些重要的机构，教会现在牢固地建立起来，它拥有土地和特权。它的集会极为庄严，均有记载备案。艾特尔鲍尔德和奥法经常出席宗教会议，有时还主持这些会议。他们的大乡绅和大臣们则在会议所作决议上署名。这种处理教会事务的方式几乎总能加强先例意识和合法意识，虽然这些集会的内容是宗教性质的，但这些会议本身肯定有助于把环绕七世纪国王的特殊的亲兵转化为我们在后期撒克逊英格兰见到的正规的“贤人”或大会议。

“特许保有地”(bookland)，即有一份文契授予合法名称的土地)的概念现已完全得到了承认。8世纪的契约，至少是那些流传至今的契约，大多都是敕封给教会的，但它们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土地权力和当地利益正在取得对传统价值的胜利。8世纪的贵族开始显得有点不那么像亲兵武士，而更像是乡绅了，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开始有所出现。关于这些住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林肯郡的戈尔索曾发掘出一所9世纪中叶建造的住宅，该住宅由围墙包围，内有一座大厅，一个厨房，一间卧室和一些室外建筑。关于教堂的证据就更多了，8世纪的史料中经常提到由具有牧师提名权的贵族家庭控制的世袭“私有”牧师。所有这一切对于全能领主来说也同样是确切的。以前的国王们有他们的王室别墅，但奥法似乎试图使他在塔姆沃思的住所成为一种全国的

司令部或“首都”。在塔姆沃思附近还有迈西亚的利希费尔德总教堂。奥法在几年时间里终于使该教堂提升为大主教教堂。即使其中包含着部分的政治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它是在奥法王国“京城”附近的一座占据天时地利的教堂。

土地所有人有义务帮助建筑桥梁和堡垒的规定第一次出现在749年的一份文件中，此后的土地分封中通常也规定了这项义务。在一个至少创造了两类大规模公共建筑——一种始终是著名的，另一种则最近才为人所理解——的时代，这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一类当然是奥法的堤坝，这是一种古老的、也许正确的传统称谓，最近的发掘表明，这一庞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的一条连绵不断的壁障，从一侧的海洋到另一侧的海洋。奥法以入侵[76]威尔士著名，但堤坝肯定是一种防御的而非进攻的工事，是在放弃征服计划后修建起来的，旨在阻止威尔士人的反攻。但堤坝的存在这一事实完全证明了奥法所掌握的巨大资源。

本章所提及的“堡垒工事”主要是指坚固的要塞而非堤坝。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及其继承人陆续修筑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堡垒或城堡(burh)网络，以使韦塞克斯免遭维金人侵袭。考古学家最近开始提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在迈西亚的强盛年代，有些城堡就建筑起来，用以自卫。多数情况下(如贝德福德，据说奥法葬在此地)，证据只是从地形学上得来的，因此不是最后定论。但在赫里福德，在发掘中发现了一条早于撒克逊扩张以前的8世纪的防护圈，在塔姆沃思也发现了一些不太确定的证据，表明那是奥法时代的防御工事，一些9世纪后期韦塞克斯城堡形成的时间也比较早；有一些城堡，比如在韦勒姆(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牛津，肯定是建筑在8世纪或更早以前就很重要的地址上的。

我们看到，城镇出现中有两个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个要[77]素，以长远来看最大的要素，是贸易。奥法生活在对内对外贸易都

在扩张的时期。最明显的迹象是货币制度的出现。约600年左右以前，英格兰只通行外来的金币。7世纪和8世纪的国王铸造的粗糙银币是不可靠的，通常只在地区内部流通。新的法兰克银币是更好的货币标本，稍早于奥法以前的一位东盎格利亚国王似乎使用过它。但是，奥法发行的精巧的硬币出现后，旧的货币迅速被取代，新币一时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流通范围最广的货币。最有意思的也许是，奥法的硬币不仅见于一些大的宝库，也曾被小批、分散地发现。显然，它们用于地方范围内的小规模交换，货币正在成为英格兰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789年，查理曼与奥法之间的一场争执导致查理曼对英格兰人关闭法兰克港口。从此事中可以看出，英格兰商人似乎经常使用这些港口：查理曼与奥法统属的国度都是方兴未艾的国际贸易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贸易中心在北欧到处兴起。对丹麦的海伦娜和瑞典的伯克等大的居民点所作的发掘表明，8世纪时英格兰和维金人地区同属于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在英格兰，这样的商业区通常与当时王室或教会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名称中常带有-wic（来自拉丁语vicus）。Hamwih是今天南安普顿的前身，它位于泰斯特和叶特切的交界处，靠近一座叫汉普顿的王室采邑。它的名称Ham-wic与Ham-tun有关联。在这里进行的发掘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公顷大小的居民点，最早有人居住可能是在8世纪20年代，其中一些制造品表明与欧洲大陆的广泛联系。其它居民点有伊普斯威奇（Gips-wic）——主要产陶中心——以及桑威奇和福德威奇。罗马时代的城镇开始恢复其经济和宗教方面的重要性。约克（Eofor-wic）形成了一个郊区贸易场所，这里有弗里斯商人的足迹。对坎特伯雷的发掘发现了一些8世纪的房屋和一个据记载为786年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伦敦，比德在730年左右称之为“水陆商旅咸集的大商场”。虽然现在看来，罗马时代和中

世纪比灵斯门的港口地区之间有一条中撒克逊时期的土坎，但这个商业地带仍然很难找出。无论它位于何处，它肯定曾是个很大的重要市场，7 世纪后期的文献提到过 Lunden-wic，8 世纪的资料则提到这个港口的通行税和征税人。

对英格兰教会来说，8 世纪是一个相当动荡的时代。世俗根基以及教堂的圣职授予权带来了一些自身存在的问题。世袭利益并非一定是一桩坏事：在一个可靠的家族控制下，教堂可以指望得到安宁与繁荣。但并不是所有的业主都可靠。如果我们相信比德记载的话，那么有一些教堂仅仅是逃避赋税的“门面”而已。比德并不是唯一为风纪松驰担忧的人。艾特尔鲍尔德、奥法及其继承人塞伍尔夫（796—782 年）参加了一系列迫切需要的宗教改革会议。僧侣被禁止过世俗贵族的生活，在修道院酗酒、唱世俗歌曲被定为犯罪。786 年，奥法主持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的一次由教皇使者参加的会议。但是教会机构的发展虽然加强了国王的尊严，却也扩大了主教的权利。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在像艾特尔鲍尔德那样的国王当政时更是如此。艾特尔鲍尔德似乎把修道院改革与掠夺教堂和勾引修女结合在一起。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较量因肯特地区强烈的反迈西亚情感而趋于复杂化。当奥法把利希菲尔德提升为大主教辖区时，大主教贾因伯特被激怒了，奥法死后，这个计划被取消了，理由是利希菲尔德被提升出于对肯特人的敌意。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英格兰教会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阿尔昆毕业于约克的教会学校，是查理曼宫廷中的一个红人，在查理曼大力复兴古典学术和教育的运动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引人注目的是，8 世纪后期欧洲最重要的学者是一位英格兰人，这在查理曼致奥法信件的内容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但是必须记住，阿尔昆与他以前的比德一样，是诺森布里亚人：关于迈西亚文化，

我们知之甚少。也许这仅仅意味着许多史实的失传。迈西亚没有一位像比德那样的人来记载它的成就，而它的一些最大的教堂又遭受维金人的洗劫。一些装饰艺术的残迹，如山上的布里登大教堂里的雕塑，表明它是建立在繁华和财富的背景上的。艾特尔鲍尔德和奥法时代的著名的遗迹是北安普敦郡布列克斯沃思的大教堂。若不是迈西亚在此举行宗教会议，这所教堂是不会出现在任何早期的文献中，这说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布里克斯沃思教堂。它是英国现存最主要的8世纪建筑

8世纪教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事实是英格兰人此时正将基督教传播到他们在大陆上的故土。奇怪的是，传教开始于圣威尔弗里德与西奥多主教的争吵。678年，威尔弗里德为了到罗马申述他的立场，开始作穿越异教的弗里斯地区的旅行，并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布道。英格兰人通过他们的商人非常了解弗里斯人，而威尔弗里德则为雄心更大的传教工作开了个头。690年，一群诺森布

里亚人在弗里西亚登陆，领头的是威利布罗尔德，他在695年被任命为弗里西亚大主教。他在乌特勒支建立了他的大教堂，有组织的法兰克人弗里西亚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由圣卜尼法思率领的西撒克逊传教团完善了威利布罗尔德的工作。从718年他抵达大陆到754年他被异教徒杀害这段时间里，卜尼法思在弗里斯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中间布道讲经，并在梅因地区建立了一个教区。卜尼法思不仅使异教徒地区皈依基督教，也对整个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为法兰克教会订立规章制度，并使其归顺教皇的领导。在他的传教生涯中，他依赖来自英格兰的书籍、随从和英格兰人的忠告。他与家乡友人之间的大量通信流传了下来。把颓唐的法兰克教会改造成卡洛林王朝复兴时期进取性教会的工作，大多数是由英格兰男女来完成的。

维金人入侵和韦塞克斯王朝兴起

奥法死后不久，强盛的迈西亚就衰落了。他的继承人塞伍尔夫保住了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还从北方的威尔士那里得到了一些新的领土，但是802年，韦塞克斯摆脱了他的统治。一个新的霸主的王朝将要兴起，这一次是西撒克逊。825年，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温登附近赢得了一场决定性胜利。把迈西亚国王率领的一支军队赶出了肯特地区，并吞并了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四年以后，迈西亚本身也被埃伯格特吞并了，甚至诺森布里亚也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这种反复非常惊人，它表明奥法王朝在稳定英格兰政治方面无所作为。埃伯格特也没能做到这一点：839年他去世时，迈西亚又一次独立了。老式的王朝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将一如既往。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的789年包含了一个预兆，这是一场风暴的第一声呼啸，一场将吞没韦塞克斯王朝的所有对手、并带走英格兰文明的一些最优秀的成就的风暴。

这年（韦塞克斯王）贝厄特里克娶奥法之女埃德伯为妻。在他的时代，自豪斯南德驶来首批三艘挪威船只；当地地方官不知他们为何人，纵马前往，欲迫使他们去王室采邑，却被刺杀。这是首批前来英格兰的丹麦船只。

这次维金人登陆是小事一桩，虽然此后不久又有一些旁证提及“海上的异教徒”进攻南部海岸。在北方的一些劫掠更为严重，其灾难性与南部的入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劫掠包括对林第斯法恩（793 年）、加罗（794 年）和艾奥纳（795 年）等地接二连三的洗劫。英格兰已在两个世纪中没有遭受到外来打击，突然有三个最著名的圣地遭到摧毁，引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只是一些孤立的事件，早在一代人以前，维金人引起的麻烦就已成为严重的威胁了。但是 835 年维金人对肯特的一次大举入侵揭开了一段长达 30 年的新时期，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入侵，最后以一支全副武装的入侵军的来临结束。

挪威人和丹麦人引人注目的扩张是一全欧洲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侵略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现象涉及到两个民族（Viking 即“海盗”一词源于他们所犯罪行，同时指这两个民族）和若干动机。他们远非完全的野蛮人，到 9 世纪 40 年代时，他们已深深陷入商业活动了几代。确实，也正是这种商业使这两个民族与其西方和南方开始了正常的接触。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要在家乡找到合适的生计变得日益困难了。许多冒险家肯定已耳闻有着极易抢劫的寺院的富饶国家之传说了，在早期的入侵以后竟没有更快地跟来新的入侵，这只能说是令人惊奇之事。854 年，丹麦王朝的垮台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王能够团结武士，他们因而成为游兵散勇对外国财富进行洗劫。

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从9世纪50年代起为什么有那么多欧洲国家遭到入侵者的抢劫，以及为什么偶然的抢劫让位于一项征服和定居的政策。入侵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绕苏格兰北岸进入西部群岛西部并再往南，另一条往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岸并往高卢。因此，侵入并定居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的主要是挪威人，而在英格兰和法兰克地区的主要是丹麦人。

865年，由哈夫丹和无骨的伊瓦尔率领的一支丹麦"大军"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在逗留数月后，它向北转向诺森布里亚，该国正好陷于一场王朝纷争，大军于867年攻占了约克。两个相互争斗的国王死去，丹麦人把诺森布里亚当作一个附庸国，让一位由他们提名的傀儡统治。然后，这支军队进入迈西亚，但遇到抵抗后没有开战就退回到约克，并于869年再度进攻东盎格利亚。其居民战败，他们的国王埃德蒙(他不久将被追尊为殉道者圣埃德蒙)成为一次杀人祭神的牺牲者。在三年之内，两个一度强盛的王国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消失了。

870年，丹麦军队驻扎在雷丁，准备入侵韦塞克斯。但那里的抵抗组织得较好。埃伯格特死后，西撒克逊由他的儿子艾特尔伍尔夫统治 艾特尔伍尔夫是一个没有野心但很能干的人，他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那种将摧毁其它王朝的王室纷争：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年纪顺序和平地继承了王位。当北欧海盗进攻时，他的第三个儿子艾特尔雷德在位，他的弟弟和继承人是阿尔弗雷德，他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大的人物。

正是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的联合力量在伯克郡丘陵迎击 81 了丹麦人，使他们第一次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英格兰的成功是短暂的。丹麦人撤至雷丁，几乎马上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在贝辛斯托克附近击败了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871年4月，一支丹麦生力军登陆。入侵韦塞克斯似乎迫在眉睫，该地的保卫者无处

求援。在这次危机中，艾特尔雷德去世，其弟成为西撒克逊王。

伟大的阿尔弗雷德(871—899年)被所有人认为是把英格兰从看上去无望的厄运中拯救出来的国王。这并非是同时代人的看法。至少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英格兰"仍然没有多少含意。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土地］")一词的作家就是阿尔弗雷德本人，"Englaland"一词则要再过一个世纪才出现。其他一些王国接受西撒克逊的统治权，乃至宁肯承认之而不愿承认丹麦人，这并非预定的结局。它们很可能已选出它们自己的国王，而英格兰的反对者、流亡者或一些反叛的团体寻求维金人援助的危险始终存在。其它一些王国的摧毁并不一定就使阿尔弗雷德成为全英格兰人的国王；他和他的继承人达到这一点，是由于军事胜利、机智的外交和好运气综合在一起的缘故。

他的统治一开始很糟糕。在经受了一年不断的小挫折以后，阿尔弗雷德不得不贿赂丹麦人。丹麦人仅保留了韦塞克斯一地五年，在此期间，他们入侵了迈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以一个由他们任命的国王替代了他，这样第三个古王国永远消失了。丹麦大军一分为二，一支由哈夫丹率领，向北进军，开始瓜分约克郡，将其作为永久居住地。另一支由吉特伦、奥斯萨特尔和阿南德率领，转向南方。875—876年，他们又一次发动对韦塞克斯的进攻。一开始，他们的胜利是有限的，877年他们再一次撤退，转而瓜分迈西亚，他们中的一支分遣队则在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建立了殖民地。

878年第三次进攻韦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数大大减少的军队，但对奇彭哈姆的一次突然袭击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大部分地区被他们占领了，阿尔弗雷特被迫退避到南萨姆塞特沼泽地中的阿瑟尔尼。形势看上去绝望了，但阿尔弗雷德在他

的要塞中捕捉战机，收容部下。据比此稍晚的作者所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5月初，“他驰往伊格布里特斯坦(埃格伯特之墓)……所有萨姆塞特及威尔特郡人及部分汉普郡皆来此地觐见他……他们均欢呼雀跃。翌日他自此营地前往伊利欧克，次日又至爱丁顿，他在此奋击敌全军，打得他们落荒而逃”。 83

这个胜利出人意料，但却是决定性的。丹麦人首领古特伦与他的部将接受了洗礼。两王达成和约。和约承认丹麦人占领大部分英格兰为“既成事实”，疆界大致以自伦敦向切斯特的西北走向一线划分，古特伦应将其部队撤至这条界线以后，他将在那里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880年秋，丹麦人已离开了韦塞克斯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定居在东盎格利亚。

这并非冲突的结束。886年，阿尔弗雷德攻克了伦敦，显然是在打败一支丹麦驻军以后。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此后三年中横行英格兰，但对韦塞克斯的影响甚小。阿尔弗雷德日理万机，他既要保证他自己王国的安全，又要巩固他对丹麦人边界以西、以南地区其它领土的统治权。作为首要任务，他看来提高了陆海军的战斗力。以往的国王一直是根据地赋供养能力来征集军队的。阿尔弗雷德重组了军队，使得任何时候都只有一半军人在服役，这预示了以后的“选兵”或民兵制度，它肯定造就了一支人数更少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对付海盗的明显途径是拥有更多的战船，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了比北欧海盗的船只更大的船只，每只船备有60或更多的橹桨。

阿尔弗雷德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肯定是使韦塞克斯免遭进一步内陆入侵的部分）使他成为英格兰第一个城市设计师。到9世纪80年代末，韦塞克斯已到处建立起一个公共中心点网络，有些拥有正常的街道栅栏，肯定是有计划的设防城市。一份所谓《城市海德》(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举了30个这样的城堡(bu-

rhs)，后来可能又增加了三个。也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温切斯特，在罗马时代的城墙以内，这里又筑起了一条新的栅栏，全然不顾罗马时代的街道。在牛津、奇切斯特、韦勒姆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可看到同样的呈直线的东西。规划很有系统，勘测者似乎用标准的66英尺规格来布置街道。大一些的城堡不仅仅是要塞，而且很快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配备守卫人员是邻近土地所有者的职责，作为报偿，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用被守卫地区。他们往往在城堡内建造"城里房屋"来囤积他们用于买卖的产品，《末日审判书》记载了城市公寓与乡村庄园之间的几种联系。商人和工匠随之前来，9世纪后期的要塞到10世纪时成了日益繁华的城镇。守卫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恰相一致，因此阿尔弗雷德在几个现代城镇建设的道路体系中为他带来了意外的永久性纪念碑。

阿尔弗雷德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付邻国有手腕。特别是在迈西亚，伤害当地人的自尊心是很危险的。阿尔弗雷德把这里的事务交给其从前的王族委员会办理，这个委员会的领袖是一位名叫艾特尔雷德的迈西亚贵族，这人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当阿尔弗雷德于886年攻占伦敦时，他立即把它交给迈西亚人掌管。受到如此殊荣的艾特尔雷德对国王忠诚不渝，在阿尔弗雷德死后，他和他的妻子艾特尔弗莱德率领迈西亚人对丹麦人发起了进攻。如果阿尔弗雷德比以前任何人都更称得上真正的"英格兰王"的话，那么这不仅是通过军事实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对手；人民之所以真心要他当统治者，是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家族是能体恤民情的公正统治者。

但是丹麦人的麻烦和他们造成的破坏依然存在。某些破坏是难以恢复的：不管现在事态如何，比德和奥法时期的世界已一去不复返了。关于丹麦大军的人数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下列这些事

实：三个王国被摧毁，主教区分崩离析，无数教堂遭抢劫，有关英格兰东部许多地区的契约和文件几乎完全失落。教堂的毁灭也许最为严重，因为大修道院以往一直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贮藏所，而一些小修道院仍然对乡村的教会事务负主要责任。

在丹麦区（后来人们对古特伦以后丹麦人统治地区的称谓），在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以及东盎格利亚部分地区，到处都是以“by”、“thorp”及其他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音素为词根的地名。这个影响是惊人的，它既表明丹麦人的军队十分庞大，也表明它在乡村广泛地分散了。即使当丹麦区一带基督教化并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时，它仍然保持着一些鲜明的特征，有着它自己的采邑结构体系、土地测量单位、法律和社会分层。10世纪的国王遇到了调和一个联合王国的种种权利与那些同英格兰截然不同的风格的问题。

英格兰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复兴，阿尔弗雷德在他最后的十年中致力于此。他像查理曼一样，通过一帮宫庭学者执行他的教育计划。他是亨利八世以前唯一写过书的英格兰国王。他悲叹手稿的毁坏和学术的衰退，为此学习了拉丁文并把一些拉丁文著作译成英文供臣民们阅读。在他的那帮学者翻译的许多著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其中有比德的《教会史》），有三种可能是阿尔弗雷德本人的作品。人们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最初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的宫中编纂而成。对牧师们来说，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为博取高官所必须的条件。很难确知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到底取得了多大成就，但它肯定造就出了更有学问的僧侣和更有知识的俗人：这是两个世纪后教会改革的良好基础。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幸运的是未来的一些事态使得他的那么多计划结出了果实。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他仍然是早期英格兰史中的杰出人物。

85

"长者爱德华"(889--924 年)、阿瑟尔斯坦(924—939 年)和埃德蒙(939—946 年)三王统治时期，居主导地位的问题是收复丹麦区。这半个世纪是民族王权的形成时期。一方面是由于阿尔弗雷德谨慎的王位继承规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幸运的机会，902年，一场危险的分裂因爱德华的堂弟战死而避免了，这位堂弟曾试图借助丹麦人的帮助夺取王位。924 年，阿瑟尔斯坦顺利地继承了王位，因为他既是韦塞克斯的合法继承人，又在他的迈西亚姑妈家里接受了教育。到这个世纪中叶时，不要说其他任何王国，就连迈西亚也不太可能恢复原先的王朝了。韦塞克斯王室就是英格兰的王室。

爱德华统治时期的征战，主要由国王本人亲自指挥，也得到国王的姐姐，"迈西亚的贵妇人"艾特尔弗莱德的配合。英格兰的进攻开始于 910 年丹麦人入侵迈西亚失败之时。在此后 8 年中，爱德华突入丹麦区，他的姐姐则使丹麦人在迈西亚边境疲于奔命。由于来自爱尔兰的挪威海盗开始进攻西海岸，艾特尔弗莱德现在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她主要的功绩是修建了一系列新的迈西亚城堡：在东部边界对付丹麦人，在西部边界对付威尔士人，在西北边界则阻止来自迪伊和默赛的挪威人对塔姆沃思的侵袭。917年，艾特尔弗莱德攻克了德比，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从而给爱德华进攻东盎格利亚的良机。到 918 年时，整个丹麦区南部落入爱德华的控制之中，尽管孤立的丹麦军队仍然坚守着斯坦福德、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莱斯特向艾特尔弗莱德投降，但不久她的去世迫使爱德华为了确保迈西亚而停止了征讨。随后他迅速返回，攻克了斯坦福德、诺丁汉和林肯。到 920 年底，亨伯河成为英格兰牢固的疆界。

同时，爱德华与其他一些非英格兰的邻国建立了联系。918年，他接受了圭尼德和达费德的威尔士国王的"归顺"。《盎格鲁撒

克逊编年史》记载，923年，"苏格兰王及全苏格兰族奉他为族长和领主；雷格拉尔德、埃德伍尔夫的诸子及所有诺森布里亚的居民，无论是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还是其它族人，都奉他为主；这样做的还有威尔士与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的国王及其所有臣民"。这些是一系列"归顺"中的第一批，这个阶段的"归顺"之最高潮形成了973年极其壮观的景象：8个"不列颠王"向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宣誓效忠，并在迪伊河畔列队觐见他。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事件是对所效忠国王的个人归顺；它们包括承认领主地位和接受庇护，而不涉及到永远放弃独立。事实上，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正争取内部统一。850年，苏格兰王肯尼思·麦卡尔平吞并了皮克特人的王国，在以后两个世纪中，苏格兰在苏格兰人（相对皮克特人而言）的统治下发展。在威尔士，9世纪后期起圭尼德的突然扩张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政治，在一些小王国中只剩下了一个达费德。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而在这两个地区，土著人的力量到1066年时都已取得了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威尔士受到了英格兰和北欧海盗的巨大影响。

在10世纪的不列颠争夺领土的诸多集团中，有一个新的集团——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毫不喜欢丹麦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对丹麦区的控制。918年，一支由雷德沃尔德率领的军队进攻苏格兰，在诺森布里亚站稳了脚根，次年，又占领了约克，在这里，雷德沃尔德自封为王。挪威人的王国断断续续地存在了35年，在此期间，贸易增长了，挪威人统治的两个城市约克和都柏林迅速扩大。在约克的发掘显示了两旁排列着木质结构房屋店铺的街道，这些街道由丹麦人建成，雷德沃尔德的部属则对之加以重建。在阿瑟尔斯坦和埃德蒙的统治时期，英格兰人的主要敌人是挪威人而非丹麦人。

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德沃尔德的效忠，从而承认了他的地

位。但当一位新的挪威人的国王在926年试图继承其遗产时，阿瑟尔斯坦发动了进攻，占领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工事，并接受了苏格兰王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王的归顺。6年以后，阿瑟尔斯坦与苏格兰人之间关系破裂。由于害怕侵略，苏格兰人的诸多敌人纷纷与其作对。但在937年，阿瑟尔斯坦率领的英格兰军队击败了[87]一支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军。阿瑟尔斯坦此时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列颠人的霸主。他受到了外国的尊敬，并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王室建立了婚姻联盟。他的敕令表明，威尔士诸侯定期地来他的宫廷觐见，阿瑟尔斯坦统治时期，达费德王海韦尔•达仿制了英格兰银币，并以英格兰法律为模本颁发了一些法律。

但是，这一切仍主要依赖于国王个人。在939年阿瑟尔斯坦死后不久，奥拉夫•格思弗里森率领的一支挪威军队又杀了回来。新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为约克及其附属领地之王。奥拉夫死于941年，此后4年中，埃德蒙收复了丹麦区北部地区，劫掠了斯特拉斯克莱德。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一首当时的诗歌，将埃德蒙描绘为把丹麦人从他们的挪威人压迫者中拯救出来的救星；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竟然认同英格兰王国而不认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但是在947年，即埃德蒙去世的第二年，约克又落入一位挪威国王埃里克•布拉达克斯之手。此后6年中，出现了埃里克、新英格兰王伊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奥拉夫•西特雷克森的挪威竞争者之间的混战。954年，伊德雷德侵入诺森布里亚，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克王被赶走并被杀死了。

韦塞克斯家族从将近50年纷乱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埃德加平平安安的统治时期（959—975年）证明，他不仅建立了军事势力，还造就了更多的东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保持以前几位国王在英格兰建立起来

的和平。”但这决不抹杀埃德加的成就，王国很不成熟，后期撒克逊王权的主要发展是以埃德加为中心的。

从阿瑟尔斯坦起，国王比以往更频繁地制定法律，也更深入到法律的细节。他们处理的事务范围很广：维持安定，镇压窃贼、教会的教阶、商人和市场的运作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着重点是统一，埃德加的法令允许地方习俗存在，特别是在丹麦区，但又坚持“世俗法律应适用于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牢固确立”。到11世纪初时，国王主持对大多数严重罪行的审判，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概念，即：保持全国的安定是国王的职责和权利。王权日益普及深入，其规模之大是10世纪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难以比拟的。

法令和契约是在“贤人会议”或王室咨议会上发布。其起源可以通过附在契约后面的署名名单来追溯。在10世纪，贤人会议比以前国王的咨议会人数多得多，也许更正规，它包括许多被称为“大臣”或塞恩的人。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过于牵强附会地试图把贤人会议看作是一个“原始议会”，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不对国王行使任何“立宪”限制。但是贤人会议有其重要性。贤人会议遴选国王，批准公共宗教活动并讨论若干事务。它由贵族、主教和许多在本地社团中颇有影响的人组成。从阿瑟尔斯坦统治开始，贤人会议扩大成一个固定机构，成为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88

国王的意志由一个经过很大改善的地方政府体系来执行。10世纪期间，英格兰的地方区划逐渐由杂乱无章统一为一种单一的“郡”制。有一些郡已存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许多建在旧的疆域上。大致在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县的区域稳固地确立了，其面积一直沿续到1974年，正好是一千年。郡委托一群要人即郡长来管理。韦塞克斯在9世纪时每郡设一个郡长，大约从阿瑟尔斯坦统治时起，郡长的数目逐渐减少，他们的地位却上升

了。到埃德加时，郡长逐渐变得不像是个地方官员，更像是他的后继者即 8 世纪时的伯爵了，但他仍然与其管理下的郡政府保持着正常的接触。

出于法律与行政上的原因，郡又划有下属单位。在大多数县里，这种下属单位称“百户”，在丹麦区北部称“百户村”。每百户都有自己的法庭来解决当地的事务。百户也摊派一些公共义务，如为军队提供给养和划桨人手等。百户也不是地方行政体系的最低层，为了加强法制，居民组成十家相互负责的团体，或“十户区”。通过一种相当复杂的机构，中央政府把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其中有多少是 10 世纪的新生事物还很难说。百户在更早之前的法律条文中已经出现，在撒克逊时代后期，百户看来通常建立在旧有的区域基础之上。但是这种体系是由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加以合理化改善的，在埃德加统治时期，显然出现了更完备的形式。

王权加强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以前，三个货币发行机构（韦塞克斯国王、迈西亚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铸制一种标准的银币达成协议。阿瑟尔斯坦在 924 到 939 年间发布的敕令宣布，“全国应统一使用一种货币”。他和他的继承人相当成功地保持了货币的统一性，所有货币都由严格控制的铸币者在城堡中铸造。973 年左右，埃德加设计了一种新的硬币，这种硬币在诺曼底征服以后还长期是英格兰的基本通货。硬币的精致表明了控制的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埃德加主要的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尼狄克修道生活在 10 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好像完全消失了。丹麦人摧毁了几个大的修道院和无数小的修道院，幸免的那些修道院趋向于一种日益松懈、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很早以前比德就谴责过这种方式。一群群修道院修士各自与他们的妻子儿女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近似于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而不像修士。要成功地

重建英格兰教会需要新型的修道生活模式和修建新修道院的资金。伟大的欧洲改革运动提供了修道生活模式，英格兰的改革本质上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贵族们则提供了资金。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三位伟大的教会人士：圣邓斯坦、圣埃特尔沃尔德和圣奥斯沃尔德。

英格兰的修道院改革在国王命令下开始于10世纪40年代：国王埃德蒙把格拉斯顿伯里交给了邓斯顿，国王伊德雷德把阿宾登给予埃特尔沃尔德。这两个修道院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可是埃德蒙和伊德雷德都不热中于此，下一位国王伊德威格文与邓斯顿积有私怨，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邓斯顿流亡国外，使他对欧洲的修道生活有了广泛的了解。随着959年埃德加的即位，时代改变了：邓斯顿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埃特尔沃尔德成为温切斯特主教。三位教会伟人中最年轻的奥斯沃尔德在法国的弗莱勒修道院逗留了一些时候。邓斯顿劝说埃德加让奥斯沃尔德担任温切斯特主教，不久以后，奥斯沃尔德在特里河畔的韦斯特伯里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等修道院的影响下，修建或重建了将近50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中的僧侣遵循一条以圣本尼迪克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按大陆方式举行仪式和日常事务。公元970年，各种传统被编进《教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英格兰修道院遵守的原则。埃德加所起的作用是关键的，他对这场运动施加了自己的影响，所有的新修道院都处于他的直接保护下。964年首次发生于温切斯特的从老式大教堂中开除俗家牧师以让位于僧侣的运动，如果没有国王的支持是很难实施的。埃德加慷慨相助，并希望其他人也效仿他：一些迹象表明，到10世纪70年代，强制贵族捐献越来越招致仇视。尽管如此，建造一所修道院在社会上还是一项颇具声望的

行动。

新的修道院富有、受人尊敬，拥有财产和华丽的建筑。一些文字资料暗示，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在艺术上丰富多采。一些带有极其精美的彩饰的书籍得以幸存下来，但金器、银器和象牙器具只有一些残片流传下来，大的建筑物几乎完全没有留下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建筑运气不佳，因为所有最大的教堂都是在诺曼底征服后重建的。10世纪扩建的温切斯特大教堂，长达250英尺，带有附属小礼拜堂，两边有精巧的塔楼，并镶绘一些饰带。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精神和物质的革新只触及到旧社会的一小部分(也许不到10%)，其它都一如既往。因而，在诺曼底征服之时，本尼狄克式修道院与维金人以前英格兰教会的遗物即一些数目不详的俗家小教堂共存着。

91 如果说新的修道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欧洲的影响，但它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则明显是有英格兰特色。到1000年时，英格兰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僧侣，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都与已经进入贤人会议的世俗要人商谈事务。重要的教会人士跻身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末期国王最重要的谋士行列。同样，实施教会改革能够为国王增添荣誉，这位国王也许将比他的任何前任都看重王位的神圣性。原定于973年举行的埃德加加冕仪式推迟到他30岁那年，因为这个年龄是获得牧师资格的最起码年龄。加冕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而是涂上圣油；它授予国王近乎牧师的地位，使之凌架于人类判决之上，正如埃文沙姆修道院布道人爱尔佛里克指出的那样：“无人能自封为王，然而人民愿选最悦己者为王。但是一当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人民则无法摆脱自己置于脖项之上的枷锁。”温切斯特新建修道院奠基证章的卷首插图显示了埃德加所希望的自我形象：头戴王冠，站在两位圣徒之间，向人世国王赖以进行统治的天国之王奉献礼品。

艾特尔雷德和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度的衰落

埃德加之后的两届君主统治表明英格兰离民族王朝还有距离。一个新的国王只有靠胜利才能赢得他人效忠，这反映在925年埃德加死时两个儿子还未成年的历史中。长兄爱德华不受欢迎，许多贵族想拥戴他的弟弟艾特尔雷德。爱德华登上了王位，但四年以后就在科夫被谋杀。这无疑是支持艾特尔雷德的贵族们干的，而谋杀又不谋而合地标志着一个多灾多难统治时期的开始。"无主见者"艾特尔雷德总是给人很坏的印象，可能艾特尔雷德缺乏那些对于君主来说仍然很重要的谋略，即用人不疑和疑人不用。另一方面，在博学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指引下，艾特尔雷德时期法律和司法仍然持续地发展着。要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难题——维金人的复活，英格兰可能已经像在埃德加时期那样实现了统一。

较之他们9世纪的祖先们，新的袭击者更使人惧怕。到10世纪70年代，丹麦国王哈罗德·布卢图斯在控制了丹麦和挪威后，正在创建一支战无不胜、训练有素的职业军。988年，哈罗德被其子斯汶废黜。斯汶自然维持了他父亲的军队，并大力修建要塞屯集军队。丹麦特雷利布格的一个这种形式的要塞被发掘了。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围绕着一组船形大厅的圆形工事，所有一切都设计得非常精确。对特雷利布格的发掘和丹麦的英雄传奇都表明，这支军队有着英格兰军队难以匹敌的协调性和组织性。

丹麦人的袭击开始于艾特尔雷德继位的第一年或是第二年。92 起初规模都很小，但是991年一支大规模的丹麦军队在马尔多击败了郡长伯特努思和韦塞克斯民兵，最后索取了大笔钱财作为赔偿后离去。这种情况在994年、997年和1002年丹麦军队袭击英格兰时一再重演。沉重的赔偿使得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声名狼籍。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他统治时期的大量便士，还有一些刻

有纪念自己作为雇佣军历史的瑞典人墓碑，这些人进入过英格兰并因英格兰的赔偿金发了财。如同1066年一样，10世纪90年代英格兰的财产处于丧失的边缘。

艾特尔雷德是怎样应付这种危局的呢？他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防止他的邻国为虎作伥。从地理上来看，建立不久的诺曼底公国是这些邻居中最至关紧要的。诺曼底人与他们维金人祖先只有几代之隔，因此常常为这些袭击英格兰归来的维金人提供港口。但在991年，艾特尔雷德和诺曼底公爵理查德订立了一项反对帮助双方敌人的条约，十年后艾特尔雷德同公爵之女结婚。诺曼底和英格兰潜伏着灾难的交往中的一页就这样翻开了。

至此，艾特尔雷德的对内政策看来与先王并无太大不同。他继承了一个强大的地位巩固的贵族集团，他早期的特许状表明他同伊德威格和埃德加一样通过赠与土地来赢得支持。但是，1002年以后，维金人的威胁迅速严重化，这就暴露了王权的一个弱点：国王的土地以及一般说来国王的活动，可能仍集中在韦塞克斯；他在东部和北部可以收买的支持非常有限，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最需要收买的。北部和东部分离主义趋势很大，这里的许多人仍记得其丹麦血统。艾特尔雷德后期的特许状表明，他的任命官职举动开始从韦塞克斯移往中西部和东英格兰。非韦塞克斯血统的新贵们变得重要起来。艾特尔雷德为图使英格兰联合在一起来防御外侮。他的无能可能使得这次任务更难实现，但无论对谁这都是件难事。

1002年，艾特尔雷德及其咨议会下令屠杀居住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政府的紧张不言自明。这项特别命令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在一些地区丹麦人是主要居民——但它反映出某种近乎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状态。我们知道，当牛津的丹麦人在圣弗雷德斯瓦德大教堂的礼拜堂中避难时，英格兰人将教堂也烧毁了。这

种大屠杀无疑促使斯汶王亲率丹麦军队于翌年入侵英格兰。斯汶洗劫了诺里奇，不过他在东盎格利亚战役中损失惨重。1005年，他退回丹麦，次年他又卷土重来。他率军横扫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这一次又只好用大笔钱来疏通。在短暂的喘息时间里，英格兰建立了一支新的船队，但1009年初一位被丹麦人收买的英格兰船长烧毁了80条船只。在这一不幸之后出现的是，另一支由高个子托基尔和亨明率领的丹麦军队登陆。1010年，他们烧毁了牛津，随后进攻东盎格利亚，次年又从这里攻入肯特。1012年，由于对他所率军队粗暴地杀害爱尔夫赫亚大主教深恶痛绝，托基尔倒戈，这场战争出人意料地结束了。这次艾特尔雷德得到了45条战船，其余的丹麦军队撤出了英格兰。

现在，英格兰的防御不堪一击是明确事实；1013年，斯汶率军又一次入侵英格兰时已带有征服目的。由于不再对艾特尔雷德抱有幻想，丹麦区的英格兰人欢迎丹麦国王到来，并几乎当即接受了斯汶的统治。到年底，斯汶占领了牛津、温切斯特和伦敦。艾特尔雷德逃往诺曼底。1014年2月，斯汶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继承了他留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但驻扎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却拥戴哈罗德的弟弟克努特为王。这时，艾特尔雷德回到英格兰，到了春天他发动了反对丹麦的远征。由于措手不及，克努特退往丹麦。1015年克努特率领一支更强的军事力量杀回英格兰，这时艾特尔雷德的儿子无畏者埃德蒙已经控制了斯汶统治过的丹麦区北部。随后的几个月，克努特重新占领了诺森布里亚，接着移兵伦敦。在丹麦军队抵达伦敦之前，艾特尔雷德去世，埃德蒙立即继承王位。可是在韦塞克斯，许多英格兰人不战而降，承认了克努特的领主统治权。埃德蒙重新召集了他的军队，一时看来丹麦人又要回老家了。但是1016年秋，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欣顿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随后签订的条约只将韦塞克斯划归埃德蒙统

治。埃德蒙死后不久，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

克努特王现在必须处理的各种难题与15年以后摆在威廉王面前的难题并无不同。像威廉一样，克努特并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征服者来进行统治，而是把自已打扮成一个合法的英格兰国王。他同艾特尔雷德的遗孀结婚，并为确保王位采取了残酷的行为：杀掉若干英格兰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幸存的艾特尔雷德的长子。一当王位确保无疑，克努特就热忱地吸收了文明君主的传统标志。他颁布法律，建立修道院，按照12世纪的编年史学家的话来说，他将自己"从野蛮之人一变为最基督教化的君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丹麦人，1019年他的兄弟一死，他就继承了一个辽阔的北方帝国，英格兰只是其中一部分。11世纪20年代期间，他越来越忙于丹麦人的事务，由于要处理的帝国事务太多，他对英格兰政策进行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相对较少，但结果却是毁灭性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自然想得到奖赏，虽然没有发生1066年后那种彻底的以新人替换英格兰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行动，但也有许多丹麦人成为贵族。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王位不会万无一失，克努特保持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王室禁卫军或称为"卫队"，他们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为了让丹麦人离去，土地所有者花了30年的钱，现在他们不得不养活一支丹麦常备军。

另外，克努特必须使英格兰政府机构在他长期在国外期间正常运转。1017年，他将王国划成四块伯爵领地——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迈西亚和韦塞克斯。这显然带有使地方分离主义情绪复活的种子，特别是由于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伯爵是两个丹麦人。到克努特统治末期，诺森布里亚的西沃德伯爵、迈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他的妻子是考文垂著名的戈迪瓦小姐）和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成为了最重要的人物。戈德温的血统不详，但到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是国王之下最富有的、力量最为强

大的俗人。对主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30年历史的权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负有责任的是克努特的伯爵们。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终结

1035年克努特去世时，有可能继承王位的有好几个人。可以代表韦塞克斯王朝的有艾特尔雷德的两个幼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但他们现在诺曼底朝廷；同样有代表权的还有流亡在匈牙利的无畏者埃德蒙。克努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由北安普顿的艾弗格芙所生的哈罗德，一个是由艾特尔雷德遗孀埃玛所生的哈塔克努特。克努特本打算让哈塔克努特来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克努特死时哈塔克努特尚滞留在丹麦，贤人会议就指定哈罗德作为摄政者（尽管这遭到埃玛和戈德温反对）。1037年贤人会议又为哈罗德举行了登基典礼。在这前一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曾经不明智地访问英格兰，但死于戈德温指使下的酷刑。1040年哈罗德去世，哈塔克努特继承了王位，两年后他又死了，这样丹麦的王统中断。现在所有的人都想要恢复古老的韦塞克斯王朝。艾特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英格兰宫廷居住一年后，于1042年被推举为王。

"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是一位被尊崇为最有名的英格兰王室圣徒。近来为他作传的人通过对虔诚传奇进行去伪存真的钻研，认为"他并不是一位具有伟大个性的人，但也不是一个神圣的傻瓜。与同时代同种地位的许多人一样，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无论他有什么长处和短处，他所继承的政府无疑是11世纪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其强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各种制度的建设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另一方面在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60年分崩离析的反作用。

从埃德加开始，地方政府就已经发展起来。一方面，由于克努

特将大片的领土权力交给极少数人，伯爵领地巩固起来。一个基础本不巩固的国王现在不得不面对强大的臣属的威胁。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在地方上推行国王政策的意义极为重大的新官员。在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国王在各个郡的低级地方官逐渐被称为郡守(sheriff)。他是国王在郡的首席行政代理人，并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郡长(alderman)职能。郡守负责为王室征集税收和司法费用，也属于不断增长的地方塞恩集团的一部分。在郡法庭，他们可以向郡乡绅传达国王的旨意，参与日常事务，并以国王的权威为名反对肆意横行的达官贵人。郡法庭和郡守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给中世纪后期政府最重要遗产中的一份。

95

艾特尔雷德时期英格兰的软弱无力是一种高度有效的税收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10 世纪 90 年代付给丹麦人的大量款项无疑是从全国征服的，这笔后来名为“丹麦金”的钱按古代征收海德土地税的办法征收，每海德有固定税率。1012 年至 1051 年间，为了维持常备军，先后几个王国仍然年复一年征收丹麦金。为此目的发展起来的复杂的征税体制也是后来编订《末日审判书》的基础。对于 11 世纪初叶英格兰政府部门来说，丹麦金可算是一笔巨大的进款。诺曼底征服以后，诺曼底国王又继续征收丹麦金达近一个世纪。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新式政府文件即国王令状。如果说艾特尔雷德只是有可能发布过令状，克努特发布过令状是确切无疑的。不过，现在幸存的最早国王令状属于爱德华统治时期。这种令状最早是一种给郡的伯爵和郡守或者主教的简单通知，内容是关于敕封土地和要求这种敕封应在郡法庭上公证。典型的国王令状如下例：

爱德华王以朋友之礼向哈德罗伯爵、托菲郡长、萨默塞特所有塞恩

致意。我知晓阿尔弗雷德已平心静气地将卢顿之地卖与主教盖瑟。他当着我的面在帕赖特做好了上述事。列席者：伊迪丝王后、哈罗德伯爵及其他许多人。我们还希望这位主教能像他的前任那样悉数拥有该地及全部附属物。凡在该地上无端索取，应物归原主。其它形式的勒索也属禁止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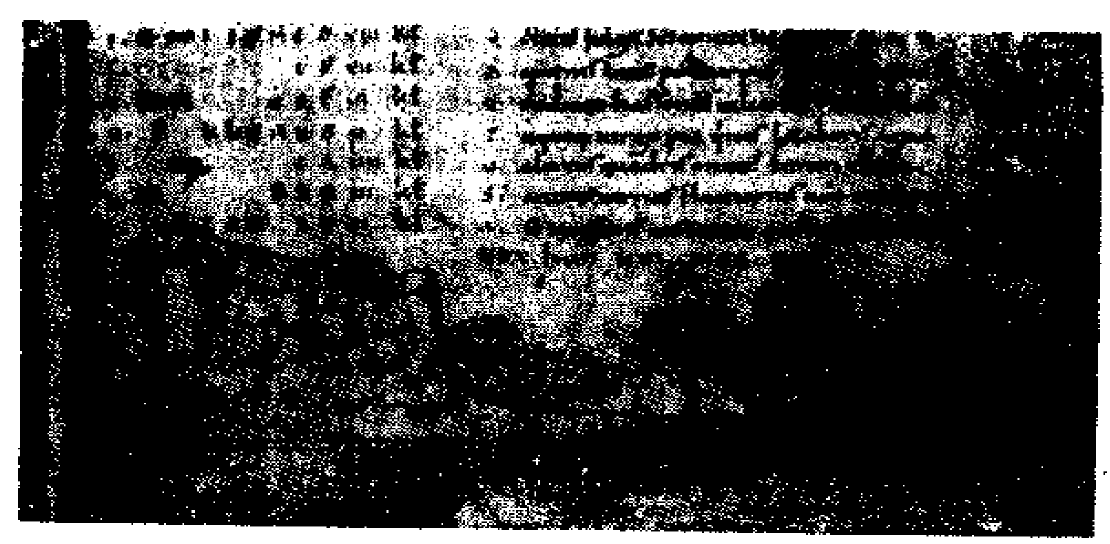
这把效率和一种新的公证方法结合在了一起：令状上吊有一个腊封的国王图章，这枚玉玺保存在王宝之中。如同地契一样，令状给旧式的特许状作了有益补充，因为特许状使用不便，又易伪造。国王令状也为国王既快又清楚地在各郡发布自己的意旨提供了一个方法。征服者威廉当即用令状发布命令，诺曼底征服后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国王文件都起源于此。 96

在下令征收一种税收或者发布一个国王令状时，国王都与其参议们商量。"忏悔者"爱德华同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国王们一样有一个由教士组成的行政班子。这个班子由一名教士首领负责，这种官职进而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大臣。他们的一项职责是整理档案：将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的非常详尽的关于土地占有、海德数目和纳税义务记录存档。比德的某些评论表明，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国王们就已经有关于敕封土地确切海德数目的精确资料。与此同时，自8世纪起一份名叫《部落海德税》的文件列举了民族、地区以及附属于迈西亚的各部落名称和海德税数目。因此我们可以相信，9至10世纪的国王们有某种财政记录，尽管说不出其详细程度。到"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国王参议拥有很多案卷，这些案卷列举了郡和百户的海德税数目，含有王室土地的数量，甚至个别庄园的名称、拥有者及其价值。不过，尽管存在某些残片，我们不是从最原始的文件中了解这一点的，而是通过《末日审判书》。如果调查人员从未接触到早期的帐目，1086年的大调查也不可能编

集得那么迅速和全面。诺曼底征服以前国家档案的丧失是不幸的，但仅仅它们存在这一点就说明爱德华时行政效率很高。

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两王统治时期之间，英格兰行政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人口和经济增长迅速。《末日审判书》之前，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文字的、考古学的、地形学的证据都充分说明，后期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在这些年里具体化。人口的增多无疑意味着城镇的扩大。到诺曼底征服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英格兰城镇：人口大量集中，有市场和商人，有特定区域、行会和规章的手工业者集团，无数的教堂，个别城镇的郊区迅速扩大。后期撒克逊法典确认了贸易中心或“港口”(并不一定是在海岸线上)和大的自治市存在，而征税的高低据城市允许拥有的铸币人多少来确定。城镇包括大多数城堡和许多没有大教堂的地方，它们的地点也不限于那些在古代曾是重要的地方。我们甚至难以估测地方市场的数量，不过，那些在13世纪开始繁荣起来的很多市场产生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

98 乡村也日益发生变化，不过限于资料难以清楚地勾勒其变化过程。地形学的研究表明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过居民集中的过程，分散的农业居民也集中成为各个村庄。这时，农业变得更加复杂和完备；到1066年，英格兰许多地区有了“公有地”，它由那些对此保有部分所有权的农民开垦，因而这时可能已有共同一致的耕作模式。早期的土地制度发展问题在今天仍有争议，但在10世纪我们第一次能明确地看到英格兰米德兰开田制区与周围“森林牧场”地区的基本差别。有关拓殖的形式、农业以及土地所有权变化之间的许多关系还难以理清，不过这种变化过程看来经过了好几个阶段，直到诺曼底征服后仍继续存在。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自发的进程，而是自上而下的有计划的重新规划。农民社会变得更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晚期的犁耕图

加层次化和有凝聚力，领主们对他们佃户的勒索也越来越多。

这种进程发生的一个原因是采邑越来越多，领主越来越多除发展迟缓的地区外，大部分老式“复合庄园”到11世纪已经分解成为相当于现代农村教区范围的单位。人口增长、新地开垦、过去“粗放式”的农业体制中的各组成部分成了自给自足的统一体。保存至今的10世纪的契据要比8世纪和9世纪所存的所有契据还要多，大多数契据敕封的土地规模要小些，得到敕封的俗人的比例要高于教会。小塞恩阶层已经扩大成为一个乡村地主阶级，《末日审判书》表明，1066年英格兰已有几百个采邑领主。

这就是大多数教区教堂建立起来的背景。像在7世纪和8世纪国王和主教们纷纷建立大教堂一样，塞恩们在10世纪和11世纪里也纷纷在采邑里建立教堂。在此之前有过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过在690年一个在私人教堂里任职的主教），不过从文件和考古资料来看私人教堂大多是在900年之后建立的，或许主要是在950年之后。教士组织肯定是乱糟糟的，大教堂教区正缓慢地衰落，处在其中的越来越多的采邑日益建立起属于本采邑的富有生气的教堂，采邑里的牧师在里面供职。11世纪教堂（在诺曼

底征服前后都是如此)实际上由领主"所有",其功能由所有者而不是主教们来决定。教堂的功能服从领主、他的家臣以及佃户们的需要。我们不能说这就是正式的"教区制",但应该注意到下列数据:1700年存在的半数以上的教区教堂都是1066年之前建立的。

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风貌——村落、采邑主住宅和教堂。大约在1010年,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在其著作中的最后两句提到塞恩身份的一般标准:"如果一个底层自由民发了财,以至他拥有了足足5海德的土地、一个教堂、一个厨房,一座钟加上一处要塞隘口,另外在国王宫殿里占有一席之位和特[99]别的办公室,这样他就会被称为塞恩"。这句著名的话里的"要塞隘口"成了一个多余的争论问题:在诺曼底征服前的英格兰存在过城堡吗?一位将私人堡垒建筑与封建制度等同起来,并确信后期撒克逊英格兰并无封建制度的作家认为,除了自治体的城堡外,没有要塞。实际上,即使把一个防备坚固的采邑主住宅算作为堡垒建筑,但除非还存在一个具有某种地位的土地贵族,它的存在不可能说明社会的性质。现在,考古发掘事实上证明,设防的住宅的确存在,由堤坝和壕沟环绕的结构精巧、建于1000到1020年左右的庄园建筑物在北安普顿郡的萨尔格雷夫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有所发现。这些遗址表明,后期撒克逊塞恩的住宅之堂皇程度可与11和13世纪早期的大多数采邑主住宅相媲美。

由于战争日趋专门化,装备也更加昂贵。到10世纪末,一种军事服务体制发展起来,它规定每5海德的土地必须提供和装备[100]一个男子服菲尔德(fyrd,民兵)役。这证明普通农民的收入无法装备自己服兵役,这也暗示了战士地位提高了。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5海德是一个塞恩最起码拥有的庄园面积,而塞恩身份的另一标志是盔甲和武器。后期撒克逊时期全副武装的战士的花费使得一般自由民无法成为士兵。

到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修道院改革正在草草收场。最后两个大的修道院建筑是1004年建于斯塔福德郡的伯顿修道院和1005年建于牛津郡的爱恩沙姆修道院。政治大分裂和资源的殆尽不久又使得大规模的敕封和建筑停止。不过爱德华的虔诚的确使他着手一个英格兰历史上最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大约在1050年，他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一座大教堂的礼拜堂，使它的规模符合英格兰君主国的规范。这时英格兰的建筑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40年诺曼底建筑的发展却辉煌灿烂：与伯莱和卡昂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时期的最好建筑物也黯然失色。因此，在修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时，爱德华自然参照了诺曼底建筑，不过他的礼拜堂最后修建得甚至按诺曼底标准来说，也是庄严瑰丽并富有创造性的。这可能应归功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韦塞克斯王朝教堂的最 101 后杰作却是诺曼底文化影响下的作品，这多少具有讽刺意义。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后岁月被戈德温家族一手操纵，同时也为继承问题所困扰。爱德华的王后是戈德温的女儿，但到11世纪50年代初，爱德华显然不会有继承人了。"无畏者"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1057年带着自己未成年的儿子从匈牙利回到英格兰，但是他刚刚回来就去世了。年幼的埃德加亲王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但是没有人对让一个孩子登基有多少热情。挪威国王马格罗斯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哈罗德·哈德赖达都将自己视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克努特帝国继承人。爱德华国王对这些继承王位的竞争者都不太满意：他的视线，如果确实移往英格兰以外，正注视着英吉利海峡彼岸，即他曾在那里度过25年流亡岁月的诺曼底公爵领地，那儿在实力和内部组织上都发展得很快。1035年，他那位当时还只有7岁的私生子威廉继承了罗伯特公爵的爵位。我们无法肯定地知道爱德华是否答应过将其王位传给威廉，但可以说可以预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爱德华因为他的兄弟被谋杀而不能饶恕戈德温，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1051年发展到顶点。这一年，爱德华的一个诺曼底朋友卷入一场在多佛的争斗，好几个人被杀。爱德华命令戈德温洗劫多佛，作为报复，戈德温拒绝了，并起兵反抗爱德华，迈西亚和诺森布里亚伯爵带领全部兵力响应了他的号召。冲突最后没有发生；当时的一个人描述了其中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进行战斗是愚不可见的，因为几乎全部英格兰显贵都加入了对垒中的双方，如果他们进行火并，将会为共同的外国敌人敞开大门"。由于丧失支持，戈德温及其家族逃亡了。在整个第二年里，爱德华不断在王室中起用新的诺曼底人，但1052年戈德温率领一支大舰队回到英格兰，爱德华不得不对戈德温作出更多的让步。诺曼底大主教逃回了故里，他的一些同乡也在戈德温的压力下被逐回诺曼底。

现在戈德温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权力，但1053年他去世了。继承他的韦塞克斯伯爵领地的是他儿子哈德罗，他注定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末代国王。在诺森布里亚的西沃德伯爵去世两年之后，该伯爵领地转归哈德罗的弟弟托斯蒂格。由于圭尼德国王格里菲斯对英格兰的骚扰，戈德温的儿子们地位蒸蒸日上。格里菲斯是威尔士的霸主，他联合了迈西亚伯爵领地流亡的继承人，发动了对英格兰领土的一连串攻击，赫特福德被洗劫一空并化为灰烬。哈罗德和托斯蒂格联合起来将格里菲斯赶回到威尔士，1063年最后将其打垮并杀死。基于这种丰功伟绩，哈罗德在英格兰一时如日中天。尽管他缺乏王统，但看来是王位明显的候选人。

102 1064年或1065年初，哈罗德造访了诺曼底公爵威廉。据诺曼底的资料，他作为爱德华的使者前往诺曼底向威廉宣誓重申爱德华让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早期诺言。这种关于誓言的故事可能是诺曼底人的虚构，但不一定全部都是捏造。一位制作贝叶花



哈罗德谒见爱德华国王

毯的英格兰艺术家可能通过其画面秘而不宣地给予我们第三种解释：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之手，从而被迫作了这些宣誓，因此回来后惭愧地面对着一副恐怖面孔的爱德华国王。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理(总的说来，诺曼底人说法可能证据最充分)，那个时代许多人确信威廉所作所为合情合理。

最后两年的变化很快。1065 年期间，诺森布里亚人起而反抗托斯蒂格伯爵，哈罗德居间调停，但诺森布里亚提名的伯爵候选人不予妥协，结果托斯蒂格逃亡异乡。托斯蒂格因怨恨哈罗德的中立，此后又反目为仇。1066 年 1 月 5 日，爱德华国王去世。在危险的军事形势面前，法律只能退居其次；贤人会议选举哈罗德为王。这等于向另外两个已成年的王位竞争者发出了挑战信号。挪威的哈罗德·哈德赖达首先发难：在流亡的托斯蒂格的协助下，他在夏季侵入诺森布里亚，占领约克。这时哈罗德的军队正在南部防范诺曼底军队可以预料到的入侵，于是不得不移师北上。9 月 25 日，他在靠近约克的斯塔福德桥与挪威军队遭遇并击溃之。哈德赖达和托斯蒂格双双被杀，哈罗德光复了诺森布里亚。

就在此时，由于天气恶劣推迟动兵的威廉公爵率领船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登陆。哈罗德匆忙率军南下，但两个月以前那种以逸待劳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他的精锐部队也在与哈德赖达的战斗中丧失殆尽。1066年10月14日，英格兰和诺曼底军队在黑斯廷斯相遇。哈罗德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山顶并筑起一道防护墙。战役持续了一整天。起初，英格兰军队的阵地看起来很牢固。英格兰军队的失败显然并不是由于力量不足，而是缺乏纪律。哈罗德的一部分军队看来不是真的退却就是佯装撤退向山下移动，被诺曼底军队切断并彻底歼灭。英格兰军队渐渐地开始分化，虽然直到黄昏仍然坚守在阵地的中央，但当哈罗德战死在阵地上时，战争结局已不言自明。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在该地建筑了战争修道院以示纪念。

威廉向多佛挺进，随后又进军坎特伯雷，在那儿接受了温彻斯特的投降。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伦敦，因为那里成为太子埃德加领导下的英格兰抵抗中心。在伦敦桥遇到抵抗以后，威廉一路上进行破坏，最后包围了伦敦。此时太子的同党人心涣散，因此当威廉抵达伯克哈斯蒂德时，埃德加亲自率领英格兰贵族朝见了他并表示效忠。阿尔弗雷德家族在丹麦人、挪威人、接着又是丹麦人的入侵下幸存了下来，但最终还是被一个异国的王朝一劳永逸地取代了。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

104

(1066—1290)

约翰·吉林厄姆

1066 年及其它

1066 年圣诞节那天，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拥戴为王。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用英语和法语发出的欢呼声使站在教堂外的诺曼底侍卫惊慌失措。他们认为教堂里出了大乱子，便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半个世纪后，一位诺曼底僧侣回想起那天的混乱。"当火势迅速蔓延时，教堂里的人乱作一团，他们蜂拥而出，有的想去灭火，有的则想伺机抢劫。惟有僧侣，主教和几位教士留在圣坛前。他们虽然感到恐怖，却努力继续完成国王的授职仪式，国王则浑身颤抖不止。"

威廉虽然取得了黑斯廷斯的胜利并接受了伦敦和温切斯特的投降，但地位仍然不稳，因此他的颤抖是有充分理由的。至少还得再过五年，他才能满怀信心地认定征服已大功告成。自 1067 年到 1070 年，反抗诺曼底人统治的起义年年不断；在肯特，在西南，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交界处，在沼泽地和北方，都发生了起义。诺曼底人只能过占领军式的生活，他们按作战单位在一起吃、住和睡觉。他们不得不修建城堡，这是可以由少数人来控制隶属国居民的战术据点。生活于一两百万敌对居民中的诺曼底人可能不足一万。这并不是说每个英格兰人都积极反抗诺曼底人。他们中无疑有许多人与诺曼底人合作；正是这一情况使诺曼底人得以成功地

接管如此众多的盎格鲁萨克逊机构。但是许多事例说明，英格兰
105 人对变成自己国家中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事心怀愤懑。这一动荡不定的年代对今后的历史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它意味着英格兰所接受的不仅是一个新的王族，而且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文化和语言。欧洲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征服都没有对败北者产生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此事并非威廉的初衷。最初许多英国人可以在表示归顺后保留他们的土地，但是到了1086年已发生某种明显的变化。《末日审判书》记载着土地上深深留下了这次征服所造成的疤痕。1086年尚存的稍稍重要的英国封建领主只有两位。因服兵役而领有封地的4000多位大乡绅丧失了土地，而被不足200名的一帮男爵所替代。这些新地主中有几位是布列塔尼人、佛兰德人和洛林人，但大部分是诺曼底人。谈到教会，我们可以说出威廉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推行反对英格兰人的政策的。1070年他免除了一些英国主教的职务，此后就再也没有让英国人担任主教或去教堂任职。在军事方面，1069年至1070年冬天北方的骚乱暗示着残酷的镇压到这时达到了新的规模。在约克郡，这意味着土地
107 价格下降了2/3。不管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诺曼底新贵。当然，这些新贵仍保留着他们在大陆上的土地，结果是英格兰和诺曼底这两个过去各自独立的国家，如今变成了跨海峡的单一的政治社团，不仅共有一个统治的王朝，而且共有一个单一的盎格鲁—诺曼底贵族。假若水上交通方便，那么海峡便阻隔不了英格兰和诺曼底，正像泰晤士河阻隔不了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萨里郡一样。从这时起直到1204年，英格兰与诺曼底的历史便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

因为统治诺曼底公国的公爵必须效忠法国国王，因此这也意

味着从这时起"英格兰的"政治变成了法国政治的一部分。但是英格兰与法国之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联系。作为法国人的诺曼底人把法国的语言和文化也带到了英格兰。而且我们所谈的并不是1066年后的一代人在大量输入"法国特色"后又逐渐重新坚持"英格兰特色"。继诺曼底人的征服之后又发生了1153至1154年安茹人的征服；虽然这不涉及卢瓦尔河流域的贵族移居英格兰的问题，但是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宫廷的到来势必使法国文化的支配地位得到加强。①

1066年温切斯特的产业主中有非英国名字的不足30%，而到1207年已上升到80%，其中大部分都取威廉、罗贝尔(Robert)和里夏尔(Richard)之类的法国名字。乐于接受外国影响的能力意味着这一时期英国艺术的外国特色最为突出。例如，在教会建筑上，使用"罗马风格"和"哥特式"等欧洲名词来描述时髦的建筑风格要比使用"诺曼底式"和"早期英格兰式"强得多。虽然在英格兰修建的教堂，也像在英格兰装饰的文稿一样，常常包含着某些可辨认的英格兰成分，然而建筑家和艺术家所采用的设计图样却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地区(意大利，西西里，甚至拜占庭)，但通常来自法国。1174年大火后被召来修复坎特伯雷大教堂唱诗队席位的是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同样，亨利三世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在音乐、文学和建筑方面法国的确超群出众，以致法语已不只是一种民族语言，而确实变成了一种既用于口头交流又用于文字书写的国际语言，每位希望自认为文明的人都用这一语言。因此，在13世纪的英国，如果说法语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了。在本章所涉及的整个时期中，每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都会三种语言：英语是他的母语；他懂得一些拉丁文；他还会说流利的法语。在这个世界性

① 安茹、卢瓦尔河流域、阿基坦皆在法国境内。——译者

的社会里法语至关重要。它既是法律和财产经营上的实际用语，又是诗歌、讽刺诗和传奇文学的语言。换句话说，诺曼底人的征服宣告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其时英国正像耶路撒冷王国一样，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说成是法国海外领地的一部分；用政治术语说，它在13世纪前叶之前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不过当然并非属于法国国王），此后则是一个文化上的殖民地。

108

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富有爱国心的英国人视黑斯廷斯战役为民族灾难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即令我们不像E．A．弗里曼① 那样把巴黎描绘成"野蛮的"，我们仍然可以论证，诺曼底人的征服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并不是说它富有掠夺性和破坏性——不过，当然，像任何一次征服一样，它同时具有这两种特点——而且因为"1066年及其它"。由于1066年是英国史上最著名的日期，诺曼底人的征服也便成了"该死的众所周知的划时代的事件。"把它视作"新的开端"或"重要的转折点"是再容易不过的。11世纪后期发生在英格兰的几乎每件事都联系到诺曼底人征服的影响而加以讨论。但是就全欧洲来说，11世纪后半叶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那些未遭受诺曼底人征服的国家，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因此问题便来了。就某些方面说，1066年造成很大的变化；就另一些方面说，发生的一些大的变化却很难归之于那次征服；再就别的方面说，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变化而是延续。

然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由一次重大的事件，而是由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进程所引出的。我指的是12和13世纪的文献大量增多。书写和保存下来的文件比以前多得多。整个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书和契据大约有2000份，而单单13世纪保存下来的就不计其数，有若干万份。

---

① 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1823—1892年），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史》、《英国宪法的成长》等著作。——译者

当然，那2000份盎格鲁萨克逊文件只是冰山之巅，更多的文件已经消失。但是13世纪的情况也是一样。例如，据估计，13世纪仅小农和农民就可能签订800万份契约。即令这个估计失之过宽，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全体居民，包括农奴，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文件发生关系。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人们只知道国王拥有玉玺，而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连农奴也必须按法令备有印章。促成这一发展的中心是国王的管理机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成这一发展的动力。国王拥有永久性的有组织的种种行文办公室，如大法院，而后又有税务法庭；它们愈来愈忙。我们可以估量出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大法院使用的封蜡的总量。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每周使用封蜡量为3.63磅，而到了13世纪60年代后期则上升到每周31.9磅。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发布的文件较以前多了，还因为政府有系统地抄写文件并加以保存。此处一个关键的时间是1199年。在这一年大法院的文书们开始在一卷卷的羊皮纸上保存那些盖了大印后送出的大部分信件——当然是全部重要 110 的信件。大法院的这些纸卷被保存下来，这意味着从1199年起，历史学家们对管理机构的日常工作较以前知道得更多。

以上的进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献档案的增多说明人们已由习惯性的记忆事件转向把它们写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时全体居民都"参加了识字运动"；即令他们本人读不懂，他们已习惯见到通过书写媒介来进行日常交易。显然，识字能力的发展是与我们通常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最初新学问的源泉全在国外，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和大教堂，但是到了12世纪后期英国也有了一些高等学府，到了13世纪20年代则建立了两所大学，先在牛津，而后在剑桥。在牛津的有些学院里，人们可以学习如财产转让、遗产管理和基本法律程序等绝对实用的课程。在整个英格兰总的趋势是不同水平的学校日益

增多。

但是这些深刻的发展是否与社会机制的其他方面的剧烈变化有关联？显然，所有这些文字记录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官僚化了，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在固定下来或在起变化？经济制度是否在发生变化？政治制度是否在变化？抑或两者只不过被详尽地记录了下来？

111 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证据的重复性容易给人以错觉。例如，人与人之间某一特殊形式的关系可能首先清楚地见于13世纪的文件上。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关系就始于那一世纪呢？或是这一类型的关系只是在那时第一次以文字固定下来？或者这只不过是有关文件碰巧保存下来的最早时期？这儿有一个恰当的例子：一种被称为“侍从契约”的文件的样本最早见于13世纪。这契约记录了男仆受雇侍候其主人的条件；它通常要详细说明工资，而且如果是一份长期合同，还要规定雇用费。一些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文件认定“契约侍从”和“契约军”在13世纪末都已存在，而且它们是中世纪后期，“可恶的封建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然而明白无误（虽非直接）的证据却表明，拿雇用费和工资的契约军和侍从至少早在1100年便有了。而且总的说来，本章将论证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之延续性的程度要比通常设想的高得多。但是在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之前，先概括地谈谈主要事件，特别着眼于那些与国王们关系最大的事件，将是有益的。

威廉一世（1066—1087）

1071年后，威廉在英格兰的地位已相当稳固。威尔士和苏格兰几乎没有给他带来麻烦。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们仍虎视眈眈地盯着英格兰，但那一直存在的另一次北欧海盗入侵的威胁从未实现。从1071年至威廉统治的末期，他的注意力一直被大陆上的战

争和外交所吸引。诺曼底是他的故乡，它比其海岛王国更容易遭到突然的袭击。与威廉毗邻的封建领主对他的新的权势感到惊慌，便利用一切机会来削弱它。为首的是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和安茹的富尔克·勒雷尚伯爵。威廉的长子罗伯特（1054 年出生）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早自 1066 年以后，罗伯特便被认为是诺曼底公国的继承人，但他却从未获准享受钱财和权力，自 1078 年后他便被卷入到反对他父亲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之中。法兰西国王与诺曼底公爵争执的天然战场是塞纳河北岸鲁昂与巴黎之间一片有争议的土地韦克桑。而威廉 1063 年征服的伯爵领地曼恩也在诺曼底与安茹的对抗中起着同样的作用。曼恩成了未来的两代人争夺的对象；韦克桑被争夺的时间还要长（直到 1203 年）。因此，在威廉统治时期已可见到那将支配下一世纪的政治模式：家庭不和与边界争端相交织。就这个意义来说，威廉临死的情况是很具启发性的。112
芒特的法国要塞的驻军侵入诺曼底。威廉进行报复，当他的军队洗劫芒特时（1087 年 7 月），他受了伤，并因此丧生。罗伯特此时已经反叛，他宁愿呆在菲利普王的宫廷里，他的弟弟威廉这时却克尽职守，引人注目地侍候在父亲的床前。1087 年 9 月 9 日，威廉一世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运送到他的位于卡昂的圣斯特大教堂。他晚年时肥胖不堪；在侍从们设法把他的遗体塞进石棺中去时，腹部裂开来，使教堂充满了臭味。这是一位非常幸运而称职的国王一生的一个不幸的结局。

威廉二世（1087—1100）

不论威廉临终前的愿望是什么，人们强烈地认为长子应得到父亲的祖传财产，即父亲本人继承的领地。因此，罗伯特尽管进行过叛乱，却继任为诺曼底公爵。但是一个人所获得的财产，即他本人通过购买、联姻或征服所取得的土地却可以较容易地用来赡养

家庭的其他成员。因此，征服者所获得的大片领土英格兰就传给了他的幼子威廉。对此，罗伯特当然是反对的，而且，要不是因为他以前的叛变，他或许会同时继承英格兰。

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支配王位继承的习俗是有弹性的；它们可以变通以便考虑政治现实，如不同候选人的性格差异等。因此那些决定接受威廉·鲁弗斯为英王的有权势之士，其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很可能断定他将成为一个比其兄长更优秀的统治者。从他1087年前后的政绩看来，这一判断也许是合理的，然而在他登基的最初几个月中，鲁弗斯发现自己遭到豪门贵族强大联盟的反抗。根据盎格鲁—诺曼底编年史作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载，反叛者的目的是想把英格兰和诺曼底重新统一起来，不是为了宪法的什么原则，而只是为了消除他们政治上的难题。奥德里克通过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员——贝尤克斯主教奥多之嘴用几句话勾勒出他们左右为难的困境。“我们怎能恰当地侍候两位相隔甚远而彼此敌对的君王？如果我们好好侍奉罗伯特公爵，就会冒犯他的弟弟威廉，他便会剥夺我们在英国的岁收和荣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服从威廉国王，罗伯特公爵便会剥夺我们在诺曼底的世袭领地。”这一论点能取得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的同情，而且可能会十分容易使鲁弗斯失去王位。如果联合的盎格鲁—诺曼底地区只要一位统治者，那么长兄对王位的要求是难以拒绝的。对鲁弗斯说来幸运的是他哥哥几乎不露面，罗伯特就呆在诺曼底，使支持他的人处于危险境地而不顾。尽管如此，1088年的叛乱虽然很快平息，却揭示出英国国王如不兼任诺曼底公爵，则其地位就十分不稳。

113

综观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统治的整个48年可以看出，诸侯叛乱(1088,1095,1101,1102年)多发生于国王并非诺曼底公爵之时的两个时期(前后共约15年)，即1087—1096年或1100—1106年。

英格兰和诺曼底分属不同的统治者显然不符合国王的利益，也不



作战中的骑士（11世纪）

符合贵族的利益。正如贝尤克斯主教奥多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不欢迎动荡不定的局面，因为那会使他们冒极大的风险。每当跨海峡的王国分裂成两个组成部分时，就会迎来一个纷争的时期，它只能以一位统治者战胜另一位统治者而宣告结束。因而英格兰国王所至为关注的事是赢得并保住诺曼底公爵的地位。

1089年，鲁弗斯对公爵爵位提出了要求。他可以用英国的银子买得别人的支持，而且他在那儿的活动也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是他对英格兰的控制仍不牢靠，1095年，他面临着一场反叛阴谋。第二年，紧张情况至少暂时得到缓解，其方式完全是始料不及的。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布道旅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他所制造的舆论气候下，数以千计的人决定参加一次征讨，其目的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对于罗伯特·柯索斯来说，这正好为他摆脱国内日益困难的政治处境提供了一条光荣而富有刺激的道路。114 为了装备他自己和他的随从进行这次远征，他把诺曼底典当给威廉，取得一万马克。

这位新公爵的下一个任务便是收复在罗伯特懒散的统治时期丧失的土地曼恩和韦克桑。到1099年这一任务已胜利完成。鲁弗斯已把他父亲的王国恢复到以前的疆界；而在苏格兰，通过在1097年立埃德加为王后，他事实上可以较他父亲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然而尽管这位宽宏大量的军事领袖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的声望一直不高。对他说来不幸的是当时的历史几乎完全由僧侣书写，而他们不喜欢他。思想严肃的教会人士习惯了他父亲宫廷的传统的虔诚和清醒谨慎的作风，而鲁弗斯的宫廷却以它的浮华奢侈、气氛欢快和追求时髦——如蓄长发——而使他们惊惶不安，因为这些在他们看来既颓废又放荡。鲁弗斯从未结婚。据威尔士的《君王史》说，“他与一些情妇姘居，因此死后没留下继承人。”他对宗教的要求可能有怀疑——不管怎么说，他同时代的人是这样描绘他的，毫无疑问，他把教会看作是需要征以重税的富有的公司。对于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事他总是不慌不忙，因为当这些职务空着时，他便可以捞取教会的收益。在执行这一有利可图的政策时，鲁弗斯依仗的是雷纳夫·弗兰巴德的机敏的援助。这人是一位才智敏捷并谙于世故的执事，鲁弗斯最终使他成了达勒姆主教。

鲁弗斯的声誉在1093年尤其受到了损害，当时他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任命圣洁的学者贝克的安塞尔姆为坎特伯雷大主教（那时这一职位已空了4个年头）。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即格雷戈利① 的改革，创造出一种爱争论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神职人员变成政治上的激进派是再容易不过了。从威廉的观点来说，正是这一情况使这次任命十分不幸。1095年威廉在罗金厄姆召集会议，解决他与安塞尔姆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使大家惊慌失

① 指教皇格雷戈利七世；他于1075年颁布敕令，宣称教皇高于世俗统治者，有权废立国王或皇帝。——译者

措的是，安塞尔姆主教求助于罗马，他争辩说，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不能接受世俗法庭的审判。11世纪后半叶，教皇的地位提高了，教皇要求高级教士必须首先忠于他，这就给政治舞台带来了新的不安定的因素。如果教士们都相信他们对上帝的义务，正如圣彼得牧师规定的那样，高于他们对国王的义务，那么这个世界的惯常的结构就得颠倒过来。

安塞尔姆赞成教士自行管理其宗教事务的辩词是言之成理的，在这方面他可以说在辩论上占了上风。但是鲁弗斯也有他的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有权——与一位有权势的国王所掌握的物质资源相比，博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确实处于劣势。威廉继续不断地困扰大主教，而对他改革教会的企图从不表示任何同情。最后 115 安塞尔姆实在忍耐不下去了。1097年他乘船离开了多佛尔，他留下的坎特伯雷的产业以后便落入了国王的手中。就眼前说，国王从这次争论中得到了好处。1100年，他获得了三个主教管区和12个大寺院的收益。这时也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争论破坏了人们对神权国王的威严权力的信仰。甚至编写《安塞尔姆传》的那位坎特伯雷僧侣埃德默在谈到鲁弗斯时也说：“风与大海似乎都顺从他”。埃德默继续写道，事实上，“在战争中，在获得领土上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你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对他微笑。”威廉二世在1100年的地位是否真的如此坚强又是另一回事；把他描绘成一位傲慢自信的国王，在看来就要到达成功的顶峰时被击毙，这符合那些爱作道德说教的编年史家们的口胃。到了1100年夏，想必当时大家都知道，罗伯特公爵不在国内的短暂的平静的时期就要结束了。这位十字军军人满载着一路杀入圣城的人应享有的荣誉，由他富有的妻子陪伴着，正踏上归途。当柯索斯重新提出他应继承的财产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或盎格鲁—诺曼底大贵族们将采取什么方针呢？恰巧，1100年8月2日，新林苑中一次狩猎事故

突然结束了这位强有力的、常受中伤的国王的生命。而且，威廉的弟弟在国王去世的那天恰巧也在新林苑里。

亨利一世(1100—1135)

亨利一世得知鲁弗斯已死，便马上快速地行动起来。他骑马去温切斯特，掌握了国库，然后便径直去了威斯敏斯特并于8月5日加冕为王。行动之快引起人们推测，亨利也许知道他哥哥要死，也许他“安排了这次事故”。但是他的同代人没有提出这种责难，而且假如亨利策划了这一冷酷的罪行，他会选定别的时间。鲁弗斯与柯索斯间迫在眉睫的争战可望以一方的失败或消失而告结束。换句话说，推迟暗杀可以为暗杀者开辟兼得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前景。如今，1100年8月鲁弗斯之死意味着亨利以其快速惊人的速度行动，却只夺取到盎格鲁—诺曼底王国的两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的控制权。他既然可以等那么长时间才投枪，当然可以再多等一两年。

几周后罗伯特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对付不可避免的入侵。他的政策是通过许诺恩宠和范围广泛的让步来取得支持。这是他在加冕典礼的那天公布的政策，当时他曾发布一项特许状，斥责他兄长的高压行径并应允将实行德政。另一方面组织防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他不能挑起太多的混乱。这时需要的是姿态和宣言，而不是推翻整个的统治。当时的现实是他的兄长已留给他现成的朝廷和政府，亨利除了接管它们外已别无选择。

当罗伯特公爵于1100年7月在朴次茅斯登陆时，以贝莱姆的罗伯特为首的许多英格兰的大贵族都涌到他的一边。但是以默兰的罗伯特为首的鲁弗斯的朝臣们却仍旧忠于亨利；忠于后者的还有英国的教会。双方后撤并进行商谈。亨利将保有英格兰并每年付给其兄生活津贴2000英镑。

亨利在度过了1101年的危机后就着手工作，以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重要的第一着便是捣毁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占领了贝莱姆的罗伯特在威尔士边界上的一些主要据点，然后把他流放。两年后他把莫泰恩的威廉的土地没收充公。但是罗伯特和威廉伯爵，像处于他们这种地位的其他人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底财产中还拥有一个基地，他们可以从那儿去收复他们的英国领地。1101年的条约使英格兰与诺曼底永久脱离关系，从而使政治上的不稳定继续下去。因此，在回顾前一段统治历史时我们发现，英国国王最先采取守势，而后便转入攻势。在坦什布雷战役（1106）后，问题才得到解决。罗伯特公爵本人被擒并在他弟弟的监牢里度过他最后的28年。

虽然亨利在其统治初年全神贯注于诺曼底事务，但他却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集中精力。格雷戈利的改革运动所引起的一些新思想威胁着王权驾驭教会的传统。改革者不仅想纯净牧师们的道德和心灵；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使教会摆脱世俗的控制。这一控制的最可恶的象征是世俗的授职礼。举行这种仪式时，新上任的修道院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的世俗君主手中接受教杖。虽然早在1059年就发布了反对世俗授职礼的第一道教皇法令，而且此后又颁布了其他种种禁令，但是在英格兰似乎无人知晓它们的存在，这情况一直延续到1100年秋安塞尔姆返回英国之后。安塞尔姆于流放期间了解了教皇对世俗授职礼的态度。因而尽管他本人于1093年由鲁弗斯授予主教之职，但他如今却拒不向亨利宣誓效忠，也不让曾被亨利授过职的教士任圣职。这便使国王处于为难的境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大地主，并且是中央和地方政治上的关键人物；他需要他们的帮助并必须确信他们是忠诚的。另一方面，他与鲁弗斯不同，他不想引起争吵，因此若干年来他发现让这问题拖着比解决它更为方便。直到1107年这一问题才

得以解决。

亨利放弃了世俗授职礼，但是教士为了他们的采邑必须继续效忠于他。实际上，国王的意愿仍然是主教获得成功与否的决定118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亨利可说是放弃了控制的形式而保留了它的实质。在安塞尔姆1109年去世后，他让坎特伯雷的教职空缺了五年。不过他也有所失，这一点他也知道。在伴随"授职礼竞争"而来的宣传激战中，格雷戈利的信徒们坚决主张国王只不过是个俗人，而作为俗人，他不及牧师，因为牧师所关心的是灵魂，而国王只关心肉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上帝选定的国王是上帝的神圣代理人这一古老的观念。亨利放弃世俗授职礼无异承认国王职位的世俗性。这在王权的历史中是一重要时刻。

在征服了诺曼底又为授职礼的争议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后，亨利主要关注的便是如何保住他已得到的东西。他认识到贵族的背离可能构成对他的威胁，便谨慎小心地消除王廷与显贵之间的隔阂，而鲁弗斯却听任其发展。用奥德里克的话说，"他尊敬而宽厚地对待大贵族，使他们增加财富和产业，并通过这样安抚他们而赢得他们的忠诚。"对亨利地位的直接威胁来自柯索斯的幼子威廉·克利托（1102年出生），他提出这样的意见，即他，而非亨利，是名正言顺的诺曼底公爵。这一挑战性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边界，意味着公爵的爵位仍旧是他的王国的最脆弱的部分。1106年之后亨利把他在位余年的大半时间消磨在那儿，反抗历代诺曼底公爵的传统的敌人，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1109—1128年在位)。他组织起一个保卫性的同盟圈——他的不少于八个私生女儿都嫁给了邻近的诸侯，从北边的苏格兰王亚历山大到南方的珀奇伯爵罗特鲁。这一外交模式使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以下讲话稍稍可信，他说对亨利说来性的问题并非寻欢作乐而是为了政治。

这一切活动的结局是亨利保住了诺曼底，而且由于这一原因，即这一斗争只不过保持住现状，历史学家们并没十分看重它。但是对亨利来说，这确实是场严重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至少有一次，在1118—1119年，他险些儿失败。

防护诺曼底这一头等大事在英格兰也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而且并不限于在大陆上拥有产业的大地主。城堡、要塞、外交和战争都需要钱。其间的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118年的条目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亨利国王因为与法兰西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打仗，整年呆在诺曼底……英格兰为战争支付昂贵的钱款，为此全年不断地征收名目繁多的税金。"国王长期在外和亟需金钱成了推动政府机构不断精练的动力。但国王不在之时，英格兰就由代表王权的委员会治理。这委员会每年在"税务法庭"聚会两次，也就是说，聚在一起在那著名的方格桌布上查郡守们的帐。119
行政管理的大部分日常工作，特别是税收工作，由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进行监督。他与浮夸的弗兰巴德相比，真好似一位模范官僚，既称职又谨慎。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于1120年在"怀特号"船失事中遇难使国王细心设计的大厦倒坍了。自那以后王位继承问题便支配着他统治时期的政治。威廉死后不到三个月，亨利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急切盼望的继承人却从未诞生。因此，尽管传说亨利曾承认20多个私生子，但在他死后只留下一个合法的孩子，他的女儿玛蒂尔达。当她的丈夫、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于1125年去世后，亨利把她召回宫廷并让诸侯宣誓接纳她为盎格鲁—诺曼底国土上的继承人。1127年亨利又受到新的震惊。威廉·克利托成了佛兰德的伯爵。如果他能利用佛兰德的财富来实现他对诺曼底爵位的要求，那么他叔父的前景就真会暗淡无光了。在这关键时刻，亨利向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提出建议，让玛蒂尔达与富尔克的儿子

和继承人、金雀花王朝的若弗勒联姻。1128年6月，玛蒂尔达稍稍违反自己的意愿嫁给了这位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安茹王朝接管盎格鲁—诺曼底国土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到了1135年，亨利一世已与若弗勒和玛蒂尔达进行公开的激烈争吵。这使得原来忠于亨利的大贵族起而反对安茹伯爵的亲属。当年老的国王去世时，这些大贵族不可避免地会发现他们难以与他指定的继承人和解。就这一点来说，正是亨利本人挑起了他死后的王位继承之争。甚至在他临终之前他仍希望他的女儿和女婿继承王位，但是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他们这样做。亨利一世一直是一位杰出、能干和成功的国王，是他那个时代的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就连他也未能处理好王位继承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亨廷顿的亨利才把亨利描绘成一个永远焦虑不安的国王。"每次的胜利只不过使他担忧他会失去他所赢得的东西；因此，虽然看起来他是国王中最幸运者，实则他是最痛苦的。"

斯蒂芬(1135—1154)

亨利一世弥留的消息传出后，老王遴选的继承人正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安茹或曼恩。但是他的侄子布卢瓦的斯蒂芬却在他的伯爵领地布洛涅。从那儿到达英格兰东南部只有一天的旅程。这一地理上的偶然情况使斯蒂芬在时间上占先。他在首先取得伦敦人的支持后便骑马到达温切斯特，他的兄弟布卢瓦的亨利正担任那儿主教的职务。由于亨利的帮助，他既取得了温切斯特的国库，又获得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同意立他为王。所缺的只是劝说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举行涂油加冕礼。这点也获得成功，因为他提出他们都参加的对玛蒂尔达的宣誓已经无效，因为那是用武力逼出来

120

的，而且他还散布虚构的故事，说国王临终前改变了心意。1135年12月22日，斯蒂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涂油加冕为王。

按照盎格鲁—诺曼底王国的政治结构，斯蒂芬一旦被承认为英格兰国王，他就在诺曼底也处于同样强有力的地位。从此以后诺曼底诸侯只有冒失去其英国产业的危险才能效忠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有最多财产怕要丢失的大贵族感到他们必须支持斯蒂芬。因此，若弗勒和玛蒂尔达在他们争取继承权的斗争中，从一开始便发现他们遭到盎格鲁—诺曼底王国最有权势的大贵族们的反对。

斯蒂芬在位的最初两年半相当平静：与他前面两位国王在位之初的情况相比，的确平静多了。直到1138年夏，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决定站到他异母姐姐玛蒂尔达一边，第一次严重的打击才落到斯蒂芬身上。罗伯特的背叛不仅意味着斯蒂芬失去了对诺曼底某些重要据点的控制，它也是一种信号，表明安茹伯爵的亲属将把斗争推进到英格兰来。当斯蒂芬等待这一打击到来之时，他开始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他得罪了他的兄弟布卢瓦的亨利，因为没让他当坎特布雷的大主教；他逮捕了三位有权势的"文官"主教，其中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罗杰，这就使布卢瓦的亨利得以提出教会的自由受到侵犯。1139年秋，当女王——人们一般这样称呼玛蒂尔达——在阿伦德尔登陆并似乎落入斯蒂芬的掌握中时，他本应抛开骑士风度，无情地把她监禁起来，而他却任她自由自在地在布里斯托尔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会合一处。从这时起英格兰便有了两个敌对的朝廷。内战实际上已拉开帷幕。 121

1141年2月斯蒂芬在林肯仓促应战，并且在本可以逃跑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结果被俘并被囚禁在布里斯托尔。如今扮演教皇使者角色的布卢瓦的亨利公开地倒向女王一边，于是是年夏天她便得以进入伦敦。但是她轻蔑地拒绝了这位使者所制订的和平条

件并以她那不得体的行为使伦敦人不快。当斯蒂芬的王后，布洛涅的玛蒂尔达前往伦敦时，伦敦人便拿起武器把女王赶走，计划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仪式因此永远没有举行。玛蒂尔达永远未能成为英格兰的女王。几个月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被抓了起来，而且由于他是她这一群人的支柱，她不得不同意交换俘虏，用斯蒂芬换罗伯特。女王丢掉了她赢得的地位；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在诺曼底情况却截然不同。安茹的若弗勒留在后面对公爵的领地施加压力，并同时照顾他在安茹的利益。从1141年到1144年的一系列战役以鲁昂①的投降和若弗勒被正式授职为公爵结束。但是这位安茹伯爵一心一意关注征服诺曼底却使他忽视了英格兰的争斗。

在英格兰内战平息下来，变成了经常的摩擦。在那战术围着城堡旋转的年代，双方都进展不大，但防御的一方通常占据优势。1147年10月，格洛斯特的罗伯特逝世。女王感到心灰意懒，便于1148年初离开英格兰，一去不复返。

1150年，安茹的若弗勒联合他的儿子亨利一起统治诺曼底公国。次年，当路易七世(1137—1180年为法国国王)为回报若弗勒在韦克桑的让步而决定承认亨利为诺曼底公爵时，这一安排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外表看来，英格兰与诺曼底之间的联系这时似乎最终破裂。然而双方都没放弃对另一方的领土要求，而且尽管在英格兰似乎形成了僵局，大陆上的情况却相当变化不定。安茹的若弗勒不足40岁就去世了，留下他的长子掌管诺曼底和安茹。1152年3月，路易七世与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离婚。八周之后她与金雀花王朝的亨利结婚，因而亨利除了大陆的其他领地外又把阿基坦这片广阔的公爵领地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

① 鲁昂为诺曼底的首府。——译者

亨利的婚姻大获成功，然而它也给斯蒂芬带来新的希望。路易七世把亨利的所有劲敌组成了一个大同盟。因而1152年夏，亨利 [122]
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作战——在阿基坦、诺曼底、安茹打击叛乱者并在英格兰反对斯蒂芬。一位见闻广博的诺曼底编年史作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打赌亨利一定活不了。而在这时，他决定扬帆前往英格兰与斯蒂芬作战，其果敢冒险精神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如此，亨利也难以打破英格兰的僵局，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危及他的地位。这时斯蒂芬的继承人尤斯塔斯于1153年8月去世，使形势突然改观。斯蒂芬的次子威廉从来不想当国王，因而出现了协商解决的前景。

双方的贵族早已急切地盼望和平。由于其田产容易遭到战争的破坏，他们不喜欢旷日持久的兵乱，有时甚至不顾主要首领的意愿而自行缔结地方性的休战协定。因此当斯蒂芬和亨利顺从他们的规劝者的意愿时，人们普遍地感到松了一口气。

根据1153年12月的威斯敏斯特条约，双方同意：斯蒂芬将终生为王，同时确认亨利为其继承人。威廉将继承斯蒂芬全部男爵领地。这些，就其要点来说，是布卢瓦的亨利1141年提出的和平条件的重复。玛蒂尔达于胜利后不能宽大为怀致使内战又延续了12年，如今斯蒂芬终于可以无人抗争地进行统治了，但他已精疲力竭，而且余年不多。1154年10月25日他去世了，葬于他们在法弗沙姆建立的寺院里，旁边是他已去世的妻子和长子。

斯蒂芬对他统治时期的战乱应负某种责任。他是一位称职的军事统帅和勇敢的骑士，但是也许过于骁勇而于他不利。的确，他继承王位是有争议的，但他的先王也都有这个问题；对王位继承有争议乃是正常现象。布卢瓦的斯蒂芬较之任何一位诺曼底国王更富有吸引力；但是他缺乏他们的雄才大略。缺少了它，他既不能支配他的宫廷，也不能控制王国。另外，他不大去诺曼底，整个在位期

间只于 1137 年拜访过一次。这与先王们的旅行记录形成鲜明的对照；就盎格鲁一诺曼底贵族的“跨海峡结构”来说，这的确是个错误。就此意义而言，可以说，布卢瓦家的这位统治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英国化”了，没有认识到英格兰只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亨利二世(1154—1189)

亨利轻而易举地便接过王位，百余年来毫无争议地继承王位，这还是第一次。作为从苏格兰边境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这一广阔帝国的国王，他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比德意志皇帝还富，124 而且使他大陆领地的名义上的封建主——法兰西国王完全相形见绌。尽管英格兰为他提供了巨大财富和皇家头衔，但他的王国的中心却在别处，在他父亲的故土安茹。

在英格兰，他的首要任务是补偿斯蒂芬统治时期蒙受的损失。这一工作在 1158 年已经完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158 年他使用外交压力迫使苏格兰年轻的国王马尔科姆四世把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和诺森布里亚归还给英国国王。然而，在威尔士，亨利遇到的是两位根基牢靠的王公，圭尼德的欧文和德贺巴斯的赖斯，他不可能通过威胁把他们吓住。1157 年和 1165 年，亨利二世两次动用军队，但在威尔士人的游击战术和夏季倾盆大雨的双重打击下都未能得手。1165 年后亨利对威尔士诸侯的态度就通融多了。早在 1155 年他便打算征服爱尔兰；但是直到 1169—1170 年他才真正地向爱尔兰采取行动，先是由威尔士边境的一些贵族打头阵，而后(于 1171—1172 年）亨利本人御驾亲征。国王迟迟按兵不动说明在他眼中还有比爱尔兰问题更迫切的事情。

亨利二世在位的 34 年有 21 年是在大陆上度过的。与法国部分的安茹领地相比，英格兰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都有点儿穷乡僻

壤的味道。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龙河河系存在的繁华社会是学术、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的中心。阿基坦和安茹生产中世纪贸易的两个重要商品，酒和盐。这些商品可以交换英国的布匹，而这项贸易必然给统治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君王带来极大的赢利。亨利身兼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从其先人继承了统治邻近领土的权利。这权利致使他插足南特(1156年)，把他的兄弟杰弗里立为那儿的伯爵，同时使他于1159年征讨图卢兹并夺得卡奥尔和克尔西，又使他于1160年收复诺曼底的韦克桑；最后，经过1166年后的多次入侵，他占领了布列塔尼并把他的儿子杰弗里立为那儿的公爵。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现在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在谋杀托马斯·贝克特中扮演的可疑的角色。1162年6月，贝克特被授职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有声望的教士们眼中，1155年起出任大臣的贝克特不应该被授予这个国家最高的教会职务。贝克特却决心向那些惊异的人们证明他是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大主教。从一开始，他就竭力反对那主要为了友情而把他提拔起来的国王。这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亨利不久就像被出卖的人那样作出反应。12世纪中期政教问题重重，这些问题通常遇到善意的人就可以搁置起来，而遇到决心争吵的人，则可以大干一场。亨利选择了“犯罪的教士”作为与大主教算帐的主题。亨利也像许多世俗人员一样，反对犯有重大罪行的教士以要求接受教会审判的方式逃避极刑。在1163年10月于威斯敏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亨利要求教会将犯罪的教士解除教职，然后交由世俗法庭罚处。贝克特反对这一要求，并得到主教们的支持，但是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他采取较和解的路线时，亨利在克拉伦登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1164年1月)。会上他向各位主教提出了国王权利一向高于教会的明白无误的声明，即《克拉伦登法规》，并要求他们答应

125

老老实实遵守这些习惯。贝克特始料不及，争论了两天，作了让步。但是等其他主教步其后尘时，他立即为自己的软弱感到后悔。这时亨利勃然大怒，决定要打击他。他把贝克特召到王室法庭，要他回答捏造的指控。大主教被发现有罪并被判处剥夺其财产。贝克特无计可施，只好逃过海峡，求助于教皇。贝克特先坚守原则而后动摇，致使英国教会陷于混乱。

亨利乘贝克特流亡在外，利用五年的时间集中精力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征服布列塔尼并彻底检查英国的司法制度。随后在1169年，为王位继承人、王太子亨利行加冕礼的问题使国王与教皇间进行无休止的协商，大主教也把它作为紧急问题来看待。1170年贝克特回到英格兰，决心惩罚那些参加了幼王加冕礼的人。他的敌人立即把大主教的明目张胆的行为告诉亨利。“难道没有人能为我除掉这暴乱的教士吗?”亨利的四位骑士过于从字面上去领会亨利这句气恼的话。他们急于想赢得国王的恩宠而赶往坎特伯雷；1770年，贝克特被谋杀于自己的教堂中。这件事使基督教国家感到震惊，并使贝克特破纪录地成了圣徒。在人们的记忆里大主教成了反抗以势压人的国家权威的象征，但实际上除掉他后大家都好过些。待抗议的风暴平息之后，以下情况日趋明朗：与贝克特的争论并没有使国王对巨大帝国的控制受到任何动摇。在12世纪70年代初，亨利正处于权势的顶峰。

这时亨利二世已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领土分给三个最大的儿子。长子亨利将获得他父亲的遗产，即安茹、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德将得到他母亲的遗产阿基坦；杰弗里将取得征讨来的布列塔尼。约翰暂时没有什么，但是后来，在1185年，亨利把征讨来的另一大片土地爱尔兰给予他。到了这时亨利二世的分割计划已经遇到了困难。麻烦在于这些计划引起的期望在他还保留着实权时是不能满足的。因而，自1173年后亨利一直受到叛逆之子的折磨。而

且，这些逆子总能够在法国王廷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一情况在1180年后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在那一年外貌温和的路易七世去世，由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奥古斯塔斯继位。这个无所忌惮的政客决心要破坏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年轻的亨利王死于1183年，杰弗里死于1186年，这本应使亨利面临的问题简单化，但却因老国王明显偏爱约翰致使理查德惊慌而又使问题复杂化了。理查德与菲利普的联盟使亨利屈服，老国王被挫败后于1189年7月在希南逝世。

亨利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才感到统治这辽阔的国土力不从心。他不停地从帝国的一角驶往另一角，几乎给人留下他同时出现于各处的印象——这一印象有助于保持人们的忠诚。虽然中央政府机关、议事会、大法院和军人家属随着他一起旅行，但帝国的巨大疆土不可避免地激发分驻各地的行政机构的发展，这些行政机构在国王不在时可以处理日常司法和财务工作。因而在英格兰也像在别处一样，政府变得日益复杂和官僚化了。这一发展，连同亨利对合理改革的兴趣，使他被看作是英国习惯法的创始人和一位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国王，但是在他自己眼中，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对他说来真正重要的是家族政治，而在他去世时他认为他已失败。但是他有30多年是成功的。

理查德一世(1189—1199)

理查德与菲利普二世的联盟意味着他作为他父亲的权利和领地的继承人的地位是无人能提出非难的。约翰仍旧是爱尔兰的领主，布列塔尼终究将归杰弗里的遗腹子阿瑟，这时他才两岁。其余的领土则任理查德支配。 127

但是理查德不想在英格兰久住。在1172年任阿基坦公爵以后，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度过。甚至在他成为英格兰国

王之后，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统治的远不止英格兰。因而他像他父亲一样有着较英格兰更广泛的利益和更巨大的责任。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他给予耶路撒冷王国的援助，这王国是由安茹家族的年幼分枝上的一个女儿来统治的，她如今嫁给了他在阿基坦的一个陪臣。1187年11月理查德一听到撒拉丁在哈廷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便拿起了十字架。在他父亲在位的末年，他由于卷入家庭纷争而延缓了东征的行动，现在，他决定一待凑足了钱，并把他长期远离时他全部领地上的管理安排好，就立即投入东征。

1190年7月，他与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出发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要到1194年3月理查德才会再次踏上英国的国土。现在他带了一支船队和一支军队来到地中海的彼岸。虽然他未能收复耶路撒冷，但却从他的劲敌萨拉丁手中取得了惊人的收获。在东征中理查德应付并解决了比英格兰的其他战时国王如威廉一世、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所曾遇到的要大得多的后勤问题。他于1192年订立的雅法条约使参加十字军的国家又存在了一百年。

在他出征在外期间，英格兰于1191年发生了一些骚动，但是他的应付偶发事故的计划不久便恢复了稳定的局面。菲利普国王回到法国后想利用他继续在外的机会制造事端，但没有成功。如果他按预期的那样于1193年1月结束东征返回故土，他的帝国也许会完好无缺。

问题发生在他被囚于德意志期间。他被监禁了一年多（1192年12月—1194年2月），而且，按1193年的情况估计，很可能还会要关得久些。甚至在如此不幸的情况下，理查德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能够抑制他弟弟狡诈的叛乱。真正的损失发生在大陆上，特别是在诺曼底，菲利普二世占领了韦克桑后，几乎攻克它的首府鲁昂。

在付过第一次赎金的2/3计10万马克后，理查德于1194年

2 月获释。他在英格兰稍作停留（1194 年 3 月至 5 月），随后便返回大陆并于以后五年励精图治，收复他被监禁期间迅速丧失的领土。到 1198 年年底，理查德通过巧妙的外交、优秀的统率才能，特别是他的足智多谋，几乎收回了他失去的每一寸土地。然后，1199 年 4 月，理查德因受伤丧命；他是在镇压昂古莱姆伯爵和利摩日子爵所领导的叛乱，于围攻利摩日附近的加卢茨—加布罗尔时受伤的。在金雀花王朝与法国卡佩王朝的争斗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理查德的伟大品格的标志之一是他善于遴选大臣，特别是英格兰的休伯特·沃尔特。休伯特·沃尔特作为最高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皇使节，支持国王与教会之间的和谐的合作。在英格兰，也像在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其他地区一样，理查德的长期在外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有效机构在沃尔特的监督下不断地发展。从理查德的臣民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日益沉重的赋税，但是没有证据说明战争的财政负担已使金雀花帝国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约翰(1199—1216)

理查德没有留下合法的子女，当他去世以后安茹帝国的各部分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继承人。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诸侯挑选了约翰；安茹、曼恩和都兰比较喜欢布列塔尼的阿瑟，他现在 12 岁；阿基坦仍由约翰的母亲埃莉诺（1204 年去世）以约翰名义控制。到 1200 年 5 月，约翰已驱逐阿瑟并把自己立为全部金雀花王朝领地的君主，不过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把韦克桑和埃夫勒割让给法国国王菲利普（1200 年 1 月的勒古勒条约）。那年晚些时候，他取消了第一次婚姻而娶昂古莱姆的伊萨贝拉为妻。娶昂古莱姆的女继承人为妻在战略上有巨大的好处，如果约翰能给她的未婚夫卢西格南的休适当的补偿，本来一切都会很好的。但事实上这次结婚却 130

牵动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休向法兰西法庭提出控告，并导致菲利普于1202年宣布约翰在大陆上的全部领地——即他领有的法国国王的采邑——全被没收。这种惩罚还有待于以强制手段实行。1152年亨利二世顶住了路易八世执行一项类似的法令的企图。然而在1203—1204年，约翰在他父亲取得了成功的同样问题上失败了。由于他对待安茹和普瓦图的为首的诸侯不得体，他失去了他在米尔波生擒阿瑟（1202年7月）时所赢得的一切有利条件；说他应为他侄儿的谋杀（1203年4月）负责这一不无根据的谣传进一步破坏了他那已经动摇的声誉。约翰感到在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中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御。1203年12月他认输撤到英格兰。菲利普占领了诺曼底、安茹、曼恩、都兰和除拉罗谢尔外的全部普瓦图。这些屈辱的军事撤退给约翰赢得了新的外号："失地者"现在变成了"轻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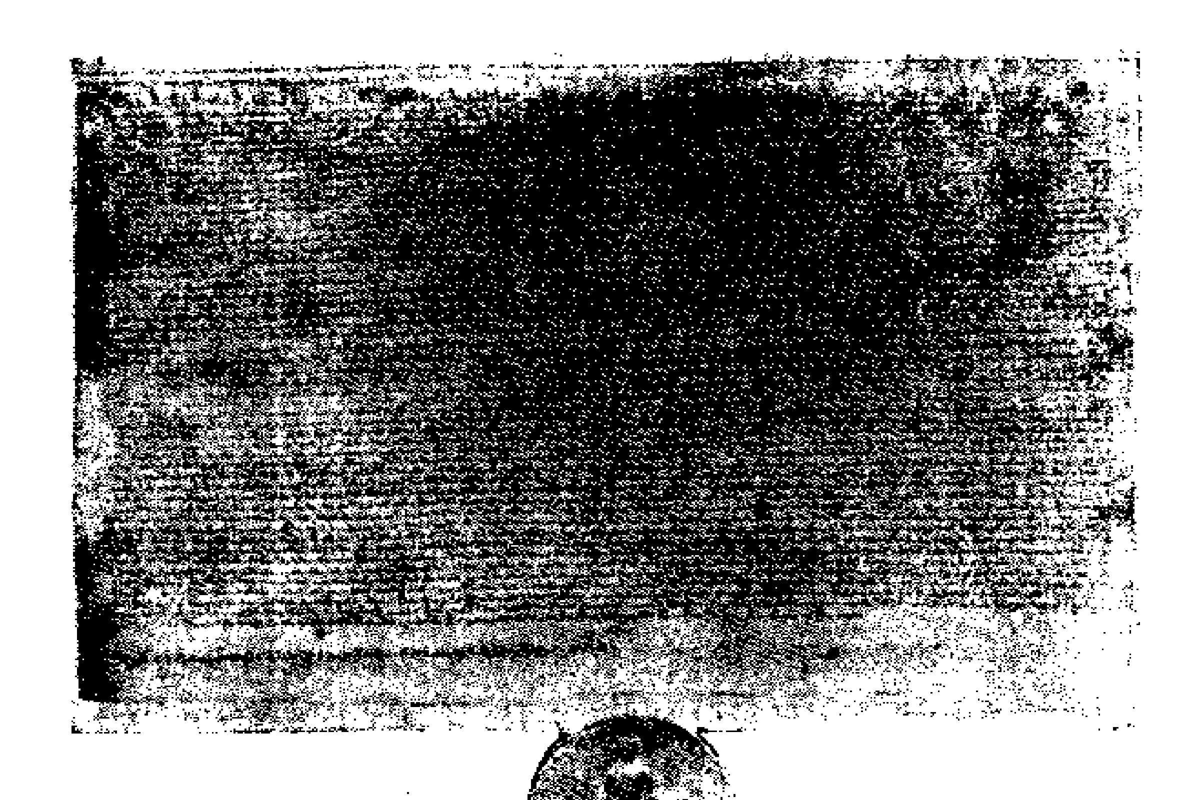
在1203年12月以前，约翰也像他的父兄一样，把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陆的领地上。在那时以后，为形势所迫，他变成了一位英国国王。自斯蒂芬在位以来，还不曾有一位国王这样常常呆在英国国土上，但是一位常常怀疑别人阴谋叛乱的国王并不能给人快乐或利益。甚至对英格兰国王的视察尚不习惯的北方人也感到约翰呆在英格兰是负担。他们不满的程度可以从1215—1216年反对约翰的北方人的数字得到说明。他毫无疑问面临着真正的问题。出于义务，他必须收复失去的家产，但是1203—1204年法国国王通过征服大片领土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强敌。异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许多家庭和寺院有财政困难，他们发现去了解其中的经济缘由不如指责国王来得方便。通货膨胀使王室的收益贬值。于是约翰经常征税并严格掌握森林法（这办法获利不少，但却不得人心）。

约翰与教会之间也有争议。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

争导致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冲突。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儿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的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除教门 131 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支持他。

现在一切取决于约翰试图收复失地的结局。1214年他率军征讨普瓦图，但是布汶战役（1214年7月）中他的同盟军的败阵既招致他大陆战略的失败，又引发了英格兰的叛乱。但是叛乱者也面临着真正的难题。领导人物通常总是由王室中一位不满的成员来充当。在阿瑟被除掉后，约翰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他自己的儿子还年轻。唯一可能的候选人是菲利普·奥古斯塔斯的儿子路易，但是卡佩家的王子算不上有吸引力的反叛首领。因此叛乱者想出了一个新的招数：一个改革的纲领。1215年6月，他们占领伦敦后便迫使约翰接受后来称之为《大宪章》的文件上所提出的条件。就其要点来说，这个文件对金雀花王朝最近60年的统治的较为令人反感的特征作了敌意的评论。正因为这样，它显然是约翰不能接受的，对他说来，在兰尼米德达成的协议只不过是赢得时间的一种手段。为实现《大宪章》所作的努力只不过引发进一步的争吵。最后反叛者决定立路易为王。1216年5月他进入伦敦。1216年10月当约翰在沃什湾的流沙中失去他运行李的部分车队后去世时，英国又被不利于金雀花王朝的内战分裂为二。

约翰具有使近代某些历史学家喜爱的品格。他对政府和司法 133



大宪章。上为1215年的宪章，右为1217年修订（增加了有关森林法的条文）后重新发表的宪章。

工作的细节极感兴趣，但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无关紧要。认为他比他的先王们还要忙碌是一种误解。1199年以后保留的大法官法庭的记录使得历史学家们第一次见到国王政府的日常工作情况。因此，它们有时给人印象，好像约翰特别称职似的。实际上他是一位可怜的君王，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管理他的较有权势的臣民上并不称职。

亨利三世（1216—1272）

以约翰的九岁的儿子亨利的名义治理国家的摄政会议不久就保证战争在陆上（1217年5月的林肯战役）和海上（1217年8月的多佛尔战役）都取得了约翰不曾取得的胜利。路易在连遭挫折之后，支持他的人迅速减少。1217年9月他接受兰贝思条约撤出英国。

直到1232年亨利才亲理朝政。摄政之年往往政局不稳，但整个说来，摄政诸公，特别是休伯格·德·伯格，干得很出色，他对亨利进行政治上的教导，直到他长到25岁左右。争夺权利的斗争大多发生在会议室里；诉诸武力的情况很少而且很短暂。作为一系列和解步骤的一部分，《大宪章》被修改后重新发表了。但是当摄政会议上的贵族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发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事件时，他们对于国王继承的海外领土就不那么关心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谁也没有产业在普瓦图和加斯科尼。1224年当他们进行内部争斗之时，他们的卡佩王朝宿敌，如今的国王路易八世，便乘机进入普瓦图，占领了拉罗谢尔，并威胁着加斯科尼的安全。英国于1225年进行的征讨巩固了加斯科尼的地位，但英王却无意为收复普瓦图作出认真的尝试。而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征伐规模较大但结局却不光彩。1224年后，亨利三世的祖先曾在法国拥有的领土中，只有加斯科尼留了下

来。这件事的影响是使12世纪领土的天平逆转。英格兰一度是安茹家族势力范围中的一个行省，如今它已成为金雀花王朝领地的无可争议的中心。最终，通过巴黎条约(1259年)，亨利放弃了他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权利，并使加斯科尼效忠于路易九世。

实事求是地说，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最大的政治成就，但是他只是由于希望摆脱其他的困境而勉强接受了路易九世慷慨的条件。当时他面临的一个主要麻烦是国内最有权势的贵族正盟誓要以武力反对他。自1233年以来亨利就时断时续地遭到别人的反对。每次争论的中心总是他选择了什么人为朋友和顾问的问题；134 这些人都是得到国王资助最多的人。他所宠幸的人中许多并非英国人，这一情况使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当时英国的政治已越来越具有岛国特性。亨利是一位爱好家庭生活的好丈夫，他自1236年便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幸福地结婚，并决心给他妻子的亲戚们优厚的惠顾。然后，当他的异父兄弟卢西格南兄弟(她母亲改嫁后所生)在法国生活不便时，他欢迎他们到英格兰来，而自1247年后，他们便经常使气氛恶化。

同样有争议的是国王给次子埃德蒙提供一笔产业的计划。1252年教皇把西西里岛给亨利，1254年亨利以埃德蒙的名义把它接受下来。不幸的是，西西里的真正主人却是德意志霍恩施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克二世皇帝的私生子曼弗雷德。亨利不仅同意出资去征服该岛，并答应偿还教皇当时的债务——教皇为打败曼弗雷德已耗资约135000马克。亨利卷入这件事是荒唐的，这事的结局是1258年诸侯开始发布有深远影响的改革纲领以取代国王的统治，这便是《牛津法规》(1258年10月)和《威斯敏斯特法规》(1259年10月)。但是夺去成年国王手中的权力而把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贵族会议乃是一种革命性的步骤。此后五年中，英格兰已滑入内战的边缘。当1264年战争果真到来之时，已只剩下一个

生命攸关的问题，即：国王是否可自由地选择外国人为顾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坚定不移地主张只有代表“王国公众”行使权力的贵族会议作为最后手段有权决定这一问题的那个人，西蒙·德·孟福尔，他本人生来就是外国人。这时，西蒙早已是“公众”中有权有势的一员：1231年起是莱斯特伯爵，1238年起是王亲国舅。1264 135 年西蒙伯爵取得刘易斯战役的胜利，但是次年在埃文沙姆战役中被打败，他本人丧生并被肢解。亨利三世在位的最后几年，国王权威的完全恢复是与以下情况结合进行的，即在《马尔伯勒法令》(1267年)中承认“王国的习惯”，其中包括遵守《自由宪章》，乃至《威斯敏斯特法规》的某些条文。埃文沙姆战役的胜利者爱德华，王位的继承人，对这一和解的气氛感到不舒服，便出发去参加十字军东征，而让他的父亲自由自在地集中精力重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爱德华一世(1272—1307)

1272年，爱德华在东征返回途中住在西西里时，听到了父亲去世、他被拥戴为王的消息，他并不急于赶回英国。在巴黎他字斟句酌地向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表示效忠：“为了我应该从你处得到的所有土地，我效忠于你。”然后他南下到达加斯科尼，并于1273—1274年住在那儿。1286—1289年，他再次访问加斯科尼。他是在加斯科尼的首府波尔多举行觐见礼的最后一位金雀花王朝的国王；1289年7月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英国人统治加斯科尼的历史决不是一部没有波折的衰落史。比如1279年法国按巴黎条约的规定最终归还了阿热奈。阿热奈是重要的产酒区，它的割让进一步加强了波尔多与伦敦之间迅速发展的商业联系。波尔多酒的关税在13世纪40年代每年仅300英镑，在60年后却为6000多英镑。反过来加斯科尼进口英国的布匹、皮革和谷类。扩大贸易的共同利益把这两个地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1274 年 10 月，爱德华回到英格兰后不久，就着手对王室和贵族官员的活动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像类似的调查一样，发现了许多冤屈，为了纠正这些冤屈，以罗伯特·伯内尔大法官为首的国王顾问开始了就广泛的问题颁布新的法律的工作。但即令在立法最多的时期（1275—1790年），也没人想到把英国法律编成查士丁尼法典那样的法典，法规中对国王权利和臣民自由权利予以同样的关注。

自 1276 至 1284 年，爱德华主要关心的是威尔士。最初他的计划只是打击一下卢埃林·阿普·格里菲斯的嚣张气焰，然后把这位威尔士王的土地交给他的两个弟弟戴维和格里菲斯。但是在 1277 年战役胜利后，他把一项令威尔士人感到屈辱的和平条约强加于对方，没有把戴维希望得到的土地给他。1282 年威尔士叛乱。在 1282—1283 年的战争中卢埃林被杀，戴维被俘。戴维受审并作为叛逆被处死；自 1076 年以来他是因叛乱被剥夺生命的第一人。136 与 1277 年战役不同的是，1282—1283 年的战争是打算征服威尔士的，考虑到爱德华资源上的巨大优势，这个任务并不太困难。

如果说征服威尔士可以视为几个世纪战争的最高成就，那么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在 13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异常好的。但是 1286 年亚历山大三世坠马身亡，他的唯一的孙女玛格丽特即"挪威少女"被确定为王位的继承人。爱德华一世建议她嫁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苏格兰的贵族同意这门婚事（1290 年 7 月的伯厄姆协议），但同时坚持苏格兰应保有自己的法律和习俗。

不幸，6 岁大的玛格丽特死于奥克尼（1290 年 9 月）。爱德华抓住这机会来维护他宗主国的权利以及他对争夺王位的人进行裁判的权利。经过复杂的法律辩论，他支持约翰·巴利奥尔，在 1292 年圣安德鲁节那一天，新国王在斯考恩登基。到此为止，爱德华可

以名正言顺地说他的行为是帮助在苏格兰维持和平与秩序；但从这以后他对苏格兰人指手划脚的态度却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灾难性的战争。

威尔士和边境地区

11世纪的威尔士由一个重峦叠嶂地区的许多小王国组成。这些王国没有稳定的边界。边界的伸缩依法律（诸子之间分割遗产的习惯）和政治（个别统治者的野心和军事上走运）而定。尽管英国国王一贯认为他们在这儿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在把这不明确的宗主权改变为持久的军事和行政上的控制方面所作甚少。最初，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似乎要就势征服威尔士。事实上，赫里福德、什鲁斯伯里、切斯特等地诺曼底伯爵都领得特许状，可占领他们原占领的任何土地。但是在1067—1075年间的迅速推进之后，他们发现不利的地形特点妨碍他们继续前进。因而他们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只限于低地和河谷区，特别是在南方。有时威尔士诸侯也能恢复主动精神并收复他们以前丧失的土地。诺曼底人对威尔士的征服直到爱德华一世才最终完成了。因此，在爱德华统治时期，威尔士硝烟弥漫，城堡林立。威尔士诸侯与驻威尔士的盎格鲁—诺曼底贵族之间开战又议和，他们因而都享有后来制定宪法的律师们称之为"元首"的权力。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征服只是零敲碎打地由个别盎格鲁—诺曼底贵族家庭，如克莱尔家族、莫蒂默家族、莱西家族、布罗斯家族等进行的。他们所征服的领土实际上为大封建主个人所有，不包括在英国管辖的正常体制之内。然而这些家族仍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而且偶尔国王会当面提及这一点。1102年，亨利一世击败了什鲁斯伯里伯爵蒙哥马利的罗杰的儿子们，并瓜分了他们父亲的边境"王国"。1208—1211年，约翰迫使威廉·德·布罗斯 137

身亡。征服和殖民化的基础工作有待进驻威尔士边境的贵族去完成，但是全面的战略仍掌握在王室手中。比如说，得由国王来决定与当地贵族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某些威尔士王国被消灭，而保存下来的又变得日益巩固了。

到12世纪后半叶，德赫巴斯的统治者(特别是里斯爵爷)还有圭尼德的统治者们才能出众。13世纪时，圭尼德的两位君王，伟大的卢埃林和他的孙子卢埃林·阿普·格里菲斯，通过武力和外交，把其他威尔士王朝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下。事实上，在蒙哥马利协约(1267年)中，卢埃林·阿普·格里菲斯得以说服不情愿的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既承认他领土上的扩张，又承认他新的头衔“威尔士王”。

136

但是八年前的另一个条约决定了威尔士的命运。1259年通过巴黎条约亨利三世同意丧失大陆上大部分领地。与法国议和意味着英格兰国王只要愿意，第一次可以集中注意他的不列颠邻人。接着便是爱德华的征讨和修建城堡的巨大计划。根据《威尔士法规》(1284年)，新获得的土地也像英格兰的土地那样划分成郡：弗林特，安格尔西，梅里奥尼思和卡那封。至于威尔士的法律和习俗，爱德华宣称：“其中有些我们已经废除，有些我们认可，有些我们已经修改，另外一些是我们添加的。”实际上这话意味着英国的习惯法已传入威尔士。

1287年和1294—1295年威尔士曾先后发生暴乱，但是城堡起了应起的作用。弗林特、里斯兰、埃贝里思特斯、比尔斯、康韦、卡那封、克里杰斯、哈莱克和博马里斯——这些城堡名字响亮，但建筑并保住它们却特别费钱。这是爱德华为确保他反叛乱胜利所付的高昂的额外费用。

南部和东部零零星星地被征服和北部及西部突然遭受到灭顶之灾形成了明鲜的对比，它给威尔士的政治地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爱德华征服得来的土地大部分保留在国王手中，其他部

分则分成许多大片诸侯领地，统称之为威尔士的边境，至于1282年在伊尔封桥死于英国陷阱的卢埃林王，他的命运是成为20世纪威尔士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崇拜对象。

苏格兰

与支离破碎的威尔士不同，在11世纪时，苏格兰的大部分，特别是最富庶的南部和东部部分，是由一个国王，即苏格兰国王管辖的。自阿瑟尔斯坦统治时期以来，苏格兰国王偶尔承认英国的宗主权，但那不过是就两国的联系或可能存在的联系而言。一方面苏格兰国王十分强悍，并不害怕盎格鲁—诺曼底贵族向威尔士甚至爱尔兰所推行的那种私人性质的入侵。另一方面，他的土地贫瘠而且他地处边远山区，引不起英格兰国王的兴趣。此外，尽管对苏格兰发动一次成功的征讨并不难，但是对于那些以泰晤士河流域及其以南为基地的国王来说，征服并控制如此遥远的一个国家似乎是，而且或许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与英格兰人的问题也没有令苏格兰人感到困扰。除苏格兰国王戴维（1124—1153年在位）利用斯蒂芬统治时期进行内战的有利条件夺取了诺森布里亚（1149—1157年保持在苏格兰手中）外，与英格兰的边界仍有效地保持在11世纪所确立的界线上。更加重要的是，苏格兰王国扩张而囊括了遥远的北方和许多西海岸（凯斯尼思，罗斯，马里，阿盖尔，盖洛韦）。挪威国王割让西部群岛（1266 [139] 年珀思条约）是这一扩张政策的顶点。苏格兰人的这一进展得力于连续三位国王稳定而持续的领导所提供的物质援助，这三位国王是：威廉一世（1165—1214年）、亚历山大二世（1214—1249年）和亚历山大三世（1249—1286年）。

低地的内部开发与高地的领土扩张相呼应。这儿修建了市镇、大教堂和修道院；为把王国划分为便于管理的行政单位而建立了

城堡和敕定郡区；王家铸币人开始铸造银币（与英国币同值）并对进口货征收税款。苏格兰的君王的联姻表明12和13世纪的苏格兰已日益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组成部分。这些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与战争极少关联。只要英格兰国王不抱有征服苏格兰的不切实际的野心，这一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政府

政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仍旧是国王。他的性格仍旧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更为重要，这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与他父亲和儿子统治时期的对比中看得很清楚。但是国王当然不能单独进行管理。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跟着一大群人：朝臣，官吏，仆役，商人，祈求者和各式各样的食客。

在跟随他的一大群人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国王的家仆。他们部分地提供细致的家庭服务：厨师，司膳人，食品储存人，马夫，管帐篷人，马车夫，驮马夫和为国王扛床的人。还有侍候他打猎的人、养猎犬的人、吹号角的人和弓箭手。还有些人兼管政治、行政和家务。他们有的有十分明确的职能。司法大臣掌管国王的玉玺和大法院的文书。财政大臣和国王的侍从照看国王的金钱和贵重物品。监军和元帅负责管理军事组织。但是王室的成员，像国王一样，是有全权的，而且王室任何一位大的官员，如总管，很可能被委任重要的政治或军事任务。

这些官员有的只是教会文书。在14世纪40年代之前，司法大臣与财政大臣总是由文书担任。但是他们许多人是俗人：国王侍从、总管、监军、元帅，还有地方一级的郡长。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并不完全、也不主要依靠教会文书来获得统治国家所必需的行政才能。他们也不依靠其利益与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相对抗的一群王家官吏。正相反，王室中通常包括某些最有权势的贵族。王室

140

的仆役也是巨大产业的所有者和他们自己家族的主人。通过他们的影响国王的权威得以贯彻到地方上去。这一非正式的权力机制常因任命王室成员出任地方官职而得以加强。当鲁弗斯在位之时，“总管”哈莫是肯特的郡长；厄斯·达贝托特是王室的监军，又是伍斯特的郡长。整个12和13世纪，王室的骑士继续受雇为郡长。

政府的主动机在王室。1136年，描述王室的现存最早的文件《王室法规》的大致发布年代，是这样，1279年，爱德华发布《王室法令》的那年也是这样。进而言之，没有理由认为发布《法规》时的王室与威廉一世时、甚或克努特时的王室有重大的差异。

同样，王室也是军事组织的中心。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实质上是“武装的王室”。王室骑兵是在突如其来的骚乱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的一支专职特遣队。如果发生大的战役，它可以迅速扩充。王室骑士常负有动员并指挥大的步兵分遣队的责任。王室的男仆，即“家人”可以得到年俸，然后再根据他们服务的日数给予日工资。人们通常认为这与诺曼底时期有很大不同，那时当大佃主①们应召为国王服兵役时，他们便集合起定额的骑士组成军队，这种军队基本上是“封建军队”。但是对1100年左右零 141 散得多的材料进行细心的研究表明，很难找到作战的“封建军队”，但同时却发现爱德华机制的主要特点已经存在：雇用费，按日计算工资，扩军时的骨干，使用王室军队驻守主要城堡并使他们成为由骑士和弓箭手组成的野战军的主力，并以王室骑士作为补编军的指挥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克努特的常备军人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与以上任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由于一些实际考虑而不得不对王室的最高额有所限制。仅运输与伙食供给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对王室出游预先作出计划会有些帮助，商人们预先知道王室要到哪里便可安排他们的货物

① 大佃主：直接受封于国王的大封建主。——译者

去哪里。但是国王所经过的地区却感到近乎难以忍受的负担。王室的需求对地方上的食品和物价影响极大，这种情况极易引起辱骂。坎特伯雷的僧侣埃德默在描写他不赞成的国王威廉·鲁弗斯的王室时是这样写的："侍候国王的人进行抢劫并把一切都毁坏，他们所到之处留下的是满目凄凉。因而一旦听说国王要来，大家都逃到林子里去。"在爱德华统治期间，计划与抢劫仍然相伴而行。宣布国王要到诺丁汉过复活节的官方信件为使当地百姓宽心而郑重宣告，国王来得快也会去得快的。

因此，既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让人感到国王就在近旁），又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让人不再感到他在近旁），国王便经常旅行。在这方面，金雀花王朝几位国王由于其领地的辽阔而较先王更为辛苦，可是约翰在政治上的失误却至少取得了减轻他旅行之苦的效果。1203年后，王室的旅行日益局限于英格兰，而在爱德华一世时，还包括北威尔士。1289年后，再也没有哪位国王去过加斯科尼。同时往来于伦敦的道路渐渐变得重要起来。到1300年时，国王的旅程并不像约翰时仍奉行的那样，主要是从宫中去中韦塞克斯的狩猎区，即西萨克逊诸王的老中心地带。

虽然出于政治的和经济的考虑而使王室行踪不定，但那个时代也存在其他的特征促使情况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官僚主义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发展。假如出于实际考虑而必须限制王室的名额，而国王的文书和财政官员又不断增长，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必然地不可能继续随国王去各地旅行。其中有些人只得在方便的地方定居下来。到1066年时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那时 142 在温切斯特已有一个永久性的王家国库，一个保存财政帐目和银钱的仓库，这就需要常设的官员来防护和管理它。到1290年定居的官员更多了，其中有教会执事，也有俗人，有的在大法院工作，有的在财政部门，而且他们住在威斯敏斯特，而不住在温切斯特。

但是官僚机构的发展并未改变生活的基本政治事实：国王仍旧四处旅行；他仍旧随身带着玉玺、秘书处和财政专家们——而且一些重大的政治和行政决定正是由这个流动集体而不是在威斯敏斯特作出的。在1290年，正如在1066年一样，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马鞍依旧是政府所在地。那时还没有首都而只有国王的大道。

官僚机构的发展也改变不了如下的基本事实，即国家政治的稳定仍旧主要依仗国王掌握小的但极有权势的贵族家族的能力——这一点已由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事件所证明。这些大佃主按什么条件拥有国王的领地呢？他们正像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一样，得效忠并帮助国王：这主要意味着政治上的效忠，而在战时则意味着军事上的效忠；在某种情况下还会要求他们给予国王财政上的资助。此外，大佃主的继承人在继承产业时得交纳继承税，如果他或她还未成年，产业便归国王监管，国王可以任意处置它们（得遵循一定的陈规）。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可以操纵受监护人的婚姻。如果没有直接继承人，那么对遗孀的生活作出安排（她的再婚也受国王操纵）后，国王便可以把土地重新封给他高兴封给的任何人。国王对豪门贵族的遗产和婚姻的这种操纵意味着他作为庇护人的权力是无限的。听他支配的不仅有官职，而且有男女继承人和寡妇。例如，当理查德一世把彭布洛克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许配给威廉·马歇尔时，实际上便使威廉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今日西方世界没有哪位政治领袖具有中世纪国王所掌握的庇护人权力。因此怪不得国王的朝廷成了整个政治体制的焦点，成了人们（包括少数妇人）相互推搡、拼命求得国王注意的人为的骚动而紧张的热闹场所。难怪12世纪的文人墨客常把宫廷生活描绘成地狱一般——但站在地狱口的数以百计的人们却急于要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庇护人的身份是国王手中最强有力的牌，问题在于他如何打牌，如果他打得不好，很快便会陷入麻烦。

这一庇护制度的主要特征在威廉·鲁弗斯统治时期便存在了。这一点从1100年亨利一世发布的《加冕典礼约法》所规定的条件看得出来。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这一制度也明显地存在。《大宪章》也对它进行了阐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作了修改。比如，1215年以后贵族的继承税固定为100英镑。但是有关继承财产、监护和联姻的法律仍旧由国王按其爱好而加以处置，或是像爱德华一世那样使自己的家属得到一份优厚的财产，或者如爱德华二世那样使他的宠幸变为富翁。不大清楚的是这一制度在1066年是否已经存在。大部分历史学家们或许会说不。但是十分有意义的是，克努特，或许还有无主见的艾特尔雷德已作出大致与1100年的法令相近的承诺。

庇护人的身份是有利可图的。人们愿意出钱来获得国王的恩赐：大法官以下的官职，继承产业，监管土地，监护未成年的继承人或与之联姻，甚至只为了得到国王的好意。这一切都是可以用价钱取得的，而价钱是可以协商的。国王于是便通过一个劲地索取高价来筹集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能向国王表明其佃户财富状况的文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末日审判书》正是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它说明这个国家财富的一半掌握在不到两百个人手中。当这些人陷入政治困境时便课以罚款，在给予他们所要的东西时索取高价，这样国王便找到了对富豪之士敲竹杠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为此，有关信息必须反映最新情况，而整个12和13世纪国王都能设法保证作到这一点。例如，亨利二世的行政机关留下的一份现存的文件被令人高兴地称为《贵妇和童男童女卷宗》。因此，在像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这样一位心怀敌意的观察家眼中，国王好似“老是悄悄地荡来荡去的强盗，他老在窥测，老在寻找可以偷到什么东西的可乘之机”。杰拉尔德谈的是金雀花王朝，但是，在切斯特孀居的伯爵夫人露西为了换取五年独居生活的权利而给了亨利一世500马

144

克，这可能是引得他说这番话的另一原因。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经常负债这一事实给予国王们一个有力的政治杠杆，这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杠杆。例如，1295年，爱德华一世利用要收回债款相威胁而迫使一批很不情愿的豪门贵族前往加斯科尼。

现存的有关王家岁收的最早的详细账目，即1129—1130年的卷筒，表明庇护人的身分是多么有利可图。卷筒记载了在这一财政年度，亨利一世以庇护人身份达成协议而筹集了3600英镑，这占他岁收的15%并超过了他的税收的收入。但是卷筒上的数字告诉我们的远不止此。在1129—1130年，由于头一年和这一年达成的协议应收入的款子总数将近26000英镑，那就是说实际收回的钱只占这总数的14%。例如，威廉·德·庞特·德·拉克曾答应拿出1000马克换取宫廷内侍的职务，并于1129—1130年支付了100马克。这就意味着如果国王对威廉的行为举止感到满意，以后的分期付款可以暂停或免去。为了不使财务署催款太急，人们宁肯出高价。但是一个人失了宠便得赶快付款——否则他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例如在约翰统治时期，威廉·德·布劳斯就碰上了这种遭遇。换句话说，只收到期款的一小部分并不表明政府工作效率不高，而正表明无限灵活的庇护制的进一步改进。

威风凛凛的国王总是把他们的手伸进其臣民的口袋里。爱德华一世以"贪婪之君"闻名于世，正如威廉一世"最爱贪财"一般。粗略地说，早在12世纪人们就认定可以根据财政情况来衡量王室的权力。用伦敦主教、英国财政大臣、《国库对话》(1170年)的作者理查德·菲茨尼尔的话说，"王公贵族的权力根据他们现金资源的消长而起伏不定"。1129—1130年的卷筒（由各郡郡长及其他官员于那年在财务署记下的帐目）表明，当时的财务制度已大致按《对话》中所描绘的线路运转。但财政制度本身肯定存在于卷筒之前。大致说来，这种制度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每年由各郡郡长向国

库缴纳地租)。1066年和1086年一些大的王家庄园仍用实物缴纳地租。到1129—1130年可以清楚地看出折算地租已广泛采用。这是符合整个欧洲的发展情况的。郡长用现金缴纳的愈多，就愈加需要用快速易懂的方法来计算英镑、先令和便士。于是便把方格桌布当作简化的算盘(财务署或财政部的英文字即由此而来①);国王的会计便像赌场里收赌金的人那样，通过移动方格里的筹码来计数。最早提到财政署这个字是1110年。全国最有权势最可信赖的一些人每年两次聚在一起审查郡长的帐目。当国王在诺曼底时，他们便作为代表王权的委员会于国王不在期间"在财务署"聚会。当克努特在丹麦时大概也有一个人选相似的委员会为同样的目的聚在一起。

145

但这只是推测。只有到了1129—1130年我们的判断才带有某种程度的精确性。但即使这时，我们也得十分小心。国库的记载——卷筒几乎只字不提金库里收入和支付的总数。虽然总数无法确定，但是考虑到金库乃流动的王室的财政厅，这数字很可能是很大的。比如，据估计，到1187年时亨利二世已向他耶路撒冷银行账目上拨款30000马克，尽管在他统治期间的卷筒上并无这笔钱的痕迹。由于缺少12世纪的金库记录，我们难以估计王室岁收的总数。因此，亨利二世统治之初卷筒上较低的总数很可能反映了新国王对金库理财的偏爱，对金雀花王朝的君王来说，这种偏爱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先王无须财务署也能理好财。但是到了铸造硬币时，金雀花王朝诸王就把安茹家族的做法引入英格兰和诺曼底了。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分析一下现存的唯一一份亨利一世时期的卷筒无疑会给我们启发。

1129—1130年付给金库22865英镑，其中有将近12000英

① 方格布英文为 chequered cloth，财务署，财政部或国库为 exchequer。——译者

镑列在“土地及有关收益”名下。有将近3000英镑可以称之为捐税，其中几乎全部（将近2500英镑）都是丹麦金；12世纪地主向君王缴纳的捐税（见第146页）一般都称为丹麦金。另有7200英镑可以称之为封建贵族与司法上的收益：其中1000英镑得自教士空额；2400英镑得自司法罚款；还有3600英镑得自前面谈过的各种协议。因此记录在案的岁收半数以上来自土地，大约1/3来自贵族和司法；只有大约13%来自税收。假如我们把它与爱德华一世统治初年王室岁收的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义的变化。粗略地说，土地约占总收入的1/3，贵族与司法提供的收入不及总数的10%，而税收（包括关税）占了一半以上。相对说来，土地、贵族和司法已不那么重要，税收却重要得多。即使把1129—1130年的税收收入可能少于往常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因为那年只征收了地主缴纳给国王的捐税），这一粗略的概括还是站得住的。

尽管王室的土地在1130年非常有利可图，但是与《末日审判书》上的记载相比，它已江河日下。1086年国王的领地和市镇共值近14000英镑，而到1129—1130年却不及10700英镑。王室土地渐渐减少，没收和转归国王的土地似乎还得不偿失。国王必须把 146 土地授予权贵。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奖赏并鼓励忠诚，特别是在他们统治的初期，当他们面临有争议的王位继承问题时。这一情况不时发生，但是它通过对王室产业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得到了补偿。由休伯特·沃尔特开始而由约翰和亨利三世的大臣们继续推行的这种管理改革的成功从以下事实得到了佐证，即爱德华一世每年仍能从土地得到大约13000英镑的收入。（然而，考虑到前150年的通货膨胀，从土地得到的这项实际收入要比1129—1130年少得多。同样，亨利一世时的20000英镑或许比爱德华一世时的40000英镑更经花。）

赋税、海德（估价赋税的土地单位）和征收赋税的财会机构等

等都是诺曼底国王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了权力的例证。尽管每海德征收2个先令所得赋税只构成亨利一世记下来的收入的10%，它显然是一笔宝贵的王家财产。到1129—1130年，土地税每年征收一次，有时税率较高（有时也把免交赋税当作一种政治恩宠，这样就为王家庇护制增加了一条途径）。在亨利二世时期，只在1155—1156年和1161—1162年征收过两次赋税。但是他增添了其他赋税，对骑士按其土地征收兵役免役税，对市镇则按其动产的估价征收地租。到约翰统治时期，兵役免役税和市镇地租每年合计起来大致可以抵偿国王逐渐减少的赋税收入，但是赋税并未消失。它换了犁税或耕地税这一新名称并按修改过的估价，在1194—1220年间又征收过四次。

但是这时候，政府发现了一种新的而且更加有利的税收形式，它不是按土地，而是按个人的收入和动产的估价来估定。最初是在1166、1185和1188年，以教会的什一税为依据，征收过这种税，那是为了宗教的目的——给圣地以财政支持。约翰于1207年确实按动产征收过税，在1203年或许也征收过。1207年的税收帐目仍保存到现在，它所显示的数字是惊人的。按1/13的比率征收的这项税收高达60000英镑，总数远远超过了其他税款的收入。（然而1194年时为了筹集理查德的赎金曾按1/4——征税史上最高的比率——征收过同样的税。）在12世纪90年代中期又首次引入了国家关税体制。这种种发展说明在理查德和约翰统治时期王室的岁收又达到了新的高水平。到1213—1214年时，约翰已积聚了大约200000马克。但这巨额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当时正是多事之秋，适逢十字军第三次东征和安茹帝国保卫战。约翰1214年的失败迎来了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到1294年之后，英国的缴税人才会再次为欧洲的一场激战掏钱。

147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13世纪的两项重要革新——向神职人

员课税和建立关税制。自1199年开始，教皇便向教会征收所得税了。这所得税开头是用来资助十字军东征的，后来却如教皇所说的那样，用来“行善”。例如1217年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就曾命令主教和高级教士救出年幼的国王亨利三世。从那以后，教会常得资助国王，特别是当他们如亨利三世在1250年，爱德华一世在1287年所做的那样，宣誓参加十字军。比如爱德华在1291年便从教皇的十字军税收中获得不少于100000马克的资助。英国教会准备给国王资助，这一点在13世纪中叶已变得明白无误了，只不过在教士们的集会上，自然会为资助的数目争论不休，而且会利用集会来讨论哪些事情他们感到需要加以改进。接着亨利三世在1254年又前进一步，他不通过教皇同意而申请教士拨款，这事已不足为奇。亨利三世于1269年效法这一先例后，爱德华一世又在1294年之前三次效尤（1278/1280，1283和1290年）。

在理查德和约翰统治时期，关税是一项战时措施，当约翰于1206年谋求与菲利普二世停战时，就停收关税了。1275年对羊毛出口品设立关税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了和平时期国王岁收的一项永久性的增补。这项收入根据羊毛贸易是否走运而有所变化，但在1294年之前每年能有8000到13000英镑的收益。这些新的措施，即教皇对英国教会的征税和羊毛产品的关税，都与意大利在英格兰设立商栈和银行有关联。一方面正是那些满天飞的意大利商人使13世纪的教皇制度起到了国际财团的作用。另一方面，财政信贷正在政府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272到1294年间爱德华欠卢卡的里恰尔迪总数将近400000英镑，这笔债款的48%是用意大利人日益卷入其中的羊毛贸易的关税收入偿还的。当然，以前国王也借贷过。13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曾欠里恰尔迪50000多英镑，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常向佛兰德商人威廉·凯德借款来资助创建安茹帝国。13世纪后期引人瞩目的是活动的规模以及信

贷与关税之间的联系。与新辟财源的总数相比，传统的赋税如兵役免役税、市镇地租和封建缴纳等几乎不值得费力去征收，而它们也就渐渐不用了。

1275 年的关税制经过国王的顾问与商人讨论后获议会批准。这些税收的特点是，它们必须征得某人的同意：或是教皇、商人、僧侣，或是国家。与此相反，由土地、贵族和司法所产生的岁收却不需要有权势的人聚集起来予以批准——实际上一切有权势的人都征收同样的岁收（虽然规模小些）而且大概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不瞎花乱用就成。亨利一世有记录的岁收的 85% 得自土地、贵族和司法，但它们只占爱德华一世的岁收的 40%。国王岁收得自税收的比例愈高，愈是需要通过政治途径来获得同意。由此就产生了代议制成长的过程；伴随动产税而来的是议会的成长。

148

1214 年以后长期不与外国交战，按动产课征的税款一直是国王不时的财力资源。战争只是偶而发生，征税的其他可以接受的理由又很少，因此只偶而才能征得同意课税，的确不能像亨利三世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征税。但是从 1208—1293 年间最后七次课征的税款可以看出其日益增长的潜力：1290 年 1/15 的收益是 116000 英镑。如此巨额的课税如何能获得同意？国王的顾问们得说明理由。他们很可能说明他最近住在加斯科尼（1286—1289年）多花了钱以及他将参加十字军东征；他们也可能指出国王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而决定驱逐犹太人，以致牺牲了一笔优厚的岁收来源——尽管到 1290 年王室的财政需求已把犹太人挤尽榨干，再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了。但是他们向谁说明理由呢？他们向“全国公众”的代表，而首先是豪门贵族，即老是出席重大政治会议的权势之士，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诺曼底时代还是金雀花王朝时代都是这样。如今称为“议会”的 1290 年那次会议于 4 月到 7月召开，在最初十周里，它迅速处理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重要的立法。到 7

月中旬，又来了另一批人，各郡选来的议员。不到一周后，议会便解散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把郡选议员召来开会？因为贵族们不同意课税。他们“只能就他们的权利所及的范围”同意它。但是他们对议会的政治、司法、立法的其他事项却没有这样不愿处理。换句话说，贵族在大部分领域仍充分地代表“全国公众”，但当讨论课税时则不是。从12世纪后叶起，国王已习惯于与个别郡的公众讨价还价，因此，当国王想召集代表全国公众的会议时，要求这些地方的公众选派代表为他们讲话是很自然的。这样自13世纪50年代以后，贵族的会议得到了加强，而代表郡和市镇的骑士、自耕农和市民（平民）逐渐地扮演较显著的角色。1290年的议会的程序表明，主 149 要是国王课税的需要促成了这一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是否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呢？13世纪是否存在使传统的政治机构必须改组的“绅士的兴起”？绅士这时在地方上是否举足轻重，因此当国王需要让人们广泛了解其需要并有效地征收税款时，便在全国主要政治论坛上给这些人安置了席位？这都是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确实难以给予肯定的答复，有的历史学家作出了相反的论证，认为13世纪对于骑士阶级来说是危难的时代。其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问题：例证愈来愈多。我们对13世纪的绅士较之对他们的先人知道得多得多。但是西蒙·德·孟福尔和他的朋友们在1258—1265年期间是否比约翰和反叛的贵族在1212—1215年期间更为殷勤地争取绅士的支持？《大宪章》中有的条文是针对贵族及其他广大社会集团讲的，但亨利一世的《加冕典礼约法》也包含这样的条文。当忏悔者爱德华在1051年决定不征收丹麦金时，他对什么人讲呢？无论在12世纪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都不仅仅只有贵族和农民。13世纪后期作为郡选议员当选的那种人恰是一直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那种人。的确，他们过去是作为贵族的随从来的，但是明智的老爷正是从随从中发现了

优秀的顾问——假若他们肯听从这些人的意见的话。13世纪的郡选议员并非第一次出席这些会议；他们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装束而已。也许政治变化的例证（13世纪的代议机构愈复杂，国王岁收中的税收比例愈大）还得与根本的社会持续性联系起来考虑。

法律与审判

自亨利二世当政以后，王室法官开始经常举行地方会议（巡回审判），这样便有可能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应用“习惯法”；格兰维尔[①]和布雷克顿[②]的论文是这样称呼国王法庭沿用的法规的。在这以前，一般说来，地方法院只沿用地方上的习惯法。当然，长期以来国王一直对维护法律和秩序负有责任；人们盼望他们处理严重犯罪和王室诉讼，但是在建立正规的中央统一指挥的审判机构之前，国王在这方面的活动只能是间歇性的。当犯罪涉及显赫人物时，国王便进行干预，他们偶尔也发动反盗窃，特别是反偷窃牲口的运动。就此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审判方式一直延续到诺曼底征服之后。情况的变化发生在1166年的《克拉伦登法令》之后，1176年的《北安普顿法令》又使它更加充实。这两个法令对重罪嫌疑犯采取由王室法官进行审判的正规措施。最初，亨利二世的法官都是国王信赖的人，他们可能是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院长或王室顾问，正是昔日国王派出执行特殊法律使命或进行详细调查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次是为《末日审判书》所作的调查。对于这些人来说，开庭只是他们代表国王所执行的行政、外交和军事的众多任务之一。但是经常的巡回开庭意味着司法工作的担子日益加重。到了12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出一批人，大部

① 雷纳夫·格兰维尔：亨利二世时的首席法官，著有《论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1188年）一文。——译者

② 亨利·德·布雷克顿：亨利三世时任法官，曾撰写论文《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法》。——译者

分是俗人，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实际上，他们便是专职法官。当然，也有一些低级法院处理不大严重的犯罪，但“专业”法庭日益占据支配的地位。原因之一是，低级法院无权创新，而国王可以，并确信创造了新的罪名。例如，共谋罪便是1279年当爱德华一世命令巡回法官调查破坏执法官意图的秘密结社时“发明”的。由于国王不仅处理犯罪而且也处理财产纠纷，因此人们显然认为它们在进行有益的工作。《大宪章》批评了王室政府的许多方面的工作，而没有批评它法庭方面的工作。当然，它要求国王的法官每年访问各郡四次，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法官精通法律；他们学识渊博，自然会对流行于知识界的见解与态度的细微变化作出反应。变化之一是自觉地以理性态度来对待是非问题。这一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阿贝拉德的名言：“由怀疑而加以探究，由探究而发现真理。”这名言应用于法律上就有着深远的意义。举个例子说，几百年来，当不能迅速确定嫌疑犯是否有罪时，习惯于采用神裁法，即用炽热的铁或用水进行裁决。这种方法在人们相信时是行之有效的（它像现代的测谎器一样依赖心理上的窥察力），但却极易引起怀疑。假如一个无辜的人对神裁法的效验怀疑起来，那么他就更加可能失败。怀疑一起，便再也平息不下来。一开头，怀疑令人震惊（当威廉·鲁弗斯说出他的怀疑时）但最后人们对它已习以为常。最后，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禁止教士参加神裁法。这意味着至少在英格兰这种办法已突然中止。经过一个混乱的初期阶段后，神裁法被陪审制取代。陪审制在解决土地所有权纠纷时已被使用过并获得成功。1179年亨利二世曾下令，处理有关产权案件时，被告可以选择陪审制而不用交战审判法——这办法由诺曼底人引入英格兰，其效验亦如神裁法 162 一样，易引起怀疑。但是这一规定在用于犯罪裁判时便意味着只有当被告选定一种审判方式时才进行审判。显然他感到巨大的压

力。根据1275年的法令，被告在选定审判之前被关在监牢中。结果许多人死于狱中，但是因为他们并未被定罪，他们的财产也没有被国王没收。由于这一原因，有些人宁肯死去而不愿承担受审的风险。直到18世纪这一选择审判的权利才被撤销。

最初，特别在财产诉讼中，陪审团是被召来直截了当地解决他们按理可以解答的问题的。但是当他们面临复杂的案件，当陪审制取代神裁法后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陪审团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于是就快刀斩乱麻，从纠纷中挑出陪审团可望解决的某特定问题。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换句话说，需要专职律师。因此，在13世纪时，法律业得到发展，它有专门的学校、专门的文件和自己的语言（法律法语）。

尽管有这许多变化，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法律裁判的态度继续盛行。在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诺曼底时代，严重的犯罪通过一定法律诉讼程序后，犯罪一方得付给受害者或其家属赔偿费。金雀花王朝所建立的司法机构倾向于施加惩罚而无需赔偿。对许多案件，如杀人、伤人和强奸来说，这样的处理被认为难以容忍，因此，虽然格兰维尔、布雷克顿这些作家给人印象，似乎新的原则已有效地取代了旧原则，但实际上旧的做法似乎仍然存在；它们经过修改后与新的结合成一体。这便意味着出得起钱的就给受害者或其亲属付赔偿费而逃避惩罚，付不起钱的便受罚。

教会与宗教

《末日审判书》表明乡村牧师通常被看作是农民的一份子。他的教堂属于当地贵族老爷。如果一份产业被划分，那么与此相关联的教堂的收益可能也要划分。乡村牧师在许多方面与普通村民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不大可能独居，而可能结过婚并完全可能从他父亲继承了他的职位。如果这一情况基本属实，我们不能不钦

佩11世纪的这些改革家们的英勇无畏，他们的目标是要废除俗人对教会和教士家庭生活的控制。在教皇的鼓励下，改革运动于1076年波及英格兰。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它逐渐发展而最终取得 154 了某种成功。到13世纪后期，结婚的教士只是少数例外。另一方面，他们许多人，包括几个最有权势的，继续与情妇厮混。德拉姆主教雷纳夫·弗兰巴德和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在几乎两百年后从考文垂主教沃尔特·兰顿和爱德华一世的司法官罗伯特·伯内尔身上找到了与他们极其相似的人物。沃尔特·兰顿被指控扼死了他情妇的丈夫，而罗伯特·伯内尔，国王曾两次设法把他从巴思和威尔士调到坎特伯雷都没成功。就授予俗人圣职权和家庭联姻而言，教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上帝夺去了主教们的儿子，魔鬼却给了他们侄子。”

但反对教士结婚这一运动的成就虽然有限，却也引人瞩目，因为自第四世纪以来的七百年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种种法令竟毫无结果。这与12和13世纪教育的普遍改善有关。如果整个社会识字的人多了，就可以较快地从俗人中招徕教士；他们也就不必保持他们接近于世袭阶级的地位。上学校的人愈多，他们便愈会懂得，其中一些人还会尊重古代的教会法。人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在13世纪的英国，人口中独身者的比例较11世纪高。理由十分简单，誓守贞洁的人多出了许多。欧洲各地都盛行出家修行，英格兰也不例外。1066年英格兰有大约50所修道院和大约1000名僧侣和修女。到1216年便有将近700所修道院和大约13000名僧侣、修女和男女教士。一个世纪后，又增长到近900所修道院和17500神职人员。在总人口增加到三倍的情况下，这一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即令如此，它们也无法说明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11世纪所有的修道院都是本尼狄克会型的。到13世纪中期不仅有几百所本尼狄克会的修道院，而且还有许多可供善男信女们选择的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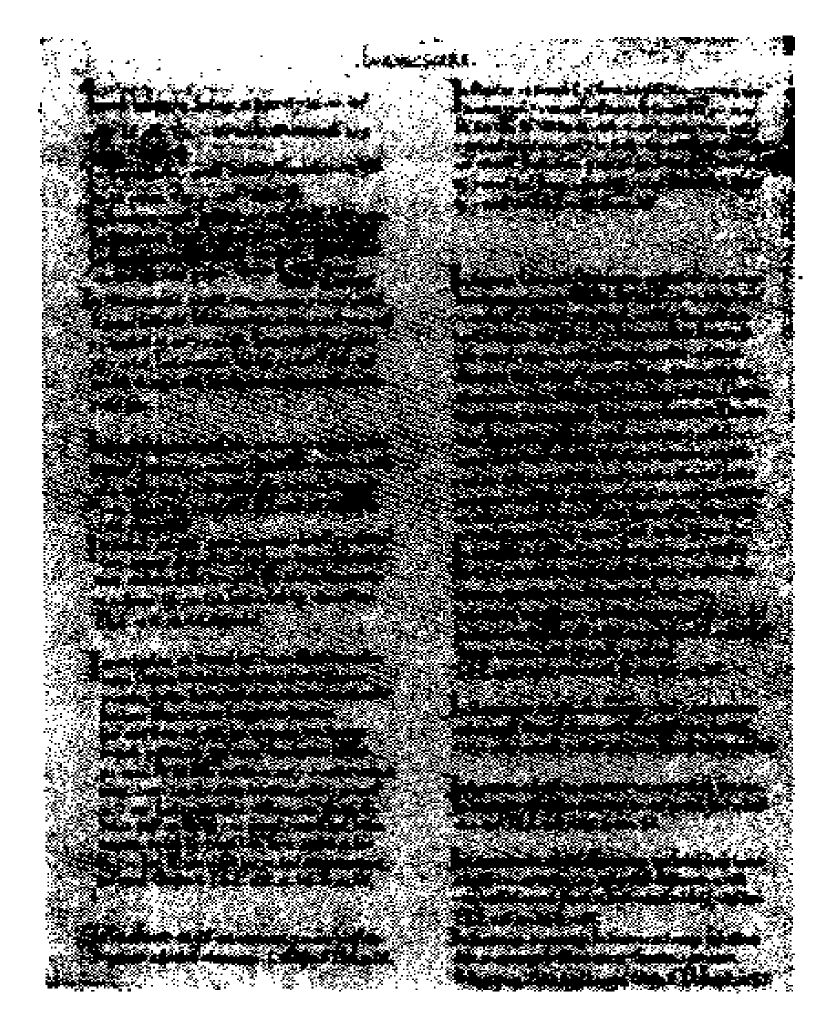
新的教派，如天主教教会、西多会、吉尔伯特会(唯一的英国教会)、圣殿骑士团、十字军救护团骑士、卡尔特修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圣衣会和奥斯丁修士。在此范围之内，几乎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宗教生活，农村的，城市的，沉思的，禁欲的，活跃的，都应时而生。另外，此时进入宗教界的人大部分都出入自愿。以前本尼狄克会主要从贵族父母那儿招收孩子来当僧侣，并在修道院中把他们抚养成人；自 12 世纪以后，进入新老教会的都是成年人。西多会搞了一点新花样，他们不收 16 岁以下的，并且坚持要有一年的见习期。征募制已被自愿加入所取代。

在12世纪期间，英国教会建立了主教管区和教区的组织，这类

165 组织将延续若干世纪。最后建立的两个主教管区是伊利(1108年)和卡莱尔(1133年)。主教管区又划分为若干副主教管区，副主教管区又划分为若干农村地方主教管区。在诺曼底时期，也像以前一样，几乎可以随意(随当地贵族老爷之意)建立新教区；但此后比较困难。教会的领土划分似乎冻结在 12 世纪时的状态。这当然并非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已趋于稳定。相反，新的拓居地继续建立，老的住宅区继续发展。实际情况是，教会法和教皇裁判权的发展倾向于保护无数的既得利益。律师的兴起，它本身就是一个领域的生活发生变化的结果，使得其他领域的变化更为困难。真正发生教区问题的地方在城镇。主教们全力对付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努力大都碰在教俗庇护人的产业利益这个硬钉子上。13 世纪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需要断然的决裂，需要一种新形式的宗教生活才能实现它。这新形式是由托钵僧和行乞修士提供的。他们是一些游方传教士，其国际性组织打破了主教管区和教区的界限。最先到达英格兰的行乞修士是多明我会修道士。他们于 1221 年到达后就前往牛津。三年之后，方济各修道士来了；他们最早的修道会设立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牛津。圣衣会和奥斯丁修士则是 13

世纪40年代到达的。到1300年修道士在英格兰共修建了大约150所修道院。

修道士的到来，正如教会法的发展一样，是一种运动，它反映了英国教会的一个基本情况。虽然英国教会的物质财富牢固地植根于英国的土壤之中，但在精神上、思想上和作为教会的法人生活上，它简直是拉丁基督教的一部分。11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一直乐于接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在1066年后它以法语为自己的布道用语，并着重以拉丁文来从事学术探讨，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广收并蓄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遍及整个拉丁教会的教皇格雷戈利七世的改革运动及教会法和教皇裁判权的相应发展。无可否认，改革者关于给予教会特许的自由的要求具有某种引人注目的后果，但最终却发现它不可企及。由于自由是与特权和长期拥有巨大社团财富相联系的，国王和其他庇护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某些至关紧要的权利，特别是任命圣职之权，纵令在13世纪他们得通过罗马教廷的法律机构才能达到目的。事实是：教会所支配的精神武器，逐出教门和褫夺教权的禁令，最终不足以抵挡世俗的权力。进而言之，它们还因为滥用而变钝了。对俗界真正关系重大的领域，不限于圣职任命权，还有战争，马上比武、经商等方面，格雷戈利改革的英雄时代在12和13世纪已逐步让位于顺应环境的时期。但是改革者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把教皇在教会中居于首领地位的理论转化为中央集权政府。教士们显而易见地学会了对教皇唯命是从。比如当教皇英诺森三世由于与约翰王争吵而对英格兰宣布褫夺教权禁令时，教士们都遵命而行。自1208到1214年的六年之中，教会大门紧闭，俗人被关在门外；他们不能去圣坛举行圣礼，不能为婚礼举行宗教仪式，也不能在教堂的墓地下葬。甚至当教皇下令自1199年开始征收教会税时，教士们虽有怨言，却也照付不误。自1228年以后，有一批



《末日审判书》中有关约克郡的一页。

不间断地居住在英格兰的收税人；他们带有罗马教皇的使节这一头衔，而且几乎全部是意大利人。在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顺应环境的特点。看起来，取得国王的赞同是有实际好处的，而这么一来，到 1300 年国王便取得了收益的最大部分。

在这整个期间，天主教一直是英国无人反对的宗教。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在教会封闭的六年之中，几乎听不到抗议的怨言，而且也没有一哄而起地对其他宗教发生兴趣。异教在 12 和 13 世纪不再像在 11 世纪那样对英国教会构成威胁：就这方面说，英格兰与欧洲许多地方是不同的。这整个时期之中英国只有少许非

基督徒——犹太人，但他们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痛楚不堪，而且在1290年被逐出英国。大多数基督徒为此而欢欣雀跃。

经济

1086年《末日审判书》中反复出现的简洁词组勾勒出了英国经济的基本轮廓。它基本上是农业经济。90%以上的人住在农村并从土地资源挣得每日的面包和淡色啤酒。土地上人丁兴旺，点到名字的居民区有13000个，大部分土地已经耕种。1086年犁过的土地占1914年可耕地面积的80%。林地和沼泽也得到利用。居民大多为农民或渔民。贸易与做工皆非主要职业。《末日审判书》的统计数字（不过使用这些统计数字也像使用其他统计数字一样要谨慎小心）可以补充说明整个情况。人数最多的阶级是维兰（villani）（占该书记载人口的41%）。他们占有全部土地的大约45%。其次（32%）是所谓的边境居民或茅舍小农；他们只占有土地的5%。因此，虽然个人情况千差万别，显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一种人与村的田地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另一种人则除了一间农舍和院子外别无土地。此外还有14%的人是“自由民”或“索克曼”。因为他们占有1/5的土地，就经济上说，似乎属于维兰阶层。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土地，占该书记载人口的9%。 158

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是国王和少数权贵，他们全都是靠他们巨大的产业上的收入过着豪华生活的地租收入者。不到200名俗人和大约一百座教堂（主教管区、寺院和小修道院）共占有全国估定值的3/4。这些人（用法律名词说是国王的大佃主）有他们自己的佃户。例如像威廉·德·沃伦这样富有的男爵从价值1150英镑还多的产业中拿出价值540英镑的土地转让出去。有些转租人（次承租人）是骑士，他们承租的土地就是骑士采邑。（虽然许多骑士并不比最殷实佃户富有，但与领主过从甚密，因此便属于不同的社会

集团。)大佃主的其他土地——通常占其全部土地的 1/2 或 3/4 是自己的庄园，封建领主正是从这些庄园上获取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和粮食。有固定中心的寺院需要固定的粮食供应，而比较喜爱外出旅游的大地主或许对金钱更感兴趣。因此大部分领地被出租(用专门名词说是租佃)以换取租金。大部分租地者与拥有骑士采邑的人属于同一社会等级；他们共同组成拥有土地的“中间阶级”即绅士。

1086 年后的两百年间英国经济有何变化？时间虽然很长，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许多基本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英格兰在 1286 年并不比 1086 年城市化程度高。市镇的确增多和发展了，但是总人口也多了。船只的设计无疑有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自8世纪以后一直是北欧各国共同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带有桶状货舱和船尾柱方向舵并吃水很深的运输小船的发展。这件事意味着长期以来把东海岸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西海岸与法兰西的大西洋沿岸联系在一起的海上贸易的规模是有限的。羊毛、布匹、木材、咸鱼和酒的贸易额很可能有所增长，商人的利润也很可能有所增长。即便如此，英国并未发生商业的剧烈变化，没有 13 世纪的意大利所发生的那种银行业和信贷机构的发展。这一相对落后情况的后果之一是 13 世纪英国对外贸易愈来愈多的部分落入了意大利人手中。意大利公司凭借其流动资本储备可以提供诱人的条件。它们不仅能购买一座寺院当年的全部羊毛产量，而且可以预购好几年的。它们还通过把巨款贷给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而获得王室庇护。13 世纪后期的英格兰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部分发展的经济。它的许多进出口商业是由外国人掌握的(加斯科尼人、佛兰德人和意大利人)。它的主要出口是原料(羊毛和谷物)而不是制成品。换句话说，那时还没有工业革命。

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业一直是织布、建筑、采矿、金属制造、产盐

和海洋捕鱼。而且，尽管人们要求布匹漂洗机有所改进，但工业技术上并没多大进展，与12、13世纪佛兰德的高度资本化的纺织业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佛兰德对英格兰羊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也有助于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从而保证这一时期始终有足够的银条流入而使它的硬币（银便士）一直维持优良的品质。（而在其他发展较快、铸造硬币较多的地区，人们却用劣质硬币来作零钱。就这一意义说，英国经济相对地说变化很少。）

最主要的是没有农业革命。尽管13世纪的产业管理专家如亨利的沃尔特或伊斯特里的亨利都以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工作，但由于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想要较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即羊毛和谷物的产量，是不可能的。虽然以马为耕畜的办法得到推广，但这并不重要。主要问题不在于犁，而在于播种、收获和保持土壤肥沃。用手播种和收获既浪费又缓慢。泥灰岩灰泥及其他类型的肥料不是太贵就是得不到。只有动物的粪易于取得，因而得到广泛的经常的使用。但是整个冬季羊群和畜群的饲料费很高，因此动物粪的产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除非主要的生产环节有根本改进（实际上没有），那么生产的第二阶段的改进，如1200年引进风车，并不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此，英格兰的经济在许多方面仍然停滞不前。我们的确可以断言，与某些邻邦，特别是佛兰德和意大利相比，英格兰在13世纪较之它在11世纪是落后了。

但讲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必须说明，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到13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居民远比1086年为 161 多，尽管当时的男子和妇女都熟悉性交中断的控制生育的方法。我们无从知道当时准确的人数。估计《末日审判书》调查时期的人口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大约介乎125万到225万之间。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可能高达700万；另外一些人认为没有那么多，或许是500万。但是他们全都同意人口增长了一倍



四季农事(1280年左右的手稿，可能出自坎特伯雷)。一月，门神忙吃喝；2月，人在炉前烤火和做饭吃；3月，修剪树木；4月，种树；5月，采花；6月，除草；7月，收割；8月，打场；9月，酿酒；10月，播种；11月，采集橡树果喂猪；12月，宰猪杀羊。这是中世纪典型的乡村生活图。除冬闲外，农民终年辛劳。他们以农为主，兼营副业，葡萄园、林木、草地和花园对农民来说都很重要。

多，有的则认为增长了两倍。自 11（或许确实是自 10）世纪开始的人口缓慢增长到 12 世纪末叶以后变为加速增长，这一假说似乎是可信的。但是人口的增长率不仅因时而异，而且也因空间而不同。例如约克郡北跑马道的人口在 1086 年以后两百年间几乎增加了 12 倍，而在别处，特别是在《末日审判书》调查期间人口已比较稠密的地区，即在南部海岸和东盎格利亚的某些地方，人口增长率要小得多，不过在沃什湾附近的淤泥地带却特别高。

人口如此增长的经济后果是什么？"扩展而不发展"。这话再好不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而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居住区和耕地的扩展。居住地的扩展是件一清二楚的事。的确，存在着现代公民倾向于称之为进步的许多迹象。市镇繁荣起来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起地区市场作用。如果了解一下这些市镇居民的职业就会发现供应食品的买卖和经营皮革、五金和纺织品的工匠小店主占明显的优势。甚至对较大的城市（如以欧洲标准衡量，英格兰只有一座真正大城市——伦敦，据估计它在 1334 年的财富是离它最近的劲敌布里斯托尔的四倍）来说，长途贩运和奢侈品贸易仍旧不大重要。农村人口日益稠密意味着城市面积和数量上的增长。在 1100 — 1300 年间，建立了大约 140 个新城市。如果数据可靠的话，1170 — 1250 年的几十年间建立的最多，如朴茨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等。他们大多是由当地贵族创建的，他们盼望从他们准备征收的地租和通行税中获取利益。有些城市的建立利用了开拓海上商业的有利地形，例如像波士顿、金斯林和赫尔这样有大船通过的港口（都是新建的）要比林肯、诺里奇和约克这些上游的河港收益大。

在农村，特别是在被诺曼底人夷为废墟的北部地区建立的样子整整齐齐的村庄，有时也可看出设计者的作用。在别处，比如在人口已经稠密的东盎格利亚，有的村庄便搬到散布于公地边沿的

新地点，大概是想从建立其上的"荒地"上获取优质的可耕地。

162 但是找到地方住是一回事，而生长出足以维持生活的食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农田的增加不是通过建立新的村落，而是通过在现有的居住区周围增加零星土地解决的。大片的森林、沼泽和山地被清理、抽干并种上庄稼。其中有一些是有潜在地力的好土壤，如沃什湾的淤泥地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部分，如苏塞克斯威尔德的空旷地，就老是瘠贫。这是"去边沿地的旅行"，人们搬往耕地的边沿并耕种真正的边沿地，它生产的产品仅能抵上消耗的劳力。对食物特别是面包的需要十分紧迫，以致其他"日需品"——燃料和建筑用材只好让路。

当然人们企图对现有土地精耕细作。在13世纪人们普遍采用三圃制而不是两圃制。这就意味着每年有 1/3 而不是 1/2 的土地休耕。但是为了保持土质，精细的耕作要求相应精细的施肥。不幸的是，可耕地的扩大有时使牧场和林地减少。这就影响了牲口的数量，因而肥料不但不能增加而且可能的确导致牲畜粪肥减少。这反过来又导致地力枯竭，产量下降。无论产量在 13 世纪末下降与否，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即如果农作物的产量达到限度以后而人口继续增长，那么两件事中必有一事会发生；或是增加粮食进口，或是降低平均生活标准。但是是否进口谷物无从查考。倒163 可能存在相反的趋势。英国谷物商人把他们的货物放在带货舱的船只中运往佛兰德、加斯科尼和挪威等地，即工业化和专门化程度高于英格兰的地区，那儿地区性的经济服务于以织品、酒和林产品换取基本食粮这一目的。13 世纪英格兰大量的财产记录表明，佃户拥有的土地在缩小。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每人平均拥有的土地减少了。

虽然如此，13 世纪村民的生活可能优于《末日审判书》时期的先人。他们较少遭受战争破坏之灾难。他们之中没有奴隶。奴隶

制是劳力短缺之经济的特征，当劳力供应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时，奴隶制便衰落。的确，他们中许多人是农奴（或维兰）（也许占人口的半数），而《末日审判书》时代的佃农和茅舍农（占登记人口的 3/4 ）是自由人。但是，虽然维兰和茅舍农就其并非农奴而言是自由的，但显而易见，他们并不很自由。因此能确切地称为“自由人”的只是较小的阶级（只占登记人口的 14%）。使维兰与茅舍农感到困难的是他们的封建领主也是自由的，自由而有权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习惯法，把许多负担加到农民身上，而在劳力相对短缺之际这很可能意味着沉重的劳役；在这样的时期，领主们不愿意按市场规定的价格付工资。只有当劳动力的供应增加的情况下，封建领主才愈来愈转向雇佣劳动。在 12 世纪，许多佃农发现他们的义务从劳役改为支付租金。这时墨守法规的观点变得重要起来。在 1200 年前后各十年间，国王的法官制订章程决定谁有权在国王的法庭上解决争执，谁无此权利。他们决定有权者是“自由的”，而无此权者为“依附的”。把社会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的结果是使人口的一半沦为农奴，使他们在法律上不自由。但是律师们用一只手取走的东西却用另一只手给送了回来。每件事愈是白纸黑字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么按习惯保有并使用土地的条件也便愈“冻结”在白纸黑字所规定的条文中，因而要在习惯法上玩花样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习惯法较前更有成效地倾向于保护现状。在这个意义上说，13 世纪的即使不自由的佃农也不像 11 世纪的自由的佃户那么容易遭到个别封建领主专横的勒索。13 世纪想利用习惯法整人的封建领主常常发现自己卷入村社的组织良好的无休止的拖延时日的官司之中。

但是即令习惯法可以保护穷苦的佃户，使他们的主人不致提出过多的要求，但它却不能使他们逃避经济变化的阴暗的现实。在 1100 至 1300 年期间，英格兰村民的半数是农奴，但是与贫苦村民 164

益发贫苦这一事实相比这事却无关紧要。到13世纪末年真正受苦的并不是佃农，而是那些无论自由与否而很贫困的佃农以及那些根本没有土地的人。我们对佃农多少知道一些。温切斯特诸庄园的死亡率说明，自1250年以后，比较贫苦的佃农变得日益"收获过敏"；这是委婉的说法，意即每次遇上收成不好，他们就有许多人死去，不是饿死便是因营养不良染病而死。对西米德兰的哈美索文庄园的研究表明，那儿的穷佃户的寿命估计要比小康佃户少十岁，这些穷佃户是《末日审判书》时期茅舍农的后继者。至于无地村民的情况我们只能推测，因为13世纪的文字记录很少提及他们。大庄园里的劳动者按习惯不仅可以得到现金，而且可以得到足以养家糊口的粮食津贴。但是那些"经济上已多余的"无地的劳动者怎么样呢？大概他们也变得"收获过敏"了吧。

但是给穷人带来痛苦的经济上的乌云，对富人来说却美好地镶着银边。人口的增长意味着食粮需要的增长。物价上升，特别在1200年前后和13世纪后期。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力供应意味着计件工资和计日工资的比率在整个13世纪一直是稳定的。换句话说，实际工资是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地主就可以得心应手。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产品而取得愈来愈多的收益。市场增加了。在1198—1483年间国王曾恩准市场2400个，其中半数发生在1275年前那个时期。同样要求租地的人增多了，地租便也提高了。就举一个例子说吧，伊利主教的纯收入从1171—1172年的920英镑升到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走运的大产业主只需要坐等供求规律自行为他发挥作用。在12世纪，正像早先一样，大部分富有的大佃主的庄园实际上掌握在他的佃户手中，或者是作为骑士的采邑或是按固定的地租租给了"农民"。在稳定的和逐渐扩展的时期，这种做法是很有见地的，就封建领主的角度来说这使他的行政管理费

降到最低点。这一制度的稳定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终生或几辈子的长期租约相当普遍，而且长期租约有转向世袭使用租地的趋势。

但是，1200年左右物价陡涨，给靠固定地租生活的封建领主带来了一些严峻的问题。如果他想把佃户放在一边，直接利用市场经济，他就得直接管理他的庄园。放弃一个世纪之久的制度很不容易，许多领主遭到佃户们激烈的反抗，但渐渐地还是这样做了。在布雷克伦德的乔斯林所写的关于伯里·圣埃德蒙斯修道院院长桑普森的务实的生活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一转变过程的最著名的描写。地主把产业收回到自己手中，任命管家和采邑管理人进行管理，并把多余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地主的花费和收益每年都不相同。这就使得他的管理人员易于欺骗他，除非他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严密的检查。因而庄园每年的详细帐目连同其他庄园的类似报告书，都送交大片地产的中心管理处接受审查。（大批此类帐目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对13世纪农村经济的某些方面知之甚多。）查帐的人起着制订政策和发现舞弊的作用。他们规定每座庄园的生产指标，即谷物和牲畜生产应达到的水平。他们决定资金的投放，如是否修建新的谷仓，是否购买肥料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导致全新著作的问世，即关于农业和产业管理的论著，其中以亨利的沃尔特的《务农》最为著名。所有这些变化必须以实际阅读写作能力的普及为必要条件：没有这一点，要把13世纪的管理革命（正是一场管理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可能的。 165

新办法的要点就在于使领主获得最大利益，并且要尽可能合理地做到这一点。看来这一问题不大可能涉及穷苦人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是经济制度中的无用的人，几乎全都生来就无用。在庄园范围之内反抗领主要求的事例是很多的，有消极的、直接的、有

时是法律上的对抗。在市镇上穷人和富人间的斗争也日益增多。到13世纪90年代时英格兰已有人满之患，传统的经济已无法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这个国家已濒于阶级战争的边缘。

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

166

（1290—1485）

拉尔夫·A. 格里菲斯

对于生逢其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14和15世纪似乎是个危机四伏、骚乱衰落的时代。英格兰的内乱和对外战争，特别是对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较北欧海盗时代以来历次战争拖延时间更长，离本土更远，耗资更多而且投入的人也更多。在不列颠群岛，威尔士人虽经过爱德华一世数次征服，仍受到英国人的猜疑；以欧文·格林杜尔的反叛（始于1400年）为顶点的叛乱似乎说明英国人的猜疑是有道理的，并使人回想起将英国人赶出威尔士的预言。克尔特人对英吉利人的偏见加上被击败、被压迫民族心理上的种种痛苦和由此产生的对征服者的统治者的万般仇恨，进一步加剧。一位苏格兰人于1442年宣称："英国人的专横和残暴在全世界是臭名昭著的，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侵占法国、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邻国的土地上。"饥荒、疾病和（1348年后产生的）瘟疫到15世纪初使英国人的人口急剧减少，或许减少了一半，这一点使英国社会陷入严重混乱。到15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家们不以为然地指出了英国人废黜国王、谋杀国王和太子的恶习（发生于1327、1399、1461、1471、1483和1485年），其频繁程度超过欧洲其他地区。心灵上的惶惑不安和异端邪说的传播使性情暴躁的牛津大学名誉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断定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教会已经衰败，主教和教士们失职。一位有名的诗人在描写1389年的情况时认为，这个似乎颓废的时代再恰当不过地反映在

垫肩，紧束腰带，紧身裤和尖头皮鞋的放荡、奢侈的时装式样之中。

当然，按当时人的意见来评价那个时代是不完全可靠的，特别是当他们生活在特别紧张动乱的时代时。目前人们公认，战争也167可有建设性的一面，它使英国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的同一性；饥饿和疾病不一定会倾覆一个社会，经济紧缩也并不就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邪说和批评教会机构的言论的增长可激发人们更大的个人虔诚；正如议会的演变一样，政治危机也有建设性的特征；最后，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遭内讧或社会骚动泯灭者寥寥无几。从20世纪后期的有利地位回顾过去，中世纪后期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动荡而复杂的时代，但也是一个生气勃勃、雄心奋发而且首要的是令人神往的时代。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国王和以王族和王室为中心的王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焦点和支点。国王与他有权势的臣属的关系则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中枢。这些臣属首先和居首要地位的是贵族，但也包括常想跻身于贵族之列的骑士和乡绅、富商、主教和有才能的教士，他们全都从国王陛下那里寻求庇护、职位和提升。一位成功的国王往往与有权势的全部或大部分臣民关系和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稳定、国内和平和政府的高效率。这绝非轻而易举的工作。自1216年起实行的王冠必须传给已故君主的长子的原则以及王室行政管理权延伸到国王的一批秘书和仆人手中，强化了越来越得到强调的国王在王国中的至高权威，但这必然使大领主的地区性封建权力受到损害。虽然王位世袭的原则减少了王族为王位争吵的可能性，但却使不适合当政的国王（因其年幼、无能或性格上的缺陷）有时更可能戴上王冠。最重要的是，14和15世纪持续不断的战争使英国国王担负着更重的义务。自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以后，没

有那个十年是没有战争的，不是在海外就是在不列颠群岛。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了解战争的需求、紧张和后果——而且比他们的祖先了解得更深切。

亨利三世时期的内战以后，人们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英格兰和解并恢复了国内和平，从而使国王和他的臣民得以建立稳定的秩序并对两者的权利和要求给予适当关照。新的国王爱德华一世(1270 — 1307年)在治理国家上显得才干突出，效率高和富有建设性，并且决心突出他作为君主的地位。但是在他无情地坚持维护自己在全部不列颠群岛甚至在国土以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不断进行战争的时代便开始了。

在威尔士，他制服了尚存的地方势力中最强悍而最不愿受制于人的圭尼德，而在卢埃林·阿普·格里菲斯于1282年去世之后，168 经过两百年的间歇性的战争，终于在他手中胜利地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国王因而把他的疆土扩展到北威尔士和西威尔士，并形成了占威尔士半壁河山的一个公国，1301年他把它赐给他的长子、第一位英格兰出生的威尔士亲王。尽管代价高昂，这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物资上的破坏必须补偿；为未来的安全而设想的计划包括兴建12个新城堡，改建6个城堡，其中大部分得到增强，成为带有新城墙的、由忠顺的移民居住的自治城市；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还要建立永久性的行政机构。这一行政机构(1284年的鲁德兰敕令[①]中宣布)开始时是一军事政权，但不久就通过把英国的改革与威尔士的实践明智地结合起来而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刚柔相济是新统治者与威尔士人民之间关系的特点，1287、1294—1295和1316年的几次叛乱波及面不大，没有成为严重威胁。然而征服威尔士的代价是巨大的。国王从英国各郡和国外招来了士兵、

① 又称威尔士敕令，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关于解决威尔士管理问题的法令。——译者

水手、建筑师、手艺人和工人来威尔士服务。仅仅 1277 到 1301 年间至少花了 75000 英镑修筑城堡（当时一个熟练的泥瓦匠每周工资不到 2 先令），而镇压 1294—1295 年间的叛乱花去了大约55000英镑。所幸的是威尔士的王家政府政绩卓著，到 14 世纪中叶它已为王家财务署挣得收益，威尔士的乡绅由于与异邦政权合作也兴盛起来。

卢埃林被消灭后，爱德华一世便立刻转向威尔士边境的贵族（大多是英国显贵），以便征服他们，确立他对他们及其属下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并把威尔士教会和主教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爱德华的整个征服活动表现了他远远超出军事范围的想象力、决心和对策略的理解。但是政教两方面都受外国统治集团控制的被征服人民的感情和激愤却不易平息。如果英国的统治变得暴虐，如果稳定的经济利益枯竭，如果旧有居民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那么英格兰统治者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殖民统治也会受到威胁。

爱德华一世也同样关注对苏格兰行使他高一级的领主权，这是一项异常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苏格兰与威尔士不同，它有自己的君主（坎莫尔王室），而且苏格兰人的独立意识很强，特别是在边远的高原地区。但是正如在威尔士一样，1286 年苏格兰王亚历山大三世的逝世和四年后他的孙女和女继承人的去世为爱德华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确立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宗主权。爱德华接受了苏格兰"国土卫士"的邀请去解决王位继承问题，并利用这一"伟大事业"（1291—1292年）确保自己被认可为苏格兰的"高一级宗主"。苏格兰人的对抗和爱德华要把自己的要求变成现实的种种努力使两国之间开始了一个冷淡时期，两国间相互敌对一直延续到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并在威廉·华莱士（1305 年被处死）和罗伯特·布鲁斯（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1306—1329 年在位）的领导下，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爱国主义

169

来保卫他们的政治独立。1296年后的半个世纪之中，英格兰人的20次入侵只在苏格兰的东南部低地建立了一个不稳定的军事的和行政的机构，但要在一个贫穷而敌对的国家把它支撑下去是困难的，必须主要从英格兰得到资助。英格兰人没能制服北部诸海，也没能征服并控制北部和西部苏格兰。因此，英格兰人没有获得他们在威尔士进行冒险活动所得到的利益（或成功），甚至在战斗中（如引人注目的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他们的骑兵部队也在灵活机动的苏格兰人手中遭到可耻的失败。北安普敦条约（1328年）承认罗伯特为苏格兰国王并放弃了英国的宗主权的要求，但是当爱德华三世1330年掌管政务以后便很快否认了这一条约。此后盎格鲁一苏格兰关系便令人悲哀地成了一系列入侵、边界骚扰、英国对南部几郡不稳定的占领，法兰西一苏格兰数次协议结成"老同盟"，乃至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在内维尔斯克罗斯被俘（1346年）。在苏格兰人坚决而团结一致的反抗挫败英国的要求和野心之后，苏格兰便持续不断使英王感到烦恼并使他们耗费巨款。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罗伯特一世试图利用爱尔兰的局势预先防止英格兰再次进攻苏格兰。1315—1318年期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获得了盎格鲁一爱尔兰贵族和苏格兰（北部和西部）盖尔山民的酋长的支持，并于1316年宣称为爱尔兰国王。此后不久，罗伯特本人也访问爱尔兰，可能是想要煽起对抗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克尔特"运动。苏格兰的干预使英格兰政府大为震惊，这也暴露了它在都柏林统治的脆弱。在1210至1394年间没有哪位英国国王访问过爱尔兰，就连爱德华一世，这位威尔士的征服者和"挥向苏格兰人的锄头"也不曾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却无情地剥夺爱尔兰的人力、钱财和物资等资源，特别是用于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和修筑城堡。残酷剥削和住外地人的统治到一定时候便导致滥用行政职权和社会秩序

170

混乱，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和苏格兰的盖尔酋长则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国王的官员们统辖着一个日益软弱而不受重视的管理机构，而苏格兰的盖尔人的政治和文化的复兴在13世纪已经扎根，这有助于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在他掌权之时，一位当代人说，爱尔兰“变成了一片骚乱的狂浪”。英格兰再也没能恢复它的宗主权，此后也没能把它的权威强加于整个岛屿。爱尔兰不再能提供财政资源，反而变成了财政上的负担。自1318年后它的岁收只有爱德华一世时的1/3，远不足以维持英国的统治。由次要人物领导的间歇性的征讨不足以恢复英王的权威，结果英王直接统治的地区缩小为都柏林周围的“栏栅”地区。当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1366年的基尔肯尼敕令登峰造极）采取种族和文化隔离乃至迫害的手段时，它无异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爱尔兰的宗主”在中世纪后期所享受的表面的宗主权代价高昂，无法律依据，对英格兰统治敌视而且容易被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叛乱者所利用。



典型的威尔士人（威斯敏斯特对13世纪末的威尔士人的印象）

171

英格兰国王要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承认他们的宗主权，但是这些国王作为阿基坦的公爵，自1204年以后一直是

法兰西国王的附庸，却拒不承认法国国王在加斯科尼的宗主权。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 — 1453年）之前和战争期间，加斯科尼一直在盎格鲁—法兰西关系中居于中心位置，它取代诺曼底和安茹成了两国争论的焦点。在爱德华一世即位之时，这个繁荣的产酒省份是英格兰仅存的一块法国领土，它与英格兰的政治关系由于非甜酒的出口贸易和把英国织品和谷物海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而得到加强，1306 — 1307 年，这个公爵领地的岁收是大约 17000 英镑，很值得为之战斗。由加斯科尼的边界和加斯科尼人的权利而引起的与法国国王的不和渐渐纳入了更大的争端，即专断而自我意识浓厚的法国想对其行省和附庸（包括阿基坦的英国公爵）加强控制而引起的民族地位与主权问题的争端。对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来说，他们不愿见到法国王权在加斯科尼显得突出或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偶发事件、和平谈判和局部战争，于是法国军队侵入加斯科尼，这片公爵领地不时地被没收，而英国人则出兵征讨，甚至爱德华一世也亲自来访（1286—1289年）。

如果不是因为其它两个因素的话，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以这种方式继续恶化下去。英国政府厌恶法兰西—苏格兰联盟(始于 1295 年)并且对法国人在爱德华三世进攻苏格兰期间为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提供庇护感到恼火。但更加引起争论的是法国卡佩王室的长子即将绝后所引起的反响。1314—1328 年间，一连四位法国国王匆匆去世，每次都要求英王为加斯科尼而宣誓效忠，这事已够令人心烦的了，而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国王驾崩时又提出了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这时新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尚无力根据他与法国母亲伊莎贝尔的血缘关系贸然提出要求，但是在 1337 年当加斯科尼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后，他便提出了这一要求。他这样做可能主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想使新的瓦卢瓦国王菲利普六世感到难堪，不过英国国王同时成为法国国王也

自有它不可承认的优点，这样就可一举解决加斯科尼的难题：加斯[173]科尼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得到保障。因而，当英国人见到法国舰队1337年离开诺曼底海岸并认为它是开往苏格兰时，战争便开始了；这场战争将延续一百多年。

英格兰的战争目标既不是持续不断的，也不是严格按照它们而行。特别是在14世纪，它的战争外交主要受命于一系列紧迫问题，比如如何维护加斯科尼的独立以及如何阻止苏格兰人为支持法国人而进犯北部边界。甚至在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以后，他也准备让法国人赎回在普瓦蒂埃战役（1356年）中被擒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并在布雷蒂尼和约（1360年）中放弃继承王位的要求以换取一些有实效的让步。然而不同王朝的纽带、商业和策略方面的考虑，甚至对1308至1378年间在阿维尼翁就职的教皇的不同态度等合在一起使盎格鲁—法兰西的冲突延伸到低地国家，延伸到卡斯提尔、葡萄牙、苏格兰、爱尔兰乃至威尔士。开始是于1338—1340年在法国北部打了一些攻城战（因为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互不关联的一系列冲突），然后于1341—1347年在法国布列塔尼、加斯科尼和诺曼底诸省以钳形运动的方式进行过更为集中的战斗（结果英国人在克雷西获胜并占领了加来）。而后在1355—1356年，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从加斯科尼大胆进军（结果取得了普瓦蒂埃的伟大胜利），而后在1359年国王本人驾临法国国王传统上行加冕礼的地方——兰斯。卡斯提尔重开战（1367年）迎来了一阵在葡萄牙、佛兰德和法国本土进行的小战斗，作战双方渐渐精疲力竭。

最初战争优势在英格兰方面，它是两个王国中比较团结、组织较好的一个。它的主要基于羊毛生产的繁荣和它在威尔士与苏格兰作战的经验为它在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础。法国行省的高度独立支配着英国的战略。爱德华三世于

1338—1340 年在低地国家作战就是为了取得佛兰德纺织品生产城市的支持，这些城市虽然从属法国国王，却与英国有着重要的商务联系。在 14 世纪 40 年代，布列塔尼的爵位继承问题使英国军队得以进行干预，甚至进驻若干城堡；加斯科尼虽然远远伸向南方，也提供了进入法国中部的通道。

不列颠群岛上的战争使英国政府有了用新的方法招募强有力的军队的难得时机。由订立合同的队长招募来的雇佣的、契约军队，补充并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这种军队比松散而臃肿的法国军队更为精干和可靠、灵活，纪律更严明。英国的重骑兵和善于使用长弓并在战争中使用防守战术的弓箭手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而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中能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巨大胜利（最引人注目的是克雷西和普瓦蒂埃的胜利）。海战居次要地位，因为海军的战术缺乏新花样和想象力。14世纪的指挥官往往没有 174 能力指挥海战，斯卢伊斯海战（英国于 1340 年取胜）是爱德华三世远征佛兰德的一次偶发事件。英国人从未保持一支永久性的舰队，但是法国国王学习他的同盟者卡斯提尔人的专长，后来在鲁昂修造了一些海军船坞，从而使他们最后在海上占了上风（1372年他们在拉罗谢尔附近的胜利便是证明）。

英国人对法国战争的投资是巨大和史无前例的。每次的出征都组织得非常正规，有时规模极大（例如 1346 年那次就有 10000 人）。财政上的花费是惊人的，在战争胜利时还能受得住，但是自1369年后，当英国的军事优势逐渐缩小，政府便采用新的更加不顾一切的手段，包括征收人头税。防御和征战的航运不能仅仅按传统的办法由南方五港①来履行义务，数以百计的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商船（例如 1347 年围攻加来时有 735 艘）被强征来服役。法

① 即黑斯廷斯、罗姆尼、海斯、多佛尔和桑德维奇，它们与温奇尔西和赖伊一起构成英国中世纪的海军防线。——译者

国人和卡斯提尔人在1369年后日益大胆地进犯，沿海的防务由南部和东部滨海几郡组织并由其他内陆诸郡资助，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防止温奇尔西、赖伊和其他港口遭到劫掠。战争的代价的确很高。虽然许多士兵在被征服的法国领土上过着享乐的生活，而且在战绩辉煌的年代赎金是有利可图的（仅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便定为500000英镑）。但是战时服役却使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工作遭到破坏；粮食、物资和装备的供给转到了完全破坏性的作战上去；羊毛和酒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不同寻常的是英格兰能从事这些海外冒险活动好几十年而未使国内感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它还要防守苏格兰边界，使威尔士平安无事并防止爱尔兰叛乱。这一成就多应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榜样和领导，他们两人都体现了贵族们所宣扬而为整个社会所钦佩的骑士品德。对于了解他父子俩并记载了他那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勇武行为的埃诺人让·弗鲁瓦萨尔来说，这位国王“英勇而高尚，自亚瑟王以来未曾见过像他这样的君主”。他的儿子显然是“最勇武之士和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他在父王爱德华三世去世之前一年于1376年亡故时，“人们为他高贵的品质深感悲痛”。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不像爱德华一世时期那样严厉，远比爱德华二世能干。

这些战争是英格兰社会变化、宪法发展和政治冲突的催化剂，要是没有它们，这一切就会发生得缓慢些。而且，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区一道，在14世纪经历了增加紧张和不安的人口和经济的波动。其后果是一系列的危机，它们突出地表现出国王与他的臣民（特别是那自认代表整个社稷的显贵）之间的关系稍一不慎便会失去平衡，并突出表明对个人负责的君主政体说来，国王本人是如何关键。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顾问们固然有才干，有决心，甚至有远见，但国王的固执己见和独断专行的性格却使他与他的有权势的

175

诸侯的关系十分紧张。1290—1297年间，有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神职人员由于国王在法国和不列颠诸岛的冒险活动常要缴纳新的、非常重的税款（在爱德华统治的前半期就有四次之多）。由于有人反抗，1297年的财产税只收到预期数的小部分（35000英镑）。国王还号召军队长期在国外服役。爱德华想压制反抗的企图使教士震惊并使商人恼火。一些反对爱德华侵犯他们宝贵的公民权的显贵，包括威尔士边境的贵族作出反响，他们又担负起自行任命的王国发言人的古老而受人尊敬的角色，于1297年而后又于1300年向国王陈述冤情。他们举起《大宪章》这面大旗来反对未经交税人同意的课税，并反对史无前例的高压强征。然而，当爱德华1307 176 年7月在坎布里亚郡沙制的伯格死于侍从怀中时，战时的种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当时他正要渡过索尔韦湾去苏格兰进行他的第六次征伐）。他遗赠给他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的是离胜利结束尚远的开销极大的北部战争和君王和臣民间信任日益减少的、政治上不安定的英格兰。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项当务之急在以后两百年的公务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并且对王国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内聚力和经济的繁荣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了避免王权遭到进一步的危机，新的国王需要具有特别的机智。

机智并非爱德华二世的显著品质。他童年时没人疼爱，少年时受到父亲的冷落，即位后又面临着没有解决的种种问题，于是便向野心勃勃的宠臣如彼得·加瓦斯顿和休·德斯潘塞寻求意见、友谊、甚至感情，而这两人并不值得国王如此信任，许多贵族对他们两人的权势感到愤懑。这些事实，再加上大贵族（由兰开斯特伯爵 177 托马斯领导）决心从爱德华二世这儿取得爱德华一世不肯批准的让步和改革，就使治理一个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兰西面临挫折的王国的可怕困难变成了争取政治改革和个人飞黄腾达的斗争。扩充的更加具体的加冕宣誓（1308年）使新国王必须坚决遵

守英国的法律、习俗和大贵族为限制国王行动自由而于1311年拟订的法令；这些法令为取得广泛支持和赞同而在议会中宣布了。爱德华二世具有他父亲一样的固执（虽然没有他父亲的才能），加瓦斯顿被谋杀（1312年）则使这一性格变成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绝不受谋害他朋友的人支配。与此同时，国王的臣民所承担的战争和防御的负担并不亚于爱德华一世征战之时，而且这时由于1315至1322年间连年歉收和牲畜生病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贫困和不安。内战（1321至1322年）和国王被废黜（1326—1327年）是国王与被统治者之间未能为相互利益进行合作的灾难性的后果。爱德华在约克召开的议会上公开谴责1322年的法令，并在1322年在伯勒布里奇打败他的对手后，处死了兰开斯特伯爵。到1326年，废黜爱德华，把王位交给他同名的儿子和继承人看来已成为该平庸、暴虐、失败并引起内乱的政权的唯一选择。这一可怕的步骤得到了王后伊莎贝尔的默许、爱德华王子的默然同意和显赫贵族及其他人的支持，并在议会中显示出来，是史无前例的；自诺曼底人征服以来就没有哪位英国国王被废黜过。因此，1327年，人们竭尽全力来隐瞒这隐瞒不了、辩护这无法辩护的事。可怜的国王泪流满面，几乎晕倒，在威胁之下被迫同意自己退位；议会的会议则被用来把这事的责任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开去。尽管爱德华之子的即位确保王权世袭的原则不受侵犯，但神授王权的不可侵犯性遭到了破坏。

虽然爱德华三世在1327年只有15岁，他不久就作了父亲而且证明自己远比他父亲能干，敏于觉察权贵诸公的态度和要求——他事实上与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在战争和接受贵族社会骑士的义务方面。与此同时，新英王制订的宏伟而众所周知的对法国计划引起了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诸岛和加斯科尼进行冒险活动时所引起的类似问题。如果这些计划最终失败了，它们对英国的含意很可能与在爱德华二世时所显示出来的一样。1337年长期战

争的爆发意味着征税额将增加到超过爱德华一世时期的水平，而爱德华三世也像爱德华一世一样对商人、银行家和地主毫不留情。此外，国王不亲临前线，不深入他和他的权贵们津津乐道的战斗之中，这便向通常在国王的亲自指导下工作的老练的行政管理人员 178 提出了问题。爱德华关于国外政府的法令（1338 年发布于泰晤士河畔的沃尔顿）引起了以国王和他在法兰西北部的顾问为一方和以留在英格兰的枢密顾问官为另一方的冲突。有的人甚至担心，如果战争胜利了，在国王爱德华的心目中，英格兰的位置将次于法兰西王国。因而，1339至1343 年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权贵、商人和下议院都对国王表示抗议。人们说服爱德华对权贵、教士和一般百姓采取谨慎和体谅的态度。由于爱德华三世通情达理、务实、自信而不高傲，最终的和解才有可能达成，人们对国王的信任才得以重新建立，这种信任自 13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变得难以觉察了。他任命大贵族们欢迎的人为大臣，迎合议会自高自大的特点，并与臣民之间发展了一种明显的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支撑着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和在法国的野心达1/4世纪之久。此后，尽管英格兰卷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战争，再也没发生过危机。

14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的情况有巨大的差异。对于当时活着的那一代英国人来说，在法国的重开战（始于 1369 年）和在爱尔兰境内与苏格兰边境的小规模的消耗战屡遭失败是令人不安的，在英格兰享受了战争的赢利并免收税款十年之后又重新征税是令人愤懑的。南部沿海港口经常遭到袭击，海军不能经常控制海峡，这样便危及贸易而使商人烦恼，而在法兰西的昂贵的骑行有时甚为壮观，但却很少获利。然而，1375 年英国政策的突然逆转，包括屈辱的对法休战和向不信任的教皇付款只不过使英国人感到羞辱和愤怒而已。此外，王后之典范菲利帕王后死(1369年)后，爱德华三世日趋衰老，精力衰竭，判断力受损。“黑太子”也开始受到战时鞍

马劳顿而种下恶果的影响，事实上，他于1376年6月先他父亲去世。然而，英格兰居民所承受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并未减轻。人们，特别是下议院对国王的顾问和官吏是否老实和称职提出了质疑。加之当时教皇和教会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反教权之风高涨，强烈抗议之声使爱德华三世的教士大臣于1371年被解职，另外有些官员被指控贪污腐化，甚至叛逆谋反。又一次政治危机发生了。在1376年的“可嘉议会”这一迄今最长最戏剧性的大会上，下议院在上议院面前以新奇而高效率的程序对那些据认为腐败无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国王的情妇艾丽斯·佩勒斯——进行了指控，这一方式使居高位的人此后必须向公众说明他们的公务活动。


爱德华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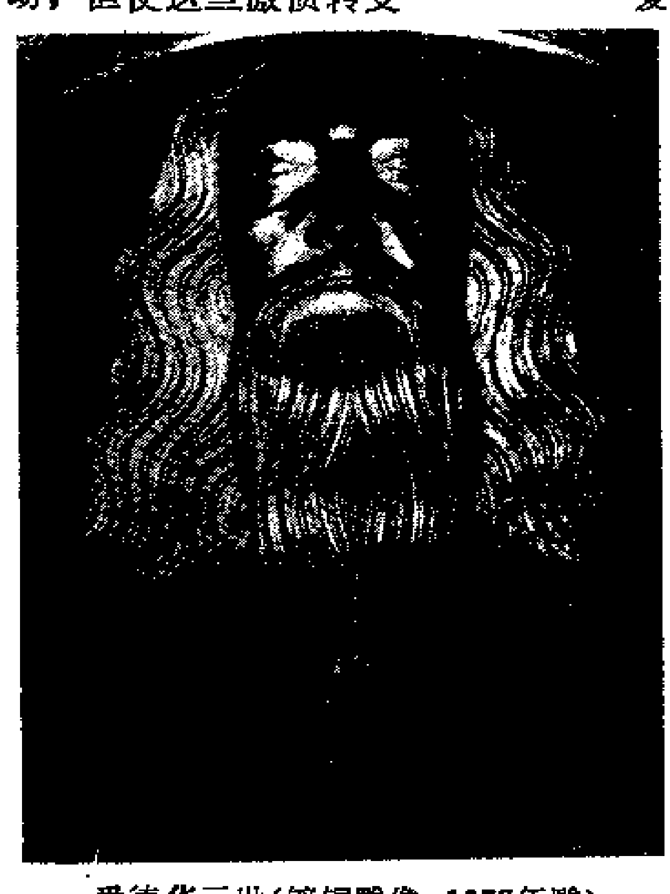
180

这次危机在国王爱德华本人于1377年6月去世时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太子”仅存的唯一儿子和继承人理查德二世（1377—1399年）继承了王位，他年仅十岁。英格兰又面临1066年以来第二次、1216年以来第一次幼主继位。前一次曾围绕着年幼的亨利三世发生了一个政治上的动乱时期；1377年后显现出类似的情况，它对英

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农民的叛乱(1381年)的兴起有一定的作用。1377至1380年为资助战争而征收了好几次人头税。这些税比通常的税率高，1379年的那一次被称为“邪恶的津贴”。它们点燃了东盎格利亚为反对强令人们服从的收税人和法官而掀起的暴力行动，但使这些激愤转变为八方呼应的叛乱的则是打不赢的战争的旷日持久的混乱、一次次瘟疫的恶劣影响和反教会的时代气质。起义者希望年轻国王理查德能够进行补救，但落了空，尽管他在1381年夏在伦敦面对起义者却表现出相当的勇气。



爱德华二世头像



爱德华三世(镀铜雕像，1377年雕)

这时理查德年仅14岁，统治集团中贵族之间的角逐仍在继续，国王的叔舅们也不示弱。这一情况，再加上在法 181

国未能获得进一步的军事成就，损害了以理查德的名义治理英格兰的委员会的声誉，甚至有损国王本人在他的臣民心目中的地位。理查德也证明是位固执己见的君王，他的不安全感引导他依靠一些不值得宠信的宠臣，这些人使人联想起爱德华二世的亲信。在他年长后，他感到童时的随从和王室已嫌不足而理所当然地要求扩大。他的朋友和同伴有的新近才成为贵族，国王却牺牲他不喜欢的别人（包括他的叔父格洛斯特）而慷慨地庇护他们。1386 年议会和一些豪门贵族攻击理查德最亲密的几个伙伴，甚至威胁国王本人。理查德以金雀花王朝特有的固执拒不屈服。这导致五位"弹劾"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兄弟德比伯爵）对他的诸顾问进一步提出公诉或上诉，1387 年 12 月又在拉德科特桥发生了一场厮打，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败。在意义重大的"残酷议会"(1388年)上，国王被迫接受贵族的惩戒，这事如果能延续下去，将极大地改变英国君主政体的性质。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所引起的紧张关系和英格兰豪门贵胄的野心又一次地引起了一场十分严重的政治和法制的危机。世袭君主制一百多年来经历过这类危机而大体上没遭伤害，但是对国王顾问诸公的批评却达到了新的有效水平，而层次更广的舆论也对事件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便是正在改变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更深入变化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因素。

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财富是土地，大部分英国人都从事土地的开发利用：种植谷物，生产乳制品并饲养牲口。英国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是间接地立足于土地之上的，往往从很大的羊群中生产出欧洲最优质的羊毛：格洛斯特市的圣彼得大教堂到 1300 年时拥有 10000 多头羊，而当时英格兰的总羊数估计介乎 1500 万到

1300 万之间。最富裕的地区是中部和南部诸郡的低地和微微起伏的丘陵地带，并延伸到威尔士的边境和南部沿海地带。其他工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力上不及纺织业，但科尼什的锡矿开采是世界闻名的，而且锡还向欧洲出口。铅、铁和煤的开采量很少，不过从泰恩谷地和斯旺西邻近地区的沿海运煤线反映了家庭和工业用煤不断增长。至于财政和商业，经济得之于它们的很少，尽管它们到近代已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源泉。英国商人（赫尔的波兰人除外）无法与意大利的国际银行家竞争，这些人在伦敦设有分行，尽管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迟迟不肯委托这些意大利公司来处理他们的战争债务。英国的商船，除在沿海水域外，一般都远远落在外国航运的后面，但是向加斯科尼运酒和向低地国家运送毛织品却日益落入英国商人手中，并使用英国船只。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有 1000 多个市场和集市（1350年要比过去还多），主要为半径 20 英里之内的当地公众服务。这些小的市镇和村庄（包括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大部分与边远的内地连在一起，内地的富裕居民往往在市镇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参加行会，购买或租赁市镇住所，担任市镇职务。少数市镇，包括某些港口，经商的范围更大更广，如什鲁斯伯里的商人经常旅行到伦敦，首都和加来（1347 年后）的商人为寻找优质羊毛也前往威尔士的边境。布里斯托尔由于与波尔多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很快便变成中世纪后期塞文河畔货物的集散地；约克、考文垂特别是伦敦则成了国际贸易的中心。

从这种财富中衍生了个人、社会机构和国王的繁荣。最大的地主是世俗贵族（人数少，像“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主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团体。在 1300 年这些大地主仍能从市场上获取相当优厚的利益，因为上一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市场保持繁荣。物价上涨，土地收入丰厚；格洛斯特伯爵于班诺克本亡故（1314年）后，他

的产业估计每年值6000英镑略多一点，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小修道院的产业1331年的全年总收入多于21540英镑。因此地主都直接开发他们的产业并亲自关怀其经济的有效管理。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坚持不让，向佃户榨取愈来愈多的地租并在领主法庭仔细记下出租的土地附带的种种义务。从土地得来的这些财富正是贵族的政治、行政和社会权势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在几个郡，在威尔士和爱尔兰有产业；例如，赫特福德和埃塞克斯伯爵汉弗莱就在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顿郡、赫特福德郡、白金汉郡以及威尔士边境的布雷坎、亨廷顿和卡尔蒂柯特都继承了财产。土地同样是绅士财富的基础，虽然只限于局部的、郡的水平上，同时土地也给予教会的地主一种尘世的权威来加强他们对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控制。这些财富也可支持某些全国性的要求和野心，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就是一例，他是当时全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84 1300年农民生活在地少、由于地主的严密控制经济上向上发展的机会受到限制的状况下。物价很高——1270年以后麦子的价格一直比这一世纪早期高——除了吃饭、穿衣和购置设备外，省不下几个现钱。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低，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的购买力都被压低了，一个木匠一天只挣3便士(不供食物)，一个工人一天挣一或一个半便士。人们向地主及其官吏抱怨、诉苦甚至报之以暴力，抗租和拒服习惯性劳役之事屡见不鲜。

1300年的商人，最明显的是羊毛出口商和酒的进口商，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兴旺发达起来，这市场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特别是在地中海的海路开放后又通向北部意大利。1304—1311年间羊毛的出口每年平均是39500包（每包至少有250只羊的一次剪毛量），这些货物只有30%至40%是由外国人装运的。英国贸易中逐渐增长的对外国商人的反感反映了本地(或已归化)商人的自信和自主精神。爱德华一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订了立法

(13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了方便依法收回欠债，这对扩大贸易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战争到来时，商人总是率先反对沉重课税，特别是1294年的"恶税"和强迫征用他们的船只。

国王是最大的地主，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获得一个公国以及兰开斯特家族的产业于1399年与国王的产业合并之前就是如此。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统治时期国家税收的增加使得国王也可以支取地主和商人的私人财富。就连农民也不能幸免，正如爱德华一世时期歌唱民歌《庄稼汉之歌》的人所评述的那样。而后，在1327年，凡每年有价值不下于10先令的货物者必须付1先令8便士的税，而境况较差的人无疑地被人把负担间接地转移到他们身上了。国王由于专心致力于战争而严重地依赖臣民的财富和忍耐。如果财富停止增长，或如果个人和团体的繁荣有了漏洞，那么国王的战争卷入可能最终超出他的财力，他的臣民的忍耐也可能消耗到危险的极度。



一位肯特农民(1390年左右)。他不得不赤着的脚、扛着工具到六英里外的大主教宫劳动。

到14世纪中期时，"高利农作"的繁荣时期几乎已经结束。价格下跌，致使为市场生产农作物获利不多。工资在上涨，农业劳工比手艺人更甚，雇用妇女也没好

处，因为她们的工资与男人一样——而且在逗熊戏中她们的工资比男人还多！大规模农作失去某种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丁兴旺的情况已经结束并全速地走向反面。由于劳力市场缩小，工资上升；由于人口下降，对粮食和供应的需求也下降，物价也随之下降。

185 大约在13世纪末，英格兰的人口到达它的顶峰，可能超过400万。那时没有足够的土地保证所有的农家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人口众多和低生活水平必然意味着贫穷、饥馑和疾病。14世纪最初几十年过分使用土地和特别糟糕的气候所引起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使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贫困线以下的人生活更加恶化。歉收对于没有充足贮藏设备的社会来说简直是场灾难；吃的不够而又没有现金购买价格高得多的粮食。1315、1316、1320和1321年的收成特别糟；1319和1321年牲口和羊的瘟病传得尤其快，而剑桥郡拉姆齐寺院的庄园花了20年时间才恢复过来；1324—1326年英格兰部分地区洪水严重，洪水在肯特郡淹死数以千计的羊群。饥饿与疾病蔓延，在哈莱索文庄园（伍斯特市）15%的男人于1315—1317年丧生。农业的混乱到处可见，谷价猛涨（在哈莱索文，1315—1316年每夸特从5先令$7\frac{1}{4}$便士涨到26先令8便士），羊毛的出口也陡然下降。然而这只是一次暂时的灾难，英格兰在14世纪20年代便逐渐恢复过来了，但穷人的不堪一击暴露无余。

186 持续更长、影响更深远的是瘟疫。它的第一次袭击于1348年发生在南部英格兰，自16世纪后期人们称它为黑死病，而当代人称它为"高死亡率病"。到1349年末，它向北传播到苏格兰中部。当时牛津郡一位牧师杰弗里·勒贝克描述先是一些老鼠为患的船只把瘟疫带到港口，然后蔓延开来，而人们无力诊断它的原因，也没法对付它的结果。

最初它夺去了多塞特郡诸港口几乎全部居民的生命，然后使生活在内陆

的人丧生，并从那儿可怕地传布到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远达布里斯托尔，而后格洛斯特的人不让布里斯托尔的人进入他们的地区，大家都认为在死于瘟疫的人中生活过的人其呼吸是会传染的。但最后它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则猖獗于整个英格兰，以致无论男女，每十人中能活下来的不到一人。由于墓地不足，连田地也被挑选来埋葬死人……无数普通人和大批僧侣、修女和牧师谢世而去，究竟有多少人只有上帝知道。瘟疫袭击的主要是年轻力壮者……这次大瘟疫〔8月15日〕自布里斯托尔开始，大约〔9月29日〕传到伦敦，在英格兰横行了整整一年，其势凶猛，以致许多村庄没留下一个活人。

当这巨大的灾难使英格兰夷为荒原的时候，苏格兰人正幸灾乐祸，以为他们就要实现反对英国人的宿愿了……但是乐极生悲，上帝的怒剑丢下英国人后又把苏格兰人驱向疯狂……次年，它像对待英格兰人一样骚扰了威尔士人；最后它又，打个比方说，扬帆前往爱尔兰，并令住在那儿的许多英格兰人丧生，但却不大触及生活在山上和高地上的纯粹爱尔兰人，但到了公元1357年它却意想不到而可怕地也到处毁灭他们。

黑死病使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到1350年，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由于致人死命的鼠疫以及战争期间的种种其他灾难”而财政极端困难，卡莱尔则“由于最近在那一带流行的鼠疫以及（苏格兰人的）经常袭击而变得荒芜和异常萧条”。甚至到了1356年，西福德（苏塞克斯郡）据称“由于瘟疫和战争十分荒凉，住在那儿的人十分稀少和贫穷，以致无力交税和防卫市镇”。塔斯莫尔（牛津郡）也大受瘟疫之害；1358年上面批准把那儿的田地改为公园，因为佃农已全死去，该村已没有交税人。然而黑死病的影响并非直接的或永久性的灾难。生活在里辛的一威尔士人的行为并非不寻常：他“因为贫穷在鼠疫时丢下土地走了”，但到1354年回来时“获主人恩准再租原来的土地并服同样的劳役”。无论如何，在人口较多的地区，死去的佃农有人顶替，地主此后20年收入的减少最多不过10%，此后瘟疫的一再复发，特别是1360—1362、 187

1369 和 1375 年的发作，留下了持续的影响，虽然这几次的爆发带有局部性和城市性。人口不断下降，到 15 世纪中期大约只有 250 万，甚至更少。

对于那些幸免一死的人来说，14 世纪后期和 15 世纪的生活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可怜。对于许多农民来说，现在已变成一个有机会、有雄心并且生活富裕的时代：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能以愉快乐观的情绪来描绘他的朝香客，而不是把他们置于阴暗失望的气氛中。由于劳动力市场缩小，农民常可摆脱多少世纪以来的无能为力状况，压低地租并要求较高的雇佣工资；由于物价猛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较富有而有志气的农民则租得更多的土地，把多余的现金用来向同伴们放债，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还用来建造石砌的房屋，这在农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88 另一方面，地主却面临严重的困难。为市场生产的小麦、羊毛不及以前那么赚钱，英格兰的耕地缩小了，农业的投资也减少了。工资和其他开支上升，放弃"高利农作"技术而把小块土地租给有事业心的农民看来更为可取。一个又一个村社完全荒芜了（即英格兰的"湮没无闻的村庄"），其中许多由于人口锐减和长期作战的双重苦难已无人居住；在英格兰地区，"湮没无闻的村庄"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的诺森伯兰以及经常遭到敌人抢劫的怀特岛。到 15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东盎格利亚是自 15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的人口才开始明显地上升，而且可能要到 17 世纪才能重新达到 1300 年的水平。

189 14 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经济明显地收缩了，但却没有普遍地萧条。当人们开始适应瘟疫所引起的心理上的震惊时，社会也相当好地适应了，虽然不是没有混乱。地主的适应最为痛苦，他们以几种方式作出了反应，并非每种方式都是为了保卫国内和平。有的，包括像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长那样思想较为保守的教会地主则采取

高压手段，甚至压迫和敲诈勒索，来保持他们对尚存的佃户的控制。有的为了保住他们的收益而拼命开发产业，像莫蒂默家那样在威尔士占有巨大产业的豪门贵胄世家的苛刻态度对格林杜尔叛乱(1400年)的爆发可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些人，如15世纪后期的几位白金汉公爵采取了更加有效的管理方法来增进他们产业获利的可能性。还有些地主看出把农田和公地围起来放牧和养殖花钱较少，是支撑那摇摇欲坠的地租簿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15世纪后期圈地在北部和西部发展得特别快。地主无论大小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起来，“控制雇工的怨恨，他们懒惰，在鼠疫之后没有过高的工资就不肯服役”。爱德华三世关于恢复瘟疫前的工资水平并阻拦自由劳动力流动的法令(1349年)很快便变成了议会的立法(1351年)。而且，身居要职的显贵或绅士还能获得补充财源：以恩赐土地、金钱和职位等形式所给予的王室庇护(如国王亨利六世的亲戚博福特家族便深知个中奥秘)；家庭的财产继承，如约克公爵理查德(1460年亡故)就因此而变成他那时代的首富贵胄；以及与资财雄厚或富裕的寡妇联姻。还有的因为替国王效劳，包括服兵役而发了财。亨利五世一次又一次惊人的胜利使这些人可以用战俘换得赎金并可从北部法兰西获得土地，到1448年白金汉公爵还指望从法国的佩尔西县得到每年多于530英镑的收益。有的把15世纪中期效劳和作战得来的钱以一种豪华的方式用来建造堂皇而精致的城堡；请看约翰·法斯图尔夫爵士在凯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或赫伯特家在拉格兰(格温特郡)的巨大的堡垒宫殿，或拉尔夫·博蒂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萨德利的城堡。这些财富和收入促成了一些新的贵族家系，它们像过去几个世纪的贵族世家一样有权有势，而且像北方的内维尔家和珀西家以及西方的斯坦福家和莫蒂默家那样常常盘踞一方。

英国的市镇和工商业也发生了类似调整。生产羊毛仍然是畜

牧业的主要任务，但在14世纪羊毛工业的模式已发生变化。部分地由于战争及其对佛兰德工业的破坏，部分地由于英国的爱好和需要的改变，毛织品加工业把以前供出口的日益增多的大量羊毛吸收了过去；英格兰东部如波士顿、林恩这样的许多羊毛港口开始衰落。像斯坦福和林肯这样的主要毛织品加工业中心已被一批新的中心抛在后面，这些新的中心位于傍依急流的小溪和河水的村庄或小镇，并经办羊毛蒸洗厂。约克发现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已超过它；再往南，东盎格利亚、西部地区，甚至威尔士都发展了繁荣的毛织工业，它们以布里斯托尔为西部的主要输出口。伦敦却独具一格：在中世纪的英国城市中只有它在14世纪后期人口大约超过了50000。它是王国的货物集散地，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贸易的末端；它把移民从内地各郡和东盎格利亚，特别是东中部吸引过来；它的郊区正沿河向威斯敏斯特缓慢发展。这些变化使许多市镇也像乡村一样不得安宁，市镇上的市民寡头统治集团则力图在这变化的世界中维持他们的控制。英格兰的地主便这样还击经济危机，但却常常因此而与日益坚持己见的农民关系紧张并建立了城市区社。

14世纪英格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严峻考验的累积影响在农民叛乱(1381年)中再生动不过地表现出来。就其剧烈程度、历时之长和响应之广而言，它是异乎寻常的，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却与几年后接踵而来的谋反和起义不相上下。1381年广泛的暴力行动是由于又一次的人头税引发的，这次每人1先令，是1377和1379年的税款的三倍。人民逃避交税，对收税官吏和进行调查的法官使用暴力，最后在1381年6月则报之以暴乱。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以及市镇居民和伦敦人参加进来；东盎格利亚生产谷物和羊毛的农村早就感受到经济紧缩、混乱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的全部影响。而且叛乱者对14世纪70年

代政治上的处置不当和最近在法国的悲惨的战绩感到失望，他们还害怕敌人侵袭海岸。尽管异教对叛乱不起主要作用，但对英国教会教义和组织的过激批评却使许多人早已倾向于谴责那看来已经失职的组织。

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向新国王呼吁（叛乱者的口号是“与理查德国王和忠心耿耿的平民一起”）为解除冤苦提供了最好的希望，伦敦的平民提供大批的潜在同情者。叛乱者于是从埃塞克斯和肯特（那儿出现了瓦特·泰勒和牧师煽动者约翰·巴尔两位领袖）汇集伦敦。他们打开牢门，抢劫国王大臣的家宅，洗劫伦敦塔并想恫吓理查德二世，使他作出广泛的让步，这些让步如果实现便会砸碎农奴制残余的锁链并彻底改革教会和国家的土地占有。但是叛乱缺乏计划和组织，只不过是不满情绪的自发的爆发。到6月15日，叛乱者便分散回家了。

战争继续，1390—1490 191

1389年，当理查德二世22岁时，他宣布：“我已到了管理我的家、我的王室和我的王国的年龄。因为目前我的处境竟比我国最低贱者的处境还糟，这看来是不公平的。”1386—1388年的事件（当时上诉的贵族们想支配国王选择朋友和大臣并控制他的政治活动）破坏了记恨的国王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人中，包括王国中某些最显赫的贵族，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产业加起来相当于威尔士、柴郡和康沃尔郡较为边远的国王特区的面积。然而在1389年，国王却谨慎地表明他是英格兰的国王，并以他的智慧和勇气处理前一世纪先王们的野心和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在政 192 治相对稳定时期，理查德以他的王室和边远的特区，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为基础，小心地组成了一个保王党。阿伦德尔伯爵被没收的领地加强了威尔士边境的王权，那儿的贵族大多桀骜不驯。

1394至1395年理查德对爱尔兰进行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征讨，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国国王的首次征讨，它成功地给那儿的英国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以巧妙的刚柔相济的方式使盖尔的和盎格鲁—爱尔兰的贵族就范；理查德甚至可能打算完成对该岛的最后的、拖延已久的征服。他这次的冒险活动确实加强了他在又一王家领地的权力并显示了他的王室组织和资财能作出怎样的成就，虽然只是暂时的。对苏格兰，自英国在奥特本战役(1388年)中失败以后，理查德便采取了支持持异议的贵族的较为传统的做法并计划与之作战；但是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品尝和平的甜头。1396年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和理查德与瓦卢瓦王朝的伊莎贝尔的结婚中止了一场更为消耗精力的战争；如果按原来的打算把军事对抗放到1426年，那么它将是百年战争中最长的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来恢复由于14世纪70和80年代个人和政治的弱点而遭到严重损害的王室政府。为了这一目的，仪式和生动的象征手法被创造性地用于王室宣传。

理查德富于想象力，精明能干，有指挥才能。他的其他品质与国王不大相称。他在幼年受到的教育和青年时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以致过分自信，缺乏分寸和独断专横。他对朋友任意挥霍，对敌人则反复无常，沉默寡言，严厉苛刻，1397—1398年他放逐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杀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后又放逐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由于他无情地挥舞君王个人权利的旗帜(他为自己的摹写的碑文中说“他打倒那些侵犯王权的人”)，他在位的最后两年被人公正地称为暴君。他还说服教皇对“图谋不轨、有损王权、王位或我们的自由或恶意诽谤我们个人”者要以逐出教会相要挟，同时理查德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还答应在必要时请法国人协助对抗他自己的臣民。1399年他再次征讨爱尔兰，给予原德比伯爵、现为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的亨

利·博林布鲁克以可乘之机，他返回英国，恢复他的职务，并收回最近被理查德夺去的父产——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国王的手法超出了英国法律和习俗的范围，也超出了他的较为伟大的臣民的容忍限度。但是他那年晚些时候（9月29日）的被废黜也使他迄今最始终如一地致力于解除英国人的战争负担的努力宣告结束。

废黜理查德二世是重大的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1399年的情况在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同的。自狮心王理查德辞世之后，193 英国国王结束其统治时没留下儿子和继承人这还是第一次，因此王国又面临争夺王位的可能性。1216年后的习惯法赋予长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即令这可能意味着一位童子国王即位（如亨利三世和理查德二世本人就是）。如没有长子由谁继承王位尚无章可循。1399年按血统应在以下两人中挑选：一位是七岁的马奇伯爵，他的祖母是爱德华三世次子莱昂的女儿，另一位是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爱德华三世第三子约翰的儿子。博林布鲁克在得到为理查德疏远的珀西家族支持后便夺取了王冠。但是在理查德二世被废黜和监禁的特殊情况下，无论是马奇还是博林布鲁克显然都提不出较为有力的理由。博林布鲁克的歪曲、隐瞒和辩护都不能掩饰政变的真相。因此，正像在12世纪一样，王朝不稳定的因素已注入英国政治，它将在下一世纪引起国内混乱和国外的阴谋与干涉。

同时，英格兰不能逃避它以前企图征服不列颠岛上“克尔特”人的后果。在理查德二世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既然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地化显然已超出它的财力，那么为保障王国的安全，需要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事实上，英国的一些国王已放弃了在苏格兰和大部分爱尔兰的宗主权要求。在15世纪，部分地因为在法兰西的战争又起，部分地由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年）和1450年以后英格兰内部的麻烦，他们对苏格兰处于防御地位，

苏格兰甚至在1419年派出大量增援部队援助法国人。英格兰俘虏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短时间内(1406—1424年)阻止了边界上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为大胆，他们希望收复罗克斯伯勒城堡和贝里克，并于1460—1461年达到了目的。袭击，小规模的海战，海上掠夺，还有失效的休战协定，加在一起构成了没完没了的“冷战”状况。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1453年)并在英格兰建立约克政权(1461年)以后才真正有目的地寻求较稳定的关系。尽管法国人担心害怕，英国人偶尔也在苏格兰打仗，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1482年夺取了贝里克，1475年签订了盎格鲁—苏格兰条约，1502年签订了“永久和约”。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转变，尽管在边界上人们继续靠抢劫兴旺起来，扰乱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英格兰对与爱尔兰关系上达到的均势不大满意，盖尔居民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却较为满意。理查德二世向爱尔兰大胆提出的王权要求归于失败，中世纪时期再也没人重复这一要求。国王在爱尔兰的宗主权纵然有英格兰给予的大量资助，却一直很软弱，盖尔人享受着独立和相对的繁荣，盎格鲁—爱尔兰人珍惜他们自己的权利，便与其盖尔对手达成协议。英国政府的主要考虑是安全(“爱尔兰是英格兰的支撑和顶柱”，一位当时的人在15世纪30年代说)，只有在威尔士叛乱(1400—1409年)期间和15世纪50年代当安全受到威胁时，英国政府才对爱尔兰事务表现出较大的关注。结果是内部政治分裂和脱离英格兰。较大的盎格鲁—爱尔兰贵族是政府可以依靠来保持其微弱权威的唯一力量：大部分英格兰人甚至不愿到爱尔兰去，从都柏林进行有效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要进行征服又根本没有钱。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像奥蒙德伯爵和基尔达尔伯爵这样一些大贵族，即令政府要驱逐他们也不可能。盎格鲁—爱尔兰关系的均势是达到了，但英国失去了它对爱

尔兰的有效控制。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的传统政策带来了问题。明摆着的是，当 195 地人民的愤怒在 14 世纪后期不安定的经济气候下，集中对准了已英国化的特权城市和主要来自英格兰边界诸郡或更远诸郡的政教官员。这种愤怒自 1400 年便爆发为欧文·格林杜尔叛乱，而在这不快的经历之后，大部分英国人对威尔士心存疑惧。一位当时的人劝说人们：

耶稣基督一定要我们当心威尔士，
要它别让我们孩子的孩子啼哭，
也别让我们哭，如果它不小心
来到这里；多少日子以来
人们一直害怕那儿的叛乱……

因此威尔士引出了一个安全的问题，而且还是个近在身边的问题。它不仅为海外敌人提供登陆（如在格林杜尔叛乱高潮时和在玫瑰战争中多次发生过），而且那里还深受管理不当和暴乱之害。亨利五世在叛乱瓦解后便立即刚柔相济地对付威尔士人并命令边境贵族照料好他们的领地。但是后来无论国王还是边境的贵族都不能坚持强有力的统治，而威尔士的地主，英国乡绅的挚友，愈益表现出缺乏责任心。然而国王和边境的贵族需要这些威尔士地主治理威尔士，因为国王已陷入内战之中，而到 15 世纪，少数的边境贵族由于收入减少和威尔士人的敌对态度已不住在他们的边境领地上了。这个地区到 1449 年“政务失误与日俱增”，因而这个世纪的大半时间中出现了秩序（因此也是安全）的问题。后继的英国政权，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都想维护威尔士的和平、改进政府的工作并控制当地的地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边界诸郡和王国稳定局面的威胁。在本世纪的前半叶，目标是依靠王室官吏和边境贵族克尽职责，来加强对现存的法律执行机构的控制。最终，特别是爱

德华四世采取了更为激进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他把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于 15 世纪 70 年代安置在勒德罗，并授予他督管威尔士、边境领地和英格兰边界诸郡的权利。这是一个大胆的权利下放之举，它使日后的亲王对整个威尔士负有责任。

英国贵族（从低而高的顺序是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地区性的权力对王国的安宁和王室政府的成功至关紧要。他们在 15 世纪变成了一个有明确界限的、世袭的社会集团，实际上成了坐在上议院的议会贵族的同义语。国王可以册封贵族（如亨利196 六世和爱德华四世就毫不犹豫地做过），也可以提升已有的贵族。国王的庇护对保持贵族的财富和势力是很重要的，不了解这一点的君王就可能与他们的贵族发生严重的冲突（理查德二世和理查德三世吃了苦头后才发现）。他们虽然数目很少——最多 60 个家族，在十年内战后也许只剩下一半——但很重要，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威尔士边境拥有独立的领地，或如内维尔和珀西两家那样支配着北方，而且因为他们对英国各郡拥有社会的和政治的权柄。较之国王的官僚政治和文职官员，他们是更有效的支柱。这一点在一个有三代王朝以武力夺取王冠、国内外都有大规模军事卷入的世纪尤其如此，而贵族在其中作出了明显的贡献。贵族们直接感到败于法国并失去那儿的英国领土的羞辱，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力争避免这种羞辱。

这些贵族与英格兰的绅士阶级——6000 到 9000 名士绅、乡绅和骑士，这些人寻求贵族“好老爷”，并报之以“忠实的效劳”——有共同利益。贵族给予采邑、土地和职务，绅士阶级则提供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1454 年白金汉公爵把他的徽章发给他 2000 名侍从。市镇和市民也是这种利益与效劳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历史学197 家不客气地称这种关系为“卑鄙的封建主义”。贵族、绅士和市民在议会的两院（上议院和下议院）中的行为是这种连锁关系的另一个

方面。

贵族及其依附者之间的合作对于15世纪篡位的几个王朝特别重要。兰开斯特王朝的维护者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为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所创建的利益网。冈特每年收益12000英镑，是中世纪后期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他的广阔的地产和恩赐权现在都由他的后代、英格兰的几位国王（1399—1461年）任意处置。约克王朝的国王们(1461—1485年)，作为1399年继承王位的另一可能的候选人马奇伯爵的继承人，除威尔士边境的领地外，财产不那么多。他们未能罗致大部分贵族的支持，这对于一个只存在了24年的王朝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亨利七世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和约克，而且也继承了内维尔、博福特及内战中其他死亡贵族的产业、地方影响和恩赐之权，从而建立了对英国贵族和绅士的最坚强的统治。

第一个篡位者亨利四世的有利条件是被废黜的那位国王已疏远了许多人，而同情他的贵族已经信誉扫地。亨利的魄力、坚毅和和解能力(更不要说他的宽宏大量)以及他与兰开斯特派的联系使 198 他能够克服英国国王面临过的最可怕敌人的联合进攻。理查德二世的死硬的支持者在温莎城堡暗杀亨利及他的几个儿子的阴谋未能得逞，叛乱者被抓获并在赛伦塞斯特处死（1399年11月）。来自理查德支持者的这种危险导致理查德本人不久后神秘地死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和伍斯特伯爵是1399年国王的真正缔造者，到1403年，他们对国王想要说服各种意见的打算感到十分失望，就预谋了几次起义。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性急者亨利，在前去参加威尔士叛乱者的途中在什鲁斯伯里附近被击败并被杀死。珀西家族的一员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结成联盟，掀起了英格兰北部的叛乱，但亨利又迅速地采取行动并于1405年处决了那位大主教。诺森伯兰在苏格兰人援助下进行的最

后一次进攻在布拉姆霍姆荒原被击溃，伯爵当场被杀(1408年)。

威尔士的叛乱较深地扎根于一个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之中。人民饱受瘟疫袭击之苦，深受一味维护自己的收入而把奋发的威尔士人拒之于机会大门之外的外国地主的压迫，再加以对理查德二世被废黜感到愤慨，于是起来造反(1400年)。叛乱动机各异，威尔士社会分裂而不统一，致使这次行动并非纯粹的爱国的民族起义。然而这却是亨利四世面临过的最严重的威胁，为了平息它，花钱也最多。欧文·格林杜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地产出发，一路损毁城堡和英国化的市镇。他和他的游击队利用重峦叠嶂的地形骚扰敌人，把他们拖垮，然后消失"在岩石和洞穴之中"。他们的成功在于叛乱时间长、无决定性战役和使征讨毫无结果。格林杜尔有时可以集结到8000战士，他还可以从法国获得援助(1403年)，也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克尔特"同胞得到帮助(1401年)。他在1404和1405年的"议会"中提出了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的威尔士独立的宏伟计划(这些目标又过了四个世纪才最后实现)，而他与珀西家族结为联盟是想把它作为分裂亨利四世的国土的前奏。

由国王和他的长子亨利王子率领的英国军队开展了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年)，其战略与在法国采取的相似：钳形运动，毁灭性的骑行军，并配合以陆上和海上的供应。战争的负担最沉重而经常地落在边界诸郡和中西部地区，国王一再命令那些地方派遣武装战士去威尔士。这些军队数目大，有4000人之多(而派往法国的很少超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的服役不及在法国较为茂盛的田野中受欢迎；要筹集足够的现金给士兵和驻军发军饷相当困难，而到1403年9月有人告知亨利四世说，"愿意在你所说的那个地区留下来的绅士一个也没有"。

一般说来，欧文在北部和西部比较安全，但是他也有他的人员

来源、给养和筹款的问题，1405年向伍斯特进军的失败使他的福

星晦暗。在詹姆斯一世落入英国人手中(1406年)时,他失去了苏格兰这一联盟,1407年又签订了英法休战协定。

到1408年,对亨利四世来说,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他坚毅、果断、不辞鞍马劳顿,跨过英格兰、威尔士,追击敌人直到爱丁堡以西,并把他们一一战胜。他通过妥协得到议会的支持,无需交出王权的任何重要部分,而他的儿子亨利、托马斯、约翰和汉弗莱是一批正趋成熟的财富。在他1413年亡故后,对王朝的再次威胁只发生过两次。当某些朝臣的反教会思想于1414年变成异端时,亨利五世甚至毫不犹豫地谴责了他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1415年支持马奇伯爵的叛乱是1450年前援引1399年的篡位进行辩解的最后一次叛乱,在亨利五世刚要离英国去法国之前被他平息了。亨利四世可以认为他在把王朝建立于牢固的基础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由于与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佛兰德结成联盟而赢得国际上的承认。

亨利五世即位时王国非常安宁统一,臣民很忠顺,使他得以在法国进行范围广阔的战争(自1415年始)并把以后七年中的一半时间消磨在国外。在作为威尔士亲王而取得作战和理政的经验之 200 后,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已丢掉他父亲的谨慎作风的能干、无畏和专制的君主。甚至在法国期间,他对王国的统治也坚强有力,使他能以打一场如爱德华三世早期的战役那样受欢迎的战争。他的统治是兰开斯特王朝的高潮。

亨利为准备战争而与尚存的理查德的支持者和解并重结外国联盟。当时,法国的情况是国王极其愚蠢而贵族们争吵不休,这鼓励他去实现征服的梦想。到了1415年,他感到可以对爱德华三世视野之外的领土提出完全的主权要求,并且甚至重新提出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亨利的野心与他的臣民的期望恰好一致。在贵族和骑士们的领导下集结了大批军队,王国经常投票赞成大

量收税，国王也能公开说明他的目的以赢得支持。他甚至建立了海军来控制海峡。这种热情直到他谢世之前都没怎么衰减，尽管议会的下议院也表达过(1420 年)他们的前人向爱德华三世表达过的对最后征服法国的后果所感到的同样的不安。

亨利五世的策略也与爱德华一样——联合法国贵族，利用他们的不和来达到他自己的王朝的目的。整个战争期间，勃艮第的支持对英国的成功十分重要。但是，进犯者的目标很快便发展为空前规模的征服和殖民地化。1415 年的征伐是一次测验，阿让库尔的胜利明显地证明了英国传统战术的正确。因此，在 1417—1420 年，亨利便着手征服诺曼底，它和相邻的几省是亨利统治期间及以后的主战场。与查理六世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年)使他成了法国的摄政者并代替多芬成为瓦卢瓦王位的继承人。这项特别的条约支配英法关系达一个多世代。虽然亨利五世从未当上法国国王(他于 1422 年先查理六世亡故)，他的娃娃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对法国的亲英派来说，是法兰西的亨利二世，继承了英法帝国。要想保住它，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是亨利二世的弟弟和在法国的军事统帅的继承人；他们在 1417—1429 年间把诺曼底的边界向南向东推进，并连续在阿让库尔(1415 年)、克拉旺(1423 年)和弗纳伊(1424 年)击败法国人。这时英国在法国的威力达到了顶点。贝德福德想通过"刚柔并济建设性的平衡"让被征服的土地和进一步的战役(在安茹和曼恩向南)自行支付军费。但是由圣女贞德所激发的法国人的觉醒和查理七世在兰斯举行的加冕典礼(1429年)使这一计划受挫，英国人在帕泰吃了败仗之后就停止前进了。此后，诺曼底人在外国总督统治下蠢蠢欲动，英格兰与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联盟开始动摇，英国议会发现它得为法国北部的战争张罗更多的现金，而那儿的驻军和野战军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英国人已陷入军事上和财

政上的陷阱，而且又没有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挥他们。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变得更为紧迫，尤其是在英格兰。阿勒斯会议（1435年）和在格拉夫林进行的讨论（1439年）都毫无结果，主要因为对和平的好处和作出重大让步是否明智意见仍不一致。但是查理七世的财产的恢复，英国为保卫兰开斯特王朝的法国进行征伐花费愈来愈大，贝德福德1435年去世，特别是勃艮第的叛变，是决定性的因素。政府释放了奥尔良公爵（阿让库尔战役后被俘到英格兰的法国俘虏），让他在法国贵族中推动和谈（1440年），不过他并没取得多大成就。1445年亨利六世娶法国皇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为妻，但这件事只促成了停战协定，



理查德二世（绘于1390年左右）

而计划中的国王的会见并未举行。最终亨利六世答应以他好不容易在曼恩赢得的土地交出来作为他个人希望和平的保证。他的这一步没有取得他的臣民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在法国拥有土地并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贵族和绅士，这导致法国人于1449年进攻诺曼底。他们得到大炮支持的猛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在鲁昂和福明纳大败并于1450年8月底完全撤出该公爵领地。“……如此伟大的国家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征服过，而民众和军队的损失如此小，人民被杀和农村的破坏及损坏又如此少，”一位法国

203



亨利四世(塑像)



亨利五世

编年史家这样报导说。



亨利六世(绘于1518—1523年左右)

加斯科尼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统治期间很少发生交战，但却遭到获胜的法国军队的侵袭，他们于 1453 年 7 月 17日在卡斯蒂永取得胜利后，英国在西南部的领土就全部丧失了。这是最沉重的打击：加斯科尼自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它的丧失使英国与西南部法国之间长期建立的酒和毛织品贸易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亨利五世的“帝国”中现在剩下的只有加来。被击败的幻想破灭的英国士兵返回英国，他们认为不可信赖的兰开斯特政府对他们的遭遇、对丧失亨利五世所赢得的一切负有责任。在国内，亨利六世面临着战败的一切后果。

卡斯蒂永战役后的三周，亨利六世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垮了，历时 17 个月，以后可能没能完全复原。失去法兰西王国（亨利是在法兰西加冕的唯一英国国王）可能是使他崩溃的原因，不过到1453年又有其他方面的国事引起他严重的关注。亨利的亲信，其中引人注意的是萨福克公爵（1450 年被杀害）和萨默塞特公爵(1455年在圣奥尔本战役中被杀)，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不值得他信任并且遭到广泛的憎恨。那些得不到他的恩宠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

查德、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内维尔，感到不快和愤怒，而他们想增进其财富的努力受到国王及其朝廷的阻挠。亨利的政府快要破产了，而它在地方上、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已经瘫痪。1450 年夏，发生了 1381 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众叛乱，为首的是微贱而有才能的约翰·凯德，他占领了伦敦几天之久并谴责国王的大臣。国王对英国的境况负有的个人责任无疑是巨大的。

亨利六世是位用意良好、对教育和宗教怀有可嘉愿望的国王；他试图与法国人和解，也希望报答他的朋友和仆人。但是中世纪的国王不能单凭良好的用意进行统治。另外，亨利挥霍无度，过于放纵，对人和政策都缺乏精明而平稳的判断。他聪慧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是国王中最缺乏经验者，而且永远摆脱不了他青年时代对别人的依赖性，这是他长长的幼主期(1422—1436 年)所带来的必然特征。他的许多难题都是公认无法避开的。他父亲缔造的英法双重帝国使他承担的负担比主要是军事征服者的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所承担的还要沉重和复杂。他的幼主期是贵族统治期，204 贵族的统治创造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国王成年主政后不会轻易地退出，特别是国王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和国王的叔祖父、温切斯特的枢机主教亨利·博福特。进而言之，在格洛斯特公爵 1447 年去世后，亨利便成了亨利四世的长子的唯一尚存的后裔，这一事实使他对 1399 年遭到冷落的马奇伯爵的后嗣——约克公爵心存猜疑。因此，对兰开斯特王朝后期的统治感到失望是有充足理由的，而约克的理查德是不满者的潜在领袖。

虽然国王有病，他那引起争吵的王后 1453 年 10 月给他生的儿子却使兰开斯特王朝得到加强，但这改善不了王国眼前的景况，也改善不了约克的理查德的景况。理查德作为英格兰的第一位公爵和国王的堂兄弟在国王不能亲政期间(1454—1455，1455—1456年)曾两次被任命为摄政者。但正因为如此而引起王后强烈的

敌意，这种敌意在布洛尔荒原战役和卢德福德桥战役（1459年9月至10月）中迸发出来，又在以后的考文垂议会上爆发出来，使约克公爵、内维尔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受害。这个在国内外造成严重损失的王朝如今又疏远权贵，致使约克公爵于1460年10月提出了王位要求。稍后他在韦克菲尔德去世，其子爱德华在沃里克伯爵的帮助下于1461年3月4日取得了王冠。人们称之为“玫瑰战争”的王朝战争时期现在开始，促成它的条件在15世纪的50年代便已成熟。

新的约克王朝国王爱德华四世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被废黜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儿子仍然没有抓起来。他们因而成了其追随者和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注意的中心，这些外国人非常急切地要使虚弱的英国政权感到难堪。亨利在北方被俘（1465年）后，爱德华感到较为安全，不过那时原国王仍作为囚犯关在伦敦塔中，他的王后和儿子则先后在苏格兰和法国避难。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未能取得英国贵族及其依附者的广泛支持。而且，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渐渐地疏远了实力雄厚的“国王缔造者”沃里克伯爵，他（像1399年后的诺森伯兰伯爵一样）讨厌爱德华日益增长的独立自主精神。他又被他那无用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抛弃。这些各式各样的人联合起来图谋叛乱（1469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鼓励下，于1470年7月与流放在外的玛格丽特王后达成了一项令人忧虑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王朝的支持者和约克王朝的持异议者返回英格兰并使爱德华四世逃往他的同盟者勃艮第公爵处。他们立即使亨利六世复位，在英国国王中只有他两次执政（第二次为1470—1471年）。当亨利召开的议会于1470年11月开会时，大法官作了“上帝说，回来吧，后退的孩子们”的开场白，他这话是针对威斯敏斯特之外的全体人民而言的。

但是被废黜的爱德华也像以前的亨利六世一样，仍逍遥在外，

而且借勃艮第之助可以集结一支军队。另外，亨利的复位遭到相互冲突的一些效忠者和互相排斥的利益集团的破坏。因此，当爱德华于1471年3月回到英格兰时，他能在巴尼特击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向西进军，在图克斯伯里征服刚从法国回来的兰开斯特王朝的王后和太子。最后爱德华四世的王朝稳固了：王后玛格丽特在图克斯伯里战役后被俘，她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而在爱德华胜利地返回伦敦的当夜（5月21日），亨利六世死于塔中，很可能是被害身亡。兰开斯特王朝的主要王系已经断绝。约克王朝的不同政见者不是被吓倒便是死去了，而克拉伦斯，虽然暂时与他哥哥和解，后来又因不小心而被处死。

205



理查德三世（绘于1512—1520年左右）

爱德华在15世纪70年代享受的相对的政治稳定使他得以试图进行一个时期的建设性的统治。他设法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结盟并改变先王卷入法国事务的做法来挽回英格兰在国外的声誉。由于盟友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反复无常，他于1475年进行了征讨，这几乎给他带来灾难，但是在皮基尼条约中，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给他优厚的财政诱饵使之退到英格兰。爱德华改革政府财政的企图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便大体上形成了。如果说他因

206

宣布他治理国家无须征收特别税项而使议会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为了酬报朋友并吸引政治上的支持者他只好另辟蹊径来增加收益。他极力讨好商人和伦敦市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贸易，并与佛兰德和德意志几个港口的汉萨同盟保持良好关系。他后期的稳定主要得力于国家几位能干而忠心耿耿的官员的继续任职。

那么，为什么玫瑰战争没有结束，为什么后代知道的只是北部威尔士地主政治中的都铎王朝？约克王朝在1483—1485年间遭到个人君主制最常遇到的两大危险：一位幼主和一位残暴无情野心勃勃的王亲。当爱德华1483年4月9日去世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才12岁。他的未成年期不须很长时间，而且不管怎样英格兰曾经历过前几次的幼主而没多大困难。但是15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行为的堕落，特别是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的经常专断、无情和非法的行为使爱德华五世的即位险象环生。约克王朝的兄弟爱德华和克拉伦斯，还有格洛斯特在他们的王朝当政的短时间内似乎不能抛弃过时的贵族态度去承担王权的义务。爱德华依靠大都与他自己的家族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有联系的贵族来扩展他在王国中的权威：格洛斯特在北方，伍德维莱在威尔士，黑斯廷斯勋爵在中部。爱德华在世时这办法还行，但是在1483年，依靠相互排斥的小宗派的危险性已表面化了。猜疑，特别是格洛斯特与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猜疑破坏了统治集团，而这集团外的那些人，包括北部根基深厚的珀西家族及威尔士和西中部的白金汉公爵，则感到有机可乘。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王朝所余的唯一兄弟，30岁的格洛斯特的理查德便受其性格和野心的支配，图谋把他年幼侄子的王冠占为己有。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监禁（或许谋害）了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弟弟，“伦敦塔中的王子”，并把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处死。他对王位继承的习惯法规定的唯一让步是无耻地宣称爱

德华四世及其子是私生子，他忽略了克拉伦斯的孩子们。理查德三世的行为和做法导致王朝战火复燃。1483年 10 月，白金汉公爵造反，他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的后代。较为成功的是亨利·都铎，他于 1485 年 8 月从法国前来登陆，尽管他提出继承王位的理由不够有力（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是爱德华三世之子约翰的非婚子的后代）。然而 1485 年 8 月 25 日他在博斯沃思丘击败并杀死了国王理查德三世。理查德的王家血统到那时已趋断绝：他的妻子和他的独子已经死去。

207

许多因素使得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丘战役后能保住王冠。在15世纪的那些篡位者之中，只有他幸运地在战场上杀死了他的断子绝孙的先王。他从约克王朝的大失所望的支持者那里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特别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的支持。英格兰的贵族也感到厌战：他们的队伍已经锐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利不是削弱了便是被消灭了。因此，把亨利赶下台的企图在英格兰得不到什么支持，而约克王朝中觊觎王位者（如 1487 年的兰伯特·西姆内尔）也不能令人信服。1455—1485 年间真正的战斗只有 15 个月，卷入的军队可能也不很多；但是战役之重要与否与参战或伤亡人数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玫瑰战争几乎破坏了英国君主制的世袭基础，亨利·都铎的夺取王冠也难以增强这一基础。亨利装作是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家继承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王并决心继续为王的。

走向民族国家

英国国王在他们的王国中享受的统治权可能使法国君主感到羡慕，王冠则象征着英格兰的统一。戴王冠者不同于其他人。加冕礼强调了他的半超凡越圣的特点，这特点似乎已由所谓的国王触摸可治皮肤病瘰疬的神力所证实。理查德二世坚决主张凡走近

他的人应该屈膝，而“陛下”在15世纪变成了常用的称呼。

王室行政管理机关使决策、征税特准令和法令得以付诸执行，208 其触角伸展到不列颠群岛除北部和西部以外的各个角落。达拉姆主教和切斯特伯爵的特权区超越于英格兰郡辖制之外，拥有特许的独立性。但是不存在国王政府鞭长莫及的问题，达拉姆主教几乎总是由国王挑选的，而且像安东尼·贝克（卒于1311年）和托马斯·兰利（卒于1437年）一样，他们常常是王室顾问；而1301年后切斯特伯爵同时又是威尔士亲王和国王的长子，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因为没有成年的伯爵，由国王来管理柴郡。

国王的行政管理是通力合作进行的。每个郡的郡长和较新的治安推事借贵族和当地绅士之助很好地行使职能，而贵族与绅士的利益反过来又牢固地与王国财富和庇护的最大的唯一源泉国王联系在一起。议会，包括从卡莱尔到康沃尔、从什鲁斯伯里到萨福克之间的各郡和市镇所选出的下议院议员，在中世纪后期的政府中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到爱德华一世时期，战争和国内的骚乱使国王愈益需要与他的臣民（用当时人的话说，“王国的公众”）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就涉及整个王国的问题作出决定并贯彻执行。在议会这样一种中央集会里偶而把地方上的代表和教俗的贵族都包括进去似乎是明智的。希望市民和小些的地主与贵族一起出钱，在战争和政治危机期间需要物资援助和表示支持，在对法律或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处置有争议或有新的变化时能感到代表会议的支持是可取的，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议会的召开经常化（自1327到1437年，平均每年一次），使它具有明确的职能和既定的程序，并使下议院的代表自1337年以后经常出席议会。这个机构在中世纪欧洲的议会中别具一格，它既讨论重大问题，也讨论个别人提出的小问题。它赢得了对英国人征税的专利权；它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它通过立法制订新法并修订现行法律。甚至下议院议员

也为自己赢得了特权、极大的言论自由和会议期间不被拘捕。它本质上仍然是听由国王支配的一个治国工具，但它有时可以批评他的政策和大臣(如在14世纪70和80年代以及15世纪40年代)，但几乎从来不批评国王本人。在使议会产生并促其发展的现实需要消失后，它就很少召开了：在1453(百年战争结束)至1509年之间，议会平均每三年召开一次。

在下议院的议员返回各自的选区以前，必须向他们汇报、奉承209他们并进行说服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希望了解事情的情况。毕竟，纳税、服兵役、能给予合作并服从命令的是他们。政府因此被忠告仔细衡量把什么样的消息传播全国并希望国王的臣民采取怎样的意见。为此目的而使用了比较明显的通讯和宣传手段。官方公告的前言可以用来推广一项政策，也可用来说明某一做法的理由。例如爱德华四世反对被废黜的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公告便大量利用了对约克枢机主教斯克罗普的回忆，这位高级教士已被亨利的祖父处死，此后头上便有了殉教者的光圈。这是使人民继续反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巧妙的宣传方式，因为那些公告会被送往各郡公开宣读和张贴。歌曲和民谣也能传到广大听众中去，有些由官方授意的作品把阿让库尔的光荣强调到不相称的地步。布道对形成舆论和动员支持上也很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便曾要求把能激动人心的优秀的传教士派往各主教管区，以便从布道坛上发出强有力的王家呼吁，要求为又一次的对法作战拿出更多的钱。国王的加冕典礼、国王外出巡行、国王和王后正式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还有伦敦)等，都是利用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大量进行官方宣传的场合。1417年有人绘了一幅亨利五世的画像供大家观看，画中的国王正在伦敦迎接一位征伐法国归来的十字军。如果任何公民对国王入侵法国的正义性还心存怀疑，此画的目的就在于消除这种怀疑。

在印刷业产生以前的时代，传阅信件来进行通报、说服和说明无异乎出版信件，这些信件很快便进入了民间编年史。亨利五世以这种方式向他的臣民报导对法作战的进程。连当时红极一时的作家也变成了官方的宣传员。在15世纪，没有别人的请求，作家很少出示他们的作品。托马斯·霍克利夫是个地位不高的政治官僚，亨利出资让他发表他那关于阿让库尔战役和英军围攻鲁昂(1419年)的赞颂诗。诗人约翰·利盖特以1436年英军抗击勃艮第人进攻、成功地保卫加来城为题，在民众心中尽量灌输沙文主义，为此他长期受到亨利六世和王廷的庇护。

国王、王廷和他的大臣是利用这些通讯渠道的主要人物，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英格兰君主国的圣殿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议会经常在威斯敏斯特集会(1339到1371年间的31次议会都如此，1459年后没有一次在别处召开过)。政府的各部渐渐地在威斯敏斯特、或在较小的程度上在伦敦有了常设办公室。伦敦当时是全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在中世纪后期已成为王国无可争议的首都，不过宗教方面除外(在宗教上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格兰大主教的所在地)。伦敦与威斯敏斯特及两城间 210 的河岸郊区一起变成了王国的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后期，政府的工作范围、复杂程度和发展速度增长了，特别是在战时，政府要征收并管理正常的税款，经常召开议会，发展关税业务，组织作战和防务的实施，监管王国的法律和秩序。因此而形成了集中协调的和固定不动的政府。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内与苏格兰的持续战争被更引人注目的对法作战作取代，自此以后，约克便失去了成为另一中心的权利。另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在国外作战更促成了向固定的中央集权政府指挥部发展的趋势，这个指挥部在国王不亲身参加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1399—1341年的危机使爱德华三世深切地认识到，他不能再像爱

德华一世及其前的先王那样随身带着政府机构去旅行。到1340年财务署已回到威斯敏斯特，以后再也没离开过。国王的大法官法庭、财务署和法院的官僚在首都扩充了，而且作为一批野心勃勃的小地主扩充到附近几个郡。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首都或首都附近有旅馆或住宅，而且伦敦居民的姓氏和语言表明许多地位卑贱的人是从全国各地移居首都的，有些来自威尔士和爱尔兰。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性是它中世纪后期第二个最为重要而持久的品质。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品质是天主教信仰和罗马天主教所属教会所共同信奉的教义。但是人们广泛认为这个以心灵之父的罗马教皇为首的世界性教会是每个教会的大家庭，其中每个教会都各有其特点和自主权。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性，作为英国民族主义在宗教上的反映，在中世纪后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英国语言及英国人民自己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也应归功于英国的法律和习俗，即英国人（包括教士）生活于其中的体制，亦即国王在加冕典礼时宣誓要维护的体制。英格兰教会，包括它的多项建筑，都是在英国国王、贵族、绅士和市民的赞助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每个教会及其牧师都怀有切身的家庭般的兴趣。主教是大地主（温切斯特的主教在15世纪中期每年有3900英镑的收入），他们参加议会并且担任国王的顾问。他们和职位稍次的高级教士们通常得到提升，因为他们为国王所信任，对国王有用而且可以不必由财务署花钱而得到酬报。因此，英国人之所以控制教会并铸造它的性格和个性是有其充分的实际理由的。自1307年以后，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上的作用，甚至在任命主教上的作用经常遭到坚决反对。14世纪的教皇，说到底，大多是法国出生的，而1308至1378年他们居住在阿维尼翁，在那儿他们有可能变为法国人的哈巴狗（或者人们广泛这样认为）。相比之下，只有一位教皇曾是英国人（在12世纪中期），而且没有哪位

211

教皇访问过英国——这情况要到1982年才会改变。

朝一个英国化的教会发展的趋势可以从几方面加以说明。以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法典为基础而后由教皇的法规予以补充的教会法在英格兰教会法庭是受到承认并通常加以实施的，教皇在宗教事务上的最终裁判权也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上，教会法受到王权的限制，特别是当被控有罪的教士要求享受"教士特惠法"① 时。从爱德华一世的时候起，教皇对英国僧侣征税的权利被大大地削减，教皇的大部分税款进入了国王的金库而不是为敌人的战争火上加油(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更为严重的仍是14世纪中期以来对教皇任命英国教会的主教及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利实施的限制，而在"教会大分立"期间(1378—1417年，当时两个、有时三个教皇同时要求基督教世界对之效忠)，英格兰不能反对它所支持的教皇。英国国王利用"圣职的被委任者法令"(1351，1390年再次发布)和"王权侵害罪法"(1353，1393年又加以扩充)来强令教皇让步，因而使任命圣职的创议权归于国王。由此而产生以下的结果：到15世纪英国教会中外国人极少受任命，只亨利七世提名三个意大利人任主教，他们都得到政府的特别赞许。 212

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对这种情况很少表示抗议。主教们不抗议是因为他们已借现在的方式受到任命。教会不集体抗议是因为害怕教皇征税。僧侣们不抗议是因为英国国王是反异端的信仰保卫者，又是回击反教权者攻击的支柱。在1433年，甚至圣奥尔本修道院院长也宣称："在全国之内国王是至高无上的。"

在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除正规教会外，还有两种表达宗教热情的方式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一种是虔诚的信仰方式，它是完全符合正统神学的，另一种由约翰·威克利夫激发起来的罗拉德派运动则是异端。14世纪时人们对神秘的虔诚著作开始产生兴趣，

① 指教士犯罪不在普通法庭受审之特惠待遇。——译者

这些著作面向日益增多的识字者，大多为该世纪后期的作品，用英语写成。这种人视教会的教导和行为为当然，但更喜欢以基督的受苦和死去、圣母玛利亚以及收集于《使徒行传》中的圣徒传记中所表达出来的个人的直感的宗教虔诚。写这类作品的往往是些孤独的个人，他们向读者宣扬反思的宗教生活。流传最广的虔诚信仰作品的作者先后有约克的隐士理查德·罗尔和遁世者诺里奇的朱莉安娜夫人。《马杰里·肯普传》一书是关于林恩一市民之妻的信仰生活的自传，书中以实例说明世俗男女所追求的美德以及它们如何使他们迷上了神的启示、显圣和灵神合一。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他在1354年用法语写了一本他自己的虔诚信仰的书）这样的俗人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这样虔诚的妇人把转向这种强烈的宗教生活作为对学者们的干巴巴的神学讨论的一种反冲，不过他们并未落入罗拉德派异端的歧途中去，这两派在信仰根源上是不同的。

罗拉德派（或许来自lollaer这个字，意为祈祷者中咕哝咕哝的人）是席卷中世纪英格兰唯一的重要异教运动，而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教史上激发起对抗教会的民间运动的唯一大学知识分子。它大体上是英国本土的一种思想模式，并十分重视书本和阅读。尽管威克利夫不大可能用英语写作，但他激发了一些论战性的英语著作和1396年《圣经》首次全文翻译成英语。他在一开头便诉诸他那时代的反教会情绪，并因为批评教会为富不仁和许多僧侣的卑劣行径而在贵族、朝臣和学者之中赢得了声誉和支持。但是他日益激烈的神学思想，极端信任《圣经》，导致他受到谴责并离开牛津。当他与亨利六世严格的正统宗教信仰（亨利六世于1401年在迫害异端的武器库中又增加一项新的利器即烧死）发生矛盾时，他从权势人物那里得到的同情减少了，而当罗拉德派在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起义中染上叛乱的色彩后，这类同情几乎完全消

214

失。在失去知识界的根源和有权势的保护人后，罗拉德派变成了威尔士边境地区和中部地区工业城市的工匠、手艺人和贫苦牧师支离分散但却顽强的运动。他们的信仰变得愈来愈怪异，但是他们对教会权威的根本敌视、对经文的忠诚以及他们对英文《圣经》的信仰却预示着宗教改革的到来，并将成为以后的英国国教的中心信念。

识字的普及和英语的频繁使用是14、15世纪的两大发展。它们表明英国人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在增长，也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

这事让人相信并不难，但要详细证明却不易。当时并未对扫盲的速度和广泛程度作出估计；我们也不可能以基本上不计数的当时人提供的资料来确定数量。如果把规定"教士特惠法"(当时教士都识字)的法律特权的1351年和1499年的法令加以比较，便可以得出识字人数增长的粗略印象。1351年的法律规定，凡能阅读的俗人皆能享受"教士特惠法"。15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必须对世俗学者与任圣职的教士加以区分，只有后者才能享有"教士特惠法"。有文化的人可能已增长许多，仅用"能书写"这个字已不能说明问题，不过1499年把更改的必要归之于滥用权利而不是归之于能读写的人增多。

把中世纪后期两次人民暴动即1381年的农民暴动和1450年约翰·凯德的叛乱加以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一般性的印象。1381年肯特和埃塞克斯的农民的冤情(就我们所知)是口头陈述给理查德二世的，叛乱期间与国王的通讯联络似乎也都是用口传的方式；理查德在伦敦塔中只得要求外面的造反者把迄今对他大声嚷嚷的冤情写下来交他考虑。这事可用来与1450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当时凯德的追随者也来自肯特和东南部，他们从一开始便把他们的要求以书面形式呈交上去，而且还出了复本供人们传阅。这文件

很长，它的议论全面而连贯，用英语写成，有时带有口语。那时出版稿件的业务正扩大它的营业范围。约翰·雪莉(卒于1456年)据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租了四间厂房来经营这项业务，并且出版了“小民谣、申诉和短诗”供出售或借阅。20年后，关税帐目上记载着通过伦敦进口了大量抄本，仅在1480至1481年间就超过1300本。

215

我们可以谨慎地引用某些数字来说明中世纪后期能读写的人不限于贵族、教士或政府官员。以参加凯德叛乱的人为例，有些手艺人和工匠现在也能读写了。1373年的一件讼诉案中，28个见证人中有11人说他们属于知识界(或能懂拉丁语，因此，可以设想，也懂英语)；而15世纪中期也能在见证人中提供同样比例的能读写的人，他们中包括商人、农民、裁缝和水手。无疑，还有许多人，无论识字与否，是决不会用作见证人的，这样，我们便无可否认地接近于托马斯·莫尔爵士于16世纪初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估计，50%以上的英国人能读书写字。

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这些数字，我们至少可以发觉有文化的男人(女人极少)在不同的职业中工作。他们占领着过去一直留给教士们的全国最高的一些政治职位。1381年后俗人也常常成为英格兰的财务主管，这个职务要求必须具备能读会写(即使不会算)的资格。有文化的人常被政府部门雇用为秘书，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就曾在秘书位置上呆了35年以上。还有一件事也是一清二楚的，即到1381年时，商人都有书写的帐单；此后不久，农村的自耕农也写(至少是读)私人信件了，就连在庄园里从事管理的农民也是在行政管理的环境中来进行工作，他们的任务愈来愈多地是通过往来信件进行的。到爱德华四世时，某些行会的规则和章程坚持它们的学徒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

阅读的习惯，至少小康俗人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阅读编年史很普遍，而且不仅在伦敦；现存的手写本就有数百份，而且有迹象表明，到15世纪快结束时出书的数字还在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用英语写的。商人和其他人喜欢拥有"札记本"，本上有个人记事、诗歌、预言、编年史的摘录，甚至还收有处方，供闲暇时翻阅。他们拥有书本，并小心地（特别是对宗教书和虔诚信仰著作）按自己的意愿加以处置。

这一文化界日益成为英语的世界。在14世纪末之前讲法语懂法语（因此也包括读写法语）的熟练技巧明显下降；甚至在政府的和私人组织的官方和正式的事务中，英语至少变得与法语同样常用。14世纪中期起议会的讨论便使用英语了，用英语讨论的第一次书面记录始于1362年。值得提出的是，现知用英语签订的最早一份财产转让契约是1376年的，最早一份遗嘱是1387年的，虽 216 然这些材料只能作为粗略而简便的指导。到14世纪70年代，坎特伯雷宗教会议也常常用英语主持，亨利四世于1399年用英语向议会讲话并被仔细记录下来。这一静悄悄的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的是由于对法战争所产生的爱国主义、十分重视英语书本和布道的罗拉德派的广泛影响、国王和贵族的带头作用；当然，还有讲英语的老百姓较多地参与了王国的事务，不仅仅是参加了议会。书面语言的胜利也是肯定无疑的了。

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地区方言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英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全部潜力才能发挥出来。必须承认，在读写英语普及化的大约一个世纪期间，古怪的康瓦尔语、像外国话的威尔士语以及约克郡话那样难以听懂的方言不能完全被吸收到共同的语言中来；但是进展还是很大的。政府伸向四面八方的触角起了促进作用，它们在15世纪前半期发展了作为官方通讯的书面语的使用并把它推广到全国。另一个促进因素是14世纪时伦敦成了王国固定的首都，约克是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布

里斯托尔是第二大商业首府，它们各有各的方言，最后不可避免地变得可以为别人所理解而逐渐熔合成一种标准化的英语。伦敦话主要是中部地区英语，它是以市区方言为代价发展起来的，易于为农村诸郡所采用。中部方言之所以取胜大部分是由于14和15世纪中部人和东部人大量移居伦敦的缘故。罗拉德派也起了部分作用，因为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活跃，而且其著作都是用不同形式的中部语写成的。口头的和书面上的中部方言由于征服了伦敦，也便征服了全王国。

杰弗里·乔叟曾十分担忧，他的作品是否能为全英格兰的人所理解——或他只为少数着迷的人写作。

> 而因为英语和拼写
> 如此五花八门，
> 因此我祈祷你可别把它写错，
> 也别因为语言贫乏而押错韵。
> 不论你在哪儿朗读或歌唱
> 我恳求上帝人们都能听懂。

1426年的一桩法律案件中说英格兰各地对许多字的发音各不相同，而它们"却一样通用"。半个世纪以后，威廉·卡克斯顿可以乐观地认为他印刷的几百册印刷物如果小心处置可以使每一郡的人都看懂。他知道"一个郡讲的英语与另一郡讲的不同"，但是如果使用"不太粗鲁、不太稀奇古怪而借上帝的慈悲可以理解的英语"，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与此同时产生的口头上和书面上都能理解的愉快对于有效地沟通思想、相互交换意见和形成国家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英语已变为"一个并非被征服的而是征服的民族的语言"。作家们对它的自信心在乔叟身上已臻于天才的高度，它获得了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国王、贵族、绅士和市民的赞助。在14和

15世纪，英语散文在质量和声誉上都不能与各种形式的诗歌相比，其中包括抒情诗和传奇、喜剧和悲剧、寓言和戏剧。这些诗歌大多属于北欧传统，而14世纪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学复兴主要是指头韵体的无脚韵诗。但是它得到当地绅士和贵族如博亨家族（赫里福德伯爵）和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的赞助，并且产生了像《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和《农夫皮尔斯》这样具有相当想象力的作品。在同一地区以英国奇迹剧组形式出现的基督教宗教剧在14世纪得到了发展，并在约克、贝弗利、威克菲尔德和切斯特等北方城市受到极大欢迎，在那儿市行会负责组织戏剧的表演和上演。

同时，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一种较新式样的诗歌，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作品流行的风格式样和内容的影响。通过乔叟和（在较次程度上）他朋友约翰·高尔的笔，它创造了英国文学中的杰作。它们在思想和词汇的丰富上，在想象力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上以及就纯粹的艺术性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大约1380—1385年写的《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特别是那十分雄心勃勃和复杂的全景画般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于1386—1400年，但未写完）对扩大英国文学的成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作品多方面地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深谙世情、他的创造性和对当代英语的精通，这一切使乔叟赢得了他作为英国最伟大的中世纪作家的地位。

肯特郡人高尔先后受到理查德二世和亨利·博林布罗克的庇护。乔叟出生于伦敦商人家庭，生长在贵族和王家圈子中，是历代诗人中受赏赐最大最丰厚的。这既反映了他作品的非凡质量，也反映了他同时代的权势人物乐于赏识他对丰富英语所作的贡献。如果乔叟的弟子霍克利夫和利盖特与他们的老师相比只算二流，那么这些作家从王室、朝廷和城市所得到的庇护至少可以确保首都本质上英国文学学校的地位有着光明的未来。

319 源于同种地方的财富和鉴赏也为建筑师和建筑者提供方便。建筑师们发展了以哥特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来自欧洲，以尖顶拱门为象征和特色）为主导的构思，创造了有权被视为鲜明的英国式的建筑风格。自19世纪以来，这被称为盛饰式[①]（更确切地说是流畅的曲线型）和垂直式（或不如说是纵式和直线型）。人们从英格兰的大教堂、较大的教区教堂和高校校舍等建筑的窗户和拱门设计中最容易辨认出这种风格。建筑上的任何新发展都可以加以确切的说明，因而人们认为13世纪末与埃及和波斯的穆斯林和蒙古人重新开始的外交的和十字军的接触致使东方的建筑风格和技巧被传到西方。精致的花纹和华美的写实主义的主题是新的盛饰风格的一大特征，它出现在现存的三个埃莉诺十字架上，这些十字架是爱德华一世于13世纪90年代树立起来、在把他的妻子的遗体由林肯运往威斯敏斯特墓地时作为路标用的。从布里斯托尔的圣玛丽·雷德克利夫修道院的北门廊和入口也可观察到东方的影响。该修道院修建于14世纪初。这些华丽而繁复的建筑是欧洲的哥特式不能相比的，它们被誉为“整个中世纪英国建筑史上对独创性的最光辉的表现”，但仅过了半个世纪（1285—1355年）却出现了一种反动。这时产生了最英国式的风格：垂直式。在英国进行战争的时代，这种风格很少被欧洲大陆模仿。它的较为简朴、清晰的线条和较大较亮的空间可能首先见于威斯敏斯特的圣斯蒂芬王家小教堂（1834年被毁），或见于圣保罗城市大教堂（1666年焚毁）。不管是那种情况，它很快便通过修建格洛斯特的爱德华二世的圣地之宫廷影响传到西部地区。今天人们仍可坐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建于14世纪30年代中期）的唱诗班席位上，也可从较晚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始建于1379年）和温切斯特大教堂（始建于1394年）

① 原文为Decorated，特指以几何形窗花格和花卉图案装饰为特征的建筑风格，英国的第二期哥特式建筑是其典型。——译者

的听众席对它们赞赏不已。盛饰式这时按英国方式集中使用于屋顶的拱顶工程，而在赫里福德的教士会礼堂（已毁）的扇形拱顶和格洛斯特修道院的建筑上达到顶点，格洛斯特修道院建于1351年后。

然而在英格兰较大的教区教堂，如赛伦塞斯特、考文垂和赫尔的教区教堂，能经常地发现垂直式建筑的最佳作。甚至当瘟疫和战争在15世纪暂时阻止大规模工程的实施之时，它们也未能妨碍东盎格利亚和西部地区的服装商和地主把他们的财富大量用于修造表现英国人的审美力和技巧的纪念碑上。垂直式建筑在15世纪后期在某些最著名的英国建筑物上经历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复苏，这些建筑物大多为国王赞助，如伊顿公学、温莎的圣乔治小教堂（始建于1474年）、剑桥的大学小教堂和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亨利七世的小教堂。这无疑是“中世纪英国建筑的小阳春”。

中世纪后期教区教堂，从雷克瑟姆的坚实的圣贾尔斯教堂到 220 波士顿柱身高耸的圣博托夫教堂以及优美的汤顿教堂、布里斯托尔的圣斯蒂芬教堂和加的夫的圣约翰教堂，其垂直式塔楼都是无比英国式的。14和15世纪的雕花木拱顶也是英国式的，最初是1291年后为约克的教士会堂设计的木拱顶，以后又以木拱顶和灯塔取代1322年倒坍的伊利大教堂的塔楼。这类屋顶工程在修建威斯敏斯特大会堂（1394—1400年）的槌柄椽木屋顶时达到顶峰，这工程受理查德二世委托兴办并被评为“中世纪全欧最伟大的单项艺术品”。13世纪后，砖石工、木工和建筑师受到国王、朝臣、贵族和其他人的庇护；这不仅是为了修建宗教建筑，也是为了修建王宫以及私人的城堡和庄园房屋。这些工匠虽然形成了主要以伦敦为基地并与王室工程办公室相联系的一种职业，但被分配到全英格兰和威尔士去完成任务。他们听任贵族和主教支配他们的专门技 221 术和经验，并因此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力的民族风格。

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英国性的认识始于何时不易测定。但他们有时把他们自己(而且也被别人)比作是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地区或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多民族。在中世纪后期英国人在不列颠群岛或在欧洲大陆上与其他民族对抗，而且常常是以暴力对抗。这些抗争是促进民族性和英国性的自我意识的温床。这些经历引发了种种情绪，使得英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与历史。

当英格兰被诺曼底公爵或安茹伯爵所统治、而盎格鲁一诺曼底贵族在海峡两岸都拥有产业、其他贵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也拥有产业之时，要少数统治者自认为他们仅仅是英格兰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当诺曼底和安茹受到法国人侵扰并于1259年正式投降他们之后，这却是可能的，因为这时跨海峡的贵族得决定他们到底效忠于谁。另外，随着苏格兰王国自我意识的增长，特别是当爱德华一世的战争使跨边界占有土地已成过去之时，这更成为可能。因此英格兰的独特性格是与包围它的海洋相一致的。在15世纪30年代中期一份小册子的作者劝告：

> 要特别保护好周围的海
> 它们是英格兰的围墙，
> 因为如果英格兰被比作城市
> 那么包围它的城墙便是大海……

英格兰国王自爱德华一世起在所受到的教育和观点上比哈罗德国王以来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更是真正的英格兰人。的确，亨利六世在他在位的39年间从未到过苏格兰或爱尔兰；他仅去过威尔士一次——在蒙茅斯呆了一天——而且自他九岁加冕典礼去法国后就再未曾去过那里。

至于外国人，13世纪佛兰德人和意大利人在英国的海外贸易中占据的优势使英国人对他们商业上的成就感到不满。亨利七世

时，据说英国人“讨厌外国人，认为他们到自己的岛上来只是想当岛上的主人并夺取他们的货物……”。说到底，与英国交战的国家的居民很可能像从属于外国修道院的小修道院一样，把钱送给敌人，或者像亨利四世的王后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仆人们那样，当法国的奸细。在百年战争之初，国王的秘书在国家文件上写上“别给外国人看!”几字，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卑贱的弓箭手与骑士和贵族一道成功地进行的英格兰战争给全国上下带来了一种温暖人心的自信。一位见闻广博的观察家于1373年写道：“英国人深深感到他们的伟大并且他们已赢得许多次巨大的胜利，以致他们认为他们是不会输的。在战争中，他们是全世界最信心十足的国家。”为他们的胜利感到的自豪似乎是无限的，单个国王则体现着胜利。在爱德华三世时，“英格兰王国得到极大的改进，它受尊敬和富有的程度都是历代国王统治时未曾见过的”，而亨利五世在臣民中的声誉比这还高。即使在15世纪中期，当英格兰不那么走运之时，英国人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信心（仅次于骄傲和自信）仍是不可动摇的。野蛮的盖尔人被看作是“十足的爱尔兰人”，而佛兰德人在1436年仍受到毫不掩饰的蔑视：

现在记起了，你佛兰德人，十分可耻，
当你们围攻加来时，你们理应受谴责；
因为英格兰人比你们声誉高，
而且出身高贵，渊源久长。

1500年左右，当英格兰几乎失去所有的海外“帝国”之时，一位意大利外宾仍然报导说，“英格兰人极爱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说‘可惜他不是英国人’。”优越感很容易转

变为蔑视或者甚至仇恨。在对法作战几十年后，仇法情绪很普遍，而且只有法国人的仇英情绪可以相匹敌，他们视英国人为“被诅咒的人种”。对法国事物的憎恶任何时候也没有亨利五世时期那么强烈。他可以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但是在英格兰他不鼓励在政府和知识界中使用法语。伦敦的酿酒商从他们敬爱的国王那儿得到暗示，而当他们用英语书写法令时，他们发现“我们的祖国语言，即英语，近日来已荣幸地得到扩充和修饰……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君主，国王亨利五世，已促使这共同的语言……通过书写练习得到赞扬”。

关于不列颠的过去和不安全感的传说与到爱德华一世（或爱德华三世）为止历代英国国王的活力与野心结合在一起，使英国人进入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们并吞这些领土的成就是有限的；尽管英国人力图使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在文化、语言和习惯上英国化，但他们与他们的这些附属领地在中世纪后期并未能成为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英国出席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7年）的代表团宣称：

> 无论人们把国家理解为由于血缘关系和习惯上的统一或语言特点（国家在神法和民法上最可靠而积极的标志和实质）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或是把国家按其应被理解的那样理解为与法国同等的领土，英格兰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但是当他们附加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是英吉利民族的一部分时，他们却陷入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第五章　都铎时期

（1485—1603）

约翰·盖伊

人口的变化

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对英国人民和美洲大陆上的英国人后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神圣的传统、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都铎王朝以后人们对社会的忧虑互相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更加感到都铎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别的且不论，仅都铎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就灿若群星，光华四射。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斯图亚特，政治家沃尔西、威廉·塞西尔和莱斯特，富有创造力的文学艺术家马洛、莎士比亚、希利亚德和伯德。亨利八世豪华的宫廷，托玛斯·莫尔爵士的刚毅，英文版《圣经》、祈祷书和国教的产生，议会的发展，无敌舰队的毁灭，莎士比亚的戏剧，都铎时代的建筑遗产——所有这一切无疑向人们表明都铎时代是英国正统社会发展的顶峰，在这个时期，天才辈出，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和悲剧的色彩。

现实不可避免地比神话更复杂，它不像神话那样迷人，但更有意义。在都铎时代，英国最强大的力量往往在其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因此，如果说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从1500年到伊丽莎白去世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超过资源所能容忍的程度，尤其是没有超过粮食的供给限度，因此没有导致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人口危机。饥荒和疾病无疑严重破坏和影响

了都铎王朝的经济发展，但是并没有像14世纪那样彻底地摧毁都铎王朝的经济基础。更有积极意义的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促进了城市和贸易的复兴和发展，引起了住房革命，使得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常常引起争论）并有力地促进了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人民的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观的形成，尤其是促进了从宗教改革思想和加尔文宗教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

224 尽管这件事情有所争议，但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自从罗马人占领不列颠以来，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经济更加繁荣，国土更加辽阔，人民更加乐观。当然，与15世纪相比，变化引人注目。在1485年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国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社会闭塞。它治愈黑死病的侵害的速度比法国、德国、瑞典和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慢些。前工业社会经济的复兴过程基本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增长过程，所以数字统计是有用的。在1384年黑死病流行前夕，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总人口大约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年前，由于瘟疫不断，人口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的总人口（不包括威尔士）仍然不足226万。这显然表明从黑死病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然而，在1525年以后，人口开始迅速增长：

1525—1601年的英国人口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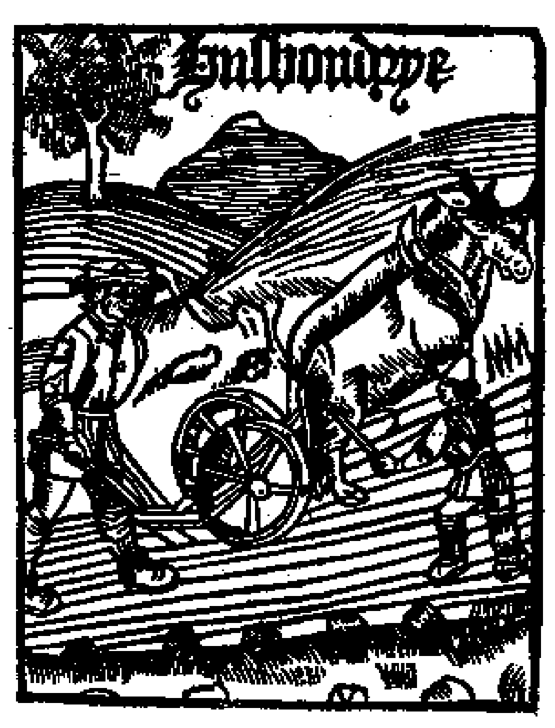
年代	总人口(万)
1525	226
1541	277
1551	301
1561	298

1581	360
1601	410

(资料来源：E. A. 赖内和R. S. 斯科菲尔德合著的《1541至1871年的英国人口史》，伦敦，1981)

在1525年到1541年期间，英国的人口增长特别快。在长期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给人一种人口爆炸的感觉。1541年以后，增长的势头有所减慢；但是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人口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是在16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了暂时的逆转，人口在1601年达到410万。另外，威尔士的人口从1500年的21万左右上升到1603年的38万。

然而，就在16世纪英格兰尝到人口重新增长的甜头时，它突然遇到了严重的社会调整问题。在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社会需求量的突然增加，对衣服、食品的急需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有利的，在当时却是痛苦的。许多问题大得非政府、传统的和教会的慈善机构所能解



都铎时期的双轮犁



搅拌奶油

决，它们给无数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通货膨胀、土地投机、圈地、失业、流浪、贫穷和污秽的城市是都铎王朝时期英国

225 的最严重的公害，同时也是人口增长和商品化农业生产的较为广泛的征兆。在15世纪，由于佃户逃租太厉害，田租不能收齐，地主放弃了以优惠的条件将土地租给农户的直接的剥削方式。另外，农民照惯例租种土地的租金很低，劳役用钱物折算，到1485年，农奴制在英国土地上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同时，1348年后，工资价格的上涨反映了工资劳动力的短缺，食品价格的下跌说明了市场需求的下降。但在1500年以后，需求量突然上涨使得由于人口增长停止不前而产生的虚假繁荣如气泡一样破灭了。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导致地租飞涨。农庄上的佃农与公簿持有农被经商的地主逐出家园，为了谋求利润，相邻的农庄被合为一体，外来的投资者牺牲了当地佃农的利益，将农场外围的土地变为牧场养羊，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公地被圈占了，荒地也被地主、乡绅占为已有，公地的放牧权也从而消逝了。然而，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在都铎时期活跃的土地市场，培养了一批榨取穷人血汗的贪婪的新资产阶级的看法是言过其实的。公平地说，并不是所有地主、强占公地者和一些想占有土地者都恬不知耻；当然，非法的土地买卖市场非常活跃，其结果困扰了许多土地的合法主人。

226 最令人头痛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高昂的农产品价格大大刺激农民去生产在附近的城镇市场上能卖最好的价钱的农作物，而不是生产用来满足农村生活需要的作物。正在增多的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食品常常是供不应求，在由于天气不好或流行病发作而造成的粮食歉收的年代里尤其如此。用现金术语来说，自亨利八世登基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工业产品，这种价格的上涨自16世纪以来加快了。事实上，由于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使得工资下降，价

格上涨的情况经常在变化。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劳动力的增长超过了就业机会，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了。人们（包括妇女）都想干一天活能够多赚点钱，而不只是只得一点伙食费，一些能干的人，其中许多是由于地租上涨或公地被圈占后流离失所的农民随着人流涌向城市寻找工作。

到现在为止制成的最好的价格指数表包括了从1264至1954年的价格变化情况，其基本时期是最有用的1451至1475年——15世纪价格稳定时期的末尾。我们从这个指数表上可以看到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劳工的生活情况，因为指数的统计是建立在主要食品和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的波动价格之上的，这些食品和消费品是英国南部的普通家庭在任何时期都必须买的。实际上，有两个指数可以引用，第一个是每年各种消费品的价格指数，第二是相当于英格兰南部建筑工人年工资率的指数。人们并不认为建筑工人是英 227 国16世纪或其它任何时期内典型的劳工。但是，这些指数可以当作粗略的参考，它毕竟反映了都铎时期大多数英国家庭开支日益上升这个严峻的现实。

①消费品价格指数

②相当于建筑工人工资率的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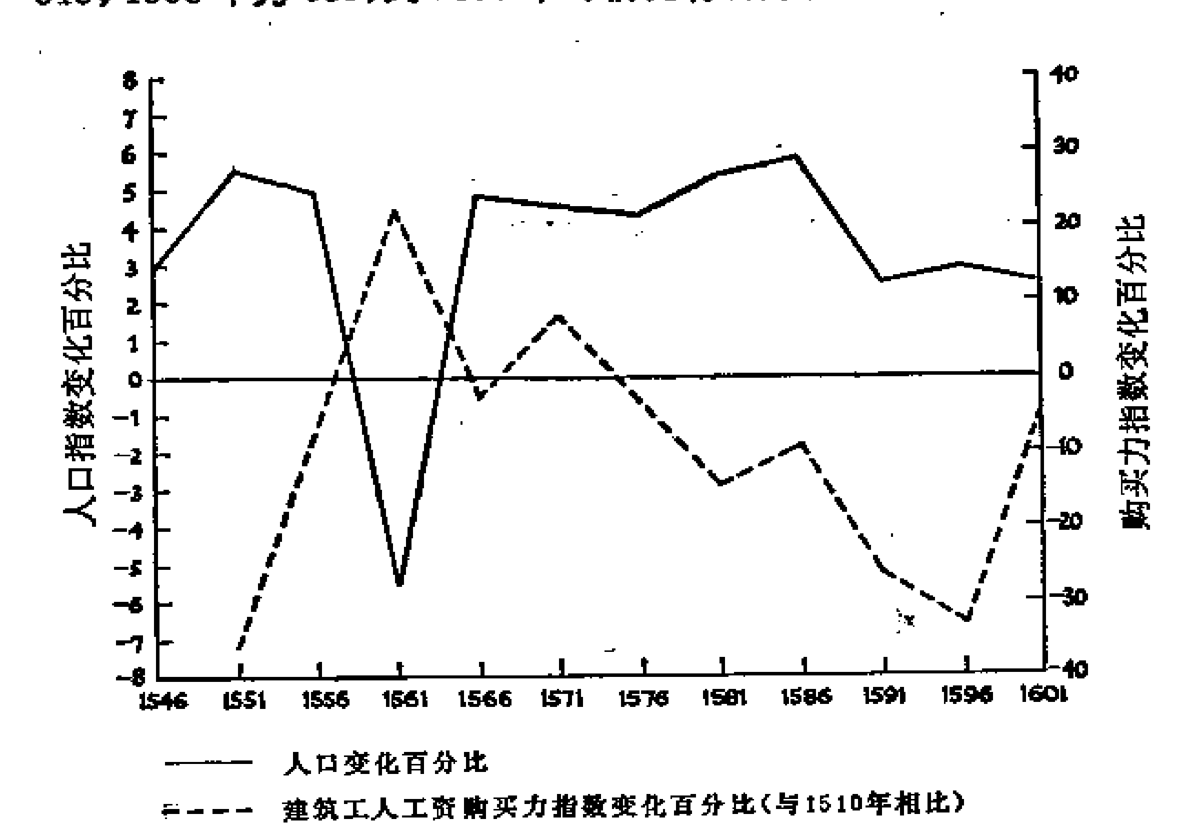
(1451－1475＝100)

年	①	②
1450	102	98
1490	106	94
1510	103	97
1530	169	59
1550	262	48
1570	300	56
1590	396	51
1610	503	40

（资料来源：E.H.费尔普斯·布朗和S.V.霍普金斯文，载《经济学杂志》，1956

年11月，第92期，卷23)

显然，在亨利八世继位后的一百年里，主要消费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上涨了488%。价格指数在1513年以前一直保持在100左右，到了1513年，它上涨到120。到1530年前夕逐渐上涨到169，在1547年亨利八世死时猛升到231。在1555年，指数上涨到270；两年后，涨到了巅峰409，虽然这部分是由于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货币贬值造成的后果。在1558年伊丽莎白继位时，指数下降到中间的230。然后，它又稳定地持续上涨：1570年为300，1580年为342，1590年为396。但在16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收成持续不好，并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流行病和饥荒：指数在1595年达到515，1598年为685，到1600年时情况有所好转，指数下降到459。



—— 人口变化百分比

---- 建筑工人工资购买力指数变化百分比(与1510年相比)

相当于建筑工人的工资率的指数同样地表现出都铎时代家庭

生活的波动情况。在1510年到1530年间，工资的购买力突然下降，在这20年里购买商品的能力相应地下降了约40%。在16世纪50年代指数再度下降，然而在60年代回升到1510年时指数的2/3。直到16世纪90年代，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到1595年，指数猛然下跌到39，1597年下跌到灾难性的最低点29。在1603年女王死时，指数回升到45，这意味着自1500年以来，实际工资下降了57%。

这些不同的数据表示了都铎时代最真实的情况。16世纪英国人口比例的变化与同期建筑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的指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明显，这两条发展曲线是相对的，成适当的比例的。（看图）人口增多时，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增长变慢时或在1556—1560年急剧下降时，生活水平就有所恢复。以后，生活水平又逐步下降。靠工资生活的劳动大军自从1570年以来逐步增长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再加上1585年到1588年和1595年到1598年一些地方遭饥荒，使以前的比例又遭到了破坏。 228

换句话说，决定16世纪不列颠群岛财富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的趋势，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资产阶级企业家的活动、欧洲从美洲大陆进口的银子、货币流通的加快和货币的贬值。英国政府的战争费用、沉重的债务以及货币贬值无疑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但是，都铎时期人民生活的基本事实是与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鉴于这些基本事实，都铎王朝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它养活全国人民的能力。民族的生存危机避免了。马尔萨斯在1798年写了一篇历史性的文章《人口论》，它列举了一些传统上为保持人口与食物资源平衡的而采取的积极的预防性措施。预防性措施包括降低生育、避孕、晚婚和不结婚；积极的措施包括人口大量死亡，或人口增长的突然逆转。英国人的生育力在16世纪50年代末期的确下降了，并在1566年到1571年期间再度下降。在伊丽莎白一世统 229

治期间，许多人终身没有结婚，这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1481—1483、1519—1521、1527—1528、1544—1545、1549—1551、1551—1558、1585—1588和1595—1598年期间，农业歉收导致一些地区的饥荒和大量的人口死亡。然而，尽管这些年的人口死亡对一些受到影响的地区来说，尤其是对16世纪90年代的一些城市来说是灾难性的，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大量死亡现象在都铎王朝时期并没有出现，只是在1555—1558年曾出现过危机的征兆。在其它主要灾难中，玛丽政府在1555年遇到了14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死亡危机，英国人口迅速下降了20万。尽管这样，从地理范围上来讲这不是全国性的死亡现象。人口增长的势头只是暂时受到挫折。事实上，16世纪饥荒持续的时间、程度以及范围都表明英国的饥荒危机不再恶化，而在逐步减少。16世纪中叶出现的淋巴腺鼠疫也发生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里，与迅速增长的人口相比，瘟疫中死去的人寥寥无几。

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价格指数波动，尽管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给一些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大量的流浪汉，人们对都铎王朝时代乐观主义态度是有充分道理的。16世纪时出现了不列颠前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它涉及了人口与资源、经济与政治、抱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英国抛弃了中世纪致命的桎梏，迎来了压力小、平衡发展的新曙光。进步是需要代价的，然而代价永远都是社会的弱者付出的，社会的强者总是从中渔利。无情的价格指数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普遍存在的。与建筑工人相比，农业工人工资下降的幅度就较小，一些特殊的劳工如门迪普矿工的实际收入也许还有所上升。地主、进行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和财产投资者从当时保证了固定的费用、提高了货物的销售价的制度中获得了最为明显的好处——正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贵族、绅士和工商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土地的永久性价值。然而，

230

许多劳工家庭也不完全依靠工资维持生活。各种各样的职业、个体经营和家庭手工业兴盛起来，尤其是在乡村；除伦敦市区外，城镇居民种植蔬菜、喂养家禽并酿造啤酒。受大家族雇佣的劳工除了现金收入之外，还有肉吃，有酒喝，尽管这种习惯性的做法在16世纪90年代逐步消失了。

最后，我们不清楚流浪者和伦敦之外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否快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人们也许会说，英国的城市人口从1520年的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2%上升到16世纪末的8.4%。然而仅伦敦一地的引人注目的迅速增长可以说明这种明显的人口过多；其它一些主要的地方城市如诺里奇、布里斯托尔、考文垂和约克的人口增长较慢，或者说保持相对稳定——而因此可以说这些城市的居民人数相对来说是减少了。

亨利七世

如果说英国采取一种没有大的压力、能保持社会平衡发展的新制度标志着新社会的到来，那么15世纪末为寻求政治稳定而作的努力对将来的社会发展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现在人们都认为，以玫瑰战争闻名的30年内乱只不过暂时打断了国家的正常生活，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丘战役取胜（1485.8.22）也不是他走运，赢得了几乎是不可能的胜利。博斯沃思丘战役之所以是决定性的，是因为理查德三世和他家族中的许多人以及追随者在战役中被杀死，是因为理查德事先消灭了亨利七世潜在的政敌；是因为亨利极其聪明，在战役的前一天自封为国王，这样他能够将理查德的残余宣布为叛党。亨利七世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结婚后，对约克家族的反叛分子采取了极为重要的宽大政策，从而使得反叛分子能够在反对理查德的战斗中与他携手合作。亨利七世与伊丽莎白在1486年生了阿瑟，以后又于1489年生了玛格丽特，231

1491年生了亨利和1496年生了玛丽，从而实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两个显赫的贵族的联合”，对此亲都铎王朝的编年史学家爱德华·霍尔[①]赞赏备至。

亨利七世的继位和婚姻对维持社会稳定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博斯沃思丘的胜利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然而他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人们拭目以待。重要的是必须恢复英国王室的权力，使其能够超越贵族的帮派之争。国王不仅需要权力，而且还应该能够统治国家。长期以来，国王的权力被严重的削弱了，地位形同贵族，而不是国家的最高统帅。玫瑰战争并没有给农业、贸易和工业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影响，但是战争无疑损害了人们对君主制的信心，国王经常被看作是无能之辈，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臣民的利益或者他根本就不愿保护他们的权利。更糟糕的是，国王政府在政治上不能保持中立，完全受某些人的操纵，从而成为某个派别集团的工具。从各方面看，这个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充满了家族思想、贵族间的竞争、徇私以及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托马斯·莫尔爵士为爱德华四世说了些公道话，认为他使英国处于一种“平静而繁荣的状态之中”，在他统治时期，重建工作已经开始。爱德华四世之所以未能取得充分进展，主要是由于他过分慷慨，由于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婚姻的破裂和不加控制的放荡行为。他未老先死给极其强大的北方派首领理查德三世篡权提供了有利时机。相比来说，亨利七世具有献身的精神，能吃苦耐劳，聪明，生活简朴，在财政上精打细算，或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显得很贪婪。然而，亨利在为获得社会稳定方面很有韬略，就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征服英国一样，他极其走运，在博斯沃思丘一举

① 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498—1547年），历史学家、律师、下院议员，所著《高贵而显赫的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的联合》，是莎士比亚许多历史剧资料的来源。——译者

获胜使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无须依靠任何派别、集团。亨利需要巩固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许多年才能完成。事实上，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尤其需要在恢复君主制的过程中防止约克分子在背后进行的阴谋活动。

约克家族有两个大骗子，其一是 1487 年被俘的冒称为沃里克伯爵的兰伯特·西姆内尔，他曾得到爱尔兰人的支持，威胁较大；另一个是在 15 世纪 90 年代里称作为约克的理查德的珀金·沃贝克。尽管他也得到了爱尔兰人的支持，但比较容易对付。1487 年 6 月 16 日，西姆内尔在斯托克被击溃；他的追随者不是被杀，就是得到了宽大处理。年轻的骗子西姆内尔被带进王宫作了仆人。1497 年8月沃贝克落入亨利手中；亨利宽恕了他，但是他不思改过，继续作恶，终于在 1498 年被绞死。这是处决真正的沃贝克伯爵的日子。但是在7 年之后，监禁在伦敦塔里的最后一个白玫瑰家族的代表，萨福克伯爵埃德蒙·德拉·波尔结束了为自己所作的辩护。

此时，即便说亨利七世没有发明新的统治方法，他显然精通使旧政体现代化的艺术。他的基本政策是加强人们对王室的政治忠诚，要他们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加强法制和社会秩序。为恢复君主制，都铎王朝的统治者在任命、提拔和奖赏政府官员时主要是看这个人有无能力、工作是否出色、对政府是否忠诚而不管他的出身以及政治背景如何。这种思想在亨利七世利用国王官职任命权和任命大臣和枢密院官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官职任命权是国王得以授予行政官员和依附者职位、土地、年金、养老金以及其它珍贵奖励的方法，并因而成为国王进行政治控制的主要武器，成为增强王室权力的有力工具。全国上下，从大贵族到身份卑微的骑士、绅士，互相竞争，力图分赃——而没有任何一个贵族对此不屑一顾。亨利七世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逐步重建了官职任命制度，从而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反过来保证王室付出的代价能够

得到完全的补偿。都铎王朝的资源在解散寺院之前以及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都是比较贫乏的。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亨利七世亲自确定王室奖励的标准与步调。的确，都铎王朝利用金钱发挥效用的做法的唯一危险是都铎王朝可能变得极其吝啬小气。赏赐的数量与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王的臣仆与祈求者的希望，以至他们常常感到急不可待、垂头丧气甚至不满。

亨利七世的大臣都是由他自己根据他们的能力、对工作的献身精神、精明和忠诚的程度等来进行遴选。亨利七世的继承者使这种选拔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乍看上去雷诺·布雷，理查德·恩普森和埃德蒙·达德利似乎官职都不大。布雷是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大法官；在1503年去世后不久，恩普森接替了他的位置；达德利是枢密院长，这位置没有具体的大臣称号，但是相当于大臣。然而，布雷和其它几个人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国王，远远超过了他们应有的权力。亨利七世在极短的时间里成功地建立了金融和管理控制网络并制定了一些计划，这些档案从不脱离他和少数亲信之手。建立金融帐目，用贵族也知道的先进方法开发价值不高的王室土地，收集罚金和债务，以及加强在道义上值得怀疑然而十分必要的迫使政敌甚至朋友循规蹈矩的制度都是由国王和他的亲信决定的。这些做法与议会毫不相干，而与由亨利的心腹布雷等人组成的枢密院有关。它们取得的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国王，国王的警惕性很高，对所有细节都很注意，任何事情都无法逃脱他的眼睛，更不用说让钱从他紧紧攥着的手中滑掉。亨利在统治初期签署了一系列管理法令，对议会土地帐簿中的每个项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检查，他是英国王位上最有经验的商人。

然而，都铎政府不论是作为合作者或独裁者都很成问题。英234 国没有警察，也没有常备军。都铎王朝的税收日益不能满足中央官僚机构的开销和文艺复兴期间日益上涨的战争费用，人们要求

建立更好的地方政治体系的呼声直到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才有人过问。这时的地方政府是由不领薪金、超工作量的、几乎是不合格的治安法官担任的。詹姆斯·哈林顿在1656年第一次出版的《大洋国》一文中写道，政府既可以由贵族组成，也可由军人组成。他说得很对，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都铎政府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它得依靠地方上的实力人物。在亨利七世采取积极措施沿着与王室广泛利益相应的路线安排现存的贵族的私人资源时，亨利七世和他的继承者对贵族的派系斗争最好是征服，最差也要控制住他们。换句话说，在英国有一些强大的附庸，他们对国家的管理来说非常重要。15世纪的约翰·福蒂斯丘和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不自觉地对英国有这些强大的贵族感到悲哀。亨利七世和沃尔西大主教都欣赏这种人们惯用的伎俩，他俩共同努力驯服了贵族，有效地控制了他们。

亨利七世的方法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他有一个很大而活跃的枢密院。这位都铎王朝的首任君主擅长权术，在与枢密院议事时，他既能唤起枢密院的狂热，使之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又能使他们感到索然无味。在1536年托马斯·克伦威尔对枢密院实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时，贵族事实上都是王室参事，其政治特权是能够不时地参加枢密院会议。1536年前，枢密院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星室法院里完成的。星室法院既是枢密院举行工作会议的地方，也是审判犯人的法庭（星室法院因为屋顶上挂满了星星状的金枝灯得名）。星室法院在1529年沃尔西垮台之前一直是国王、大臣和贵族主要聚会的地方。在亨利七世的控制下，枢密院主要讨论国内安全、武装防卫以及外交等问题。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得到一些实力人物和军队将领的支持。在亨利七世时，枢密院从没有讨论过财政和政策的实施情况，这些事情完全由大臣和两个特别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一个是精通法律的委员会，另一个是政务审

235

计委员会。参加枢密院的活动标志着一个人新的、显赫的和微妙的政治地位，亨利七世就利用是否让人参加枢密院活动的方法来消除异己贵族和与他缺乏联系和处于孤立状态中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亨利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再者，亨利七世毫不掩饰地决心把要塞和城堡的指挥权、对军队的监督权尽可能地集中在王室家族成员的手中。如果亨利七世感到地方巨头的实力威胁到王室的利益，他会立刻向他们发动攻击。亨利的发难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控告他们违法乱纪，课以罚款或者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没收其财产。

例如，1507 年伯加韦尼勋爵乔治·内维尔在最高法院受到审判，被指控为非法保留一支私人军队。他承认有罪(在亨利七世时受指控的人都这样做，因为这对他们较为有利)，被罚款 70650 镑。如果以一个人一个月 5 镑来算的话，从 1504 年 6 月 10 日算起到 1506 年 12 月 9 日为止的 30 个月里，这笔钱可以雇佣 471 个人。他那支军队好像由 25 个士绅、4 个教士、440 个自耕农、1 个皮匠和 1 个修补匠组成。都铎政府完全掌握了这些详情。然而在这次诉讼中，亨利并不是完全在原则上反对伯加韦尼保留这支私人军队；他看重这支军队，包括位列最后的来自肯特郡的修补匠。他一心想从伯加韦尼的手中把这支军队夺过来——当然，伯加韦尼能负担这支军队的开支则更好。尽管亨利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英国除了与苏格兰和爱尔兰变化不定的关系外，还是卷进了欧洲的纠纷之中。阿瑟王子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在 1501 年极其轻率的婚姻引起欧洲的密切注视。甚至最初的有关婚姻的谈判和以后的婚约就将亨利七世拖进了法国的 1489—1492 年的战争。英国，或者确切地说英国的国王，除了一些在王室领地上征召的军队和贵族应召提供的军队之外根本就没有军队。于是，在伯加韦尼案件中，他豢
236
养军队成为受到指控的主要原因，然而伯加韦尼出生在约克家族，

并且与 1497 年的康尼斯流产的暴动有牵连，也是其中的原因。

折合现价，伯加韦尼被罚了相当于 100 万英镑的钱，但是人们认为他不会全付这一笔罚款。从更广阔的角度上看，他的案件成为都铎政府为了改变 15 世纪王室与地方巨头的实力对比不利于王室的局面，对贵族采取的大规模的法律制裁的先导。然而更激烈、更有效的武器是剥夺贵族的公民权并没收其财产。剥夺公民权是议会通过的法令，犯有叛国罪的人将被剥夺公民权，其财产由国王没收，该人被宣布为十恶不赦。被宣判犯有叛国罪的人常常被处决，但是他的财产并不一定被完全没收。大多数根据剥夺公民权法案被处死的人依照惯例将会平反，这样他们的继承人将不会受到牵连，然而并非都归还其财产。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138 人被剥夺公民权，其中 86 人一直没有平反。在平反的人中，只有 46 人是由亨利七世平反的，6 人由亨利八世平反。这些数字与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甚至理查德三世时期的数字形成相反的对比，它反映了都铎王朝政策的严酷性。亨利七世知道，剥夺公民权不仅仅是派系斗争的工具和王朝的阴谋；它还具有积极的作用，君主可用它一举铲除地方豪强的势力和怀有敌意的权贵，同时，还可以显著地加强国王的权力和收入。亨利八世在 1536 年的“体面的朝圣”骚乱事件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 1569 年的“北方叛乱”之后纷纷仿效亨利七世的作法，利用剥夺公民权法来加强国王领地的力量，消除贵族的反抗据点。但是，剥夺公民权法案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为了避免不良的后果，都铎政府往往采取罚款的形式。滥用剥夺公民权法，同时又不能为受害者平反，他们的继承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样会激起一些贵族的强烈不满，危害到他们与君主的关系。这种做法还会在一些地区造成权力真空。例如，在东盎格利亚，1547年亨利八世剥夺了诺福克第三代公爵的公民权，给那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553 年玛丽女王为

诺福克公爵平反后，那个地区的局势才趋向稳定。在此之前，国王很难控制那里的局势，结果导致了1549年的凯特起义这样的大骚动。

一些历史学家怀疑亨利七世在统治末期过分地执行了压制政策。1506年亨利亲自要求教皇的巡回税收官波利多尔·弗吉尔编写英国历史，波利多尔本人却认为亨利七世在1502年以后掠夺金钱，变得十分贪婪。

237 亨利七世为了迫使人民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他，采取了比以前更严酷的措施。人民对亨利的行径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受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而是因为国王的贪婪造成的。国王是否一开始就这样贪婪不得而知；然而国王在统治后期的确是很贪婪的。

对亨利七世所谓贪婪的争论至今仍然很激烈。但是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有三点已经得到了证明。第一，亨利七世利用面值从100 镑到1万镑不等的处罚保证金来约束臣民的行为。这些保证金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国家的政治生命，尤其是贵族的政治生命掌握在国王的手中，二是缩短习惯法的审判程序。如果一个人证明有罪，他就要付处罚保证金，法庭也不再就犯罪的性质以及犯罪的程度进行争辩。换句话说，就像利用空白证书进行暴政统治的约翰国王和理查德二世一样，亨利七世利用处罚保证金来代替正常的司法程序。第二，恩普森和达德利为了替亨利七世的封建权力辩护，歪曲陪审团的调查工作和判决报告。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关于威斯特摩兰伯爵财产案件的调查报告。在亨利八世时期，枢密院展开的全面的调查就是要纠正这个错案。第三，亨利七世卖官鬻爵，其中包括在司法界的官爵。他两次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出售高等民事法庭大法官的职位。即使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卖官鬻爵十分盛行时，也没有达到如此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大肆卖官鬻爵的

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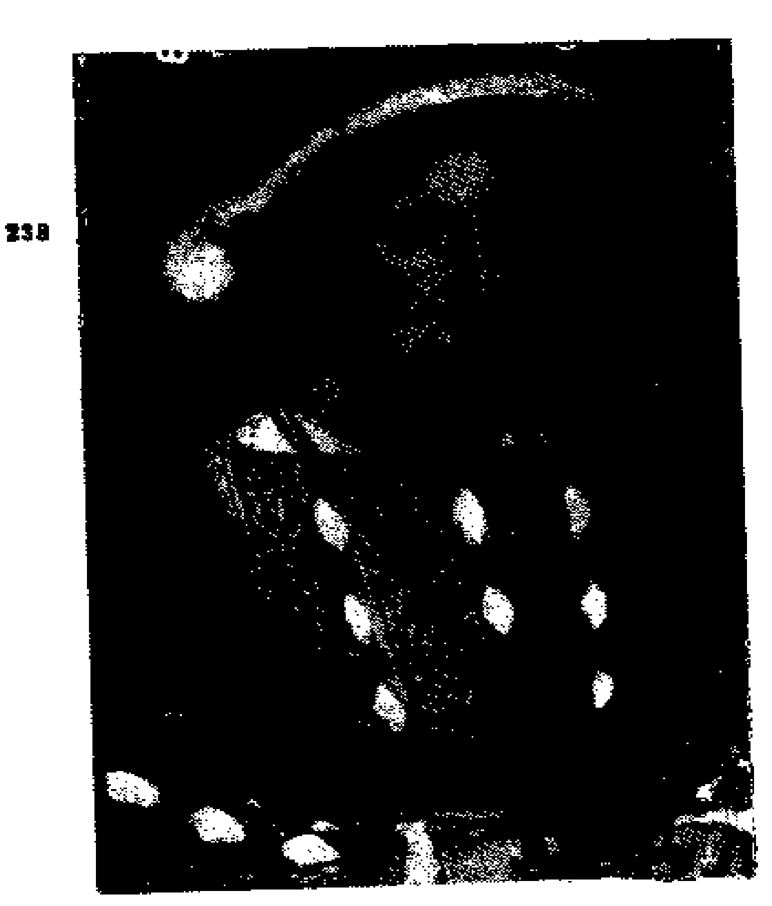
亨利八世

1509 年亨利七世去世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 1547 年还活着的人从没有料到亨利八世的继位会激起全民族的信心。亨利八世的哥哥阿瑟在 1502 年去世，亨利八世继承王位时只有 18 岁。亨利八世受到他的参事们的压力，尤其是受到他父亲时代的政府官员的压力。亨利八世与他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了——这种结合如果没有带来革命性的结果的话，那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亨利从而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统治。他后来处决了恩普森和达德利，将他俩喂了狼来为其以前的雇员在财政上的做法赎罪。无须多说，对这两人的处决是亨利八世精心策划的把戏，目的是从亨利七世所创造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好处而不沾染上它的臭名声——谁也没有因为亨利八世的政府一直拖到 16 世纪 20年代才取消最后一批已经公开出售的处罚保证金而抱怨他。不过亨利八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生性残忍，人们关于与过去彻底决裂有助于解决老大难问题的说法在他



亨利七世(1505年绘)

身上得到了验证。



亨利八世(1536年绘)

亨利八世的性格无疑很有魅力，而且咄咄逼人，也是极其病态的。霍尔本的肖像画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他的形象。他非常自私，处处自以为是，然而他也能不断地闭门思过，这都是由于他不十分聪明但很能干的特点，以及他十分明显的自卑心理造成的。他的自卑心理是由亨利七世造成的，亨利七世不喜欢他。阿瑟死时，亨利只获得威尔士亲王的空头称号——这显然是亨利七世不信任他的表示。所以亨利八世决心在任何地方，即使在教会也要实现自己的统治，而不是徒有虚名。他决心使君主理论付诸实践，尽力使“最高统治者”一词具有任何一个罗马皇帝都没有想到过的新含义。亨利八世急切地想赶上和超过黑太子和亨利五世的辉煌业绩，迫切想获得“金羊毛”即法国王位。他的军国主义的梦想以及在欧洲大陆上的冒险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装备，并一再把他具有较大建设作用的参事们的工作搅乱，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人们在评论亨利八世时总是侧重强调他的君主理论和对征服的欲望，然而人们也认为亨利八世的政策在其统治期间是始终如一的；亨利八世亲自制定政策，只有在他太忙、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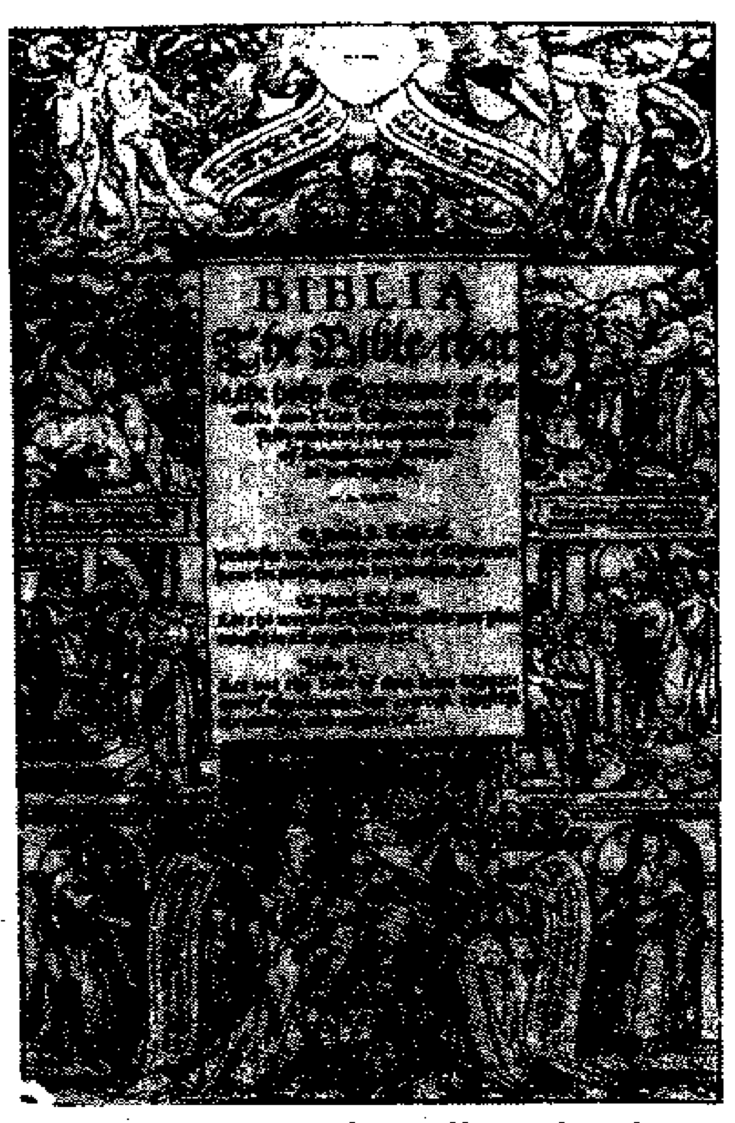
暇顾及国务时，他的大臣才有一定限度的行动自由。

沃尔西主教是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这位骄傲而又工作很有成效的教士在1515到1529的14年里一直执掌大权。在这段时间里，亨利八世相对来说是比较克制的。亨利八世不像他的父亲，他觉得写作是一件枯燥痛苦的事情，而情愿打猎、跳舞、嬉戏、吹笛，在安静点的时候就学习神学和天文学。他常常在半夜唤醒托马斯·莫尔爵士，邀他一道在王宫的屋顶上观察星相。他还写了一些歌曲，其中一首歌谣集中地表现了亨利青年时代的情感。



爱德华六世（绘于登基前，时为威尔士亲王）

与亲密的伴侣一道欢度时日，
这是我之所爱，至死不渝！
人们鄙夷放荡，但都不否认自己也是如此，
只要上帝欢喜，我就这样生活下去；
我的嗜好
是打猎、唱歌和舞蹈，
美好的娱乐



科弗代尔圣经(出版于1535—1536年，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圣经，后来，该圣经被其他版本，尤其是1539年9月的大圣经(Great Bible)取代

使我舒适又快活。

是谁让我这样做？

不过，亨利八世自己确定基调，只是在满意沃尔西的工作时他才放心地娱乐游玩的。沃尔西在 1515 年圣诞节前夕被任命为大法官和枢密院的首席大臣，虽然他很想在星室法院实现他公正的理想，(而亨利七世则多少是利用它来谋求财政上的好处) 他仍像亨利七世那样将枢密院和星室法院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将它们作

为大臣行使权力的工具。沃尔西最可贵之处是他对英国教会的态度。亨利八世与沃尔西迫使教皇授予沃尔西终身全权使节的头衔，这意味着他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能够召集使节宗教会议。沃尔西利用其权力既可迫使整个英国教会服从都铎政府，又可向教会征税。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惶恐不安但又很实际的妥协。在当时的背景下，亨利同意教会最好由一个既是教会人士、又是政府官员的人来领导。教会认为最好服从教会人士而不是世俗统治者，因此在政府中任职的沃尔西无疑保护了教会免受世俗舆论过份的责难。

麻烦的是，都铎政府在恢复了社会稳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不久，英国又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变得摇摇欲坠。一些是多年来受到压制的力量，另一些是从欧洲的宗教改革和自我反省中兴起的力量。长期以来在英国世俗人士中一直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教会的情绪，犹如未爆发的火山，一直压抑在人们的心中。这由来已久的“传染病”自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来就在英国社会中流行。到16世纪时，英国世俗人士对教会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对教会滥征税收、占有土地、在政府中兼职、管理不善和男女非法同居不满；第二，人们对教士人数太多感到不满。隐士、修士和从俗教士人数之多似乎超过了世俗人数，形成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劳动、享有特权的消费者阶层，这种看法虽然不对，但是反映了世俗人士的怨恨；第三，反对主教和教会法庭的司法权，尤其是对异教徒的审判权。一些著名的作家，尤其是学识渊博、严肃的克里斯托弗·圣杰曼（1460—1541年）指出，教会在审判异教徒嫌疑犯时采用秘密指控和道听途说的伪证，被指控者却得不到别人的辩护和陪审团的陪审。这些是罗马人的做法，与英国的习惯法原则背道而驰——斯为教会的阴谋，目的在于剥夺英国人的自然法权。这些思想显然具有爆炸性，因为它们触发了教会与世俗律师之间的理

性争吵。

民众的宗教思想是英国教会面对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中世纪末，宗教的主要特征是圣餐、圣礼和教阶制度；在普通人眼里，它过份强调礼节和义务，反对人们通过自己阅读《圣经》获得主观上的宗教体验。贵族、教士和富商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传统的天主教教义提倡虔诚与冥想，但不缺乏主观性和个人的反省，少数 242 文盲则需要在思想上得到别人的指点以便在冥想中能有所成效。对普通人来说，个人的宗教信仰来自对《圣经》或《圣经》故事（尤其是插图版）的理解。但是在英国出版本国语的《圣经》是非法的。教会当局认为人们阅读英文圣经，即使是当局批准发行的版本，会形成自己的看法，从而出现异端。托马斯·莫尔爵士继沃尔西之后成为大法官，他是主教的同盟者，是第一位反对使用英文版《圣经》的世俗人士。他在 1530 年 6 月 22 日发表的臭名远扬的讲话中声称不需要用英文来宣讲《圣经》，也不需要民众来掌握《圣经》，《圣经》发给谁完全由当局决定，并由当局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发给他们。莫尔执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在国外出版的所有英文书籍都不准带进国内；同时还规定除非事先得到主教的批准禁止在英国印刷任何《圣经》或宗教书籍。这两条法规一条是针对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能阅读拉丁文版的《圣经》和评注，另一条是针对穷人的，他们依靠半文盲的手工匠和云游的布道者的解说来理解《圣经》。然而莫尔和主教是逆社会潮流而动。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新思想包括新教思想在西欧的传播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流亡在国外的英国人印刷了许多异教徒的书籍、《圣经》特别是安特卫普的威廉·廷代尔出版的书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送入英国。国内对英文版《圣经》的需要越来越大，甚至亨利八世也变得开明起来，乐意在国内出版《圣经》。1536 年即莫尔死后的第二年，迈尔斯·科弗代尔翻译的英文版《圣经》第一次在英国出版。

欧洲的宗教改革和自我反省思潮促进了一些社会力量的发展，其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希腊文化的影响。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7—1536年）。他们摈弃了经院主义哲学和繁琐的礼仪，提倡理智和简单地笃信《圣经》或基督哲学，这是对《圣经》原文尤其是对希腊文《新约全书》进行了特别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伊拉斯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文章，漫游各地，他曾三次访问英国，而且正是在剑桥他于在1511至1514年编写了他自己的希腊文版的《新约全书》，修订了他的拉丁文版《圣经》，对定本《圣经》做了重大修正。

希腊文化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英国人，即圣保罗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心情忧郁的约翰·科利特。他是年轻的托马斯·莫尔精神上的导师，曾去过意大利，在那儿接触了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他精通希腊语法和文学，并在牛津大学和圣保罗学院开设了这两门课。他用哲学思想和文学知识对《圣经》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圣保罗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是为圣经评注的方法开辟了新 243 天地。科利特强调神性的统一性，强调对《圣经》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注意其历史典故，相信的确存在为人赎罪的基督。这些激动人心的想法激励了伊拉斯谟和英国年轻一代的人文主义者。

1503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从而吹响了人文主义改革的号角。这是一本关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书，或者说是人们精神生活指南。该书浓缩了作者从科利特那里吸取的人文主义、福音教义和政权还俗主义，向惶恐不安的欧洲宣告当时的教会特权是不合理的。伊拉斯谟还推动了世俗人士改革传统的宗教礼仪的运动。他对经院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对空洞的礼仪、教会的弊病、甚至对教皇的行为道德的猛烈抨击不仅使人感到欢欣鼓舞，而且令人为难。伊拉斯谟的《愚蠢颂》（1514年）是一篇经典的讽刺文

章。他那不朽的才智，加上严肃性、幽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表现出他使教会上层人物头痛、使人民欢娱的改革要求。才智是使文学作品卖好价钱的极重要的因素，伊拉斯谟充分利用他的才智就像利用取之不尽的钱袋一样——这是他独有的天赋。他的幽默自然得体，不断喷涌而出。他写的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犹如石子投入池塘，在欧洲激起层层波浪，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244 在《愚蠢颂》之后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代表是托马斯·莫尔。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于1516年在卢万第一次出版。该书虚构了一个理想的异教徒社会，那里的人住在遥远的岛上，根据自然的道德准则生活。莫尔含蓄地将无知的乌托邦人的良好的社会习惯和开明的宗教态度和欧洲基督教社会的道德沦丧相比较，于是从无声处有力地控诉了后者——这是莫尔喜爱的、辉煌的但也是令人困惑的成就。但是令伊拉斯谟失望的是莫尔在任大法官的年代里放弃了宗教改革的主张，转而迫害和残杀异教徒，因此除了他的追随者在其著作中为他辩护外，莫尔作为宗教迫害狂而不是主245 张宗教宽容者被记入史册。然而，1535年他在亨利八世的蓄意报复下悲惨地死去，以及他甘愿为他从当时矛盾的教皇的最高权威信条中发现的真理受刑，永远说明他的宁死不屈不是欺世之举；当斧头落下时，《乌托邦》作者莫尔作为对人类精神生活作出杰出贡献者的少数人之一在历史上赢得了不朽的一席地位。

1517年路德在欧洲舞台上的首次出现无情地粉碎了莫尔的乌托邦世界。令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感到悲哀的是他们不知不觉地而又无可挽回地为新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英国信奉路德教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影响甚远。人们所说的"新学问"的兴起成为16世纪20至30年代出现的最强大的力量。路德思想和无数的书籍迅速渗入到许多大学，尤其是很快渗入到剑桥、伦敦城、法律协会，甚至通过安妮·博林和她的亲朋挚友的干预，传到了亨利八世的宫

廷。在剑桥，受到影响的有年轻学者托马斯·克朗默和马修·帕克，他俩后来都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沃尔西作为教皇使节自然不遗余力地阻止新教的传播，然而不见成效。一些批评他的人责备他不愿烧死异教徒，所以才失败的。沃尔西宁愿焚书、拘禁人而不愿将人处以火刑；他像伊拉斯谟一样厌恶将人活活烧死。然而路德教有这样大吸引力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不相信罗马教廷和教皇权威、提倡个人宗教信仰的主观性。另外，他对教士的看法反映了反教会人士的心理状态，他对教士男女关系混杂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他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教士婚姻问题。

亨利八世的第一次离婚就是在宗教信仰发生大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阿拉贡的凯瑟琳虽然为他生了 5 个孩子，但只有玛丽公主活了下来。(她生于 1516 年)。为了确保都铎王朝的财产，亨利需要男性继承人。然而在 1527 年时凯瑟琳显然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这时亨利八世正在追求安妮·博林。而她如果没有婚姻作保证的话就不愿与亨利多来往。王宫经常颁布或取消法令，如果亨利八世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如果说是个虚情假意的）神学家的话，所有的事情也就不知不觉地或者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地得到了解决。

主要的障碍是亨利，他担心在国际上蒙受耻辱，坚持离婚必须得到英国主管当局的批准——通过这种方法来剥夺妻子的合法权力，达到恫吓教会法庭的目的。但是，他的婚姻是由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批准的，亨利七世得到其批准后才让年轻的亨利八世与他哥哥的遗孀结婚的，因此这事情与罗马有关。然而，教皇似乎不同意亨利八世离婚。为了不经罗马同意就能离婚，亨利不得不反对现任教皇克力门七世的统治，声称前任教皇的批准无效——这样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也就自动结束，理由是他俩的婚姻一直是不合法的。亨利八世又成为单身汉。然而，这种策略使亨利从婚姻 246

法领域开始涉入了更大、更敏感的教皇的权力范围。如果尤利乌斯二世的批准是无效的话，那么这肯定是因为圣彼得的继承者无权制定这样的契约，这样，教皇的行为就如同越权的立法者。

亨利精通神学和宗教法律知识，他知道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他的行为不会有多大的非议。亨利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不会受自己宗教信仰的约束。他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教皇的所谓最高权威是假的，是人们想出来的花样，目的在于剥夺国王的合法继承权。亨利向往过去不列颠王国的黄金时代，渴望回到君士坦丁皇帝和卢修斯一世时代。事实上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卢修斯一世，他是神话传说中的国王，是诺曼底征服前人们臆造的东西。但是亨利八世收集的"英国史料"表明，卢修斯国王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他赐给英国教会自由和财产，并写信给阿莱塞利乌斯教皇，要他传授罗马法。然而，教皇回信说卢修斯不需要罗马法，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列颠法律(不管它是什么)，已经根据不列颠法统治着国家和宗教社会：

> 因为你是上帝在不列颠王国的传教士，所以正如赞美诗作者所呼吁的那样："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旧约全书·诗篇》第七十二篇)……一个国王不仅要拥有王国，而且还要能统治王国。如果你治国有方，就是名符其实的国王，如果你不善理政，你就不配称国王……上帝让你统治不列颠，你就是上帝在王国的传教士，你就和上帝同在，永远统治下去。

难以置信的是离婚案使亨利八世认为教会应该受他的王权控制。在离婚案引起危机后，亨利八世亲自制定政策，管理政府。他撤换了沃尔西，因为沃尔西的使节权力直接来自罗马教廷，他无法在亨利与罗马的争吵中采取妥协的态度。亨利任命托马斯·莫尔为大法官，然而亨利的做法招致了不良的后果，莫尔不愿意卷入亨

利的事情。亨利八世召集了议会，议会即使不愿意，也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享有全权的立法机构与亨利携手合作。亨利和议会最后通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令，宣布英国不再效忠罗马。这些法令是1532年的“首岁教捐法”、1533年的“上诉法”、1534年的“至尊法规”、1534年的“第一王位继承法”、1534年的“叛国法”和1536年的“反对教皇权力法”。上诉法规定亨利八世是英国新的最高主宰，所有的世俗和宗教权利都是亨利国王赐给的，同时宣布废除教皇对英国教会事务的裁决权利。至尊法规声称英国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是英国国王而不是教皇。王位继承法是都铎[247]王朝政府企图解决王位继承顺序的一系列措施中的第一个，这个法案毫无特色，甚至托马斯·莫尔也认为这个法案除了谴责教皇的司法权侵犯了亨利八世的王权之外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根据叛国法的有关条款，莫尔与罗彻斯特的费希尔主教以及伦敦的卡尔特修会僧侣都因为不承认亨利的最高权威而受到指控，后者坚定地捍卫教皇的最高权利及阿拉贡婚姻的合法性。条款规定，凡不承认国王和王后的尊严、称号及其财产——即否认亨利王权的最高权威者，都犯有叛国罪。实际上，这些犯有叛国罪的人都是亨利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牺牲品，他们于1535年夏天被处死。一年后，反对教皇权力法的通过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完成，该法彻底清除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权力，其中包括解释《圣经》的权力。

亨利八世这时完全控制了英国教会，成为世俗和宗教界的最高首领。他的宗教身份是世俗教区的大主教，在英国他能否决一切外部的或教皇的权威。他不是教士，没有圣职，也不行圣礼——他一度想与教士一样履行这些职责，然而遭到主教团的断然拒绝。不过亨利八世不是新教徒。直到1547年亨利死时，他一直信奉没有教皇的天主教——这是亨利八世典型的荒唐做法，他认为这符合英国历史，是由卢修斯国王所证实的。亨利作为世俗大主

248 教，只要不抛弃宗教信仰，他就能制定宗教法规、解释教义。这样他得到了想象不到的更大的自由，因为主教除了上帝的存在、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和一些圣礼的基本原则之外，无法就教义究竟是些什么达成一致意见。希腊基督教人文主义学者抛弃了经院主义哲学，对《圣经》的经文进行了研究，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的结构，对事物的怀疑主义态度从而盛行起来。

1529年前，亨利通过沃尔西来控制教会，1534 年以后，在新任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帮助下，他亲自统治教会。亨利任命克伦威尔为宗教界的代表。克伦威尔曾是沃尔西的助手，后来逐步升迁，负责照看博林的利益，在 1532 年，他负责整个政府的工作，尤其是议会的工作。这样，他既是掌玺大臣，又是亨利的宗教代理人，从而完全接替了沃尔西，成为亨利都铎王朝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540 年 7 月他垮台时为止。他与沃尔西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他作为宗教代理人完全受亨利的领导，而沃尔西作为普通的英国人接受亨利的领导，作为教皇使节完全不受亨利支配。

亨利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这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疑问。确切地说，为什么在上院拥有大量表决权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精神贵族竟会允许亨利这样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亨利通过威胁和惩罚性的税收迫使反对派教士屈服，但不幸的是，确有一些主教支持国王。教士屈服于国王有很重要的原因。在政治上敏感的教士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处境，他们宁愿受都铎国王的控制也不愿成为下院反教会议员的牺牲品。他们与国王毕竟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屈服则只有灭亡。早在 1532 年，就有迹象表明都铎王朝的最高权威既是政府的最高权威，也是议会的最高权威，只有厌恶议会的专制君主才能制服议会，使其机械性地通过一些所需的革命性法律。大多数主教是教

皇极权主义者，他们清楚，如果议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则将触发长期以来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反教会情绪，使教会淹没在律师和反教会人士的愤怒之中。而且，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繁琐礼仪的攻击、对宗教迷信的揭露和批判提高了人民的认识，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总的说来，至高无上的王权比最高的议会权力好些，没有王室必要的鼓动，教会就不会遭到日趋接近的灾难。

亨利八世至高无上的权力保护了主教，使他们免受了反教会人士过度的迫害，国王在宗教上的保守主义态度防止了在其统治期间新教势力的迅猛增长。然而，什么也挽救不了寺院的命运。除了人们普遍的反教会情绪之外，在 1535 年以后还出现了三个不可抗 249 拒的力量，正是它们促使了教会机构的解体。第一，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的组织机构宣誓效忠，这种情况在上诉法和至尊法规颁布后在司法上是不能允许的。第二，亨利八世破产了。他需要寺院的财产来充实自已的财政。第三，亨利要求全国不效忠罗马，支持他的宗教改革，这就需要钱贿赂他们，执行大规模的新的任命制——他必须安抚世俗贵族和士绅，让他们也参加分脏。于是，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宗教代理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成以亨利为首的委员会，对教会进行普查，制定了第一个自《末日审判书》以来的主要税收记录，将英国教会情况以及财产作了统计。托马斯的调查极为细致，如是否做宗教礼拜、寺院的捐助人是谁、寺院的土地情况、地租是多少等等。整个调查花了 6 个月时间，制定的《教会财产》一书既是寺院财产情况的记录，又是征收教士个人收入税的根据。这充分显示了托马斯的管理天才。小寺院在 1536 年封闭，大寺院两年后被封闭。在此期间爆发了可怕的北方叛乱即“体面的朝圣”叛乱，打断了封闭寺院的过程。亨利完全破坏了对朝圣者的诺言，残酷地镇压了叛乱，实行军事管制，并在公共场合绞死人以示惩罚。亨利的掠夺很快地结束了。到1539

年 11 月为止，一共有 560 所寺院被查禁，每年收入价值 13.2 万英镑的土地收入落进了国王税收增收委员会。这是克伦威尔新建的一个部，专门处理财产的转让问题。亨利还抛售金银器皿、铝制品以及其它贵重物品，从而又获得约 1.5 万英镑的收入。最后，寺院曾拥有向英格兰和威尔士推荐大约 2/5 的教区教职的权利，这些权利现在也成了国王职位授予权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经常就封闭寺院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行辩论，有些人认为这些影响正是预料之中的，另外的人则不这样认为。按前一种人的意见，亨利八世消除了最后一个潜在的威胁王权的保垒。亨利根据寺院所在地和捐款新开辟了 6 个大教区——彼得伯勒、格洛斯特、牛津、切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威斯敏斯特，最后命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区在 1550 年被取消。国王后来重建寺院教堂，更新人员并颁布新教令。他通过封闭寺院使自己的固定收入增加了约二倍，但是这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对解散寺院的无情嘲弄是，在 16 世纪 40 年代，亨利八世巨大的军费开支以及世俗人士的分赃——这从政治上看是无法抗拒的，大大地消耗了亨利八世的财政收入，使封闭寺院的好处消失殆尽。出售没收的土地早在封闭大寺院之前

250 就开始了，到 1547 年时约 2/3 的前寺院财产更换了主人。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继续转让财产，到 1558 年时，3/4 的寺院财产被转让了。伊丽莎白一世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继续出售剩下的土地。当然土地没有白白送人，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一共进行了 1593 项土地转让，只有 69 项土地是全部或是部分当作礼物赠送的；大量的土地(95.6%)是按照新的价格出售的。虽然在亨利八世期间，出售土地并不是为了投资，但在任何情况下，土地本是最好的投资。显而易见，国王出售土地给自己带来了大量的额外收入，然而，人们毫不怀疑亨利八世长期以来挥霍浪费耗尽了他的财源，使他的继承者很难有效地统治英国。

封闭寺院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漂亮的哥特式建筑被毁坏，中世纪的金属制品被溶化，珠宝被变卖，图书馆遭洗劫，这一切都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坏文化艺术品的行为。教会的士气一落千丈，等待圣职者的人数急剧下降；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亨利八世的改革与人的精神生活有关，或者与上帝有关。修道院院长从上院消失了，这意谓着宗教人士在议会的投票权大大地缩小了，世俗人士在上下两院地位则相对提高。随着寺院土地的被出售，举荐教区代表的权利通常也消失了，地方上的世俗人士从而逐步垄断了这些地区的职位任命权，确定了以后三个世纪的模式。贵族、士绅，尤其是中等士绅家庭从国王出售土地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1535 年到 1558 年的全国财产的再分配使教会深受其害，而王室与世俗人士大获其利，贵族和士绅与国王相比得到的好处更大。在 1558 年以前，新富翁的财产并不是完全由以前的寺院土地构成的。但是，如果认为诺福克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话，那么在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这个郡的财产分布情况是 4.8% 的庄园属于国王，6.5% 的庄园由教会或主教拥有，11.4% 的庄园由东盎格利亚地方巨头占有，75.4% 的庄园由士绅拥有。而在1535年，2.7% 的庄园由国王所有，17.2% 由寺院占有，9.4% 由地方巨头拥有，64%属于士绅。 251

如果亨利没有与罗马教廷决裂，那么就不会有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新教改革，因此我们更应该从宗教发展的角度去评价亨利八世的所做所为。然而亨利八世是掠夺者，而不是创造者。托马斯·克伦威尔经常在亨利的背后竭尽全力地向他同时代的人宣扬伊拉斯谟和其他人的启蒙思想；伊丽莎白之所以走中间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克伦威尔复杂性格中有利于和平一面的影响。但是，克伦威尔得到的奖赏是断头台。对他怀有疑虑的亨利抛弃了他，使他成为对手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沃尔西和克伦威尔约束亨利，他

就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亨利八世决心参加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从而点燃了缓慢燃烧的导火线，燃烧的导火线一直到1587年2月玛丽·斯图亚特被处决后才被扑灭。

不过，如果说亨利在其统治末年将注意力集中在外交和战争上的话，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国内地位已经稳定的缘故。克伦威尔加强了必要的国家机器，保卫了国家最高首脑的安全，使之不受国内自发的反对派活动的威胁；简·西摩为都铎王朝生了男性继承人，亨利八世对与凯瑟琳·霍华德结婚十分高兴，兴奋之余，把神学完全抛在了脑后。

亨利八世在婚姻上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在此无须一一述说，然而大概情况还要说一下。安妮·博林嫁给亨利时已经怀孕了，她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了伊丽莎白一世。亨利见生了一个女孩非常失望，大骂安妮与上帝给了他一个女儿。安妮过于早熟，行为轻浮，结果犯了致命的参与政治的错误：她被逐出王宫并于1536年5月突然被处死。亨利立刻爱上了质朴的简·西摩，她如愿以偿地生了爱德华小王子，不过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简·西摩12天后死于外科手术。接着亨利为了得到欧洲同盟国的支持又娶了克莱沃的安妮为妻。安妮性格温柔，与亨利合不来。亨利粗暴地骂她是佛兰德的母马；结合不美满，离异也就很方便。凯瑟琳·霍华德接替了她。霍华德是一个神情飞扬、行为轻浮的女子，曾经是克莱沃的安妮的女侍从官，不配作妻子。她于1540年7月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五个王后，在对克伦威尔的突然发难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她于1542年2月因通奸罪被处死。最后亨利于1543年7月又娶了性情和蔼的凯瑟琳·帕尔为妻。凯瑟琳是个有教养的伊拉斯谟式的人，曾两度守寡。她的温和善良感染了所有的孩子，他们都曾和睦地住在一起，免受了亨利父王残暴性格的影响。

亨利在和凯瑟琳·霍华德结婚后就计划着对外战争。当亨利

得知霍华德不忠时就更想进行对外战争，他想实现年轻时代就有的征服法国的梦想。沃尔西曾监督执行1511—1516年的早期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失败了，沃尔西却极其巧妙地将军事上的失败变成了外交上的胜利，于1518年成功地签定了伦敦条约。亨利于1520年在金衣丘举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大的狂欢活动，招待他厌恨的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此次狂欢被称为世界上的第八奇迹。1522年和1523年的另外两次消费了更多人力物力的战役也都因为英国财政枯竭而失败——结果亨利的政策陷入了一片混乱。英国先与法国作战，后来又休战结盟。亨利也许对从1529年到1536年的欧洲和平感到非常欣慰，并对哈布斯堡王朝与瓦卢瓦王朝之间一直持续到"体面的朝圣"叛乱之后的新的争斗感到非常高兴。

到1541年时，亨利与西班牙又重新修好，联合反对法国，这一次亨利很谨慎，一直在认真考虑此事。为了都铎王朝的安全，在英国与法国开战之前，亨利要杜绝国内敌人的一切可趁之机，因此这就需要将英国的霸权扩大到不列颠的全部岛屿——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同时，亨利继续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这一任务最终通过1707年的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法案完成了。

克伦威尔的改革计划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并的前奏，议会在1536年和1543年通过的法案是其尾声。边疆地带的贵族领地划成了郡，英国法律和郡县的管理方法扩展到了威尔士，这些郡和自治市应向威斯敏斯特提供24名议员。另外，重建后的威尔士王庭和新建的最高民事法庭负责管理整个地区的防务和司法事务。威尔士完全服从国王的法令，按英国的土地占有条例办事。1543年的法令规定，威尔士以前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继承方法要逐步淘汰，由英国的做法来取代。尽管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威尔士的一些传统做法一直持续到17世纪以后，但英国的风俗习惯很快占居

主导地位。英语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语言，威尔士的地方艺术也随之衰落。

253 英格兰人将合并看作是威尔士文明进程的开始，这个过程随着1689年威尔士王庭的被取消和1830年威尔士最高民事法庭的被废除而告结束。然而，威尔士人将亨利八世的法令看成是野蛮的吞并，这些法令就其性质来说并不像1707年的与苏格兰合并条约那样是由双方谈判达成的。事实上，尽管有合并条例，16世纪时威尔士文明发展并繁荣起来。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亲戚约翰·普里斯爵士大声疾呼，为威尔士的历史辩护，反对波利多尔·维吉尔的怀疑主义；登比的汉弗莱·卢德和其他一些人也运用自己的地理知识支持普里斯。曾在兰纳蒙、牛津新学院求过学的威尔士兰纳蒙的普拉斯-杜人约翰·欧文生前在国外的文学名声比他同时代的威廉·莎士比亚还要大。他一共写了1500首拉丁文短诗。为了长期保存威尔士地方语言，威尔士语语法书编纂出来了——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辛恩·戴维·赖斯(1592年)和马洛的约翰·戴维斯(1621年)，前者是用拉丁文写作的，目的是使欧洲广大读者能够理解，后者公开论证了威尔士研究的实用性。

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政策开始于亨利七世之英国的所有法律都自动适用于爱尔兰的决定。爱尔兰议会只有事先得到英国国王的同意才能立法。事实上，英国的影响并没有超越都柏林以外

254 的地区，爱尔兰的首领保持了权力的平衡。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前主要靠爱尔兰的首领来统治爱尔兰，然而在16世纪30年代亨利必须保卫英格兰，使之不受到可能由教皇发动的来自爱尔兰的进攻。伦纳德·格雷被克伦威尔任命为爱尔兰的代理总督，但是他在爱尔兰采取的高压政策结果适得其反。安东尼·圣莱杰爵士接替了他，并采取了一些新的作法。

圣莱杰调整了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政策，其基本原则一直到

1783 年时也没有改变。他放弃了高压兼并措施，采取了友好和睦的政策，然而其实质是让亨利八世成为爱尔兰的国王，在爱尔兰建立起从属于英国的上层结构。英格兰国王是爱尔兰的领主而不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圣莱杰劝说亨利做爱尔兰的国王，这样就可以粉碎教皇企图做爱尔兰封建君主的梦想，并使爱尔兰的首领都听从亨利国王的指令。亨利接受了圣莱杰的意见，于 1541 年 6 月加冕为爱尔兰国王。

亨利也许认为兼任爱尔兰的国王会加强他在不列颠岛上的安全。进而言之，如果这种思想是在国王与爱尔兰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和平的、法制的关系，这是值得赞扬的，对大家都有利。然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爱尔兰的微薄税收难以在都柏林维持一个王国所需要的、受英国议会和枢密院控制的政务会，星室法院，大法官法庭和议会。而且，如果爱尔兰首领叛乱，或者由克伦威尔开始的爱尔兰宗教改革失败的话，兼任爱尔兰国王的英格兰国王很可能派遣英格兰军队全面征服爱尔兰。正如后来的结果证明，国王的怀柔政策产生的效果也许比高压兼并政策更糟，正如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生活在爱尔兰的埃德蒙·斯宾塞极为失望时所说的那样，都铎政府为了有效地征服爱尔兰充分地吸取了它在新世界的殖民扩张经验。

爱尔兰历史的苦难变迁，尤其是在 17 世纪的变化很难完全归诸于亨利八世和圣莱杰。然而，都铎王朝采取的新政策使爱尔兰的从属和自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美洲殖民地造反之后，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不列颠议会于 1783 年取消了它对爱尔兰的控制。1801 年通过的联合法使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造成了有利于威斯敏斯特直接统治爱尔兰的局面，在此之后爱尔兰的历史发展与都铎王朝毫无关系。

然而，都铎王朝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关键在于控制苏格兰。詹

姆斯四世(1488—1513年)于1492年恢复了与法国的老同盟关系，并支持帕金·沃贝克的叛乱，这深深地刺激了亨利七世。然而亨利七世不为苏格兰的战争叫嚣所动，于1502年与苏格兰签定了永久和平条约，一年后又将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国王詹姆斯。然而詹姆斯在亨利八世继位后不久便企图毁约；亨利八世此时正在法国境内作战，他派遣萨利伯爵北征，萨利在1513年9月9日在福洛登杀死了大批苏格兰人。苏格兰的一些上层人士——国王、3个主教、11个伯爵、15个勋爵和另外大约10000人在战争中被杀死，这是在中世纪自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发动的对苏格兰入侵以来的顶点。苏格兰的新国王詹姆斯五世是个婴儿，他母亲是亨利八世的妹妹，她在此后的20年里代表了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利益。苏格兰在福洛登战役失败后，惶恐不安，便加强了与法国的联系。苏格兰摄政、阿尔伯尼的约翰公爵尽管是亲法势力的主要代表，但他保持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暂时和平。

詹姆斯五世长大以后，于1536年访问了法国，并与弗兰西斯一世的女儿马德琳结婚，她死后又很快地与吉斯的玛丽结婚，这时，法国的威胁日益明显。1541年詹姆斯同意在约克与亨利八世会晤，但他出尔反尔，未去赴约。这时，苏格兰政府完全由亲法派比顿大主教把持，他代表了老同盟和教皇势力，对亨利八世形成了威胁。1542年10月，诺福克公爵率兵入侵苏格兰，起初战绩不佳。但是苏格兰军队的反击也一败涂地，其结果比福洛登战役还惨。1542年11月25日，3000名英军在索尔韦沼泽地一举击败1万名苏格兰军队，惨败的消息使詹姆斯五世在不到一个月内羞辱而死。这时，出生才6天的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了苏格兰的王位。对英格兰来说，这次胜利似乎是自己祈祷的结果。

亨利八世和后来在爱德华六世年幼时期统治英国的萨默塞特摄政又多多少少地把优势转变成危机。他们为了有效地进行对法

战争、确保英格兰后门的安全，对苏格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干涉政策。1543年亨利利用在索尔韦沼泽地被俘的人员组成苏格兰境内的英格兰党人的核心，策划推翻比顿政府，迫使苏格兰人签定格林威治条约，谋求爱德华王子与玛丽·斯图亚特的联姻以促成两国的联合。同年末，亨利与西班牙结盟反对法国，并计划在第二年春天联合入侵法国。然而不出所料，入侵计划没有安排好。亨利攻占了布格涅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西班牙皇帝与法国出乎意料地在克雷比签定了单方面的和约，从而将英国的侧翼暴露了。战争一直持续到1546年，耗费巨大。弗兰西斯最终答应英国可以留在布格涅8年，到期后，布格涅连同英国人在那里修建的耗资巨大的城堡一起归还给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同时也抛弃了苏格兰人，承认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签定的格林威治条约。然而这来得太迟了，亨利野蛮掠夺苏格兰人的政策导致了不利的后果。比顿在与亨利的英格兰党人的角逐中占了上风，他废除了格林威治条约；赫特福德伯爵即后来的萨默塞特摄政率领12000人北征。赫特福德伯爵的军队大获全胜，将边界的一些乡村和洛西安夷为平地，但结果适得其反。英军对爱丁堡和洛西安的洗劫反而使得苏格兰人联合起来抵制英军暴行。这样，亨利力图避免的与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的局面出现了。赫特福德于1545年返回苏格兰，但在苏格兰，即使在1546年5月比顿被一群苏格兰地主刺杀后，亲法势力仍在增长。

爱德华六世

亨利八世在1547年去世，陷入窘境、犹豫不决的萨默塞特公爵赫特福德的摄政生涯于1549年结束，结果造成了中央权力的真空。地方上也是这样，郡县政府软弱无能，无法控制住因为16世纪50年代生活水准下降而产生的骚乱。在1548年到1550年期

257

间，当北方人民对"体面的朝圣"叛乱还记忆犹新时，新的骚乱又在各地爆发。对法战争的沉重负担造成了货币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恰好与萨默塞特成立圈地委员会和征收羊毛税的事情同时发生，从而产生谣言说摄政支持穷人反对富人。在德文、康沃尔和东盎格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叛乱者占领了埃塞克斯和诺里奇。萨默塞特的搪塞和对结束国内危机表现出来的无能使沃里克伯爵大为不满，他于1549年10月突然发动了反对萨默塞特的政变。

不过，萨默塞特最大的失败是他坚持遵守已经名存实亡的格林威治条约。他渴望实现亨利八世的计划，在苏格兰消除法国的影响，实现两国的联合。他在平卡叶战役中的胜利(1547年9月10日)被看作是企图将苏格兰从罗马教会影响下解脱出来的一个步骤，但是，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政策并没有促进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反而把苏格兰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法国的怀抱。1548年6月，6000名法军在利恩登陆，玛丽·斯图亚特被带往法国。当萨默塞特想进一步威胁法国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向英国宣战。布格涅遭到了围攻，法军加强了在苏格兰的力量。苏格兰人接着同意玛丽应该同法国王子结婚。所有这些最终促使了萨默塞特的垮台。

沃里克伯爵于1550年2月重新改组了枢密院。他取消了摄政的头衔，改称枢密院长，这是很有意义的改变。枢密院的工作自沃里克的父亲埃德蒙·达德利垮台以来一直没有起色，政变后的枢密院工作很有成效。沃里克死后的一些传说把他贬低成一个耍阴谋诡计的人，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为了社会的稳定采取权宜之计正是都铎王朝惯用的做法，是其政策的基石。据传有三件事情可以证明沃里克的罪行：他发动了反对萨默塞特的政变，在1552年1月审判了萨默塞特并将他处死，以及为了使自己的表姐简·格雷登上英国王位，搞

阴谋诡计改变了王位的继承顺序。然而，根据都铎王朝的标准，只有最后一项指控似乎成立。但是，如果废除信奉天主教的玛丽的计划成功的话，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

沃里克于1551年10月自封为诺森伯兰公爵。事实上，他作出的改变萨默塞特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局面的努力值得赞许。他使用武力，其中包括外国雇佣兵，恢复了国内的和平，他通过明智的改革和紧缩政策使英国的财政恢复了正常。最重要的是，萨默塞特与法国和苏格兰的灾难性的战争很快结束了。诺森伯兰公爵不顾 258 耻辱实现了与苏格兰的和平——这种和平虽然不那么光彩，但也是很吸引人的。布格涅立刻归还了法国，在苏格兰的驻军撤回了英格兰，格林威治条约很快被人遗忘了。于是玛丽不可避免地将与法国王太子结婚，只是出于年龄上的考虑，婚姻一直拖到1558年才举行。

此时，英国的宗教改革也发展到了十字路口。在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处决后，亨利八世亲自控制了英国国教，他在宗教上的保守主义态度至死没变。萨默塞特成为枢密院新教教派的首领之后，权力越来越大，直至作了摄政。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时只有9岁，但他不可思议地早熟，也成了一位固执的新教徒。1547年7月萨默塞特对教会重新颁布克伦威尔的伊拉斯谟主义的禁令，接着又颁布宣扬新教的布道书，4个月后又召开了议会，取消亨利的宗教立法。同时天主教教堂被拆除了。这些小教堂专用于为拯救捐助人的灵魂而做弥撒，无疑是向人们宣扬新教所否定的东西——炼狱和安魂弥撒。萨默塞特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取缔了他们的活动，但他也想得到其财产来实现他的苏格兰计划。枢密院后来写信给克朗默大主教，要他下令从教堂里把所有的圣像取下来，“圣像完全不必要”，没有圣像教堂仍然是最神圣的地方。神龛以及里面的珠宝、圣盘迅速被王室洗劫一空；装饰教堂的雕像

和壁画被破坏得残缺不全，或者被涂上了一层白石灰。1538 年，亨利八世肆意破坏神龛，尤其是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神龛，因为这些神龛是人们朝圣的中心。萨默塞特摄政将此破坏运动推向了高潮，下令务必将与天主教礼仪有关的地方艺术、雕塑、金属工艺品和刺绣统统摧毁。

一直存在的危险是新教改革可能走过头，就像 1549 年的康沃尔叛乱完全违反了第一部克朗默祈祷书对集会所作的主要规定那样。1548 年 9 月对公开布道者的审查制度被破坏了，萨默塞特一度不得不禁止所有的布道，不管是已经批准的，还是没有批准的，并要求大家阅读官方的布道书。他许诺要"终止所有宗教上的争论"，"实现新的统一"。克朗默也渴望实现这一目标，他写信给不来梅新教首领阿尔贝特·哈登贝格时说：

> 我们渴望在教堂里确立真正的上帝的教义，我们不愿摇摆不定，也不愿意含糊其词，我们要摈弃一切世俗的考虑，留给后代一个与圣经的原则一致的、真正的、简明的教义，这样我们各民族将有同一个上帝的箴言，这箴言是由学者和虔诚的人组成的最高权威机构颁布的，这样，我们的后代就有了仿效的榜样。为了实现这一重要计划，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得到学者的支持，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加以比较，这将有助于消除在教义上的分歧，制定出一整套真正统一的教义。

259

许多新教神学家响应了克朗默的号召，其中有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策尔、波兰的约翰·阿·拉斯科、意大利的彼得，殉道者韦尔米利和引起争论的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会会长贝尔纳迪诺、奥基诺，他曾于 16 世纪 40 年代初期就新教发表了一通耸人听闻的讲话。

然而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难达成一致。诺森伯兰伯爵一度想任命为罗切斯特主教的约翰·诺克斯（幸好他拒绝了）具有某种特

别的“返祖现象”；他是乱世英雄，在危难中发迹。克朗默很快看出，要实行新教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这是从英国宗教改革中得到的最基本的教训。与此相应，他的两个版本的公共祈祷书（1549、1552年）隐含了这位大主教1537年以来就渴求的纯粹的圣经教义，但采用它们不仅需要议会的批准，还要由信仰划一法来加强执行。克朗默认为这两种祈祷书的优点一是用英文写的，其次是无疑属于新教性质的；然而遗憾的是祈祷书的第一次发行时间是在信仰划一法颁布之后，这样英国国教的教义和仪式都得听从议会的决定，而不是由国家首脑独立的立法权来决定。宪法上的这种修改标志着都铎王朝的世俗人士对英国教会的最后胜利，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1559年做出有关宗教问题的决定时不得不将克朗默的祈祷书看作是种先例。 260

玛丽女王

诺克斯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流亡国外，宣扬民众有反对偶像化统治者的权力的理论，这使欧洲人大为反感，然而他受到了诺森伯兰的庇护。这一点说明公爵将他的前程与新教事业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爱德华六世身体一直不好，1553年春末就可明显看出他快死了。根据长幼顺序和亨利八世的遗嘱，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是合法的继承者。诺森伯兰在1553年7月企图暴动，结果失败了，这一点需要认真地解释。事实上，诺森伯兰想让他的家族与王室联姻，他的长子在5月21日娶了简·格雷。简是多塞特侯爵的长女，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她是继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之后王位的继承人。爱德华起草了一份“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他剥夺了姐姐的继承权，把王位赐给了简和其继承人。爱德华六世于1553年7月6日去世；诺森伯兰和枢密院4天后宣布简为国王，公爵的阴谋似乎得逞了。这也许真是爱德华六世的主意，固执 261

的信奉新教的小国王憎恨他的姐姐，尤其是玛丽；"文件"是他亲笔起草和修改的。至少，爱德华六世是自愿与诺森伯兰合作的。

简·格雷只当了9天的国王。诺克斯为她辩护，并声称如果玛丽坚持要继承王位，就会有恢复天主教和暴政的危险。玛丽的起事失败了，她被允许逃往弗雷明汉信奉天主教的霍华德家族的坚固城堡中。在东盎格利亚士绅的支持下，她率兵南进。伦敦倒戈，诺森伯兰、简和主要的支持者后来都上了断头台。

玛丽之所以取胜是她玩阴谋欺骗了别人。诺福克的士绅轻信了她遵循都铎正统主义的谎言；他们很快发现玛丽在威斯敏斯特坐稳王位后露出了可怕的天主教徒的真面目。虽然这样，我们也应该清楚伊丽莎白时期的约翰·福克斯和其它的新教辩护士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偏见，他们力图使人相信玛丽是个迫害狂。的确，自从1555年2月颁布的法律再次允许火刑后，玛丽至少烧死了274人。另外，新教的主要殉难者，如胡珀主教、里德利主教、拉蒂默主教和克朗默大主教在火刑柱上遭受的痛苦远远地超过了其信仰天主教的反对派在肉体上所受到的痛苦——因为费希尔主教、托马斯·莫尔都被恩准仅仅实行斩刑。不过爱德华六世时这些新教的领导人首先成为政治报复的牺牲品。史蒂芬·加德纳是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失势的保守派首领，他在16世纪30年代智谋上斗不过托马斯·克伦威尔，在40年代被国王抛弃，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被囚禁在伦敦塔里。他在1553年成为大法官后，发誓要报仇雪恨。第二，我们也应该明白，在玛丽时期的许多殉难者在亨利八世时期也会被当作再洗礼派或者劳拉德派的异端分子被处以火刑的。根据16世纪的标准，考虑到莫尔任大法官时迫害新教徒的情景，人们对玛丽恐怖统治一事就不会觉得奇怪；玛丽本人也许会觉得自己工作干得很出色呢。玛丽迫害的范围也许被大大地扩大了，因为这些统计数字主要来自怀有偏见的福克斯，他只要可

363

能，常常将同样的例子引用两次，他还常常有意忽略爱德华统治时期并没有受到迫害的劳拉德派造成的数字重迭现象。

玛丽的真正的目标始终是想让英国与罗马教廷重新修好；宗教迫害只是实现其计划的一个小部分。对她有利的是当时议会中的有地的俗人对宗教信仰毫不关心，他们几乎毫无保留地取消了亨利和爱德华的宗教立法，重新颁布了异端法，他们自始自终的唯一要求是不归还1536年以后没收的教会土地。玛丽需要教皇的支持，她无法独自一个人干。1554年11月，金雀花王朝血统的英国流亡在外的波尔枢机主教在英格兰登陆，宣布教皇宽恕了英国的罪孽，与英国重新修好。波尔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着反对宗教改革的精神，着手整顿天主教会；这些整顿包括礼拜仪式、教士的行为、教育和主教团的监督。但是，波尔与1517年前的科利特、伊拉斯谟和托玛斯·莫尔一样是个狂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具有同样的理想，人们对莫尔的怀念在玛丽统治时期达到了偶像化的程度，这也并非偶然。然而，波尔既没钱也没有时间来完成他的任务；三年时间，加上又没钱，是远远不够的。教会的机器在缓慢地运行着，不增加薪金，尤其是在北方，教士教育水平的提高只是一句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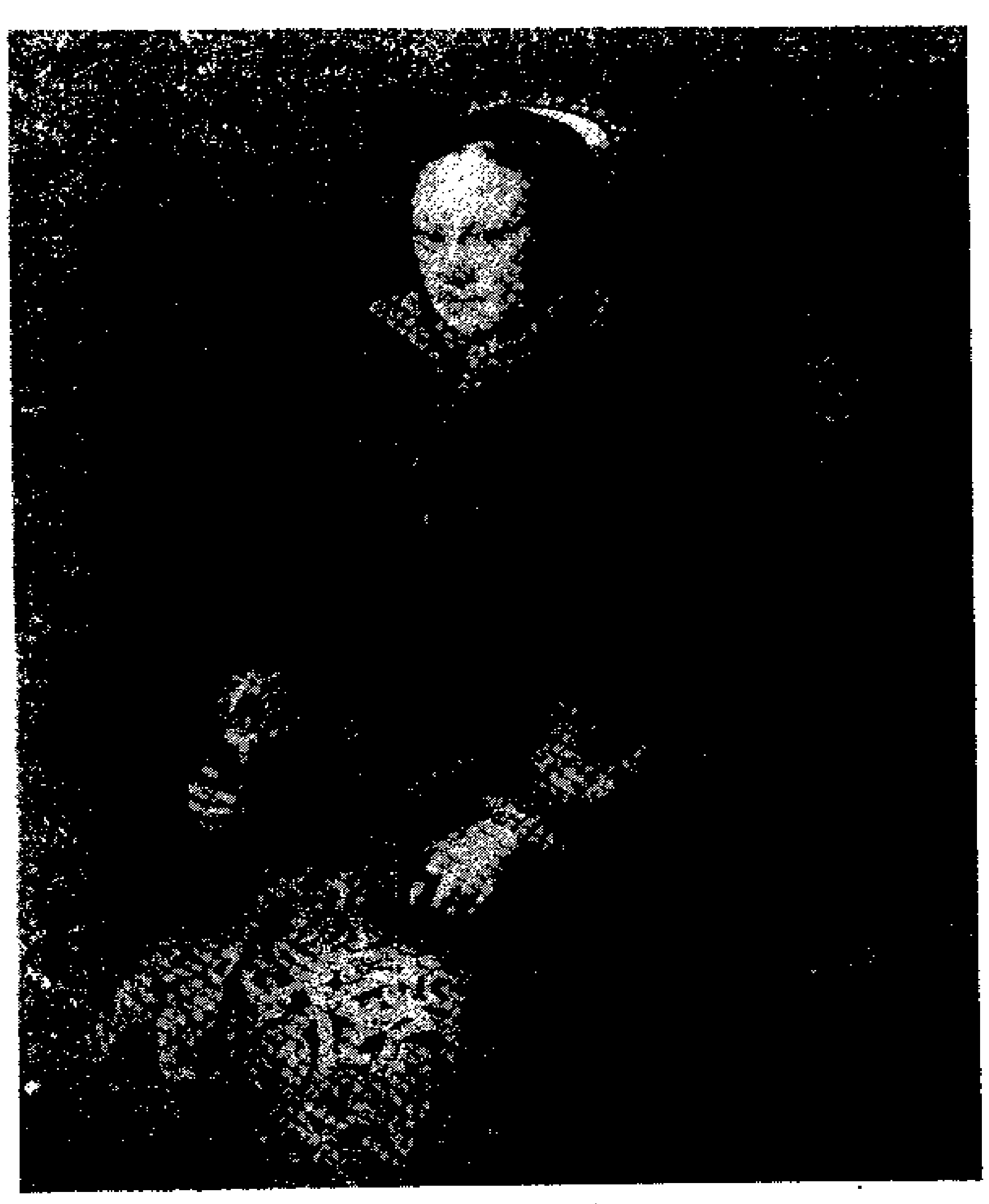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玛丽短暂的统治在其它一些领域里是极其成功的。诺森伯兰的财政改革最终完成了；财政部进行了改组，使之充满了活力；铸造硬币的蓝图也准备好了，并在伊丽莎白期间被采用。1577年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关税和补助金大大下降的原因”。其结果是1558年5月的捐税簿，关税收入因此增加了75%。这种程度是空前的，直到詹姆斯一世继位后才又出现过如此高的税收增长情况，而当时1610年的大契约证明是一场大失败。

然而，玛丽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她让大约800名英国新教徒

移居到法兰克福、苏黎世和日内瓦。这些流亡者不仅进行激烈地反对天主教的宣传、出版煽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颠覆英国政府的活动，政府对此不得不竭尽全力加以镇压，而且在1558年被他们称之为新教徒黛波拉[1]的伊丽莎白继位时纷纷回国，其中许多人被任命为主教。尽管担任主教就要实行英国国教的礼仪，而这与他们新近所养成的日内瓦新教徒对主教制的仪式和服装所抱的反感是有矛盾的。玛丽的第二个错误是她与西班牙皇子的婚姻。她渴望与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结婚，不顾枢密院和议会的恳求，于1554年7月举行了婚礼。菲利普被称为国王，在玛丽王后在世期间两人共同执政。然而，如果玛丽死后无嗣，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他在英国的权力就结束了。但是，就是这样的规定也不能平息反对这桩婚姻的人的不满；1554年有4起叛乱同时在酝酿之中，其中肯特郡的托马斯·怀亚特爵士领导的起义在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便于1月份爆发了。怀亚特率领3000人朝伦敦进发，一路声称"我们不想伤害女王，但要改组枢密院和贤明的国王的顾问班子"。怀亚特不愿洗劫伦敦，将军队移到金斯顿——这是一次致命的转移。他的部队被打败了，100名叛乱者（包括怀亚特）被以叛国罪处决了。其它预谋的起义也土崩瓦解。

怀亚特担心英国可能会成为西班牙走卒的忧虑完全被证实了。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后，菲利普成了西班牙国王。在一年里，他把妻子也拖进了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战争。吉斯公爵在1558年1月7日再度攻占加来，战争达到了新的高潮。加来除了作为羊毛贸易中心而具有的商业价值之外，还是黑太子和亨利四世进行的光荣的法国战役的象征；加来的失守不只是运气不好。玛丽于1558年11月去世，她的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悲伤，波尔主教在几个小时内也相继死去，人们只把它看成是小事一桩。与此

[1] 黛波拉(Deborah)，《圣经》中人物，希伯来一女先知及法官。——译者



玛丽一世(1554年)

同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点燃篝火，庆祝胜利；玛丽·斯图亚特与多芬① 的婚姻也加速到来了，这是亨利八世和萨默塞特对外侵略

① 法王长子的称号。——译者

的危险结果。

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是亨利与安妮·博林的女儿，她于1558年11月7日登上王位，统治英国达44年之久。伊丽莎白死后名声大振，远远超过了她的实际成就。显然，对她的宣扬、对光荣的崇拜、她的长寿、与莎士比亚时代的巧合以及幸运地击败无敌舰队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我们在放声赞颂的时候忘掉了这样简单的现实，即她不动声色地使英国陷入了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之中。

> 你是否正在前往伊丽莎白的庙宇朝拜？
> 我四肢疲软仍蹒跚前往。
> 有人称她潘朵拉，有人称她格洛里亚娜，或辛西娅，贝尔福比、爱丝特拉；
> 不同的名字表明了人们对她不同的爱；
> 然而不同的名字同指一个天体，
> 赞美着同一个灵魂。
> 我来自她的故乡，我们赞美她呵——伊莱扎[1]。
>
> 托马斯·德克
>
> 《永久的幸运》(1600年)

与这首充满爱国激情诗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的真实在迂腐的尘埃中暗然无光。

265 起初，政府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宗教纠纷。虽然诺森伯兰和玛丽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来解决1547年到1549年之间的社会动荡，然而他们失败了。伊丽莎白的口号是"和睦"，她1559年1月出席伦敦市举行的第一次官方招待会，被看作是英

[1] 伊丽莎白的爱称。——译者



伊丽莎白一世

国和平的缔造者，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她的首次加冕庆典的主题是“团结”：她的王位缀满了红白玫瑰，下面写着：

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联合在一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就像亨利七世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的婚姻结束了英国的内

乱，他们的孙女、新的伊丽莎白将为保持英国的永久和睦而努力。正如庆典上一个儿童所咏唱的一样：

> 因此内战结束，鲜血不再流淌，
> 两个家族团结如一家的时候，
> 现在，我们相信，啊，高贵的女王，
> 争执停止，安宁增长！那都是因为有了您。

这虽不是杰作，但表达的感情是真挚的。

然而，在1559年，宗教和睦仍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次庆典把伊丽莎白描绘成犹太人的士师和以色列复国者，是在棕榈树下登上王位的：

> 迦南国王雅宾长期以来用武力迫害以色列人；为了上帝宠爱的人，上帝终于发善心要拯救他们出苦难，派来伟大的黛波拉为其士师。

然而向往和睦容易，实现它非常艰难。伊丽莎白起初力图恢复亨利八世的宗教法规，重建她至高无上的王权，与罗马教廷决裂，只允许两种按照新教规定的圣餐（面包和酒）。1559年时，这些只是设想，无法实现；因为这些想法忽视了议会在确定"信仰划一"程度、制定和取消法律方面的作用，忽略了议会与国王的合作关系；这些打算也使新教流亡者感到失望，这批人必须得到安抚和利用，因为玛丽执政时的主教都不应在新国教里任职的。最后，一开始就担任伊丽莎白首席枢密官的威廉·塞西尔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法，根据这个方案，伊丽莎白任国教最高首脑，这样安抚了大男子主义；同时还规定要通过信仰划一法，规定采用经过修改的克朗默1552年版的公共祈祷书。另一项法案规定将玛丽开始归还给寺院和天主教会的财产收缴归国王所有；第三个措施是进一步牺牲主教的利益来加强国王的财产。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于1563年完成，这时宗教大会通过了39条款，规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

这些是根据爱德华六世期间克朗默起草的42条款制定的。这些教义比1517年的信仰划一法更严，因为捐款法要求领薪的教士同意39条款，否则就得放弃薪俸。

这时，国教成为都铎王朝维持国内稳定的最有效的工具。尽管它有一些缺陷，约翰·朱厄尔在其《为英国国教辩护》一书(1562年)中为其整个结构辩护，"很有见识的"理查德·胡克在《教会组织法》一书中(1593—1600年)也赞赏了教会组织。"按照法律规定建立起来的教会"使英国免受宗教纷争之苦，而在当时，这种纷争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伊丽莎白面临的严峻考验不只是宗教问题。1559年4月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签定了卡托—堪布累齐和约，从而结束了玛丽的对法战争；天主教国家与伊丽莎白签定和约还意味着它们承认了伊丽莎白的国王地位。然而，英国国教尽管保留了圣坛和祭服，它仍然是新教性质的。对天主教徒并没有采取宗教宽容，除非他们改换门庭，成为"教堂里的天主教徒"。虽然伊丽莎白只在出现国际危机时才迫害天主教徒，然而，根据信仰划一法不上教堂者将受到罚款惩处。总之，英国的天主教徒、罗马教廷、西班牙和法国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天敌，天主教联盟反对英国的活动是英国一直面临着的真正的危险。1599年以后，天主教徒直接从事阴谋活动，企图废黜伊丽莎白，扶植玛丽·斯图亚特。

玛丽在1558年4月与法国王子结婚，7个月后，苏格兰议会授予他苏格兰王位以换取他对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支持。都铎王朝的玛丽女王死后，法国重新开始干涉苏格兰，战争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559—1560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新教革命。约翰·诺克斯从流亡地日内瓦回国并于1559年5月11日在珀斯布道，立刻触发了人们心中的愤恨。苏格兰太后是寡妇，在1561年8月以前一直住在苏格兰。这时，伊丽莎白和塞西尔不失时机地进行干预，支持

诺克斯；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逐步成为把欧洲大陆势力赶出不列颠群岛，确立亨利八世梦寐以求的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一世一直不愿结婚，也不任命王位接班人。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恨不得她早死，这样玛丽就可以发动天主教徒政变，接替伊丽莎白的王位，因为玛丽的祖母玛格丽特是亨利八世的妹妹。苏格兰与英格兰王位的合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玛丽作为苏格兰的统治者犯了错误；她在兰塞德战役中失败了，于1568年5月逃往英格兰。伊丽莎白实际上把她软禁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出笼了，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徒、教皇和西班牙野心家们极其危险地与国内政治上的反对派勾结起267来，联合反对独掌大权的塞西尔。幸运地是，由绝望的天主教徒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莫兰伯爵领导的北方骚乱因计划不周、互不协调都被轻易地镇压了。1572年夏天，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又经历了第二次严峻的考验，维护了社会稳定。塞西尔为此要求奖赏，他小心谨慎地申请贵族头衔。

然而，监禁玛丽开创了都铎王朝政治发展的新阶段。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都必须考虑到国外的干涉。首先，教皇庇护五世在1570年2月发出教皇训令，宣布革除伊丽莎白的教籍，废黜其王位，并号召虔诚的天主教徒推翻她。其次，1572年西属尼德兰爆发了起义，新教徒有了危机感，英国需要直接援助奥兰治亲王。最后 伊丽莎白威胁支持法国出兵低地国家来抗击西班牙，这一点在英法两国的联姻谈判中两次被提到，这在菲利普看来是敌对的行268为。枢密院对这些事实际上意见有分歧。先由塞西尔、后由伯利勋爵和苏塞克斯伯爵领导的主流派主张与西班牙重新修好。伊丽莎白的宠臣、伯利勋爵的主要对手兰切斯特伯爵和坚定的新教左翼分子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则不同意，恳求伊丽莎白对荷兰提供物资援助。这是现实的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

是伊丽莎白选择了与法国结盟的间接战略。她对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信心不足，她固有的保守主义、世俗思想和对反叛者的厌恨胜过她倾向新教的本能。总之，她小心行事。伊丽莎白政策的核心是静观、防卫和不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因为女王和伯利都认为英国不可能在单独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然而，在1585年英国还是很孤立的时候，与西班牙的战争到来了。从1580年到1583年，伊丽莎白执行支持法国干涉尼德兰的政策，支持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兄弟和王位继承人、极有可能向伊丽莎白求婚的安茹的弗兰西斯公爵。兰切斯特和沃尔辛厄姆集团在挫败伯利和苏塞克斯后鼓动枢密院反对这项婚姻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然而安茹公爵还没有来得及在低地国家阻止西班牙的卷土重来便在1584年去世了。新教徒纳瓦尔的亨利这时成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吉斯领导的宫廷党立刻投靠西班牙来反击新教威胁。菲利普二世此时吉星高照，他的军队于1583年攻占了亚速尔群岛；奥兰治亲王于1584年6月遭到暗杀，1585年5月菲利普信心十足，扣留了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里的所有英国船只，这是朝着公开宣战迈出的一步。伊丽莎白的反应是同意兰切斯特的计划，在1585年8月与荷兰三级议会结盟，并派遣伯爵进军荷兰。可是兰切斯特的远征一败涂地；他于1587年12月极其羞辱地回到英国，不久便去世了。只有充满爱国激情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受命报复西班牙后，掠夺其港口和财富，大胜而归。

与西班牙的全面战争在1587年2月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之后爆发了。天主教徒的一系列阴谋，其中包括暗杀伊丽莎白一世的计划促使枢密院下定决心处死玛丽。伊丽莎白迟疑不决；虽然玛丽是王族，经过审判后，她还是被判死刑。枢密院迫不及待地执行了死刑判决。苏格兰人激怒了，但是21岁的詹姆斯六世被英格兰

的津贴和极其诱惑人的最高赏赐——英国王位续承人所收买了。(在任何情况下，詹姆斯从没有指望西班牙会支持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菲利普二世将英国处决玛丽视为对他的挑衅，他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对新教英国的考验最后来到了。

无敌舰队在1588年5月从里斯本出发。菲利普的计划是要控制英吉利海峡，在荷兰沿海与帕尔马公爵的军队会师，然后将帕尔马公爵的3万武装力量从尼德兰送过海峡。主力舰队的任务是掩护他的军队通过海峡，然后，无敌舰队上的混合部队与帕尔马军队汇合，联合入侵英国。无敌舰队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指挥；英国舰队由海军上将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任总指挥，沃尔特·罗利爵士任副指挥。埃芬汉乘坐1581年为沃尔特·罗利爵士建造的"皇家方舟"号军舰，德雷克指挥1575年编入海军的"复仇者"号军舰。英国的地方武装也紧急动员起来；凡可能登陆的地方都在地图上做了标志，其防务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即使帕尔马军队登陆，他们也必须苦战一番，才能消除英国的抵抗力量。在这次战斗中，英国的海军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颇具浪漫色彩的远距离的排炮轰击外，打败无敌舰队的历史性胜利仍具有一些传奇色彩。英国舰队组成中队，从两翼夹击停泊在加来锚地的梅迪纳·西多尼亚舰队，而此时，帕尔马因为害怕荷兰人乘机攻击，不敢前来支援。英军在加来派遣的火船实际上毫无威胁，但它们看上去像满载炸药的致命舰只。无敌舰队争相砍断缆绳，乱作一团，丢失了锚给后来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战斗在格雷夫林以外海面上进行。英军利用远程炮轰击，西班牙舰只上弹洞累累，人员伤亡极大。战斗中风向突然改变，受到重创的无敌舰队随风向北逃窜，霍华德和德雷克穷追不舍，一直打到福斯湾。许多西班牙舰只只有绕奥克尼群岛航行，大西洋上的飓风和锚的丢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588年8月英国的新

270

教徒们兴高采烈，不停地祈祷，感谢上帝拯救了英国，并在圣保罗大教堂前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游行。

众所周知，英国的胜利是极其侥幸的。英国的威望因而大增。但是从此以后，伊丽莎白再也没有将整个舰队投入战斗。在以后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她改变了以前的防御政策。她积极支持荷兰人的事业，支持1589年继承法国王位的信奉新教的纳瓦尔的亨利，支持在加勒比海、亚速尔群岛附近和伊比利亚半岛沿海上数以千计的走私海盗反对西班牙的活动。她还在1589、1594、1596和1597年发动了对西班牙的危险的远征，但规模都不大，没有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战争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人们经常担心会遭到入侵，这种局面直到詹姆斯1604年继位后才结束。

从内政、外交两方面来看，伊丽莎白晚期的政策所具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首先，那个控制了诺曼底但还没有控制巴黎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3年为了能进驻巴黎，不惜改换门庭，做起弥撒来了，从而沉重打击了反西班牙和罗马的新教同盟。其次，伊丽莎白就日益增长的债务和弗朗西斯·维尔领导的英军开销问题与荷兰发生了争执。再其次，多年来的战争开销之大，在英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议会不断资助、借贷和出售王室土地也是入不敷出，而且出售土地、借贷给将来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最后，战争实际上扩大到爱尔兰。爱尔兰的宗教改革失败了，西班牙在爱尔兰登陆的危险以及严重的内部叛乱，迫使枢密院考虑全面征服爱尔兰，实现亨利八世登上爱尔兰王位时的宿愿。伊丽莎白犹豫不决，最后，她的另一个宠臣，风流潇洒、狂妄自大的埃塞克斯伯爵奉召于1593年率领大军出征爱尔兰。但是他遭到了比兰切斯特在尼德兰的失败更惨的下场；他在绝望中临阵逃脱，幸好没有受到处罚，但在1601年2月因率领手下的人参加了伦敦街头的叛乱而被处死。芒乔伊勋爵接替了他在爱尔兰的职位，他迫使爱尔兰反叛首

领投降，并在1601年击溃4000名西班牙步兵。1603年爱尔兰完272全被征服。不过结果一开始就不理想，英国的霸权是确立了，但是依靠武力征服爱尔兰却使爱尔兰宗教改革的希望成为泡影，也使爱尔兰和英格兰在文化上交融的希望落空。

然而，这样矛盾的结局不只是表现在爱尔兰的历史上，伊丽莎白政府和社会中的紧张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果说英国的黛波拉创建了国教、镇压了叛乱、击败了无敌舰队、平定了爱尔兰从而恢复和保持了都铎王朝的稳定的话，那么社会的稳定则因社会的腐败而受到了危害。那些在开始时不起眼的小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女王的谨慎和迟钝使她不能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她在1559年为解决宗教问题所做的努力似乎耗尽了她的创造力，也许是她在新教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使她无法在其它领域里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也许伊丽莎白太像她父亲了？不管怎么说，她年轻时受到人们热情赞扬的坚定性，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步丧失了，她变得优柔寡断、迟钝和健忘了。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政府部门。首先，伊丽莎白和伯利使英国的税收制度无法挽回地衰落了。议会津贴赶不上通货膨胀，因为当政府的开销直线上升时，英国的税收仍然停留在相对静止的状273态上；1558年以后，偷税漏税现象非常普遍，也加重了货币贬值。议会的一次性津贴从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的14万英镑下降到后期的8.5万英镑——在1624年又逐渐下降到7万英镑。向苏塞克斯一些大家族征收的税从1540年的平均每户61英镑下降到1620年的14英镑，一些应该交纳税的人也设法逃脱了，因此在交税者的名单上见不到他们的名字。从1572年到1598年伯利去世，这位财政大臣本人就是逃税者。他装模作样地在议会里抱怨人们逃避交税时，一直将自己的财产申报为133英镑6先令8便士，这个数字到他死时一直没有改变，然而，他的实际收入大约每年是

4000英镑。肯特郡的威廉·兰巴德抗议说，到处都是欺骗，不诚实的估税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在这里兰巴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伊丽莎白政府所忽略的关键问题，问题出在地方政治制度，而不是中央政府；各郡的纳税人以郡为标准互相估计税款，而中央政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士绅是地方政府的脊梁——地方代理长官、治安法官、郡长、津贴委员会委员、治安书记官和警察等都是由他们担任的。虽然16世纪的生活变得日益复杂，伊丽莎白并没有采取措施来提高这些不领薪俸的地方士绅的地位。这些人主要靠为国王效劳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相比来说，他们在1603年时的地位比在沃尔西主教时的地位还要低。伯利尤其有些独特的见解，他认识到地方官员不仅要关心地方事务，而且还要为国担忧，肩负重任。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当后来查理一世企图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时，许多郡进行了抵制。

第二，伊丽莎白和伯利因为资源有限，无法向臣属提供足够的庇护，因此中央政府的措施不力，内部腐败盛行。与西班牙的战争每年要消耗25万英镑，议会的津贴、国王的土地收入，关税和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各种财政收入加起来也不足抵偿战争费用。伊丽莎白在1588年出售了价值12.6万英镑的土地，1599—1601年出售了21.6万镑价值的土地——这是杀鸡取蛋的作法，反过来更减少了国王的收入。强迫贷款、捐助、船税、代办粮食供给、借款和分享私掠船的赃物暂时缓解了财政拮据状态，但这是以引起政治摩擦为代价的。1603年时国债一共是40万镑，这还是伊丽莎白精打细算的结果，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她一般尽量不赐给他人头衔、地位、年俸和养老金。即使一些人得到土地，他们也必须向财政部交纳合理的租金。通货膨胀使王室政府官员的所得越来越不值钱，庇护不足的问题也愈加严重。

伊丽莎白非常绝望，只得采取下述三个办法，从长远观点看，

这不仅使后来的詹姆斯一世没有足够的财源，而且产生了其它有害效果。第一，大规模赏赐到时要归还的官职和土地，这就经常造成四、五个或更多的有继承权的人等待一个空缺的职位和财产的现象——这一权宜之计是以将来作抵押的，常常使得一些关键的274 位置成为世袭。另外，排队并非解决职位任命权缺乏的理想方法。第二，违反1551—1552年的法令，大量卖官鬻爵。花200镑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官职，花1000镑到4000镑的钱可以买到一个油水很足的官职，如军队的司库或宫廷财产管理人的职务。买官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如果买卖成交，新上任的官员则加倍地搜刮买官花去的钱。因此，英国不得不容忍这种有预谋的腐败行为。例如，伯利的年收入有4000镑，其中2/3是从卖官鬻爵中得来的，他的年金只有866英镑。在卖官鬻爵风气达到顶点时，他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在1608年到1612年任职期间，每年的平均收入为6900英镑；另外的一些人捞得的油水小些，然而，这对都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第三，伊丽莎白利用早期的一些做法，给王公大臣、宠臣某些特权，如专卖权、垄断权等。兰切斯特伯爵每年从关税中获得750英镑的好处；沃尔特·罗利垄断了扑克牌的买卖，埃塞克斯伯爵买了征收甜酒税的权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亨利八世挥霍了寺院的财产，迫使他的继承人改革税收制度，否则战时经济就维持不了几年。伊丽莎白的过度节约和廉价的庇护制掩盖了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使之能够一直持续到1603年。政府的腐败给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财政改革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障碍。究竟谁的过失更大呢？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另一个造成国内紧张关系的主要领域是宗教。英国民众完全服从1559年的宗教改革，但是狂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愿服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流亡在国外的人虽然接受1559年的有关宗教问题的决定，但他们渴望清除英国国教中

的“天主教”礼仪和祭服。他们向国内灌输有关礼拜仪式和教会管理的激进思想。形形色色的叫做清教徒的新教徒则渴望达到下面四个目的：清除天主教仪式（圣餐按照原始基督教教义的规定，而不是按照祈祷书规定的要求进行）；重新开展由受过适当教育的牧师完全根据《圣经》进行的布道活动；在上帝选定的选民中宣扬活生生的再生的信仰（一些激进分子强调堕落的可怕结果，否认人有自救的能力，例如，通过努力工作）；最后，宣扬由宗教大会规定的教规，反对教士，尤其是主教团的控制。另外，一些清教徒分立分子宣扬独立教会的思想，宣扬建立与伊丽莎白的国教没有瓜葛的宗教大会，并建立自己的宗教仪式和教会管理形式。然而，这些主张脱离国教者不是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就是以煽动革命的罪名 276 遭到政府的迫害，虽然这个政府早就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组织。真正的问题是，1559 年的解决方案是新教发展的起点，还是它的尾声。

在以后的 40 年里，伊丽莎白拒绝就有关宗教问题的决议案作出任何调整，其程度实在过分。帕克主教在《公告》一书中（1566年）要求严格遵循公共祈祷书中关于仪式的规定；政府也争辩说仪式和祭服并不重要，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基本要求。当然，清教徒会反驳说，如果他们提出的东西不重要，为什么要求执行信仰划一？人们反过来可以认为，这些东西是在强调宗教仪式，强调主教团的教规，甚至强调主教的权力。新教徒分别在 1566、1571、1572、1586—1587 年得到了议会的支持。伊丽莎白利用她的拿手武器，即君主否定议案及使议会休会或解散议会的权力，挫败了这些政治企图。她同时声称宗教政策实际上是一桩预定的买卖，在买卖中，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没有王室的同意是不能插手的。然而，既然 1559 年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决议是王室和议会共同取得的成就，伊丽莎白一世这种关于王室特权的看法是令人争议的。因

此，在伊丽莎白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她也留给继承者一套主要依靠政治机敏的君主理论；查理一世的一生就是滥用这种理论的典范。伊丽莎白被迫对清教徒采取强硬措施。惠特吉夫特(1583—1604 年)大主教奉伊丽莎白的命令来迫使清教徒闭嘴，他利用最高法庭，间或也利用星室法院侦查和迫害非国教徒牧师，一些非国教徒活动家如亨利·巴罗、约翰·格林伍德和约翰·彭里经审判后，都因煽动和叛国罪被绞死。

天主教问题比新教问题更棘手。1559 年关于宗教问题的决议使天主教徒陷入了孤立。伊丽莎白希望天主教的活动自行消沉。玛丽时期的主教被免职，波尔主教的去世使英国的天主教徒失去了领导人，罗马(或西班牙)在 1570 年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指令，整个天主教处在一种僵化的状态中。在卢万，遭流放的天主教徒宣扬效忠世俗政权，实行不抵抗主义。然而，在 1569 年的北方叛乱和次年教皇庇护五世颁布训谕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将天主教徒看作是潜在的叛国者，他们受命推翻伊丽莎白，拥戴玛丽·斯图亚特为王。议会和枢密院联合采取自卫行动：1571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凡将罗马教廷文件带进英国或在英国发行罗马文件均属叛国行为；1581 年的法令又进一步规定延长叛国罪法律的实施时间，并对不参加国教活动的天主教徒以不服从国教的罪名每月增加罚款 20 英镑。结果正如尼古拉斯·桑德在《君主教会面面观》(1571年)一文中所说，天主教徒的忠诚变成了抵抗。桑德列举
276 了 1558 年以来受到流放、监禁和罚款的人的总数；他为 1569 年的叛乱辩护，为教皇训令叫好。然而，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动失败了，1580 年，耶稣会教士从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那里得到新的决定，称教皇训令只是要约束天主教徒的思想，它在政治上可能是可以实行的。此后，抵抗主义的理论应放弃，代之以重新对现政权表示忠诚。

同时，流亡在外的威廉·阿兰在杜埃创建了神学院，训练英国传教士。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和耶稣传教士在罗马和西班牙一道受训，然后被陆续派往英国。到1580年12月时，100多名教士登陆。他们的一部分计划是要说服伊丽莎白相信他们，虽然信仰不同，但完全服从世俗政权，另外，就是给急切等待的天主教徒送来精神上的安慰。这双重目的在两个温和的耶稣会传教士埃德蒙·坎皮恩和罗伯特·珀森斯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俩否认相信天主教就是自动叛国的观点，坚持认为他们的使命纯粹是精神上的。但是，北方叛乱、无数与玛丽·斯图亚特有牵连的阴谋和狂热的天主教徒菲利普二世的所作所为对和解的前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50年的宗教改革宣传，加上无敌舰队的入侵使得人们对天主教的憎恨一下子爆发了；有关天主教阴谋的传说引起了一系列的骚乱，这种骚乱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詹姆斯二世统治期间。伊丽莎白和伯利在受到国际上的威胁之后，满足了新教徒的愿望；政府采取了新的宗教迫害政策。1558年到1577年之间没有一个天主教徒受到迫害，但是1577年到1603年之间，约有200名牧师和世俗人士遭到迫害。1584—1585年，议会通过议案规定，只要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谁是天主教神父谁就是犯了叛国罪，这时，天主教徒面临了真正的危险。1558年以后成为神父的天主教徒必须在40天内离开英国，否则将受到指控。

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经历了许多考验，如战时经济、爱尔兰危机、埃塞克斯叛乱和从1595年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598年的饥荒。且不说灾难性的1556年、1594—1597年的农业歉收是自1482年和1527年以来最严重的，再加上战争的影响，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1597—1598年和1601年的济贫法对一些教区提供了有限的救济，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其它救济措施。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社会福

利。进而言之，伊丽莎白时期颁布济贫法主要针对流浪汉和日益增多的城市骚乱，而不是出于对穷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关心，议会里的富翁们也持同样观点。

然而，都铎王朝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在改善国内住房条件方面，从而缓和了人们因担心都铎王朝衰落而产生的悲观主义情绪。从1570年到1610年虽然没有什么辉煌壮观的事情，但是这些年是英国住房革命的第一个重要阶段。遗产记录表明，在1530年到1569年期间每个家庭平均有3个房间；从1570年到伊丽莎白统治结束，则平均有4—5间房。1610到1642年是住房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平均每个家庭有6间以上的房间。1570年以后富裕的自耕农也许有6—8间房。1500年时，小农只有一间茅房，此时他们渴望能有2到3间房。富裕农民家中常常有客厅、卧室，并用烟囱代替了敞开的壁炉。穷人爱住平房，一间挨着一间；在原有的小茅屋旁再建上一间卧室和厨房。厨房常常单独建在离住房稍远一点的地方，这也许是为了防火的缘故。在伊丽莎白晚期，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常常被描绘成这样："有三架间的住房、三架间的谷仓和一架间的厨房"。这时住房内部的设施也有了改善。在1570年前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平均一个家庭花在家具、餐具和炊具上的钱大约是7镑，在1570年到1603年期间是10镑10先令，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它上升到17镑。富裕家庭的财产在1570年到1610年期间上升了250%，中下层人家产上升的比例还要稍微高点，其比例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在伊丽莎白时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住宅非常豪华，很有特色。它反映了都铎时代社会稳定和日益上升的享乐标准。16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建筑日益受到中世纪哥特建筑和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响。罗伯特·史密森在1591年到1597年期间为德比郡的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设计建造了哈德维克大

厅，该建筑有大量玻璃窗，高而对称，向剑桥国王学院附属教堂之垂直之美表示着敬意。但是，如果说伊丽莎白时期的建筑在外观上属于新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其内部结构却变得更加复杂。不管怎么说，新中世纪的庭院、门房、壕沟、护墙、塔楼和城堡在都铎王朝时期都已成为装饰品，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哈德维克大厅的护墙呈E.S.(伊丽莎白·什鲁斯伯里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型——这种装饰性的设计表明这个家庭是个暴发户。砖砌的烟囱成为都铎时期宅第的共同特征；它们标志着贵族使用厨房和佣人时代的到来。厨房和佣人的住处不是处在建筑物的一侧，就是设在地下室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利用地下室逐渐变得很普遍，在空间有限的城市里尤其如此。家庭佣人的地位下降到了最低层，300年后，他们才被解脱出来。

然而，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伊丽莎白时代住宅的建筑风格第一次将家庭安逸和私生活的清静等同起来。中世纪住宅内的大厅依然保留了下来，但它成了长长的画廊，里面挂满了历史人物的肖像画。人们在这里常常举行私人谈话，而不受到来来往往的佣人的打扰。事实上，伊丽莎白时期的画廊是按照16世纪初期都铎宫廷画廊的模式建造的。在都铎王朝初期，汉普顿法院里沃尔西的画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527年，亨利八世和托马斯·莫尔就在这里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讨论亨利八世首次离婚的问题。同样，一楼的会客厅替代大厅成了家庭成员的起居室和吃饭的地方。家庭成员住在一楼或二楼上的卧室里，佣人在楼上楼下和地下室里忙碌不停；他们住在楼顶上的房间或塔楼里。结果，楼梯整日响个不停：这种木制结构逐步成为一种建筑特征。最后，淡水的供应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公共卫生和个人身体健康的关心。在城市里，居民经常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去解决污水排放问题，有时集资交给市政当局，或者时常到王宫或威斯敏斯

279

特提供劳役以换取水和解决污水排放问题。

在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艺术和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很 280 大的进步。尼古拉斯·希利亚德是伊丽莎白时期影响最大的宫廷画师。他的袖珍画维妙维肖，令人叫绝。希利亚德曾受过金匠方面的训练，因技艺不凡而获得肖像画师称号；他的画善于捕捉人的“迷人的魅力、诙谐的笑容、快若电闪的一瞥和其它的面部表情”。他的绘画风格主要是逼真和神似，它既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人物的形象，又能表现出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因此，希利亚德的袖珍画远远不只是一张普通的肖像画。希利亚德的绘画技巧是在亨特和布鲁杰斯的作坊里学来的。在那里，人们在精制的牛皮纸上作画，然后将画贴在硬纸板上。希利亚德为增强其效果将画贴在黄金制成的板上，“并用白鼬、鼬和其它小野生动物的小牙齿将黄金底板磨得铮亮”，看上去完全像金刚石。希利亚德做的嵌有珠宝、藏有纪念品的贵重金属小盒常被当作护身符，或者被君主、大臣、骑士和淑女们当作爱情的信物互相赠送。希利亚德的技艺后来传给了他的学生艾萨克·奥利弗，最后又传给了塞缪尔·库克。后来，由于照相术的发明，这种袖珍画渐渐衰落了。

都铎时期音乐的发展是在王室和贵族的赞助下进行的，而教堂礼拜仪式的需要、时代的发展以及中世纪有关音乐创作的清规戒律逐渐被淘汰、更多更新的音乐创作和演奏技巧问世，对此也有促进作用。都铎王朝的历代君主以及沃尔西枢机主教都是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的热心赞助者。亨利八世所拥有的乐器表明，他的这种爱好在英国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是可行的——亨利本人喜欢笛子和风琴。他和沃尔西争相为自己的教堂聘请英国和威尔士最好的风琴手和歌唱家。在玛丽时期，英国音乐受到了佛兰德和西班牙音乐的影响，而在同时，以帕莱斯特里纳的赞美诗和佛罗伦萨的小夜曲作品为代表的意大利音乐一直对英国产生着潜在影

响。伊丽莎白拥有一个由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组成的庞大的宫廷乐队。王家教堂是都铎时期音乐人才的荟萃地，托马斯·塔利斯、威廉·伯德和约翰·布尔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幸运的是新教改革促进了音乐创作活动——爱德华国王、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使得宗教音乐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许多人包括伯德和布尔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也都活了下来。不过真正重要的是音乐得到了发展。伯德和布尔逐步地摆脱了旧的宗教音乐模式和老的音阶的束缚。塔利斯和伯德获得了印刷乐曲的许可，虽然没有成功，却成为乐谱印刷的开拓者。旋律、和音和节奏像无伴奏齐唱和多声部音乐一样对音乐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修饰技巧和即兴创作在古代钢琴、笛子和其它乐器的演奏中都十分盛行。这些预示了 17 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音乐创作的发展，也最终预示了 J.S.巴赫音乐创作时代的到来。

都铎时代在一种含糊不清的标志中结束了，其特征在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伊拉斯谟的智慧、莫尔的讽刺小说(尽管用拉丁文所写)表现了欧洲在宗教改革前的丰富的思想渊源。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约翰·奇克爵士和罗杰·阿斯卡姆将文艺复兴思想用平淡的、但还说得过去的英语散文形式表现出来。托马斯·怀亚特爵士、苏里伯爵、亨利·霍华德和菲利普·西德尼赋予英国的抒情诗以新的活力，重新使 14 行诗成为富有表现力的古典的创作形式。但是，自乔叟以来重新弥补了英文诗中不足并加以完善的人是埃德蒙·斯潘塞。他使诗歌成为音乐，使耳朵和舌头之间出现了紧密的联系。斯潘塞完美无缺地掌握了韵律、时间和声调之间的联系，而这一点绝不是对古人的简单模仿就能实现的。尤其是，他十分和谐地将英国北方、中部和南方的方言混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如同笛子演奏那样的抑扬顿挫、变音和变调的效果。他的田园组诗《牧羊人的日历》(1579 年)是英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它

那优美的旋律叙述着田园生活的痛苦与欢乐：

听鹁鸣啾啾婉转激扬，
常在那荒凉的山梁上歌唱，
听鹁鸣我心旷神怡，
282 胜过在夏日艳阳下的游玩；
鹁鸣声声引起四周丛林回响，
初春里绿荫中的小鸟与你欢声歌唱，
也有的小鸟因不及你的歌喉不愿歌唱。

斯潘塞的杰作是在1589年到1596年间完成的《仙后》。这是一首寓言史诗，它从各个层次探讨了伊丽莎白末期国家组织的性质。诗的形式既属于中世纪的，又属于文艺复兴时代。在1580年以后，哥特式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建筑上，还反映在文学上，反映在它对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面。细节很重要，它们能使结构对称，对总的文学效果来说没有坏的影响。重要性在于《仙后》是一首寓言诗。正如斯潘塞在写给沃尔特·罗利爵士的献词中所说，"在《仙283 后》中，我说的荣耀是泛指的，但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我赞美最杰出、最光荣的女王陛下和她在仙境中的王国，在另一些地方，我把她比喻得很朦胧"。换句话说，斯潘塞的寓言诗一半是宣扬道德伦理，另一半是说故事。在这首诗里没有直接了当、简明易懂的句子。然而，这首诗像他以前写的《皮埃尔庄稼汉》和以后写的《朝圣》诗一样，使读者一步步踏上鉴别真伪的道路。在诗中，伊丽莎白政府的抱负、腐败、阴谋和世俗思想都被升华了，进入了一种欢快的仙境，这种仙境掩映在浪漫的田园风光之中，被誉为格洛利亚娜黄金时代的体现。

然而，斯潘塞的诗绝不可能影响到伊丽莎白的政府。他对罗利说，他"总的目的"是要"以道德和温和的戒规来重新塑造士绅和贵族"。然而诗中含糊不清之处太多，斯潘塞显然认为他的目标已

经过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方法使得骑士制度变得可笑和讨厌。乔叟时代充满活力的、完美的、信奉异教的骑士们已经被都铎时代的王公大臣所替代。如果黄金时代曾的确存在过的话，那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常将今日的世界
与过去的世界相比，
那是人类最强盛之日，
是道德之花绽开之际；
我感到了今昔世界的差异，
悠悠岁月，漫漫长河，
人类的航船偏离了方向，
从它当初的源头，
深深地误入了歧途。

斯潘塞在《仙后》中的寓意无疑过于复杂了，他试图在一首戏剧性的史诗中表达人类世俗化的、理想的行为准则是注定办不到的。此外，读者必须解开他无数的拟人化的诗谜，如他将伊丽莎白比作月亮女神狄安娜（或辛西娅、贝尔福比），将沃尔特、罗利比作提米亚斯，将玛丽·斯图亚特比作杜莎——这词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指在神学上弄虚作假等。斯潘塞写诗作乐的本领是很大的，但他以诗说教的努力失败了，这使我们对他的绝望和失落感有了更深的理解，使我们不受格洛利亚娜神话的迷惑；艺术是一面"天然的镜子"，它反映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的形式和承受力"。

另一面真实反映都铎时代的镜子是不朽的威廉·莎士比亚。他创作了 38 部剧本，其中有《汉姆雷特》(1600—1601年)，《李尔王》(1605—1606年)，《奥瑟罗》(1604年)，还写了 154 首 14 行诗(1593—1597 年)，以及《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和《卢克丽斯受污记》(1593—1594 年)。莎士比亚对英国和欧洲文学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他的

作品所具有的活力、力量和精湛的技巧是欧洲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相比的；他的天才胜过乔叟和坦尼森，这一点无须多解释。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莎士比亚不像弥尔顿和伏尔泰那样是“理性的”或“精英”作家。他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斯特拉福和伦敦而不是牛津和剑桥。他的世界完全是世俗世界，是生老病死、金钱、商业和啤酒馆，这些就是他无与伦比的戏剧和诗歌的素材。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也许是他具有无限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作品里没有固执偏见及文人的酸味。

284

然而，莎士比亚的经历表明他处在欧洲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大约在1580年以后，欧洲文学在不断探索和表现近代人的思维过程和表现方式。作者和他们书中的人物都表现了人的一般经历和自己的特殊感受。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博士》(1592年)集中体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以戏剧形式来描写个人经历的手法；剧中的人物都表现出内心的绝望以及屈服于无法抗拒的个人动机。《汉姆雷特》是上述两部戏剧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莎士比亚用人们所熟悉的情节创造出一部不朽的杰作。但是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差得并不远。两位剧作家都渴望从心理角度，而不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这两部戏剧的差异是浮士德并没有超越自我和装腔作势的戏剧性表演从而实现自我分析，汉姆雷特的主观反省和自我怀疑是他全部行为的基调。

> 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
> 《汉姆雷特·第二幕》①

① 译文参见《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下同。——译者

16世纪初，科利特和他的朋友宣扬新柏拉图哲学，主张客观评价人的感觉、自然和真理——这反映了中世纪人的气质。然而，约80年后，在加尔文教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又注重强调主观性和自我表现，强调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人要追求真善美就必须仔细进行自我分析。加尔文主义宣扬上帝选民的思想，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的奴役，并用其观念来取代骑士制的思想。

尽管马洛和莎士比亚没有完全垄断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但占据了主要的支配地位。15世纪的寓言和道德剧一直很兴盛，但到后来也衰败了，尤其是在切斯特、考文垂和约克这样的外地城市里。然而，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环球剧院展示了一个新的灿烂的世界，在这里，新教改革的影响和都市生活的复杂性造就了近代英国人喜闻乐见的戏剧。自我表现、人的个性、自白都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是随着教育的普及、识字人的增多、非国教意识的出现和人们眼光逐渐转向俗世而渐渐发展起来的。 285

然而，汉姆雷特的忧郁最终战胜了他的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命运茫然不知，也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
> 《汉姆雷特·第三幕》

都铎王朝末期也给予人们这样的感觉。1603年3月24日，当哀悼格洛利亚娜时代的结束的丧钟长鸣之时，伊丽莎白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伯利早在5年前就死了，一代新的、野心勃勃的不拘一格的王公大臣崛起了。在伊丽莎白死时，都铎王朝获得

了许多成就，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宗教改革、击败西班牙、挫败极端的新教和天主教分子、统一不列颠；然而，人们易于将这些成就神话化，并给予过多的赞誉。现实生活更具有磨损作用。由于社会结构的腐朽，稳定的社会出现了不稳定，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相对来说变得更加削弱。王室的财政资源变得越来越贫乏。国防力量也很弱，因为伊丽莎白极不明智地让她的陆军萎缩了，而英国海军力量只能依靠武装的私掠船和海盗船。宗教极端分子不再大叫大嚷，但他们并没有被国教所同化。最后，济贫法的一些好处在许多方面仅仅因为人口的增长就被抵销了。

到 1603 年时，伊丽莎白的惰性和袖手不动造成了一种预示着全面改革到来的型态。乡村不声不响地变得无法控制，英国无法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战争必定会引起国内的政治摩擦。这并不是说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全面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这时还没有出现导致内战的重要因素。然而，都铎王朝留下的少得可怜的国家税收遗产、不健全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官僚机构内流行的腐败行为最终只有通过内战和政权暂时中断才能治好。10 年的军事独裁使得英国人在1660年清醒地认识到复辟君主制的代价实际上是便宜的。

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

（1603—1688）

约翰·莫里尔

斯图亚特王朝是英国历史上成就最少的王朝之一。查理一世 286 以叛国罪受到公开审判，并被斩首示众。詹姆斯二世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抛弃了国家和王位逃亡国外。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二世是平安地在他们的病榻上寿终正寝的，但詹姆斯一世生前眼看着自己一切希望逐一破灭，所有的抱负迭遭挫折，而查理二世外表上虽取得了成功，却是个毫无雄心壮志的平庸之辈，他虽有获得平静安逸生活的愿望，但很晚才得以实现，以致未能在生前加以享受。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最突出事件是20年的内战、革命和共和国的实验，这些事件本应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历史进程，但改变如果说有的话，也是无从捉摸的。不过，当王公们和将军们奔波操劳——失败之时，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易被人察觉，而且完全不是按照政府的意愿而进行的。事实上，17世纪英国最明显的革命是由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

英国的人口，如果不是说更早的话，也是从16世纪初就开始不断增长，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期。1630年，英格兰人口总数可能接近410万人（给人印象更深的是，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大约是190万人）。到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达到顶峰，将近530万人，而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从600万人增加到770万人。此

后，这个数字基本稳定，或略有下降，在英格兰下降到490万人，不列颠降到730万人。1650年前，除因瘟疫造成人口暂时下降外，人口基本上呈稳步增长之势，此后则转而下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令人费解。最近的研究认为家庭进行计划生育的习惯为主要原因。像英国这样一个土地肥沃、气候从未坏到毁掉全部收成的国家，一旦消除了瘟疫的祸害，人口就会增加的。每对结婚的夫妇都有可能生育较多的孩子，使他们长大成人，从而保持人口的数量。事实上，由于有晚婚的习俗，英国人口增长率一直较低。在所有的社会集团里，男女双方往往把结婚年龄推迟到25岁左右，这样妻子的生育期只有12至15年。晚婚形式出现的原因看来在于双方要在婚前积攒足够的钱以便能独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对家境较好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进大学、接受法律训练或是当七年或更长时间的学徒；家境较差的则需要长期为别人干家务劳动，靠仅有的微薄工资过活。

这种晚婚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7世纪后半期，这时结婚年龄甚至更大，这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要获得足够的积蓄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么说，初婚的平均年龄看来又推迟了两年，到了26岁以上，这势必对生育有所影响。更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想要对家庭的人数加以限制的迹象。一个有3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显然想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再次受孕。例如，为了降低生育，母亲在哺育第三个或以后生的孩子时，哺乳期要比第一、二个孩子长几个月。简陋的避孕方法和节育的现象也较普遍。对贵族家庭进行的某些研究表明，独身现象变得更加普遍（海军的发展可能就与这种预料不到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17世纪后半期时，南威尔士每3个主要贵族家族的家长中就有一个未结过婚，而在一百年以前，这个比例几乎等于零。而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从5个降到2.5个（在婴儿死亡率较高的情况下，这些家庭中有很多实际

上不复存在)。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对所有的贵族或其他社会群体都具有典型意义，但它生动地反映出变化着的人口结构情况。

人口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640年以前的一百年中，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增长，这就造成了在某些地方有时粮食短缺，严重时则发生饥荒，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伦敦就可能有饿死人的情况，16世纪20年代初坎布利亚有不少人饿死，则是肯定无疑的。在此以后，饥荒已不再成为现实的威胁，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农业的增产、良好的交通及信贷系统和人口数量的稳定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英格兰避免了周期性的粮食匮乏和大规模的饥荒，但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仍继续威胁着大陆上的那些邻近的国家。

人口增长的另一经常的影响是物价的上涨。在1500至1640 289 年之间，食品的价格长了8倍，工资增加则不到3倍。对大多数自己不生产粮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养自己及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人来说，这一世纪是财政亏损的世纪。特别是对那些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动工资为生的人来说，其生活水平在这一世纪中大大下降了。实际情况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绝大多数——需要购买他们的大部分食物，这样他们所花费在食物上的钱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是政府不得不关心调整粮食贸易，并设立具有法律制裁权力的地方机构和行政法规，以保证在粮食歉收的时候可以以最低的特价供应粮食和其他的农作物。

人口增长不仅对食品资源，而且对土地也增加了压力，对那些平均生育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他们或者平分家产，减少下一代每个成员的所得部分，或者其中一个儿子分得家庭的自有土地或租地，而另一个就得设法养活自己。农产品价格的高昂使得耕

种土地有利可图，或者去开垦那些迄今经济效益不高的土地。然而17世纪初，大部分地区可利用的荒地已所剩无几。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发现有的耕地，尤其是在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带，那里（由于海水泛滥和冬天雨水太多的原故）的现有条件利用率极其有限。但是排干沼泽或清除林木的费用很高，必须有敢于冒风险进行投资的人，必须使住在那里的居民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计以及原有的小康家产。于是政府再一次被迫在鼓励提高生产力和防止那些受害者的诉苦和抗议之间进行不断调停（更多的是犹豫不定）。

人口的增长对就业也造成了压力。17世纪初英格兰失业现象极为普遍。农业仍是就业的主要源泉，但田间劳动是有季节性的，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一年中只要用部分时间打短工就可，无需全年进行劳动。然而由于劳动力充裕而又便宜，由于大多数手工业工场完全依靠体力，而不利用能把大多数工人吸引到它附近的某种能源，又由于原料散布在各处，有的生长在地上，有的埋藏在地下，因此17世纪的“工业”是在农村的茅舍和外屋里进行的。对有些人，尤其是在金属制造和建筑业劳动的人来说，“制造业”是赚钱的主要来源；对其他人尤其是从事某些纺织行业的人来说，这是首要的或辅助性的收入来源。纺织业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制造业”，英格兰各地将近有20万名工人，主要在西南部、东盎格利亚或奔宁地区。然而，纺织是一项特别不稳定的工业，食品价格的昂贵 290 影响了国内市场，17世纪初的战争和外国竞争又大大缩小国外市场。成千上万个家庭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收支平衡。如遇残疾或死人他们就尤其会感到入不敷出。该领域长期存在着“半失业”现象；这是由于过多的半日工寻求全日工而引起的结构性问题。

在赫特福德郡的奥尔纳姆，大约1/10的家庭需要定时从济贫税中得到补助，还有1/4甚至1/2的家庭有时需要领取救济物或补

贴(如燃料或衣服)以度过难关。很多家庭要靠行乞、捡柴、采野果或掘野菜,以及从当地的慈善事业或税收中不定期地申请补助(即所谓“临时经济措施”)才能生存下来。农业领域就业的困难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迫使大部分男人和妇女进入城市——首先是伦敦;但是城市的就业问题不仅不比农村好,而且更为变化莫测。城镇里有很多不熟练的临时工,他们在工商业紧缩或农业歉收时很快就被裁减掉。食品价格昂贵使得人们无法购买其他商品,这样就又缩小了靠非农业工资过活的人的数量。那些最需要附加工资以购买食物的人,看来最不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制订并监督执行一个全国性济贫规划,颁发有关地区迁徙、房舍建筑和促进海外贸易的附加法规。这样,人口的增长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职责和义务,而这些都是王室的财力资源和能力所不一定负担得起的。那些生产并出卖货物的人,或者利用土地紧缺而增加租税以获利的人,或者服务于日益复杂和不稳定的土地和商品市场的人(主要是律师),都想坐享其胜利成果,另一些人则指望王室能阻止并缓和这些重大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充满活力的经济中,政府必须在各竞争性的、无法调和的利益之间作出抉择。难怪王室感到成为众矢之的,威信越来越低。

相比之下,到17世纪后半期,这些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渐趋缓和。人口的少量下降防止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关于17世纪农业变化的性质及范围,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已不再是个只进口粮食的国家,而是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当然,为了保证剩余粮食不被囤集起来,必须给予奖励。这个巨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大规模扩大耕种面积的结果——或者是开发未耕种过的土地或者是改进耕种计划。但也可能是施行了新的耕种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大大增加了田地的产量。由于更好地更换品种和更广泛地施用粪 291

肥和肥料，这样就有可能增加粮食产量和饲养更多的家禽。几乎所有这些后来一直沿用到 19 世纪、使英国农业发生变革的思想早在 1660 年时已为人所知，而且大部分已在尼德兰试验过和实行过。问题是要了解这些方法是怎样会迅速地被采用的。保守势力极其顽强，自耕农之间更是如此；在教科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好的想法和那些同样表面上貌似有理但实际上似是而非的东西被混杂在一起；真正有效的方法需要使土地能合理使用，而有些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该世纪前半期最风行的革新不是那些可增加产量的方法，而是那些能够吸收廉价的剩余雇工——尤其是将“工业化”的商品作物，如染料、烟草、桑树（用来养蚕）等转变为手工业生产的方法。只有在人口下降、实际工资提高和粮食价格下跌时，提高生产力才能取代扩大耕种面积的愿望成为主要动力。土地出租方式的改变使地主看到了可能收回出租土地时所投资金的较好前景。新的耕种方法可能会使前些时候建立起来的单单靠增加耕种面积的情况得到巩固。不论如何，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和对工资的调整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没有必要了。

292 在 1660 年，英国仍存在许多区域性经济，它们即便不易达到，也力求自给自足。信贷和分配方面的问题阻碍了区域间产品的交换。大部分小市镇，甚至郡里的大城市陈列和出售的主要是本地的产品。但到 1690 年，情况就不同了。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的地区，如果英国王室在 17 世纪时能在许多问题上自行其是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使爱尔兰和苏格兰完全合并为或接近于海关免税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它归咎于议院的说客们维护自己狭窄私利的行为，1600 年前后和 17 世纪 60 年代尤其不是这样。在英国，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一个离海岸超过 75 英里的地方，由于有计划地改善内河航道，到 1690 年时，离可以通航到海的水域有 20 英里以上距离的地方甚少。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民族经

济逐渐形成。每个地区不需要再力图保持自给自足的状况，从而在贫瘠的土地或不良的气候条件下来生产质量低劣的商品。在充分利用各地的土地和气候的有利条件下，地区分工产生了，它们可以和各地交换剩余粮食或奶制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菜园种植在肯特普及开来。

在手工业工场方面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这样便造成的后果是一场零售业的革命——商店时代的到来，它反过来又进一步促 293 进了上述变化。小市镇的特点是售货摊或肉铺，在那里摊贩和零售商陈列由他们自己种植、制造或至少用本地原料制成的货物。在1690年，很多城镇，甚至较小的城镇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商店：不只是出售当地的产品，而是出售居民需要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店主要满足四面八方的需求。一个文件记载特别详细的例子是：一个名叫威廉·斯托特的人在17世纪80年代在兰开斯特以每年5镑的价格租借了一家商店。他到了伦敦和谢菲尔德，以一半现金(父亲的遗产)、一半借贷的形式在那里买了价值200镑的货物，并很快从四面八方购买了货物，向兰开斯特及其周围的人供应各种不同的产品，如西印度的糖、美洲的烟草、西雷丁的金属制品等。虽说如此，城镇一旦成为出售世界商品的中心，人们往往不去商品少的小城镇而到大一些的中心最大限度地选择商品。这就是17世纪所形成的城市大部分都集中在现有的大市镇的原因。20多个已有一万人口的城镇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而生活在较小的市镇的人口比例稍有下降。某些小的手工业中心，如伯明翰、谢菲尔德这样的冶金业城镇，或曼彻斯特、里兹这样的服装业城镇，亦或肯塔姆这样的造船业城镇，都成为著名的城市中心。但是1690年时20个最大的城镇几乎全都是原来1600年时的最大城镇。它们全部都濒临大海或可通航的河流。

大的城镇由于它们在市场中所起作用的变化而开始繁荣起

来。但是它们中有很多——尤其是郡城——逐渐成为既出售货物、又出售劳务的集结地。由于商店的吸引力和城镇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那里有数百人正式集合起来组成理事会和委员会），服务性行业和闲暇工业从而兴起。乡绅们和富裕的农民来到城里经商或开店，他们停留下来去听取律师、医生或地产经纪人的有关业务上的咨询，或带来家属住上一段时期进行一系列社交活动，如看戏、参加音乐会或其他娱乐。一个追求旅游胜地和娱乐场所的世纪已开始显出端倪。

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城市，17世纪中期时拥有35万居民。第二、第三大城市鲁昂和里昂，有8到10万居民。欧洲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25万，但只有100以上的城镇人口超过50000。然而，在英国，伦敦在1640或1660年人口就超过了50万。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争当第二，但都仅有人口25000人。伦敦比英格兰其余50个城镇加在一起还要大。无庸讳言，伦敦是在牺牲其他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海外贸易随之对早期银行和财政活动的压制是慢慢地才得到缓解的。因此很多输出港口的贸易必须取道伦敦。17世纪时主要的新的"再输出"贸易（从殖民地进口的原料，如糖和烟草，经过加工后运往欧洲）也集中在那里。伦敦在行政、法律和政治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当英格兰农村靠供养首都人民并维持温饱而获得繁荣时，城市的发展可能稍为缓慢一些。在1640年，全英格兰1/10的人住在首都，1/6的人部分时间住在那儿。到1690年，在英国最有钱的人当中有一百个是最富的伦敦人。财富不再是主要由地主们所享有的额外特权。

假如商品能够在民族经济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人民可能会更加固定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内战前后，2/3以上的英国人死于他们出生地以外的一个不同教区；但是他们大多并不远行他乡，而是留在他们出生的郡县。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迁移

形式。第一种是"改善性的迁移"，即青年和年轻的成年人外出去当学徒或租种农地，这种迁移在整个17世纪除了从全国各地到伦敦去当学徒的之外，主要都是在本地。第二种是"生存性的迁移"，即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或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不得不走上征途，经常是长途跋涉，希望能找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这种迁移在前半世纪较后半世纪更为普遍，部分原因是后期人口增长的停滞和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在家乡工作的更良好的机会，部分原因是希求得到救济的人普遍减少，使得济贫院的主管人更加同情那些身体健全的失业者，另外一个原因是严格的定居法禁止和不赞成这种迁移。1662年的一项议会法案给予警察和监工们以权力，他们可以处罚那些从一个济贫区迁移到另一济贫区去寻找空地或荒地并在那里建筑茅舍的人。

在英国历史上，17世纪可能是第一个人口迁移出境多于迁移入境的世纪。在此期间，大概有30多万人，主要是已成年的年轻男子，渡过大西洋移居国外。其中单独组成的最大团体是到西印度，其次较富裕的团体是到弗吉尼亚和信仰天主教的马里兰，还有一个小得多的团体到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人口移居的形式动荡不定，但在17世纪50至60年代可能达到顶峰。对大多数向外移居的人来说，寻找职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们外出的主要原因，然而少数人首先考虑的是摆脱宗教的迫害，希望能按他们所选择的祈祷上帝的形式建立教会。后来，由于犯罪或仅因流浪（尤其在17世纪50年代）受到惩罚而被强迫运往国外的人数越来越多，除横 296 渡大西洋的移民外，还有数目不详的穿过英吉利海峡定居欧洲的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可能是天主教家族的后裔，他们是去建立宗教团体或从事雇佣军的军事活动的。新教士绅的幼子们也参加了后者的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回国参加了英国内战。因此，16世纪英国被看作是著名的宗教避难所，而到17世纪欧洲和美洲都接收

从英国来的宗教避难者。与几十年前相比，17世纪初从国外来的移民可能少些；这一时期唯一重要的移民活动，是犹太人在克伦威尔政权取消限制他们在英国的居留权的法律后蜂拥而入；另一次是17世纪80年代，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为了逃避路易十四的迫害而移居英国。

远离故土在外建立家园的人很少，但是确实有不少人在英国全国各地周游。小贩、搬运夫和其他从事贩卖货物的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四倍。从事沿海贸易船只的吨位也以同样的数字上升。街道到处充斥着沿街叫卖的小贩，手里拿着小报、小册子、日历牌、劝诫性的故事和充满质朴智慧的小册子，此外还有卖各式各样小玩意的小贩和周游各地的卖艺人。假如说酒店一直是不同于农村生活中其他社交中心的消遣场所的话，教区的小教堂现在则成为它在传播新闻和信息以及形成大众文化方面强有力的对手。在本世纪初期，国家和地方对酒店的法规主要在于防止把过多的大麦酿成啤酒；而到该世纪末则更关心如何防止小酒店可能引起的骚乱。

296

在1540至1640年这一百年中发生财富从富人和穷人手中转向社会中产阶级的再分配。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从租税和服役中获得他们大部分收入，但它们很难和上涨的物价保持平衡；长期租约的传统和固定租金的惯例以及不稳定的"占地偿金"——租借权易手时交付的费用——对他们的收入都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些富有警惕性的地主们能随着物价上涨而采取行动，但许多地主警惕性不高。同样，那些靠农田和地产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也遭受食物价格上涨(更坏的是，价格涨落不定)之苦；而劳动力市场的过剩现象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得穷人更难于弥补他们的亏空。丧失土地的劳动者和村民的数目急剧上升。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无论是自耕农或商人，却富裕了起来。如果他们生产了超出他们需要的剩余粮食，便高价出卖并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多的粮食。他们还

可以将自己所获的利润借贷给贫困的邻人(当时还根本没有银行、股票、股份以及房屋互助协会),或取消抵押借贷人的赎取权。他们向更多的土地进行投资,宁可扩大他们的耕种面积而不去投资以提高生产率。他们中不少人由农民上升为乡绅。

17世纪时,英国只有两种人享有"社会"地位,即乡绅和贵族。其他所有的人只根据他们所起的社会经济作用来决定他们的经济上的地位(庄稼人、鞋匠、商人、事务所律师等等)。贵族与乡绅有所不同。他们有一种"品质"把他们和别人区别开来。这种"品质"就是"高贵"。贵族和绅士是"高贵的",其他人是"卑贱的"或"粗俗的"。这种观念部分来自封建的和骑士制度的传统,根据这种传统,土地是从国王那里接受来的,作为交换必须尽军事义务。这种义务早就消失,但这种占有了土地和"领地"就有了地位和"荣誉"的观念又重新复活。它是以把亚里斯多德关于公民的论点应用到英国的条件下而重新复活的。在英国,绅士或贵族应是不受统治的人。他们是独立的、悠闲的,即他们可以不劳而获,他们的收入能使他们不受别人控制或依赖他人。这样他们就有时间和闲暇去从事研究关于统治的艺术。他可以独立作出判断并培养作出决定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担任官职(如治安法官、乡长、民兵长官及警察等),所以他们不需都具备这种品质。但他们必须具有服役和管理的能力。绅士们应该是好客、慈善和公正的。他们在思想境界、个人爱好方面正如在财富上一样应能和他周围的邻人、自耕农区别开来。地位较低的乡绅和自耕农有同样的收入,但是他 297 们生活方式不同:绅士出租土地,穿着棉织品和麻织品、能读拉丁文,自耕农则是劳动农民、穿皮制品、用英语读、写。在1640年,英国大约有120个贵族和20 000个乡绅,占成年男子的1/20。土地的固定不变和土地收入的稳定性,使绅士们的活动限制在农村;而那些富裕的商人或手艺人,他们的收入可能比很多绅士都要高,并

且在他们的自治城市的管理中履行同样的职责，但是却得不到绅士的地位。他们必须工作，他们的资金和收入都没有保证。绅士们的年轻儿子们如果要去学习法律或进入商界当学徒，就不能再保持他们的绅士地位。但是他们可以从事某种职业，从而使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再次获得绅士的身份。有钱的商人或律师希望在他们晚年能够买一块领地定居下来，过一种贵族式的文明的生活。

到17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情况变得对田地较多的大农有所不利，他们交纳的租税高，劳动价格也较高，收益却较低。除非他们在提高生产率上进行大量投资，否则这种情况无法避免，但在这方面他们无法与大地主抗衡。大地主有他们大规模经营的好处。少数自耕农希望在服饰上也和绅士阶层一样穿戴打扮，但许多小绅士则放弃为了保持外表装束而进行的不平等的竞争。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商人和城镇官员们越来越大胆地坚持认为，他们自己与乡村的绅士们一样应该得到尊敬的称号。“绅士”阶层（gentility）的定义扩展到包括那些事先并没有购置土地的人们。这种“假绅士”越来越受到尊敬和广泛的承认，甚至连那些主管纹章等级的官员也予以承认。然而，他们却得不到许多乡村绅士的承认，这些乡村绅士深为他们珍贵的社会地位的贬值感到痛心。为了反对“绅士”这一称号的贬值，他们创造并推广了一个新的术语以恢复他们垄断权和重要性，他们称自己为“乡绅”（“squires”），称他们的集团为“乡绅阶级”（squirearchy）。

在1540至1640年这一世纪中，社会的中产阶级在牺牲下层、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牺牲上层人的情形下得到巩固发展。在1640年以后的一世纪中，广大贫穷家庭的困难得到缓解，大农场主和小地主感到的艰难增大，社会上层人士则大发其财。到1690年（虽然他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还刚开始）出现了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的利润、财富和权力都是从他们的地产中获得的，而他们得到这些财富和

权力后，又将之大大扩展到他们的地产之外。他们向商业投资，向政府贷款，开采在他们的土地上的矿产资源，改良耕地和出租耕地等。他们居住在其城镇里的居处的时间和居住在乡村的房舍中的时间一样多；他们在伦敦家里和社会上层人物聚会的时间和同乡下的邻居呆在一起的时间一样多。他们建立了包括许多贵族在内的(但也不限于贵族)、由一些特别富有的人所组成、在文化上属于世界主义的上流社会集团。这种新现象当时就得到了认可，它需要一个集合名词作称号。于是贵族(aristocracy)这个名词便产生了。(这个名词原来是像民主这个名词一样，只是由政治思想家应用的，而不是由社会分析得来的)。在17世纪后半期，“乡绅”一词的创造和“贵族”一字的应用，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社会进展的情况。城乡的结合、大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经济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变动性等都包括在人们相互生活在其中的某个门类中了。到1690年，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和单一的有钱精英。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大门，不是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限制在陈旧的特权观念和摆脱不掉的关于出身纯正的老框框中的。 298

政府和法律

斯图亚特王朝政府对这些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了解甚少，并且也无力进行控制。该政府拥有的财力和权力远不足以达到实现其雄心壮志所需要的程度；而这些正是大多数人民希望他们的国王以及国王们希望他们自己所能拥有的。

国王们所掌握的财政和政府机关的资源仍很有限。詹姆斯一世继承了每年35万镑的收入。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收入已增加到每年100万镑，到80年代则增加到200万镑。这种增长是相当可观的。它说明在整个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在和平时期的财政资源是能够应付它的活动需要的。当这一世纪消逝时，从王

室土地、王室封地和王室特权所得的收入下降为整个王室收入的极不重要的一部分。王室的一般税收占了从商业税收中所得收入的绝大部分。这些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包括：进出口物品的关税以及向日用消费品（主要是啤酒）征收的消费税。只是在内战和大空位时期（当时国家的收入绝大多数来自财产税）直接税才在预算中起了主要作用。在1603至1640年和1660至1689年这一段时间内，王室收入来自直接税的不到8%——肯定要少于14世纪和16世纪。这里部分地反映了地主在下议院控制了征税权，但也反映了在行政上存在的弊端，这种弊端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和税收分配的是否公平。

商业的活跃，尤其在1630年以后的商业发展，是使王室收入稳步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增长远远超过了物价的增长，使得斯图亚特王朝成为欧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负债最少的王朝。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二世都挥霍无度，常过分轻率地收买他们的奴仆以求获得他们的忠诚和好感。然而公正地说，斯图亚特王朝的问题应该归咎于伊丽莎白女王。在16、17世纪，整个欧洲各国的王公们都利用遭受暴君的或异教徒的外国入侵危险为借口，制造新的征税形式，而这种税收往往成为永久性的，即使入侵的威胁已经消除或已被击退。在17世纪90年代，当英国受到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和顽固不化的詹姆斯二世的袭击威胁时，威廉三世正是利用[290]这一形势而改变他的税收政策的。由于斯图亚特王朝从未真正面临过入侵的威胁，他们未能找到有力的借口以坚持实行财政上的革新。伊丽莎白一世在无敌舰队的年代有一次极好的机会，但是她年事已高，大臣们又加以劝阻，所以她根本没想去尝试一下。相反，她以出售土地的收入偿付战争的费用。虽然此事并未使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处境像一度想象中的那样困难，但它造成了重要的后果：它使国王丧失了借贷的抵押物。

斯图亚特王朝只要用心经营，就可获得足够的收入和收支平衡的预算。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几乎只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没有破产过，他们只有一次在1670年必须延迟对借款支付利息。不过他们从未有足够的钱以进行能获胜的战争。因为在整个17世纪中，直到1689年，从未有一个国家要入侵英国或对它进行宣战，有时情况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严重。英国分别于1624至1630年和1655至1660年对西班牙、1627至1630年对法国、1651至1654、1665至1667年和1672至1674年对尼德兰开战，但都是作为侵略者。不能认为这些战争使那些鼓动它们的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谁也未遭受损失，因为妥协的结果是维持原状。尽管争夺殖民地（南亚、非洲、北美、中美、南美）的斗争加剧，但没有割让土地之事，扩张的行动稳步进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欧洲大陆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徒劳无益。这种看法使得海军投资逐渐增加，而所有大陆国家都发觉到，陆地上的战争阻碍了他们海军的发展。1689年，英国海军的力量与荷兰、法国相等，但后来的25年战争使得英国有了欧洲最强大的海军。作为一个原来无力执行积极对外政策的国家，英国到了本世纪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得到了大大改善。

政府缺少强制性的力量，它没有常备兵或有组织的警察人员，甚至连保卫国王和他周围作为仪仗的警卫队也是在复辟时期才创建起来的。1603至1640年国王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召唤的武装人员，为数只有几十人，而不是上千人，1660年以后英国常备武装人员可能近3000人，在爱尔兰和丹吉尔（这是查理二世从他葡萄牙的妻子那里作为嫁妆获得的令人头痛的领地）则要多一些。此外还有数千名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随时召回的编成团的英格兰人，他们和荷兰、葡萄牙军队一起服常备兵役。但是英格兰境内没有军事力量，而且除了在西部禁止非法种植烟草和有时逮捕宗教的异端分子以外，直到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才出现了军队。

当然，内战开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643至1644年冲突高潮时，将近有15万武装人员，这占成年男子人口的1/8。但到300 40年代后期，数字已经下降到25000。到第三次内战即反对年轻的查理二世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时(1650—1651)，军队又增加到45000人，而在50年代后期又有所下降，维持在10000到14000人之间(虽然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有多达18000到40000的人在各特定时期服役)。在英格兰军队被派到各地进行驻防。伦敦明显地成为有军队设防的城市，将近有3000人左右的军队驻扎在每个公共场所(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它的大殿成了军营)。军队干预当地的行政和政治事务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对地方上的教会，因为驻军经常保护和培育那些极端主义的和分离派的礼拜堂)。军队既是共和国政府少数人的唯一的保护者，又是一种怨愤情绪的源泉，这种怨愤影响了居民中大多数人，使他们无法长久地接受弑君之举和革命事件。

在该世纪其余的年代里，反对国外入侵和国内叛乱的第一道防线不是正规军而是民兵；他们未经过很好的训练，装备一般，由本地士绅们纠集和领导，通常是一支仓促建成的本土防备力量。这些士绅由国王任命，但不隶属于国王。他们把积极的服役或愤怒地开枪射击，看作只不过是他们在1642至1645年所作战争努力的一部分。

当时根本没有警察。犯罪行为很少由当局进行"调查"，而是由301 受害者或受害部门向治安法官提出控告和证据而进行裁决。逮捕则由村里的临时民警(由普通农民或手工业者轮流担任一年)或地方长官(也由士绅们轮流担任)来执行，后者则由几个拿薪的低级官员加以协助。骚动和更大范围的骚乱只能由民兵或"地方民团"①

① 原文为posse comitatus。据英国习惯法，郡长可召集15岁以上、身体强壮的男性居民维持社会治安或执行遭到暴力反对的法令。——译者

来对付，后者由自由领地持有者组成并在需要时由行政司法长官临时召集。

王室的强制力量并不强；它拥有的官僚机构也很小。在17世纪30年代，支薪的官员人数不到2000人，其中有一半实际上是国王的私人家仆（如厨师、马僮等）。统治着英国的“文职人员”，或者说是领取薪金来统治英国的人员，其人数还不到1000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和枢密院工作的办事人员极少。决策者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明显地由于缺少情况收集者和存放可资查阅的有用资料的文件柜而受到限制。在17世纪，因海军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情况的改善（国库作为建立部门的预算和财政预算的机构出现了）使文职制取得了进一步的扩展。内战本身带来两件珍贵的副产品：即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取代官方报告中的罗马数字和印刷情况调查表。尽管枢密院在1603至1640年之间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在查理二世时期又增加了两倍，工作效率仍不断降低；尽管在枢密院之下建立了外交事务、贸易和殖民地等方面的小组委员会，但并未能使之达到伊丽莎白时期工作效率的水平。

在17世纪的英国，政府是经过“同意”而进行统治的。我们这样说通常是指政府的事务是由议会决定和通过议会讨论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意谓着，政府要由全英国的不支薪的、自愿的官员来决定并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在17世纪初郡政府掌握在近3000个杰出的士绅手中，而到17世纪后期，为5000人。他们是由王室挑选出来的，但是这种挑选的余地事实上限制在每个郡从80个最富有、声望最高的家族中挑选出约50人出来。实际上，在这些士绅家族的首领中，除了那些太年轻、太老、太粗野或过于笃信天主教的外，全都会被任命的。在200个左右的自治城市中，权力掌握在12—100人的团体内。在多数自治城市里，这些人组成一个恋栈的寡头集团；在很多地区（尽管占少数），选举是在有选举权的人数

较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是在17世纪80年代，乡村和城市少数上层人士利用特殊地位掌握权力的行为才真正受到挑战。

我们不可过高估计政府依靠地方精英自愿支持的意义。这些精英既控制了税务的摊派和征收，以及民兵的给养、训练和部署，还控制了社会和经济立法的执行、对大多数罪犯的审判以及逐渐加强的强制实行宗教信仰划一。他们的自治权和威望在复辟时期 302 确实比在战前时期要大一些（王室复辟实际上是乡村的士绅而不是国王和议会的胜利）。17世纪的统治艺术就是说服那些统治着市镇和乡村的人们，后者自己与国王之间存在着利益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利益一致是有目共睹的。国王和乡绅有共同的政治词汇；他们有同样的社会概念；他们对不稳定的秩序和社会安定同样感到关心和焦虑。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服从国王，即使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意愿。正如一个绅士对一位不满1625年强行征收非法捐税的朋友所说，"我们不能给我们下面的人树立一个不服从的榜样"。地方精英也参与了当地的无休止的争辩、竞争和利害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涉及传统做法和荣誉，也可能涉及税收和捐税的分配，以及提升官职或者对改建道路和河流等进行投资。对上述事件国王和枢密院是公认的裁决者。所有地方上的官员都需要王室的支持以维护他们在该地的影响。但是，假如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不与国王合作，那就不能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理政的艺术就在于能使地方上所有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为它效力。在1603至1640年期间大多数官吏都在尽其职责，即使要完成的任务使他们感到担心或惊恐。1660年以后，对内战可怕的回忆也产生同样的效果。只是在1641年查理一世和1687年詹姆斯二世专心为自己而不顾其他时，他们才放弃了和那些享有大量土地、财富和权势的集团打交道，这时王权与乡绅之间利益的一致才消失。

当我们抱有上述表面上的一致性的看法时，我们也不应低估

王室对那些形成信仰和观念的机构的控制力量。王权从未停止过对中小学、大学、教堂和印刷业的控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控制逐渐减弱了。但大多数教师、牧师和作家在大部分时间里拥护王室的权威并支持现有的社会、宗教观念。这一现象在下述事件中即可清楚地看出来：劳德大主教和他周围的人（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他们企图使英国教会革命化）的思想在牛津和剑桥通过精心安插的教师迅速地传播给整个大学生一代，这也许是极为明显的例证。同样，在17世纪80年代，君主具有神圣权利的理论在大学毕业的教士中的影响比在大多数居民中要大得多，这也是国王控制了大学的主要职务部门的结果。在王政复辟时期，克拉伦敦伯爵告诉议会，克伦威尔未能控制住学校的教员和导师，是英国国教在17世纪50年代所以兴旺一时并且在国王返回时遍地都建立起来的主要原因。他向政府发誓保证全体教师政治上的忠诚和宗教上信奉正统信仰。有资料证明，在17世纪后期，这样的做法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强有力地进行。甚至到1689年以后，当宗教集会的权利已给予不信国教者以后，不信国教者仍得不到开办并管理他们自己学校或学院的权利。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

303

可见，王室有着令人生畏但却是不牢靠的人力和物力。无论是都铎王朝政治制度崩溃并导致内战和革命的道路，还是君主政体和教会复辟重新建立起来的道路，都不是不可动摇的。与16世纪80和90年代相比，17世纪20或30年代担心、预测到（更不必说寻求）内战的人更少了。在17世纪60和70年代，很少有人认为共和主义和宗教狂热已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整个时期，内战的威胁表现在三个方面：王位继承问题全然未定；敌对的宗教派别斗争非常激烈，大陆

强国对英国和爱尔兰内部纠纷的潜在影响等。所有这些极其危险的问题到17世纪20和30年代都已消失或减弱。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无可争议，稳稳当当地登上了王座，英国天主教社团处于被剥夺的地位，但受到的迫害很小（他们要交纳不同的捐税和款项，并且不能担任公职），清教徒则企图通过在其被摧毁的组织和机构内发展自己的力量来接管教会。对清教的虔诚和狂热广为传播，但现在其主要特色是接受祈祷书和信条的基本形式和具体做法，只不过用他们自己增加的礼拜仪式、教义、祈祷会等对它们加以补充和扩大。最重要的是，他们试图使宗教大家庭精神化，这只是充实地方上教区的信仰，而不是向它挑战。不过他们所增加的形式乃是核心，祈祷书只不过是证明他们信仰基督的外表而已；但是清教与当局之间对立的程度有所缓和，清教徒为反对罪恶的国王而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的能力也消失了。最后，大陆本身内部冲突和矛盾的缓和也使得大陆上其他国王不再想干涉英国国内事务。凡此种种，使得英国在17世纪初摆脱了内战的危机，以后也没有发生逐渐走向违法和公开暴力的现象。恰恰相反，除了因埃塞克斯伯爵企图重新获得自己在朝廷失去的地位而发生短暂的混乱外，1569至1642年这段时间是英国享有国内和平最长的时期。在1605至1641年之间，没有一个贵族，也没有一个绅士曾企图反叛。这段时间中，的确只有一个贵族被处以死刑（卡斯尔汉文伯爵在1631年为了众所周知的色情罪）。一般说来，反叛和判刑的数字在数十年间不断减少。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英国也许是欧洲暴力最少的国家。在该世纪的前40年里，上演《汉姆雷特》和《泰特斯·安德鲁尼卡斯》时舞台上的死人也许比任何一次暴力冲突或多次冲突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从来没有听说发生过敌对集团之间的流血冲突和循环报复的杀戮事件。英国没有土匪、盗贼和武装流浪汉集团，除了

在苏格兰边境地区偶然有"沼泽骑兵"团伙。在16世纪后期，仍可 304
见到郡法官之间的斗争和辩论白热化以至殴斗和动武(如16世纪70年代在柴郡和90年代在诺丁汉郡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到了17世纪，对法院机构的尊敬足以免除这种暴力行为。

英国人以爱打官司而著称，但这也反映出愿意服从国王法院的裁决的情况。不过，审判轻率、陪审团是拼凑起来的、对犯法者肆加恫吓和非法定的团体惩处犯法者等现象仍不少。杀人的事很快就终止了。1628年时白金汉伯爵曾遭到一个狂热分子的杀害，但王朝的其他官员们——总督、副总督、治安官员、郡长等，在任职期间很少有人被杀害或被打成重伤的。一些法警因扣押了那些拒不交税者的货物而遭殴打或被用草叉赶走；但一般说来，17世纪初的数十年中，在政府的各种主要措施中，法律和秩序是王室法权中具有最大力量的因素之一，也是使人民俯首听命的巨大力量。类似暴动(通常是因为缺少粮食或因圈地剥夺了村民或手工业者维持家庭基本经济收入的权利而引起的)的次数和暴烈程度也逐渐减弱。暴力的暴烈程度受到严格的控制，在骚乱中被杀死的人几乎没有。同样，当权者作出的反应也是有节制的：1629年，在一次骚乱平息后数星期，又在马尔敦发生了一次骚乱，有4个人因参予骚乱而被处死。在一般情况下，当局宁可调动最小的力量，推迟判决，在起诉的同时一面进行仲裁，或经过仲裁撤消起诉。骚乱并未对国家机构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形成威胁。

当代人中几乎无人期望爆发内战，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人们尚未认识到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英国可能已变得越来越难以统治了。飞机的乘机务员或乘客们都不希望飞机爆炸，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防止飞机发生爆炸。飞机有时发生爆炸可能是由于金属老化或机械失修，但有时也是驾驶员的过错。英国内战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不能用这样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但是英国的内战看来更多地是

由于驾驶员的过错而不是机械失修所造成。当代人以事后聪明来追溯这次“大叛乱”原因时很少追溯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以前的事。看来他们是正确的。

詹姆斯一世在许多方面是个极为成功的君主，但这并不排除他在性格和判断上存在着严重缺陷。与伊丽莎白女王恰恰相反，他对君主制和王权的性质有着非常清晰、精辟、连贯的观点——但他完全未能遵循这些看法。他知识渊博，写了有关政府的理论著305作，并和天主教主要的能言善辩者就神学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论。他还把他的思想和笔锋转向古代的、但在当时的盛行的巫术和当时烟草输入所造成的威胁。他认为君权直接来自上帝，只对上帝负责，并且只有上帝才有权解除对君权的信任；但他又认为他要受到自己在加冕典礼上的庄严宣誓，即要按照“王国的法律和习俗”来统治国家的制约。具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往往只是抽象的，在实际情况下，他发现自己只能通过议会进行立法和提高税收，同时，作为国王，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合乎司法的规范。他的特权，虽306然是上帝授予的，但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这方面，詹姆斯是言行一致的。他和他的议会，或者说是和议会的一些议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其中大部分是不重要的或是暂时性的。这样，当他在1621年向议会下院致词时说，他们的特权是他赐与的时候，就导致一场关于特权来源的争吵。不过，他只是说他有权对他们如何使用他的恩赐进行评论，而不是说他有权收回他的恩赐，这和他宣布过的任何此类权利和自由没有联系。正是这种不懂策略和在错误的时刻提出正确论点的本领使他从法国的亨利四世那里得到“基督教王国中最聪明的傻瓜”的绰号。

他最大的弱点不是智力上的而是道德上和私人生活上的。他的形象并不庄严，平时不修边幅，笨拙粗野，杂乱无章，大惊小怪。他所掌管的朝廷内部挪用资金、贪便宜的风气迅速地影响到政府

的效能和声誉。王室的贫困使得某些官员不得不用不正当的财源进行补偿。但在詹姆斯统治下(虽然在他儿子统治下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的公开形象由于一系列性犯罪和谋杀的丑闻而日趋恶化。例如在1619年,一位前张伯伦伯爵、一位前财政大臣、一位前国务大臣和一位前贵族抚恤金局长因涉嫌性或财政方面的案件而形容枯槁地被关在伦敦塔中。1618年,国王潜在的同性恋发展成了同一个小乡绅出身的年轻朝臣的风流事件。这位小朝臣在几年内成为白金汉公爵,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公爵。白金汉通过常年为病痛缠绕的詹姆斯控制了政府,并一直掌权到年轻、谨小慎微的查理一世登基、他于1628年被暗杀为止。这样一种可恶的形象使国王付出了惨重代价。他在财政上不能自我节制不仅增加了财政上亏空,而且使得公众不愿给予他适当捐献。

307

詹姆斯一世是个好幻想的国王从他所怀抱的希望和雄心来说,他是个失败者。他幻想能实行统一。他希望将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合一扩大到不列颠王国更充分的统一。他要把法律、议会和教会完全统一起来。但是他能做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经济联合、对共同公民身份的有限承认和拥有一个共同的国旗。他所寻求的"思想和精神上的统一"完全没有达到。詹姆斯的想法表现在他提出的温和、渐进的建议里。但是这遭到议会中士绅们的狭隘思想和消极反应的阻挠。他也想用他的三个王冠——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权力和威望促进基督教王公之间的和平与团结,这一目的使詹姆斯早年在波罗的海和在德意志的仲裁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在晚年,他未能阻止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低地国家的冲突再度发生。这使他的成果大为减色。最后,他企图利用自己作为"天主教和新的"英国国教首脑的地位,利用作为促进苏格兰长老派和英国圣公会之间合作的协调者的身份,来使基督教教

会能再度统一起来。他企图组织全基督教的会议，使得所有教会——天主教、正教、路德教和卡尔文教——中的温和派能响应他停止宗教斗争的号召，但这个计划同样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未能实现。不过，这些建议在许多地方得到了反响。

不论怎样，在詹姆斯统治时期，英国政治上逐渐稳定，宗教狂热有所缓和，国内安定，并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他对厄尔斯特的"殖民政策"，包括将原有当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地主驱逐出去，代之从英格兰(大部分是居住或靠近由伦敦财团创办的伦敦德里)或(更多地)从苏格兰西南部迁入的数千个家族。这件事也可算得上是件相当残酷的、为期不长的成功，虽然它的后果至今还令人寒心。他留下了大量的债务、一个名声不好的朝廷和在没有适当财力的情况下向西班牙挑起的一场有限的战争。

他与议会发生了争执，不能确保他向议会建议的某些重要措施的实现；其中，只有与苏格兰的"联合法"以及著名的使国家税收合理化的详尽规划"大契约"，是重要的事。但是议会未能降低王权，也丝毫没有提高他们自己在政府的地位。从这方面来说，詹姆斯并未在议会上遭受重大的失败。国王需要时就召开议会，不再有用时就把它解散。议会程序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因而对议会的权力也未发生影响。在他统治时期，议会在6个月的时间里开会不到一个月，直接税不到王室预算的1/10。大多数议员对议会作为一个机构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表示怀疑。谁也不相信议会的消失能给予他们反抗国王的权利，更不用说是机会了。詹姆斯是一个按照法律进行统治的新教国王，他的臣民中有些人不喜欢他，但是不信任他和恨他的人很少。1625年查理一世的继位是自1509年或者可以说是自1307年以来最为平安和牢靠的。

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之间正如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之间一样，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假如说詹姆斯是个不拘小节、马虎



詹姆斯一世

随便、平易近人的人的话，查理则冷若冰霜、谨小慎微、落落寡合和反复无常。他是个矮子，意志薄弱，是在他那有才能的死于天花的哥哥的幽灵下成长起来的，他哥哥死时查理才 12 岁。查理身材矮小、说话口吃、干事优柔寡断，总想把他周围世界看得过于简单，认为



马背上的查理一世

在国王做出榜样和建立起和谐秩序的地方，服从和安定也会接踵而来。他是一位自信自己的动机和行动纯正无邪的政治家，认为无需向人民解释自己的行动和行为。除亲信外，他是位难以接近的国王。詹姆斯能言善辩，查理却沉默寡言，是一位用行动代替语言、独断独行的国王。他在许多方面正如詹姆斯在《松脂杜纶布》

(Basilikon Doron)里所描绘的偶像一样。

政府管理的方式完全不同。查理是位廉洁的国王，统治着一个廉洁的朝廷；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现象被堵住了，在162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里，预算达到了平衡，行政业务顺利进行，枢密会议重新改组。政府在许多方面比以往办事效率提高了，并卓有成效。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其原因多少是由于误会和缺乏交流。在1625—1630年，英国发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为了收回从查理的姐夫、帕拉丁的选帝侯那里夺走的领土，同时为了支持新教）和与法国的战争（使路易十三实现把他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娅嫁给查理的婚约）。议会鼓吹战争，但未能供应给养，以使战争取得胜利。一支雇佣军白白地被送往德意志；海军远征队向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堡垒发起进攻，结果一无所获。行政上和军事上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财政上为弥补议会供给的不足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强制性的、沉重的负担，另外有些人则对它是否合法表示怀疑。

查理在整个执政时期以想当然而不问其所以然的轻率态度统治国家。1629年，国王和议会之间就下列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国王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国王为实现该项外交政策而必须采取的应急财政措施，用监禁来强制推行这种应急措施，以及国王倡议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新的少数派，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完全与英国国教主流派背道而驰等。1629年，查理的愤怒和失望达到了顶点，以致他决定直到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他将不召开议会而单独进行统治。他甚至认为，只有让那些控制着几届议会的鲁莽和心怀不满的一代人统统死光，国王和议会之间原有的和谐才会重新恢复。他就是这样简单化地估计很多事情的。但是决定本身并不是毁灭性的。1625—1629年召开的三次议会是令人痛苦的且怀有恶意的。但是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系列挫折，而不是有组织的反抗，

310

同时也显示了议会机构上的无能。议会上不少人对国王政策提出了公开批评，但意见不统一。约翰·皮姆、爱德华·柯克爵士、汤姆斯·温特沃思爵士、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达德利·迪格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这几届议会中是最尖锐的王室批判者），除对白金汉的憎恨和相信他们进入政府是纠正目前管理不善的最好方法等看法比较一致以外，他们很少提出相同的意见。一方面由于担任公职就可以得到报酬和荣誉，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能够提出的原则和政策，这些朝臣都野心勃勃。至于政治机构的改变和宪法的改变，他们从未正视过。他们不是革命家的原型；他们缺少统一的目的，甚至提不出一致同意的可以替代政府的一组人选。

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国王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着，而且没有采取任何协商一致的行动去以和平的或其它的方式重新召开议会。国王提高了国家实际的税收，足够支付和平时期的费用。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遇到了阻力，不过这实际上对他也未起多大阻碍；这件事就是1635年开始征收的船税。船税所得主要用于建立一支舰队。这种阻力大部分来自地方上对税收如何分配的争论上。虽比预期的要慢一些，船税的90%都征集到了。朝廷里有人公开提出关于这一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同时，国王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胜利后船税的征收数目又高了起来。在1637年，查理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这时王室的预算收支平衡、并有行之有效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高效率的枢密会议和稳定的王位。臣民在政治上对它顺从的程度超过了数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

但是，他所推行的宗教政策，使他疏远了广大人民；他支持威廉·劳德大主教，则又重新激起了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宗教狂热。不过这种宗教狂热尚未发展到组织地下教会或进行破坏性宗教活动的地步。那些不同意劳德宗教行为的人们作出一个前几代人无法作出的选择：他们可以而且确实迁往了新世界。在那

311

里他们摆脱了国教当权人士的迫害，但以保持新教纯正的名义互相迫害。劳德做了两件严重削弱人们对国王效忠的事。一件是由大主教倡导的许多学说和由劳德本人和他的信徒所提倡的宗教活动，它使人联想起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仪式。由于劳德本人一直认为罗马教会虽然是腐败的，却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人们广泛认为罗马天主教教义正被人由边门引了进来，而国教正遭到背叛和抛弃。实际上，劳德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想要改变国教的礼拜仪式和习俗，而是要把英国人完全限制在对祈祷书的彻底遵奉之上。1559年的祈祷书不仅是必需的，内容也是充实的。因此围绕祈祷书出现的清教的行为和典仪之阴影必须加以制止或消灭。这种手法激怒了所有的清教徒，其他许多人也感到担忧。同样糟糕的是，劳德的教权主义，他企图以攻击世俗人士侵占教会财产和裁判权的手段恢复主教、教会法庭和地区牧师的权力和威望，以此重新恢复教会的土地；同时，世俗人士控制什一税和对任命牧师的权力将 312 受到限制，牧师强制推行上帝法规的权力则要增强。劳德大主教教规最明显的效果是把圣诞桌从教堂的内部搬移到东侧，放置在讲坛上并用栏杆隔开。同时，那些由遵守法规的牧师设置的富丽美观的条凳也被搬走，放上普通的、未经装璜的条凳。在教堂里，牧师要高高地站在讲坛上，俯视着坐在下面诚惶诚恐的俗民。有罪的人不能仅按照上帝的话就得到拯救，而是要以上帝的牧师从中进行神圣宣誓为中介。一个真正摆脱俗人的贪得无厌和享乐无度的人才能在教堂中传道。这样的纲领使得劳德在政府里能享受到赋予世俗人士的各种利益。

尽管有上述的情况，1637年仍是查理掌权登峰造极的时期。不过5年以后内战就爆发了。这完全是由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造成的。国王应该从17世纪20年代(如果不是16世纪90年代的话)总结出的最明确的经验就是，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政治体系力量

不够，无论有没有议会的帮助都不能进行胜利的战争。当时这一点并不紧要，因为似乎无人在可预见的将来要向英国发动战争，这使得王朝处在日益有利的经济环境下（严重的通货膨胀已消失，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查理所应该避免的是投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但是在1637年，他错误地和他的苏格兰臣民进行了内战。事实已证明，查理要想住在伦敦统治苏格兰是办不到的；他的稳定和统一教会的愿望使他首先反对苏格兰贵族们在司法和担任圣职的资格问题上的自治企图和把教会地产世俗化的计划，同时，他还试图把劳德在英格兰推行的宗教改革推广到苏格兰。但是人们对劳德的抗议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加上国王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姑息退让，结果各种麻烦迅速产生。在12个月内，查理面对的是他的苏格兰宗教政策的彻底失败和他在那里政治威望的降低。因此他决定采用武力以实现他的愿望，并且先是在1639年后在1640年两次计划入侵苏格兰；但在两次行动中，苏格兰人比他动员得更快、更彻底，人数也更多。查理宁肯依靠爱尔兰天主教徒、苏格兰当地的天主教徒和西班牙以及教皇给予的表面上的援助，而不愿接受短期议会（1640年4月到5月）的建议，短期议会愿意提供向苏格兰开战的资金，但查理必须做出痛苦的、但却是可行的让步。由于军队组织松弛、道德败坏和行动迟缓，查理被迫在1639年放弃了战争，听任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并在1640年秋天就占领了纽卡斯尔。苏格兰人呆在那儿拒不返回，直至国王和他们签定条约，其中包括要由英国议会批准的支付给他们的费用。

于是产生了一个唯一的使国王的政策摆脱所有这些困境走上
313 正规的机会：召开了一个不能随意解散的议会。其所以不得不采取这一无可奈何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在12个月之内，查理赖以维持他没有议会的统治的机构和特权被一扫而光。那些在17世纪30年代曾劝告过国王的人们，有的被囚禁，

有的被放逐或失宠。但是希望回到和平与统一的日子的想法也未能实现，相反，在更大的不信任和谴责声中危机迅速加剧。内战在两年之内爆发，这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愕和惶恐。查理的地位为何崩溃得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和令人吃惊，其原因必然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但是有两点极为明显：一是人们所一度向往的宪政改革的目的达到了。查理众所皆知的低下品德、一有机会就要将原来的让步撤销的鲜明决心，以及他的日益增长的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想法，使得下议院的领袖们，尤其是约翰·皮姆，不得不考虑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1640 年，所有的议员几乎毫不例外地赞成一项消极的、限制性的纲领，废除那些维系没有议会的政府的权力、特权和法庭。没有人想要去加强两院的权力，只不过坚 314 持要允许议会能正常召开并履行它古老的职权：制定法律、发放给养、敦促国王关心臣民的疾苦并寻求补救办法等。1641 年的秋天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观点，即既然国王如此不负责任、不可救药，那么代表人民的议会有权将原来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交给议会本身。这意味着议会应在任免枢密院成员和政府及朝廷的主要官员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同时枢密院的辩论和决议应该受到议会的审查。由于查理在 1641 年同苏格兰订立的条约中作出了类似的让步，实现这些要求就更有条件了，同时在10月爆发了爱尔兰的叛乱，更增加了实行这些要求的迫切性。

爱尔兰北方的天主教徒害怕英国议会要推行新的强制性宗教法规，决定先发制人，解除厄尔斯特那些会推行此类法规的新教徒 315 的武装。由于深深扎根于厄尔斯特的宿仇，暴力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将近 3000 名（即 1/5 ）新教徒遭到杀戮。据英格兰可靠的材料，死亡人数还要多。对查理一世最为致命的是叛乱者宣称是在他指挥下行动的，并找了个伪造的证明文件。这就使有关查理的谣言流传更广，说他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策划叛乱，向天

主教的西班牙妥协，以及为了在 1640 年侵犯苏格兰向教皇要人要钱，而随后就在 1640 年早些时候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现了用武力解散议会的密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查理试图用拥护他的部队在议会开会时逮捕 5 个下议院的议员，上述谣言越发被人信以为真。在这样的情况下，授权查理去招募并统领一支能为英格兰效劳、从事征服爱尔兰的军队，是不可想像的事。约翰·皮姆这时领导了一场在议会内对查理的攻击，把他称作是发疯的国王，不适合掌握政权。在内战爆发前 18 个月，下议院的大多数和上议院的少数人都同意这种看法。当查理在诺丁汉举起他的旗标向他的人民宣战时，对他的评价好坏和他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是引起国家分裂的因素之一。

关于内战的爆发，首先要提出的是，查理在 1640 至 1642 年的举动使得许多人对宪法采取了比他们原先所采取的或预料到的更加激进的立场。但是关于宪法问题的争论是有限的。与谁来控制用于镇压爱尔兰叛乱的武装力量这一紧迫的无法调和的问题有关，信任问题就出现了。这样又引起了对另外一个有关问题的注意，即国王对民兵及其指挥者、总督和副总督的控制权问题。议会上的这些争论和国王的大臣、枢密会议成员应对议会负责等问题事实上成了内战爆发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交战双方积极参加者头脑中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当然，信任问题使某些人站到了议会这一边。但是由皮姆和他的同伴们提出的明确的新要求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假如国王对教皇的讨好使有些人转向了皮姆，同样皮姆想用成千上万伦敦人民群众的围攻来要挟两院中的动摇分子去赞成所争论的问题，这种轻率做法也使另一些人转向了国王。那些在 1642 年宪法问题上站在对立方面的所有人中，有 10 人觉得无法倒向任何一方，他们看到双方都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方面，因而企图进行调解并和平解决问题。整个 1642 年，大多数的郡

和城市中，居主导地位的思潮都是和平主义、中立或地方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力图使整个地区中立化，使各派别之间达成非军事化协议，或以“和平”运动的方式促使双方非军事化，由郡的机构以国王或议会的名义维持秩序和纪律，而对更大范围的全国性的战争却未做任何进一步的努力。因此，宪法问题，无论它对威斯敏斯特的那些经历过王室欺骗和伦敦学徒恫吓的议员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它本身都不足以引起一场内战。

在1642年，还有第二个也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即宗教。大主教劳德的宗教试验使清教的战斗精神重新燃起。在1640年，众多的牧师、乡绅，尤其是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决定了教会管理系统必然被推翻，因为这个教会管理系统受到一小撮革新者和隐藏的天主教徒(劳德分子就是这类的人)的任意操纵。大主教的办公机构必须废除；祈祷书，据有些人说是上帝厌恶的恶臭，必须取消；“主教”的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仪式必须制止。议会中大多数人原先同意比较温和的改革——惩罚劳德及其同伴，制定立法以减少大主教的自主权和裁决权。但是苏格兰人要求进行更大的变革的压力，在精心安排下所发生的要求改革教会“根本法”的请愿运动，以及群众破坏偶像的事件（很多地区发生了砸碎彩色玻璃和砍倒圣诞桌栏杆的事件），致使不同意见迅速两极分化。由于那些发起反对大主教的人同时也对地主的贪得无厌和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的制度进行攻击，(一般还包含了对财产权的要求)，因此那些维护现存教会的言行也就被看作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维护教会秩序和现行制度的言行。

在保王党成立以前就存在一个国教党，那些在1642年投奔国王的人显然是由于宗教的缘故。另一方面，那些起而为议会奋斗的人则是一些要推翻现存教会、为创立一个新的福音教会而献身的人。福音教会把宣讲上帝的教义和遵守道德和社会纪律放在首

要地位。这种想法由于那些从新英格兰流放回来的人，谈到在新英格兰的蛮荒之地善男信女们所做出的成就而更为增强。正如《旧约》中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的束缚回到希望之乡一样，现在上帝重新选择了英国人，他们正在摆脱束缚进入希望之乡，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正当大多数英国人惶惶不安地谋求妥协时，少数人却在热情地为了宗教而进行武装斗争。

原来犹豫不决的人现在坚决地投入内战。面对着掌握了主动权的少数派越来越高的要求和威胁，多数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进行选择。许多人，也可能是大多数人，奉行阻力较小的路线，他们按照那些被迫服从的人们所告诉他们的办法实行了。其他一些人则反复自问，勉强而痛苦地做出决定，然后将自己和家庭迁往他们认为名声较好的一方所控制的地区。但是，由于惧怕国王的"主教"同盟者和议会的宗教狂热者，许多人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感到很为难。

517 **内战**

第一次内战从1642年持续到1646年。很难准确地说出内战从何时开始和国家卷入战争的时间。1642年1月国王离开了伦敦，开始在中部与北方作长途周游。4月里他试图收回在赫尔的一个军火库（他在苏格兰战役中丢失的），但赫尔城城门紧闭，拒绝他进入，他只得又回到约克城。6至8月间，查理和议会两院向一些敌对的委员会发出关于训练民兵的完全矛盾的指示，这导致了双方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和武力威胁。8月底双方都认真进行了征集兵力的工作，冲突逐渐增加。8月20日，国王在诺丁汉举起了他的旗标正式宣战。但各方仍抱希望：或者双方能达成协议或者两军在正进行战斗的某一战役中能解决争端。但是10月23日在南沃里克郡的埃吉山发生的第一场战役不分胜负，未能解决任何

问题。虽然国王向伦敦进军并已到达布伦特里德，但他并没有足够人力或者得到理应得到的支持以打垮阻挡他去路的军队。当时冬天已来临，道路无法通行。他只得退到牛津。只有在和平形势不定的冬天过后和协商失败后，真正的内战才开始。起初，军队是勉强拼凑起来的，给养很差。到了春天，形势已十分明显，必须进行全国动员，各地区都必须征集军队，为维持军队所需要的钱财和管理机构筹措或建立了起来。国家可说是已陷入战争之中了，但这场战争的逻辑和它所付出的代价将要使内乱变成流血的革命。

在 1643 至 1645 年的某些时候，全国可能有超过 1/10 的成年男子参加了战争。没有一支单独的军队超过两万人，而最大的一次单独战役，即于 1644 年在约克附近进行的马斯顿荒原之战，参战者来自一些不同的军队，总人数不到 4.5 万人。但是在 1643、1644、1645年征战的季节里通常有 12 万到 14 万武装人员参加。双方都组织了地区性的各郡的"联盟"，每个联盟至少都要有一支军队，(至少名义上如此)他们的任务是把联盟地区内的敌人清除掉，使自已不受侵犯。双方都有一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斗的"行进队伍"。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往往是小范围的冲突和袭击，而不是大规模的战役。在有些地区发生小的战斗(如在东盎格利亚、南海岸和威尔士中部)，另一些地区则经常被敌方军队穿越或被占领，(其中最严重的是塞文河和泰晤士河的河谷地带，整个米德兰则是经常的军事行动地带)。议会的中心位于伦敦近郊。由于靠近首都，直接受到议会强制性的命令，同时还有迅速发展起来的成千上万的武装起来的伦敦市民(这是由失业的和有宗教倾向的人组成的，他们所占比例不定)。使得那些漠不关心和动摇不定的人接受了 318
议会的权威。同样，国王最初的力量在于他访问过和去过的地区，即从兰开夏到剑桥郡之间北部和中部米德兰地区。最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初是中立的或混乱不清的，只是到了后来，保王党才

逐渐在该地区占了上风。

国王在最初具有一些有利因素：富人的支持、由王室人员领导的统一的统帅机构和较单一的军事目的（占领伦敦）等。但议会具有更多长期性的有利因素：伦敦的财力和人力，这对取得人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对海军和贸易航线的控制权，这使得讲求实际的商人宁可与他们而不与国王打交道；领土比较密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与王党的穷乡僻壤相比不易受到侵犯，同时议会还得到了由于1644年2万苏格兰人入侵而提供的有限的但却很重要的帮助；这是苏格兰对议会同意实行一种类似苏格兰教会的管理制度的回报。

看来，议会方面在长期战争中将会拖垮保王党。事实确是如此。单纯的军事力量在战争胜负上只起很小的作用。双方布署同样的战略，采用同样的武器；双方都有大量在三十年战争中在欧洲大陆军队中服役过的有经验的军官。1645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军事平衡，双方都对自己的军事组织进行了"新模范"化的整编，国王在布里斯托尔和牛津分别设立了独立的统帅部，议会则把三支在近几个月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合并起来，包括沃勒·威廉爵士领导的战绩欠佳的南方军和总司令艾赛克斯伯爵的"行军部队"，但这支军队对担负当时的任务，即保卫东盎格利亚，又显得太庞大了。这支"新模范"军改由一位"局外人"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来统帅，以避免原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竞争。所有下院议员都被免除军事领导职务，回到议会供职，但是其他的军官则要按照他们现有的资历进行安置。新模范军起初并不是为了将议会事业激进化而创立的，它也不受激进的军官的控制。关键的问题是职业化，而不是激进化；军队后来在宗教热情和按才能启用人才方面所取得的声誉，并不是它在创建时的特色。从1645年6月在纳斯比战役开始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并不是由于军队的热情，而是由于有了正常

的给养。在战争最后的18个月，未得到给养的保王党军队完全崩溃，而新模范军则给养充足。内战是以消耗战而取胜的。

在战争最后的12个月内，掀起了一股群众性的反对战争暴力和破坏的浪潮。在英格兰西部和西南部到处都发生了由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组成的中立的“棒民”起义，起义者企图把交战一方或双方都赶出他们的地区，要求以缔结和约来结束战争。由于保王党军队纪律松弛，遭到起义者打击的主要是他们。不过居民对双方都抱着敌视态度，这使得双方都很难摘取胜利的果实。

为了赢得战争，议会向人民强征沉重的税款。政府对富人或中等阶层人士收取的直接税达到这些人收入的15%到20%。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啤酒（在热带植物饮料如茶、咖啡、巧克力等引进前的时代里，啤酒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基本饮料）和盐（当时必须的防腐剂）等征收货物税。数千个乡绅和很多其他人的财产在敌方控制的地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其收入完全由国家征用，只允许留下1/5贫瘠的土地给那些有妻子儿女的人。在战争结束时，议会允许那些不太积极的保王党（“失职者”）收回他们的地产，但须付一大笔罚款，而那些强硬分子（“邪恶者”）不仅得不到补偿，还要将他们的土地在公开市场拍卖给出最高价者。那些财产未被没收者则被要求借钱给国王或议会；拒绝“自愿”出借者还要遭到敲诈性的罚款。居民除了上述负担以外，交战双方都免费征用营房；军队住宿在民房里，而不偿付食宿费。军队在行军时一般都不愿担负自己的生活费用，对那些不供给他们费用的违抗者则举枪射击。抢劫和掠夺现象很少发生，但小偷小摸和践踏庄稼则是常有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塞文河上的贸易由保王党军队占领伍斯特和议会军队占领格洛斯特而受到严重影响。泰晤士河上的商业则受保王党军队占领牛津、议会军队占领雷丁的影响。恶劣的气候又带来其他问题，17世纪40年代后

320

期的农业收成是17世纪最坏的年份。沉重的税收和粮价的高昂导致手工业工场产品市场的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穷人和生活拮据的人灾难深重。战后的安置、军队的解散和恢复“正常化”等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议会必须授予其下属广泛的权力，甚至任意裁夺的权力。战争是由伦敦的一些委员会来掌管的，这些委员会监督每个郡和地区联盟委员会的活动。各地委员会享有与习惯法原则不相符合的权力，例如估计人民财产和对他们摊派税款、寻求法律上的指控证据和扣押商品，以及可以不经审判、不出示证据就不定期地对那些阻碍他们的人予以监禁。享有这些权力的人可以得到保障，他们不受任何民事和刑事起诉，而且(1647年中期以后）这种保障由另一议会委员会强制实行。最高法庭有关土地的判决被委员会的法令驳回。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为了打赢内战而必须的资源得到了保证。但在1647年和1648年，议会在其政治统治方面看来比国王的统治还要残暴。要求结束战争和恢复国王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321 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议会向苏格兰人保证，要解散伊丽莎白时代建立起来的教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和最好的新教会的榜样”，重新创立教会(这是一种诡辩术，因为苏格兰人错误认为这一定是指他们自己的教会)。1646年这个保证完成了，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主教制、大教堂、教会法庭、祈祷书和教历书(包括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全部被废除或禁止。建立起长老派体系以取而代之。教会管理人员和来自临近地区教会的一些世俗“长者”每月聚会一次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个郡内所有这种会议的代表或“各级人士”应定期碰头。教区、各阶层和地方上的活动均由全国性的宗教会议和议会来协调。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这种全国性的教会权威，在这方面和旧教会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新的全国性的信仰是建立

在一种新的祈祷书（强调即席祈祷和按《圣经》原文传教的“公共信仰礼拜规则书”）、新的教义问答手册和新的信仰要点基础上的。在各种情况下，“善男信女”们都被授权可通过宗教的或世俗的法规去灌输道德职责，即一种“习俗的改造”，和严格的精神上的服从。但是这些清教徒的试验未能实现。它对俗人给予过分多的限制以取悦那些严格的长老派领导人。它授予个别教区的权限太小，而为了取悦其他许多人授予社会等级、总主教辖区和宗教会议过多的权限。这种明确规定的教条、礼拜仪式或纪律上的要求不但对别人过于严格，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正当在1642年“清教”联合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时，这种强迫必须作另一种选择的做法给运动造成巨大的分裂。许多“独立派”成员拒绝接受这种负担，开始要求信仰自由和在国教教会外自由进行宗教集会的权利。有些人开始拒绝付什一税。清教的分裂发生于竭力推行长老派体系之前。同时，这种体系受到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喜爱祈祷书和庆祝基督教大节日的习俗已持续了四代人之久。他们由于丧失这两种权利以及对下述清教教规，即：如不事先得到牧师及他们自以为是的仆从们的赞同和认可，禁止任何人接受圣餐，而感到愤慨。因此，反对祈祷书和庆祝节日的教会法令在整个英格兰包括东盎格利亚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试图推行这一变更的牧师遭到反对，甚至遭到驱逐。虽然有1/5的牧师被认为在精神上、道德上或政治上不合时宜而遭到议会的排斥，但那些代替他们的人大多数仍然寻求秘密的主教委任。清教的试验未取得成效，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专横的议会的憎恨。

但是假如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属于战胜一方的人，逐渐认识到内战并未解决什么问题，只不过是由一种新的、更艰难的在金钱上、信仰上的强迫代替了旧的王室的强迫的话，那么少数人同样为目前惨淡经营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更加激 322

进的改革。上帝让他的人民遭受这种考验和痛苦不会是没有美好目的的。如果承认斗争的结果是一无所获，而使国王在他可能在1642年接受的条件下复位的话，那将是对上帝和那些为上帝的事业而牺牲和受苦的人的背叛。推动人民前进的力量又一次是宗教的力量。这种观点见于伦敦，因为那里教堂集中，经济萧条，同样也见于军队，许多士兵由于对痛苦和毁灭有着强烈的回忆，而在激烈的战斗中，感到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分文俱无的议会也痛苦地预见到向人民强征税款的后果，于是在1647年决定要将大部分士兵遣散，并将留下的再次派去远征爱尔兰，同时却不去偿付自战争结束以来欠发的薪饷。这样就激怒了士兵。在1647年的夏天和323 1648年的秋天，两院的大多数人找不到前进的道路，两次退而表示愿意接受国王所能接受的条件。国王自从军事上失败后，希望继续保持谈判，但又要使自己能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计划看来是有道理的。

不过，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军队都阻止议会进行投降。1647年8月，军队进入伦敦把首要的"煽动分子"从下议院撵走，并威逼其他议员必须表示赞成给予他们税款以及其他物质享受。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应得的。同时，他们拒绝以伦敦为基地的被称为"平等派"的极端分子关于要他们解散长期议会并宣布所有现存政府骗取的信任为无效、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宪法的要求。平等派要求所有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签署一项社会法令，即"人民公约"，享有参加一个权力分散的民主国家的充分权利；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只能在短时期中任职，并且应对他们的选民负责。他们的许多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信仰或从事自己愿意的任何一种基督教形式，都不应受到任何议会或政府的侵犯。军队的军官和士兵都卷进了平等派要求宗教自由和他们对长期议会的腐败和暴行的声讨中。军官和来自普通士兵的"鼓动员"对平等派的建议进行了争

辩，最重要的是1647年11月在帕特尼教堂举行的那一次。但是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认为这些建议不能满足军队的基本生计要求。他们宁可向受到遏制的议会施加压力，利用它的专断权力来实现他们的局部利益。

结果是第二次内战的爆发。这是一次各个地方反对中央集权和军事统治的反叛，温和的议会党人，"棒民"、所有各郡的社团都起来反对新的压迫，他们受到前保王党人的鼓励和挑动。第二次内战发生在没有受到第一次战争影响、未为上次经历所震动的地区如肯特、东盎格利亚、南威尔士、西雷丁和北雷丁等地战斗最为激烈。由于国王笨拙地去和苏格兰人联合，战争趋于复杂化。苏格兰人因为议会未能遵守它的协议，实行苏格兰人样式的教会而感到恼火，他们不顾一切地相信口是心非的查理所给的含混的保证。假如叛乱是互相配合，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他们可能会取得胜利。但它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结果被军队一个接着一个地消灭。随着8月份苏格兰人在普雷斯顿被击败，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了。

但一切问题都未解决。国内仍然要求和平与和解，军队仍需要薪饷，国王仍推诿搪塞，许下空洞的诺言。还像在1647年一样，议会眼看着他们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到12月初，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向国王投降，按国王的条件让他回来以恢复秩序与和平，或者将他除掉，投身于情况不明、茫茫宪法海洋中，做一次大胆试验。两院中头脑清醒的绝大多数人和国内的广大群众都希望前者，一 324 小部分人在军队首领的带领下决定实行后者。军队第二次清洗了议会，在所谓"普莱德清洗"中，下议院有半数以上的成员被逮捕或禁止进入议会席位。其余的2/3的人拒绝参加受到了强暴对待的议院。在后来几个月的革命性的日子里，不到1/6的下议院议员出席了议会，其中到场的许多人是为了缓和局势。批准审判国王

的决定的人可能不到1642年向国王宣战时的议会人数的1/10。

1649年1月，国王被判处死刑。他的威严和克制在舆论上是他的反对者的极大的失败。他是在一群被吓昏了的、表现同情的群众面前，在白厅前被公开斩首的。这位英国国王中最不光彩和表里不一的一位得到了殉难者的荣誉。他的声誉由于最后的尊严和为他声辩的《陛下在孤独和痛苦时的肖像》的出版而得到恢复。这书在后来数十年中一直很畅销。

325 **共和国和护国政治**

从1649到1660年英国为共和国。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确是革命时期。别的时候，有些国王也曾被残酷杀害，但以前没有一个国王是被以合法形式杀害的。君主政体被废除了，同时废除的还有上议院、英国国教。英国在1649到1659年之间有四个独立的宪法，并在1659至1660年制定了五花八门的应急措施。苏格兰完全并入不列颠，桀骜不驯的爱尔兰被制服，这种情况即使在它多灾多难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期在全国政权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试验，不过很多方面仍未有所触动。法律体系只草草地进行了修改，但仍可看出它不过是由排他性的法定教士掌管的旧的神秘的习惯法体系。地方政府又回复到旧的形式，同样一年召开四次的会议又重新成为真正的地方议会。财政部重新掌握了政府的财政大权。财产权得到保护和增强，社会制度受到维护，使之不再受到激进派的抨击。教会成为一个结构松散的国家教会，该教会并不326 强迫每人参加，但必须交付什一税以供养教堂牧师，并须承认教区官员在根据都铎王朝法规执行职责时所具有的世俗的和道德的权威。在实践过程中，每个教区在作礼拜和其他宗教仪式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并允许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和节日庆典安静地、广泛地进行。

从制度上来看，这10年确实是在回复到君主制复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的不平坦的10年，从1649到1653年，英国由残阙议会统治，它是长期议会残余的一部分。它承认了普莱德的清洗和弑君的行动，并自认应享有立法和行政权。尽管某些下议院议员作出高风格的姿态，把自己比拟为罗马共和国的会议，但残阙议会实际上是个度日维艰的团体。它终日忙忙碌碌，以致无法采取大胆、积极的行动，并寻求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用说去建立新的圣地了。它回避了它所面对的问题。残阙议会用卖掉国王、教会和王室土地所得的钱武装军队去征服爱尔兰，其中包括袭击德罗赫达和韦克斯福德和屠杀平民百姓，这些行动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但人们可以说这是对1641年大屠杀的报应。同时，对苏格兰的较为温和的入侵也使人们的震惊情绪缓和一些。残阙议会以建立议会外的财政机构，和恢复战前地方政府的形式，来劝诱地方上的人们进行第三次内战，打败保王党军队。对宗教问题，议会发布了前后矛盾的声明，使大多数人猜想基督教教义可能有的优越性，而不会竭力去进行反对。残阙议会甚至匆促地投入了和荷兰进行的海战，俘虏了不少荷兰商人，使英国的转口贸易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翻了一番。一个士气低落的保王党在舔着它的伤口，并试图去偿付它的欠债；旧议会党中的大多数垂头丧气的人在勉勉强强地继续按他们的老一套办法行事。残阙议会则在蹒跚地前进。

1653年春天，军队已准备有所变动。由于军队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胜利以及在伍斯特战役中打败查理二世这些天赐神恩的新证明，军队的首领，主要是统帅克伦威尔（自1649年起担任）要求进行神圣的改革，这种改革正是残阙议会过于热衷并不断着手进行的。

残阙议会的议员和军队首领之间的分歧最后导致议会被断然解散，这种行动是军队在1647和1648年曾采取过的。克伦威尔

担心自由选举会煽动起右翼的大多数人起来行动，因此决定召开一个“圣徒会议”，它是从忠于上帝事业的人中挑选出来约140人组成，任务是建立一个道德更新和政治教育的纲领。克伦威尔想327以此使人民能够认识和理解上帝的“许诺和预言”。他的想法是：从这140个人的片断言行中拼凑出一幅真理的图像。这种想法是高尚的但却是幼稚的。这140个被“任命”的议会或“贝尔朋议会”的执拗顽固分子们缺乏领导，彼此互不协调，在争吵了5个月以后，绝大多数人同意将他们的权力拱手还给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真诚地企图说服其他人来领导而他本人不插手，但未能成功。军队是唯一支持共和国的，它可以组成也可以解散政府。军队必须起统治的责任。

克伦威尔从1653年12月直至他1658年9月死亡，一直以护国公和国家首脑的身份统治着英国。按照两个书面的宪法文件即《统治约法》(1653—1657年由军事委员会发布)和《谦恭的请愿与建议》(1657—1658年在一次议会上草拟)的规定，克伦威尔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必须协同并通过国务委员会来进行统治；他还必须定期地召开议会。克伦威尔看到自己的处境与当年摩西领导以色列人走向幸福之乡的情景相似。英国人民曾在埃及（斯图亚特君主制）受到奴役，他们逃亡出来并渡过红海(弑君)，他们在火柱的指引下（军队自1656年在西班牙战役得胜起取得的伟大胜利，此乃神灵旨意的显现），正在荒漠（当前的不幸遭遇）中进行挣扎。

328 英国人民像以色列人一样，是牢骚满腹、难以制服的。有时他们需要艰难跋涉走向幸福之乡，正像克伦威尔1655至1656年在一次未成功的保王党暴动(只有少数王党分子参加，大多数人熟视无睹，而除军队以外，很少人去扑灭这次叛乱之火）中因大多数人民反应冷漠而感到灰心丧气。后来他建立了一个统治体系，把各

地区置于一个高级军官的监督之下。这些"少将"们不仅要对安全负责，而且要干预当地政府的各方面的事务，并且要开创"礼仪的改革"（一种道德上重新振奋的运动）。在其他时候，克伦威尔企图用"医治和安顿"的政策，用削减军队的权力、扩大参政人员的范围、与地方官员及议会分享权力等办法使国家走上幸福之乡。

假如克伦威尔满足于别人对他的政策的默认和政治上最低限度的顺从的话，他可能已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权。但是他信仰强烈，充满激情，渴望建立一个更能领悟上帝事业、更愿服从上帝旨意的国家。克伦威尔是个正统的加尔文教徒，他相信上帝选民的职责是使人们爱上帝，崇敬上帝，他相信上帝的神意是要向人民指出前进的道路。和一般人不同，他相信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上帝的选民是分散在各种教会之间的。容忍是恢复上帝的教诲和真理统一性的一种方法。他这种宗教上的激进主义是和他的社会保守主义同时并行的。社会上的等级制度是自然的、正当的，它的缺陷和不正义不是固有的，而是犯罪的结果。必须进行改造的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中人们的行为。

由于克伦威尔处死了查理，他就把自己与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决裂开来；同时，意识到如在那些有选举权的人们当中进行自由选举，很可能使国王重新上台，那就意味着人们拒绝把他的权威建立在公众同意的基础上，因此克伦威尔避免当代的争论。他的自我辩护在于未来，在于他相信他要完成上帝的意志。但是由于他认为他要去实现这样的任务，因此他就完全置公民与法律的自由于不顾。为了完成上帝对未来的许诺，克伦威尔进行了独裁专断的统治。他可以不经审判而任意把人囚禁。一个名叫乔治·柯尼的商人，因拒付违反宪法规定的海关税，克伦威尔就把他和他的律师关押起来，以防止他将自己的案件送交法院。当议院无法供给他适当的财政资金时，他就以下命令的方式来征

收税金。当人们未能自觉地响应他的道德更新的号召时，他就设立“少将”制并派“少将”到各地工作。于是出现了十分自相矛盾的现象：克伦威尔这个杀死国王、勉强充任国家首脑的人和幻想家，却被他的第二届议会请求担任国王。人们向他呈献王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建议他接受王位，是为了限制他的权力，使他受到以前国王事例和法律规章的约束。由于这些约束与他自认为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任务互不相容，因为上帝的旨意并未指示他去恢复他所抛弃了的职位，因此他拒绝了王位。

329

当克伦威尔在世时，军队（具有直接的军事威力）和乡绅（具有巨大的社会权威）一直很活跃。克伦威尔是唯一的将乡绅与职业士兵、将宗教的激进主义与社会的保守主义、将政治空想家与宪法上玩弄现实手腕的人、将具有非凡能力的超人与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等各种矛盾因素，统一在一起的混合体。他既是他统治下政权唯一的稳定因素，又是极不稳定的因素。假如他能致力寻求解决问题，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稳健的共和国。若不是在他心中燃起要改变世界之火，他也绝不会从一个养羊的农民成为国家的元首。随着他的去世，共和国也崩溃了。他的儿子缺乏他所具有的品质，而在高级军官的妒忌下屈服了。军官之间又开始争吵不息，加上一次全国性的拒交税款运动，加速了军队的瓦解。克伦威尔死后18个月，在蒙克将军领导下的部分军队决定事态应到此为止。于是自由选举进行了，查理二世被召了回来。

330

君主制复辟

查理无条件地恢复了王位。他宣告他的统治从父亲死亡那天算起。他父亲曾同意过的那些议会法案仍旧有效，其它一切则全部宣告无效。（举例说，所有被共和国卖掉的王室和教会的土地都要收回，但是保王党分子所付的罚款或者保王党分子按共和国的

法规重新购买的财产都不能偿还)。议会保证它本身在政府内所起的作用不超过它在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时代所起的作用。(除了那一个早已过时的要求议会每三年需要召开一次的法案，1684年查理撤销了该法案，但未引起普遍反对)。由于长期议会和那些在大空位时期掌权的人像当年查理一世一样滥用职权，把他们扶植起来作为对王位的一种平衡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关于复辟的文件宁可用把权力从中央交还给地方的办法来限制王权。查理曾同意废除特权法庭、限制枢密院的审判权(枢密院现已丧失了力量因此无法靠它去推行政策)和废除税收特权。地方的乡绅甚至比以前更为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查理以非凡的勇气和旺盛的精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他没有对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好友们给予特殊的照顾或信任。在各级政府，如在市议会，在宫廷官职的分配上，在政府机构中，在地方政府中等，权力都是共享的。旧的保王党分子、在大空位时期躲在一旁的议会温和派和忠于克伦威尔的一派人都得到了职位。得到好处最少的倒是那些逃亡的保王党分子。查理不同意议会要求大批放逐和惩罚君主政权的敌人的企图。只有那些签署处死查理一世的死刑执行状的人和极少数其他人才被排斥在"赦免和大赦法令"① 的一般规定之外(一位怀恨的王党分子称王政复辟为一次"对国王敌人的赦免‹Indemnity›和对他的朋友的遗忘‹Oblivion›")。他决心作出一项宁可使老朋友(他们不会再次将国王送到国外)感到沮丧，而不是使敌人感到沮丧的决定，并认为这是一项最好的办法。策划反对查理二世的举动并不多，而且只限于宗教界一些激进的派别。甚至一个只有不到3000人武

① "赦免和大赦法令"(Act of Indemnity and Oblivion)，1660年议会通过。根据这一法令，查理二世在布列达宣言中宣布的大赦在法律上有效，但50人例外，其中包括13个弑君者。此处"Oblivion"既可作"大赦"解，也可作"遗忘"解。——译者

装人员的政府就足以对付这种威胁。

查理希望以同样综合性的措施来处理宗教问题。他希望恢复英国国教，但对它进行一些改革以使大多数温和的清教徒也能接受。为此，他授予一些温和的教徒以主教的职位，并且颁布了一项临时决定(伍斯特宫宣言)，该决定削弱了主教的权力和自治权，并允许对祈祷书中那些有争议的仪式和词句自由选择。他还要求给予那些甚至不能接受宽容的国家教会的少数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以召开宗教会议的自由，即使他们并不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为这些温和的措施奋斗了18个月，但最后被骑士议会中顽固的英国国教多数派和他自己的顾问们的冷漠以及查理·巴克斯特和清教徒首领们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所阻挠。他们拒绝接受授予他们的在教会里的较高职位。他们不断反对容忍，并在关于改革祈祷书的会议上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们的苏格兰的同伙则比较灵活和讲求实际，结果达成了一项为大多数教友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查理最后放弃了建立一个包罗广泛的教会的企图，并批准了彻底恢复旧教会的“信仰划一法”。该法令强迫教士们要进行严格的宣誓和其他一些考验，结果使大约1/5的牧师在1662年底被排斥在外。他们中不少人在国教会以外举行秘密会议。接着，查理着手推行对所有非国教徒进行宗教宽容的方针。虽然他在1663年1月的第一次尝试遭到失败，但仍为自己逆转了教会的传统作用而感到安慰。内战以前的清教徒把议会视为免遭国王迫害的保护者，新的非国教徒则必须把国王视为免遭议会迫害的保护者。这就使得国王在15年中同大多数非国教教徒的关系在政治上是稳定的。然而这也是复辟时期政策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它建立起一种全面的政治解决措施来反对狭窄的、非容忍的宗教措施。地方官员很少是非国教徒，但很多官员对非国教徒抱有同情，不愿强迫他们遵守议会所通过的用来反对他们宗教集会的所有禁令。

一般来说，查理的问题不是由于他采取的措施，而是由他所执行的政策路线引起的。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个懒惰的国王。他的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初期被争取王位的欲望所支配，一旦从流亡中回国，他的野心也就丧失殆尽。他是斯图亚特王朝中唯一没有理想和长远计划的人。这就使他一旦在政策遭到强烈反对时便轻易回头。他虽然缺少理想，却不乏偏见和嗜好。他是个带有强烈唯理主义气质的人——一个有着许多情妇和17个被确认的私生子的庸人，一个对人类的天性采取玩世不恭态度的人；他还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终身都对在他即位时创办的皇家学会感到兴趣，虽然这种兴趣时高时低。但是他这种理智上的经验主义和从他双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感情上和精神上的神秘主义混杂在一起。他自认为具有半神的力量和特异性能。(据说国王用手触摸即可治愈腺体和瘰疬等类的疾病。查理二世比任何一个国王都更多地触摸过这类病人。)同时，他还强烈地倾向于罗马天主教。他的母亲、妻子和哥哥以及他喜爱的姐姐都是天主教徒，而他“性情温和”，对许多人都平易近人，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真正亲近的只有他的家属。他知道，凡是天主教强大的地方，君主政权必然强大。天主教徒仍明显地忠于他的父亲。假如有什么神学对查理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天主教教义(关于他的情妇，查理说，他不相信上帝会诅咒一个顺便进行一点享乐的人)。他醉心于天主教义并两次表明了他的这个偏爱(在1670年和法国签订的秘密协定中以及在他临终时表示参加天主教教会)。他政治上过分敏感，以至临终才宣布了他的信仰。不过，这样使得他更加公开地去实行宗教宽容。这件事以及他对他表兄、法国的路易十四明显的敬慕使得英国人日益感到恐慌。

查理在1660至1661年得到大量的财政收入（每一年有120万镑），这主要来自间接的税收。但由于他不善理财，在他执政初

期这些资金仍不敷应用。在通常情况下，他都感到十分拮据，除非求助于议会所取得的有限的长期贷款，否则他无法进行特殊的税收。因此，查理虽是外交政策、战争与和平的唯一决策者，但议会在考虑这些钱有什么用途之前，决不会赞成给予所需要的费用的。

这个时期需要有一个像亨利八世时托马斯·克伦威尔那样典型的伟大行政改革者，但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问题的决策和政策的推行，都需要对机构进行调整并使之规范化。枢密会议过于庞大、杂乱，办事效率极差。在国王的密室里举行的特别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经常在下一次特别会议上被否决。这样就使问题论而不决，而且到底应由谁管也弄不清楚。由于枢密会议软弱无力，政策的执行就只好留给互不联系的个别大臣和行政部门。恩俸授予也是一片混乱。同样，议会的效率也不高，而且越来越想入非非。查理感到那些在 1661 年当选的议员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总是乐于为他尽忠的保王党分子，因而在近乎 18 年的时间里，使骑士议会每年召开一次。议会之所以效率不高，一方面因为两院之间的敌对态度越演越烈，尤其是当上议院要求掌管已经不存在的政务法庭的司法权时，好几届议会都因这类问题无法解决而受到阻挠；效率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无章可循。一个拥有数百名成员的组织没有公认的领导，不得不用许多时间去讨论应该讨论些什么。由于大多数资深大臣来自上院，再加上对宫廷的安排有一种反对情绪，17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是犹豫不定的时代。查理的统治在国内外没有受到严重威胁。但是，早期的欢快接着就为政治上的轻微挫折所替代，瘟疫的侵袭、第二次荷兰战争（1665—1667 年）中梅德韦屈辱性地受到荷兰人的入侵以及 1660 年的伦敦大火，使人在 1660—1661年怀有的上帝会保佑这块已醒悟过来的土地的自信心逐渐丧失。

查理在政治上仍存在许多困难之处，如在 1672 至 1673 年第

334

一次推行宗教宽容的重大努力遭到失败，对他的贷款的利息停止支付，以及“卡巴尔”① 组织中不可信任的大臣们为了他们集体的失败(1674至1675年）而互相指斥，从而引起议会中政治上的争吵等。但是对他的权威的唯一的挑战的是1678至1681年的“排斥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于下列一项传闻的揭露而触发的，即由泰特斯·奥茨、伊斯雷尔·汤奇和其他奉行罗马天主教的亡命之徒企图杀害查理；并扶植他的信奉天主教的哥哥登上王位。这一传闻比其他类似的传说似乎更明确，更合乎情理，但仍然是捏造出来的。一位负责调查此事的官员神秘的死亡以及从詹姆斯的私人秘书的衣物中发现阴谋反叛的信件，使事态更加紧张。结果是各方面都力图通过议会来阻挡詹姆斯的登位，这样也就使查理的君权神授的理论破产了。

事实上，“排斥运动”的政治首领们至少像詹姆斯一样热心利用危机来削弱查理的势力。因为在前12个月中，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詹姆斯，而是查理的“骑士—国教”大臣丹比伯爵。这事看来似乎很奇怪，但很清楚，反对派的首领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丹比的政权和詹姆斯的一样，对自由构成了威胁。丹比的原则和沙夫茨伯里的正好完全相反：它发展了管理议会的老练的技巧，集中了财政管理权，并为了王室贵族和国教的利益破坏了地方政府中各利益集团的平衡。它还打算在和平时期建立一支常规军，联合荷兰反对法国。沙夫茨伯里是内战时期的变节者，贝尔朋议会议员和克伦威尔国务议会的成员，曾任查理手下的财政大臣和大法官。他后来支持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议会，反对中央集权，赞成宗教宽容，厌恶常规军，憎恨荷兰。总起来看，丹比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让查理

① 原文为Cabal，指查理二世在17世纪70年代初期设置的非正式顾问小组，此名为其成员Clifford、Arlington、Buckingham、Ashley和Landerdale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者译

二世过上安宁生活而已，而在沙夫茨伯里看来像是早期的专制主义。但是，人民把罗马天主教和独裁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了，甚至把丹比看成为罗马天主教派遣的特务，虽然他是一个纯粹的英国国教徒。只是在丹比被关进伦敦塔后，沙夫茨伯里才认为排斥运动达到了一项目的，并认为它还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包括粉碎神权的理论基础，和创造一种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和团结的条件(要在查理死的时候促成"排斥"法案，因为不经过斗争詹姆斯335是不可能承认这一法案的)。为了促成"排斥"法案，沙夫茨伯里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他建立的"辉格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连续在三次大选(1679—81)中组织了请愿示威和联合的竞选运动。

但是他们失败了，查理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辉格党员在由谁继承詹姆斯王位的问题上——是由得宠的国王私生子蒙默斯，还是由詹姆斯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辉格党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只进行了合法的、和平的运动。由于对内战记忆犹新，人们不愿让主张暴力的团体掌握全权。查理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他的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召开或解散议会；他在上议院有337稳固的多数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排斥法案"的通过。贸易的繁荣增加了王室在贸易方面的收入，使查理摆脱了财政困境。他在政策上除排斥运动外都作了让步，这样就拢络了不少温和派。沙夫茨伯里错误地认为查理在压力下会示弱。他从未了解查理在政策问题可以妥协，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的特点。他绝不会放弃他的神圣的权利。若不是他心中抱有重新结婚以生育来解决继承危机这一希望的话，他是不会作出最大的牺牲去和他尊敬的、不生育的王后离婚的。这是他政治风格最完整的体现。

同样，坚定的意志和刚愎自用，以及他在1660年表现出来的对众人的和善态度，使他在当时得到拥护；一个在政治上陷入僵

局，被折磨了三年的国家得到复苏，并重新团结在他的周围。在晚年他逐个排除了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报答了那些支持过他的人，终于过上安宁的生活。他把国家让给那些相信君主有神圣权利、英国国教会有神圣权力、地方人士有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神圣权利的人。于是洋洋自得的托利党—国教徒们得意忘形，他们欢迎他们所维护过的詹姆斯二世登位。他们的骄傲自满的情绪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詹姆斯实际上是个顽固分子。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他的苏格兰政府对不信国教的新教徒（“秘密集会者”）进行了最严厉的镇压，并广泛地使用了审判来加以迫害。更为糟糕的是，詹姆斯认为自己是个温和派，他无意使自己成为一个大陆样式的专制君主。但是贸易的繁荣使王室的收入增加，同时，他的第一届议会又通过了提高税收的议案（这届议会是在查理所宠爱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企图以军事力量夺得王位的威胁下召开的），所以他能够维持一支两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的职业性和它的职业军事首领们的不同的政治态度。詹姆斯曾经两次教促查理用他那一小支军队去摆脱麻烦的议会。他并不会对用军队去反对一个不服从的议会感到犹豫不决，不过他不想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国家，实际上，在垮台的时候，他还在像以前那样试图以巧妙的手法将同情他的人“塞进”议会。到1688年初詹姆斯第二次结婚时，他已结婚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儿子。当时詹姆斯已经50岁了，希望由他信仰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荷兰丈夫奥兰治的威廉继承王位。他一直想为他的同教派的教徒们争取宗教的和公民的平等权。这意味着不仅使他们摆脱刑事法（处罚那些不出席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人）和宣誓法（禁止他们担任国王统治下的所有官职和支付薪俸的职位）所规定的处罚和无权状态，而且允许天主教把教堂建立在英国国教堂旁边。这就是说要创建天主教的统

治和天主教礼拜仪式的主教管区以及公共活动场所。这还意味着338允许天主教徒同样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可以说是“恢复”某些高等学府作为天主教的神学院校)。这样就可能导致天主教徒不交纳什一税及不受国教法庭的管辖。詹姆斯确信，一旦取消对罗马天主教的禁令并废除对天主教徒的公民权和宗教权的禁令，千万人必然会恢复对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他认为,同意天主教处于“同等地位”是一种人道的和温和的纲领。假使在短期内对天主教教徒在担任国家的和地方官职的人数作一定程度的照顾，这也是正确而公平的措施。

毋庸赘言,托利党—国教徒政治群体中的人对此无比愤怒。他们对国教会的忠心大大地超过了对被尊为神圣的国王的忠心。詹姆斯很快发现，没有一个由托利党—国教徒控制的议会会废除反天主教的法案,同时,虽然那些被笼络住的司法人员会支持他中止这个法案的决定,但是他死后信仰新教的继承人继位后,这个法案可能又会得到实施,因此他竭力要求排斥托利地主势力,代之以建立在天主教和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之间联合基础上的政权。有3/4的治安法官和大多数军官都被收买了。这些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新人。詹姆斯的清洗在地方政府里所产生的社会革命,比1646至1660年曾达到的规模还要大。詹姆斯收回了绝大多数城镇的特许状,重新组织起该地区的政府,并让不信国教者来掌权(这对他能否得到议会的绝大多数的同情关系重大)。为了赢得不信奉国教者的支持,他颁布了一项给予他们完全信教自由的“赦免宣言”。

托利党—国教徒被激怒了，但最初只采取和平的手段。这股狂风本会自行吹散的;詹姆斯濒临死亡,玛丽会继位,他们将会进行报复。消极的反抗会阻止詹姆斯的成功。因此7个主教向他请愿,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遵照他的指令,教导他们的牧师向教徒们宣读赦免宣言，同时他们还着手让英国国教会将来对不信国教的

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詹姆斯断定这些主教煽动叛乱，但连他的法官也联合起来反对他，最后主教被宣判无罪。然而，托利党人在1687年时的得意忘形（哈利法克斯侯爵当时写道："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我们采取不反抗和消极服从的信条而遭到嘲笑"），到1688年6月，因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出生变为惊恐万状，因为在他们面前确实出现了狂热的天主教王朝执政的可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许多英国国教领袖们将宗教置于他们政治原则之上时，许多不信国教者却选择将政治原则放在首位。他们并不怀疑詹姆斯仅是为了眼前的目的才利用他们的，因此两党的首领联合起来采取了紧急措施，请奥兰治的威廉在武装人员适当的保护下回到英国来，并向詹姆斯进行抗议。也许他们确实相信这样会使詹姆斯接受威廉的屈辱条件，收回那个打算建立一个被收买的议会的文件，发布回复到以前的"自由"议会的新文件，并向法国宣战，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在襁褓中的威尔士亲王的继承合法性。但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拿起武器参加威廉的入侵，愿意助詹姆斯以一臂之力的人则更少。 339

不论邀请威廉的人原来抱有什么希望，威廉本人肯定是想要詹姆斯退位的。他的这种想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有一点可以作为他的理由，即他需要控制全部英国陆、海军和财政资源去与路易十四作斗争。至于他想如何夺取王位则不太明确。最后，因为詹姆斯几乎是精神上彻底崩溃，使威廉和玛丽得以宣布共同执政。将近数星期詹姆斯的军队和威廉的军队从未交过锋。威廉于11月5日在托拜湾登陆，并向东转移，詹姆斯把军队远远地带到索尔兹伯里，后因不断地流鼻血停了下来。由于他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狂燥，许多职业官员及军事领导人都离他而去。詹姆斯后来逃回伦敦，并很快落入威廉之手。即使在那时，詹姆斯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些粗略的计划和许诺可以保证他得到大多数贵 340

341 族和乡绅领导人物的效忠，但是他丧失了理智，两次逃跑（第一次是他在肯特海边被一个好心的渔民捉住送了回来，这使威廉感到很恼火）。后来，詹姆斯逃往法国，路易十四公开宣称要动用法国军队使他复位。威廉明确宣称，除非他和他的妻子共同登上王位，否则他决不会去保护英国，这样就使政界人士别无选择。几乎所有的辉格党人和大多数托利党人以各种方式尽可能为他们的行动制造借口，赞成詹姆斯让出王位，将王冠授予威廉和玛丽两人。1688年的光荣革命比1642年的大叛乱更令人难以预料；它的后果可能更为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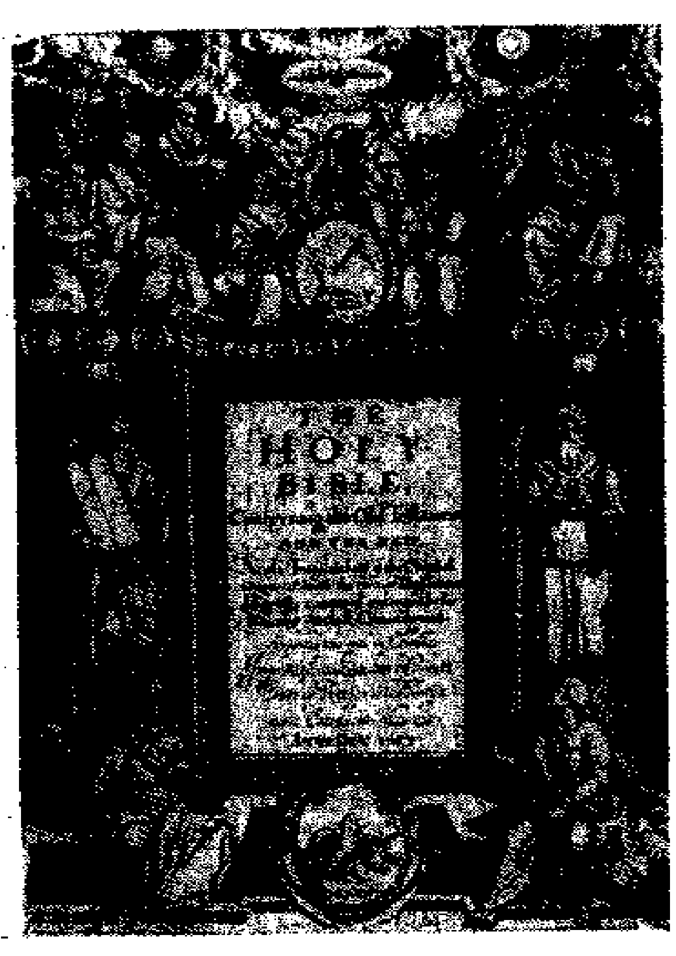
英国革命对王权是否产生持久的影响呢？回答是：其影响小得可怜。在17世纪80年代，王室在财政上收入更为富裕，它拥有一个逐渐增大但仍然不够用的文官机构，并具有一个创建常规军的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议会想限制国王，并强加给他一些他所不喜欢的条件，或者从他那里把他一直享有的权力拿走，但是在这方面它表明自己显得无力击败国王。17世纪80年代王室的特权和1600年前后没有多大差别。国王可以否决他不赞成的提案，可以赦免任何个人使之免受法律的制裁，可以宽恕他所挑选的人；他选择自己的顾问、法官和高级行政官员，也可以任意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解职。他无需接受任何人的劝告，如果他失去他的封地的大部分收入和“任意”征收钱财的权力，他可以从议会税收中得到充分补偿，其中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终身的。

唯一真正大大削弱王权的是1641年的立法，该立法废除了特别易受王权控制的法庭和委员会。对王权最重要的一项限制是撤消了枢密院的司法权，这样枢密院就失去它的威力，不再是个有执行权的、活跃的机构，不再能监督、笼络和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而是回复到过去只作为一个谈话机构及国王寻求忠告的场所。它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远不及在斯图亚特王朝和都铎王朝时期那样。詹姆

斯一世听任彼此倾轧之风从枢密会议传到议会之内；查理一世不想听来自枢密会议各集团的不同建议，而要这些傀儡们遵从他自己的原有看法。查理二世则喜欢将官员们召集到他的密室仓促地开会，秘密制定政策，因此谁也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进行的。上述每个君主为了各自不同的原因鼓励逐步发展起来的枢密会议中的一些秘密的委员会，由一些担任重要官职的人组成。这就是18世纪内阁会议的由来。1641年被废除的其他议会法庭包括，星室法庭、高等委员会、债权法庭以及地方委员会和更多地由于偶然原因而不是有计划组成的机构，如北方委员会和威尔士边界委员会等。在王政复辟时期，查理二世不仅受到议会的限制，而且受到各地乡绅的限制。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所有国王用来制服不听命令的各郡社团的方法都被剥夺了。政府的权力比任何时候更加依靠这些地方团体的主动支持。在17世纪60年代，除关税外，所有的税收和所有的教会立法，如信仰划一法、集会法和5英里法以及大部分安全事务都委托给乡绅阶级出身的地方长官，不需再诉诸中央宫廷的决定。 342

因此，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国统治的经验只具有极为有限的直接影响。甚至对查理一世的公开审判、定罪以及斩首的记忆既未能改变君权神授的说法，也未能使他们给予议会更多的尊重。政治界的人士终于知道弑君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只是增加了而不是取消了对他们的压迫。使职责与资源相称的问题变得更清楚了，但问题本身既没有增大也没有解决。英国看来只有在下列两者中选择一条去路：或者在牺牲独立的地方乡绅阶层的基础上加强中央行政和管理权力，或者进一步放弃权力集中，将英国变为一系列半自治的郡国，实行自治，轻税薄赋，缓慢停滞地发展。主张后一条路的有17世纪20年代议会中出现的“乡村党”、内战中的中间派以及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辉格党人。共和

主义者如约翰·弥尔顿等人也持这种主张。弥尔顿羡慕荷兰共和国，他希望在英国也能同样发展这种公民人道主义的寡头政治。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条道路是民主集团如平等派人士等的理想。平等派希望官员们应更负责，政府应服从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自由，因此他们要求将权力下放给由选举产生出来的地方行政长官和陪审团。但是这种“乡村”理论是与一个总体性的帝国发展思想不相容的。向西印度群岛和沿北美东海岸（从南卡罗来纳到圣劳伦斯河）的扩张，与南美、西非、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乃至保护同地中海南部和东部重要的贸易，都需要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力量。这只能依靠国家急速增长的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能力来维持。正是路易十四和1689年后逃亡的詹姆斯想在英国推行罗马天主教和专制政府的共同威胁，迫使政府最终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宪法和政治改革，正如下一章所要阐明的那样。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是一个紧张局势未得到缓解的世纪。



詹姆斯王圣经的扉页。该圣经是詹姆斯一世主持召开的汉普顿宫会议的产物。

文化艺术和宗教生活

即便不是对君主制而是对英国教会而言，17 世纪是个幻灭的时代。在 1688 至 1689 年光荣革命时期，教会丧失了它在 1603 年获得的理智、道德和精神上的威望。英国国教在本世纪初在理智上采取了攻势。亲身经历过 1559 年事件的这一代人，目睹了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采取的把新教教义和天主教仪式混合在一起的状况。第一代新教徒的批评比较有力，因为他们在玛丽女王时曾被流放，在流放中他们在欧洲大陆上亲眼见到了新教的纯洁教会经验，从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在 16 世纪 90 年代和 17 世纪第一个十年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人不知道有其他的教会，他们喜爱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中的韵律和克兰默大主教礼拜仪式的节奏。朱厄尔、胡克和安德鲁斯的著作把英国教会描绘成所有教会中最好的教会，声称自己为使徒新建正统教会的后代，直接继承了克尔特人的教会，因此比分裂了的新教教会具有更大的权威；此外，国教还摒弃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腐败和缺陷，比如抛弃了罗马主教僭取的权威，比天主教优越。英国国教具有和罗马教会一样古老的传统和符合使徒的教义，有更忠实于基督训戒的具体仪式。对清教徒来说，这些断言不易驳倒。 343

清教徒日益流露出希望在国教内部进行工作的愿望。詹姆斯一世继位和基督教千年福音派请愿的影响，只是使他们要求在现存的机构中进行一些变革。在 1604 年的汉普顿宫大会上，讨论的议题全部是关于如何使圣公会的国教更加有效地成为新教教会；詹姆斯曾在该会上主持召开了一次主教和清教徒会议。清教徒希望有一个像 1200 年以前的君士坦丁皇帝那样虔诚的君主，他能很好地治理国家，振兴和保护真正的宗教。他们渴望多干些事，而不是少干一些。他们要在教会内部工作而不是反对它。即便是占全国人口 5 %的不信奉国教的天主教徒，也在国教牧师发起的思想 344

上的攻击下屈服了。本世纪前25年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天主教徒是否应宣誓效忠并避开罗马教皇管束他们的政治忠诚的要求。英国国教的论点占了上风，天主教徒在忠于信仰的同时，在政治上放弃了反抗。火药阴谋事件①是天主教的最后一个真的阴谋。随着英国的天主教逐渐为审慎的贵族和乡绅而不是由好战的牧师所控制，它的和平主义和政治上的妥协倾向日益增强。

新教的团结，如果不是统一的话，一直保持到长期议会召开之时。清教在国教中加强了活动，但真正退出去建立秘密集会以反对国教者极少。由于不愿服从大主教劳德对英国国教活动所作的狭隘的解释，几百个或上千个清教徒迁往新英格兰。但是没有发生分裂的现象。

内战和大空位时期，不仅英国国教，而且英国清教都出现了分裂。国教的组织结构被废除（主教，教会法庭）或遭到禁止（祈祷书，圣诞节或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大教堂变成了布道中心或被世俗化（当作军营、监狱和商店的拱廊）。数千个教区的旧的礼拜仪式和庆祝活动不顾禁令仍在进行，但教堂的首领们丧失了勇气，主教逃走、躲藏起来或保持沉默。在他们死后也无人替代。到1660年，那些残存者年龄全都在70岁以上，国教的主教成了危险的人物。

但是那些梦想像马萨诸塞、苏格兰和日内瓦那样以加尔文教取代英国国教的人感到大失所望了。议会所设想的长老会制流产了。内战的混乱造成了五花八门的派别和教会。浸礼会在1640年以前是少数强大地下教会之一，现在通过军队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新的集团不同意加尔文派关于上帝的选民注定要得到拯救的看法，认为上帝的恩惠是自由施予的。有的甚至认为普天下的人均可得到拯救。这种团体主要是在伦敦以及其它地方上的城市活动。

---

① 1606年11月5日英国天主教徒企图炸掉议会和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阴谋事件。——译者

各派别中势力最大的是教友派，他们在17世纪50年代在农村非正式的福音传教活动为该会赢得数千名信徒。教友派否认宗教的形式化和“在尖屋顶教堂里”的那些“受雇的牧师”的特殊威望，要求人们从自己身上寻求神圣的火光和直接来自基督的神圣精神，无须以国教或《圣经》为媒介。他们出于对形式上的宗教崇拜和什一税的憎恨而斗志昂扬地开展了广泛的消极低抗运动。他们的一个首领詹姆斯·内勒于1656年以亵渎神灵罪受到护国公时期的第二届议会的审判。虽然他逃脱了死刑，但受到各种肉体折磨，议会曾用数小时来考虑应该割开或斩断他身体的哪一部分。 345

1660年以后，原来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宗敬思想并未得到恢复。虽然在王政复辟时期教会可以公开地恢复它旧有的形式，但是它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再次推行普遍信仰划一。英国国教为自己作的辩解是处于守势的和紧张不安的。随着高等委员会被取消和主教辖区法庭的废弛，国教缺少了惩治不履行国教法规者的武器。这些机构的废除所造成的屈辱使它在机构上软弱无能。1660年庆祝复活节的活动和到处出现的五月柱都是自发的，表明它在民众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但是那些不信国教的人并没有被迫参加它们的集会，1662年关于采用国教礼拜仪式但削弱主教的权利要求的决定没有扩大国教的影响，使得2 000个牧师离开了教会。虽然国教试图禁止非法的秘密集会，但浸礼会、教友派和其他激进派别都未得到根除。更为重要的是，1662年成千上万具有温和的清教传统的“不信国教者”，重新考虑他们想参加国家教会（虽未这样提出）的愿望是否超过了他们对上帝的虔诚的信仰。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第一个10年，他们宁可留在教会内等候良好的时机。在王政复辟时期，他们越来越赞成分离。在17世纪初，他们感到自己“对巴比伦更为虔诚”，现在他们放弃了这种权宜之计，走向了教会分裂。1689年的“宽容法”正式承认了宗教多元 346

化这一事实。英国教会不能惩罚那些不信该教者，也不能强迫那些男男女女加入该教。国教成了一种衰落的精神力量。

17世纪早期和中期，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都相信有一种能够给英国带来虔诚、良好的纪律和秩序的神的力量。上帝引导他的子民走向和平和真理的希望之国，在那里人们把爱戴和敬重上帝视为己任。詹姆斯和查理一世、温特沃思和劳德、皮姆和克伦威尔都持有下述想法，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理想可以通过人们对神的要求的反映来实现。上帝创世时的无所不在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天佑神意和显圣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充斥在所有政治著作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多恩的诗、亨利·帕克和年轻的约翰·弥尔顿的思想都宣告了同样的论点；马罗的剧本是唯一没有证明这条法则的作品。

上述希望在大空位时期以后就不存在了。弑君的创伤使保王党分子不再相信神意。1660年激进分子经受过的背叛所具有的更深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后来为何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从心理上说，在神圣的恩泽得到证实之后却又遭到背叛，其痛苦尤其大。不过多数清教徒及其继承者还是设法适应了这个新的上帝王国。他们认为世界为罪恶和缺陷统治着。在当今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在自身内部创立一个优美的殿堂以寻求个人的安宁。这种关于教会及国家所能达到的成就有局限性的想法统治着17世纪后半期的思想意识领域，它明显表现在查理二世持有偏见的世界观的浓厚神秘主义中，表现在主教和牧师组织的放任自流上，表现在不信国教者不再追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上。有少数人继续追求千年盛世(艾萨克·牛顿爵士对物理法则的研究获得了成功，但他想在《启示录》中寻求“第二次降临”的日期却是不成功的)，但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别无他求。约翰·弥尔顿勇敢地面对着一位似乎在17世纪40和50年代指引着他的人民、但到1660年就背叛

了他们的上帝。《失乐园》谈到万能的上帝使人们堕落。《复乐园》谈到基督在旷野中受到的诱惑以及人类错误地用世俗的方法传布福音。也许共和主义者被引入了歧途。《力士参孙》是他作品中最为尖锐的，书中讨论了一个被上帝赋予巨大才能的人，却不能用这些才能为上帝服务。正当参孙和迪莱勒① 纵乐被剃掉头发而失去力量时，共和主义者同样在 17 世纪 50 年代被情欲引诱而失去了完成上帝愿望的机会。但是王政复辟时期比较典型的清教徒的著作是布尼安的《天路历程》，该书的内容是个人寻求和平和得救。

基督教正在被非政治化和非神秘化。17世纪末典型的国教小册子的书名为《基督教的理性》和《并不神秘的基督教》等。在这里，上帝曾是自然和生命的经和纬，现在则成了造物主，他可以使事物向前发展，是存在人体内的精神，可使人遵守道德标准。布道则强调睦邻和慈善的美德，鼓励牧师在宣讲宗教的职责时，应强调仁慈对待老人和动物，而不要去宣讲关于改造世界的情况。约翰·洛克从不信国教者的角度希望采取宗教容忍，认为教会应是人们自愿组成的社团，他们集合在一起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敬上帝。宗教变成为一种无威胁的业余爱好。当权者无需考虑在私人会议上成年人会同意哪些事。上一代的清教徒不可能想象出如此平淡的状况。

宗教力量的减弱和宗教控制的世界观的崩溃，也反映在文学和科学上。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与詹姆斯一世时代戏剧的区别并不在于它的庸俗，甚至也不在于它的琐屑，而是在于它的世俗化——扎根于自然界宗教体验的形而上学的诗歌，让位给了更富于理智和理性，或者是更虚无飘渺和超脱的宗教诗篇。

世俗化也是视觉艺术变化的一个方面。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的乡村住宅往往强调家长式的基督精神。住宅建筑在大厅的周

① 参孙的情妇，她把参孙出卖给了腓力斯丁人。事见《圣经》。——译者

围，里面住着家庭和范围更广的集体，人们在一起生活劳动和进餐。那里也可能有一个“上席”，反映爵位和等级，但是社会关系是比较随便和不拘礼节的，到17世纪后期，新造的房子有了“客厅”和私人餐厅，而佣人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有了单独的住所。房屋建筑在宽大的花园里，四周围以高墙，并有看守人守卫着。王宫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17世纪和16世纪一样，很少看到兴建教堂。也许大多数新教堂都是在1666年大火以后由于需要而在伦敦建筑的。然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的教堂和小礼拜堂(比如剑桥的彼得教堂)中的紧张和虔诚的风格，与雷恩设计的伦敦教堂的平静、轻快、理性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绘有寓言故事的彩色玻璃和阴暗的木框架被大理石替代了；横卧雕像由竖立着的男人和女人的塑像所代替。

246

在所有视觉艺术中，西班牙和西班牙属的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属的尼德兰的反宗教改革艺术——一种将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精致的风格——的影响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响——自我放纵、表现出物质上的挥霍无度——所取代。在17世纪初，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假面舞会；这是一种试图将古典文化世界和基督真理结合在一起的娱乐活动，将观众拉进来作为演员，进行表演，同时将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幻想的力量在伊尼戈·琼斯和本·琼生为查理一世所筹办的假面舞会中表现得如此之大，以致国王逐渐相信他自己的虔诚和美德会迅速影响他的臣民，就像发生在舞台上一样，国家轻易地就能获得安宁和统一。但是这种幻想没有影响17世纪后期另一种与此相当的艺术形式即歌剧。当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作家们纠缠在英雄业绩和悲壮事件中时，斯图亚特后期的作家们却转向小说中的家庭说教和屈莱顿及后来蒲柏的讽刺诗。

王政复辟时期的科学也同样世俗化了。在17世纪40和50年

代，科学家们曾探求他们称之为"一次伟大的复兴"。科学研究机构依据弗兰西斯·培根的思想，并在像塞缪尔·哈特利布和被放逐的波希米亚人夸美纽斯等爱空想的社会设计师的指引下，得到清教政治家的器重。这些机构从事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人将征服和统治自然界；医学的发展将消灭疾病，农业的发展将征服饥饿和贫困，正义和教育的改革将使人类走入和平的新秩序。但是 351 新教末世学的另一方面和科学的天国论像其它天堂一样，在1660年也消失了。在皇家学会历史上，17世纪末不是幻想的世纪，而是逐渐进行探索和进步的时代。弗兰西斯·培根精确观察、测量和归纳推理的原则，由法国人笛卡尔进一步加以精炼，促使植物和动物的分类和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哈维在内战前夕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导致该世纪后半期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取得一系列进步。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1687)是两百年来研究物理法则的基础。罗伯特·博伊尔在化学上和罗伯特·胡克在地质学上的著作，根据大量的实验和测量创立了新的法则。物理科学的进步狠狠地打击了旧的神秘主义。天体的几何运动的发现粉碎了知识界对占星术的信赖。自然规律的发现使人很快产生一种信念，即对任何事物都可作自然解释。魔术、巫术、符咒等都被知识界所抛弃。在164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巫术对人的迫害几乎停止了。这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诅咒和魔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持怀疑论观点的法官和陪审员不会对他们定罪。实际上，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经济仍然几乎完全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在以蒸汽为动力的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更不用说以气体或电力作为能源了。采集地下矿藏和熔炼矿产是另一个技术上的难题。科学使人们的观念有所改变，但没有能改变经济。

政治思想也在世俗化。汤姆斯·霍布斯消除了君权的道德基础；在《利维坦》(1651)中，为政治权威辩护的合理性概念，为专注

于真正的权力和有能力保护统治下的人民所替代。马基雅维利虽仍臭名昭彰，但他的思想对反对罗伯特·菲尔默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辩护士的君权神授说越来越有说服力。

英国革命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革命中任何一个党派所追求或为之奋斗的目标可能都未能达到。革命对改变政治和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可能甚至更少。但是它深深影响了知识界至少是政治精英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从基督教人文主义、骑士制度以及崇敬古物中吸取能量逐渐过渡到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纪。当约翰·洛克在他第二篇《政府论》(1690)中写道"所有的人生来就处于一个绝对自由的形态中，他们无须得到任何人同意或遵照任何人的意志，就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处置他们的财产和私人事情"时，他宣告了一个只有在对旧的理想感到幻灭时才可能实现的使命，但这是一个未来数十年内很可能实现的使命。

第七章　十八世纪

·352

(1688—1789)

保罗·兰福德

1688年的革命——"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由于各代人的不同解释而在不断地变化。它在20世纪所受到的评价特别坏，近代的历史学家简直对它不屑一顾，其意义几乎完全被抹杀了。麦考莱和维多利亚时期辉格党人对它极为推崇，认为它是民主与自由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后来它却逐渐被看成保守、自私的寡头政治的反动。尤其是与近代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似乎只是一场宫廷政变，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政治权力的转变。也许正是由于相对的非暴力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特征，所以才加强了人们这种印象。不过，这种现象也许是被夸大了。在苏格兰，被废黜的国王的支持者是被武力打垮的，这种武力过程直到1689年才完成。在爱尔兰发生了真正的浴血战斗，一个描写当年战斗的故事，至今仍在爱尔兰人的神话和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伦敦德里被解围、詹姆斯二世在博因的战斗中被彻底地击败时，厄尔斯特的新教徒确实感到他们的得救是值得庆贺的，然而他们明白没有经过流血战斗，这一切都不会实现。

英格兰的情况与此颇为相似。前王党分子尼古拉斯·莱斯特兰奇证实，只是由于詹姆斯的朋友们偶然的失误，特别是国王出人意料的未能在国内矗起王家军旗，发动战争，才使英国避免了一场中世纪常见的残酷的内战。然而莱斯特兰奇对自己的家族在为了维护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没有遭到更大的劫难深感宽慰，这也

许就是使他觉得这次英国革命相对来说是和平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觉得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会议是一次妥协的会议，是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战争而让步的会议。为了尽可能地仿效1660年复辟时期所采用的程序方式，以权宜之计通过一个法案，使明显不合法的程序合法化，所以就将1688年的非常议会转变成为正式的议会。实质上，首要的问题无非是能找到一个能达成协议的共同点，而不是去争论双方所提出来的极端解决方法。奥兰治的威廉被拥戴为国王，玛丽为王后。德比领导的托利党原先主张玛丽为唯一的国君，或以詹姆斯二世名义行使某种摄政的权力。在这个事件中出了力的新教势力表示，除非树立一个新的国君，其他方式他们概不接受，结果就采取了上面的安排。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去掩饰这次事件的革命性质。尽管在形式上詹姆斯的被假定的非法行为，特别是他的依靠常备军及其财源以维护自己的任意实施或中止法律的行为遭到了猛烈抨击，但权利法案仍佯称詹姆斯二世是自动退位，以致这个被抛弃的国家别无他法，只有寻求奥兰治家族的保护。虽然这种说法难以令人相信，但仍完全能够赢得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当然有些人例外。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和两个主教（他们是促使詹姆斯二世下台的七主教事件中的两人）的领导下拒绝按照非常议会所拟定的誓词宣誓，虽然誓词的措词颇为谨慎。另外的一些人如1681—1687年间反动时期王室的最坚定的拥护者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拚命地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合法的国王取得王位应该只根据议会的实际决定，而不是由上帝所判定的。

353

然而，议会君主制无疑是确立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意义由于后来的人们不仅有意识地回避1689年的教义式的法规，而且由于后来的长期痛苦而变得模糊不清了。消极服从和不抵抗主义一直具有很大影响，这一观念由于人们精心制造了一种论据，强调1688

年的“清教之风”是上天决定的，同时强调每个公民的职责是与任何形式的权威合作，而不是去搞无政府主义，从而得到了加强。对整整一代人来说，这些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对那些认为1688年的事件不可避免、但又很难与它造成的后果相适应因而感到愤恨、绝望的人来说，这些观念使他们产生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合乎法理的思想。除此之外，他们还沉浸于18世纪的人所具有的正统国教观念，从而巩固了潜在的权力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仍然是一股重要政治思想意识。然而，除了这些方面之外，1688年造成的巨大变化仍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权利法案显然打破了世袭的权利，这种世袭权利是1660年旧政体复辟的基础，而被以议会为代表的民族意志所取代。首先是威廉和玛丽，接着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安妮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于1700年死后的汉诺威选侯(詹姆斯一世女儿的后裔)的继位都是由英国的有产阶级决定的。当专制主义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西 354 方世界似乎都是处于上升的时候，1688年的这种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应低估的。18、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在1689年取得胜利的契约论的一致性与完整性，同时却低估了它所带来的紧张关系、矛盾和冲突。但是他们将它看作是彻底否定了关于政 355 府的概念的历史转折点，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1688年的革命者对君主应占什么地位的问题十分关心。就英国与外国势力的关系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预见到他们行为的后果值得怀疑。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影响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否认不了的。在1688年之前，从克伦威尔到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亲法反荷的。在1688年之后，法国多多少少地成为英国永久的敌人，与英国一直不断地争夺海 356 上霸权。冲突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使英国再次既卷入了大陆上的战

争，又卷入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是自伊丽莎白与西班牙斗争以来所从来没有的。在这段时期中战略战术的复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英国人在这场即使不是无法预见的，但确实是突如其来的革命的后果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了各色各样的不同考虑的影响。从整个战略的角度看，英国要竭力反对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西班牙与法兰西王国合并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波旁帝国，以前曾需要保护以免受到荷兰经济发展威胁的英国的商业利益，此时也采取进攻的姿态来对抗法国的更为持久的竞争，特别是提出了即使不占领西班牙帝国的领土也要分享贸易的权利。辉格党人利用这些舆论制定了一整套干涉别国的外交政策，这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的大陆战役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然而，在这些年代里，如果不是为了王室事业的话，这些考虑是很难使英国人同意花费如此多的费用和资财的。九年战争曾被恰当地称之为英国王位继承战争。1688年威廉认为他干预英国国事将自然导致荷兰与英国的反法同盟，否则他是不会扬帆驶往托比湾的，然而实际上，他的新的英国臣民之所以给他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大半是由路易十四蛮横无理地维护詹姆斯二世的态度造成的。英法经过艰难的谈判于1697年达成了和约，法国放弃了对詹姆斯党人的支持。但是4年之后，爆发了西班牙王位之争，欧洲又处在战争的边缘，路易十四又支持斯图亚特家族，这一次是支持詹姆斯的儿子即老僭君，这使许多不情愿的英国人也转而支持政府的大陆行动。

战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英国军队所向披靡，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军队在马尔巴勒的率领下，取得节节胜利；英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新教徒的继承王位之举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个在不久之前还被广泛看作不过是法国的一个比随从好不了多少的国家所赢得的新声誉。且

不说鲁克在直布罗陀和斯坦厄普在梅诺卡岛的胜利，马尔巴勒在布莱尼姆和拉米里的胜利，已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和地中海的强国，同时成为法国在海外的劲敌。在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军事上的进展也随着国家开支的减少变得缓慢，布莱尼姆的辉煌胜利所激起的雄心也随之消散。但是1713年签定的乌特勒支条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得到的主要收获，这甚至使人产生了法国研究外交问题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样一种印象："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

357

战争对国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争费用几乎高达1.5亿英镑，而在和平时期每年的开支据认为最多只有200万英镑。巨大的开支要求增加税收，这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令人注意的是占比例很高的款项(约有1/3)是靠贷款。这笔钱只有在不断上涨的和变动不定的金融市场才能得到。这样的金融市场是由17世纪末期的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尽管农业萧条严重地影响了土地的价值，商业贸易在1780年代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很多年中，投资所产生的盈余使经济状况未趋恶化。光荣革命后的政府由于特别需要现金，准备将尚未出生的纳税人的收入作为抵押来创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利率。这就为人们踊跃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些为最终在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作出贡献的金融家们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只要战争在继续，政府就不得不向商业界借款。一个新的现象是这段时期前所未有的巨额借款促使必须建立新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钱最终都要由有产阶级付的话，这个新的议会制政府就不会得到更多的信贷。同时，政府如果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必须与这些有钱的人及其代表紧密合作的话，也就不会有相互之间的谅解。国债和与国债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将一个非法王朝、金融界以及纳税的人民连接在一起的重要利益关系之上的。

年复一年，战争接着战争，沉重的债务不断增长。一届届政府感到它们要想不借债越来越难，政府所征的税收几乎只是为了偿还债务利息。然而，事后看来，这种制度虽然和当今欧洲各国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有益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使得原来可能动摇的政府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在战争时期促使私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公用事业，使国家财源增长。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只注意到政府的缺陷，借口说国债实际上是能够偿还的。现在国家虽然避免了破产的危险，但是却越来越衰微。社会上的人们受传统心理的影响，普遍憎恨税收，对新形式的税收更为不满。这使得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愈加烦人。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一些人颇有见识，认识到这个新制度在政治上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产生于它对议会尤其是对下院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赖于议会参与这一精密的过程，而议会也就理所当然地抓住财权不放。土地税是纳税者所承担的对国债的基本保证，议会小心翼翼地通过关于一年征收的土地税税额。即便授权时期更长一些的关税和货物税也是在经过拖得很长的争辩后才定下来的，“预算”一词是在亨利·佩勒姆任财政大臣时(1743—1754)首先使用的，它在名义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是，实际上，财政预算的主要特征在光荣革命时期就已有了，1689年正是在这方面比任何其它东西更能最终确立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在17世纪时，人们很可能认为立法机构有些荒唐可笑并且显然是令人气恼的英国中世纪的残余，是对有效的君主政府的妨碍，应当完全加以废除。此时，它的前途已得到了保证，自从1689年以来议会每年开会的时间都相当长。从某种意义来说，1689年的革命使已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复杂。18世纪的政治家并不是想如何摆脱议会和制服议会，而是如何操纵它，而如何玩弄操纵议会的手腕就成了乔治时期政治的关键问题。

358

17世纪末期，在进行政治革命时要想避免涉及宗教革命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依个人的观点而定)是不可能的。从这方面来讲，1688年革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所得，而且还在于它的所失。当代许多人希望采取激进步骤来修改17世纪60年代关于宗教的决定。人们谈论过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广泛的国教问题，而对一些非国教徒尤其是长老派教徒来说，与国教和解的可能性看来比1604年汉普顿宫会议以来任何时期都大。然而，后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1662年，信奉国教的乡绅不允许削弱教会的等级制度和主教制制度。说此时产生了劳德教或者高教会宗教的反动是不正确的。但是任何与非国教徒和解的迹象很快消失了。结果，非国教徒从当时的事件中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勉勉强强的宗教宽容政策。1689年的宽容法规定在国教会主教许可之后，非国教的新教徒实际上享有信仰的自由。但他们必须遵守三十九条款的基本教义和信仰划一法的规定。这些要求看来与詹姆斯二世对待非国教徒的所有各种看法都相距甚远。

无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通常低估了宽容法的意义。对那些信仰被严格限定在特定条件下的人给予极其有限的自由，这对曾经拒绝了信仰自由令的诱惑、并曾迎接了奥兰治的威廉到来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报偿实在少得可怜。然而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观点。对那些最近在17世纪80年代初期受到严酷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律保证。但是从那些不安的教会人士的观点来看，维持复辟时期的决定也是很重要的。1662年的祈祷书一直到20世纪仍然 359 是国教礼拜仪式的基础。但是在1689年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安稳的教坛，如果没有这个教坛，官定的新教事业就要失败。一个矛盾的现实是教会的排外性与英国作为18世纪的野蛮世界中唯一的文明国家的声望具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能容纳除了分裂教派和

天主教徒以外的所有宗教信仰的国教和一个宗教信仰上具有严格限制、与大量的非国教徒同时并存的国教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的不同也许是在于这是一个宽容的、在宗教上能够互相通融的社会。在法律上承认礼拜自由，这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前所未有的事，伏尔泰将它视为自由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688年革命的结果。

360 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它们带来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和政治冲突，而这些正是奥古斯丁时代的特征。紧张关系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是国教的困难处境。这个时期的一个强烈的呼声是“宗教处于危机之中”。现在看来当时宗教是否有危机值得怀疑。宗教宽容对企图恢复劳德教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信仰自由的理论和信仰自由情绪的蓬勃浪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好像是乏味的空谈。而且，英国国教根据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而享有的政治特权在1688年革命后丝毫没有受到损伤。然而，困难也就出在这里，因为实际上，有各种迹象表明，非国教徒能够向这个特权挑战，或者避开这种特权的限制。许多非国教徒随时准备偶尔服从国教，在每年举行圣餐礼仪时，根据国教仪式来进行，以迎合法令的规定，然而在他们自己的集会处作礼拜时却不是这样，因而常使国教徒感到恼火。在此期间，非国教徒按国教要求而作的宗教礼拜是否越来越多尚无法确定。但这段时期明显的是，非国教徒小教堂的存在得到了公开的认可，此时，那些到这些教堂去的人都注意到了国教与非国教的不同标准，而且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17世纪90年代和1700年后10年的整个气氛的刺激，使得教会人士感到焦虑不安和歇斯底里。神学理论上的
361 探索和自然神论增长的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辩和恐惧。约翰·托兰的《基督教并不神秘》是最早的最有系统地推广“自然”宗教反对“天启”宗教的著作之一，它在1697年引起了对这类问题的激烈

争辩。尽管如此，一些最激烈的反对天启论者本人就是英国国教的教士。塞缪尔·克拉克是辉格党怀疑论者，他攻击了三位一体论，结果遭到1712年宗教大会的愤怒谴责。本杰明·霍德利曾连续三次任主教，但他否认主教和教会的神圣性，这两个人只不过是比较明显的异教例子，这种异教精神标志着英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

英国高教会对上述时代潮流的反动，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达到了最高点，安妮是宗教信仰上虔诚和保守的女王，她对高教会的反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英国高教会的力量主要来自其它方面，其中许多与党派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托利党人常常自封为"教会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利用国教的危机感和边远地区国教徒乡绅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乡绅来说，1688年的革命带来的除了坏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战争引起了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所征收的沉重的直接税。土地税是1英镑要交4先令，使得已经受到农业萧条影响的地主遭受更大的负担。而且，地主乡绅为了战争作出的牺牲却为他们的敌人—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些金融界人士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特别活跃。这些人似乎都是宗教上的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之外他们不用交纳其它税，当然他们都追随辉格党的政策。新旧政党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妙的。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人很多出身于清教徒或辉格党人，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哈利就有这样的背景。在另一方面，辉格党领导集团跻身官场，争权夺利，为党派利益而不顾原则，落得一个不光彩的名声；他们好像变得不是1679年"乡村派辉格党"的后裔了。然而，在18世纪初期无疑存在着强烈的党派意识。这种强烈的党派意识，也许在1710年辉格党人抨击托利党神学家萨谢弗雷尔传教时宣扬陈旧的不抵抗主义时达到了高潮。随后发生的民

众骚动暴露了政治的潜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也是伴随1688年革命而产生的。1694年的三年期法原则上是要迫使国王定期召开议会，这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个法案也要求举行经常的选举，其结果是这个时期选举竞争特别激烈，竞争冲突不断，在20年里进行了10次大选，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随着1695年的颁发许可证法的到期，国家的检查制度被取消了，确保了公众辩论的论坛日益扩大和普及。这些年是格拉布街①、期刊报纸出现和真正具有政治意识的民众日益增多的关键时刻，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总之，在历史学家看来，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是政治稳定的有利时机。但是，当代人所能得到的资料似乎表明有限君主制和财政稳定是以政治上的混乱为代价的。

"罗伯特统治"②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王朝继承英国王位加剧了原就很紧张的局势。安妮女王在世时，人们如果不是从逻辑上也可从感情上对她的家族的信任而将她看作是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国的真正代表。而讲德语的汉诺威选侯继承了英国的王位，他们对外积极参预外国事务，对内执行辉格党的政策，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汉诺威选侯继位时所利用的借口就很难继续维持，结果在1714年时，从王朝的观点出发，很多问题都发生了。许多人敦促觊觎王位者，即詹姆斯二世的儿子放弃天主教，回到伦敦。如果詹姆斯三世皈依国教的话，显然会加强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机会。但他没有做出个人的牺牲，以致1715年詹姆斯分子的叛乱如一颗受潮的爆竹一样没有炸响。同年路易十四去世，此后，法国也无力干涉英国的事务。即使

①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伦敦的一条街道，以前为穷文人聚居之处，今改名为弥尔顿街。——译者

② 罗伯特统治(Robinocracy)，意即罗伯特·沃波尔的统治。——译者

在苏格兰，虽然叛乱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仍然不妙。1708年，在相当紧急的气氛中实行了联合，解决了一些由于王位继承而产生的棘手问题，许多苏格兰人为失去自己的民族议会和相应的独立而感到哀伤。但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巧妙地保存了苏格兰的一些法律和教会机构，同时，通过与英格兰王家机构的联合获得了真正商业上的好处。在这种环境下，1715年的叛乱不论就其内容和目的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说老僭君失去了机会，那么在不同的意义上说他的成功的竞争对手乔治一世也失去了机会。在安妮女王统治的末期，不得人心的战争、蛊惑人心的选举口号"教会在危机中"以及女王对辉格党领导集团的厌恨等，使托利党人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对大多数托利党人来说，国教的利益胜过他们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感情。如果新政府贯彻执行威廉三世于1689年开创的明智的两党制政策的话，那么1714年的过渡就将容易得多。然而，乔治一世显然将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的功劳都归于辉格党。从1714年到1721年期间辉格党人大肆排斥托利党人，谋求自己的统治，这使得詹姆斯分子叛乱的危险性比原来更大，并且威胁到1688年革命的安排。首先，七年期法的通过使得新的辉格党政府在他们的工作基本完 362 成之前无须与无法控制的选民打交道。谣传说一旦时机成熟，辉格党人就将取消限制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律规定，使议会成为"长期"议会或者是"领薪"的议会。同时，安妮时期的托利党人企图用来束缚非国教徒的立法，如暂从国教法①和分立教会罪行法②，在经过暂时终止执行后，于1718年被一齐取消。大学议案的目的是

① 暂从国教法(Act of Occasional Conformity)：1711年制定，旨在防止非国教徒仅只为了获得民政和军事职务而接受国教圣餐，然后又不接受国教的法案。——译者

② 分立教会罪行法(Schism Act)1714年制定，禁止非国教徒开办学校和在学校任教。——译者

让国王完全控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和研究员基金，以便将这两个教会和专职人员的摇篮变成辉格党人的地盘。最重要的是，1719 年的贵族爵位法案力图将上院的规模限制在当时的水平上，不让其发展。这将有助于确立辉格党人在上院的统治地位，而不因君主的思想改变而改变，使得辉格党人能够控制那些影响到他们利益的立法过程。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辉格党人持续而有计划地清除各郡治安部门、治安委员会、军队以及各级部门中的托利党人。

363 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如果完全成功，就会造成与当时瑞典一样的制度，这种制度使这个国家在以后的 50 年里国家衰微，贵族派系分裂。它就会造就一个如同绝对专制君主制那样的具有无限权力的寡头政体，这种政体是 17 世纪时的英国人十分惧怕过的。寡头政制将使得 18 世纪最显著的成就——稳定的、灵活的政治结构完全不可能。这种制度之所以没有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辉格党内部的分裂。在乔治一世统治初期，在辉格党人内部联合起来摧毁对手的时候，他们的计划得以相对稳定地进行。但是他们的联合只是暂时的。新国王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他利用英国的海军力量为实现汉诺威王朝在波罗的海的野心服务。在政府内阁中，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加剧。1717 年辉格党最终发生了分裂，沃波尔和汤森德成了反对派，斯坦厄普和森德兰在宫廷的地位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为巩固。宫廷政治也起了轩然大波。国王的儿子即未来的乔治二世和他的妻子卡洛琳显然表示支持汤森德，并从此开始了汉诺威家族后嗣玩弄政治阴谋以争夺王位的长期斗争。在这种形势下，要完成斯坦厄普建立辉格党一统天下的宏伟计划显然很渺茫。在下院中，沃波尔本人在否决贵族爵位法案和迫使政府放弃大学法案的斗争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南海泡沫

事件①之后不久，内阁为使其计划免于破产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现在看来，"南海泡沫"事件和伴随而来的财政恐慌是无法避免的。这似乎是激烈而恶性膨胀的商业冒险的自然结局；这种商业冒险精神是随着前些年"金融界"的兴起而来的。然而首先应对 384 造成这场动荡的前后过程加以说明。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界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收回的投资特别丰厚，显然这就为向国家借贷的债主们之间更激烈的竞争提供了条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内阁的确曾在1711年鼓励建立南海公司，目的是以此来实际上代替辉格党人创办的银行。而且，人们都相信它的存款不仅来自伦敦城区，而且来自众多的小储蓄者手中，认为它的投资来源更广泛，更公平。南海公司1719年的计划似乎经过很仔细的筹划以分配国债，并给与财政部以更好的条件。南海公司所遇到的困难，开始时并不是由计划不周造成的，而是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不同人的利益。对公司的董事们，尤其是制定计划的核心集团的人来说，他们不仅需要为自己，而且还需要为许多王公大臣、议员谋取丰厚的利润，因为得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是公司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关键。然而得到他们的支持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给他们的股票以优惠的条件，甚至有一些是用贿赂得来的。总之，许多与南海公司有牵连的人都盼望很快地分得利润，为此公司不顾投资的可能性，拼命大量发行股票，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在南海地区的贸易情况。1713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条约给予公司以享有对西班牙奴隶贸易的垄断权，而且可以享有向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市场贩卖欧洲商品的权利。从理论上讲，这些规定展现了一幅特别令人振奋的前景。但是在实际上，从伦敦来控制这种遥远贸易的困难太大了，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

① 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1720年英国由于南海公司倒闭而引起的一次财政危机，涉及许多政界人士，丑闻不断。——译者

的冲突和竞争更加重了这些困难。南海公司的贸易在短期内无法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即使在以后，公司的贸易也很难满足1719年时人们对它的过高希望。然而在1720年初期，对投资冒险的狂热冲昏了人们的头脑，使他们忘掉了严峻的现实。人们认为股票会上涨，于是新的冒险家不断地投资，这使得买了许多股票的人可以乘机抛售股票，谋取高额利润。随着基金的不断涌进，人们不断发行新股票，并不断大肆宣扬投资的可靠性，更不用说该公司更加慷慨地向政客们赠送钱财了。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政府所造成的腐败，以及投资者、民众们的无知和大量的国债，终于使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虚幻的“泡沫”在不断增长，它又促使难以置信的计划、欺骗性的吹嘘的“泡沫”更为增长，最后，人们开始产生了怀疑，泡沫破灭了，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变卖了土地、财产，以高得出奇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人的结果更惨。对这些人来说，只有徒365 唤奈何，别无他法。而这些受害者之中并非都是富裕的人。议会急急忙忙通过新法令严加限制将来的股票公司，不过这只是亡羊补牢之举。为了减轻政府的重大损害，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国王与威尔士亲王公开和好了。辉格党反对派又被请回到政府之中，汤森德着手去赢得国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青睐，沃波尔在下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议案，企图尽力来维持国债，使宫廷不致丢脸。沃波尔的这一行为使他长期背上了“遮掩”显贵的腐败和欺诈的污名。沃波尔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这种严重的局势。与这桩发生在1720年的暧昧的交易有牵连的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与辉格党人一样，不想在公众面前大肆渲染这件事。而且，南海泡沫事件也是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同时期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也产生了灾难性的事件，人们因此将此危机归罪于与伦敦城区和宫廷无关的金融势力。除了两三个大臣做了替罪羊之外，国王的366 大臣们都得以免除罪责。对沃波尔来说，这是他政治上的重大胜

利，他利用这一意外的机会胜过了自己的对手。在以后的2年里，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死去，为沃波尔取得优势地位的新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或正像他的对手所说的一样是“罗伯特统治”时代。

当然，当时的人无法预见将来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的到来。18世纪20年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不过这并不是指当时人们基本健康和生存状况受到威胁，而是说20年代开始时，不仅出现了南海泡沫危机，而且人们担心瘟疫会袭击英国，这时，瘟疫在法国南部盛行，它随时可能经马赛和海船的航道传到伦敦。当然，这种惊慌是不必要的，自400年前的黑死病第一次侵袭欧洲以来，瘟疫每隔一段时间危及大部分欧洲地区，然而，到此时，瘟疫即使尚未绝迹但也已停止了。不过，在这时，这种迹象还不明显，另外有一种并非传自国外而是本土的疾病，却仍然对人口的动态统计产生很大的影响。在18世纪2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在乔治二世1727年即位后的头三年里，被当时人们称为疟疾和热病的天花、流感盛行，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对人口的影响显然非常严重。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缓慢的、微弱的增长似乎被这一次显然是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率所破坏了。在1731年，英国的总人口约520万，这个数字大约比17世纪50年代中叶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人口数字还要低。

在当时人们不只是在生理上有病，南海泡沫事件所揭示出来的贪婪、欺诈和歇斯底里也是当时人们的通病，它受到了报纸、教会的猛烈抨击，并被认为是南海泡沫事件以后的年代里仍旧存在的最大的罪恶。奢侈和浪费被认为是其根源，而道德沦丧，行为放荡则是其结果。当时在公众生活中有许多大丑闻，是其令人震惊的证明。议会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揭露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的腐败行为。德文特湖地产的托管人以极低的价格将被没收的詹姆斯

党人的财产卖给他人。慈善公司的职责是为穷人提供援助和就业机会，然而它的董事和官员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甚至侵吞公款。在这两件事例中，一些著名的议员和支持政府的人都有牵连。更令人震惊的是对大法官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的弹劾，人们指责他策划了出售司法职位。后来当人们发现他把大法官法庭照管的私人财产变卖以资助该法庭的商业司法人士时，甚至他的内阁同僚也不愿意为他辩护。执法者犯法使当时的人大为震惊；人们极为重视财产权，对它的破坏是人们不能容忍的。而且，公开的犯罪与隐蔽的犯罪都十分猖獗。犯罪行为是社会的一面扭曲的镜子。但现在犯罪似乎变得更有组织，更商业化，更具有愤世疾俗的性质。乔纳森·怀尔德是小偷头目，是他时代的典型代表。他的钱财都是由他的手下人为他偷来的，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都市里的腐败的官员和治安法官与他同流合污造成的。他只是靠犯罪发财的一个例子。在王室森林里的偷猎者组织得非常好，他们有计划地向伦敦市场提供猎物。南部和东部沿海的走私者根据市场和经济的原则调节自己的行动，他们与政府官员和公众的广泛合作也十分频繁。当局也曾采取措施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活动。怀尔德由于一个案件败露而被带上了法庭，他于1725年被处决，他的死反而使他在民间传说中被渲染流传。1723年议会又通过了新的法律——严酷的“黑法”来严厉打击温莎森林和其它地方的偷猎者。这些人一直等到20世纪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间英雄；历史学家此时才有意将他们看成是民众文化的真正代表。对走私者来说，政府越镇压，他们人越多，走私越猖獗，在18世纪30年代他们最活跃的时期，曾与乔治二世的龙骑兵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们的走私活动迎合了社会消费者的需要。

这些就是汉诺威王朝统治英国初期时发生的事情。从这方面来说，最好别将南海泡沫事件看作是英国1688年革命后的最后一

幕，而是应该将它看作是通向18世纪中叶社会繁荣、风气粗俗、商业发展的壮观场面的开幕戏。用这种戏剧性的比喻是特别合适的，因为这个时期在表演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世纪20和30年代伦敦的剧院有一个大发展，并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1737年国王宫廷采取行动实行了大规模检查制度之前，剧院和报纸对南海泡沫事件时期和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日益激烈的抨击。其中批评得最厉害的是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它在1728年上演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该剧是否有意写成政治讽刺剧尚不能肯定，但是有意义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却将它看成是政治讽刺剧。盖伊的戏剧迎合了人们由于对社会的忧虑而产生的错觉和幻想。它以鲜明的笔调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绘成一个贼窝，认为统治阶级的道德与伦敦下层阶级的道德一样地堕落。菲尔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绘，它将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相提并论，作了切实的比较。蒲伯的《愚人记》①、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和博林布鲁克的《手工匠》都是那个时代的讽刺小说，它们对此问题都有相同的描绘。在这些作品中许多因素都是共同的，如回归到古典主义，对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田园风光魅力感兴趣，尤其是以虚拟的方式对18世纪初期的商业界的不 [369] 断批评等。在这些方面，文学杂志对沃波尔时代的抨击，的确可以被看作是持续了许多年的最后的、最激烈的浪潮。但是，它显然并未对将来起鼓舞作用，也未能提出可供选择的建设性分析。

当盖伊的观众在马克亚斯②身上看出沃波尔的政治本质时，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即汉诺威政府的政治家与当时社会罪恶之间的紧密联系。除了少数几个人（最明显

① 《愚人记》(The Dunciad)，蒲伯所写的长篇讽刺诗，讽刺当时文学界的丑恶行为。"Dunce"原义为"愚人"，意指当时文学界的一些人。——译者

② 马克亚斯(Macheath)，盖依所写《乞丐的歌剧》中的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译者

的是漫画家威廉·霍加德，他对人们的行为道德进行了大量的讽刺），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致认为沃波尔是同类人中第一号大坏蛋。他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个诺福克的平步青云的小官吏；专门靠有计划、有预谋的腐败行为往上爬，（他在1712年因侵吞公款受到了托利党人的指控），他之所以能够爬到国家的最高位置，是因为他完全不讲原则；完全按宫廷的旨意行事。在1727年之前，他的表兄汤森德勋爵和他一道分享权力，一道承担臭名。但是，乔治一世的死和新国王的继位使得沃波尔特别引人注目，他不仅巧妙地控制了乔治二世，而且还控制了卡洛琳王后，他将所有竞争对手都挤下了台，连汤森德本人在1730年也被撵走。结果，他很快上升到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以来从来未有人达到过的突出的个人地位，他的独霸权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格拉布街下层文化人的猛烈攻击。他是一个"伟人"，英国的"巨人"，"高大的人"，他也是人们最大的政治错觉的代表——是诺福克的骗子，是萨伏依街头玩弄西洋景的人，帕里努鲁的魔术师，米尔林的巫术师，装模作样的大师等。他对性情暴躁、反复无常的乔治二世，和对以前难以驾驭的议会的控制，被无数攻击性文章和印刷品描绘成名符其实的玩弄政治权术的手腕。

当时和以后，人们认为沃波尔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他善于巧妙施加影响，甚至行贿。与前一段时期的政治动乱形成鲜明对比，这时期的特征是政治稳定，这是政府权力日益得到加强的自然结果。随着战争的进行，政府的权力逐步扩大，尤其是建立了巨大的管理新的财政制度的机器，它直接地带来了大量新的庇护制。而且，1688年革命后的政府迫切需要在下院中赢得多数，因此，为了控制议会，更需要在议会利用这种庇护制。结果，出现了规模更大、纪律更严的宫廷和财政党，它起了在国王和下院之间久已存在的鸿沟上架起桥梁的作用，从而开始了一个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

相互协调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理论，但是并非所有的 376 前提和结论都是必然发生的。沃波尔的管理原则也毫无创新之处，至少从查理二世统治以来，许多大臣就曾试图在下院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宫廷党。但在安妮女王和她的后代君主的统治时代，且不说广泛流行的腐败，人们追求利禄之心也十分强烈。虽然在某些方面沃波尔的内阁确实在和平时期大量削弱了庇护制，但毫无疑问沃波尔和他的继承人亨利·佩勒姆都是老练的善于玩弄手腕的人，他俩使宫廷党成为控制议会的极为有效的工具。但是，要在乔治时代的英国形成典型的议会制度，仅仅靠庇护制是不够的。

这并不是否认沃波尔的无可比拟的才能。他作为一个宫廷大臣才能超群。他完全操纵了王后，（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她）控制了国王。赫维勋爵与王后卡洛琳非常亲密，因而有许多机会目睹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极深刻地描绘了沃波尔的这种手段，认为他将奉承、哄骗和威胁极其巧妙地结合起来。虽然赢得宫廷人员的支持并非什么新鲜的事，但是他有非凡的把各种才能都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本领，这使得他能同样巧妙地将议会议员玩弄于股掌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决定留在下院充当第一大臣，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以前的内阁大臣们一般都照例投奔沃波尔，他们仍留在枢密院，并最终控制了政府的钱袋。沃波尔在争论问题时有些粗鲁，（并不一定是缺点），但很有技巧，因而也非常有力。作为一个博取人们好感的人，他在弄清典型的乡绅的观点并满足他们要求方面的能力是甚为卓越的。然而，最重要是他的政策完全不同于老的辉格党同僚的党派性的纲领。他尽量避免激化宿怨，这一点在他对待教会的做法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援引“特许条例”允许不信国教者信仰自由，甚至让他们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在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危害国教垄断权的危险。宣誓法和法人法的取消还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在公司、大学和议会

也没有任何彻底改组的计划。辉格党所推行的新的与法国和解的政策成为沃波尔统治时期与所有人和睦相处的政策，这一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税收大大降低了。从理论上讲，辉格党的优势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从实际上讲，沃波尔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政治上，放弃了强迫的作法，谋求实现政治上的协商一致；原来排外的寡头集团的做法，被虽不激动人心却切实牢固的政策取代了，他敞开大门，让任何只要口头表示服从一般"革命原则"的人进来组成巩固的联合统治。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王朝也将最终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就政府的腐败而言，它也不是沃波尔新的管理所导致的，371 而是由庇护制发展而引起的。在1714年之前，变化不定、难以捉摸的宫廷政策使得对官吏和庇护人进行的甄别极其困难。从位于选区金字塔之巅的选举巨头到底层的税收官吏和普通市政参议员，人们搞不清楚获得油水和权力的关键是什么。安妮时期党派政治的许多不稳定因素都是犹豫不定的结果。在1715年之后的二三十年期间，这个问题通过采用公共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中心性的作法得到了解决。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托利党人加入内阁，除在1743年曾出现过时间很短的"基础广泛的内阁"①（它是沃波尔倒台后形势不稳定的结果）外，托利党人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自相矛盾的是，托利党被排除在外反而使得内阁更加稳定。在宫廷中任职的托利党人，他们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宫廷中的官吏而不是托利党人，他们害怕被永久地被排除在官场和权益之外，那将是无法忍受的。而且，沃波尔的辉格主义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许多以前支持托利党的家族轻而易举地改弦易辙，支持辉格党人的新原则。那些在本能上或从自身的利

① 基础广泛的内阁（Broad-Bottom Administration），指英国历史上由各派联合组成的亨利·佩勒姆内阁（1744年11月至1754年3月）。——译者

益出发而倾向宫廷政治的人更是如此。到了18世纪30年代，在本世纪之初时还由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平分秋色的康沃尔郡的封闭选区成了辉格党人的领地。尽管在1712年时哈利在下院获得了托利党人的多数，但在上院却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实于他们在下院的朋友。这种变化并非是突如其来，而是持续稳定发生的。18世纪一些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也发生了这种变化，其中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

在沃波尔和佩勒姆统治时期，政治局势的稳定性无疑是汉诺威王朝制度所获得的主要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对它的规模过分加以夸张，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乔治二世统治时期政治没有变得僵化，而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现象。汉诺威王朝为与辉格党结成同盟，(尽管辉格党的原则有些乏味)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它永远疏远了顽固的“托利乡村党”人的家族。这些家族虽然没有产生过一流的政治家，但是在组织反对派方面却有一定的能耐，能够将一切潜在的敌对势力组织起来。他们会使背叛他们的人生活艰难，充满痛苦。例如当他们的一个出身贵族的领袖高尔伯爵与亨利·佩勒姆携手合作后，1747年在高尔的家乡斯特拉福郡进行大选时爆发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大骚动。在一些郡里，托利党人确实有自己的牢固的地盘。在从拥有40先令以上的郡选民中，托利党人得到的支持不但一直未见衰减，甚至还有所增长。在其它地方，如果说他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话，也是很有影响的。虽然辉格党人的不断的小恩小惠使教会中的托利党影响受到削弱，但是教会的重要神学院之一牛津大学，仍然对国教乡绅忠心不变，在托利党集团手中仍拥有足够的教会庇护制来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利益。相当多的城市里也有一些潜在的反对政府的势力。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尔、诺里奇和纽卡斯尔，民众有参政的悠久传统，也有许多易受到托利党人的煽动的因素。沃波尔的统治基础很广，不会 372

被认为是狭窄的寡头政体。然而还是有不少地主和教士以及城市中的中下层人士反对它，因此，这个时代的稳定更多地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稳定。

373 当然，只有政府本身发生分裂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危机。在18世纪30年代初期，在宫廷中出现了由反对沃波尔的人结成的令人生畏的联盟。当沃波尔企图扩大货物税体系时，这些反对者的机会来到了。从政府财政来看，沃波尔这个计划对财政是有益的，但是它引起了许多英国人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们反对新的税收，担心政府官僚机构的进一步扩大。只有当1733年沃波尔表示愿意撤销这项计划、乔治二世对他表示坚决支持以反对宫廷中敌视他的人时，才挽救了他的政府。即使这样，1734年大选时，人们普遍地反对他，严重削弱了他在下院中所拥有的多数地位。四年后出现了更为严峻的局势。1738年和1739年议会外的人们进行了强有力的鼓动，坚决要求对西班牙采取强硬措施，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也支持这种要求，使局势变得更加非常危险。被遗弃的托利党人、心怀不满的辉格党人、怀有敌意的商人、民众政治家和王位继承人结成了可怕的同盟，最后不仅迫使沃波尔打了一场他深恶痛绝的战争，还把他撵下了台。期待权问题特别令人吃惊，1751年弗雷德里克去世时，佩勒姆又面临了沃波尔所遇到的问题。

即使没有国内的这种紧张局势，辉格党人的优势也面临严重的挑战。詹姆斯党人所造成的威胁也许是夸大了；因为许多为了“海外国王”干杯的人，是否真的愿意为了斯图亚特王朝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有勇敢精神。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不仅使英国在海外卷入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而且还卷入了对付欧洲大陆上强大的、联合起来的波旁王朝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似乎主要关心他可爱的选侯领地，随后他与英国国内人士的

冲突，尤其是他为了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利益不惜投入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行径，给了英国的爱国政治家充分的把柄去攻击政府。沃波尔早就预言说，这场战争将演变为一场英国本土的王位继承战，这话果真应验了。1745年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对汉诺威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按欧洲大陆的标准，英国的常备军很少，甚至小僭君那支少得可怜、装备很差的军队，在1745年12月竟打到了英国的米德兰地区，防卫者竭尽全力才得以将之阻止。英国卓有成效的民兵因为得不到托利党人的支持早就不存在了，许多乡绅对此局面顶多保持一种沉默的中立。詹姆斯党人的军队的进攻被挫败了，并最后在库洛登地区被彻底粉碎。政府对苏格兰高地人执行残暴的恐怖统治，引起了人们的惊慌，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伦敦当局。从这些方面来说，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样，1745年的危机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辉格党人泼了一盆冷水。政治上淡泊 374 和贵族的优雅的传统图景是不对的。它与1745年的反叛者之破烂不堪同时又血腥残忍的形象不符，在相对平静的18世纪50年代初期，情况也不是这样。

例如，佩勒姆具有很巧妙的行政管理手段，他使国家安全地摆脱了战争，虽然他用的手段有些不光彩。他在财政上也很精明强干，使国债牢牢地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然而可能出于对政治局势的错误估计，他在1753年提出了犹太人法案，企图缓解英国国内犹太人的窘境，但引起了高教会的强烈愤慨和敌意，他们的不妥协迫使佩勒姆取消了令人恼火的措施，在1754年的大选中，他为此受到了惩罚。然而詹姆斯党人入侵的危险依然存在。直到1753年，伦敦城居民看到詹姆斯党人反叛分子公开被绞死仍感到非常兴奋；在某些方面，18世纪政治无疑是比较温和的，不过并非一直如此。

工业与失业

詹姆斯二世党人企图复辟的垂死挣扎是与前工业社会的消逝同时到来的，因为传统看法认为，被称之为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和变化深深植根于18世纪中叶。然而人们广泛认为的为工业起飞提供了条件的时期，却正是令人担忧的经济萧条的时期；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在18世纪30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特别低，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区，尤其是老的纺织中心，失业情况非常严重，而且还常常出现骚乱。然而，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情况。食品价格低廉使得人们可以花更多的钱购买消费品，因此促进了一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英国中部地区的工业的发展。农产品价格低廉，既经常使农业感到困难，但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例如，在东盎格利亚，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就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混合耕种技术的改进通常和"萝卜"汤森德时代联系在一起，但它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时期。不过耕种技术的改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公认的。在其它一些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在18世纪30年代出现了交通史上极其辉煌的一章——建成了全国规模的收税道路网。在1730年之前，只形成了少数收税道路协会。绝大多数主干道，其中包括北安普顿郡附近的大北路和几乎整个大西路都是由恰好位于道路两旁的不幸的地方郊区维持的。乔治时代初期的英格兰大路由于各主要消费品中心之间迅速增长的客流量和更麻烦的货运而日感困难，这种情况被认为是全国的耻辱。即便说不是总受欢迎，收税公路协会是一个很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方可通过逐步发展起来的税收体系征收相当的钱来维修公路。这种协会发展的最鼎盛时期是在18世纪中叶的40年。随着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公路发展，它们大大地加强了地方的活力，到了1770年，在运河开始了强有力地竞争运输市场时，它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相对有效的全国运输网。在旅途上所花费的时间也大大地缩短了。在18世纪

375

20年代，从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这样的主要地方城市出发到伦敦足足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在18世纪80年代时顶多不超过24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适用于几乎所有重要路线的时间的缩短，看来是现在的运输能力和技术的改善所能达到的极限了；直到19世纪20年代麦克亚当[①]和特尔福德[②]得到大量援助以前，交通运输几乎就没有得到什么改善。

如果国内的消费、货物和资金没有迅速扩大的话，收税公路也就得不到发展。然而，在这几年中海外的扩展更远远超过国内的发展。当然，当时的情景可能又会给人带来错觉。充满爱国激情的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坚持大英帝国的传统观念。殖民地仍被看作是主要的原料来源地、过剩人口的迁徙地和增加国库金银的重要来源。王冠上的宝石就是来自西印度群岛，吃的糖也是来自那里的种植园；1739年爆发的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就像以前几次战争一样，是为了打进西班牙控制的南美的富庶领地，掠夺那里的黄金、白银和热带作物。然而现在看来，英国的海外贸易是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英国越来越多的商品输出不再局限在欧洲市场，而是发展到了其它地区，尤其是北美。主要的传统输出商品纺织品因为市场的扩大而受益，但是发展更快的是新的制造业，尤其是与金属工业相关的产业，如家用产品、工具、武器和各种器具的生产等。总之，对“伯明翰产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这些制造业的迅速发展。

重商主义的理论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但它要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还需要时间。在18世纪50年代，美洲13个殖民地的重要性

① 麦克亚当(J.L.Macadam，1756—1836)，筑路工程师，碎石路面方法的发明者。——译者

② 特尔福德(T.Telford，1757—1834)，苏格兰土木工程师，后移居伦敦，建造了许多桥梁、道路、运河。1818年英国成立土木工程师学会，他被选为第一任会长。——译者

日益显露出来，商人和政府官员开始与法国竞争，力图控制北大西洋世界。这种注意力的转变，对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乔治时代伦敦的发展非常快，它作为西方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了。但是严格地说，伦敦的重要性相对来说并不大。与美洲的大量新贸易转到了西部的新港口，尤其是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奇以及商业活动曾兴盛一时的怀特黑文。这些港口的工业产品供应地区，即塞文河谷、西米德兰、约克郡、兰开夏和苏格兰西部地区的工业重心很快从南部、东部和西部转向北部和米德兰地区。

这种转移很明显地反映在该时期人口统计的数字上。在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以后，人口又开始增长，虽然在30年代增长较慢。1750年的人口调查，如果完成的话，就会表明人口总数可能达到580万，比20年前多了50万。到1770年达到了640万，而到1790年则将近880万。按19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个增长率算不了什么，然而它标志着近代人口统计史上的转折点，它也表明工业和城市的普遍发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并不缺少重要的发明和新建的企业。但是在亚伯拉罕·达比① 时代和乔赛亚·韦奇伍德② 时代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区别。从这方面来看该世纪中期又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大家熟悉的工业革命初期的巨人，如博尔顿和瓦特、加伯特、阿克赖特和韦奇伍德本人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英国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影响，在60年代初，七年战争期间，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所发生令人振奋的事开始引人注目。城市环境的改进本身说明了经济的增长以及城市内事业的扩展。当代人中如果有谁对安妮王后执政时期记忆犹新或生活在18世纪最

① 亚伯拉罕·达比（A. Darby，1678—1717），第一个用焦炭熔炼铁矿石成功的人。1709年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铁公司。——译者

② 乔赛亚·韦奇伍德（J. Wedgwood，1730—1795），陶器设计者和制造商。1759年在斯塔福德郡开办了他的第一个企业。——译者

启25年的话，一定会证实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巨大变革时期，此时城市以及某些小城镇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这特别表现在改善住房拥挤、卫生条件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在不断扩充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城市，宽阔的广场、整齐的房屋和厂房深得来访者的赞赏。相比之下，旧城区的狭窄街道、木房草屋的杂乱情景就显得有些过时，甚至令人感到粗俗不堪。凡是讲究文明的城镇都竭力设法从议会获得享有广泛权力的进行城市重建的职 379 权。今天许多保存完好的乔治统治时期的城镇都归功于这个时期的城市重建。其中理想的城镇建设规划的最突出的例子，也许就是北部边界地区的城市；在这方面，爱丁堡的新城仍显示出早期建立的一些城市的活力。南大不列颠的首都也不落后。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及其实际措施，伦敦的中世纪城门在1761年被拆除了，但其中的勒德门又重新修建起来并装饰一新，它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一直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二、三年前仍然如此。附近的威斯敏斯 380 特大厦，这个城市发展中最大的独立工程，几乎同时在1762年开始破土动工。威斯敏斯特的筹建委员们和各个教区的合作者就要改变这个大都市很大一片地区的面目。普遍铺设或重新规划了下水道和自来水管；修建、铺平了马路和行人道，其中很多还是第一次修建的；广场进行了清理和重建，并以各种雕塑和花草加以点缀。房屋有计划地加以编号，那些原来的五花八门给行人带来不便甚至危险的旧的标记统统被清除。到18世纪80年代，除了贫民窟外，首都的外貌已成为居民引以自豪，同时也是来访者，尤其是外国人惊叹不已的对象了。

这些变化不仅限于大城市和小市镇，而且乡村的大部分建筑也逐渐开始改变，土地本身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农业革命最明显的象征即议会圈地法案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8世纪后半期制订的。它们在经济上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与已进行了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的比较平静的非议会圈地相比，它们所起的作用要少一些，而且它们主要是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朝南和朝西这带状地区所具有的特点。但是，作为边界地区的土地和可转换的土地上农业获得较高效益的标记，它们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议会圈地在地理景观上的影响，也给当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之时，它们使人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几乎到了自满的程度。奇怪的是斯密本人对此并无信心。但是斯密是位学者，他的著作主要是理论阐述而不是实际观察，书中大部分是在 18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惊人的发展出现之前写成的。他的同胞约翰·坎贝尔的《政治观察》(1774)是对大英帝国经济发展的肆无忌惮的颂扬，现在仍然是这方面比较可靠的指南。

物质生产的增长必然影响着英国社会的性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商业多样化和前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从社会结构来看，它的主要影响可以说是扩大了社会的等级制度。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同时由于税收的水准和性质对财富的再分配并无影响，社会上中等和上层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比下层阶层更为迅速。其实这并不是新鲜事。例如，在 16 和 17 世纪农业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运动的令人注目的进展，逐渐把以热爱古老英国的小生产者、自由持有农和自耕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改变为一个新的农业社会。富裕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他们通常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佃农而不是地主本人，逐渐成为农村的统治者，而在这些阶层之下的人则越来越多地变为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这个过程有时被夸大了，因为实际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是在 18 世纪这个进程肯定是加速了，尤其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城市社会中也产生了相应的状况。

381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8 世纪的英国已逐渐变为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更糟糕的是，两极分化的破坏性十分明显。日益增长的

社会变动性，加上大量的当代文化教育和交通的改进，使得令人不安的贫富悬殊越发明显。挥霍无度的统治阶层上流社会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同样，中产阶级适度的、但也相当可观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使得商业高度发达的、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变得彰然昭著。这个“苦恼”(malaise)，如果可以称为“苦恼”的话，那么它在首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伦敦，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会约束和习俗，以及总想使可怜的穷人和生活舒适的资产者甚至富豪建立亲密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菲尔丁和霍格思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道德上的义愤和对社会的批判。

关于生活水平的议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水平恶化的实际状况还很难判断。在1750年以前，由于食物价格低廉，加上人口相对稳定所造成的工资比较固定的情况，可能使穷人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伦敦人由于嗜好喝酒而带来的严重问题和虽然危害较小但当时仍同样受到批评的爱喝劣质茶叶的嗜好，都说明了当时可供支配的收入并不短缺，然而到了下半世纪以后，对很多人来说，情况似乎开始恶化。粮食又像以前那样经常没有好收成，甚至歉收，加上工业经济不时地突然跌落和经常存在失业，使得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陷入充满危险和悲惨的状况。除此之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技术革新，使得工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使得工业进展的好处无需和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卑微的成员共同分享。

18世纪对社会问题似乎比其他时期要敏感些，虽然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不容易全面阐述清楚。穷人们仍旧主要用传统的武器进行反击，以保卫原来的有保障的经济秩序。他们反对饥荒和物价的上涨，企图诉诸于古代法律来限制中间商人和垄断制。他们反对削减工资和使用机器，组织联合会对抗主人，组织俱乐部使之具有社会保险作用。有时他们走极端，铤而走险，进行反叛或骚动。

虽然他们有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整个说来他们在这些战斗中失败了。乡绅阶级对民众反对有钱的人和商业企业家的愤慨情绪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是出售改良的农产品的专门市场的增加对地主来说，正如对粮食商人一样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关于处理生产关系的古老的情况也是如此，企图强制推行古老的学徒法，以防范资本主义的手工场主和不熟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逃避这些法规的办法，未能收效。有一个采用了旧学徒法的限制措施的团体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仅表明它没有进行新的投资并设立新的工业。当时成立的一些协会存在的时间甚至更短。至于那些纯粹为了支取退休金和疾病福利的慈善俱乐部，则受到上层人士的鼓励。但当联合会（或职工会）反对18世纪工厂主采取的明显不公正的行径，例如在西部各郡纺织工业的实物工资制时，则经常遭到镇压。有的时候他们在伦敦的裁缝工业或在皇家码头取得了成功，这有助于那些组织比较健全的团体树立信心。在大多数新成立的工业中，工厂主对在此之前一切团体都加以清除。

下层阶级不满的最极端的表现在某种情况下是最受到容忍的，这无疑是因为用家长式的统治者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需的保险阀。对骚乱的镇压很少采取过份的措施，处罚也只限于一小部分参与者，以儆效尤。即便那时，即使挑衅似乎很严重，但牵涉不深时，处罚也轻得惊人。因选举问题上发生的骚乱，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发生过；在像考文垂这样经常动荡不宁的城镇里，那里有一个大的选区，很多甚至不是选民的人也积极参加到选举中来，这种情况是每个选区都可能发生的。18世纪50年代中叶和60年代中叶饥荒时期经常发生的那种食物暴动，也被认为是当时令人不快的乡村生活面貌的必然反映。在一定范围内，政府对这些事件一般是采取容忍的态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塔菲尔德的织丝工人（当时认为贝德福德爵士支持输入法

国的丝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灾难)，愤怒地包围了贝德福德官邸。这次暴动十分严重，最后不得不动用了军队，但是就是这样，文雅的伦敦社会仍认为把它看作是一种有趣的娱乐，从旁进行个人观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则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因此，至18世纪30年代发生反对公路征税的骚乱是以相当温和的态度来处理的，甚至还有迹象表明骚乱者从某些有产者方面得到了鼓励；这些有产者和他们的下层同胞一样对征收过路税感到不满。但是对这一事件，后来还是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起，已有一些迹象显示出对民众骚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约翰·威尔克斯为了保卫选举权利和出版自由进行的长期的、有争议的运动引起街头激烈的示威。随后在以"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名义下所发生的示威与当局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一般人并不十分同情它。1780年反天主教的戈登骚乱① 第一次在伦敦造成真正的恐怖现象，它标志着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十年后的法国革命终止了旧的容忍的做法，并在有产者的头脑中注进了群众叛乱这个可怕的怪物。

没有一个永久性的方法可以解决由于最低层群众人数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不断贫困化而带来的问题。18世纪的对穷人的救济仍以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社会福利法为依据。在最坏的情况下，穷苦的劳动者和他们家庭的生活几乎相当于，可能甚至低于美国的奴隶或俄罗斯的农奴。对穷人的救济可能包括由他们吝啬的邻居所捐赠的最低的生活费，以及居住在残忍的主人的带有漏洞的破屋内，这些主人靠有计划地剥削他手下的人为生。定居法强迫那些无房居住的人必须住在他所出生的教区，除非他有自己的每年至少收入10镑的房产；10镑是个不算太小的数字。实

① 戈登骚乱(Gordon Riots)是于1780年6月2—9日在伦敦发生的。由乔治·戈登勋爵煽动起来的反天主教的骚乱。参看本书第415页(原书页码)。——译者

际上，这些残酷的法规并没有严格执行。济贫税是绝大多数教区
384 开支的主要项目，而且到18世纪后半期又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济贫税经常扩大到定期的户外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费用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定居法不得不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不幸的是，它们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具体地说，就是那些可能成为他们所逃往的那些教区的负担的人。但即使如此，18世纪后半期限制流动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少的。如果不采取一些认真的办法来补充人员，工业所需要的巨大劳动力是无法满足的。

有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和其他时期一样，对穷人是非常担心的，但他们对犯罪更加担心。因为商业化的社会提供了空前多的诱惑或刺激，引诱人们犯罪。五花八门的犯罪形式，例如拦路抢劫或者社会学者更感兴趣的破坏狩猎法等，历来吸引着人们很大的兴趣。但是犯罪最多的是这样或那样破坏财产的偷窃行为，它造成了经常的威胁，并日益严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为了反对这些违法的浪潮，对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可能有些夸张。不过，这一时期财产确实缺乏保障。为了制止城市犯罪，迫切需要强有力的警察力量，以便能够对犯罪行为顺利进行侦察和判罪（假如说不是迫切地要求进行比较仁慈的治理的话!）。但是警察力量会带来不少危险，何况它本身就存在着被政治庇护所利用的可能性。再说来自政府支配下的任何组织的力量的威胁已受到人们严重的关切。人们不愿看到在把常备军限制在最小限度的同时，却让一个更新的和同样邪恶的力量代之而起。其结果除了个别的如伦敦的菲尔丁兄弟所作的措施之外，这段时期内在这一方面未取得什么有意义的进展，而当局却被迫采取单纯的高压手段，以流放或死刑来威胁那些即使不太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个时期对轻微的罪行判以死刑的数字激增，对此19世纪的改革者提出了激烈的抗议。实际上这仅是想

用想当然的方法来遏止侵犯财产的浪潮。即使如此，也未能达到目的。因为陪审员和法官只是处理和宣判最确凿的案件。从统计数字来看，判罪的数字要小于真正犯罪的事实。有时甚至已宣判了死刑，但也由于法官的请求或高级官员的指令而予以缓刑。这样，审判的过程必然会陷入作为该时期特征的前后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政治措施的混乱之中。

穷人们既然指望不上国家，只好对教会寄以一线希望。18 世纪的教会在今天称之为社会政策方面的声誉不佳。由于它牢固地处于乔治一世时代庇护制范围之内，无法指望教会对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作出有系统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不配享有好 385 声誉。18 世纪真正的慈善事业有时被人遗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因为这种慈善事业绝大多数是自愿的和非正式的。它没有像在后来的时期、甚至以前的时期中那种对慈善活动进行记载的官方或国家的文件，因而很容易被人忽略。但许多有关对教育、保健和娱乐机构的捐献和支持的记载还是非常多的。不过这种记载常表现出恩赐的态度，同时也是由于担心那些被剥夺者对社会和政治所造成的威胁使他们陷入困境从而感到焦虑所促成的。但是在其他时期也有同样情况，而且其数字也相当可观。捐款和成立协会——这一过程的主要形式——创建学校、捐赠医院、设立贫民院、管理福利机关等。在这方面教会都积极地参与了。而那些被后来改革者所辱骂的阶级，即英国国教的达官显贵们——大主教、副主教、地方主教和教士们，则一点也不积极。

18 世纪的教会的地位有些相互矛盾的现象。18 世纪初"自然"宗教的影响导致越来越看重行动而不是信仰。基督教徒是那些为人行事像个真正基督教徒的人，而行善是献身宗教事业的最明白的表现。但是理性宗教无论它多么慈善，对那些未受过教育或智力较弱的人却未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所有那些主要教会的精神

力量都明显地在宗教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开始衰退。不信国教教徒受到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论的教义挑战而引起的神学上的紧张关系的影响，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下降，并且暂时退而只依靠它的以前的支持者，即城市中产阶级。农村里的教会仍继续进行它的固定的工作，这种工作常以该地区部分牧师的居留和个人行为如何而定。在城镇里，教会也和不信国教者一样，经常向文明的中产阶级的宗教集会求助，中产阶级可以为贫穷城镇的生活条件提供援助，并修缮或重建教堂。

使穷人能在另一个世界补偿他们在这一世界所受的苦难，这一任务就落到教会的叛逆者卫理公会的肩上。韦斯利的卫理公会教派的许多方面和社会关系致使它难以普及它的重要性。约翰·韦斯利本人是牛津的一位具有高教会观点和保守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人员。但是从他所受到的许多影响中可以看到17世纪清教的精神。他自己的思想经历是骚动不宁的，明显表露出十分轻率和任性。但是他的信徒受到的组织和纪律约束近乎是专制的。从神学上看，韦斯利属于阿米纽斯派，但是加尔文主义对卫理公会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韦斯利在加尔文派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正如格里菲斯·琼斯和豪厄尔·哈里斯在威尔士、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英格兰处于领先地位一样。所有这些人对他们的敌人来说都是危险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他们的室外传教活动可以说就是对教区牧师垄断教坛的一种公开攻击，这从世俗当权者的角度来看，韦斯利无所顾忌地对所有阶层的人进行布道，会使各地的乡绅们感到震惊。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却是极端的独裁主义，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并未提出异议。从他和他的信徒的态度来看，他们所关心的只有一点，即为了拯救全人类，首先是为了穷人、为了那些被赶时髦的牧师忽视的英格兰煤矿业和手工业的无家可归的人们。他的成就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在他去世时，信奉卫理公会的人顶多不

386

会超过七八万人。他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及旅程所引起的惊慌和争论，表明他对乔治时代的社会影响甚为广泛。卫理公会被指控为罪恶的渊薮。他们的传教者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清教徒，既有詹姆斯党人，也有共和主义者；他们强使或诱逼他们的妻子放弃所有的肉体享乐，他们贪求别人们的财物并禁止人们使用世俗的财产。卫理公会遭到了如此多的攻击，明显地说明韦斯利击中了现代思想意识的痛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信仰形式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缺陷。

中部英格兰的形成 387

卫理公会教派运动的早期历史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它确实是充满了社会紧张气氛和问题。不过这也许是对一般的情况作了过分的渲染。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走向过分的极端。使外国人感到吃惊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性和内聚力，而不是它的严酷和刻板。不少法国来访者，从伏尔泰到修道院院长格罗斯利神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指出英国不存在"等级"，尤其是个人可以轻易地沿着社会阶梯自由上下移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贵族没有特权和特殊利益，这一点尤其受到他们的称赞。在英国，贵族可由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当他们走上绞架时，他们像普通犯人一样公开受刑。1760年费勒斯勋爵因谋杀他的仆人被处决时，他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在罪行和死刑方面英国的法律都是一视同仁的。格罗斯利在一件不太重要但意义深长的事情上惊奇地发现，所有阶层的人在新建的大路上都必须交纳通行税，即使贵族也不例外。再说，英国的威胁城市贫民生活的穷苦和饥 388 饿等情况，远比法国和德国农民要好得多。英国的劳动者（虽然通常评论家们是指伦敦的劳动者），看上去似乎收入充裕、丰衣足食，而且特别富有独立精神和能说会道。尤其重要的也许是那种被外国人所强调的英国绅士定义的很大的伸缩性。任何人只要穿着像

个绅士就被当作绅士。伦敦的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的人都仿效文明社会的风度、礼仪和观点。这就是那个其社会价值、社会差别和习俗完全由金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支配的社会的真正标志。在18世纪的欧洲，英国是富豪统治社会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这种富豪统治的性质，是这段时期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表面上并看不出有产者的基本成分在起着戏剧性的变化。没有出现资产阶级的资本渗透进农村的狂涛巨浪，也没有发生土地贵族或乡绅大量抢占土地的现象。小规模的专业人员家族和商业家族的逐渐同化，改变了地主阶级的成份，但并未明显影响它的整个性质。从上层来看，18世纪的大地主有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发展。不过土地只是财产的形式之一，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形式。甚至在18世纪之初，土地的首要作用也逐渐减弱。根据对光荣革命时期国民收入的估计，在总收入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农业。但这个比例逐渐在变化，到1780年大约下降为1/3。实际上，土地本身仅是英国经济商业化的一部分。对土地进行的开发和改良逐渐地就像对股票、贸易和手工业工场进行投资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上暂时的衰退对贸易影响不大，而反过来则不然，商业的衰落对土地的价格是休戚相关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海外贸易大为衰退，它的影响立刻反映在地产的价格和政治的严重后果上。如果地主阶级拥有大量非土地的产业，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某些方面，如拥有采矿权或政府的股票等的重要性。以工业资本和个人财富形式出现的流动商品和贸易平衡，绝大部分都掌握在中产阶级广大群众手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增长主要依靠这些人。社会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也依靠这些人，这一点深为外国人所钦羡。

中产阶级或“中等人士”当然不是一个自觉组成或具有内聚力的社会团体。从其财富和活动的情况来看，它仍是形形色色、各种

各样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垄断着资本、拥有巨大 391 商业财富的城市大老板，到代表商业化英国的支柱的小商人和手工艺者——新的“店主的国家”，通常人们认为这词是18世纪末拿破仑首先使用的，更早的时候亚当·斯密就采用过了。在中产阶级的农民，即不久就可能获得绅士农民美称的有钱的佃农，和他们城市的伙伴，即在早期工业社会发迹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之间不一定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共同之处。他们自力更生并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就他们在所经营的无论是商业的或专业性的企业活动上所投入的劳动和利润来看，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拥有、控制或者操纵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政治上，他们在大小城镇都占绝对优势，甚至在许多农村教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傲慢的巨头相比，他们俨然以统治阶级自居，虽然这些寡头们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似乎显赫一时。

这个阶级的主宰一切的腔调、它的务实态度以及坦率的生意经到处可见。它对教育的明显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18世纪的声誉颇为不佳。对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时期学术界的主要机构，如文法学校和大学进行调查的结果说明，这方面 392 确是不如人意。文法学校很少尽力完成它对穷困的孩子进行学校教育的使命。所捐赠的捐款往往不够支付开销，同时主管者经常营私舞弊。在校任教的牧师总是尽力而为，但往往不能克服由于工资低、供应差带来的不利的因素。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以自满和懒散的印象，其与苏格兰的大学相比更是如此。在北部地区，学术生活充满了宗教斗争和顽固偏执之风，但也显露出巨大的活力。苏格兰启蒙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苏格兰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对欧洲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这方面，英格兰的大学大大落后了。它们只是在训练牧师和对绅士及有钱阶级实行广泛的教育上发挥了作用。它们在这些方面表现

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牛津的赫特福德之类新创立学院呈现出的训练有素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以及剑桥在数学上取得的真正的进步，丝毫不能证实罗兰森① 的作品和反教权的宣传品留给人的印象。即使如此，他们也还是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

但事实往往出乎他们预料。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数量不多，中产阶级以他们平时的捐赠款项建立了大量实用的、进步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适应中等阶层的子弟到各种职业和商业部门任职而设立的。但是这些学校寿命不长，在它们消失后未留下什么痕迹，对苛求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他们轻易认为这些学校根本没有存在过。甚至18世纪最大的学校，其中包括北安普顿和沃林顿的不信国教的学院中最好的学校，也未能维持很长时间，但当它们开办的时候却为商业阶层提供了他们所必需的基本的、踏踏实实的教育。

这样形成了一个特别重视实效的中产阶级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英国有过启蒙运动的话，那就是实用思想上的启蒙。18世纪引人注目的既不是神学上的论争，也不是哲学上的探索，而是应用技术。1758年成立的技术学会正是这种精神恰当的反映。在它成立初期，最有争议的方案也许是如何将鱼从海岸由陆路运到伦敦的计划，这样就打破了泰晤士河鱼贩子的垄断，从而降低了一种珍贵的、富有营养价值商品的价格（这是人们所特别强调的）。无疑这听起来好像是奇谈怪论，但其目的完全是实际的。技术学会是个大的全国性的组织，但它不过是许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长期的或短暂的俱乐部或协会中最为著名的组织之一而已。这种对科学的兴趣在各郡至少像在大城市一样，都是非常高的。同样，利奇菲尔德集团同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和卢纳协会的联合组织只不

① 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756—1827)，讽刺画家，从1781年起，不断创作讽刺画，讽刺英国的政治社会特别是伦敦法律界的一些现象。——译者

过是许多严肃的业余团体中的最著名的而已。在这些团体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文学潮流也表现出对科学兴趣增长的迹象。甚至原来以娱乐为宗旨的月刊也以反映这一对物质世界进行深入探索时代的无数发明和预测为特征。

中产阶级进行工作和学习，也需要消遣和娱乐。18 世纪是以上流寡头社会进行娱乐消遣而著称的一个世纪。这首先在大的温泉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巴斯这个代表乔治时代的著名城市，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经常光顾就会有名无实。作为开拓者的伍德父子和作为创建温泉的第一主人的“花花公子”纳什的事业，不仅仅依靠那些大人物的名声，而且也需要中产阶级的钱财。对据报导到温泉沐浴或参加那里的聚会的所有贵族来说，为了分享那里的融融乐乐气氛，必须有人分担这里的花费。在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正是中等阶层对比他们地位高的阶层的时尚和习惯的忠诚维系了闲暇和奢侈的商业活力，同时维护了占统治地位的贵族上层人物的尊严。巴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唯一的。温泉娱乐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国性的现象，在地方上也有不少更为著名的温泉娱乐场所。丹尼尔·笛福在 18 世纪 20 年代初周游英国时发现了许多有温泉的城镇，并惊奇地指出坦布里奇是一个“公司和娱乐为该地主要行业”的城镇。但是坦布里奇在首都周围还有几个竞争对手，如埃普瑟姆、达尔威奇和锡德纳姆威尔斯等。这些地方都是给伦敦人带来新鲜空气和矿物盐的优美旅游胜地。皮克区已成为现代旅游者先驱所喜爱的地方，笛福发现到那里来旅游的人的要求超过了巴克斯顿和马特洛克所能提供的食宿条件。尤其是巴克斯顿在 18 世纪中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尽管到 18 世纪 80 年代在它和自己的对手坦布里奇争夺仅次于巴斯的第二位时受到另一个新兴起的切尔腾纳姆的威胁。

温泉水的供应当然是有限的，但另一个宝贵的商品，海水，是

395

极为充足的。因此在海边，正像在温泉一样，根据医学理论可以将保健和娱乐有机地结合起来。医学证明海水与海上的空气对人体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布赖顿直到18世纪90年代之前还没有任何发展。但是海滨娱乐场早在这以前就已开始发展起来了。罗素医生在1749年出版的《论海水在治疗腺病中的作用》一书对推动这方面的进展起了很大的影响。韦茅斯这个充分利用英吉利海峡海水中矿物质成份的地方，在1780年已是一处兴旺的娱乐场所。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两地因为从伦敦前来交通方便，更早建起了娱乐场所，而且备有更高级的和多种多样的设施。约克郡海滨的斯卡伯勒也有所发展。在这些进展中医疗起了主要的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基本推动力量。上流社会所实行的一年中的礼仪和宫廷所规定的日常时间表，与下层社会的不为人重视的节日和假日，有着相当大的鸿沟，这个鸿沟由新的获利甚丰的娱乐场所极为成功弥补起来了。同贵族隐居到乡村那样，这些娱乐场所主要是居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暂时迁往的地方。它们兴起的潜在基础是中产阶级普遍感到需要带有娱乐活动。他们用捐献和捐款的方式以获得尊贵的朋友和既文明又富有的环境。尤其对于新的富裕阶层中显然得益的妇女来说，这种灵活但有防范性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早在这些娱乐场所出现以前，笛福就全面阐述过了它的特色，称之为"新型的以集会进行交际的方式"。集会包括跳舞、打牌、喝茶以及一般的社交活动，这在18世纪中期已很普遍。甚至在许多城镇市场的集会上，人们既进行买卖交易也进行婚姻介绍，而且无拘无束，互相聊天闲谈。在那些最大的城市里，有一些市民们引以为荣的豪华排场。18世纪50年代在诺里奇由当地的建筑师汤姆斯·艾沃里设计建成的戏院和议会厅，其构思之独特，令人赞叹。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一所华丽的、新式的非国教的教堂，这也可以说明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几乎每

396

天花钱参加娱乐集会的人在星期日也前往教堂。

硬把一个复杂时代的文化发展归纳为一个单一的模式似乎有些考虑不周。不过乔治时代中期文艺的主调无疑是与人数众多、富裕而妄自尊大的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连的。没有简单的从庄严的贵族古典主义向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后退。古典主义的传统正像文艺复兴以来数世纪中一直被采用一样，现在仍然被采用。但是到处可见的亚当的火炉和韦奇伍德的陶器明显地带有新的、甚至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文艺的胜利曾是上流社会优秀阶层的胜利，主要是为优秀人物的消费而服务的。18世纪早期艺术的特点在于它的体系、结构和形式，而理解它的关键是它的古典的深奥含意。蒲柏的贺拉斯式的讽刺、布林顿的帕拉第奥型的建筑设计以及如威廉·肯特等古典主义者所喜爱的仍然具有形式主义的园林风光都属同一类型。但是20年以后，中产阶级的实用教育所教育出来的人可能很少人能理解讽刺文章语言的微妙之处，更无人能懂得它并把它与威尼斯的文艺复兴相比。但是18世纪中期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与此相反，它既不深奥又不细微，由威廉·申斯通所传播的绚丽多彩的园林学和由“才干·布朗”[1]开创的更为时兴的“自然”风光与18世纪初期热衷于仿效古典主义的情况相距甚远。这种现象也明显地表示在文学的新发展上。小说中无论是流浪汉式的或清教徒式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本质都不再着力加以渲染。不过有时，如在理查森《帕米拉》和《克拉丽莎》对放荡贵族的带有偏见的描写中，这种渲染仍颇为突出。而在别的情况下，如斯摩莱特和菲尔丁的冒险小说中则采用了对下层或中等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表示关怀的形式。无论如何，这些倾向结合在一起，在18世纪60年代产生了他们崇尚感情的最有特色的表现形式。

---

① 布朗(Lancelot Brown)，18世纪中叶园艺师和建筑师，自然景色园林设计的主要代表者，绰号“才干·布朗”(Capability Brown)。——译者

如劳伦斯·斯特恩的《特里斯川·香迪》闯进了宏伟的宅邸和客厅，求助于豪富与商人。但是不应使普遍高涨的感伤主义运动掩盖了它作为表达中产阶级价值与观点的工具的意义。感情使商业化英国的富人们日渐把他们带到现实中来的那些东西升华为幻想，使一个消费者社会能获得高雅的风度，感情能形成“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是高尚的人们，无论其出身和教育如何，都具有的，使它成为衡量高贵与否的真正标准。感情也能促进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使其强调家庭生活并忠诚于加尔文主义的道德观念，而不去重视英勇的、但带有等级观念的个人荣誉。1760年乔治二世死后，新的国王和王后成为这种理想的象征，他们使宫廷社会具有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也真实地反映了许多臣民的道德观念。中产阶级最初仅只是模仿社会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至少从理论上看，无需去模仿他们了。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① 无需培养什么礼貌，而且“感情之人”② ——正如以此命名的麦肯齐甚有影响的书中的主角一样，实际上并不属于哪个阶级的。

假如说中产阶级的文化是感伤的，那么它的另一特征则是一定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只有当艺术家急于表达他们对外部影响的坦荡胸怀时才有所缓和。但是这一思想潮流的创立者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这位新国王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著名的英国艺术大师，一味追求大陆风格，结果发现自己转到了一种庸俗的但有发展前途的欧洲艺术传统上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体现了国内的很多新潮流。因为雷诺兹和他的同行海曼和盖恩斯伯勒一样，需要依靠新发财致富的公众，正像他们需要依赖贵族的恩主一样。另外，他的影响也明确地反映了该

① 《美好的新世界》，作家阿·赫胥黎所写长篇小说书名。书中描写了一个讽刺性的乌托邦。——译者

② 《感情之人》，亨利·麦肯齐所写小说书名，它以结构松散的一系列速写描述了一个风度优雅的主人公。——译者

时期民族的活力和职业化的特征。1768 年皇家学会的出现，说明它作为代表性的协会，已达到与正涌现出来的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团体相当的水平。另一方面，它使富有活力的本国艺术进入高峰，这种艺术正是霍格思曾经预言过但从未实现过的。不过，在文化发展的这一或那一领域中，外国影响并非不重要。安杰利卡·考夫曼是美化伦敦的最积极的探索者，而约翰·佐法尼是描绘伦敦风光的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但是谁也未能起到本世纪初外国人所起的作用。这时在豪华的装璜艺术上，无人能与维列奥相比，在音乐方面无人能与亨德尔的崇高地位相比，在雕刻方面，无人能与李斯布莱克或卢贝利维克相比，有的只是像亚当斯这样的人来装饰英国人的房屋，像伯尼或博伊斯这样的人来陶冶他们的听觉，以及威尔逊这样的人来为他的丧事树立纪念物。

大概没有其他地方比在画家自身身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新的文化自信心了。在霍格思自觉地努力为创立一种真正的本国传统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孤立地位。对他的英国学派的继承者来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盗用大陆技巧时那种并无低人一等或依附于人的心安理得态度。在这方面，德比的约瑟夫·赖特，这位并不是最受人推崇、但很富有革新精神的 18 世纪中期的艺术家，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他是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的朋友和查尔斯的祖父，他本人是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甚至还是位诗人。赖特擅长对部分用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发明的研究。但同时他也是熟练地掌握光的用途的人，在这方面他不亚于卡拉瓦焦。正如许多人一样，赖特也去了意大利，但他是在他的主要杰作已问世之后而不是在这以前去的；当他回国时，他似乎失掉许多灵感而不是得到许多。

抗议政治

乔治统治中期英格兰所发生的社会改革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未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当时传统和习俗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它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如何还难以估计。从表面上看，该世纪中期的政治性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诺思(1770—1782)和小皮特(1783—1801)执政时期，在政治技巧和政策两方面都可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没有；19世纪威胁着旧制度的骚动和改革的浪潮，似乎令人想起一个骇人的时刻即将到来。但是这种表面现象完全是不可靠的。所有的政治调查、政治目的甚至政治结构，完全由一个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所无法直接影响的强大政治潜力所控制。仅从这场发生在18世纪50和60年代的报纸、书刊和小册子上的大论战来看，其范围和激烈程度也足以证明公众争辩的生气蓬勃气氛和政治家们对参加论争的热烈心情。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位政治家处于特殊的地位。这就是老皮特。老皮特这位有影响人物的声望，甚至在200年后，也难以给其以应得的评价。在1750年以前，皮特的事业远未取得完全成功。这位生活在挥霍无度和怪僻家庭的幼子，最后终于和斯托的坦普尔这个辉格大家族联姻。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已获得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家的政治声誉。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迸发出来的反汉诺威的激情，使他声名远扬。但是公众几乎永远把他看成是国王的“不受欢迎的人”。在1746年，佩勒姆授与他职务，其条件虽暂时有利，却无前途可言。作为财政部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决定重要政策之外，而且在议会辩论中被迫保持缄默。这似乎是一个爱国者牺牲原则以达到晋升目的的另一个事例。但是皮特的命运由于18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1754年亨利·佩勒姆的突然死亡似乎成了当时形势的分水岭；这也表现在国王对这件事意义的看

法上："现在我再也得不到安宁了！"佩勒姆的继承者是他的弟弟纽卡斯尔，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大臣，完全不是辉格党传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可笑的平庸之材。但是他在上议院感到很难施展他哥哥或沃波尔的能左右局势的影响。皮特的主要对手是下议院的亨利·福克斯，此人缺少取代佩勒姆的政治勇气和力量。辉格的"老部队"这个在汉诺威继位后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此时几乎无人领导。而他们的劲敌托利党却由于不断受到排挤而越来越顽强，并且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情况下不愿对国王唯命是从，他们也在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皮特能否满足双方的要求呢？

皮特之所以能这样行事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使然，尤其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是在直接影响到有关未来的几个主要问题尚未着手解决时发生的。海外斗争的主要焦点已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问题，而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重商时代最为成功的重商主义强国之间世界范围的冲突。在北美，法国想在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之间筑一条防线，切断英国的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两国为了有争议的产糖岛屿而争吵不休。与此同时，在西非则为了奴隶和橡胶贸易而争吵。在印度，当地王公的宗派斗争和软弱无力，与法、英的东印度公司的贪得无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爆炸性的局势。每件事都可能导致一场对英国来说是殊死的、决定性的战争。当这场战争爆发时，它对英国和皮特的政治对手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1755 至 1756 年，英国在大西洋未能给予法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同时在地中海丢失了梅诺卡岛，加上海军上将宾所遭到的残酷对待等事件，使老辉格政权声誉扫地，即便说还未彻底垮台。这样就造就了皮特的兴起，而且也许是造就了第一不列颠帝国的形成。 404

往后的年代是历史上极为重要并取得空前成绩的时代。七年战争赢得了胜利，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败了法国军队，消除了波旁

王朝在各处的威胁，这标志着帝国的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皮特成为英国历史上取得最光辉胜利的战时大臣。而且，他所取得的打垮这些“老部队”政治家的胜利似乎表明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家和新型的政治，正如约翰逊博士在简要概括沃波尔和皮特的不同之处时所说：前者是“国王给予人民的大臣”，而后者是“人民给予国王的大臣”。但是皮特的官运亨通更多地是由于他精明的政治计谋、十足的好运而不是受到了公众的爱戴。他所得到的虚假的群众支持都是他在伦敦城区的朋友们和在地方上新发现的托利党同事们所煽动起来的。他的第一次当权，即1756—1757年的皮特—德文希尔内阁软弱无能，寿命不长；第二次，即1757年在联合内阁的任职，则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方面是由于和纽卡斯401 尔的交易，另一方面是由于得到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这种复旧的利益集团和“老部队”的结合是玩世不恭政治手腕的产物。这件事和沃波尔在1720年和乔治亲王（后来的乔治二世）以欺压和献媚的手段达到回到朝廷的目的是一样的。

皮特的崇拜者所编造的关于战争的完美无瑕的记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皮特所奉行的基本策略与他以前曾拥护过的爱国纲领完全背道而驰。他执行着代价很大的与普鲁士联合的政策，同时他慷慨地使用英国的金钱和人力资源以维持在德意志的一支军队，这些行动自然都是追随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战略。皮特本人对战争的独特贡献，即采用联合行动进攻法国的海岸，以转移法国在德意志战争中的注意力，从而竭力向他的托利朋友们证明他的爱国热忱，但这一努力逐渐因他的“汉诺威”政策而黯然失色。从军事上来讲，对法国海岸的联合行动是消耗巨大而且是徒劳的；当战争最后胜利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皮特未能控制的力量。总的来说，法国因未能为在海上和殖民地的战斗准备充足的资源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优越条

件是有限的，但却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是克莱武的才能使得东印度公司的权力更为增加。皮特把克莱武形容为“天生的”将军，就是委婉地承认任命克莱武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甚至连沃尔夫这一在英勇袭击魁北克的战役中得到全国赞誉的人，也不过是在北美战场上许多将军中的最后一位，他们都未能在北美取得全面的 402 胜利。但是胜利毕竟解决了战争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至少在和平协议必须签订之前是如此。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战争都发生转折的1759年这个“惊异之年”之前，皮特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联盟濒临分裂。皮特的托利支持者们经常散布说他们要免去这位大臣，因为他实施的政策经常使他们惊恐不安，同时他的盟友纽卡斯尔则不断威胁说要限制他的这个同伙的行动，因他挥霍了大量的金钱而取得的却是惨重的失败。到1759年，这些棘手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七年战争的胜利不应完全归功于皮特，但他在两个重要方面获得历史上的声誉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如果说皮特在群众中的威信是被夸大了的话，那么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性质上所起的作用却是重大的。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形势呈现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对托利党的排斥以及辉格党集团把官职任命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的能力，前景很暗淡。但是皮特至少希望和旧的政治决裂，尤其在大城市中，他的联系深入到真正中下层民众的选民中。同样，作为一个战争领导人，他具有极为重要的、当时无人可与之比拟的本领，没有这种本领战争不可能继续下去，更不用说取得最后的胜利了。政治勇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自信，这种自信有时难与轻率的傲慢相分辨，使更多干练的、谨慎的人获得从事战斗并赢得一次光辉胜利的道德基础。皮特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这是他在战争重要时刻能够指挥若定的主要因素，在这些时候，老辉格党集团，如纽卡斯尔和福克斯，明显地表现出六神无主。

如果政治的桂冠最终应属于那些对一切敢于冒险的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皮特是当之无愧的。

不论对皮特取得的成就应如何评价，他在这些年代里所进行的有争议的行动形成了不久就接踵而来的戏剧的序曲。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转变将永远和新的国王乔治三世以及他的最激烈的臣民之一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对于国王来说，这些日子是他受到最大创伤的日子。但是乔治三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不过是他祖父执政时期一些事件最后所必然导致的逻辑决策。这尤其表现在他要消灭旧的党派的差别这一似乎是革命的决心上。这种差别实际上已经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在谋求托利党的帮助上取得成功而减弱了。1760年时，这种区别已仅仅是口头上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带着一种勉强容忍的实质上的差别，因为这种实质上的差别已为心照不宣的乐意于使新的王朝去同老的托利党相接近。在朝廷里，托利党的回来受到热烈的欢迎，并适当地给了他们以职务、荣誉和爵位。在各个郡内，他们回到了前十年未能回到的地方，进入治安陪审团。中部各郡内的治安陪审团又一次成为类似乡绅阶级的聚集地，其中许多人是老托利党员，有的甚至是老保王党。令人敬畏的托利党获得了显赫的地位。约翰逊博士这一当代的大文豪，受到新政权政治上的恩泽，在1762年获得布特勋爵的资助金。但是他被新政权所器重实带有某种讽刺意味。18世纪30年代时约翰逊曾写过一篇辛辣的爱国主义的文章攻击沃波尔在对待加勒比海问题上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加勒比海的野心。现在，在新国王的政权下，他又以同样有力和更加咄咄逼人的笔调写文章为乔治三世在英国要求占领福克兰群岛[①]问题时对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而辩护。他把该岛描绘成"一个冬天多风、夏日荒芜、无益于人类的荒凉而阴森的孤岛。"

403

① 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

在英国外交政策历史上，福克兰群岛问题并未就此了结。约翰逊作为个人的重要作用，在牛津大学的历史上甚至受到更大推崇。因为辉格党的牧师一代代地垄断着官职和财源，在46年的时间里，感伤的詹姆斯党人的家庭和教会在政治上都受到冷落，汉诺威时的英国基督教教士一般都在剑桥和牛津的少数辉格党的学院里受过训练，在新王统治之下，大学无疑都感到精神上自由舒畅。颇为奇怪的是，牛津甚至对早期汉诺威政府所作的贡献也大于一位首相。但是佩勒姆很少试图阻止他弟弟把宗教的恩惠施予剑桥，而皮特则曾一度低声下气地从他自己学校中的詹姆斯党人团体中捞取好处。在乔治三世统治下，牛津有一位诺思勋爵当了首相，他又是该校的名誉校长，同时是具有保王情绪的各郡旧托利家族的代表人物。

假如托利党重新在朝廷执政不足为奇的话，乔治三世采取的另一些新的措施就更不奇怪了。新的政权开始显露出它朦胧的良好愿望和崇高的理想。任何认为这位新的"爱国国王"会加强王权的看法都很快地不攻自破。君主死亡法明确规定，法官在君主死亡时无需像过去那样解职，这样就打消了以为国王要运用他的合法权利取消辉格党的司法机构的疑虑。同时，年俸法规定，王室每年的津贴必须严格控制在80万镑之内；乔治二世的年俸也同样如此，但附加了重要一条规定：如王室费用有剩余，那么余额将归国库，而不是归王室所用。由于通货膨胀，这条规定严重地妨碍了王室应付朝廷费用不断增加的情况，同时也讽刺性地表明，国王为了表示爱国之心，而作出了最具有毁灭性的让步。这是在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领导下的兰开斯特家族一派人的真正传统——并不是由于意图建立一个新的、施行仁政的专制政体，而是进一步对王室特权加以限制。

但是上述问题与新政权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和平问题

相比，不过是区区小事。皮特和纽卡斯尔两人都已退职。前者因404为乔治三世和布特拒绝把战争扩大到西班牙、而他却坚持要这样作，而在1761年去职，后者则主要由于反对次年所签订的和平条款。但是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论点，现在看来并无多大份量。如果不把在战争中所获得的一些东西交还给波旁王朝，和平是不可能取得的。把法属西印度群岛交还法国和保留法国在加拿大水域的捕鱼权并非过分的让步，即使皮特和纽卡斯尔，在1762年的外交环境下也是无可奈何的，除非把战争进行到痛苦的结束。另外近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功致使财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在1761年引起普遍的惊恐。在报刊、小册子上经常出现反对进一步进行战争的文章，其中由伊斯雷尔·莫德特写的《对德意志战争的思索》是很有力的一篇，战争到头来仍将以破产而告终。再说战争的目的——继续对弗里德里希大王给予支持以及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乔治三世和布特可能多少有点认为，战争即使是光荣的，对他们个人也没有利，同时由于需要尽快地取得和平，这种和平与其说是他们的需要，不如说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在他们与西班牙达成协议的条款上更是如此，因而他们倾向于和平。但是他们的和平从本质上讲是谨慎的防御的措施，而且获得议会和民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政权为何显得如此有争议呢？这也许主要是因为新来的人在进行活动时要么就是心不在焉，要么就是带有个人对旧政权的怨恨情绪，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困难。乔治三世所挑选的进行改革的人，是他过去的导师布特勋爵，这是一位具有知识阶层性格的苏格兰贵族，他的经验和技能并不丰富。他对年轻国王的工作所给予的教导，往往是幼稚无知多于老奸巨滑。这时没有发生过反对自由和宪法的重大阴谋，也没有任何推行新的独裁制度的决定。然而毫无疑问，就新的国王和他的大臣而言，他

们无疑对这位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就独掌权力的人，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而且，即使不是下决心，也是准备去遣散他们，甚至使他们难堪。这位"黑心"的皮特，他被认为在1757年背叛了亲王的宫廷，人们对他公开表示愤恨。现在，很难想象皮特和布特在新的环境下如何能彼此合作。皮特是妄自尊大的人，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和他长期共处。至于辉格派的大多数人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继承下来的重要地位，都会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他们对新国王采取了一种屈尊俯就的手段，例如卡文迪什家族常认为自己是拥立国王即位的人，对他们来说汉诺威选侯充其量是同等人中地位最高者。纽卡斯尔在终身在朝廷服务以后，也许是因为指望他的建议能被这位学究式的、无能的但以体态匀称、奖励植物学家著称的苏格兰贵族所采纳而获得宽恕。总之，为了谨慎地前进，可以列举不少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保证顺利地从老政策过渡到新政策。这已不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438 辉格的"老部队"深知布特所要求的主要内容必须予以同意。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他们缺乏自己的杰出领袖的环境下，仍愿意在改变了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其中典型的人物是诺思勋爵，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表兄弟，又是未来的首相，在新政权中是乔治三世朝廷的一位消极的依附者。甚至那些年长者，虽然认识到自己是新政权的牺牲品，但不愿对它公开表示反对。哈德威克是辉格派的老资格的律师和佩勒姆政权时的主要台柱之一，现在只能够为他的朋友寻求一个体面的职务，并为他的家庭请求继续在宫中有个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布特和乔治三世把纽卡斯尔及其朋友仍赶走实为愚蠢至极。当他们这样做并坚持在1762年春签订和平条款时，他们就树立了在近代英国政治上最持久的仇敌之一。

假如新计划得以实施，摒弃旧的政治机构付出代价也许还是值得的。但是布特自己由于受到强大敌人的围攻仅任职一年，就

抱着从议院后席或者宁可说是(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以秘密的方式来指导各项事业的崇高意图而辞职了。因此他除做了使老辉格集团更加敌对的蠢事以外,还给了他们以耍阴谋和权势的借口,加强和煽起他们的反抗情绪。这种反抗情绪和布特的模棱两可的做法形成以后20多年时间的政治模式。18世纪60年代一个短时期内,大臣职位像恶梦似地不断更换,因为乔治三世要寻求一个既能适合于内室中的秘密计议,又能驾驭议会的人选。在这个过程中,辉格党本身在罗金厄姆勋爵、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的领导下,也在经受着考验,并感到力量不足,直到1770年才出现了像诺思勋爵这样能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贯穿这些年曲折复杂的政治派别冲突始终的一直是布特前后矛盾而破坏性地玩弄权势所造成的有害的遗产、对辉格集团的猜疑以及关于存在着一种不正当的秘密势力的传说。当埃德蒙·伯克对这一时期的政治进行全面而经典性的分析,出版了他的《对当前不满的反思》(1720年)时,正是上述的影响使他对新的朝廷及它的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攻击。《反思》一文作为辉格党权威性的著作载入史册,对后代的人来说,也是关于乔治三世劣迹的权威性的记载。

在18世纪60年代,还有另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战争的胜利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明显地表现在兴办企业时代在经济报酬上的分配不均。这段时期是以一系列激烈的工业争吵为标记的,这些争吵引起了一些大城市,如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的广泛的骚乱,并可能波及到政治而引起动荡。即便在农村,这些年收成也不好,物价上涨并出现了严重的歉收。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被称为“可爱的流氓”,这称呼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创造性。环境和机会主义造就了威尔克斯。若在10年前,他的不满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威尔克斯在报刊上的文章,使得乔治三世

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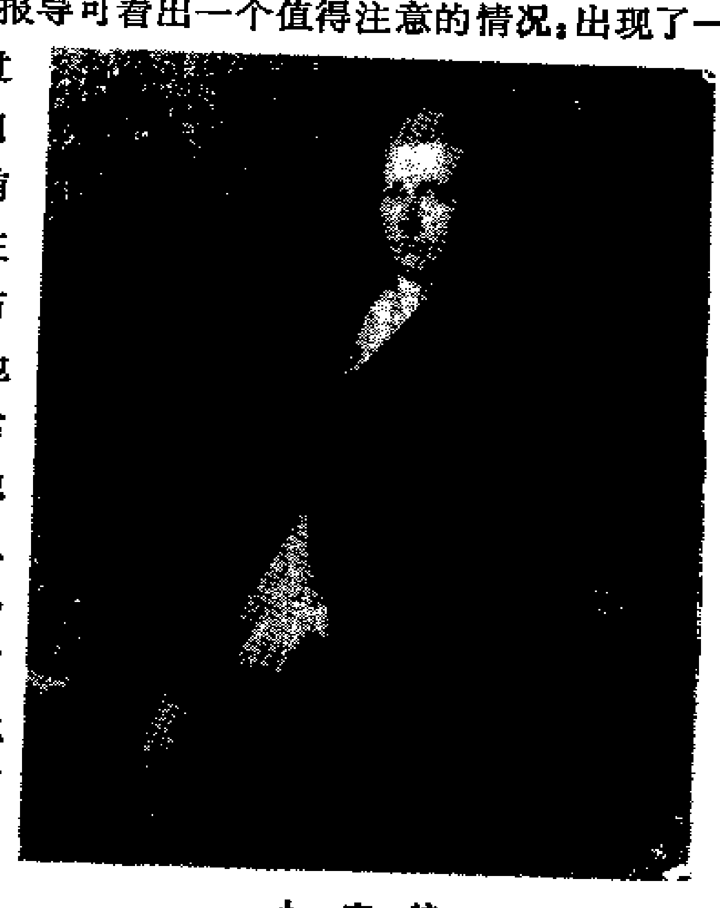
的大臣颁布了一种通用拘留证，持有此证可以对政治犯任意加以逮捕，这一举动使得群情哗然，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也就成了汉诺威政府统治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皮特和纽卡斯尔在当政时都采用了这些措施。不过当时它们是以存在拥护詹姆斯党人复辟的威胁为正当理由的，是被用来反对受排斥的托利党人而不是用来反对爱吵闹的辉格党人的。与此类似，1768 年，威尔克斯作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议会代表被开除出下议院，但他的除名在当时确有前例并符合法律的规定。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事件使这一有名的郡同首都狂热政治卷在一起。该郡选民不能被视作为衰败选区的一小撮选民。三年之后，当威尔克斯和他的伙伴们抨击下议院禁止公开报导议会争论内容的权利时，实际上是在攻击立法机关中一项古老的、谨慎地加以防范的特权。但在新的情况下仍维护这种特权是完全行不通的。威尔克斯派的极端分子是典型的小企业主、手艺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代表着“中下阶层”中最为集中、最能表达自己的看法、能力最强的那些人。一旦他们对国家表示不满，他们不仅会从地方上那些对选举权担忧的绅士们，而且在全国上上下下城镇的同行中都能得到支持。中产阶级仅作为他们运动中的最重要的力量，没有统一的政治，抗议也并不是他们所乐意采取的主要的政治手段。但是他们参加了威尔克斯的运动，这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政权的政治中独特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只不过是他们所起作用的一部分。在汉诺威王朝早期，决定着政治运动的法则已不适用，不论以前它们所起的作用如何。以前认为它们是有益的，现在可以把它们轻易地抛弃。老辉格党人本来准备采用一切手段报复乔治三世，因此尽可能地使这种反对朝廷的新的民众精神合法化。但是如果没有与统治阶级中地位显赫的人物进行这种合作，单靠民众动乱和威尔克斯相联合很可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

反叛与改革

新政权的初期总是以多采多姿的政治形式引人瞩目。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时期最惊人的变化是英国在海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七年战争所必然带来的对帝国威力的认识。英国在北美建立的霸权更令人欢欣鼓舞。帝国的文官和大臣们在18世纪60年代初期曾雄心勃勃地规划着新的侵占大西洋彼岸殖民地的美好前景。魁北克是盛产鱼类和皮毛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因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拓殖地而增加了力量，为不列颠的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可靠的市场，并源源不断地供应必需的原料，甚至可为国库收入增加新的财源，这对负债累累的宗主国来说前景确实是诱人。有效的得到管辖的重商主义制度在西印度群岛已牢固地建立了，使日益繁荣的奴隶贸易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热带产物，同时为使贸易打入西班牙帝国奠定了有价值的基地。在东方，出现了更富于冒险的、更激动人心的情景。自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中取得胜利后，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已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出现。虽然从表面上看，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没有占领土地，但实际上从这时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殖民化的过程中去。在这方面，当1765年克莱武代表公司正式接受孟加拉的"底瓦尼"(diwani)(土地税收)时，实际上这已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而不仅是商业活动了。这件事与普拉西战役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从逻辑上来看，它是后者的结果。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对印度的看法。新占领地的神奇特色和对它的以前未被认识的文化的发现，给予新帝国的影响特别强烈。这种影响最早表现在弗兰西斯·海曼所作的关于克莱武接受当地王公进贡的巨大画像上，该画像于1765年悬挂在拉奈莱①的高雅的英雄画廊内。亚洲的

① 拉奈莱(Ranelagh)，伦敦切尔西区泰晤士河畔的旅游胜地。——译者

珍品大量地输入，从而第一次出现了对印度社会的莫大兴趣。在东方其它方面的新收获则不如印度多，也不甚引人注目。在1768年的普选中，从报纸的报导可看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了一批在东印度公司工作过回国的选民，他们用自己据说是不义之财来贿买议会的席位。这些“在印度发了大财的纳波布(nabobs)”回国了，他们的影响正如他们的劣迹和罪行一样，无疑地是被夸大了。从实质上看，他们和西印度群岛种殖园主、“土耳其商人”、“财主”，以及其他一些因牟取不义之财而引起古板的家族仇恨的人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小 皮 特

但是他们的出现无疑是一件极为新奇、并令人关注的事。克莱武本人就是这种贪婪的“纳波布”的化身；当他在东印度公司服务时他以残酷的、无耻的手段聚敛私人财富。这似乎是那把帝国当作获取大量的罪恶财富手段的那个阶级的特征。但这种诱惑似 410 乎并不仅限于印度。随着“底瓦尼”而出现的对东印度股票狂热的投机，公司财政上不断出现危机，政府对东印度公司活动的兴趣日益增长，凡此种种，都使东印度政治的复杂性和它的日益腐败的特色令人厌恶地暴露了出来。

在美洲没有“纳波布”，但是由于美洲广大版图的占领和扩展

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超过在东方扩张所带来的问题，由这些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支节问题更多。不列颠的大臣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大西洋彼岸属地的潜在价值，但他们对十三个殖民地在它们受到伦敦干涉时要求独立的观念的强烈程度并未理解，也未认识到这些位于远方的、富有的、智慧的250万人阻碍和反抗帝国主义强国的能量有多大。其结果是，从1765年印花税法颁行时，美洲人提出"没有代表就不付税"的呼声开始，英美关系出现了10年周期性的危机，最后导致在1775年爆发了反叛战争。总之，从英国的立场来看，甚至迟到两个世纪以后仍很难判断问题的结症所在。在1775年，大臣们的意图大部分都明确地或暗地里放弃了，甚至最乐观的人到1775年时也不能再有把美洲仅仅看成是罗舍厄姆伯爵称之为的"财源"的想法了。用暴力征服殖民地的代价必然是巨大的，就像其最后结果必然是难以预料一样。英国在欧洲的那些敌国将独立战争看作弥补他们在七年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以与英国抗衡的好机会。也有人提出这次战争完全是实行重商主义原则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与"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它系统地推翻了英国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凑巧这一年爱德华·吉本也同时出版了他对罗马帝国悲观论的著作①的第一册）。但是除了极少数人，主要是城市中政治极端分子和某些宗教上的不信国教者外，英国人都积极支持对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他们的主要原则是保卫议会的无限主权，当时是非常通行这一原则的时代，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1765年发表的名著《评英国的法律》一书中，毫不含糊地宣称议会至上具有非常巨大的法律权威，这一点可能最明显地表现在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中。另外，在过去似乎很引人注意的经济问题，现在被提出后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他们对帝国的真正的理解

① 指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译者

是它的旧的重商主义。殖民地如果不承认议会至高无上的全部含义，这将不仅得不到好结果，而且是极端危险的。那种富于幻想、认为不能控制的帝国不如根本就不要的想法受到人们的反对，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太过于幻想的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的想法。这里编年史与文化产生了冲突。美洲人从心底来说是维护17世纪的英[412]国人的权利的。对他们来说，反对印花税法是和汉普顿反对征收船税的斗争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一个能凌驾于地方议会和地方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则在施用一件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至高无上的特权，这是18世纪人们最坚守的信条之一。这种信条认为奉行重商主义制度的宗主国应享有不可分割的、无限的权力。这样只有诉诸武力才能决定争端的结果。

在一定的时候，战争的结果注定有利于新生的美洲。在过渡期间战争证明是英国的灾难——它远比1665—1667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情况都要糟。战争由一次殖民地的暴动发展成反对波旁王朝各国的全面战争，最后还卷入对荷兰和一个与其他强国保持“武装中立”的国家的敌对行动。1782—1783年的和平协议使败局有所挽回。虽然13个殖民地的丢失已无法挽救，但在1782年由罗德尼海军上将领导下的海军在“圣者之战”①中取得的光辉胜利使英国保存了西印度，尤为重要的是使乔治三世避免了丢失克伦威尔一世纪前获得的牙买加的珍贵珠宝。在地中海，西班牙夺回直布罗陀的企图遭到失败。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竭尽全力保卫克莱武将军的所得之地，避免了法国的报复和地方王公的叛乱。现代人认为美洲的独立是一颗难吞的苦药，但除了13个殖民地以外的绝大部分的帝国疆土仍保存完好，至少避免了在战

① “圣者之战”(Battle of the Saints)，1782年4月12日在多米尼加附近海面上英、法两国海军的一次战斗。英军大获全胜。——译者

争最黑暗时期所感受到的屈辱状况。

但是国内的情况要比海外美洲殖民地战争的结果重要得多。这次世界性的战争给一个刚诞生的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上的禁运是严重的。随着经济的衰退，股票市场以及土地价格下降到多年未见的、惊人的水平。税收空前提高，国债迅速地增长，再加上财政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有关政府、议会以及政治体系等重要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混乱的情况下，比较保守的力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绅，都卷入了1779—1780年的几乎公然攻击宪法的鼓动协会运动中去了。该组织成员受到各郡、首都以及地方城市的广泛支持，他们对改革的要求仅次于威尔克斯运动的激烈的激进派。约克郡的一个传教士和乡绅克里斯托弗·威维尔几乎成为领导该运动的全国领袖。他自己并不是上述激进派分子，但他的消灭衰败选区、扩大选举权以及秘密投票的要求都带有未来主义派的色彩。另外，关于鼓动协会有过这样一种暗示，或者用约翰·杰布和梅杰·卡特赖特这样一些大城市中的鼓动家的话说，有过一项具体建议，即英国议会如果抵制改革，就应由各郡的代表取而代之。当代人对这种新的情况感到担忧并不足为奇，但回顾过去对鼓动协会运动的活动能力和规模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在今后的50年内，它对改革的推动胜过任何时候，到1780年达到了高峰，几乎到了全国取得一致意见的惊人地步。在这方面，下议院甚至不顾政府内外既得利益者的意见而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王室的影响已有所增强，而且正在加强，应加以减弱”。这一举动标志着以后几乎持续了5年之久的剧烈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开始。

那么，鼓动协会运动为何未能实现它的诺言呢？当诺思勋爵在1782年短时期内不担任辉格党领导职务时，伯克及其同僚通过议会作过一些改革，如废除某些名声不佳的只领干薪的职位，并着

手更仔细地审查王室的财政情况等。但是事实上议会的改革是躲躲闪闪的。甚至当小皮特在1784年获得最高权力、改革已由财政部以首相的职权提出时，议会中的大多数似乎仍不赞成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革须在发生过鼓动协会运动的环境下进行。进行真正彻底改革的热情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只限于在那些要求最强烈的城市内。但是改革的要求有时只是过分地大事喧嚷，而真正对改革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当中也极为有限。鼓动协会是发生在全国性的危机的情况产生的，当时任何对现存政治进行的系统批判都是受欢迎的。改革者反对腐败的和无能的法律体系的呼声更为适时。30年后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时对拿破仑的战争的庞大开支带来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同样的抗议。但是这种情况为期不长，改革的兴趣大部分都随之消失。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复苏及财政恢复的感觉逐渐增长，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于小皮特政策的影响。繁荣比任何争论都能更有效地推动改革。 414

此外还需考虑到人们对极端分子的策略的广泛而日益增大的关注。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看来不仅对宫廷的腐败政治，而且对支持宫廷的宪法结构，乃至对财产制度本身都进行了攻击。在早期改革运动的著作中已经可以见到关于"人权"派人士将成为什么的说法。根据后来的标准看，像理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人还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们向当时某些最牢固的见解和普通的思想进行了挑战；要想将他们与边远地区的绅士和地方城市的商人不可靠的联盟拆散，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方面，戈登骚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改革者和戈登骚乱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戈登骚乱者在1780年春将伦敦置于他们控制下近一个星期，恣意杀戮与破坏。他们出于无耻的宗教偏见，试图取消对罗马天主教实行缓解的自由措施。对罗马天主教的缓解法案是1778 415

年在政府和反对派共同支持下通过的。如同1754年实行的犹太条例，立法机构显然与公众的思想感情不容易协调。反天主教的领导人乔治·戈登勋爵把自己的运动称之为新教协会，这样受惊的有产者就很容易将骚乱者和受尊敬的鼓动协会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英国在以后的年代里所以显得如此保守，其根源可追溯到这一段时期。

416 18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从“议会外”的意义上说动荡不安，而且也显露出与18世纪60年代一样的政治不稳定的景象，这也是造成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在1782年前，议会中的改革者曾松散地聚集在辉格党的两个主要集团，即罗金厄姆勋爵派以及追随谢尔本的一派的周围。这两个公认的辉格主义党的明显来源，纽卡斯尔和罗金厄姆一翼可追溯到纽卡斯尔和旧的辉格集团，谢尔本的一翼则来源于老皮特。两派的最杰出的人物也都是众所周知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罗金厄姆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他最喜爱的亲信。福克斯的父亲亨利·福克斯曾是老皮特的对手，在新政权时期曾在短期内充当过布特勋爵的工具。谢尔本派中有小皮特——用伯克的话来说，他“不是旧的大木料的碎片”，而是“大木料本身”。这两个人是真正的改革者，他们似乎都想为这一疲惫但仍有希望的年代指出一条新的途径，并想充当领导来反对那些在美洲战争中处理不当的人们所奉行的丢脸政策。但不幸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是，最后他们成了敌人而不是同盟者；在1782年诺思勋爵的退位之后复杂、艰巨的政治中，他们之间的互相敌对起了重要作用。福克斯掌握了主动权，他竭力企图完全控制内阁，由一个人垄断权力，但国王厌恶这种做法，对他这个人也很反感。福克斯在1782年罗金厄姆死后使用的斗争武器是和他的宿敌诺思结成不光彩的联盟。这次联盟激起了广泛的憎恨与愤怒，但是它控制住了下议院，在福克斯看来，控制了下议院就是控制了政府，其代

价远超过对政策一致性的要求。但是福克斯的逻辑存在着缺陷，他的内阁，即臭名昭著的福克斯—诺思联盟，寿命不长。它首先遭到国王本人的强烈反对，国王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破坏。同时它也受到皮特的反对；皮特不想依靠福克斯，同时非常憎恨诺思。当福克斯被迫提出一个皮特和国王也许会诉诸全国的问题，即彻底重建东印度公司的问题时，他等于在政治上进行自杀。乔治三世指示上议院不要通过“东印度条例”并任命皮特执掌政权；同时在1784年春天进行了普选。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福克斯遭到彻底失败，这不仅表现在他未能在财政部可以施展影响的地方取得胜利而且在更广泛、更公开反映公众意见的全体选民中，也遭到了群众的憎恶。局势稳定后，皮特稳稳当当地当上了首相，辉格党彻底“完蛋了”，尤其是福克斯和皮特为了反对乔治三世和诺思的联盟而进行改革的希望被葬送了。这应归咎于福克斯这一“人民的宝贝”的不负责任的奇怪行动。

看来改革不论怎样都不会取得成功。皮特在其早期政策指引下曾经同意进行改革，他知道没有王室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作为首相，他不想推行激烈的政治行动。他是个改革者，但不愿对教会和国家的机构有所变动。在皮特的统治下，“经济改革者”提出的减少朝廷腐败和浪费的许多要求得到实施。此外，在他的领导下，犹犹豫豫地迈开了走向自由贸易的第一步，这突出地表现在1787年与法国的商业条约上。对帝国的困难问题也以既谨慎又有创新的态度来对待。在美洲殖民地战争危机时，爱尔兰已要求它的议会脱离威斯敏斯特而独立，这个要求在1782年达到后，又取得了一项自治措施。如果能够得到米德兰和兰开夏的制造商的同意，皮特是会允许爱尔兰享有与宗主国同样平等的商业自由的。他在这方面的失败使得英爱关系处于一种含混不定的状态中。印度由于通过了东印度法案而基本平息下来，该法案使政府对公司

417

的事务有最后决定权，至少在它们不只是涉及商业性的问题时，这样就至少解决了作为英国政治事务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1791年，加拿大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后那些忠实于英国的移民的涌入和魁北克棘手的"人种"问题而颁布了一项法案，[①]这个法案很不容易地一直维持到1867年。

皮特的优势地位在许多方面带有传统的性质。他的权力基本上来自宫廷的封臣和国王的支持。他在1784年取得的胜利可以被看作是与丹比或森德兰所作过的一样的王室的胜利。皮特的对手似乎也很像是传统式的。福克斯更多地依靠王室的继承人、未来的乔治四世。乔治四世在政治上、财政上和两性关系方面的怪僻行为都令国王失望，正像国王对在他之前的任何继承人感到失望一样。但是在其他方面，皮特和他的行动反映了近年来的所发生的变化。在当代众多变革的浪潮中，他在行政上和经济上进行了改革，这些变革本来是很容易被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所吞没的。启蒙思想所产生的盛行一时的功利主义已有所表露。杰里米·边沁及其他哲学上的激进分子在实用的政治学上尚有待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但他们所传授的或采用的思想，正如福音派教义的宗教影响一样，是在各地普遍流行的。对当时真正产生重要影响的改革主要是那些道德上、人道主义方面及实用主义方面的"改进"，这些改进使福音派受到鼓舞。约翰·霍华德的著名运动发生在18世纪70和80年代。他的"发现航程，"或用伯克的话来说"善行环航"，对监狱改革工作是一很大推动，受到了许多地方官员的支持。正如那时广泛掀起了建立在牧师监护下的友好社团的高潮一样，主日学校也在这一奉行真诚努力的年代里出现了。下层阶级传统性的娱乐活动，在社会上层人物不满的监督下有所增加，尤其是那些

① 即1791年英国议会颁布的"宪法条例"，它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份为上魁北克和下魁北克两省。——译者

诸如斗鸡、斗牛等虐待动物的游戏。另外，对待帝国的责任心的态度也有明显的转变。伯克反对沃伦·黑斯廷斯这个英属印度的救世主的运动，无休止地延长下去，而最后遭到了失败；尽管黑斯 418 廷斯在某些问题上明显存在错误，但对他的指控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支持。黑斯廷斯是公众道德标准改变的牺牲品。在克莱武时能容忍的事情现已变得无法容忍。如何对待附属国人民的问题，在国内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对从印第安红种人到科克上尉发现的南太平洋岛民等“未开化的”人民的兴趣，正如伯克对更成熟的亚洲人民所受到的同样的奴役表示的愤怒一样，表现出一种新的对帝国受害者苦难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敏感。这种敏感的最重要的攻击目标当然是臭名昭著的奴隶交易。由格兰维尔·夏普在18世纪70年代形成时期和由威廉·威尔伯福斯在80年代所领导的运动，还得等待好多年才能取得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取得过胜利。在1772年发生的萨默塞特案中，一位被西印度种植园主带到伦敦的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理由是英国没有一条法律能具有足够的权威认可“奴隶制度这样的统治行为”。这一决定的宣传价值与其法律意义是不协调的，但它以及它特别着重人类平等、宗教拯救以及政治保守主义所引起人们的兴趣，恰好触及18世纪后期思潮的本质。因为威尔伯福斯及其友人都是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坚强保卫者，他们对激进政治毫无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新的工业化英格兰商业阶层严肃的、福音派的热忱。所有这些并不能代表政治体系的实质，却正是威尔伯福斯的朋友皮特最能代表的阶级所具有的。另外，恰恰由于他们坚持要保护财产利益的本能，再加上推行商业上的侵略政策和道德上的无限真诚，把小皮特统治的英国带进了法国革命的时代。

第八章　革命和法治

(1789—1851)

克里斯托弗·哈尔维

419 两个革命的反省

1881年年轻的牛津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发表了《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把英国工业革命看作像玫瑰战争一样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时代"。拿这个说法去理解"两个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虽然很方便，但却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攻陷巴士底狱是显而易见的具体事实，工业化的进程却是渐进的，它的影响是相对的，它的意义只有回顾起来的时候才显现了出来。"工业革命"这个使英国人感到惊奇的概念，其意义对英国人来说还不如对欧洲人更大，因为，欧洲人曾在近处了解过革命。事实上，正是一个法国人，即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首先在1827年使用了"工业革命"这个术语，卡尔·马克思则使它在1848年以后成为欧洲普遍流行的用语。

这种情况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有些麻烦，他们要权衡对历史事件现在的看法和过去的看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看到工业的变革和在昏暗的工业作坊中所发生的新的发展过程，而从过去的眼光来看，则使我们感到工业革命前的上层贵族人士的权力是如何缓慢地下降的，同时也看到即使在科学的时代，宗教的力量也还表现得如何顽固。一直要到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切实的持久性的工业变革，然后，又过了20年，包括中等阶级在内的人，

才确信工业革命的好处。

关于发展难道不需要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来证明吗？从理论上说，是需要的。但是，“事实高于一切”的时代是如此的变换不定和摆脱不了个人色彩，因而对事实的记载和估价就另当别论了。直到1801年，英国才有了关于人口调查的资料。在此之前，关于英国人口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虽然人口调查后来发展成为包括职业和居住条件等社会分析的复杂手段，但是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就像1791年至1860年间由陆地测量局所进行的系统丈量测绘工作一样，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节约开支的实际行动，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影响了统计数字的编订；因为对商品货物 420 和企业的管理或课税的事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大陆上的专制政府对他们的虽然很少的工业企业的资料却很热心地进行收集和统计。)对某些基本的问题，如众所周知的关于工业化究竟是否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等的争论仍然很激烈。

从这个观点来看，近代政治显示出了它的阴暗面。托因比的同时代人同意卡尔·马克思的论点，即在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1917年以后，苏维埃俄国似乎显示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代替办法，即“有计划的工业化”。但是它在人类的生活和自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非常明显了。同时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的世界”，再次阐述了通过自由市场的作用而取得工业化的例证。他们争辩说，英国资本主义在面对投资的可利用资源比较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在投资和生活水平两方面都取得了增长。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尚未取得结论。同时，争论还只是限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但要知道，英国的经济发展曾对爱尔兰、印度和美国南部各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远非是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幸福。

如果说在统计上和研究范围上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思想上也有问题。“工业化”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不管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对经济学说是如何想的，作为行政官员和地主，他们的口号是：安定，他们的价值观仍是前工业时代的。到1829年，工业化的潮流已变得甚为迅速，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在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发表后仅仅11年，在《爱丁堡评论》上，有人用粗声粗气的腔调把“时代的标记”描述为——：

> 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什么也阻止不住我们。我们向粗野的自然挑战，并用我们不可阻挡的机器，永远胜利地前进，并满载战利品而归。

托马斯·卡莱尔以生动的、充满感情的词句描述了当代的五光十色的印象：那些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曾在威佛利小说集中描述过的从英雄时代转变到政治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罗伯特·欧文的“新拉纳克”中所设计的工厂社团，绝望的手摇机纺织工的空想的政论；那些欧洲来的访问者表现出来的不胜愕然和惊讶之情等。仅在几个月之后，卡莱尔的话被铸到了乔治·斯蒂芬森的机车“火箭”号上。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个既与我们的时代又与那个时代本身协调一致的概念呢？对这个问题，G.M.扬是一个最初的探索者，他在《一个时代的画像》一书(1936)中，看到他所描述的主人公们，“受到福音教派的纪律和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对进步信仰等不可估量压力的支配和鼓舞。”然而，扬的历史著作——“他所器重的人的言谈”——是相当贵族化的，它忽略了人民大众——矿工、工厂工人、爱尔兰的贫农、伦敦的街头流浪人——或者只把这些人看成是一种“麻烦”。人们缺少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

所显示出来的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认识到伟大的运动是由千百万个普通人的个别决定所达到的。在与托尔斯泰描写的 421 那些法国的和俄国的士兵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很少有人也具有"受器重的人"的观点；就我们所知，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教会的实质，就人们所写和所读的东西来看，他们很少对进步充满信心。然而，不管他们的行动自由如何受到限制，那些提供给"极为倨傲的子孙后代"的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留意它们。

E.P.汤普逊是上述说法的创始人。他声称，对这个说法所作的连续不断的一套解释已经有了，这就是法律。不管行政机构如何偏袒不公（在18世纪时，这种偏袒不公的情况常常是明显的），"法治"仍然被认为是公众所共同享有的。这一论点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影响以后仍然存在。在1832年，作为一个年轻的议员、T.B.麦考莱发表演说，主张政治改革以保卫法治，避免专制独裁的横行无忌。"人民在受到法律的摧残时，别无他法，只有诉诸武力；如果法律成了人民的敌人，那么人民也将成为法律的敌人……。"让法律"结合"为新的体系，使它们不同于政治制度。这种哲学和工业变革的"革命"后果两相平衡，也与那种意图从这种变革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学的种种努力相平衡。

再说，法律的演进为另一些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模式。1859年牛津大学的一篇就职讲演曾说到"上帝自然法中的最美的和最奇妙的法则"，这个法则结果是经济学，但它也可以是法学或地质学。个人道德、技术发明、道地的英国观念，即法律和进步观 422 念的平衡等，都一齐结合到它的强大的潮流中去了。

在所有的阶层中，对那些古老的道德问题，如贿赂和不信神、酗酒、嫖妓和赌博等，如果不被看成是反社会的行为的话，也都逐渐地被看成是旧的行为了。就像"生命的宗教"一样，理性的启蒙思想也从苏格兰和法国传播进来；再加上廉价的商品等，这些都显

示出生活可能更长久并更美好。当塞缪尔·佩皮斯把他的海军部的下属的妻子看作他的合法宠爱物时，那个同样好色的詹姆斯·鲍斯威尔却为他的妻子和家庭而痛苦。威廉·布莱克非常鲜明地描绘了新的道德规范的预兆；这种新的道德规范或者是由于腐败行为的罪恶或奴隶制、无产阶级的骚动、法国的事件等酿成的，或者是由于上帝的震怒。

现实就是证据。那么，人們的状况是否有所提高？它是否有所改进？一个英国旅行家在1839年时很惊奇地发现，当匈牙利的穆斯林邻人已经有了单桅帆船在多瑙河上航行时，匈牙利人却还没有在水路上航行的船只；不管原因为何——是划船桨手的利益或是骑马骑手的利益，是匈牙利贵族的运输的特权，或是对任何一种土耳其事物的厌恶等——把它看作是阻碍了改革和进步的"罪恶的利益"是有典型意义的。

"进步"和法治都不是必然的，而必须经过同国内的和国外的敌人，同那些国内的"旧的腐败现象"和新的不平，同国外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去争取。进步意味着不受经济和政治操纵和控制的道德的发展。这种价值观，可以拿克雷克夫人的著作《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1852)中的主人公的话来说：

> 那些他能够完成的事，他一件都不会搁置一旁，直到把它完成为止。他把他的事业的各项任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的工作都当天完成。由于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土地所有者，同时又对时代的发展抱着普遍关心的态度，因而总有无数的小事会随时涌现在面前，但即使如此，他那种当日事当日毕的工作规律仍照常不懈。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正像他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一样，他似乎都决心要"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工作"。如果他有可能避免这样做的话，也绝不是由于他的不够勤奋；任何职责他都不会半途而废，没有任何知善不报之事；没有任何罪过是不加弥补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加宽恕的。

法治是一种英国的传统，但是法治的作用作为“有效”政府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曾在英国的国内边界问题上创立起来过。当苏格兰人将他们的国家从落后中拉出来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具有特色的法律机构作为工具去巩固土地资本，去开发和建立“公民社会”。在爱丁堡，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和戴维·休谟把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和哲学与法学结合在一起，去创建一种混合的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像帕特里克·科尔克豪恩、詹姆斯·米尔等人以及《爱丁堡评论》的编著者们，则把他们的价值观传布到了南方。爱尔兰的贡献是颇为不同的。迪安·斯威夫特曾写道：“法律似乎以为天主教并未在爱尔兰风行过”，因而就在爱尔兰实行了清教法律，但清教法律，按照它的定义，是强制性的，所以，毫不奇怪，在爱尔兰1814年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力量。

虽然合法运动有助于在1799年结束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和盐 423



《人民》（约翰·哈登1826年绘，反映中产阶级家庭生活）

业工人的农奴身份并在1807年在不列颠帝国停止了奴隶贸易，然而，尽管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贫农在他们的乡村"改进"中起了作用，但他们得益很少。法律比任何时候更成为财产的工具，它使仍然是分散的社会中的地方上层人物在来自欧洲的威胁到来时联合了起来。那些在1745年聚集在依靠法国支持的查理·爱德华周围的民族酋长和地主，成了土地所有主，他们同革命者没有共同的理想。雅各宾主义和詹姆斯主义一样，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应用法律去加强民族团结和保证经济变革的任务是对它的非常严峻的考验。

工业发展

一个在1815年有着灰白鬓发的老人，可能还会记得1745年詹姆斯党人穿过曼彻斯特向前行进时在伦敦引起的恐慌，他也会对国际上的一个变化感到震惊，这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地位正好反转了过来。这并不是仅仅由于20多年的以滑铁卢的胜利而达到高潮的战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占领了重要市场的结果。英国的封锁摧毁了伟大的法国的港口经济：波尔多的街道上长满了青草，与此同时，英国获得了大约20%的世界贸易和将近一半的工业制造品。

424

工业的发展并非伴随着一个事先注定的成功道路。它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而且是不确定的。亚当·斯密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工业。即使到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还怀疑技术是否能够普遍改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格雷戈里·金于1688年作出他的估计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确实已取得了进展，这意味着，在采矿、制造业和建筑业中，生产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总收入的1/5。（如果以整个不列颠来计算，数字将要少一些，因为它将包括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800年，估计数字为，英国的"制造业"生

产占国民收入的25%，占贸易和运输的23%。不过，这样一种增长，并不是法国的能力达不到的。英国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质量上的变革，这在市场的型式、技术、政府的干预等方面更为突出。在1800年，国民生产的33%是由它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当法国由于革命提高了农民的权利而使农业的发展缓慢下来时，在英国，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了有效的所有制形式，同时它也是进行商业开发的关键因素。

1745年法国的人口为2100万，是英国人口的一倍。它的经济由于王室的庇护和国家控制，不仅产量高，而且在技术上也是有创造力的，在发展速度上同英国一样的快。不过，在英国，技术的发展是由于新的需求所促使的，而在法国，它不仅受到政府干涉的阻挠，而且也由于传统资源太多而受到损害。法国仍然生产大量木材以制造木炭，而英国的铁工厂老板则用煤来炼铁。法国有一 425 个与农民的农业耕种结合在一起的庞大的木材工业；而在英国，圈地运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限制了这种家庭工业的发展，而促进了大规模的工厂建设，这种工厂需要的是水力和蒸汽力或者是系统化了的生产。尤其是，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时已在商战中战胜了法国，把法国从西班牙所属地区、印度和加拿大的领土上驱逐了出去。甚至英国丧失美洲殖民地之事，也很快由于棉花贸易的兴起而得到好处。

在1801年，英国第一次正式的人口调查发现英格兰有830万人口，苏格兰为163万，威尔士58.7万，爱尔兰522万。这次调查使关于人口的争论得到解决，看来它从1750年以来增长了大约25%，比欧洲的一般增长速度快50%。现在，争论仍在围绕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增长继续进行。在1750年前的若干时期，死亡率降低了，这是食品供应的改进和卫生状况改善的结果，也是由于流行病所造成的死亡率减少了。这种情况还反映在出生率的增长

上，更多的哺乳期的婴儿存活了下来。

在英国，制造业的增长和家庭农场的消失，使儿童成了一个有价值的收入来源。农业问题作家阿瑟·扬奉劝人们："去吧，孩子们，去找一些儿童来，这些儿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用。"在爱尔兰，人口的增长沿着不同的浪潮发展，这就是，地主们力求取得更多的地租和18世纪20年代以来马铃薯的种植。马铃薯的种植使每块土地所生产的营养食品增加了3倍。地主认识到，在新增加的农田上，增长起来的人口可以使每亩地地租收入增加3倍。总起来看，在1780年到1831年50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

人　口（单位：百万）

	1780（估计数）	1801	1831	1851
英格兰	7.1	8.30	13.1	16.92
威尔士	0.43	0.59	0.91	1.06
苏格兰	1.4	1.63	2.37	2.90
爱尔兰	4.05	5.22	7.77	6.51
联合王国共计	12.98	15.74	24.15	27.39
英格兰占百分比	54.7%	52.7%	54.2%	61.8%

最近的一个统计说明，在19世纪初英国的农业生产力比法国的高2.5倍，而法国本身的生产效率比欧洲的其他国家高得多。结果是人口从乡村迁往城市，与此同时，还可以养活得起这些增长的人口。1801年，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有30%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比例比北欧的任何国家都高得多。不过，在工业城市中的人口，占这个数字的比例还不到1/4。城市人口中居住在海港、沿河城镇、和地方上的中心城市的，比其余的居民总数还要多。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性大都会，有人口约11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3。

另外，人口仍旧颇为均匀地分布在多处。各郡人口的绝对数

仍在增长。"克尔特系外缘"①的人口仍约占联合王国人口数的一半(45%);都柏林(16.5万人)和爱丁堡(8.3万人)仍是继伦敦之后的大城市，科克和利默里克比大多数工业城市的人口还多。这种地方性中心城市的复杂的组织，反映了地方的乡绅、教士、农夫和专业人士所占有的主导地位以及几十年来贸易增长的影响。

英国经济的特征仍然是贸易而不是工业。大陆上的城市仍然严格受到控制，或者说直到最近这种控制才停止，他们的贸易受到复杂的和破坏性方式的限制，并受到横征暴敛的盘剥。德意志小城市的中世纪城门仍旧在傍晚时分加以关闭，以便使"外方人"离开他们的市场。但是，与此相对照的是，在英国，国内很少有什么阻碍，而"重商主义"的政府积极地鼓励利用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财富。18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英吉利海峡地带似乎将发生长期战争，而以马恩岛为中心的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的吸引力，将商路转移到了北方，利物浦先是靠谷物和奴隶贸易，现在则靠棉花贸易兴起，格拉斯哥先是靠烟草和亚麻，然后则靠棉花和工程技术。随着与它们的腹地相联系的有效的运输纽带的开拓以及制造业功能的转变，它们作为货物集散地的功能渐渐发生了变化。

贸易和分配对工业化提供了主要刺激，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像 427 英国那样城市人口达到了30%，这些人口需要衣、食、取暖，或者像英国那样控制了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商人们由以来掌握上述所有一切的制度——法律所允许的制度，如果说不鼓励建立的话——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生产的增长能够转变为利润、信贷和进一步的投资。在国内，日益扩大的"受尊敬的阶级"为布匹、刀具、建筑材料、瓷器等提供了市场。这种"国内的"要求在1750年至1800年之间增长了大约42%。但是在同一时期，出口工业的增

① "克尔特系外缘"(the Celtic fringe)，指英国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康瓦尔人及其后裔。——译者

长为200%，其中大部分是在1780年以后取得的。

除农业外，另外三个占统治地位的部门是煤、铁、纺织。前两种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本设施，和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东西。但是纺织业在1750年时占出口价值的50%，1800年达到60%以上。棉花在1750年时还不很需要，到1810年时已达到出口贸易的39%而占了统治地位。煤的出口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增长了一倍。这是因为蒸汽水泵的使用能够进行更深、更有效的采矿的结果。同时，用马拉的铁路运输可以把铁装载运输到更远的河道地方。铁的生产因战争需要而兴盛起来，同时因用煤代替木炭作为熔铁燃料，在18世纪80年代炼铁的"搅炼法"和"辗压法"得到改善，使铁产量在1788年至1804年间增长了200%。但是，成了将工业化这个滑翔机拉着飞上天空的力量的是纺织业。

羊毛一向是英国的一大特产，虽然亚麻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并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政府的恩庇而得到扩大。棉花的增长主要应归于它适于机器生产，同时归于南美的奴隶劳动使得原料的供给迅速提高。新的机器是很原始的。但是对机器需要的增长说明工人反对采用机器的阻力已被克服。约翰·凯的飞梭织机使织工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当他在18世纪30年代想将它加以应用时被破坏掉了，到了70年代又和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手摇纺纱机(一种多锭的纺轮)和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一起使用起来。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需要巨大的工厂，它从德比郡河谷扩展到兰开夏和苏格兰。在竞争所导致的物价下跌之前(1784到1832年物价下跌了2/3)，人们可以赚到巨大的财富。阿克赖特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特许证，这为他带来了20万镑和准男爵的身份。罗伯特·皮尔爵士原是一个棉布印花工，并是未来的托利党首相的父亲，后来，他的企业雇佣的工人达15000人之多。罗伯特·欧文估计在1799年和1829年之间他的新拉纳克工厂为他和他的同

伴（在交清股息之后）净赚了30万镑利润。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在采用动力织机和从爱尔兰来的移民，及1815年后退伍军人这批劳动大军充斥劳动市场之前，手工织工也享受到繁荣的一定好处。其后织工的状况就陷入那个时代的真正悲剧之中。

棉纺织业的技术向别的纺织部门传播——很快传播到约克郡的精纺毛线行业，又缓慢地传播到亚麻和羊毛纺织业。但是它也使机械工程和金属制造业兴盛起来。为了开动成千上万的纺锭， 428
必须把强有力的和可靠的机器投入使用。工厂或火绒箱必须是由耐火的金属柱或金属梁制成。1770年，阿克赖特用水磨匠和钟表匠去安装他在克隆福德的主要由木料制成的机器。但是工厂设计和机器制造很快就变成了专门的职业。这时的工厂具有多达150匹马力的水力转轮，复杂的纺机“骡机”(由珍妮机和能纺出细的“纱线”的机器的混合物)。同时，蒸汽动力的应用不断增长。

詹姆斯·瓦特在1774年把他的单缸冷凝器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1781年又将他的滚动蒸汽机申请了专利。在1800年，棉纺织厂是这些蒸汽机的主要运用者，蒸汽机为“骡机”纺纱机提供了可靠的和连续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蒸汽机所需要的越来越复杂的技术既使蒸汽机的进一步应用不断扩大（1804年应用到火车头，1812年应用到轮船），也促进了机床的发展，特别是与亨利·莫兹利相联系的机床制造业以及他所发明的螺旋切削机床。这些，以及和它一起发明的测微机，使机器的各个部件的制造得以绝对准确。从此以后，机器可以再生产机器本身并能够制造出越来越复杂的机器。18世纪钟表制造业的标准不再是价格昂贵的技巧， 429
而是平常的机械工业智慧的一部分。

在像布林德利、斯米顿、特尔福德和伦尼这样一些人尽可能地利用水运和马力来从事运输的同时，交通设施的创建也使建筑工程到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与此并行的是利用风力，帆船变得非常

复杂，直到19世纪80年代前一直可同蒸汽机相竞争。国内的非常糟糕的道路状况得到了修整并趋于正规化。在有些情况下，建筑是从零开始的，由收税道路协会或由政府承担。从伦敦到爱丁堡，在1745年需时两周，1796年需时两天半，1830年时乘马车或汽船约需36小时。在17世纪水上航运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爱尔兰在18世纪30年代利用筑坝设闸的办法修建了一些"死水"运河。不过，只是在布里奇沃特公爵1760—1771年将曼彻斯特与一地方煤矿以及利物浦联系起来的计划完成后，水运对工业成长的重要性才显示出来。布里奇沃特工程师布林德利设计一种"窄道"运河，以防止干旱季节米德兰的水量丧失。在1764—1772年的和平时期，当货币贬值时，乡绅、商人、手工工场主和银行家所组成的公司 430 着手去把所有可以航行的河道联结起来。这种私人企业有的（如牛津运河）可以得到30%的红利，不过平均红利约为8%。运河建筑的下一个繁荣时期是18世纪80年代，这时把兴修运河系统推广到那些并不适合于商业用途的地区。这时，英国已有了一个在欧洲无可匹敌的运河网络。当农业的和工业的"改进者"结合起来共同去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时，许多不利于进一步联合的障碍都被克服了。

改革和宗教

英国政府没有也不想在工业化上去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像1815年谷物法所显示的，它对自由放任政策也不支持。但是它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或多或少系统化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对工业资本家比对其他任何阶级更为有利——当然，除了地主。不过，地主本身在采矿、运输和财产发展等方面常常也是资本家。布莱克斯通和伯克的原则，连续性、权力分割、政府和经济社会的互相渗透，特别是政府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的观念，补充了古典经济学的结构、

科学发现，甚至也补充了上层阶级的有教养的自然神论。

但是这种理想需要进行革新。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已使他们遭到了部分损失。虽然，群众暴动——特别是1780年的戈登骚乱——使得令人尊敬的改革者更加小心谨慎，但改革已成为公认的必需之事了。亚当·斯密和约翰·韦斯利的言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也看到了这一点。问题是如何把改革控制在宪法范围之内，像鼓动协会这些试图使政治更加具有原则和保持平衡等方面的努力，只不过使得“利益”的区分更为明显，腐败现象更加露骨而已。苏格兰的“大衰败选区”：那里只有4000余名选民，却可选举45个议员（在114人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在英格兰7人中有一人有选举权），它得到由它的“操纵者”，即在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著名的邓达斯家族所分给的恩宠。1782年以后，爱尔兰的“自由”议会仍然是一个不准天主教徒投票的机构。

在大制造业集中的城镇，压力集团如制造业者总协会，对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恶劣现象公开发表了意见。1801年，约克郡的70万人民，只有郡议员2人和城镇议员26人。而康沃尔18.8万人却有郡议员2人和城镇议员42人。1793年以后，不信国教者和天主教徒被允准参加投票，但不能当选议员。在另一方面，政治影响受到了很大限制，进入议会花费甚巨，以致有时被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反而更有好处。贵格会教徒的总人数虽在减少，但他们的牢固的家族关系（教友会教徒不能“嫁出去”，而是要留在教派内部）受到散布各处的从制造业和冶铅业到银行和铁路的各种企业的广泛支持。具有自由思想的一神论者，他们“最多信仰一个上帝”，是科学和教育上的地方启蒙思想的有力领导者。

福音派新教会的复兴则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民众的教会，在起源上属于传统的高教会，它从17世纪的宗教遗产中（在布尼安的著作中有典型的表现，并由约翰·韦斯利加以传播）和威廉·劳

等人的虔诚的文学中汲取鼓舞。与"老的不信国教者"和加尔文主义的"选民"形成对比，它强调由圣经来指引他们生活的人是可以得到神恩的，它的教徒应毫无例外地受到尊重，是世界性的和"热诚的"(有许多成为严格的不可知论者和高教会的批判者的人开始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一种针对无神论革命而产生的对危机的信念，它无视工业关系和粗野的个人行为。皮特酗酒、福克斯好赌，但他们两人都易受到福音派教会所施加的压力的影响。

福音教派的复兴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不过它很快就流入特殊的渠道上去了。韦斯利在1795年创立的"卫理公会社团"把英国教会除外，因为他们不能够再接受习惯上的圣职委任。他们仍然是托利党员，但是，卫理公会的一些组织如原始卫理公会(他们在1811年分离了出去)变得越来越趋向自治，越来越激进。卫理公会是北方"约克郡的真正宗教，"在别的地方，浸礼会和公理会在工业城市扩展，它的上层人物经常是一位论派和贵格会教徒。乔治·埃利奥特在她关于1832年左右情况的"政治小说"《费里克斯·霍尔特》(1867)中这样描述不信国教的价值观：

> 这里的居民认为古老的英国并不像它可能的那样好，这里的芸芸众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宗教并不就是统治者的宗教。因而，他们可能比那些统治者更好一些，而如果他们更好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将许多事物加以改变，这些事物现在或许已经使这个世界比它应该成为的状况更为痛苦，而且确实是更为罪恶。

"生死攸关的宗教"完成了威尔士的宗教革命。在1800年，80%以上的居民仍旧固守官方教会，官方教会在18世纪中叶的传教活动("巡回学校")，增加了居民的识字水平(在威尔士)和宗教热忱，这种热忱之高，出乎它本身所可以支持的程度。加尔文派的

卫理公会和其他非国教教会乘虚而入，在1851年，威尔士的教会中有80%是分离派教会。在苏格兰，官方的长老会控制了教育和济贫活动，实际上它成了苏格兰的附属立法机构。长老会受到地主和他们世俗的自由主义教士的控制，它不仅越来越受到独立的长老会的攻击，而且也受到那些希望将权力转交给天主教结社的人的攻击；这些人通常是福音派新教会教徒。在爱尔兰，不信国教的传统起初是自由主义的，他们的领导人常把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利地位与天主教徒作对比。但是18世纪90年代的事件和福音派新教会所受到的新的苦难，最终加强了信仰新教的东北部地区和国家的其余地区的分裂。

国外战争

法国革命在英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从坏的方面看，它可以削弱英国的宿敌，从好的方面看，它可能创建一个宪政国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年轻的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都对它表示祝贺。罗伯特·彭斯在它的鼓舞下写了《苏格兰战歌》——它具有明显的现实含义。甚至政府也没有很快对伯克在他的1790年11月出版的《对法国革命的思考》中所作出的严厉的批评作出反应，而英国本身一个温和的制宪运动看来在继续发展。虽然伯克表达了当局的感觉，特别是1791年6月巴黎急剧向左转以后，习惯性的顺从已被排除，武力将要统治一切。改革只能在保存基本的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伯克既攻击法国，又把布莱克斯通为英国政治制度辩护的言论大大加以夸张。当局确实为英—美激进主义者汤姆·潘恩对伯克的回答而吃惊。潘恩在《论人权》(1791—1792)一书中大胆地提出要求个人自由的、民主的改革。伯克自己可能引起了他试图避开的东西。如果说《对法国革命的思考》在6个月中出售了19000

份的话，《论人权》则出售了200000份，这在一个仍是半文盲的国度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自从内战以来，小册子宣传还没有达到过如此大的规模和影响。

434 政府特别对两件事感到震惊，即法国人关于英国的低地国家附庸国的"自决权"和观念的传播的观念。欧洲的君主国虽然有更多的考虑余地，但在1792年后放弃了18世纪的关于战争的绅士风度，而把法国当成了一只必须捕杀的疯狗。法国人把战争当作是群众的十字军运动，实行了"全民武装"。在英国，外交威胁发展成为联合的威胁。对法国的警告使巴黎的一些乐观的革命者增长了一种信念，即战争将在英国带来革命。1793年2月1日，法国宣战。

英国对战争并无准备，军队只有45000人，能够到海上投入战斗的舰船还不到1/10。再者，这次战争和以前的英、法冲突完全不同。新式的军队，猛烈的革命性的进攻，法国的新的统帅们的才能等，所有这些，都从一开始就使英国的同盟国遇到了困难。到1797年，奥地利退出了战争，只剩下英国一国单独去对付波拿巴的攻英大军。

在战争初期受到政府特别注意的有三件事，法国入侵的威胁，战争的庞大费用以及国内各种不同派别的斗争。法国人作过三次进攻英国的尝试，一次想通过威尔士，两次想通过爱尔兰。1797年在彭布罗克郡的登陆没有得到支持。1798年由亨伯特将军统帅的一支军队在梅尤半岛的基拉勒登陆，受到当地同盟者的支持，在该地战斗了两个星期才被击败。政府希望依靠海岸的圆形石堡加强海岸线的防御并保卫本土，组织民兵（国内防卫力量），把民兵条例推广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所有这些都使有关的地方官员经常感到头痛。由于向同盟国提供的资助到1795年时达上千万镑，不得不急剧提高税收，1799年以后新设立的收入税，每镑征收2先令10

便士。最后，政府严厉地批评那些企图与法国媾和或团结的团体。1793—1794年“皮特的恐怖统治”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爱国团体的地方性活动的补充下，把许多激进社团都摧毁了。这种迫害在苏格兰特别强烈；巴拉克斯菲尔德勋爵用土语粗鲁地讽刺这儿为“上帝创造的最完美的制度”。

巴拉克斯菲尔德的讽刺——一次当一个人向他说耶稣是个改革家时，他回答说：“他作了很多这样的事，他应被绞死。”——象征性地反映了苏格兰上层阶级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已经终结。以后30年是持续不断的迫害，这是由皮特的苏格兰的同伙律师邓达斯家族施行的。

在爱尔兰，这种逆转甚至更为强烈。战争使皮特强迫爱尔兰议会在1793年给予天主教徒以选举权，以便把他们从“不信神”的法国那里拉过来。但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非宗教的激进主义迅速在增长。到1798年时，它在厄尔斯特遭到极端信奉新教奥兰治分会和对新教特权非常愤恨的天主教农民的地方暴力运动的反抗，同时他们也部分地受到浸染了革命理想的法国训练出来的 435 牧师的影响，在亨伯特登陆之前不久，在威克洛爆发了一次短命的、罪恶的事件，这次事件足以使占优势的新教更加相信他们应该分离出来。1800年爱尔兰仿效苏格兰在1707年时的例子，和英国在政治上合并。

除了1801—1803年的短暂的中断时期之外，“国外战争”一直沿续到1815年。到这时，英国已为战争花费了15亿镑，然而它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非常有限。战争很快就从群众的记忆中消失了。在那个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一个武装的营地，经常征募人员参加民兵，至少有1/6的成年男子武装起来。和法国不同的是，他们中很少人真正地到国外服役，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大约210000）死亡。在法国人口增长慢了下来（1800—1850年法国人口

增长32%，英国增长了50%)之时，英国与此稍有不同，所受的影响也较小。1805年以后英国的海军优势从未受到过挑战，并且通过封锁破坏了法国的大部分工业，因为法国的大部分效率高的工业都设在商业港口。

亚当·斯密曾写道：战争能够使需求不正常并在一定的劳动力形式中创造出一个“销售者市场”。现在战争造成了这种局面。铁的贸易不仅在西部米德兰的传统基地上，而且在苏格兰中部以及威尔士南部都兴盛起来。在南威尔士的梅瑟蒂德菲尔城，1790—1820年间人口增长了20倍。这是一个荒凉的、遥远的城市，它座落在这样一个地区：该地18世纪中叶时的最大城市卡马森的人口还不足4 000人。由于英国用封锁困扰了它的敌人，使它一向遥遥领先的纺织品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即它的制造商甚至供给法国军队军服。那些巨大的运河船坞查塔姆、朴茨茅斯、德文波特进一步扩大，变成了大规模生产的先锋。它们建造的战船得到巨大的改进。19世纪50年代蒸汽动力占了优势，这几乎可以说是另一次较小的工业革命。

海军事实上是政府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典型。水兵的悲惨状况激起了1797年在斯皮特里德和诺尔发生的暴动。这些事件并无政治内容，暴动者不管怎么抱怨，仍旧是充满爱国心的。当局用强制和让步的混合手段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组织最好的船坞工人。在别的地方，政府对要求解救工人阶级苦难的努力反应暧昧。1799年的结社条例把工会看成是革命社团，认为它是非法的。政府同样成功地拒绝了关于保障最低限度的法定工资、恢复较古老工业关系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得到工场主(整个来说以小的手工场主居多)的支持，政府也不会同意。这些措施和因投资转向政府公债和商战所引起的萧条，确保了1790年至1814年间平均实际工资保持不动。那个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为许多农村

教区所采用的相对地说比较慷慨的济贫税的办法（即所谓的斯品汉姆兰制度）① 继续实行传统救济的条件。无疑它对甚至是比较尖锐的社会冲突都起了缓解的作用。

在战争中，英国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卷入到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中，而只是向它所参加的许多不同联盟的成员国提供资助。这首先是为了反对革命的法国，后来是反对拿破仑，其实这不过是 18 世纪战争中雇佣兵原则的较为精致的形式而已。只有当 1811 年和 1814 年英国派遣了它自己的军队到伊比利亚半岛时，它的军队才在欧洲大陆上发挥了作用。英国在其它地方的收获是巨大的，它对印度的统治得到加强，并且通过新加坡取得了对荷属东印度的实际统治。它在 1795 年至 1816 年间征服了锡兰，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南非，并确立了对埃及的一项权利；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前西班牙殖民地也非正式地取得了商业霸权。 436

虽然英国是胜利者，但是，战争在欧洲所留下的主要是法国的影响。凡是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他们就留下了法律（或者是他们的对手仿效而制订的）、度量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特别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地图被完全改变了。在 1789 年前，英国是大陆社会的一部分，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在巴黎就像在爱丁堡一样地熟悉自在，而且甚至比他们在伦敦还要感到自在。在 1815 年以后，尽管取得了吸引千百个外国参观者前来的经济进步，但英国仍然与欧洲的生活方式距离很远。

在英国国内，战争和萧条使政治观念两极分化为"革命派"和"保王派"。"皮特恐怖统治"，爱国主义的社团和拥护教会与国王的暴民，将那些原先不过是站在普通立场上的民主思想家逼迫得或者隐名埋姓，或者走向与真正受压迫的组织，如爱尔兰人的和工人

① 斯品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1795年伯克郡鉴于食品缺乏与价格上涨而对工资作出相应补贴的一种办法，后为英国及威尔士各地陆续采用。——译者

阶级的组织相联系的道路。“雅各宾传统”变成对工业和经济变动十分敏感的因素，就像以前对政府的“罪恶”十分敏感一样。这时工人运动的特色是：一种散乱的、变化不定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宗教千年福音主义等各色各样的混合体。这种状况直到宪章运动时都是如此。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统治上层少数人的残酷的现实手段和为加强国家权力、使之高于政治学的契约论思想所施加的镇压的作用，反而从中产生了它自己激进的对手。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彭教派控制的低教会企图使上层人物皈化；但是杰里米·边沁反复阐述的计划也力图这样作；边沁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相信，社会或多或少能够被一些不言自明的与经济学相似的原理所统治。在这些原理中，最容易理解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主张社会活动应当以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目的。作为一个一切“社会契约论”理想的死敌，边沁坚决反对法国革命。他试图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注意他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法律和监狱的改革。他也许比他所设想的更为成功，但困难迫使他成为民主改革者。在1815年，他表示支持普遍选举权。边沁的学生们被人们称为“哲学上的激进派，”他们提出了将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上的连续性结合起来的思想。1815年以后，当他们组织了一些由温和的工人阶级领袖作为信徒的组织时，他们把这一思想提供给主张改革和主张保持政治连续性的双方，由此产生了集中领导的全国性的行动和公众进行干预的理论，这一理论在该世纪其余年代里仍颇有影响。

437

边沁主义主张由地方当局征收捐税并在适当的地区行使行政权力。它们应该受到支薪的观察员的监督，后者向中央部门报告视察结果。这样一来，“古老的腐败行为”和普遍的堕落就可以被遏止住了；地方的责任感也可以维系住了。然而，事实上，官员们仍占居着统治地位。边沁及其助手米尔父子、埃德温·查德威克

可能已转向了民主，但他们并不愿让人民的代表除了投票赞成官府的行为之外，还去作更多的事。毫不奇怪，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英属印度取得的。

法律变成了一种阶级类型。劳动人民通常在法庭上无力进行抗争，丧失了他们的传统权利，行动自由受到了束缚。有产阶级由于惊恐强化了迄今为止没有实际效力的机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部分上是对战争、工业化和压迫等所联合在一起的力量的反应：它意味着对不公平的法律的敌视。在威廉·科贝特的思想 438 中，对"西恩"(未公开的富人敲诈穷人的同盟)并不欣赏，而罗伯特·欧文对它实际上会不理会。即使边沁派的人士也认为一些立法机构是"巨大的罪恶行业"。虽然只有爱尔兰人站出来反对它，但法治的"胜利"就像滑铁卢一样证明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坏东西"。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也许只是因为在一个新的宪法鼓动浪潮影响下，群众希望它能够比较长久地维持下去。

自由之路

> 英国人，你们为何
> 要为奴役你们的老爷耕作？
> 为何要用辛苦和细心
> 去纺织暴君们穿着的衣饰。
> ……　……　……
> 你们蜷缩进地窖、洞穴和茅屋
> 而你们装修的庭堂却由别人来居住。
> 为何抖动着你们所铸造的链条，
> 且看，由你们锻炼的钢铁瞪着你们，光亮闪耀。
>
> ——雪莱：《致英国人》

在1815年后，托利党政府面临着一批新的文学激进派，其中 439

有科尔里奇和华滋华斯。他们的思想由拜伦和雪莱继承了下来。1812至1827年利物浦勋爵的政府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它由小乡绅、医生和商人的后代，甚至一位女演员（例如乔治·坎宁的情况）所组成的。虽然它被谴责为反动的政府（它的一些成员的确如此），但它是站在中右立场上的，在对外关系上是自由主义的（用欧洲复辟时期来衡量），并且在国内抱着和解的态度。但是它继承了一种可怕的战后消沉气氛和工业紧张所造成的折磨人的痛苦，其中特别是必须支付的战时债款和对复员人员的安置。这些问题，很少受到能干的辉格反对派的支持。辉格反对派通过一种新的文学评论媒介和大量群众抗议作品使它深感苦恼。这些作品包括从亨利·赫瑟林顿和理查德·卡莱尔的"免税"报纸到威廉·科贝特牧歌式的激进主义作品和威廉·布莱克的空想的千年至福说作品。地主阶级则坚决要求通过1815年的谷物法继续对粮食进行补助。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秩序的威胁来自新的工业城市，在那里战后繁荣的结束引起了广泛的失业和工资的锐减。工人的思想意识（更多的是他们关于工业的而不是阶级的意识），自1800年以来一直在趋向尖锐化，地方上的政府代表、工业家、治安法官则痛切地感到他们的孤立。

这些乡绅们所常常表现出来的对那些向着他们的大门大声咆哮的雅克宾暴民的恐惧，和某些工人阶级的领袖明显的革命思想，加起来岂不构成了推翻这个侥幸避免倾覆的政权的威胁？如果这些因素互相配合起来，如果发生一个共同的经济原因将工业工人和议会激进派和资本的技术行业都结合在一起，同时，如果统治阶级真的闻风丧胆的话，它们是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但是要达到这种地步是非常困难的。伦敦并不像巴黎那样是一个"绝对的"首都。如果伦敦的激进派要大规模动员起来，那里也没有可资掌握的至关重要的权力杠杆。

伦敦并没有和各个地方一起行动。议会反对派否认暴力行为与自己有关，并表示反对暴力。内政部是在它的实行镇压政策的首脑西德默斯子爵的领导下；它的地方代理人恐吓要反抗——但付出了代价。事态的顶峰于1819年8月16日发生在曼彻斯特，当地方当局命令义勇骑兵队去逮捕在圣彼得广场上大规模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者的时候，士兵转向了人群，11人被打死在“彼得卢。”激进派要求复仇的情绪以及渗透到激进派运动中的政府的密探和挑唆者，对以后几年进一步爆发的事件——苏格兰的织工起义以及在伦敦卡图街暗杀内阁成员的阴谋等，——应该负责。镇压——绞刑和流放——是严厉、野蛮的和有力的，但是在长时期中它却使合法的反抗和对政府的坚决不信任态度得到加强。 440

政府本身对无限制的工业化非常不安。当它逐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克服行政管理的紊乱状况和改革刑法法典时，它仍然是依靠着农业上的利益，对工人阶级的暴力行为则甚感惶恐。瓦尔特·司各特是支持政府的，他对工业逐渐向城市的转移感到惋惜。因为，他认为在乡间作坊中，那些手工场主和依靠他并同他以及他的事业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人们具有值得称赞的影响。他在讲这些看法时，可能是想到了罗伯特·欧文和新拉纳克。欧文在宣传建立自治的工业会社时，要求停止发展工业；同时，通过农耕教育，使农业重新成为一个能雇佣大量工人的巨大的部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适应于从战争结束以来就弥漫开来的社会危机气氛和挽救社会的乌托邦计划。

古往今来的最大祸端，
来自帝王之桂冠，
没有任何东西，像甲胄的铁环，
来把人类本性摧残。
当耕犁用黄金和宝石来加以镶嵌，

和平的艺术品，会受到箭的钦羡。

工匠们并不需要懂得他们的天才人物威廉·布莱克的宇宙论以便赞赏他所作的启示。对许多人来说，未来必定会像19世纪20年代中叶流行一时的约翰·马丁①巨大而细致的、教诲性的绘画所具有的启示性。

不过辉格党对政治斗争的贡献是足够有力的。1820年，乔治四世企图和他的王后离婚，使王室的丑事外扬。《爱丁堡评论》的一个主要撰稿人亨利·布鲁厄姆为维护王后卡洛琳（她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殉难者）而同国王和大臣斗争。这得到了公众的一片称赞声。1822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自杀。卡斯尔雷曾使英国与以梅特涅为代表的保守强国脱离关系。对利物浦政府的更加自由主义的一派大臣们来说，他们施展抱负的道路已经敞开了。

继卡斯尔雷为外交大臣者为乔治·坎宁，他在1823年与美国总统门罗站在一起保护南美洲的一些新的共和国，同时，这也为英国的利益获得一个广大的市场。两年以后，内阁废除了六点条例②和反对工会的立法，1826年停止了邓达斯家族对苏格兰的"管理"。威灵顿公爵政府在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这届政府对由丹尼尔·奥康内尔所巧妙利用的爱尔兰舆论表示让步，并且当1828年奥康内尔作为克莱尔郡代表当选为议员、出现了全国性起义的威胁时，也表示让步。不过，由于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徒，所以他被拒绝担任议员席位。

现在只剩下议会改革等待着去实施了。这直接牵涉到一个党派问题。压力集团——工会、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可以用法律让步来加以收买。但是改革将意味着辉格党的胜利，意味着辉格党

441

① 约翰·马丁(John Martin，1789—1854) 画家，常创作遭受大火或洪水毁坏的画面，以显示人类在灾害面前的痛苦挣扎。——译者

② 六点条例(Six Acts)，1819年彼得卢屠杀事件后，议会通过的六项法案，旨在镇压激进主义运动，其中包括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等。——译者

在控制议会和官职授予权上的胜利。1828年，威灵顿公爵在“极端分子”的压力下站稳了脚跟。但是在第二年，这些极端分子由于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而和他分手。与此同时，在乡村的鼓动逐渐增长，辉格党人在鼓励他们的激进派的对手方面无所顾虑。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辉格党在格雷伯爵和约翰·罗素勋爵领导下，在选举中获胜。当他们的改革议案被上议院拒绝后，组织良好的“政治联盟”在城市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骚动者袭击了诺丁汉堡和位于布里斯托尔的主教殿堂，这两个地方都是反对改革的上议院贵族的所在地。在梅瑟的骚动后，接着就是处死工人领袖狄克·彭德林。1832年4月，上议院屈服（以9票之差），使格雷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格雷政府在另外一些方面显示了它的保守性质，它野蛮地镇压了英格兰南部农业工人的不满表示——“斯文上尉”暴动。

应付改革

尽管改革鼓动具有近乎革命的性质，1832年的法案仍将那些最具潜在困难的工业和商业权力因素结合到了一起，但此外几乎再也没有了。苏格兰的选举人从4579人增加到64447人（增长了1407%），但爱尔兰的选举人只增加了21%。41个英格兰最大的城市，包括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和伯明翰等，第一次获得了名额，但是英格兰的城镇选区的平均面积（这些城镇选出差不多658个代表中的一半代表，即324人），仍然在900人以下。伯明翰的349个选民选出的代表数目仍然像里兹的4 172个选民选出的一样多，英格兰占英国人口总数的54%，选出下议员71%的议员，在1832年以前，它选出的下院议员占74%。“实际上代表”是代表权益而不是代表人民，这个原则仍然保留着。在以后大约半个世纪中，议会继续为地主势力所统治。

有些保守分子现在害怕边沁派对贵族和教会的攻击。但是，议会中空谈理论的人很少，辉格党人的改革热情也已很快消失了。人道主义者在1833年取得了成就，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工厂视察员制订了在纺织厂中关于童工的规章。1834年关于济贫法的修正条例（它的拟订者埃德温·查德威克认为它是在制度上和经济上重建英国地方政府的基础）仍然是一个孤立的文件，它受到人民的痛恨，就像它的象征，即巨大的联合劳动所或“巴士底狱”受到人们的痛恨一样。

《泰晤士报》也大声谴责新济贫法，不过，它感到哲学上的激进主义也许已走得够远了。1834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爱尔兰一度比较平静，辉格党努力和奥康内尔达成谅解，这一谅解在今后延续了10年。但是在英国本土，仍然处于开始阶段的工人阶级的“交替社会”已达到了最高点。在像约翰·多尔蒂等人领导下的工会的发展，“免税”的廉价出版物上的言论，激进派在改革法案上所遇到的挫折，罗伯特·欧文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等，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产生了建立一个英国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计划，它将会通过一个“全国大休息日”即大罢工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此后，社会应该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加以改建，按照劳动时间多少来计算金钱价值。3月间政府进行反击，6个多塞特工人被判刑——托尔普德尔殉难者①。工会联合会进行了太多的抗议和罢工，以致它们的组织者无法使之互相配合协调。8月间欧文退出，实际上，运动这时就结束了。10月16日议会偶然地失火焚毁，如果6个月之前发生这样事的话，那就可能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了。

地方政府进行改革时，辉格党的胜利真正到来了。苏格兰的市议会，迄今为止都是自行选举的，在1833年实行纳税者选举制。

---

① 托尔普德尔殉难者(Tolpuddle Martyrs)，1834年，6位多塞特郡托尔普德尔的农业工人因令人宣誓加入工会而被捕并被判刑，从而激起全国的抗议。——译者

两年以后，英格兰的城市进行了改革。在较大的城市中，辉格党人和激进派得到了官职，一般来说，他们都保住了这些职位，但是，政府却严重分裂了。1834年11月，在皮尔领导下的，多多少少还在改革体制中工作的托利党人取得了政权。但好景不长，1835年辉格党人重新当选，不过他们是在非常保守的梅尔本的领导下。当他们在1841年失势以后，皮尔似乎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渐进改革的精神，这种渐进改革姿态也是年轻王后的丈夫，那个严肃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贝特所具有的。

然而，皮尔却在两个方面受到威胁。工场主害怕利润跌落，要求降低工资，他们认为只有面包价格降低才能做到这一点（面包是工人的主食品，工人平均每人每周吃五磅面包）。这只有在允许谷物自由进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必须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由于辉格党的没落而受到挫折的激进派攀附于当时流行的思潮，并掌握其控制权。理查德·科布登是个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利益的并不很成功的棉花商；约翰·布莱特是个贵格会徒，罗奇德尔的地毯制造厂厂主，詹姆斯·威尔逊，是苏格兰的一个新闻记者，1843年创办了《经济学家》杂志；这些人成了1838年10月在曼彻斯特会议上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人物。这个同盟既代表了、也部分地创立了具有商业头脑的个人主义的中等阶级——即德国人所称呼的（至今仍这样称呼）“曼彻斯特派”。他们靠请愿、示威、动员非国教徒、充分利用新的廉价邮政，创造了一个广为传播的反对土地贵族、同时反对皮尔本人的敌对气氛。

皮尔事实上在国家财政上遵从了政治经济学上一些训诫：进口关税大大降低，英格兰银行重新改组，允许铁路有自主的企业首脑（尽管商务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个人偏向于主张立刻实行国有化）。但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成员怀着极端愤怒的心情来行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强大是依靠不断增长的反叛工人的力量。一个 443

极端反正统的曼彻斯特棉花厂主、年轻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注视着那些不满分子冲破着工厂墙壁的接连不断的浪潮，并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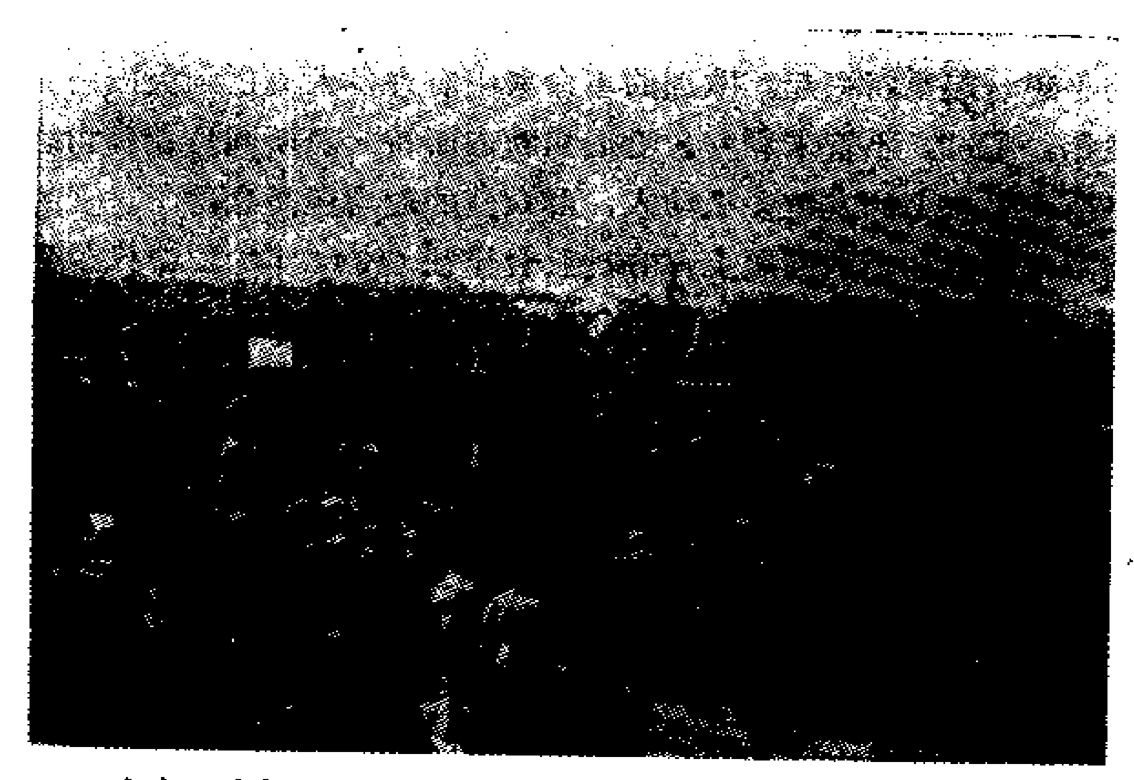
> 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楚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①

恩格斯所选择的论据是经济萧条的最终后果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

1848年一个伦敦的清扫工告诉亨利·梅休，他是社会观察者的先驱，说："我并不关心政治，但我是一个宪章派。"人民宪章，包含了有名的六条——成年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平等的选区，废444除议员财产资格限制，议员支薪，每年改选议会——这些要求达到了与法国革命和丹尼尔·奥康内尔在爱尔兰所进行的运动同样的直接影响。但是对一个广泛的、复杂的、具有浓厚地方性质的运动来说，它只产生了表面的暂时性的团结。从形式上看，它是非常民主的（虽然只考虑到了男子，只是偶而有人提到妇女选举权）。宪章运动之最引人注目的全国范围活动仍然是短命的，只从1838年延续到1842年。但是宪章派的组织、异端思想，散布到受到地方经济苦难、政治传统和领导人性格等影响的地区。"物质力量派"和"道德力量派"领导人之间原有的分歧，因对当前的政治党派、饮酒、爱尔兰财产、教育等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更趋复杂。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米德兰地区，宪章派的领导机构产生于从事零星小企业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50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译者



宪章运动者最后一次大示威（1848年4月10日于肯宁顿公地）

的小商人和职业人员。约克郡的宪章派在严重的失业现象和新济贫法影响下，具有较强的战斗性。但是他们参加了托利党的工厂改革运动。威尔士工业区的“边界城市”过去就发生了许多“通过骚乱讨价还价”的事件，因而，1839年11月4日在纽波特发生大量抗议运动可能并非偶然；这场运动最后以同军队的流血冲突告终。14人被打死，但接着而来的审判并未对起义者处以绞刑，而是把他们流放到大洋洲的塔斯玛尼亚岛。 445

与1831年时的梅尔本或1819年时的利物浦相比，皮尔更为人道和老练，他的政策成功了。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趋于低落；它在1848年的复兴，更多的是反映了爱尔兰的痛苦而不是反映英格兰手工匠的希望，也不是由于任何想仿效欧洲事件的愿望。后来的宪章运动更富有试验的性质，而且互不统一，同时它还更具有爱尔兰的色彩。费格斯·奥康诺设计了一个

殖民计划。欧文派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那些自欧洲革命家摘取来的思想一起重新兴起。欧洲的革命家中有许多人流亡到英国终其晚年。不过，不管朱利安·哈尼和欧内斯特·琼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友谊多么动人，群众性的运动还是衰落了。老的宪章主义者在个别问题上，如戒酒、合作社（1844年的罗奇代尔先锋①商店就是起源于宪章运动的）或工会等问题上仍然很活跃。另外一些宪章派迁居到国外，很多以前的宪章派后来十分体面地参加了维多利亚时期中期的地方政府。

"除非上帝建造了这座城市……"

1832年一次可怕的霍乱流行病从中东掠过欧洲，大约使31 000英国人丧生。1833年议会投票通过拨款30 000镑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同时，约翰·基布尔②在牛津布道时宣讲了"全国背教行为"。这些事件仅仅是同政治改革偶合在一起（议会花在温莎城堡的时间和金钱比它在教育经费上花的更多），不过这些事件仍是重要的，它们决定了此后国家所要采取行动的方向，以及早期维多利亚人在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合理化时所要采取的方式。

446

虽然霍乱的影响在乡村中也是致命的，它使迅速发展的城市的问题更加激化。新的工业城市都只有较小的范围，人口密集，普遍地都是步行上班。对城市土地的利用根据经济力量而定。为数众多的小资产所有者阶级，在棉纺织业城市中占人口比例的5%左右，但是常常占据50%的土地面积。工人仍住在被工厂、道路、

① 罗奇代尔先锋(Rochdale Pioneers)，1844年一群工人在罗奇代尔开办的合作商店，这是近代合作制运动的先驱。——译者

② 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英国国教会教士、神学家。他在1833年7月14日在牛津布道时宣讲了"全国背教行为"，主张消除英国国教中的新教因素，恢复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传统，反对议会对教会的监督。这次布道标志着宗教界的"牛津运动"(1833—45)的开始。——译者

运河，后来又有铁路等所占据的附近地方。这些地方非常脏（19世纪的城市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对工人来说，不论从租金或从人的生活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一间勉强能住的房子要花去一个熟练工人一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经常付得起这样的费用。结果，不仅在旧城区如伦敦的贫民窟、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地窖、苏格兰城镇的套房建筑、梅瑟蒂德费尔的“瓷器区”等处的贫民窟迅速扩大，而且地主和颇具心计的建筑师们又在特定地区建筑了一些贫民窟样式的居住区，如约克郡的“背对背”式的和很小的“房间加厨房”、或“单向”公寓等。1870年时，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居住在这些公寓中。

如果说住房很差，那么卫生状况则更差。生活水平稍好一点的公民能够联合起来创办委员会来建造供水和排污系统、街道照明设备并提供某种维护社会秩序的组织。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还能起些作用的话，那么它们使他们的较贫穷的邻居的苦难更加恶化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新的盥洗室常常会将污水排到工人阶级的供水处。

流行病是工人阶级所作的报复。被仆人、商贩等所组成的（这些人通常是商人们所忽视的）非常贫穷的群众所环绕的富人们，突然变得非常容易受疾病感染。例如，未来的坎特伯里大主教A．C．泰特的7个子女中有5人于1856年在卡莱尔死于猩红热。1831年政府强迫地方上的贵族为临时的卫生部提供帮助，以便同霍乱作斗争。1840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对由于养活家口的当家人的死亡和健康不佳等而陷入贫困境地的人非常多而忧虑，他代表济贫法委员会指导编订了一个《劳动居民卫生状况调查报告》，于1842年出版。由于这一报告以及后来的宣传鼓动，更不用说爆发另一次暴乱的威胁，政府在1848年制订了一个条例，授权市政当局建立地方卫生局，隶属于三个公共健康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查德威

克自己的。除边沁派之外，别的力量也动员了起来，有些是宪章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但托利党人、专业和慈善人士可能更多。从整体来看，这一运动在阿什利勋爵身上得到典型的表现。这个未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可能是一个具有偏见的低教会的托利党人——麦考莱提到他的风格时说它是“埃克赛特大厅的嘛叭”，但是他继承了威尔伯福斯操纵公众和上层人物舆论以取得有力的政府干涉的技巧。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种技巧被用来帮助矿工、447 工厂工人、贫穷的移民和贫民窟的居民。有些人曾争辩说，行政管理的改革是由它自身取得动力的，既和议会行动也和舆论无关。“托利党对历史的解释”（正像这种观点有点不确当被称呼的那样），把官员们（“位居高津的人”）的力量和像阿什利那样的热心人创造法律的行动，与议会对社会状况的冷漠无情作了对比。但是这不过是对改革进程具有偏见的一种解释。官员中的行为标准在各部之间和个人之间是互不相同的。有些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另一些人则反映了恩赐的文官职务的安闲舒适风气。安东尼·特罗洛普，他作为邮政局的高级官员，仍然有时间每周两次去打猎，并且每年写出1.7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三个书记官》(1857)。小说中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未经改革的文官制度死气沉沉的图景，同时还反映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文官制度改革者的反感。

这时，既是“地方自治”也是专门职业演进的黄金时代；它的最强大的发端来自大城市，同时也来自大批在苏格兰受过训练的新一代的医生，这些医生正在从简陋的外科、药剂师向独立的职业转变。利物浦在1847年任命了第一个保健医官，一年以后，伦敦城区这一充满各色各样社会危险的“一个平方英里”的地方，任命了生气勃勃的约翰·西蒙医生为保健医官。到1854年，保健医官成为必须任命的职务，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

过份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工业社会带来了教育组织的问题。人们对此意见不一，[448] 低教会的汉纳·莫尔认为要反复灌输宗教，但要保持秩序，儿童就应该学读书，而不必学写作。亚当·斯密害怕劳动分工会使工人阶级智力降低，企图用国家教育来对此加以补救。虽然作为加尔文教教会改革的一个结果，这个办法在苏格兰实行了，但英格兰没有同样的措施。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前，文法学校出现了，它们大多起源于宗教改革以前，此外还出现了独立的或“冒险的”学校及慈善学校。这些学校在质量上有很大不同，它永远不能适应人口日益增多和年轻化的情况，更不用说不能适应新的城市地区并提高水平了。然而，1800年左右，舆论——甚至包括乔治三世，转而认为教育是预防革命的手段，它部分地通过一种新的、廉价的和诱导的教学形式，实行了兰卡斯特和贝尔的“导生”制，即年长的学生以死记硬背的办法学习功课，然后，再教他们年幼的同学。这直接导致了1808年英国和外国学校学会和1811年全国学会的建立。不过，这两种全国范围的计划，是伴随着他们的受尊敬的非国教的倡导人与国教会之间敌意日益加深而来的。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中，宗教的宗旨仍然优先于教育的准则。

在拥有基金的即“公”学的改革所引起的宗教冲突，是属于英国国教内部范围内的，并不太强烈。在18世纪的最后年代，学校的状况特别恶劣；不过甚至在激进的广教派教士托马斯·阿诺德①1829年开始他在拉格比的活动之前情况就有所改善。阿诺德的改革，事实上是和1832年的本质上是保守的政治措施相平行的。不过，它维持的时间较长。“文科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仍为

---

①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mold)，19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家，认为教育应鼓励学生进一步学习；1828—1842年担任拉格比学校的校长，在提高公学的教育水平上起了很大作用。——译者

一些大学最主要的指定课目，不过它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年轻贵族毫无意义的仪式变为通过奖学金来竞争考试的课目，而在牛津和剑桥则成为中年级学生争取研究生地位的课目。它们的目的是为取得职业提供资助，但是，其功能却更具有深刻意义；作为引导别的孩子们从商业性中产阶级转向地方贵族的健全价值观方面去的先导。1842年阿诺德去世时，他的办法已被别的较古老的公学所仿效，同时，铁路系统的不断扩展和托马斯·休斯在1857年所写的《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一书也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对公学的改造，为新一代的改革者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在这里受教育的。和边沁派人士不一样，他们没有制订高度完整的纲领，而是设法去把只适于贵族和英国国教士的机构转变成为为整个社会服务。这种"国有化"的理想和它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即工人阶级与"政治社会"的"结合"，在1848年由基督449 教社会党人F.D.摩里斯的追随者（包括汤姆·休斯在内）力图把英国国教变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仲裁者的努力中表现了出来。他们并不是没有知音。在布莱德福德，一个年轻的激进的羊毛制造厂主（原为贵格会教徒）威廉·爱德华·福斯特写道：

> 除非对这些群众作一些让步，同时除非是所有的阶级真诚地竭力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否则，迟早将会有一场动乱；不过，我相信，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的政治方法，乃是由中产阶级对发动者表示同情，同时，给他们以权力，并通过帮助他们实现那些合理的要求来反对那些不正当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的阿诺德的女儿，马修·阿诺德的姐姐；她是学校的督查员、诗人和具有高深思想和温和改革的"知识贵族"，业已由福音派宗教转向了政治活动。

阿诺德、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派亦即自由的英

国国教传统，他们的原则是把宗教看作是国家的合作者；对这种关系，神学教义必须严格遵守。低教会夸大宗教的功能，但是，他们的简单的神学理论正在自由主义的攻击下渐渐消亡，这种攻击在1832年改革时达到了顶峰。教士们担心边沁派思想以及无神论改革的思潮会泛滥成灾；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布道时宣扬对上述现象进行教会的抵抗，这种抵抗，要建立在英国国教使徒传统基础上。鼓吹复兴天主教的牛津运动并不是要通过社会改革或通过"高教会"的仪式来反对自由主义。它是保守的，在思想上向往英国国教传统；12年以后，即1845年它分裂了。当时它的一些领袖，包括约翰·亨利·纽曼(部分是由于对低教会迫害的反应，部分是由于纯粹的思想信仰原因)，决定他们和罗马天主教保持一致，并"转变立场。"虽然他们敌人的宣传是另一个样子，但是牛津运动的目的却是，既通过虔诚的世俗人士如W.E.格拉德斯通，也通过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来加强英国国教主义。广教派是立足于承认宗教具有更大社会意义上的，当事实说明只有不到1/5的英国人参加他们的教区教堂时，它就处于困难的境地了。1851年举行的独一无二的宗教普查表明，英国人口中只有35%参加星期日礼拜，并且一半是在非国教的牧师领导下进行的——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在1848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广教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了很大努力想接近工人群众，但是每一个工人都信任工人组织的领导人F.D.摩里斯，很多工人也受到摩里斯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的影响，有更多工人事实上受到J.M.勒德洛在工会方面和E.V.尼尔在刚刚开始的合作运动方面所做工作的帮助。

英国国教会至少保有一种传统、财富、以及反对不信国教者的广阔的行动余地。由于他们分裂为许多派别并受到统治阶级的怀疑，因而他们的一些领袖——比如著名的卫理公会的杰贝兹·邦廷——就试图通过他们的保守主义来把他们自己团结起来。政 456

治上的激进主义一般是农村或矿区的不信国教者（南威尔士变化更为剧烈），或者是城市上层分子诸如一位论派和贵格会教徒等的标志。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反对谷物法的运动取得胜利之后，非国教的力量才减弱；以后它使自己与自由党保持一致，同时要求改善他们的公民地位，或者（在1848年建立的“自由社”纲领中）要求解散国教。有组织的非国教思想开始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主要的（也是颇为困难的）作用。但是富有的不信国教者一个个陆陆续续地转到了英国国教会方面。这使不信国教者损失了许多宝贵人才。

在苏格兰，关于圣职授予权问题的争论在1833—1843年的“十年冲突”时期达到了顶点，直到苏格兰国教“分裂”和创建了一个新的“独立教会”时才终止。教会的世俗作用很快降低了——1845年法定的济贫法生效——但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宗教政治继续困扰着苏格兰的中等阶级。

变革的环行道

不过，即使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19世纪40年代仍然是危机的十年。英国的工业仍然是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市场有限，并且受到美洲、欧洲日益激烈的竞争。工业投资过多，每采取一个新的发明，都意味着资本回收的减少。每一次商业萧条都比过去更尖锐、更长久。实际工资只是缓慢地增长，也许还不足以对付急剧下跌的手工业行业和城市生活高昂的必需生活费用。卡尔·马克思通过他的工厂主朋友恩格斯的描绘对英国进行了综述，认为这种现象是到处存在的。资本主义注定要在它本身的资本剩余积累中窒息，它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低工资的工人，将在下一次经济萧条中，坚决地起来反对它。他应该会附合雪莱的指控的，

451

像睡醒的群狮一样站起来吧，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落在身上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事件似乎使人们可以感到革命越来越近。1845—1846年和1848年马铃薯的病虫害破坏了当地人口增长的基础。从1845年到1850年之间由于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达一百万，有两百万人在1845至1855年间迁居国外。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准备在远低于英格兰正常工资的条件下作工。这已被看作是一支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39)中写道：

> 每一个摘下统计的眼镜仔细观察的人，都可以发现在城市和乡村……英格兰的下层工人群众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于同他们在所有市场上竞争的爱尔兰人……

这种情况所以没有发生，主要是由于工业的急剧发展，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并把它们转到了新的更多样化的经济中去了。它的最主要的、在心理上也最为引人注意的工具是铁路。

各种原始型式的铁路从17世纪初以来就把煤从矿区运到港口或河道；到1800年大约有200英里的以马为动力的车轨散布在全国各地，轨距和型号也多不相同，用的是木制的轨道，后来才用铁轨。从18世纪70年代起用铸铁，从90年代起用更为安全可靠的锻铁制的"侧立护轨"。蒸汽牵引这时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低压力的固定式发动机，它在斜坡上牵引车厢；另一种是轻型高压力的"火车头"发动机，它在铁轨上行驶。1804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在威尔士展示了这种火车头，它很快被北方的煤田所采用，在

那里，乔治·斯蒂芬逊等"观察者"建造了大功率的优质铁路，因为在1800年至1825年间煤产量增加了一倍，优质铁路的需要使马拉的车厢的运载量过度紧张。到1830年，全英国由议会批准建造的铁路已达375英里。

19世纪20年代中叶的商业繁荣，又一次刺激了铁路建设，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都兴建了铁路。在1820年至1830年间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曼彻斯特的居民人数增加了47%。对上述

452 棉花和人员的运输的要求，受到布里奇沃特运河垄断权的阻碍，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竞争者与之竞争。现实的需要几乎超出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只是在它完成的前夕，同时在公开竞争的压力之下，一个有足够功率的火车头才由斯蒂芬逊制造了出来。获得奖金的"火箭"号（1830）机车与流水作业线"专利者"号机车（1834）之间的区别之大，就像"火箭"号与它的拙笨的、但比较稳当的先行者"运动"号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此后机车的设计在半个世纪之中未发生变化。

在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发展受到另外一个兴盛的投机事业的刺激。1840年，大约2400英里的铁轨将伦敦和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布莱顿连结在一起。有些路线颇为兴旺，另有一些路线则因投资过多或遇到了劳役农场和法律诉讼而遇到了困难。在最初的日子里关于合股公司的规章很不充分，同时广为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有些人成功地将"纸片（股票）变成了黄金"。乔治·赫德逊这个"铁路大王"就被说成是这样的人，他在1845年时控制了1/3的铁路。赫德逊通过用为建立新支线聚集的资金支付现有路线红利的

455 办法赚取了诱人的利润，当19世纪40年代巨大的狂热（他为这一狂热的兴起也出了力）在1848年消减下来的时候，他受到了攻击并逃到国外——不过他是在铁路里程已达到8000余英里、铁路网已从阿伯丁延伸到普利茅斯以后才逃走的。

但是铁路时代也产生了它的英雄人物，自学成才的斯蒂芬逊和他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罗伯特、诺瑟夫·洛克、丹尼尔·古奇和学识渊博的伊桑巴德·金登·布鲁内尔等。布鲁内尔的大规模的计划：7英尺宽轨距的大西铁路，铁制的和螺旋桨的汽船先驱“大不列颠”号，和18000吨的海上怪兽——“大东”号汽船，既使公众感到着迷，又使他的不幸的财政支持者感到害怕。G.K.切斯特顿可能会问道：“是什么样的诗人，将如此巨大的弓形物射向了星球?”这样一些人，卡莱尔把他们称之为“工业的首领”，是比棉花厂主更具有吸引力的企业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后来把他们形容为“自助”的模范。

这种新的运输系统是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创建起来的，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现代建筑技术的情况下建筑起来的。筑路工人（据说1848年时有25万人在工作）靠啤酒和面包为生，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地面工程，这些工程是早期英国铁路的象征。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人形象是悲惨的工厂中的奴隶和饥饿的棉纺织工人。19世纪50年代时，壮实的工人从事劳动，他们在6个月中建筑了水晶宫，他们又被用船运到克里米亚去建筑无可匹敌的军事设施（建铁路、军营）。铁路花去了空前多的金钱，无论如何，到1849年时，投资的数目不下22.46亿镑；尽管到1859年投资上升到24.4亿镑，铁路一直只是一种中等的、比较可靠的投资项目，但从有些公司来看，情况远非如此。直到1852年，他们从乘客中所赚取的钱远较货运为多，以后的货物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运河那里一步一步地收买过来的。运河的所有者，迄今为止，得到的利润不断猛增，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在竞争中变穷。到19世纪50年代，运河网中的主要河段已被铁路所掌握，交通很快地转向了铁路。这时，在工业成长过程中最富有生气的部门里，曾被亚当·斯密谴责过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已成为事实。

政治和外交：帕麦斯顿的年代

铁路的繁荣是和政治上的急剧变化同时发生的。1842、1843和1844年的收成较好，粮食充足，粮价低廉。但是到了1845年，由于天气恶劣，收成很坏，第一次的病虫害袭击了爱尔兰的马铃薯收成。反谷物法同盟的意见似乎已经得到证实。皮尔企图在内阁中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但遭到失败并辞职了；只是当辉格党无法组成新的政府时，他才又组织了政府。他于1846年提出，在三年中废除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的措施。这样他就通过资助济贫法和地方警察而赢得或者说他希望赢得乡绅们的支持。但是他的党严重分裂了；当他在5月间因压迫爱尔兰的问题而受到指责时，只有少数人支持他。在下一届选举中，罗素重新当选并组织了一个辉格党政府。此后，辉格党和后来的自由党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由于皮尔派的上层人物，包括格拉德斯通、阿伯丁和詹姆斯·格拉海姆爵士等转到了辉格党方面，托利党的乡绅们现在发现他们处在辉格党的德比勋爵和乔治·本廷克勋爵和狂热的前激进派本杰明·迪斯雷利领导下。托利党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是坚定不移的，然而，在此后的30年中只有5年执政。

456

有一种更高程度的政治派别管理方式，这就是以圣詹姆斯俱乐部、改革俱乐部和（托利党）卡尔顿俱乐部为中心的新的俱乐部。上述俱乐部都是在1832年建立的。不过，如果认为这就是从左向右逐渐转移的政治，那就意味着是用后世的评判标准了。这时还没有全国性的政党，正像政党还没有纲领一样。公开的演说很少。政党领袖们——主要是辉格党的地方官，只是在选举开始的时候（每7年举行一次），对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常常是他的亲属，给以一些关于政策方面的暗示。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到拥护他的选区去旅行，发表演说，向地方上的贵族拉选票，只有在得到足够的支持

时，才“前往投票处”。

庞大的费用使竞选成为例外而不是常规，地方贵族在他们的许多残存下来的“口袋选区”中仍有牢固的地位。在投票时（投票是公开进行的）如果反对，比如说反对伍德斯托克的布兰赫姆宫，那对一个地方上的农民或小商贩来说，自然是等于自杀的行动。同样，各个郡仍由大家族统治着。中等大小的选区比较开放，但是费用很高，这里的选民有时达到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所描写的伊顿斯威尔城的腐化的程度。新近获得选举权的六城市有时可能选出活跃的或贫穷的代表。麦考莱成了里兹城的代表。但是更多的是选出地方上的企业家，这些人通常可以担负得起竞选花费。不管怎样，有些事情到今天仍然是很熟悉的：英格兰比较保守，而“克尔特系外缘”则比较激进。

虽然1834年威灵顿短暂而小心翼翼的政府证明它是一个公爵担任首相的最后一次事件，但是政府仍是属于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辉格党人正如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反映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尽管辉格党人上升为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在很多场合还是新近的事，这是由于上层人物的变动而引起的。皮尔和格拉德斯通两人都是牛津大学的优等生，都是刚从地方上工商业近来的一代人；更令人注目的是本杰明·迪斯雷利，他是个冒险家和小说家，是从一个其成员只在1860年才获得政治平等权的教会出身的。

政府大臣们很少花时间去考虑国内的立法，但却用了很多时间考虑外交和公用事务；这不足为奇，因为后者要占1/3的预算。从1815年以来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发生变化。海军在1822年购买了它的第一艘名为“猴子”号的汽船。1828年，海军很不情愿地又预订了几艘。海军大臣觉得“使用汽船是意图对帝国的优势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使用船桨就意味着舷侧炮将被丢弃，而帆船则可以多年保存在军港中。因而德文波特在1848年还将三层甲板帆船 457

张满风帆下水，不过利用螺旋推进器作动力的小船比以前帆船作舰队时代的数量更多。由长期服役的大约13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在1830年时42%是爱尔兰人，14%是苏格兰人），待遇很差，给养恶劣，由这支军队维持爱尔兰和殖民地的治安。在许多小战役中，这支军队在印度和1839—1842年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提高了英国的势力和商业影响。不过这时它是为自由贸易的商人而不是为了势力已减退了的特许公司而战的。

英国从欧洲的竞争中抽出身来的情况在外交上也反映出来。在拿破仑失败之后，欧洲保守的领袖们，首先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试图通过主要大国的协商会议来建立合作制度。但是甚至到1848年，英国的外交家宁愿以传统的权力平衡的方法来寻求安全，即便这意味着要使法国恢复起来以与俄国抗衡也在所不惜。尽管在1830年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了荷兰、并且似乎将落入法国势力范围时，英法协约一度有些混乱，但从这时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一个暗中的英法协约。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是让比利时中立，并成立了一个与英国关系密切的王室，这一切都由伦敦条约(1839)加以保证。到1914年8月德国破坏了该条约时，长久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

458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其他问题比较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日益衰亡中的土耳其帝国有关，英国想以土耳其为在巴尔干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屏障。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人物是帕麦斯顿，他在1830年46岁时才迟迟进入外交界，他自己躲在白厅外交部的污秽的院落内（外交部在鼎盛之时，也才有45个职员），在那里作为一个握有统治权力的人物一呆就是30余年。他是一个具有侵略精神的爱国主义者，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个自由派。然而，在1847年，欧洲最受欢迎的英国政治家不是帕麦斯顿而是科布登这个自由贸易的信徒，他在一个首都接一个首都受

到宴请，而接待他的主人们对一件事是深信不疑的：保守的君主制注定寿命不长，自由主义的日子很快即将到来。

在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他们以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名义预言，一个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欧洲革命即将到来。2月24日巴黎起来 456 反对路易·菲利普，然后柏林、维也纳、意大利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也爆发了起义。但是英国并未随之而起。当宪章运动在4月14日把他们最后一个大请愿书送到伦敦时，10000名特别警察被召集上岗就位。内政部在那个星期把电报都收买了。实际上，警察在内心中比宪章派还要不满，这正像在大陆上是中产阶级的志愿人员作了起义的先锋。但是警察的忠诚是绝对可靠的，对他们来说，革命是在别的地方发生的某种事情。宪章运动者在肯宁顿广场散去了：议会用耻笑拒绝了请愿书。

但是1793年的事件没有重现。巴黎的共和政府要求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坚决地反对它自己国内的激进派，并且不向国外输出革命。帕麦斯顿并不想改变力量均势，但他宁愿支持立宪制的政府并希望奥地利从意大利撤出。这种温和方针很难成功；英国不能将自由党在短期内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保持下来。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而得到农民的支持，同时又得到俄国的帮助——它镇压了匈牙利，使奥地利可以在别处自由行动——旧制度又重新掌权。但是奥地利这时已筋疲力竭，俄国则为了统治东欧而苦恼。

结社

谷物法的废除，1848年紧急事变的处理，铁路的迅速发展。这些都不仅使经济情况充满了希望，而且政治上的一致性也有助于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巩固。农业利益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耕作的效率却使它能够平安度过外国的竞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认识

到，它必须和旧的上层人士合作以控制工业工人，又要对后者作充分的让步以避免政治上的爆炸事件。在这方面（特别是与纺织业相比），铁路、汽船和电报对工业化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并且是迷人的、富有吸引力的。它们起了把土地、商业和工业都结合在一起的功能。它们也特别地使律师们富裕了起来。

到19世纪50年代，法律“收编了”工人阶级——至少是他们的领导成员。熟练工人如工程师和木匠等组成了“新模范”工会。他们并不迫切要求国家的干预，而是要求契约上的平等。他们不是通过公开的示威而是通过对议会中两个政党的议员施加外交压力来发挥作用。他们的入会手续和会场的画像，都与以前那种近乎阴谋性的社团的严格按条文进行宣誓和神秘主义不同，而是关心捍卫他们自己处于工人阶级最上层的尊严。

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都在走向“结社”思想。古典政治学含有破坏性的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手中，仍然如此，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功利主义与激进的改革和对温和的工人阶级领袖的同情加以调和。穆勒很惊异地发现他的《逻辑学》和它从法国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中借来的实质性东西成为旧大学的正统学说。但是该“理性主义的圣哲”本人却对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充满热情，并大力去把功利主义、伦理上的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糅合在一起，以便使担任现职的改革派人士能够接受。这些担任现职的人在19世纪中叶左右在思想水平很高的文学评论中大加宣扬上述思想。

在准备进行政治合作的候选人看来，“法治”远非绝对完善。A.V.狄西① 把他自己在19世纪60年代写的那句话用来描述19

① A.V.狄西（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牛津三一学院研究员，19世纪后期政治争论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竭力反对爱尔兰自治，写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译者

世纪的政府。“约翰·史密斯如果是以约翰·史密斯的身份出现，那么他将是禁止不住的，但是如果约翰·史密斯是以一个手艺人的身份出现的话，那么就可以禁止得住了。”但是，他希望扩大选举权将会消灭这种不平等；整个来说，这一点做到了。

那么，现在谁还处于“法律之外”呢？爱尔兰人受到深深伤害，“废除英爱联合”是奥康内尔对下一代爱国者的要求。虽然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像苏格兰人一样渴望在英国的现有制度下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但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则由于饥荒而变得更具有进攻性；他们还指望能得到移居美洲的苦难同胞的帮助。移居殖民地的人民可能由于他们将英国制度移转到殖民地而感到自豪，但是殖民 481 局清楚地知道，移民们关于法律的观念并不包含给当地居民以权利。高教会和低教会的人士们对法庭实行广教会的笼统的无所不包的规章不满。他们不能够把它废除，但是能够经常地对维多利亚城市的高楼大厦建筑和宗教虔诚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们接受了关于政治和社会进化的观念——坦尼森的“循序渐进逐渐扩展的自由”——这比1859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要早很多年。托马斯·卡莱尔虽然并无自由主义的朋友，但他对自立的称赞和他的伦理学的作品给了个人主义几乎是宗教的性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成了维多利亚中期自由党的支柱，只有当他要求将“结社”扩大到被政治忽视的占居民人口1/2的妇女时，他才显得有些反常（妇女的公民权和法权平等地位只是在1880年才开始加速度地发展起来）。有两个麻烦的知识分子很难制服。约翰·拉斯金是“牛津的毕业生”，他的《现代画家》的出版是1843年轰动一时的事。这书把对贵族的尊重和对经济以及环境的日益增长的破坏性观点结合起来。虽然它的直接的政治影响与罗伯特·欧文的政治影响比较起来非常微小。没有任何人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猛烈的抨击法律的拖延和不平等，然而，却没有

人对革命和不法行为更为担心。在狄更斯的著作中，“拖拉衙门”、班奈克里斯、贾恩戴士家族互控等，与斯莱克布里基、狄法吉夫人和贝尔·赛克斯等形成对比。不过总的说来，A.V.狄西把狄更斯与沙夫茨伯里相提并论，都作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是正确的。

好斗的不信国教者和旧的激进主义有他们自己的与现制度远不相同的世界观。但是，当局的触须伸向了他们。19世纪40年代中等阶级阅读诸如迪斯雷利的《西比尔》之类的“工业小说”，他们对大城市中的状况非常焦虑和关切，试图将他们的问题拟人化并使之与个人的道德观念相调和。但是加斯克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查尔斯·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却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保证，他们的英雄人物的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迁居国外。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曼彻斯特进行了猛烈的卡莱尔式的讽刺，但当他说到关于考克镇居民的较好的前景时，这种讽刺动摇了并消失了。

但是，考克镇的居民很少有时间或金钱去阅读文学家对他们的灾难的描述，而且很少理解他们所阅读过的东西。尽管中产阶级的公众被文学激进派所吸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亨利·梅休，这个《早晨记事》报的社会调查者先驱，刚刚把科贝特和黑兹利特的新闻工作传统带到了19世纪60年代；狄更斯，他也是从同样放荡不羁的环境中过来的，但避开了这个传统。我们知道，工会中的“工人贵族”们阅读那些他们的上级需要他们阅读的东西，虔诚的教徒则保持着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①。但是那些“粗俗的人”和“小酒店社会”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一种民间传统在海港、织工和田间存留了下来并继续发展。在19世纪后期，一个美国教授

①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17世纪英国作家布尼安寓言式的作品。——译者

发现英国2/3的伟大的传统民谣仍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农业城镇”中吟唱。在这些“农业城镇”中，更富有平民性的“棚户民谣”成 462 了庄稼人和马车夫之间传布关于农夫信息的工具，同时，“马伕歌词研究会”保存了原始的但却是有力的职工团结的思想。

乔伊斯·卡里在《除贵族之外》(1953)中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年轻人、激进的政治家，他把他的主人公契斯特·尼穆放到一个露天市场的帐篷中，一群演员在表演《玛丽亚·马丁》或《红色谷仓中的谋杀》；这是19世纪一传奇剧的主题，它大致是以1830年“斯文上尉”起义前夕发生的一次谋杀为基础的，尼穆对此的反应是：

> 我所看到的，也是千万人已经看过的这个剧，是富人对穷人所犯下的许多伤害中最严重的一次。通过这个剧，能够尽可能表现出穷人的道德、善良和孤苦无告以及富人的无耻的残忍和恣意的放纵。
>
> 这是千百个同类戏剧中的一个。我曾常常疑惑，为什么这样的宣传未能同样给英格兰带来流血革命，正像它带给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每一个别的国家以流血革命一样；因为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正像我所说的，这在我的生活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卡里，这个精明的和具有历史头脑的小说家，似乎在这里感到深深的愤慨和怨恨，这种愤恨情绪之深使普通工人阶级的具有庄严和自助精神的政治学不敢将它表露出来。但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政治的“结社”，那一排排工人居住街道的卫生状况，日益富裕的小教堂和仍然关闭着的星期日公园等，都无法使人得到安慰。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时代

(1851—1914)

H. C. G. 马修

463 **自由贸易：工业经济的繁荣**

1851年的博览会显示了联合王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尽管就高超的技术而言，许多大陆国家的展品，特别是德意志各邦的展品，令英国工厂主咋舌。由官廷发起、贵族组织的这一博览会反映了英国对经济进步和自由主义的信仰。它触发了群众的热情。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到伦敦游览的极好机会，人们从四面八方乘着特别列车经过一天的行程便可来到首都，尽管旅途使人筋疲力尽，却也令人兴奋。博览会的成功使当时的人大为惊讶。报纸上每天公布参观的人数，到展览会结束时，共卖出了600万张门票，博览会在位于海德公园的、由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举行，每天来到这一"金光闪闪透明玻璃拱形建筑物"参观的人数达10.9万。这次博览会的巨额收入后来被用以建造南肯辛顿博物馆。成千上万的人秩序井然，一个个趾高气扬。有产阶级欢欣鼓舞，19世纪40年代那种紧张不安、爆炸性的气氛正在让位于50年代比较平静的气氛，到60年代，这种平静又变为绝对的自信。在博览会期间出售的一首街头小调突出反映了工匠的自力更生思想、自由贸易的国际主义和君主国的沙文主义等奇特的混合，它也是此后至该世纪末英国公众生活中许多特征的写照：

噢，英国最大的财富

无疑属于诚实的劳动者……
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相会
真是高兴之极，　　464
不分信仰和国家，
大家互相友好地祝愿。
就像同一祖先的一脉子孙，
愿这神圣的纽带不再被割裂，
愿和平的橄榄枝，
代替沾满鲜血的战剑。

听吧！号角已经吹响，
维多利亚确实来临，
她将永久地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我们国人的荣幸，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会赞同我的提议——
向她的朋友致以良好的祝愿
让她的敌人见鬼去。

这种小调的调子说明了帕麦斯顿勋爵亨利·坦普尔深孚众望。阿伯丁勋爵的1852年联合政府在克里米亚陷入反俄战争(1854—　465
1856)，由于在战争中节节败退而崩溃；帕麦斯顿就是在该届政府崩溃后担任首相的。除了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担任着首相职务，领导着自由联盟，直至他1865年10月去世。在帕麦斯顿身上体现了英国作为世界唯一强国的过分夸张的自信，他成功地同时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于一身。

1851年博览会所展示出来的英国社会在同年的人口调查中得

到了更多的统计上的分析。有两个事实发人深思。在不列颠岛上，住在城市的人口(尽管常常很少)第一次超过住在农村的人口：这同英国的过去、同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由贸易运动是伴随着英国经济致力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而产生的，而不是相反。19世纪20年代自由托利党人的理想，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间能基本持平，随着自由贸易的到来，逐渐被人淡忘。农业毫无疑问仍是最大的产业，而且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其竞争能力和产量事实上都有明显增加。但是，人口的增长主要在城市，农村劳动者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当19世纪70年代英国农业由于北美大草原的开垦而面临危机时，只有相当少的人仍然从事振兴农业的工作。19世纪70年代的"土地反叛"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由于工资下跌，地方官员和农场主带着士兵开往田里收割庄稼，失业工人千方百计把自己组织起来。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南部地区——由于亚当·斯密所谓的世界贸易"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不是由于任何有意识的政治决定在起作用，不得不乘上国际资本主义的滑行列车，而对于这种列车的轨道，乘客是不能预先知道其升降的；以前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一步。世上还没有都市国家这样的先例；也许这就是英国人念念不忘农村景象和传统的原因。

1851年人口调查引起国人注意的另一项统计是对宗教情况的披露。这是到当时为止试图估计参加宗教活动人数和不参加宗教活动人数的唯一的一次人口调查。要进行这样的统计有许多困难，但其重要性是无可争议、令人惊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一部分人常去教堂做礼拜，国教徒只占到教堂做礼拜的教徒一半略多一点。在1792万总人口中，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为：

国教	5292551 人
罗马天主教	383630 人
新教	4536265 人

在剩下的人口中，有 525 万呆在家中做礼拜。对不信国教者的人口调查是成功的。他们要求获得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权、得到更多的重视，现在得到了整个维多利亚中期最有效的武器的支持，这就是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兰开夏工厂主葛雷格林德先生① 所称许的：事实。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就是这样不断地城市化，也许可以说是不断世俗化，而且在思想状态上肯定是不断非国教化。维多利亚中期的政治反映了所有这些向自由主义迈进的趋势。

在 1847 年到 1868 年间，托利党（1846 年分裂后作为保护贸易主义者离去的该党余部）在 6 次大选（1847 年，1852 年，1857年，1859年，1865 年，1868 年）中失利。诚然，托利党失去了这些选举，但很难说究竟谁赢得了这些选举。多数派政府依赖下面四个主要团体的支持：辉格党、激进派、自由党和皮尔派（1846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追随者）。这种支持总是易于瓦解的。维多利亚中期典型的政治模式是这样的：联合政府由上面提到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派别组成，各个派别之间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直至不再能达成一致、出现破裂；政府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下台；然后，由托利党组成少数派政府，在这期间，非托利党派别捐弃前嫌，联合打败托利党，迫使其解散，并赢得大选，最后恢复权力。1852 年，1858—1859 年和 1866—1868 年托利党少数派内阁（德比/迪斯累利）即遵循这一普遍模式。

1846 年到 1868 年间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把托利党人排除在权力之外，只允许他们偶尔有少数派执政的时期。在同一时期，

① 葛雷格林德，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译者

1852年最先由阿伯丁勋爵形成的多数派联盟逐渐演变为“自由党”，尽管甚至到19世纪60年代经常性地使用这一名称时，它仍有分裂的倾向，随时都可能瓦解。在行政方面，辉格党人、皮尔派和帕麦斯顿勋爵居支配地位。他们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容忍。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同盟中体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使政治家清楚地了解了以下事实：旧的政治结构只有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才能维持下去。皮尔派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在1853—1855年以及1859—1865年提出的一系列庞大预算甚至从财政上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要求。工厂主阶级需要自由贸易：格拉德斯通认为他们已如愿以偿。

当然，“自由贸易”不只是指废除保护关税。“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是一个体现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哲学”的缩写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初版于1848年的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指南——《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此作了归纳，“简言之，自由放任主义将成为最普遍的原则，除非是为了某些特殊的利益，否则，凡是背离这一原则的，都是有害的”。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国家不能加以干涉。穆勒和其他人把国家作为一方、把社会作为另一方的划分 467 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前提的：个人能够并且应该独立。个人主义、自尊、自力更生以及非官方的合作社组织，所有这些都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据此，经济应该是自我调节的，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凡是信奉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1859年)中思想的人，都应该自由地自行其是。

这种个人主义观是从社会进化论者家喻户晓的著作中得出的。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不是人们意料之外的事；它是一系列有关进化的著作集中的一种，同时也是出类拔萃的一种。“进化”的概念以及随后的“进步”概念，不管是就个人、全国还是全球而言，都渗透到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

因为进化是由科学法则决定的(这种观点通常被说成实证主义),人的职责是去发现和服从这些法则,而不是干预它们。因此,绝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如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周刊的编辑沃尔特·贝奇霍特和著有许多社会学著作的作者赫伯特·斯坦利)都是自由放任原则的坚决支持者。

如果一个人要取得大的成功,他或她必须用知识武装起来,知识的可得性以及对它进行评价的自由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道德上的选择必须是有见识的选择;人类同情心方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是乔治·埃利奥特(真名为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便是维多利亚中期社会自由精神的解放和检验的明证。

1855年和1861年废止"对知识的征税"(对报纸征收印花税以 468 及对纸张征收关税和货物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受到人们特别珍视的自由立法。废除这些税收使作为自由英国的集中体现和保卫者的现象,即大城市和地方上的自由出版物,成为可能。19世纪50和60年代,日报和星期日报纸得到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外省,其政治和一般观点都极为开明。到1863年,英国有1 000多家报纸,绝大多数都是最近创办的。例如,1867年在约克郡,86家地方报纸中有66家是1853年以后创办的。在伦敦,《每日电讯报》1855年改为每天售价一便士,成为自由报纸的旗帜,1871年,其发行量达20万份,远远超过《泰晤士报》。外省新创刊的报纸效法《每日电讯报》,它们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向前迈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评论格拉德斯通1862年纽卡斯尔船坞之行的社论:

"当我们坚持说德比勋爵(托利党领袖)是一个政治上的懦夫,并告诉他,'这是为了纪念'时,那是因为关于保护关税的胡言乱语,是不能仅仅由于宽恕了它就把它忘掉……自由贸易政策已有10年光荣的胜利,

并且它还取得了同法国（在1860年关于自由贸易）签订的条约，现在我们把它放到了崇高的永久的地位"。

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特指不实行保护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国王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牢固的地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取得了彻底胜利，因为他们的信条作为政治原则被广泛接受，只有刚愎自用或自负顽固守旧的政治家才会否认它。前座托利党政治家很快接受了以下观点：如果他们的政党要想再次成为多数党的话，他们必须接受迪斯累利所说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要废弃，而且应该受到诅咒"。托利党的预算同自由党的预算一样变成无懈可击的自由贸易。

在财政政策范围之外，人们对自由贸易究竟要达到怎样的地步意见不一。19世纪50和60年代，自由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提出了大范围的"消极"自由贸易措施，废除国教会、废除强迫性的教堂维持费、废除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担任公职的宗教限制、废除对土地转手或使用的限制，结束以恩赐制为基础的文官制度。除了这些以外，60年代，各选区普遍掀起了进一步进行议会改革的运动——这一要求受到了一些（但不是所有）自由党议员的支持。在这些方面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实际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对不同政党交叉效忠的联盟，其中最基本的是对自由贸易经济的信奉。在这种联盟内，存在着许多改革利益，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的利益。19世纪60年代，由于宗教的大复兴，自由党内宗教活动家的人数大为增加，激发了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为政党的成功而奋斗的热情。罗马天主教徒、不信国教者、甚至世俗主义者都在这一基础广泛的进步运动中得到了表露——由于他们都反对国教和官方教会，这一表露具有共同的调子。整个19世纪，不信国教者也许是投自由党票的最重要的社会

原因。然而，荒谬的是，这一联盟的领导权始终属于国教教徒，尽管他们是国教徒中比较温和、主张改革的一些人。因此，联盟的领导人同它比较好战的支持者之间在改革的速度方面发生了很大争执。整个说来，领导人——帕麦斯顿、约翰·罗素勋爵和格拉德斯通——希望进行温和的改革，以全面加强英国国教，而激进分子则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以最后废除英国国教。这样，两派只能在一些很有限的措施上，例如，废除强迫性的教堂维持费上达成一致，而在他们政策的最终目标方面存有分歧。1869年废除爱尔兰国教会便是这种政治方法圆满成功的表现。

工人阶级中能言善辩的人参加自由党，特别是参予选区的活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政治状况，宪章派提出的六点是不可能被拥有政治权力的各个阶级接受的。到50年代末，通常由宪章派以外人员领导的激进的选区改革运动，只要求进行选举权改革，其中，至多是要求家庭的男性户主享有选举权（家庭投票权）。要满足这一要求，对于两党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自由党的领导人来说并不困难。他们希望改革这一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一些托利党人之所以希望改变它，是因为他们1847年以来的经历表明他们不可能在现存的制度内赢得大选。一些自由党人，包括格拉德斯通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都希望有限度地扩大选举权，以此把更多的开明工匠和刚毅不屈的人物包括在内，以支持自由党的紧缩开支和改革计划。一些激进派，例如，约翰·布赖特希望实行“家庭投票权”，使自由主义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尽管他们很快又指出他们不希望将选举权给予所谓的“社会渣滓”（即乞丐、失业者、大肆挥霍者和没有财产者）。一些在一般立法方面异常激进的自由党人，例如罗伯特·洛，怀疑任何将导致民主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高等阶级”将会被这种改革吞没。一些托利党人如后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则担

470

心家庭选举权将导致通过不断增加直接税(例如收入税)对财产发起进攻。一些辉格党人认为，既然现在的选举制度总是选举出一些托利党以外的人，就没有必要进行改革。

帕麦斯顿反映了最后一个派别的观点，1865年，他在没有允诺进行选举权改革的前提下，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他死于这一年的秋天。接任他当首相的罗素在1866年向格拉德斯通提出了旨在对付城镇的温和的改革法案，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内阁破裂了，一些人认为该法案走得太远，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过于驻足不前。第三届德比/迪斯累利少数派托利党政府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城市改革法案，就这样，放弃了反改革者的基本立场。一些改革变得势在必行：当迪斯累利出人意料地宣称接受家庭投票权修正法案时，自由党人开始了通常的重新组合；后来该法案以比前一年罗素—格拉德斯通法案更戏剧性、更彻底的形式通过。1832年的选举权制度到此结束：城市政治的参项直到1918年才建立起来（1884—1885年将类似的选举权授予各郡男子）。在1868年极端混乱的形势下，自由党人以112票的多数赢得大选，似乎再次承认了他们在1865年作为主要政党的选举地位。事实上，这样一来，1867年改革法就改变了政治角逐的规则，使多数派的托利党政府再次成为可能——但是，没有认真试图改变自由党前30年的任何主要成就的、肯定也没有试图改变自由贸易中心内容的恰恰是1874年迪斯累利统治下的托利党政府。

这些改革压力在格拉德斯通第一届政府(1868—1874年)的最初年月达到了顶峰；到1874年，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许多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除了废除爱尔兰教会外，19世纪60和70年代初，自由党人废除了强制性的教堂维持费和“对知识所征的税”，同时还废除了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宗教限制以及用钱购买军官职位的办法；他们对爱尔兰的土地进行了立法，又为英格兰和苏

格兰的教育立法;他们开创了以竞争来获得文官职务的做法,通过引进一定的责任制,使资本主义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对安全——所有这一切都增强了他们对自由贸易资金的筹措、对政府帐目进行适当的清算、把预算减少到最低程度以及紧缩财政的关注。

尽管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常常引起争执,然而,这一巨大的改革浪潮没有遭到强烈反对。甚至确立国教的地位——全面保卫国教在19世纪上半期一直是托利主义重振旗鼓的主要内容——的努力也已部分明确而又有效地告一段落:在19世纪30年代还纯粹是梦幻的东西到70年代已成为现实,这当中几乎没有经过明显的斗争。托利党的最后一张王牌,非选举产生的上院,只是在很有限的方面起了作用,如拖延废除纸税,拖延废除教堂维持费和设置候选人名单,拖延废除进入大学的宗教限制等。有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同心协力,为清除自由国家之船前进道路中的暗礁而努力。 472

作为社会精神实质的自由贸易的到来刚好同经济的繁荣在时间上一致,这一繁荣从19世纪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认为是自由贸易引起了经济繁荣,经济史学家怀疑这种说法。废除关税障碍可能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不大,但是,从全国信奉经济进步这一比较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自由贸易"的盛行同各个阶级都具有的创新热情有密切的关系。按照比例,19世纪中期的繁荣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是同缓和的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似乎表明,由于市场的力量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内部发生作用,19世纪20到50年代人们曾经极为关注的"英国生活条件"问题能够被解决,而且正在被解决。甚至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棉荒"——当时,由于美国发生内战,兰开夏在美国南部各种植园传统的生产资料来源被切断——引起的灾难很少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有产阶级庆幸,地方上的首创精神和自愿的捐助似乎足以使威斯敏斯特政府免于承担兰 473

开夏劳动力遭到破坏的直接责任(事实上,政府的贷款计划也起了重要作用)。



工人阶级的住房(约克郡)。这是1890年住房条例规定废除的贫民窟的典型。

同任何别的国家相比,19世纪50到70年代,英国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极为惊人。在早期工业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方面——煤和铁——英国比较强,由于大陆国家进口英国的煤和铁作为自己工业化的基本原料,增强了英国这两个产品在世界上的优势。富有活力的制造业部门推动着大规模的项目向前发展,包括从船只到蒸汽机,到纺织品,到各种各样装饰维多利亚时代住宅的小商品,这些都用英国船只装运出口,使整个贸易世界"维多利亚化"。这一巨大的工业活动有赖于货币的流通和银行体系,尽管这两者各有缺陷,但比较稳定,尤其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474 **人口的转变:城市与农村**

这一经济进步的浪潮产生了到19世纪70年代主要以城市和

工业为主的国家与经济。1851年还有人认为城市的增长不可能延续下去，现在却日益加剧。到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5的人口住在所谓的“农村地区”，就是说，80%的人口已城市化，这一比例比欧洲大陆任何国家都要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一直很少改变。到1901年，有74个城镇的人口超过5万人以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都市伦敦的人口则从1851年的230万增加到1911年的450万(如果包括所有郊区可能有730万人)。人口增长最快的不是已发生“工业革命”的城市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而是工业中心周围的大量城镇，例如索尔福德镇，这些城市的扩展区逐渐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所谓的“集合城市”，即由几个城市构成的实际上仅仅是非农业单位的工业和城市区。到1911年，英国有7个这样的地区，而当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超过2个的。这7个地区是：大伦敦(730万人)，兰开夏郡东南部(210万人)，米德兰西部(160万人)、约克郡西部(150万人)、默西赛德(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克莱德赛德中部(约150万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11年只有4 00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岛。一些城镇，例如钢铁城镇米德尔斯伯勒从实际上一无所有发展到半个世纪后的12万人。这些集合城市绝大多数都包含重要的爱尔兰社区，他们的政治因而也倾向于比别的地方更“爱尔兰化”。19世纪末期，伦敦和利兹也形成了庞大的犹太社区，他们是同爱尔兰饥馑一样强烈的东欧“农村人口衰减”的牺牲品。

当然，城市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在20世纪的不发达国家是普遍的现象，但在19世纪还没有先例，因而对这些城镇不易概括。城市建筑风格和标准差异很大，从坚不可摧的格拉斯哥石屋、矿井区背对背、两上两下、常常用劣砖砌成的小屋到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时髦的郊区别墅，各不相同。这种住宅的共同特征是，几乎都是供

出租和租借的——自己住自己的房子的人很少，尽管这到19世纪末变得非常普遍。一些城镇经过有公民意识的地方委员会的精心规划，有公园、图书馆、音乐厅、浴室、道路；另一些城镇则听任建筑投机商处理。

这些不断增长的城市由铁路控制着，第一次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铁路车站和编组车场所占用的空间改变了城市中心，到476郊区的便利交通使境况较好的人不住在城市中心成为可能，铁路运输把一切都笼罩在煤烟之中。污物和噪声成为维多利亚城市的特征——污物来自火车、工厂和住宅的烟囱、马匹，噪声则来自二轮货车、马车以及马蹄叩击圆石块所发出的声音。当20世纪初汽车运输代替马匹时，每一个人都注意到城市中心变得如何相对清静和清洁。但是，噪音、污物以及破烂不堪的住宅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改革城市生活只是非常缓慢地才变得强有力。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凡是产生的东西总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观477点在弗洛伦斯即贝尔夫人《在工作》一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该书对典型的工业城镇米德尔斯伯勒进行了典型研究，该城市所从事的行业只有一种，即炼铁：

> 由于没有富有浪漫色彩的过去，没有庄严的传统，因此，这种迅速巨大的增长的事实给米德尔斯伯勒以异样的传奇色彩和庄严，这便是力量的庄严，它不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它自己的全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尽管制造业城镇也许没有古代的那种魅力和美感，但各自有自己的引人入胜和独特之处……高高的烟囱、外形粗陋的大窑和高炉，冬日下午城市上空升起的烟雾犹如塔楼和尖塔一般……晨曦和黄昏是参观铁城的极好时光，白天是云柱，到了晚上，则成了火柱。

博览会后20年，部分由于博览会上展出的机器的感染，城市

的推动力反射到农村。“精耕细作”——在肥料、排水系统、建筑以及类似于收割机和打谷机这样的农业机械上进行投资，使道路同铁路相连——显然使人误认为：自由贸易带来了农村的繁荣，导致了物质和道德的巨大现代化，甚至在农村，也有人担心传统宗教能否延续下去，因此，有些人转向了新教，有些人则转向唯物主义。

经过一代富有朝气和进取心的耕作，人们赢得了安东尼·特罗洛普有关巴塞特郡的小说所描写的维持安静、闲暇和郡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利润。1868年，联合王国所消耗的食物有80%仍然是由国内生产的。但尽管进行“精耕细作”，许多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仍然令人遗憾地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20世纪初，在苏格兰高地北部和西部，脚犁和手工扬谷机仍然是到处可见。

19世纪70年代，接二连三的歉收，北美草原的开发，来往于海外羊毛生产区既快又廉价的运输，导致了“大萧条”。只有牛奶、干草、稻草的生产没有同外国展开激烈的竞争。特别是，英国东部的特产——小麦的价格急剧地下降，但农场工人，尤其是小农场的工人很迟才适应这种局面或适应对制酪业生产的新要求。西部畜牧区很少受到严重的影响。随着城市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这一下降由于萧条变得愈益迅速：1851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20.3%，1901年只占6.4%，英国大多数食物和农业生产资料如羊毛都要进口，这一事实将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呼吁保护农业很少获得反响，甚至在托利党内部也是如此——肯定没有达到改变自由贸易财政制度的程度。一些自由党土地改革家——他们通常不考虑保护农业——赞成出卖小块土地（1885年掀起三英亩地一头牛运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们建立苏格兰高地小田地委员会（1886年），授权建立不受地主干涉的小田地社区，这是本土上取得的唯一大成就，尽管它也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479

城市里工作时间少、工资高所具有的吸引力、19世纪50和60

年代的机器化、该世纪最后25年的不景气，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他们绝大多数成群结队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城镇，有些到煤矿（尤其是到威尔士的煤矿），有些人到殖民地，有些则到军队。1861年到190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男性劳工总数下降了40%以上；妇女在城市中不太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她们在农村的人口减少不很剧烈，结果，农村的男女比例明显不平衡，尽管许多未婚女子在类似"姑娘友好社"这样组织的帮助下，设法在城市中从事家庭服务。

所有这一切使农业社会陷于混乱，不再为人津津乐道，社区特有的服从性在下降。托马斯·哈代小说的出版时期（1872—1896年）几乎正好是农业萧条的时期，它具有一种无法控制、含而不露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决定了农村社会及其居民的命运。哈代描写已经消失了的乡村习惯和传统。但是，尽管小说在形式上是反映历史，但它有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折光。《卡斯特桥市长》描写了小麦商迈克尔·亨查德的命运，他未能适应新的贸易方法，结果陷于破产。哈代在描写他财政崩溃时写道："他的内心活动似乎倾向于认为有一股背离他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些以韦塞克斯为背景的小说所刻画的"痛苦的总戏剧"描写的是文明的崩解。哈代在1895年全面考察了他的小说后写道："究其根源，这一变化是最近车站马车工人（或多或少地）被移民劳工人口所替代而造成的，前者是地方传统和幽默的身体力行者，这样，地方史就发生了中断，这对保存传说、民俗、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偏执个性的打击最大。而这一切要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总是要同特定的土壤结合在一起，其它条件无法替代。"幸运的是，塞西尔·夏普、马乔里·肯尼迪-弗雷泽和其他研究民俗、民歌和舞蹈的历史学家多多少少记录了在这一切完全消失以前的英国农村生活的特性。

农村习俗的破坏受到了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鼓励。教育措施

——例如，1872年的苏格兰教育法——使苏格兰和爱尔兰人中说盖尔语的人和威尔士人中说威尔士语的人盎格鲁化，使农民对城市生活有了准备。从1850年到1900年，农村的变革和教育政策对那些语言来说是强有力的打击，在苏格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在威尔士，地方的主动性保证了1889年以来各学校坚持教威尔士语。

在一些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比较大，因为移居的工人离开城市到农村收割庄稼，而农村周围的小城镇居民到农村偷猎司空见惯。一些产业工人，尤其是煤矿工人，他们住在村庄的荒野和田地上，在这些村庄里有诸如赛狗、赛鸽等活动，并有与此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协会。中产阶级利用土地价格的低廉，千方百计购买乡村土地。对于财源充足的有产阶级成员来说，乡村已成为奢华的游乐场所以及“消磨周末”的地方；而对大城市的许多居民来说，乡村则是遥远、甚至充满危机的场所，这里充斥着操着古代口音，衣服和举止奇里古怪的人。奥斯卡·王尔德的喜剧《认真的重要性》(1895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都市的情调。 480

> 布拉克纳尔夫人：土地不再是有利可图，也不再是一种乐趣，它给人以地位，但又使人无法把它维持下去，这便是土地的实质。
>
> 杰克：我有一幢乡村别墅，当然，周围还有一点土地，我想大约有150亩，不过，我们的实际收入并不依赖它，事实上，就我所知，只有偷猎者才从中获得好处。
>
> 布拉克纳尔夫人：乡村别墅！……我想，你还有城镇别墅吧。几乎很难想象像格温德林那样天真无瑕的姑娘居然能住在乡村。

然而，过去农村幸福的景象常常在城市居民心中徘徊；不管什么阶级，只要他(或她)可能，总是住在一个有花园的房子里，或者租一套分配来的房屋；他们在城市里重新塑造着农村，却忽视了农村所经历的痛苦现实。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日益反映出人们对村庄的 481

怀旧心理，这在贵格派雇主卡德伯里[1]在伯恩维莱庄园进行的试验以及19世纪末的“花园城市”运动中达到了顶峰。

群众与阶级：城市工人

大量人口的城市化以及农村地区的衰落无疑会对各个阶级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19世纪前半期有产阶级最担心的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或其它革命阶级。19世纪下半期最惊人的特征也许是没有出现这样的阶级。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除了他们的劳动生产外，未留下任何回忆录；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的追求、希望、信仰、爱好、讨厌、习惯、热情大多没有文字流传下来。在帝国中，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报告是随着被别国津津乐道的训练有素的文官效率的提高而逐步出现的，但在国内，只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系统地观察英国城市穷人的生活习惯。亨利·梅休颇具影响的《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那些工作的、不能工作的和不工作的人的生活条件和收入大全》(1861—1862年)开了头，但不系统，以后也没有人接着搞下去。据我们所知，它们的确表明了高度复杂和多样化的生活模式，在这当中，地区主义和宗教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些劳工人口的生活标准开始迅速提高。从1860年到1914年，实际工资翻了一番。增长最快的是1868—1874年间的繁荣年月以及1880—1896年这段期间，在后一时期，实际工资几乎上升了45%。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了19世纪以来第一次供人享受的闲暇时间。一些钱（尽管不是很多）不只用于食物、住宅和衣物等必需品。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剩余不是同出生率的增长而是同出生率的下降相一致的，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它对有产

[1] 卡德伯里(G.Cadbury)，英国商人和社会改革家，1879年将其商业公司从城市迁到名为伯恩维利的乡村，后又在该地购置土地，建造数百幢住房，供社会各阶级所用，它成了“花园城市”的雏形。——译者

阶级产生了影响，工人阶级所受的影响则较迟。这样，多余的现金没有为多余的儿童所吸收。这是一种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它说明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以下预言缺乏事实根据：即工人阶级靠“铁的工资规律”来维持生活水平，因为任何剩余财富都会被额外的儿童吸收。家庭规模的控制为19世纪80年代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相对繁荣开辟了道路。至于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人们知之甚少。男女结婚比较迟，他们也许使用了一些19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流行、但不很可靠的控制生育的办法；妇女通常也许使用流产作为防止孩子出生的办法。

当然，“工人阶级”一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几乎总是用复数） 482 包括比较广泛的范围。查尔斯·布思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调查“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他发现工人阶级有6大范畴：“高报酬的工人”，“固定收入的人”，“固定收入较少的人”，“间隙收入的人”，“偶而有收入的人”以及布思所谓的“最低层的阶级”。“固定收入的人”是这当中最大的一个阶层——等于另5个范畴的总和——家庭规模减少最多的就是这个派别的男女，他们的实际收入有所上升，并且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经济领域内的潜力。

“固定收入的人”的日益繁荣促使他们加入工会，以此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改善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进行谈判的手段。19世纪中叶的工会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狭窄基础上的“行会联盟”，由那些妒忌地保护他们在同伴中的特权和辛勤获得的优势的人组成，他们凭借通过学徒获得的资格或熟练操纵机器的能力从雇主那里获得这些权利和优势。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加增强了行会联盟的影响和地位，一些技术在其它行业，例如在铁船制造业的发展是扩大而不是削弱了这一行业的重要性。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这些行会联盟开始得到补充，包括了许多固定受雇的工人。生活 483 标准的提高也使这成为可能，因为以前工会会员的入会费很高。工

会的存在不仅仅为了，或者也可以说主要不是为了工资谈判，而且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自助”利益，各个工会同友好社团的关系密切，有时实际上等于“友好社”。对于任何自尊的工人来说，这些利益中首当其冲的是葬礼补贴——避免由济贫院支付葬礼费——但许多工会也有疾病和失业补助，因为到当时为止，国家还没有对当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任何帮助，而对那些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帮助则更少，他们只好依靠济贫院这一最后安全网。

在1945年以后的观察者看来，工会活动似乎是在最奇怪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1874年后的20年是以剧烈而又巨大的通货收缩为特征的——也就是说，价格(工资下降的程度稍小)下降。另一方面，那些固定受雇的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但这很难使工会会员达成一致的看法：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个减少工人工资的雇主仍能使工人的境况改善。因此，新工联主义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工资：这既是一种积极的，同时也是一种反动的力量。除团结感外，它几乎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一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时期最公开的罢工中起了作用——1888年布赖恩特和梅的火柴工厂罢工，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争取“码头工6便士币”的罢工，这两次罢工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注意，可能是因为这两次罢工都发生在伦敦激进派的鼻子底下。但是，这不是典型的罢工(事实上，伦敦码头工人罢工不是由工会发动的；工会是在罢工结束后才成立的)，领导罢工的社会主义者如约翰·伯恩斯的作用也不应过分夸大。甚至绝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都是坚决的格拉德斯通派：除很小的范围外，卡尔·马克思及其著作在他几乎度过整个研究生涯的国家里还鲜为人知，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体的著作只拥有极少数读者。事实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绝望。

如果说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不断增长在机构上的反映，

那么，共同的闲暇活动，尤其是男性挣工资生活的人的闲暇活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感。观看英式足球比赛——这是一种由公学和大学业余俱乐部发起的比赛，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上职业化——成为从朴茨茅斯到阿伯丁工业城市男性(仅限于男性)固定的娱乐活动。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每一个自尊的工业城镇都建立了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运动队反映了该城市宗教的分裂(在格拉斯哥分成信奉天主教的克尔特队和信奉新教的园林队，默西赛特则分成天主教的埃弗顿队和新教的利物浦队)。所有这些队都鼓励队员地方爱国主义、地方热情和自我意识，这使许多政治组织者大为妒忌。足球是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杯赛(从1871年起)和联赛(从1888年起)的固定性和复杂性，484 对长远和眼前利益的需要，每周入会费的预算，或许还有易地比赛的火车票费，庞大、自我管理的人群，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训练有素、秩序井然的劳动力满足于把闲暇时间用以观看其它通常由地方商人组织的俱乐部比赛。工人们对整个足球赛季经久不衰的注意，就像农民注意农业气候季节一样。

比赛时间长、比较独特、社会各阶级人士都参加的板球赛日益流行，自1873年以来由郡的冠军进行比赛，它对上面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都是一种挑战；也许，尽管实行了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但仍有个性存在，板球赛便是明证。格洛斯特郡医生W．G．格雷斯对当时投掷物和打球的娴熟使他创立了许多击球、滚木球和接球的记录，这些记录甚至现在仍然很少有人超过，他本人几乎也成为类似1874—1886年的赛马冠军弗雷德·阿切尔那样的全国性英雄。格雷斯大而滑稽的络缌胡子常常使群众把他混同于索尔兹伯里勋爵——这种混同可能对后者有好处。

在这以前，工人阶级的旅行一直是在不顾一切地寻求新的职业或膳宿的背景下进行的。到19世纪80年代，以下活动开始成

为娱乐性的活动；由个人组织或由商行组织的新设公假海滨旅行，对许多人来说已成为一年一度的远足。为满足这种要求，一些旅游胜地——布莱克浦、莫尔坎伯、绍森德、斯卡伯勒、伊斯特本、波托贝洛——纷纷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假日几乎总是在城市度过，“海滩”即码头，杂耍和澡堂，常常背靠饭馆、木板房和客店。19世纪 90 年代，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组织到农村旅行的散步俱乐部和自行车俱乐部来扩大这一传统做法，但这些活动对中产阶级下层的吸引力要比工人阶级大。

大众报纸和全国性通讯联系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其它大型的娱乐活动：打赌，尤其是对马下注的打赌以及利用刚刚发展起来的赌注业对足球下注。打赌给人提供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闲暇能给人增添乐趣，而且它还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尽管这种利极少。

因此，工人阶级中比较顺遂的部分开始分享半个世纪前工业革命带给有产阶级的一些繁荣和希望。饮食有所改善，除了面包、马铃薯和啤酒外，人们开始吃肉、牛奶和蔬菜。住宅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肥皂价格便宜，一般人易于获得，房屋和人变得更加清洁。书、照片、形态各异的装饰性家具开始固定地装饰雇佣工人的家庭。体面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用钱来证实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控制程度以及安居乐业的程度，工资的上升使每周的开销绰绰有余，由于分期付款购买法的发展，体面成为工人们追求的目标，这花掉了工人阶级剩余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

486

挣工资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重要，但不能过于夸大。19世纪下半期，每隔 10 年，经济就出现短暂的混乱。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是一个大萧条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收入有所下降。我们业已看到，这一阶段在农业上肯定是如此。就整个工业而言，这是调整而不是萧条时期，但对工

人来说，调整通常意味着痛苦。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失业”一词才具有现代的意义。

就到教堂做礼拜而言，宗教对城镇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很少起直接的影响。A. F. 温宁顿—英格拉姆（英国国教徒）在1896年写道：“不能说上帝的教会失去了大城市，因为它从来未拥有过大城市。”新教（包括英国国教和非国教徒）都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服农村劳动者在他们进入城市后继续到教堂做礼拜，尽管慈善机构的施舍、周日学校提供的教育、直接的布道、恢复十字军东征、国教会和救世军都具有间接的吸引力，然而，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始终未能达到在城市出生的人的大多数。1902年至1903年，伦敦只有19%的人经常到教堂做礼拜，而这些确实到礼堂做礼拜的人主要来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阶层。外省各城市的数字可能多一点，小城镇可能更多。只有罗马天主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天主教的组织比较适合工人阶级，他们通过教会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卓有成效地吸引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的天主教会众。 487

但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对宗教完全淡漠。甚至在世俗的办法可以使用时，“习俗礼仪”（尤其是在婚丧时）仍然非常流行。不到教会做礼拜的人似乎也没有同宗教积极对抗，除非宗教采取罗马或仪式主义的形式，并且同爱尔兰移民和原有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关。再者，他们明显憎恨同有产阶级的地位和权力有关的宗教，特别是国教。在一个其能言善辩的成员强烈地支持到教会做礼拜的社会里，不到教会做礼拜既是对社会冷淡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抗议。

职业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1850年后的几十年是发展的黄金时代。1851年，中产阶级还是一个相当小、比较容易区分的团体；专业工

作者、商人、银行家和大店主等。这一团体同工人阶级的鸿沟很深。到19世纪末，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模式，由于经济的变革，出现了庞大的、处于中间地位的集团，这一集团或许可以称为中产阶级下层。经济中的服务部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随着英国经济逐渐商业化和工业化，造成了一支庞大的白领工人大军，在零售、银行、会计、广告和商业部门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工厂的管理从父权制家庭传统转到新的职业管理者阶级手中，制造业的官僚迅速增长。随着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消磨在新的职责方面，尤其是根据1870年法令产生的教育制度方面，地方和中央的文职官员队伍迅速扩大。商店、办公室、电话局为妇女的就业提供了新的机会。伦敦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尤其大，它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城市劳动大军，这些工人经过多种工艺的训练，他们乘着火车和新建的地铁，穿梭于那时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和像克罗伊登那样从1870年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城市职员宿舍区的城镇到伦敦之间。郊区化是19世纪下半叶城市生活特有的新事物：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或自成单元，或半独立，各自都有小庭园，或在房前，或在房后，显示了这一新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有产阶级的追求。

488

这是些在自由主义时代取得成功的家庭：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成就，这一阶级奋起响应。它崇尚荣誉、竞争、体面、效率和目的感。它推崇成就、金钱和成功。由于该阶级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变化无常，对那些确信自己有权来控制他们的人尤为敏感；它尊重等级制，在这一点上，它同19世纪50年代自由党坚定的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后者受到前工业社会“昔时义举”的社会精神实质以及17世纪战斗口号的鼓舞；它在社会秩序中追求安定的地位，这一点使个人主义成为保守党在各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媒介。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像威尔士和苏格兰市镇这样有非国教传统的小城镇里，个人主义充斥其间，由此而造成的自信、连同它的不信从

国教，有助于使这些地方变得比较开明。在大城市，中产阶级倾向于充当配角的角色，为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获得权力摇旗呐喊，以换得他们对自己的承认。

1896年，哈姆斯沃思兄弟创办了《每日邮报》，由于该报在全国各地高度有效的发行，这张地方性报纸很快畅销全国，成为中产阶级下层的必读刊物；起初该报在调子上具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倾向，布尔战争期间转为工联主义。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评论该报及其读者时鄙夷地说："这是勤杂员办的，给勤杂员看的。"

有产阶级

中产阶级上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医生、律师、国教教士、政府各级文职官员——他们具有在大 491 学或越来越多地在公学接受教育的背景。在许多城镇，他们从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富丽堂皇的别墅。他们的生活比19世纪上半期更排外，他们送孩子到寄宿学校学习的习惯增强了这一阶级对全国的了解，但削弱了该阶级各个成员在地方的根基。正如其继承者所解释和形容的那样，拉格比的托马斯·阿诺德精神在职业界非常流行。通过以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史为主的教育大纲的教学，通过国教广教派的教化，通过旨在利用每一个闲散时间的接二连三的比赛（冬天为橄榄球，夏天为板球和田径运动）来调节生活，所有这些职业阶级的社会精神有一定的价值，但毫无效果。由于它处心积虑要提供管理帝国的人才，结果忽视了工业国家的需要。

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种社会精神实质的影响。他们不是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家庭商号，而是日益把他们送进为职业阶级设计的教育过程。棉纺厂主和船坞主的儿子学习希腊文和橄榄球，而不是像德国的同伴那样，学习科学和会计学。受这种教育的孩子对回到制造业生活缺乏兴趣，维持企业和制造业





教育方式。上为1908年左右小学的自然教学，下为19世纪后期基督慈善学院(公学)中的一间宿舍。

的精神实质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种精神实质曾经是19世纪前半期工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人发现，商业比工业更适宜他们，因而，他们进入日益扩展的、把工厂地板上的血汗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化为一栏栏数字的银行部门。

英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这些人的能力。货物进出口收支平衡的巨大赤字开始扩大(1851年为2700万镑，1911年为1.34亿镑)。由于"看不见的收入"——银行、保险、船运和来自英国在海外投资资本的收入——这种赤字转变为全面剩余。来自服务业的收入(1851年为2400万镑，1911年为1.52亿镑)以及来自海外的红利(1851年为1200万镑，1911年为1.88亿镑)似乎成为英国繁荣至关重要的因素，与之相适应，中产阶级的主要专长是经营钱财，而不是人和物品。

英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发展同早期制造业的工业化一样，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在两个方面，这种发展是那种工业化的产物。由于"世界工场"在国外出售产品，它刺激了其它急需资本，而本身又不能提供资本的经济的发展。同这种经济的竞争以及19世纪80年代一些制造部门的不景气降低了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为服务业的发展鸣锣开道。

再者，不能夸大这一趋势，也不能过于强调它的新奇。土地、工业和商业贸易的融合是英国历来已久的传统。这一传统阻止了贵族成为大陆型的一个等级，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使制造业主得 492 到了地位以作报偿。一些人获得了这种报偿，另一些人，尤其是不信国教者，则没有获得这种报偿。在英国，制造业和制造业主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19世纪前半期既孜孜以求又惊恐不安的制造业主的基础——"中产阶级君主政体"没有产生。这部分是因为贵族对制造业主的吸收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贸易"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中产阶级是新教徒，确是如此。他们在英国国教和各大学的地位日益重要:由于1854年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①后的一系列改革，各大学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职业和文官考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为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并维持家庭的开支，同时为了支付仆人工资以及孩子上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中产阶级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得不对家庭规模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他们比工人阶级还要早。

中产阶级妇女也希望家庭规模减小，她们开始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喂养孩子、操持家务。这些部分被解放的妇女在慈善、教会、地方政治和艺术、特别是音乐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妇女煞费苦心地强迫自己进入大学学习（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参加考试,但没有学位),从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牛津、剑桥、伦敦都建立了女子学院。尽管妇女就业仍然受到反对,但一些人成功地担任医生。然而，绝大多数妇女最容易谋得的职业是高级护理。

浮华与环境

贵族(和乡绅)只是部分地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在英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阶级中，它可能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变化最小的一个阶级。正如社会主义作家比阿特丽斯·韦布所指出的:"贵族是一个出奇顽强的实体"。它继续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为威斯敏斯特的两个政治派别提供众多的成员，几乎拥有英帝国所有的高级官职,管理各郡地方政府,充当军队军官——海军在社会地位上较少排外。贵族和乡绅从19世纪50至70年代繁荣的耕作中获得的

① 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1854年由诺思科特和特里威廉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报告，建议文官的任命应通过考试和品行考查，而不像以前那样由恩赐和势力。——译者

利益在农业萧条中丧失殆尽，但由于贵族在城市土地上巧妙的投资以及城市发展所得的意外收获，弥补了一些损失，因为尽管农业土地价值不断下降，但随着在这些土地上建立城市郊区，土地所有者变得非常富裕。英国贵族总是被卷入工业化中，尤其是矿井、运河和铁路的发展中。现在它又明智地把自己同新的商业扩展浪潮联系起来：绝大多数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有一位巨头以增加其管理委员会的声势。它也通过机敏的婚姻，尤其是同美国富裕的新贵族的联姻来分享财富；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九代马尔巴勒公爵同康斯尤罗·范德比尔特的联姻。通过这些办法，尽管农业衰落，许多大贵族地产仍能维持下来。但是，他们既是榨取财富的机器，同时也是财富的玩物，像玩物一样被对待。城市人是通过畅销的报纸和期刊上把贵族作为闲暇男女的描写而认识贵族的；他们在乡间赛马、狩猎、射击、钓鱼、赌博，参加伦敦的商业节。在闲暇变得日益重要的人口中，贵族的这些活动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人心。在这方面，宫廷带了头。艾伯特在南部运用到宫廷生活中的隆重排场也同样顽固地运用到北部严肃的娱乐生活中。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对迪塞德河谷的巴莫拉尔宫的扩建，他们对农民生活和口头传说明显而又公开表露的喜爱之情，对善于画农村狩猎的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的宠爱，所有这些都使苏格兰令人肃然起敬，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相似的草原和山区也同样令人向往。宫廷同现在处于衰落中的因而也是最大众化的浪漫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宫廷这样做的时候，就重新树立起浪漫主义的声誉并体现了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被复制最多的一幅画是兰西尔描绘牡鹿的《幽谷之王》，他所绘的不是万物之王，而是在一个小山凹中，在猎手的射击圈内的牡鹿：没有一个幽谷是安全的，自然被制服了。

494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在巴莫拉尔宫的生活是愉快的，但也是品

格高尚的；常常强调对农民的职责。维多利亚的儿子、1901 年继位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是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丑闻使他母亲感到震惊，同时这些丑闻本身就是极好的素材，使新闻界的好奇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亲王和他富甲一方的狐朋狗友例如托马斯·利普顿爵士集中体现了富豪统治；利普顿在杂货零售贸易中发了大财。在摄政事件后的日子里曾给贵族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在 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使帕麦斯顿花花公子的派头明显地不合时宜的福音主义运动和牛津运动，现在，似乎已让位于铺张挥霍和普遍的道德松弛。一些像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这样的贵族，尽管环境富丽堂皇，但仍过着旧式的简朴生活，他们的家庭以宗教气氛浓厚著称。但是，蓄着络缌胡子的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 19 世纪90 年代却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外甥、后来继承他为首相的阿瑟·贝尔福被看作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以崇尚时尚著名——前者明显地持怀疑的态度，后者则公开地骄奢淫逸。

尽管维多利亚和她的儿子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君主政体——宫廷和一般上流社会的顶峰——在两人统治时期都很繁荣。维多利亚在她漫长的统治（1837—1901 年）中小心翼翼地保护君权，她日益认为保守党政府对君权保护得最好。维多利亚在 1861 年艾伯特去世后从公共生活中长期销声匿迹非常不得人心，使得由巴黎公社刺激而成的十分严重的共和运动成为可能，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自由党领导人才老练地把这一运动偏离原来的方向。人们评论最多的是君主不临朝政和懒惰，而不是亲临朝政。在一个其重要成员对统治集团的号召具有强烈的响应力的、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君主出现在不断发展的面向大众的信息传播业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凝聚点，它强调家庭、延续和宗教。沃尔特·巴奇霍特在他经典性的《英国宪法》一书中指出英国“因循着我们

可以称之为社会舞台的演出，而这种演出的高潮是女王的出场。”君主有助于权力的合法化：它“通常像神秘的事物一样隐藏着，有时又像露天表演一样炫耀自己”，就像她在1887年和1897年庆祝 496 她在位五十和六十周年的大庆节取得的巨大成功一样。维多利亚本人的平易近人、她众所周知的遭遇（勇敢地履行职责的“温莎遗孀”）以及她是位妇女、年老而且常常有病这一事实使脆弱的人性同庄严的制度之间的对比愈益强烈，人们因此愈益尊重后者。

君主代表了被当作前工业社会秩序的永恒特性。在一个不断城市化的社会里，君主对工业革命起着平衡的作用：英国越是城市化，英国的君主也就越是只起仪式作用，并越是只因袭惯例，同时也越是民众化，因为君主所要求体现的价值观是存在于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主义之外的。

“风俗的大变革”

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英国（爱尔兰除外）是一个非常有秩序和平衡的社会，尽管工业和社会变革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潜在的紧张。虽然政治骚乱没有完全消除，但不是经常发生的，不足以引起广泛的注意。大不列颠岛上的犯罪活动，包括偷窃和暴力行动都相对和绝对地下降，这在人口不断扩展的社会中是不常见的，这有力地驳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较高的犯罪率的说 497 法。1901年的犯罪登记表明，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的风俗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骂不打代替了连骂带打或只打不骂；不同的等级在行为规范上基本接近，无法无天的风气开始衰落”。英国这个主要依赖自我调节的社会依赖于自发的组织——教会、公谊团体和巨大的慈善组织网络——来对付精神和物质的沦丧。在一个重要的领域——教育领域，19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表明教会的自发性努力不能提供适于工业国家需要的初级教育制度，

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法令建立了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寄宿学校(尽管到1880年才要求儿童进入这种学校，直到1891年才要求进入这种学校需要交费)。地方的积极性，尤其是伦敦和北部一些工业城镇的积极性，把对十几岁甚至成年人非常有效的、大范围的技术教育制度搬到小学教育中来——但是，由于这种教育制度取决于每个学校董事会的兴趣，因而杂乱无章，无法同德国的教育制度相媲美。工业城镇，尤其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建立了城市大学，这些大学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所不同，它们不是为那些进入传统职业的人提供古典教育。当时的人把政府对教育的职责看成是穆勒的主张，它是不合习惯的一个例外，而不是被广泛接受的认为社会组织应负职责的开端。

“乡村托利党”：保守党的复活

由于城市选民从占成年男子的20%增加到60%，各郡的选民增至70%，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给政治家提出了问题。家庭普选权为他们提供了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比较大的选民团体(远没有达到普选权的地步，甚至男子选举权也没有达到)，选举秘密投票，而先前每一个人的选票都要公开。

自由党联盟不甘心大选的失败，问题是，他们这种难以名状的非正统联盟体系能否继续奏效？当格拉德斯通第一届政府在1873—1874年像传统的自由党那样瓦解，然后不合常规地在大选中失败，因而自1846年以来第一次将权力让给托利党时，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自由党对此的反应是双重的：在一些城市地区，尤其是伯明翰(约瑟夫·张伯伦就是该市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产生了严密的政党组织“地方议员决策委员会”。“决策委员会”是一个自封的地方权贵团体，常常是不信国教的商人，他们通常严厉抨击自由党领导人过于谨慎和过于贵族化。1877年形成的全国自

由党联盟试图把各种地方议员决策委员会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另 498
一方面，自由党领导人仍然绝大多数是贵族，他们急忙作出反应。W.E.格拉德斯通是利物浦（原为苏格兰人）一个谷物商人的儿子，但从小在伊顿公学和牛顿基督学院受教育，是一个跨越两个团体的居高临下的人物，他本人是顽固的英国国教徒，但在后半生，同情非国教徒，因而，对维多利亚社会上上下下具有号召力。格拉德斯通没有"决策委员会"可以支持自己，他向往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权力基础，他越过地方组织的头目向整个自由党团体发号施令，他的办法是作政治演讲和写小册子。由电报联系起来的新的巨大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网使直接的全国性辩论第一次有了可能，政治家早晨刚作完演讲马上就成为全国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餐桌上谈论的话题。因此，在1868年的大选中，在他1876年反对迪斯累利政府对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屠杀基督教徒反应不力的运动下，在他反对1879—1880年保守党的帝国主义功绩中道德和财政懈怠的运动（"中德洛锡安运动"）中，格拉德斯通明显显示出试图产生一个反道德暴行的伟大群众阵线的迹象。"论坛"成为维多利亚后期政治的特有形式：格拉德斯通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辩论的论坛，他们的同时代人包括自由党人和托利党人都必须参加。

1867年改革法给托利党人带来了新的契机。他们在习以为常、几乎是濒濒失败后，开始获胜。1867年，全国保守党人和宪法协会联合会建立，1870年，其中央机构开始调整选举策略。托利党的目标是自治城市；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们得扩大从郡到大城市及其郊区的基础。19世纪70和80年代，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迪斯累利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大选的胜利；1881年迪斯累利去世后，该党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成为举足轻重的政党。他们的办法是把一个基本上是等级制的、 499

贵族的、英国国教的政党同大城市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抱负联系起来；托利党成为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政党。迪斯累利意识到，政治的成功与否同等程度地取决于政策和代表性这一问题。在1872年著名的兰开夏和水晶宫演讲会上，迪斯累利把自由党描绘成不爱国的、对财产和国家制度构成威胁的出卖英国的世界利益和帝国利益的政党。他用一种比较明确的语调称颂社会改革政策，这对最近才成为选民的工人阶级成员恐怕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演讲的主题——尤其是爱国方面的——很快被其他保守党人采用。这些成为20世纪托利党绝大多数选举演说的范例。

1874—1880年保守党政府的早期年月，一连串的社会改革绝大部分是由国务大臣R.A.克罗斯发起的：工匠的寓所、公共卫生、公谊团体、河流污染、食物和药品的出售、商业运输、工会、工厂、饮料许可证以及教育等都是立法的内容。这些改革中有许多“还在酝酿中”，而且得益于皮尔派—自由党人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也激发了先前的格拉斯顿政府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也许超过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影响，因为社会措施是随意的、而不是强迫的、它们所具有的影响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有限的多（例如到1880年，威尔士和英格兰的87个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履行工匠住宅法），然而，这些改革在保守党的神话里显得很重要。他们表明托利党是一个能有效地处理城市问题的政党，他们为“托利党民主”是一种现实这一提法提供了基础。同德国对城市生活问题的保守做法相反，英国的做法似乎是综合的、协调的和建设性的。

但是，保守主义真正关心的是巩固城市中产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支持是意料之外的。缺乏爱国主义的自由党妖魔之说只是部分地取得成功，因为托利党人的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帝国主义政党的说法，由于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南非和阿富汗事件

上的错误做法以及他们的军事成功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受到严重削弱。人们很难做到既要是帝国主义者，同时又要用财政紧缩取悦中产阶级，这是格拉德斯通的中洛锡安演讲所巧妙揭发出来的自我矛盾。 500

托利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这部分是被格拉德斯通口若悬河的演讲击败，部分是由于那一年贸易的下降造成的。接着的1880—1885年格拉德斯通政府是自由主义极度消沉的时期。政党不宁、内阁分裂。在帝国事务上，托利党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犹豫和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灾难，1885年查尔斯·戈登在喀土穆被击毙时，这种灾难达到了顶峰。自由党对殖民机构的这种"官方心理"已习以为常，认为它是拒绝广泛的帝国职责的一种方式，他们一面表示遗憾，一面继续占领该地。在选举方面，他们在两个方面全部失败，由于做得太过分，疏远了反帝国主义者，由于表面上不太愿意，又疏远了帝国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格拉德斯通控制和减少开支的决定使积极的改革陷于困难之中。同1868—1874年明显相反，政府只是以一个大的改革而著名，即1884年郡普选权改革。农业工人选举权的扩大有可能使郡席位落入自由党手中，索尔兹伯里利用上院的妨碍议案通过权来获得大的收获以作回报，重新分配议席法案使自治市席位更有利于托利党。这样，托利党能够利用自由党的改革产生由单一的成员组成的政治结构，即中产阶级城市和郊区选区选民，托利党以后的政治成功的基础即在于此。

这种结构的后果是自由党日益依赖于"克尔特系外缘"的，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员。因此，这三个地区的利害关系和优先权就成了英帝国时代的中心问题。

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自治运动的失败

没有人能够否认“爱尔兰问题”的存在；同时，几乎没有人能就这一问题是什么形成一致看法。迪斯累利生动地刻划了大都市的迷惑：

> 我希望政府官员站出来说清楚爱尔兰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说它是物质问题，有人说它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现在一会儿说是因为没有贵族，一会儿说是缺乏铁路，一会儿说与教皇有关 一会儿又说与马铃薯有关。

爱尔兰的农业是爱尔兰最大的产业，经营农业的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同通常的说法相反，他们绝大部分住在自己的地产业上或靠近他们的地产。农业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收成好的时候非常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还进行了技术改进，但同英格兰相比，投资仍然不足。爱尔兰自己不能筹措资本，也不能从英格兰吸收许多资本。它的经济养活不了它的人口：不计其数的人迁移到大不列颠岛，在大不列颠岛，没有那一个城镇没有爱尔兰社区；1841 年到 1925 年间，海外移民包括：475 万人到美国，7 万人到加拿大，37 万人到澳大利亚。

501 1798 年叛乱的遗物，丹尼尔·奥康内尔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企图废除 1800 年联合法的失败，以及 1845—1846 年的饥馑，产生了 19 世纪 60 年代芬尼派的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们试图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发动起义。1867 年，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特别是伦敦克拉克韦尔监狱的爆炸事件。使英格兰人大惊失色。在这次爆炸事件中，有 100 多无辜的人丧生。芬尼运动决不代表整个爱尔兰人的观点，但它有可能成为整个爱尔兰人观点的危险，促使自由派政治家，特别是格拉德斯通作出退让性行动。1869 年废除爱尔兰国教，1870 年的土地法，1873 年流产的教育改革（这一改

革受到爱尔兰自己议员的拒绝），都是想表明威斯敏斯特能够满足爱尔兰大众的要求。但是，光有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布特的自治政府协会非常活跃，到当时为止，爱尔兰政治上的主要政党——自由党仍在继续活动。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使形势大为恶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和布特一样，也是新教徒）1877年成为自治派领导人，他一直拥有这个地位，直至1890年因离婚丑闻中自毁为止。帕内尔准备毫不犹豫、不顾一切地利用每一个政治形势——但甚至这一比较强硬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寻求农民土地个人占有权的土地联盟挫败。1879年，帕内尔成为该联盟主席。土地联盟——主张使用"物质力量"的芬尼派同主张用"道德力量"的帕内尔派的有力结合，形成了全国性的天主教群众阵线——在最萧条的1879年至1882年的"土地战"中掀起一个持久的反对驱逐农户的运动，用暴力对付驱逐，用"抵制"（"boycotting"一词因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而得名，由于受到社会和经济的排斥，他后来发了疯）对付驱逐农户者。爱尔兰农村的暴力和1882年爱尔兰大臣格拉德斯通的外甥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遇刺，使英格兰有产阶级大为震惊。我们业已看到，英格兰的有产阶级对比较轻微的暴力犯罪已习以为常。 502

1880年格拉德斯通政府一方面用高压来对付这一危机，另一方面利用1881年土地法进行妥协，这使农民获益匪浅，但没有使他们获得所有权。自由党（利用1884年郡选举权改革）加强了对爱尔兰的控制，在188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86个席位，这样，在威斯敏斯特，自由党和托利党之间维持了权力平衡。

格拉德斯通站出来支持自治，很快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有人私下请求索尔兹伯里在两党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但遭到拒绝。格拉德斯通的决定同自由党考虑的主要内容十分吻合，但它选择的时机表明了政治的必然性，自此以后，只有1906年有一次，自

由党人在无需主张自治的议员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权力。绝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权力下放，或者像格拉德斯通所说的那样，让“国民千方百计获得自由的权利”；1886年，人们很难说爱尔兰不是这样一个地区。问题是，是承认抑或压制它的独立国地位？再者，1866年格拉德斯通提出的温和的自治法案没有给予爱尔兰独立，尽管其对手声称，第一，尽管帕内尔作出保证，它最终都要使爱尔兰独立，第二，它没有对集中在厄尔斯特工业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绝大多数新教人口提供实行自治的保护性措施。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了英国政治的严重危机。面对1886年夏天的格拉德斯通自治法案，自由党发生分裂：93名议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哈廷顿勋爵领导下的辉格党人，只有一些是约瑟夫·张伯伦领导下的激进派，投票拥护托利党，反对法案，这样促使自由党政府跨台，开始了保守党（统一党人或称反自治联盟）的长达20年的统治。自由—统一党员（自由主义的背叛者）在自由党支持者中占有重要的比例，那些传统上支付自由党绝大部分选举费用的土地贵族几乎都是自由—统一党成员。这种影响和资助的丧失对自由党来说可能比该党实际叛乱的议员人数更为重要，尽管在上院，自由党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派别。

503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该党，但使格拉德斯通控制了该党以及全国解放同盟，在1891年的纽卡斯尔会议上，他接受了该党的激进纲领，从而加强了对自由党的控制。自治迫使格拉德斯通实行自由主义。在1886年前，爱尔兰堵死了实行第二类措施的道路，所以，自治是对的、必不可少的。但1886年后，只要上院依然存在，自治就不可能实行。因此，自治一方面促使自由党人为权利而战，另一方面，使他们30余年的努力完全失败。

很自然，爱尔兰事件影响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方，废除国教也都酿成了政治问题，两地都发生了土地运动。尽管

1882 年斯凯岛曾利用军队镇压小农场佃农的游行示威，但很少有爱尔兰那样的暴力行动。这两个地区的一些自由党人要求“彻底自治”，这一运动由于威尔士和苏格兰在 19 世纪末同爱尔兰具有共同的文化复兴而愈演愈烈。然而，和爱尔兰不同，自由党之所以能够把半全国性的运动遏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范围内，部分是因为苏格兰占支配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南威尔士煤矿在威尔士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把那些比爱尔兰更为偏僻的地区同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在苏格兰南部和威尔士南部，自由帝国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

由于自由党的分裂，再加上尽管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作了各种尝试，都不能把它重新联合起来，托利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是活跃的反动分子。索尔兹伯里没有试图诋毁自由党在 19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尽管在这段时间，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托利党的地位及其同自由—统一党的联盟取决于不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做这些事情。因此，尽管通过了一些立法，尤其是 1885 年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郡议会，1890 年制定了改进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措施，稍后，颁布了 1902 年教育法，进一步建立了中学教育体系，但是，1886—1905 年统一党人统治的时期不是重要的立法时期，它也无意成为这样的时期。托利党实质上所依赖的城市选民希望继续维持自由党 50 和 60 年代的状态，而不要重新滋长类似自治的自由主义。他们抵制格拉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这并不是因为它要抛弃 19 世纪中期自由贸易年月的各项成就，而是因为格拉德斯通的自由党走得太远，似乎超过了那时的目标。因此，反格拉德斯通联盟主要依靠自治把联盟团结在一起，把自由党排除在外。它孤注一掷地坚持反自治的立场，而置选举问题于不顾，就像 20 世纪初期经常发现的那样。自由党一如既往地投身自治也有助于他们这样做。短命的 1892—1895 年自由党少

数派政府(格拉德斯通的最后一届政府，1894年格拉德斯通退休后由罗斯伯里担任首相)在第二个自治法案上花费了很大精力，这504一法案在下院成功地被通过，只是最后被上院推翻。自由党能够上升为一个由英格兰各郡、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组成的全新的多数派，但他们不能维持它或者再一次出现这样的多数派。1895年，统一党人令人信服地取得了胜利，1900年，他们利用在南非战争中所取得的暂时成功操纵了"卡其选举"①，奠定了多数派的地位。

难以驾驭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党人反自治事件总是与帝国联系在一起：帝国的权力不能转移，1800年通过联合法的事实表明爱尔兰的战略重要性，自治再一次处于危急关头。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帝国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他们对英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影响。

整个说来，英国没有寻求增加帝国的直接权力，扩展帝国权力的压力集团很少深孚众望或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在505白人的旧居留地，他们成功地寻求转移权力。1867年，他们通过了加拿大管辖法，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然而，19世纪最后40年，英国兼并了非洲、远东和太平洋的大块地区。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商人，在世界运输中拥有压倒一切的地位，甚至当英国制造品的支配地位在1870年后下降以后，这种地位依然如故。凡是有贸易的地方都有英国的利益，尽管在形式上，英帝国的权力在这些地方也许并不存在。因此，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先于正式兼并：没有什么比以下格言更不确实的了："旗插到哪里，贸易就做到

① 卡其选举(Khaki election)，利用紧张局势博取多数人投票的一种选举。——译者

哪里。"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所描述的，不管多么遥远的地方，没有一条小河没有英国组织石油运输和地方货物的代表。

在东非和中非，最早出现的欧洲人常常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例如，福音派行医布道者戴维·利文斯通传播福音，治疗疾病，揭露内地奴隶贸易的非人道。H.M.斯坦利1871年"营救"利文斯通之举经过巧妙的自我宣扬，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大大增加了人们对"黑色大陆"的兴趣。

在一些地区，英国从事贸易的企图得到了武装的支持——一 506 个显著的例子是对印度政府鸦片和一般自由贸易通路的垄断，英国通过接二连三地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政府就范，这在天津条约中(1858年)达到了顶峰，是所有英国帝国主义剥削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因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一贯的政策，而不是地方危机的偶然结果。政府通过特许公司——拥有政府授予的在一个地区从事贸易及其管理权的贸易公司——间接地卷入事件中，常常使不太复杂的问题变得很复杂。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落入英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因为当一个公司破产时(或实际上如此——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前从未支付红利，1923年被政府收回特许状)，英国政府除了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外，很少有其它选择的余地。

除了这种庞大的、大都是非正式的贸易网外，还有镶在"帝国王冠上的最珍贵的宝石"——印度的中心地带，尽管它现在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它曾是英国考虑它在欧洲外利益的焦点。1857—1858年印度士兵起义后，旧的东印度公司瓦解，它的地盘落入英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1876年，根据女王的授意，威斯敏斯特通过法令，宣布女王为"印度女皇"。

为保卫印度并保卫到亚洲大陆的通路，英国进行了各种兼并

活动。在印度附近地区，兼并了缅甸和马来西亚地区，这些大都是在加尔各答印度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的，印度政府在实施自己507 的帝国主义计划时，常常具有它在做一些事情时所特有的系统方法；这一点同伦敦做事毫无计划有天壤之别。在到达印度的通路上，埃及和苏丹在英国控制下，帝国在东非和南非的扩展至少部分受到对印度考虑的影响。当然，这种简单的表述使我们避开了对每一次兼并极其复杂的叙述。最有争议的兼并是在埃及和南非，对这些地区应予以注意。

打通了到印度的通路使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了保障，尤其是为对付英国人长期以来最担心的国家——俄国提供了保障。1854年到1856年，英国和法国在皮德蒙特—撒丁的支持下，派出了大量的舰队和军队支持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俄国对散乱而又软弱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欧洲国家反对落后的俄国，但它们的行动令人失望，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无能的，尽管由海路千里迢迢向大军提供供给造成了新的问题。通过电报对军队困境的新闻报导无所遮掩地阐述了英法自由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作战中的怪事。在这次战争中，弗洛伦斯·南丁格丁以“智慧女士”而闻名。战役主要由一系列包围战构成，在克里米亚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卡尔斯地区，原来列强之间存在的平衡被血腥打破，这为1914—1918年战争埋下了伏笔。土耳其被成功地保卫住了，这样，英国把埃及为其一部分的奥斯曼帝国支撑住了。

英国希望土耳其进行改革，像现代自由国家那样行事。这一希望没有实现。到19世纪70年代，北耳其再一次分裂，并处于俄国的进攻之下。1874—1880年迪斯累利政府继续执行保持土耳其完整的克里米亚政策；格拉德斯通领导下的自由党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不再可行，他们支持把土耳其欧洲部分分裂为独立的、基督

教的国家。1878年柏林会议上签订的“欧洲协定”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迪斯累利带着“体面的和平”以及帝国在塞浦路斯岛的好处回到伦敦，他认为该地对东部地中海地区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作为海军基地，该地没有丝毫用处。

由于土耳其分裂，埃及也变得日益依赖自己，1870年起，埃及开始组织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这一工程对加强英国同印度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于开凿运河资本的流入打破了埃及的平衡，导致埃及社会和政治的分裂。1875年，迪斯累利带回了埃及总督在经营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中的大笔财产。这样，当埃及破产并且试图进行军事政变时，英国在埃及不仅有总的战略利益，而且有直接的财政利益。在作了一些其它的尝试后，1882年，格拉德斯通不太情愿地代表运河债主入侵和占领埃及，尽管埃及从没有正式被兼并，但英国一直占领埃及直至1954年，因此，在理论上，埃 508 及的地位与独立的印度土邦相似。经过19世纪80和90年代的一系列战役，英国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对反叛苏丹的正式兼并。1885年杀死戈登的马赫迪，1898年在恩图曼战役中遭到了基钦纳的最后、同时也是最无情的镇压。这样，随着土耳其的衰落，英国成为东地中海和东北非的主要势力。

南非发生的事件与此并无二致，但由于有了布尔战争，因而更加复杂。1795年英国占领了好望角，以保卫英国到印度的通路。19世纪30年代以来，布尔人慢慢地迁移到内地，内地的安全影响着好望角。人们设想了各种计划，试图把布尔人联合在一个联邦中，1877年，迪斯累利政府在布尔人被祖鲁人削弱后，将联邦强加给布尔人。领导的无能（这是英国在南非军事行动的特点）导致了800名英国士兵死在伊桑德尔瓦那，这是殖民战争中为数不多的长矛战胜枪炮的例子。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失败；1879年，祖鲁人在乌伦迪（1879年）被消灭。因此，布尔人希望重新获得独立。经

过短暂的战斗，1881 年，布尔人在马尤巴山战斗中打败了一小批英国士兵，使布尔人有了与该战斗的军事重要性不相称的宣传资本，达成了模棱两可的协议：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获得独立，但接受英国的保护。金刚石的不断开发以及 1886 年在德兰士瓦发现黄金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财政方面，南非成为英帝国名符其实的最珍贵的宝石。像塞西尔·罗兹这样的人控制的资本的流入动摇了布尔人的农村经济，就像以前动摇埃及的经济一样。和

509 埃及一样，德兰士瓦分崩离析，但在保尔·克留格尔领导下的布尔人仍然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罗兹的老朋友詹姆森博士 1896 年试图煽动南非英国侨民起义，但没有成功（在德兰士瓦的英国人没有政治权利）。新上任的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宣称英国对布尔共和国拥有各种权利，决定用战争来打败克留格尔。1899 年，米尔纳唆使克留格尔进攻好望角殖民地，开始了一场预计比较短、比较有限的战争。然而，布尔人拥有德国的武器装备，而英国人只习惯于进行反对手无寸铁、未经训练的土著人的殖民战争，因此，战事进行得非常糟糕，1900 年，英国人在用炮火包围布尔的主要城市后犯了一系列错误。战争似乎已经结束，殖民大臣张伯伦劝索尔兹伯里进行“卡其选举”，统一党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但是布尔人拒绝承认失败，他们用游击战术扰乱英国人。英国人以焚烧布尔人农场、清除草原、有步骤地把布尔人家庭赶往“集中营”作为报复。集中营中的高死亡率导致了英国国内的强烈抗议。继罗斯伯里为自由党领导人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诘问道：“到了什么时候战争就不成其为战争？”，他自己回答道：“当采用在南非的野蛮主义方法时。”1902 年，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米尔纳企图粉碎生于南非的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目标宣告破产。

世纪末的反动：新国家观

布尔战争花费巨大，远远超过了英国在整个19世纪其他所有帝国侵略的总和。这次战争没有能够粉碎布尔人，但它确实粉碎了格拉德斯通式的财政制度，政府的开支达到了新的高度，自此以后，一直没有降下来。战争也使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的问题带上了赤裸裸的和戏剧性的通俗形式。战争显示了帝国的力量和忠诚，因为英国的白人殖民地派军队前来援助，但它也显示了帝国的弱点。帝国似乎过于庞大，无法协调。英国海军不再占优势，法国海军再加上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人的海军形成一种威胁。"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变得危险。帝国竞争意味着，在19世纪70到90年代，法国通常似乎是英国最可能的敌人，德国是它最可能的朋友。德国的1898年海军计划以及它企图取得"显著地位"（这同它在布尔战争时怂恿克留格尔是相一致的）的愿望使德国成为英国潜在的威胁，当时英国人对这种威胁的看法在厄斯金·奇尔德斯著名的侦探小说《沙漠之谜》（1903年）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由于1902年的英日联盟，英国海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安全得到了保障。1904年英国同法国签订了解决北非争执的协定，1907年同俄国签订了解决波斯争执的协定，开始了限定帝国职责的努力。因此，布尔战争开辟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新航线"。这些协定形式 510 上是有关欧洲外的地区，但它们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欧洲内部；尽管不是联盟，但在某种程度上迫使英国站在法俄联盟一边，在欧洲发生紧张时，反对德国和奥地利。至于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当时还不清楚。

布尔战争引起的对世界安全的焦虑也使对英国在世界上所占的相对经济地位的讨论日益广泛，因为英国的国力最终还是依赖于其经济地位。19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压倒一切的优越地位大部分已经消失。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当时都是实力雄厚的工业国

家，美德两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已经超过英国。英国现在是几个开路先锋中的一个，不再是唯一的开路先锋。然而，英国社会和政府的绝大部门行为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自由状态，包括自由贸易、把政府开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经济自决和自控的戒律历久犹存，就像在自由党政府时一样受到保守党的保护。1851 年中央政府每人开支为 2 英镑，1891 年只增加到 2.5 镑 511 (到 1913 年为 4 镑)。19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这一状况不断受到批评，有些批评在布尔战争后更加激烈，更加普遍。

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中缓慢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人们对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能力的批评，军事的低效率以及南非战争中征募的士兵的低质量导致有产阶级公开要求对全国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安排重新进行评价。

在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各种流派之前，必须首先注意一般的影响，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证主义是自由放任的坚强后盾。在 19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开始呈现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不再被看成是市场中各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各个民族之间的竞争。这就急剧地减少了讨论的单位数字，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由同这一民族竞争有关的帝国主义引起的)，即单个“种族”是否比无数的个人更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先进的种族”能否由政府、社会、甚至遗传结构控制其命运？这一概念——这是英国进化科学同德国有机的国家概念的结合——强有力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种族”辞令成为所有政治领域中的右派改革者的共同标志，包括从表面上的右翼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到新自由派哲学家J.A.霍布森和L.T.霍布豪斯到被视为左派剧作家的G.肖伯纳。如同通俗的报纸在报导许多小规模的殖民军事远征时所取得的成功一样，通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很容易成为同帝国主

义相联系的种族优越论的现成论据。这些通俗性的报告只强调个人的勇敢、品质、积极性以及“赢得帝国”的各种业绩，而对用来福枪（19世纪90年代后偶而用机关枪）武装起来的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同大量使用长矛、至多偶而零星使用滑膛枪的地方力量在技术上的天壤之别则只言不提。

对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自由国家的批评来自三个主要政治派别：一是不满的保守党和统一党人，他们认为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过于墨守皮尔—格拉德斯通的财政政策，二是自由党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必须继续向前发展，以对付新的挑战；三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乍看起来是如此），他们对整个国家秩序发起挑战。来自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人都一致要求提高“全国效率”，这一口号试图表明他们愿意借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和为适于对付世界挑战的“超级种族”立法。

自由贸易国家总是受到各种批评。19世纪下半期，这些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是艺术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拉斯金在政治上不容易归类，他在诸如《给这个最后来者》(Unto this Last)(1862年)这样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对工业社会的美学进行了抨击，但他没有提出系统的批评。他的美学批评被前拉斐尔协会采纳，这是一个由画家、作家、工匠组成的团体，他们强调，特别是通过威廉·莫里斯的著作和计划强调，前工业社会的那种神秘工匠之邦、心满意足的农民和浪漫色彩等价值。由于受到这种影响，设计和建筑方面出现了大规模的改革，集中体现在诺曼·肖的家庭建筑以及19、20世纪之交勒琴斯设计的以新郊区建筑物为代表的“英国风格”上。从莫里斯那里，人们还导出了具有持久潜能的社会主义词令：顽强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平均主义的自耕农社会的形象。莫里斯没有正视工业化，他绕了过去。 512

19世纪80和90年代的美学家为前拉斐尔派的美学，为他们

对中产阶级道德的全面批评提供了新的动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才子兼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和他的同代人爱尔兰人帕内尔一样，由于公开披露自己的性习惯，而丧失地位。王尔德的著名文章“社会主义男人的心灵”展示了美学同个人主义之间，而不是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

自1884年起，这些社会主义倾向得到以伦敦为基地的费边社的加强，费边社成员包括西德尼，比阿特丽斯·韦布，乔治·肖伯纳，H.G.韦尔斯以及稍后的小拉姆齐·麦克唐纳，这些人都是强烈的社会进化论者。费边派对自由党经济秩序的批评与其说是批评其不公正，不如说是批评它无能和浪费：一个由经过训练的职业家上层人物管理的集中计划的经济和劳工市场可以消灭低效率、贸易循环以及失业、贫穷等副产品。费边社主张通过立法而不是革命来逐渐达到这一目的。也许，费边社(Fabian 一词得名于古罗马将军费边)的主要贡献是站在英国左派一边支持“进步”这一新概念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左派的视线一直局限在围绕自治问题的不停争吵上。因为费边社向现存的知识分子宣称：费边运动不是群众运动。但是群众对格拉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缺陷的不满也在发展，来自艾尔郡煤矿的工人基尔·哈迪提出了以下观点：不断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下院中必须有自己的代表(下院中的议员仍然不支薪)。1892年，哈迪被选为西汉姆的议员，1888年，他帮助成立了苏格兰议会劳工党，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建立了独立工党。独立工党视自己为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很难建立一个得到群众支持的组织。它同自由党一样，在言论上是反帝国主义者，支持“彻底自治”，但也要求国有化。H.M.海因德曼的社会民主联盟在其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比较有活力，但缺乏群众基础。

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自由党仍然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左派"政党（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政治讨论中第一次普遍使用自由党一词）。然而，不断提出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在组织上的成功所造成的威胁，引起了自由党的注意。自由党在19世纪最后20年知识分子辩论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80年)这样的著作点燃了土地改革派对改革的热情。乔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促进富裕的过程中是什么造成了贫穷?"乔治明确回答道，是土地拥有者的地租以及工人不能自由地获得土地(包括城市和农村的)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征收彻底和有效的土地税，通常叫做"单一税"。土地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此后一直都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我们为什么不坐下来冷静地看一看比我们所挽救的矿井和工厂里的妇女和儿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堕落呢?"阿诺德·托因比问道；他是开明的基督教徒历史学家、激进分子，曾和T.H.格林一道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初的牛津大学有激进的影响。托因比的门徒(例如1884年在伦敦东部建立托因比陈列馆的卡农·巴尼特)鼓励人们，第一，知识分子要亲自投身到对工人阶级问题的现场观察中去，第二，承认自发努力本身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进步激进派"开始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希望更多的"积极自由主义"者能够注意到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发挥其能力。这势必要花钱，自由党认为这笔钱应当通过增加直接税来征收，特别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在征收税收的同时实行重新分配的措施。1892—1895年的少数派自由党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他们通过第一次强行征收行之有效的遗产税的办法来支付不断增加的社会改革和海军开支。"新社会主义"(这一运动就是如此称呼的)试图通过自由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来证明自由市场体系的合理性。

它企图使资本主义理性化，而不是代替它。这一运动最强有力的发起者是J.A.霍布森，他也是“非道德的帝国主义”的严厉抨击者。这一运动希望把自由党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使自由党继续成为基础广泛的政党，能够继续吸引和统一城市工人阶级。这样可避免德国的境遇，在德国，工人阶级形成了建立在自己阶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该党拒绝承认德意志国家的合法性。人们对自由党的政治期望加强了这一看法。在一系列对他们担任纠察的合法权利和他们不受损害的权利表示异议的不利的法律决定通过后514（这在1900—1901年著名的塔夫·维尔案中达到了顶峰），在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些工会在1900年同独立工党联合形成劳工代表委员会。由于布尔战争而分裂成三个方面的自由党现在处于最虚弱的地位，似乎不太能为工联主义（到当时为止一直称自由党）提供补救的机会。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03年2月同自由党签订了选举协议，根据协议，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选区党团不得投统一党人的票，但要达成地方协议，使一些劳工候选人有机会被选中。

两个左派之间的这种妥协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工党（自1906年后，劳工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是“进步派”的一部分，至少当时是如此，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的改革倾向，都信奉自由贸易。

统一党人（1895年后，由于自由—统一党领导人约瑟夫·张伯伦和哈廷顿勋爵进入索尔兹伯里内阁，因此准确地说应称为托利党和自由—统一党联盟）希望维持英国宪法原状。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支持英国的财政安排，仍然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在两院中占有多数，但没有给保护政策以有效的支持。然而，他的党内的帝国主义者派别开始日益把一些帝国保护形式作为本质的东西。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美国

和德国经济的不断成功是由于它们保护新兴工业。在技术日益复杂的新工业时代——化学、电子、汽车——英国除非实行保护政策，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工业和教育密切配合，所有事情都由政府监督，才能不至于落后；第二，他们认为帝国关税同盟（相当于19世纪初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能使帝国经济一体化，英国制造商品，殖民地生产生产资料。第三，他们把关税（包括货物税）看成是支付使“超级种族”适应不断加剧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必不可少的社会改革的唯一直接税，他们认为英国的未来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一计划在1903年由约瑟夫·张伯伦发动的关税改革战役中具体化（当时张伯伦仍为殖民大臣），这使首相阿瑟·贝尔福大为窘迫，他在前一年继叔父索尔兹伯里勋爵为首相。由于有良好的财政、复杂的组织和代表性，关税改革造成了统一党人的分裂（尽管年轻的温斯顿·邱吉尔是少数几个实际离开该党的议员之一），它先是在一系列补缺选举，然后在1906年大选中被选民抛弃。在这次大选中，自由党和29名劳工议员以绝对的多数当选。19世纪80和90年代，英格兰从自治方面转过身来，但没有摆脱自由贸易。皮尔—格拉德斯通开放市场和降低食物价格的传统仍 515 有很大影响：“大面包和小面包”是自由党颇具吸引力的口号。

但是，尽管1906年自由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消极因素的结果——非国教徒（由于宗教大复兴，他们的队伍迅速膨胀）反对关税改革，讨厌贝尔福的1902年教育法，他们普遍批评统一党人操纵帝国事务——这时候的环境有了变化。尽管到处存在着许多“旧自由主义”（和旧托利主义），但来自左派、右派和自由党本身对维多利亚自由国家的批评措辞非常严厉。

20世纪最初几年（关于20世纪是从1900年1月1日开始还是从1901年1月1日开始，争议很大），境况较好的家庭广泛使用独特的器具，这些器具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由于技术

上没有过关，很迟才找到市场——例如家庭中使用的电灯、电话、打字机、留声机、汽车——不久以后又出现了无线电和飞机。1907年在兰开夏的科尼开始建造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作为电影院的建筑物。突然之间，维多利亚的岁月及其盛行的事物似乎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年月，三名最著名的政治人物——1898年格拉德斯通，1901年维多利亚本人，1903年索尔兹伯里——相继去世，使这种变化显得更为突出。

516 **爱德华年代：国家危机**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年对劳工市场和社会状况的一系列调查有助于人们对19世纪的国家进行重新评价——例如，查尔斯·布思《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该书在1889—1903年间共出了4版计33卷)和西博姆·朗特里《贫困：城市生活研究》(1901年)等调查。布思和朗特里第一次试图把贫困限定为社会现象(这与济贫法对贫穷下的定义刚好相反，在济贫法中，贫穷是一个法律范畴)。朗特里发现约克郡有27%以上的人过着他所声称的“基本贫困或亚贫困”的生活。19世纪80年代后，雇佣工人的生活标准也许有了提高，但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处于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同前面提到的宫廷和贵族成员奢侈的“享乐主义”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几乎3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是骇人听闻的，这使当时的人517 大为震惊。但是这也意味着有70%的人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这一比例在19世纪中期“铁的工资规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断言这种经济必然产生大量的乞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已隐隐约约注意到他们周围的浪费和穷人的遭遇。马休·阿诺德《文化与君主》(1869年)说伦敦东区“有许多极其悲惨、无法维持生活的穷苦大众”。对于这种现象，他们

的反应最终是地方性的和个人的，通过个人慈善的形式减轻那些他们实际上熟悉的、或所谓“值得可怜”的那一类人例如贫困绅士的痛苦。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系统调查不仅使人们吃惊地发现“超级种族”竟会如此贫穷，而且，这些调查所提供的数字表明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和办法；在不弄清问题的严重程度之前，是不可能正确处理好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主要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评论道："如果说1834年的问题是贫民问题，1893年的问题则是贫穷问题"，他的意思是说，贫穷问题已变得可以界定和可以解决。

1905—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尤其是1908年阿斯奎斯在坎贝尔—班纳曼死后成为首相后，试图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免费供应午饭(1907年)、老年保险金(这是1908年阿斯奎斯成为首相前起草的一项计划，尽管它是由继承他任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合乔治在下院贯彻执行的)、对付凯恩斯财政赤字的“发展法”(1909年)、温斯顿·邱吉尔的劳工交换法(1909年)；劳合乔治的“全国保险法案”(1911年)(该法案对一些工人在生病和失业时实行强制性的保险，由国家、雇主和雇员支付有关费用)，所有这些立法以及其它一些小的措施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第一批立法的里程碑。这些立法以抛弃维多利亚的以下原则为基础，即个人的诚实和勤奋将保证较大的繁荣；这些改革都承认资本主义浪费大，效率低，是惩罚个人，不管这个人的品质如何，与此同时，单凭“自愿行动”是不够的。但是，他们的改革仍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人的改革，他们认为只要对这一制度作零星的调整，就能够逐步淘汰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并使它“公正”。

这些改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它们是以广泛的一致性为基础的；通过征税来支付改革所需的费用引起了特别争论，由于需要征收大笔的钱款来支付“无畏”舰队的开支，以对付德国的海军

扩张，这一争论更加复杂。主张关税改革的人赞成通过保护性的间接税来征收这种税收；自由党为日益扩大的直接税立法。劳合乔治1909年的预算由于拟对比较富裕的人征收“附加税”以及试图对土地征收效益税，从而把长期潜藏的问题白热化。贝尔福和统一党人利用上院的力量推翻了这一预算。

518 这是不断使用上院来挫败自由党立法的高潮：1893年的自治法案以及1906年至1908年间的一系列措施或是被弄得支离破碎，或是遭到破坏。否决预算，传统上是下院的权利，现在上院否决它，这对英国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打击。统一党人认为对财政立法的常规豁免权意味着自由党人正使用这种权利来改变实际上是社会立法的方向——但所有征税，其结果是，而且总是社会性的。1910年的两次大选使自由党依赖工党和爱尔兰的支持，但结果仍然是反对上院的人占明显多数；统一党人领导人——尽管不是所有的追随者——最后承认了这一点，1911年议会法将上院的否决权限定为二年。

这一大的制度上的论战是从有关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开始的：额外税的负担落在谁的头上——是通过附加税落在富人头上还是通过食物税落在穷人头上？这一问题的展开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即有关宪法组织问题。应爱尔兰支持者的要求，自由党人现在提出了第三自治法案，这一法案同废除威尔士的英国国教一起，在1914年议会法的有关条款中成为法律，尽管由于战争的进行实际上被拖延下来。

519 统一党人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预算，但无法容忍自治。在他们新领导人安德鲁·博纳·劳的默许下，他们原原本本地接受了邱吉尔勋爵在1886年提出的“爱尔兰将要浴血奋战，爱尔兰是正义的”口号。他们把炮弹（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运往北爱尔兰。人们对军队是否忠于国家颇为怀疑。统一党人在整个联合王国的三

次选举中遭到失败后，他们把爱尔兰拖到了战争的边缘。自由党在厄尔斯特问题上作了较大让步，不过这种让步本来可以在较早一点时候作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止了这次内战的爆发。

对于政治和政治学家来说，爱德华时期的英国是一个骚动不安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复活以及自由党愿意就许多长期拖延下来的或受挫的问题达成协议对统一党人来说是件头痛的事。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他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这一民族的自然统治者。

但是，如果说旧的统治者上层人物的衰落引起了最大的麻烦。那么，新的、正在兴起的力量也是很积极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可以追溯到J.S.穆勒修改1867年改革法、使妇女享有选举权的试图。这一运动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一些妇女获得了地方选举权以及参加英国宗教会议，担任地方议员候选人、学校董事会成员、济贫委员会委员的权利。19世纪70和80年代，中产阶级妇女对她们所担任的辅助性的公共角色——帮助教士、医生或议员、担任慈善机构秘书（主席总是由男人担任）、参加大学的考试却没有学位——不再满足。妇女们被剥夺帝国议会的选举权逐渐被看成是对妇女权利的剥夺，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是一个争取新型的市民权力的运动。福西特女士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在1897年同一些组织联合起来，是一个取得很大进展的无懈可击的争取自由权力的运动。然而，潘克赫斯特的“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1903年）的势力超过了这一运动，使它相形见绌。该同盟日益赞成用暴力反对财产和政治家个人以及通过监禁和挨饿使其备受折磨，甚至有时将其折磨致死。这一同盟究竟是有助于这一事业还是阻碍这一事业很难说得清楚：一方面，它使这一事业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它对暴力的支持使它疏远了议员中可能的支持者，尤其是首相阿斯奎斯的支持，这使有关它的立法屡屡失败。尽管它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部获得支持，也从少数统一党那里获得支持，但在

1914年前，没有通过任何立法。

爱德华时期的工会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工会成员从1901年的200万发展到1913年的410万。1908年后的几年，通货膨胀和工资的稳定有助于这一刚刚露面的运动充分发挥其能量；1910年至1912年进行了一系列大罢工，在1911年第一次铁路总罢工时达到了顶峰。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引咎辞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只有成为工会成员后才能加入工党，而绝大多数工会附属于工党(1909年煤矿工人工会附属于工党，这是到当时为止一直支持自由党的主要工会，这一工会的加入是一特大胜利)，工党力量大大增加。在意识形态讨论的刺激下，工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由选举派别组成的网络，其中许多必然具有乌托邦特征(很大一部分是由威廉·莫里斯鼓动起来的)，因为履行这些办法的手段一直很有限。该派在下院中有稳定的基础，但范围有限，主要依赖同自由党达成的协议，1906年选举时，它给自由党带来了30个席位；假如考虑到在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工业议席中，60%的成年男性没有选举权的话，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的点滴成功大不必大惊小怪。然而，下院中这一派主要把自己看成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成功地修改了自由法案，以阻止各工会根据1906年塔夫·维尔案后形成的工会争执法合法地联合起来。工党也干预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威斯敏斯特这一缓慢的进步导致了一些工联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威尔士矿工中的某些人)转为工团主义，即工会“直接行动”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包围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的机构。

工党的存在与成功，同工联主义的发展与困难休戚相关，反映了该党同自由党在社会和知识方面的差异。劳工运动的团结性是以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社会共鸣、他们在工作和闲暇中的共同经历以及他们自己已明确宣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概念为基础的。工

人阶级没有感到自己被有产阶级疏远，但他们确实感到自己受到冷淡。由于自由党没有接纳工人作为候选人，这种感觉愈益深刻，不管在政策方面达成多么广泛一致的看法，自由党同盟的中产阶级成员——这是一些在各选区发号施令的人——都不会把希望通过充当奴仆的途径进入他们队伍的人接纳为候选人的。

“落日余晖”

因此，爱德华在位时期翻新的自由主义遇到了许多困难。本世纪的两个伟大改革政府中的第一届政府有力和富有想象力地解决了这些困难。它成功地遏制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到1914年把许多大陆国家拖入政治死胡同的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机(尽管爱尔兰仍然有可能是例外)。导致英国自由党政府垮台的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外事务。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贝尔福内阁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以及1905至1914年间爱德华·格雷为自由党所追求的协约政策所带来的矛盾后果。在欧洲的平衡中，英国绝对和动情地，而不是有条件地站在法国和俄国一边。1905年后英法秘密军事会谈增强了这种义务感。尽管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对欧洲大陆很难产生直接的影响。R.B.霍尔丹的军队改革发展了将来用于欧洲的远征军，尽管这支军队效率很高，但同大陆国家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相比，仍然很小。事实上，德国对它根本不屑一顾。由于“欧洲一致行动”概念公开让位于民族自决，英国的作用减小。尽管格雷本人是强烈的反德分子，继续避免达成正式的同盟，但到1910年，已很清楚，如果英国有敌手的话，德国将是英国的敌手。在南非、巴尔干和土耳其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在海军建造计划的继续升级中(尽管英国，特别是1911年至1912年试图商定限制性协议)，英德敌对已成定局。它开始表现在文化、外交和军事方面。英国对德国

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关切与敬意现在开始变为惊奇和担忧。

522 当1914年6月和7月的巴尔干事件和中欧事件迅速导致战争，也就是说德国估计的充当霸主的时候已经到来时，英国很少能施加影响。可能除俄国外，英国从这场战争中所能获得的东西比欧洲其它任何大国都少。如果德国人不进攻巴尔干，英国自由党内阁是否会全然投入战争，值得怀疑。不过，德国既忽视了英国长期以来对低地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关注，同时也忽视了保证巴尔干独立的意义，他们曾与英国在1870年签订条约，这在普法战争中仍然有效。对巴尔干的进攻决定了事态的发展，阿斯奎斯领导其内阁投入战争，结果两人辞职，——约翰·莫利和约翰·伯恩斯。阿斯奎斯这样做并非自愿；英国政治领导人不具有那种充满激情地举旗投入"到圣诞节就结束"的战争的轻率精神。

英国在心理上显然没有作好进行大陆陆上战的准备，而在物质上也基本上没有做好准备。地面战争，甚至在克里米亚和南非发生的战斗，被看作无关重要的小事，由职业军人和一些志愿兵进行就行。军事重要性在贵族和乡绅，逐渐地在公学中有一定影响，但在其它地方影响不大。右派团体的社会军事化的企图——从19世纪50年代的民兵，到来福枪手和志愿兵到1900年前后罗伯茨勋爵的国民兵役联合会——都令人注目地失败了。"特拉发加战役纪念日"是一年一度的军事庆祝会，这表明在公众心目中基本上只有海军及其防御——即所谓的"蓝海"政策。除一些农村地区外，"当兵"、"从军"对普通人来说是失业或个人遇到不幸时的一种绝望的行动。英国公众喜欢沙滩和鲜艳的制服，因为它们赏心悦目，同战争的各种征兆恰好相反。英国崇尚浮华与家庭情趣。到爱德华年代，政府的枪炮和船只的订货合同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成为英国东北部经济的重要部分，但总的来说，军事问题很少影响人们对

政府和社会的看法。它肯定没有像大陆各个国家实际发生的那样渗透进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结构。第一个工业国家为世界在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方面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公共试验，它的成功是以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为前提的。1914年8月4日(星期二)，这种试验突然被打断。

第十章　二十世纪

(1914—1984)

肯尼思·O. 摩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

523　1914年7月17日，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大厦举行的年度宴会上严正指出英国社会状况的不良征兆。在英国国内，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结成的"三角同盟"威胁要发动大规模的联合罢工以支援铁路工会获得官方承认和一周4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在全国工业即将陷于瘫痪的前景下，在爱尔兰海彼岸，爱尔兰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内战状态，信奉新教的厄尔斯特与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共拥有不下20万武装军队，而带有传奇色彩、长期存在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已发展到互相残杀的严重程度。在国外，印度和埃及也有民族主义问题。在离英国更近一些的欧洲东南部，奥地利大公弗朗兹·斐迪南于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又重新掀起暴乱。

因此，在世界大战前夕，由于通过各种制裁和制度也无法应付的紧张关系，英国原来呈现的那番文明、自由、民主的传统景象似乎陷入瓦解的边缘。然而，按过去的经验，一旦战争危机达到高潮，这些矛盾因素往往会迅速地消失。举国上下都由同仇敌忾的潜在情绪所左右。8月4日英国宣战之后，头几周内人民的抗敌情绪不可避免地相当高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只好采取引人注目的措施来维持全国的货币流通和信贷。面对战争的挑战，制造业

和商业不得不打破“照常营业”的老规矩重新加以调整。在大战初期的具体战役中，英国的经历似乎是惨痛的，因为临时征集的英国远征军匆匆开赴佛兰德和法国，竟在伊普尔遭受严重挫败，不得不从蒙斯狼狈撤退，损失惨重。这样，英国部队就只剩下三个军的兵力，因此大战几乎一开始，它的战斗力就大为削弱了。除了法国部队在马恩河上奋力抵抗，阻止德军迅速进犯巴黎之外，德国及其奥地利同盟获得初期的胜利。 524

不过，在战争刚开始就打了败仗之后，英国举国上下都投入了长期战争的准备。国内种种重大问题，如爱尔兰自治，在对敌斗争期间都暂时搁置一边。各政党之间也宣布无限期休战。职工大会当时提出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口号比雇主还高，1914 年夏天发生的工业骚乱渐渐平息下去了。在广泛的——虽说远不是普遍的——对正义战争的一致认识的基础上，一种奇怪的镇定情绪传开了。一个开明社会所能接受的条件是需要从多方面合情合理地解释战争的真实情况。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中最直率的左翼成员劳合乔治提供了这一条件，他在 1899 年曾一度坚决反对南非布尔战争。在大战爆发最初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一直保持缄默，很受人怀疑。但是，1914 年 9 月 19 日，他在伦敦女王大厅对威尔士同胞发表了一通颇有说服力的演说，并表示自己要毫无保留地把战争进行到底。这样，他就赢得了(或要求赢得)最高的信誉。他声称这是为维护自由原则的一次战争，为保卫像比利时那样的“身高五英尺五的小民族”反抗德国人明目张胆的侵略，或支持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反对当前的奥匈威胁而开展的一次运动。毫不奇怪，只要把这次战争说成是神圣的事业，就会不仅得到基督教会各派领袖的支持，同时还有自由党所有的英雄豪杰从福克斯到格拉德斯通的拥护，以及英国国内的立即响应，更不用说苏格兰、威尔士那样较小的民族了。

这种对战争正义性取得广泛一致的认识并没有贯穿后来可怕的整整四年。当然，它经历了许多变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为扩充武装部队而实行不得人心的征兵令之后。到1917年，即使完全不算其他因素，诸如从工人组织中征兵入伍，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提出把国外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的口号，十足的厌战情绪终于扩展开来。当然，通过新闻机构暗中或公开的操纵、出版检查和政府资助的宣传品散布德国人犯下的所谓种种罪行，也可以把这一致的认识继续维持下去。于是出现大肆镇压激进或反战的舆论。尽管政府施加压力，到1917年一些团体如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征兵团契”、民主管理协会（它寻求和平谈判）等对公众舆论仍然发生一些影响。兰斯多恩侯爵提出的和平呼吁(1917年11月20日)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有关战争年代的史实要求广大的人民群众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必要的，必须不惜代价把它进行到底，直至德国人彻底投降为止。志愿人员应征入伍相当积极踊跃；1914—1916年间法国部队各兵种征集了大量志愿军，的确证明比后来用强迫服役办法征兵更为有效。从1914年秋西线相持僵局时开始的海陆军之间的长期矛盾，一直持续到1918年8—9月间盟军最后突破防线仍没法解决，只得听之任之。

这些惨痛的年代给英国人民心理上、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难忘的印象，从而改变了他们的观点，甚至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文学艺术家的感情。即使在这次大战结束后20年，人们对外国战争威胁仍心怀余悸。在西线上，双方都用重兵防守，深挖战壕，无法使用1870年普法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灵活出击的新战术。由于双方都不习惯这样的打法，因而西线战事进展极为缓慢，几乎长达4年，在法国的战事只出现小小的进展。英国部队偶或主动采取攻势，结果他们总是遇到重大伤亡，其严重程度对一个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在享受和平的民族来说，简直是难以理解的。1915年9月英

军进攻卢斯被击退。1916年6月英军进犯索姆河，头一天就牺牲了60 000人，失败更为惨重。仅在这儿英军伤亡人数就达42万人。1917年8—9月，帕尚达埃勒的战况最惨，英军伤亡纪录竟达30万人以上，其中许多人在暴雨中淹死在佛兰德的泥淖里。在这种阵地战役里，骑兵和新发明的武器诸如“坦克车”统统不起作用。连新式战斗机也没有多大用处。如同其他情况一样，级别把指挥官和普通步兵分隔开，自始至终妨碍他们互相沟通。后来几个月里英军实际上已失去了进攻能力。1918年 3、4月，英军不得不避开德军在亚眠防区发动的新攻势。直至8月黑格终于取得激动人心的突破，战事才显露出接近结束的征兆。与此同时，按劳合乔治、邱吉尔等人的主张，英军采取“东方”边缘战略包围西线对峙的地方，也取得了连续的突破。1915年夏的达达尼尔远征由于采取庞大的军事行动失策，导致更大的损失；一年之后的萨洛尼卡的远征也是如此。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使邱吉尔明智政治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此后他花了许多年才挽回自己的名声。甚至在公海 527 这一英国原来独霸的区域里，1916年6月英国海军在日德兰附近与德国海军相遇，发生一场大海战，这场战斗至多只能算是平手。由于指挥不力，英国大舰队在海战中损失3艘战斗巡洋舰、3艘其他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后来的反战宣传几乎从各个方面大肆渲染愤怒的群众如何仇恨应对这次惨重牺牲负责的陆海军指挥官。“战争诗人”如威尔弗雷德·欧文、艾萨克·罗森堡（他在战役中阵亡）、西格弗里德·沙逊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他幸免于难）等对帕尚达埃勒大屠杀尤为激动，一致宣扬；只要战争这一概念出现，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因为大屠杀的结果会把一代青年的半数毁灭。赤裸裸的战争伤亡数字——75万人阵亡，250万人受伤，还有许多人终身残废——加强了这一群众性反军国主义的信念。不过，尽管理应如此，当时大

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持这种看法。1915 年底，西线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确实被撤职，由一位严肃、沉默的苏格兰低地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继任，他扎扎实实地在广大群众中建立起勇敢正直的威信，与此同时，埃德温·勒琴斯爵士设计的战争纪念塔，纪念在蒂埃普瓦阵亡的英军将士，也赢得群众爱戴。其他海军和陆军将领，如贝蒂海军元帅和艾伦比将军(1917—1918年他在埃及出色地指挥战役，率领军队通过巴勒斯坦进入叙利亚，消灭了德国同盟土耳其部队)几乎成了受人欢迎的英雄。战壕成了严酷、无法逃脱死亡的象征。布鲁斯·班斯法瑟的著名漫画《老比尔》奉劝战友，如果他晓得"有更好的地洞，就请钻进去吧，"反映出对阵地战的恐惧普遍采取幽默、容忍的态度。在军事紧急关头过后，美国又给予大量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到1918 年 11 月停战的时候，英法部队已突破德军防线直抵德国边境，这时，群众对战争的热情达到了顶峰。英国似乎又在英伦三岛上酝酿出马尔伯勒公爵显赫时代以来的一种不为人知的、新的军国主义狂热。

战争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以及后来的普遍痛恨战争)其主要因素是全民、全社会及其经济结构都卷入了大战。在从容不迫的开始之后，战争于 1915—1916 年间带动了工业和社会的重大改革;它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和集体操纵。工业、农业的生产与分配全部由庞大的战争机器需要来支配。这一模式是劳合乔治在 1915 年 5 月上任管理的新军火部设立的。军火部的成立是为了对武装弹药的供应严加控制，该部也就成了通过"动员人员"刺激整个工业机构的一个大型中央机器。它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对不同领域如社会福利、住房政策、妇女地位等都发生影响。煤矿、铁路、商船以及其他船运全都归国家控制。战前不干涉政策的老口号，连同自由贸易的空洞原则都束之高阁或无人问津。传统的工业系统也同样全部编入新的机构。1915年 3 月，政府与

工会（矿工除外）谈判后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同时保证允许集体协商，于是工会领袖从此可以间接地接近政府。财政协议当然没有达到它的使工业在战争期间普遍太平无事的目的。煤矿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纠纷，尤其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正式举行罢工获得胜利。军火部推荐非熟练工人(尤其是女工)进机械厂以"代替"正式劳力，并力图控制军事工业中的劳工运动引起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在克莱德地区。1916—1917年间苏格兰和谢菲尔德的工人委员会的非正式活动使我们联想到对战争年代的一致认识是肤浅的，而且远不是统一的。不过，战争却保证了工会地位继续合法——还有新近并入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雇主们。劳资关系中看来很可能出现一种新型有组织、有计划的制度。有势力的企业界人士如埃里克·格迪斯爵士、约瑟夫·麦克莱爵士、德文波特子爵、朗达子爵等在中央政府主要部门中出现是值得注意的事件。这象征着工业和政治领导关系的变化正在进行。爱德华七世的开明英格兰正在转变为国家企业，后一代人几乎可以称之为"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通过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大战对集体的影响确是深远的。反对战争的左翼人士如工党党员拉姆齐·麦克唐纳曾讽刺说，战争命令比工会和激进人道主义者在过去半个世纪所发动的一切运动更能推动社会改革。政府活动正开辟新的前景。在和平年代管理英国的精英——技术、专业和文职人员——的行列里，又增加了新的阶层。行政管理阶层大量地扩充。社会改革者如威廉·贝弗里奇或西博姆·朗特里，甚至连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都在中央政府休假期间成为具有影响力甚至受人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1916年12月劳合乔治继阿斯奎斯当了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谷物生产条例使英国农业重新振兴，给佃农和雇佣劳力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和教育也得到重视，

尤其是通过1918年H. A. L. 费希尔教育法规定免费普及基础教育，并为从基础教育进入中等或高等教育创造机会。以保守党529人物詹姆斯·索尔兹伯里侯爵为首的一个政府调查组为国家房屋建设计划打开了新的前景，而这一领域却是新自由主义在1914年之前几乎完全忽视了的。原则上规定有系统地资助地方政府房屋，给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提供需要的租赁住房，清除城市中心及老工业区的贫民窟。政府对公共卫生也表示关注。一方面战争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的生命，另方面国内又保护生命：改善医疗制度，给儿童、老年人和哺育婴儿的母亲创造更好的条件，成立医疗研究委员会等等革新，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到1918年底，政府又提出一项新建议：由卫生部协助提供医疗服务和全民的健康保障以取代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职责。

英国社会从战争时期的经验中首先得到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们(实际上是全民中大多数人)认识到这是个解放的时代。英国妇女在战争年代中获益最多。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前线服务，通常参加战地医院工作。护士伊迪丝·卡维尔为了协助在比利时的英法战俘逃亡而惨遭德国人杀害，这一景象又大大有助于普遍提高妇女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国内，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如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女儿克里斯塔贝尔（不是她那个小女儿社会主义者西尔维亚）也帮助政府搞征兵运动。妇女在行政事务、军工厂、机530械厂和其他许多原来妇女不熟悉、只收男工的工作中更广泛地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几十年来束缚英国妇女的性别界限在大战的重大压力下取消了。现在很难再说妇女仍然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权了，因此，1918年人民选举代表法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有选举权。这几乎是逆潮流而动。长期对妇女残酷迫害和歧视阶段一下子就结束了。政府通过到处强调战争的积极后果，和推行原应等和平恢复时才开展的全面“重建家园”(用词不当)计划，借以策划(也许不

是有意的)扩大和加强当时人民的统一步调。

大战使英国政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战爆发时，下议院仍然多数由保守党(或统一党人)和自由党互相竞争，轮流操纵。不过，大战给自由党带来了灾难。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严重地损害个人和平民的自由。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自由党人隐瞒了战争的真正好处，使大家长期不明真相。1915 年 5 月阿斯奎斯自由党内阁让位给三党联合执政标志着自由主义垮台的新阶段。此后，阿斯奎斯在本党内显然领导不力，同时党内在征兵基本问题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两人都肯定征兵是表示全心全意"战斗到底"的标志。而更多的老自由党人如西蒙和麦克纳却犹豫不定。阿斯奎斯自己也闷闷不乐地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征募所有 18 岁至 45 岁的成年男子，但是抨击阿斯奎斯和自由党道德标准的呼声普遍继续高涨。

1916 年 12 月最后危机来了。几个月以来，对政府执政失败的不满一直存在，这种不满不仅针对战场上失利，同时也针对解决爱尔兰问题和国内劳工纠纷不力。紧接着是 1916 年 12 月 1 日至 9 日间拜占廷玩弄复杂的政治花招，使历史学家们摆开中世纪老学究的架势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工党领袖博纳·劳、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联合建议阿斯奎斯成立新的最高战事委员会以管理战争事务。在犹豫不决多日之后，阿斯奎斯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劳合乔治辞职。经过 12 月 4 日至 9 日间双方力量激烈的较量，他竟上台出任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首相。这个政府不仅包括保守党内所有统一党人，还包括了(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以一票之差赢得多数的)工党，再加上下议院中约占半数的自由党人。这样，从 1916 年12 月至 1918 年 11 月劳合乔治就为自己建立了近乎不可动摇的、半总统式的地位。他是最高的战争内阁首相，有新内阁办公室及由私人秘书组成的非正式顾问团或"郊区花园"的支持。

531 这一尖顶是建筑在一庞大的中央集权机器之上的。劳合乔治在政治上的胜利有助于战争取得胜利——但对他自己的自由党却是一



劳合乔治在索姆河与印度士兵交谈(1916年9月)

场大灾难。由于党内仍然分裂,自由党从根基上削弱了,在议会中不起作用而且意见分歧,士气一蹶不振,在出版和知识界里失去了大量的动力。在1914年之前推动过许多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就这样一下子消失了。当1918年11月大战结束的时候,自由党人四分五裂,残缺不全,成为大战受害最深者。

工党很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这个党在大战爆发时也一直是四分五裂的。与工会领袖们的爱国主义相反,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许多社会主义左派人士一直反对参战。结果麦克唐纳不得不辞去议会中工党领袖的职务。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如征兵的影响(军事上的,也可能是工业上),以及是否接受劳合乔治的领导同样使工党困扰不安。不过,大战的长期后果,对工党是完全有

利的。工党所依靠的工会经历大战之后大大加强了。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几乎成倍地增长，达到800万以上。工党还受到俄国革命和大战最后两年中更为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工党一面为政府效劳，一面又以原来反对派的面貌起作用。这样 532 的地位使它正好利用自由党人的内部困难乘虚而入。最后，1918年的选举权改革把有选举权的人从800万人扩大到2100万人以上。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选票大大增加，同时助长以阶级为基础在政治上向两极分化的倾向。1918年，工党章程规定该党担负一项社会主义新任务，更重要的是改组选区和总部的结构以便由工会彻底控制。虽然当时没有被人预见到，工党的发展是大战在政治方面产生的一个重大结果。

真正受惠的还是保守党人。大战促成他们转变为自然占多数的政党。既然他们自称是爱国者，大战也就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在1914年之前他们在关税和其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此外保守党越来越代表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这时他们大多数以城市或郊区为基础，不再是代表乡绅的党派了。在大战末尾，当重视商业的新人物如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先后上台时，保守党就像工党一样摆开架势，准备摧毁爱德华时期的政治体系。当大战在1918年11月11日宣告结束，劳合乔治上任为总指挥。他那些与自由党联合的余党，在选举中与保守党结成同盟，反对在反政府的自由党中的和平主义分子以及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这样，右翼统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

在国外，大战年代也促进了一些变化。从各种意义上看，这确实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既为大英帝国同时也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值得感谢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以及印度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援。澳新军团日（纪念他们在加利波利半岛苏瓦湾英勇奋战）在澳大利亚日历上却变成了悲剧性的象

征性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开过一次联邦首相参加的帝国战争内阁会议以协助英国本土的内阁。像南非的史末资这样一位得力的联邦政治家也应邀前来参加讨论英国内阁事务。在商业方面，英帝国给予越来越多的优惠。这时，帝国秘诀是一大神通的力量。当时的主要建筑师有埃德温·勒琴斯，他青年时代受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参加过工艺美术运动。这时，他和赫伯特·贝克一起重建德里市，把才能转向装饰艺术和环境规划。他们设计的大型总督府和行政大厦等建筑有古典风格权威之称。大战期间，帝国观念比以前更容易受人接受。大战时期的秘密协定确实保证了英国用托管制度或其他策略以和平方式史无前例地扩张大英帝国的版图，把中东广大的新领地一直延伸至波斯湾。“阿拉伯的劳伦斯①”等奇才怪杰的活动引起了轰动，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中东地区发现的丰富的大油田打开了诱人的前景，这就激励英帝国一再向外扩张版图。

533 然而，要维持原来的版图已变得越来越不实际了。早在1914年之前，行之有效的帝国政策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遇到的种种抵制已渐渐明显，尤其是在印度出现不断壮大的国大党运动。这时还有其他的事件——有效地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屡屡发生。威尔士在劳合乔治领导下只知盲目地爱国，爱尔兰则不同，掀起了反殖民主义的骚乱。1916年4月由少数共和军和新芬党人领导的复活节起义似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到1918年中期，在阿斯奎斯政府野蛮的反动政策帮助下，新芬党及其共和主义政纲在爱尔兰南部几乎26个郡中赢得了信任。在英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老领袖如约翰·狄龙竟被新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迈克尔·科林斯和艾蒙·德·瓦勒拉取而代之。到大战末期，爱尔兰南部实际上采取了军

① 劳伦斯(Lawrence,T.E.,1888—1935)，英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成功地在阿拉伯人中进行策反活动，被誉为“沙漠枭雄”。——译者

事管制，反对征兵法，几乎达到掀起暴乱、反抗英国王室和新教发展或其残渣余孽的状态。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长期发展，经历了从奥康内尔到帕内尔和雷德蒙领导几十年的立宪代表会议的和平时期，似乎走到发动新暴乱的边缘。大战年代的一种明显风气，即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致认识，尽管在克莱德地区和威尔士矿山里比较薄弱，没有蔓延到全爱尔兰的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的蓬勃发展，一种新型的要求摆脱英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正在暗地里进行。印度、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很可能都在注意事态的发展。大战留下了更完整但也更孤立的不列颠，它昔日耀武扬威的帝国角色，已被战后世界广泛的变革所淹没。

二十年代

534

当和平恢复的时候，情况变化似乎不大。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在“联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这就保证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个持续时期。选举的结果也是爱国主义和大战年代团结的产物。当选的首相几乎普遍被公认为“赢得大战胜利的人”，是自克伦威尔以来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选举结果确实是一边倒的。支持联合政府的人数不少于526名(其中自由党人占136名，其余几乎均为统一党人)，工党议员只有57名，独立自由党人为26名。但是细细观察一下，这样的结果却不是那么确切的。工党的57名议员纪录隐藏着这样的事实：该党获得了250万张选票，在选举中几乎可以取得巨大的突破。在爱尔兰，新芬党在南部81个席位中获得了73个席位，它的代表退出威斯敏斯特议会，在都柏林另立自己的非正式议会或称“爱尔兰众议院”。尽管如此，以首相及其战争期间的同僚的名义发表的命令，看来是必须执行的了。选举似乎也肯定了社会经济在许多方面已迅速恢复正常。许多战时管制和国家机构的集体制度消失了，犹如它们从来不曾存在。大工

业又回到私人手中——铁路、船运、甚至煤矿；煤矿业主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可恶的集团。政府还开始推行稳定的财政政策以保证最后恢复金本位制，这就必然导致紧缩通货，把大战期间迅速大量发行的纸币稳定地加以紧缩。伦敦市、阶级制度、私人资个主义看来注定可以随便发展。为了显示资本主义讲究人情，政府在1919—1920年间也匆匆地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活动。当然，劳合乔治在竞选运动中表示热衷于造就"宜于英雄施展才干的地方"远比要做坚决吊死德国皇帝或"把德国人逼到山穷水尽"的沙文主义者更为积极。因此，他一上台，哪怕昙花一现也立即雷厉风行地执行发展医疗卫生、普及教育、提高抚恤金和扩大失业保险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党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博士推行的住房津贴计划；由于国库不得不支持这项计划，1919—1922年这一时期内公共建造房屋竟超过20万间，虽然有限却对解决国内一大社会难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生活并不正常，这很快就令人不安地显露出来了，而1914年前那种安逸的框架并不易于恢复。由于失去了许多国外市场和出售了海外投资以支付战争开支，结果造成一系列新的破坏性的经济问题。其中最糟的方面是国债大量地增加，报纸以头条新闻把它刊登出来，颇引人注目。1914年无法偿还的国债总额达到7.06亿英镑。七年之后，它增至7.875亿英镑。结果在1918—1919年的急速通货膨胀之后，就出现了人民要求改善经济、停止公共开支的"浪费"和恢复预算平衡，稳定货币的强烈呼声。政治状况也远不是正常的。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是在阴谋笼罩1918年召开的"联票选举"的背景下，于不愉快的气氛中上台的。这个联合政府执政能否名正言顺是值得怀疑的。加之，自由党首相和他的保守党同僚之间在国内外和殖民地事务上经常发生紧张关系，联合也就成了政府内部纠纷的牺牲品。劳合乔治本人是个造

535

诣很高的人，忙于参加各种国际和会，远离下议院，又是不带随员的首相，他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性生活方面大胆妄为，因而不能赢得普遍的信任和爱戴。于是，在大战停战期间举国统一的认识不久即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新的矛盾。

反对派发动了一系列逐渐破坏联合政府执政的挑战。新的统治模式正在形成，并为以后20年的英国史铺路。在左的方面，许多自由党人针对劳合乔治对待自由贸易之类的空洞旧原则过于轻率展开猛烈的抨击。1919—1921年英国政府为了发动战争，反抗爱尔兰共和军，竟采取不加节制的报复政策，出动王室供养的后备军队去支援军队和武装警察，导致流血暴行，从此之后，劳合乔治对爱尔兰的政策显得更使人震惊。1921年12月，天生善于谈判的劳合乔治终于与新芬党领袖阿瑟·格里菲思和迈克尔·科林斯和好了。从1922年1月起，由南爱尔兰26个信奉天主教的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了，其余爱尔兰东北部6个信奉新教的郡仍留在不列颠联合王国内。但是，政府如此改弦易辙，要在自由舆论中修复劳合乔治失去了光泽的形象，未免为时太晚了。在工党和工会内部，首相长期享有劳工监护人的威信已丧失殆尽。在1919—1921年间，他的政府采用粗暴方法，包括使用紧急措施和出动军队(甚至包括警察)镇压矿山、铁路以及其他工人的全国性罢工。此后政府再也防止不住失业(不久即达100万人以上)的不断增长，它使老工业区笼罩上一层阴影。1919年通过桑基报告明目张胆地欺骗煤矿工人并建议实行矿业国有化，以及在"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进一步破坏"三角同盟"以打击矿工，这一系列事件都在工人阶级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一个选举出来要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统一的政府却反而使阶级更进一步分化。如果联合政府在左的方面受到抨击，那么右的方面的火力也同时加强。保守党人渴望恢复独立党执政的健康制度，摈弃首相及其 536

随从的冒险措施。虽然联合政府延续近四年之久，它终于陷入绝境，连首相劳合乔治也走投无路。

除此之外，人们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和平条款抱有更广泛的失望情绪。和约的签定越来越不得人心。与此相连的还有大战期间英国和盟国之间偷偷订下的秘密条约，以及强加于战败的德国人身上的有关财政赔偿和疆界安排的不公正条款。经济学家J.M.凯恩斯在他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一书中对这种情绪阐明得最有说服力。他以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中途辞职以示抗议，因此他的著作立即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该书论断似是表明对德索赔过重会导致它的财政崩溃，从而长期削弱欧洲的经济。凯恩斯又用生动而深刻的语言揭露签订凡尔赛和约的人如何在狂热和腐败的气氛中私下讨价还价。他指责劳合乔治是个“完全不得人心”的人。于是首相后来代表欧洲出席一系列国际会议就很不受欢迎。按博纳·劳著名的话说，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了。大英帝国还有可能扩张领土，但必须同时从它在欧洲承担的义务中退出来，否则另一灾难就会如同1914年8月那样折磨英国本土。1922年10月，当英国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和直布罗陀海峡而濒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劳合乔治联合政府遭到了最后一次打击。保守党和英国左派都反对重新掀起这场侵略风波。政府的右翼基础垮台了。1922年10月19日，劳合乔治下台，从此在政治上再也不受人重视。

537

反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两种势力继续存在。他们先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为代表，二人均在1927年10月促使联合政府垮台的运动中成名。麦克唐纳宣扬乌托邦国际主义和“美妙的新世界”① 的理想主义，是不断壮大的工党最完美的代言人，

① “美妙的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赫胥黎(1894—1963)的一部幻想小说的书名。它讽刺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灾难：人沦为机器、个性自由被扼杀、文化艺

该党在1922年及1923年大选中席位猛增。他能够对克莱德区的社会主义和伦敦机关的社会习俗两者同时保持暧昧关系。和他相比，斯坦利·鲍德温则更有影响力，他率领郊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正统爱国主义的保守党力量，他们对劳合乔治的政治实验以及战后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国际冒险主义全都哗然。鲍德温先后在1923—1924、1924—1929、1935—1939年间任首相，是一位可以尽快使英国恢复安定、太平的合适的领袖。

这时，在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经常发生动乱。战前安排好的许多模式这时似乎都受到抨击。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的小规模运动预示着联合王国本身的统一可能受到威胁。有两个小型的民族主义党派以爱尔兰人的模式建立起来，一是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党，另一是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不过，它们的重要性还在于遥远的未来。在艺术、文学、音乐、美术和建筑方面，战前的大师如基普林、哈代、埃尔加以及勒琴斯等虽仍有名声，却暗地里受到反映“现代主义”的先锋运动的挑战和反叛。在小说家中，主要作品已问世的有乔伊斯和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于1920年出版，大战期间它的反响欠佳，此后劳伦斯的后期作品似不大受欢迎。更有创新精神的是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有关系的一小批知识分子和美术家的作品。尤其是维吉尼亚·伍尔夫，他写出一系列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其中人物性格勾勒维妙维肖，叙述形式特别流畅，证实了“现代主义”在小说中的生命力。比较正统的是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1924)，作者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有间接的关系，他在这部作品中反映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时体现出西 538 方开明人道主义自信心的逐渐丧失。在诗歌方面，取得开拓性进展最显著的是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它具有扣人心弦的节

术濒于毁灭。他以悲观的态度描述一个假想的世界国家，该国的口号是：“社会性、同一性、稳定性”。——译者

奏和鲜明的形象；贯穿作品始终的基督教谦卑精神和私下的悲哀情调反映出20世纪文化的一大特色。除肖伯纳写出他最富有哲理的剧作《圣女贞德》外，这时不是戏剧创作的繁荣时代，更不是美术、设计和建筑发展想象力的时代。画家如本·尼科尔森等人仍在寻求新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等显然在停步不前。在美术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还造就了几个著名的反叛者：美术评论家和保护人罗杰·弗赖伊，画家邓肯·格兰特和瓦尼萨·贝尔等人都力图从表现方法上突破现实主义的框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中的作家、美术家和有关的人，如经济学家J.M.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雷奇和该团体的哲学家兼导师G.E.穆尔确实多才多艺，但都受到20年代英国文化的种种限制。这个团体一心想把欧洲大陆的现代派诗人和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灵感注入英国艺术之中。他们崇尚创新与坚决反叛传统相结合的精神，这在利顿·斯特雷特的论著中尤为充分。他对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直至她以下的许多名人不为人知的缺点，都加以揭露和讽刺。在消极方面，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鼓励进行天生的、近乎宗派的艺术观点的交流，它终于带着自己的色彩走进象牙之塔。难怪30年代的作家批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是个新的文化统治集团。他们抨击该团体的成员（宁可追求美感）对道德观念强调不够和对政治和社会缺乏应有的关心。大概这些成员的作品具有鼓励高雅艺术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倾向。

不过，艺术方面的发展，以及它们要求在表现方法上解放思想和革新，是和当时广泛的社会运动合拍的。这时获得选举权的妇女（1918年只有部分获得，1928年则全体获得选举权）能够享有其他自由，如吸烟、看电影、过更开放的"性生活"、不再穿色彩单调清教徒式的衣裳。20年代传记所称赞的"服饰鲜艳的年轻人"，亦即诺埃尔·科沃德在他的讽刺小品和剧作中着重描绘的人物，也只局限于他们的外貌。他们通常是中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他们或者

他们的朋友都是和公学、牛津以及剑桥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学校，特别是牛津，都受到自由文化的自我表现的影响，具有腐朽没落、虚无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倾向，它们正是30年代反战的标志（同样是错误的标志）。一般来说，较老的大学可能对社会的影响比后来宣传所说的要小得多，但是它们无形中也和当时的实验气氛溶为一体。

当然，道德标准的老牌卫士们在战后似乎遇到丧失权威的危险。这一点在教会中特别是大战伤亡数字公布时表现最为明显；不过，拥有大量爱尔兰教徒的罗马天主教会可能除外。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一度是许多人精神上的指路明灯的新教教会，这时都陷于教徒减少、经费缺乏和丧失威信的境地。即使在势力最强的威尔士和苏格兰，新教教会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减。由于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教会的种种道德规范，那么清教主义和严守安息日主义面临的挑战就更不用说了。连英国国教在战后也得克服许多困难才能继续承担它原来确立的全国任务。大主教如兰德尔·戴维森、科斯莫·兰等还在用老一套笼络人心的言词和规范去讲道，可是他们的布道看来已越来越不起作用。从形式上说，英国仍被公认为基督教国家，国教领袖也仍受人尊敬，他们和王室以及有领地的贵族还有牢不可破的关系。星期天当火车停开，铺子、戏院关门，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则连酒馆也停业的时候，这一天仍然是安静、沉闷的日子。1927—1928年间，英国国教祈祷书修订本的出版引起了公众激烈的争论；安立甘公教派与英国国教的福音派之间的旧纠纷又重新抬头。宗教仍然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代表家庭、社团，它又是维护爱国主义的一种可靠形式。那么，通过青少年活动如童子军、教会团，也是保持宗教与王国之间联系的一种纽带。大战本身促进了世俗的虔诚，以勒琴斯在白厅设计建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为其象征。然而，尽管有这些正式的装饰让人

539

540

民记起他们世世代代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和神奇作用已明显地衰退，尤其是对战后一代和复员军人。

教会对1926年大罢工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能为力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同年，工业衰退的恶性循环、失业和社会不满导致英国前所未有的阶级矛盾大爆发。这时，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过去。鲍德温首相呼吁"上帝赐予我们太平盛世。"然而在英国最大的工业部门即煤矿里，由于削减工资、开除工人致使矿工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劳资关系仍然十分紧张。1926年4月，政府拒绝恢复采矿业的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职工大会代表谈判破裂。几乎出于偶然，工会纷纷投入大罢工。整整九天（5月3日至12日），英国完全陷于瘫痪。工会的潜在经济力量在与政府及其现存制度较量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作用。英国国教领袖们从侧面呼吁和解，却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这次大罢工是相当和平的。对许多开公共汽车和参加其他破坏罢工活动的工贼（包括因干这一勾当而旷课的牛津和剑桥学生）都没有施加暴力。警察或武装部队既没有使用暴力镇压，也没有遭到暴力反抗。最后，5月12日，职工大会忽然号召停止罢工，但是在约克郡、坎布里亚、泰恩赛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的工业区则再坚决不过，还有几个主要的工人小组（如动力工程人员）也坚决罢工到底。工会彻底失败了，尤其是苦苦坚持继续罢工数月的矿工。英国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短暂的、不流血的小冲突而已。对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是毫无痛苦的，甚至是很好玩的呢。

但是很明显，大罢工暴露出来并加深的分歧遗留下来，是破坏后20多年全国统一的一个有力因素。在矿业以及其他部门，这个因素到80年代初仍然存在。在1926年的情况下，大罢工也许不起作用，因为工会半心半意，政府却有充分准备，甚至在蠢蠢欲动（以邱吉尔等大臣为例）。不过，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回

忆说，"这是头一年"——显示出英国工人阶级团体内部不同寻常的忠诚和阶级团结，不仅在矿业、炼钢、造船等老工业区如此，连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系统中的"半熟练工人"等服务人员也都如此。国内的阶级矛盾即使还未达到动武的地步，却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当时警察或文职人员甚至还有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他们采取所谓"中立"，却深受人们怀疑，实际上英国广播公司一直在政府压力下争取保持独立。在矿区里，矿业主从大罢工中学会了一套欺骗伎俩，他们大幅度削减工资同时设法破坏矿工联合会代表工人发言的基本职能。如果像阿瑟·库克那样有号召力的矿工领袖靠边站，那么后继的工会和工党领袖充其量也不过协助走向一种 542 社会制度，它在工资待遇和就业机会方面明目张胆地玩弄花招，以致大战年代中应有的社会统一成为莫大的讽刺。正当英国很难地度过萧条的岁月，大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抗议仍在人们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20年代后期，英国形成的一种社会模式一直延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长(但愿能慢一些)，据1931年人口普查，从1911年4083.1万人增长到1921年4276.9万人，到1931年则增至4479.5万人。但是，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年轻作家乔治·奥威尔后来强调过这一点。在英国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20年代是一个不断繁荣和令人满意的时期。由于艾迪生1919—1921年的建房计划中途夭折，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的计划直接资助私人建房主，郊区中产阶级住宅区便得到发展，兴建了许多房屋。从大战中涌现出来占人口很大比例的是具有中产阶级抱负的人——拥有家室，有安静的居住环境，追求更舒适的享受(例如，私人汽车到1930年有一百万辆以上，以奥斯汀牌小轿车最受欢迎)，家庭生活用品、家用电器如吸尘器等。英国广播公司通过广播网给私人家庭播放文娱和教育节目。对于1880年和1918年间迅速增长的低级经理、

文职人员、教师、熟练工人以及其他白领行政人员和专业团体来说，20年代确实是个不错的年代：物价开始下跌，租房容易、房租低廉，还有其他舒适的生活享受。采用新技术的工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在中部地区，著名的现代汽车厂有朗布里奇的赫伯特·奥斯汀和考利的威廉·莫里斯。在这些工业区周围，涌现出新型郊区住宅的生活模式。这些人既得的利益又从为人实在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稳妥第一"口号中重新得到保证；在经历了大战和大罢工种种不必要的刺激之后，这样的保证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

然而，对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却是个不断失望和幻灭的时期。例如，农村在战后经过短期草草的恢复之后，就陷入了20年代的萧条时期。农村人口稳步下降，尤其是英国南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原到康沃尔，小城镇的命脉枯萎了。英国农村生活表面上还保持着原来的传统面貌；在1918—1926年这一时期里，"绿色革命"使小地主人数大量增多，这是诺曼征服以来土地所有制最大的变革。但是实质上是负债累累，抵押借款的负担、银行贷款以及明543 显的衰落都在城乡生活差别逐渐加大当中体现出来。此后许多英国文学作品都以农村为题材，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严肃内容和社会含义。

在较老的工业区里，尤其是在英国北部和东北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中部克莱德区一带的工业区以及爱尔兰海彼岸贝尔法斯特的贫民区里，这是个失望加深的时期。有关当时工人阶级住房紧张和生活困难的状况，以及贾罗、威根或默瑟尔提德维尔等老区满目疮痍的景象，在20年代史实中均有大量记载。随着潮湿、不卫生的住房、简陋的校舍和落后的公共服务而来的是儿童患病和死亡，中年人结核病、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废的数字惊人地上升。在英国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老工业区里，生活状况明显低下，和英

国东南部、中西部城镇、旅游胜地的豪华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旧的工业部门如炼钢、造船、采煤等因缺乏投资而不断造成失业，从而加深了 20 年代的社会鸿沟。1925 年财政大臣邱吉尔决定恢复与战前比值相同的金本位制，尽管（事后）受到凯恩斯尖锐批评，但受到最正统的经济学家和商人的广泛拥护。这就意味着把英国出口 544 的煤和钢的价格定得过高，从而导致采煤和炼钢工人失业率的继续上升。在鲍德温管辖得井井有条的地方，以教育、医疗设施、图书馆、游泳池或公园等公共场所为例，社会鸿沟则更为明显。（据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家R.H.托尼在1929 年发表的一些著名讲稿阐述，）"稳妥第一"的时代及其所有的世俗措施，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不平等宗教"。它的特点之一是全国总财富的1/3集中在 40 万人手里（他们占人口1%弱），还有生活水平悬殊贯穿整个英国社会。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不断加深的社会鸿沟当时只偶然引起了小规模的暴乱或反抗。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一致，即使在萧条期间也孕育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娱乐活动。那个时期的产物——工人俱乐部、图书馆、活跃于矿工居住区里的歌唱队和铜管乐队、工人阶级社区"合作社"提供的信贷——对 80 年代的英国来说，似乎是遥远的陈迹。但是，即使在这些阴暗的年代里，这一切却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对生活的乐观精神。群众娱乐也是人民统治者鼓励用以促进忠君爱国的止痛剂。这种"面包加马戏"传统源出维多利亚的音乐厅。当时许多著名杂技演员如乔治·罗比（他曾拒绝接受爵士封衔）仍然不断地涌现。但是马戏的艺术形式很快就被新出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代替，卓别麟这时成了电影院里的宠儿。除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乐观天性和尊严之外，还有致使国内比较和平统一的其他因素。这也许要归功于当时相当严厉的政府。1924—1929 年内维尔·张伯伦就任卫生大臣期间成就卓著，他雷厉风行地把旧济贫法贯彻到底，使之成为这一阶段里

的一个著名的里程碑。穿戴整齐的工人足球观众和在郊区住宅中兴起的中产阶级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两者都被貌似共同的价值观连结在一起。能够把他们全都团结起来的是大家熟悉的象征——也许是那个一直颇受欢迎的乔治五世，也许是鲍德温再次提出的那个消极的保证。杰克·霍布斯是这十年里出现的体育健将，他是萨里和英国的板球开局击球手，1925 年他打破了W.G.格雷斯保持多年的纪录(125)。他为人谦虚、顺从、虔诚、信教、滴酒不沾，是个典型的忠君爱国的艺人。他是个职业"球员"，满足于接受业余公学的"绅士"(他们从另外的一道大门进入爵士球场)的指引。他总是打直线球，也总是听从裁判的决定，哪怕裁判的决定多么令人失望或不公平，他从不抱怨。在战后变革的激流中，霍布斯温顺的品性为力争保持传统秩序的社会提供了一块可接受的试金石。

545 三十年代

20 年代在怀旧与革新的朦胧烟雾中结束了。"高级社会"的奢华与宫廷生活的壮丽互相辉映。香烟画片和杂志都在迎合社会名流(如老牌茶叶大王"汤米"·利普顿或伦敦德里夫人等)的个人爱好。知名人士在国内仍然到处产生影响。埃尔加直至1934年仍享有最佳音乐大师之称；基普林潜心写作直至 1936 年；托马斯·哈代德高望重，享有遐寿，于 1928 年逝世。"稳妥第一"的精神只允许采取最谨慎的革新形式。20 年代末的政治傀儡是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在 1929 年号召成立第二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在 1914—1918 年间参加过反战抗议，但在大罢工中却是个可靠的人物，他坚决打击社会主义极端分子，与上层社会沙龙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即将舒适地投进贵族的怀抱里了。一位合法的叛逆者，对于一个力求朴实而又有节制地进行改革的社会，他是个相当稳妥的形象。这时劳合乔治是个孤立的老将，邱吉尔因为在印度成立自治政府

问题上持“死硬”观点而主动退出托利党的主流，于是麦克唐纳就显得是一位以稳健步伐向前迈进的可靠向导了。

事实上，第二届工党政府证明是个失败。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因为许多力量失去了政治控制。1929年10月，美国股票交易所垮台，接着是贸易额和失业率螺旋形下降，对此任何政府都无法纠正。1932年末，失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近300万人为其顶点，凡此种种，英国工党政府除了提出社会主义或其他缓和办法外，显然是一筹莫展。虽然失业在30年代后期逐渐下降，但工业停滞和社会腐败实际上仍在继续。除了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市场萧条之外，还有英国本身的一些特殊因素：逐渐老化的传统工业如采煤、炼钢、纺织、造船等与整个工业结构不相适应。历来投资额低，人手过多，工作效率太低，加上几十年宽松纪律和绅士道德的文化熏陶代替商业教育或企业技术训练，这些问题也就更加尖锐。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全面急剧紧缩，直至1935年还没有一丝转机。在此之前，长期目睹矿业及其他工业领域毫无希望的惨状，反饥饿、反失业的游行示威，靠“失业救济”过活的严峻现实，使伟大的英国人民大众变得消极和麻木不仁了。

这时，有人提出要用新的政治动力重新激励和推动国家及其经济往新的方向发展。在左翼中心，劳合乔治仍然是30年代贯穿始终的一位年迈、被多数人遗弃的先知，他呼吁仿效美国实行新政。在左翼偏左方面，提出各种不同办法的，先是来自社会主义联盟的集体主义，后来又有左派书社，还有小小的共产党的纯宗派主义。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要求从苏维埃俄国中寻找未来。在激进派右翼，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先后退出保守党和工党，并企图把英国建成以共同计划和反犹太主义相混合的法西斯主义变种。与此同时，老牌社会主义作家肖伯纳和H.G.韦尔斯，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英国成为有计划、廉洁奉公、科学的乌托邦。 546

但是最受欢迎的解决办法是在传统的英国政治大杂烩中去寻找。到1931年8月，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已陷于绝境。英镑的大量流失和梅委员会报告的发表，该报告指出政府高额开支和不平衡的预算是工业崩溃的根本原因，这就促使工党政府危机的到来。政府迫切要求削减社会开支，包括失业大军全靠它活命的社会福利费。于是内阁只得分裂，以银行家为一方，职工大会为另一方，展开搏斗。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547 不过，第二天早上，代替他职位的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而是麦克唐纳在新的"国民"政府里继续任首相，他几乎把所有的工党同僚都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后来在10月举行的大选里，这一届政府(它后来使英国取消金本位制和英镑贬值)重新获得绝对多数556票的支持，工党票数下降到只有51票，它的前任著名大臣几乎全部在选举中落选。这一届"国民政府"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调子。它的傀儡麦克唐纳越来越不得志，便渐渐隐退了。鲍德温留任到1937年。他仍然能发挥大量的政治潜力和施展巧妙的策略：如1935年他促使放宽印度自治权的议案获得通过，1936年未加冕的君主爱德华八世藐视当时的习俗，想既保住王位又与离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婚时，鲍德温在策略上彻底挫败了他。但是，一旦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旧陈规，政府内部就从保守党专家治国的新形式中获得主要力量。他们当中的著名人物是内维尔·张伯伦，他和他父亲都当过伯明翰市市长，在30年代国内和(后来)国外政治生活中他是个杰出的人才。正是由于张伯伦的领导，对建房和耐用消费品大量投资，同时繁荣米德兰东部和南部的先进工业地区，致使经济在30年代早期达到半恢复状态。从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等老地区出来的移民，正好与轻工业中心和郊区的人口增长相抵消。政府管理中有一种明显的调节方式，就是英国"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这就是通过收购牛奶、其他市场计

划和产品指标等方式使农民得益，用改善交通（明显的如伦敦地铁）、扩大煤气和电力供应、降低房租等办法方便城市和郊区居民。1932年在渥太华会议上，一百年来的自由贸易被埋葬了，会上宣布实行新的关税贸易制度和帝国特惠制，直至70年代为止。尽管关税在英国经济上的作用掀起了热烈的争论，但是卡特尔化的炼钢业看来是获得好处的大型工业之一。于是投票者及时表示感激。他们在1935年大选中以可观的多数选票答谢国民政府——这时几乎全是保守党人——并广泛地支持贯彻张伯伦政策的保守主义，直至30年代末对外政策使政府出现新的分歧为止。

国民政府的策略是明确而坚决地以等级和地区划分为基础的。老工业区置于"特别区"计划的领导之下。按流行的说法，苏格兰工业区、东北地区、坎布里亚、约克郡和兰克夏郡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都是"不景气地区"，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有人外流 548 到伦敦和伯明翰参加反饥饿游行，或从戏院排队买票的长龙中讨几个铜子时才为外界所知。在这些所谓"不景气"的社区里，有一种颇有讽刺意味的自我维系的生活模式。这里工业紧缩，这就意味着他们该纳税的收入继续减少，文娱活动减少，工业萧条加强，于是又来一次更严重的全面恶性循环。当时一些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该书是否属长篇小说仍未有定论）、沃尔特·格林伍德在《患难相爱》中有动人的叙述，刘易斯·琼斯在《库玛迪》和《我们生活》中对威尔士矿区生活有感人的描写——尖锐地批评由经济结构产生的贫困对当时社会和文化心理上造成的深刻影响。但是，挽救局面的措施却寥寥无几。贵格会教徒和其他理想主义者在当地摆出一副慈善的姿态。政府通过特别地区委员会也给予一些援助，虽然实际上根据新的地区政策，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并没有改为多种生产或进行大检修。托马斯·琼斯以讽刺的口吻建议把它们改为露天考古博

物馆，同时用火车把居民送往戴根纳姆或豪斯斯洛的娱乐场去就业。还有一些新措施，如地产贸易，以低息贷款或投资贷款吸引工业家组成团体和移居老工业区。例如，白金汉郡斯劳市在30年代就成为工业活动中心，而它建筑上的种种丑闻却成为约翰·贝杰曼少有的辛辣讽刺的目标①。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实行联合控制，政府又缺乏紧迫感，致使这些主要工业区实际上得不到援助，只得自行经营。直至1935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在重振军备的冲击下强调发展制造业和飞机生产，失业率才有明显的上升。

惨遭不景气磨难的工业区为什么没有得到多少复兴的鼓励，其主要原因是它们设备配套独立自足，发展幅度有限。英国其他地区大多数人经历大战浩劫之后都觉得生活还可以接受，况且还有许多方面令人满意。30年代是通货膨胀率十分低、私房价格便宜、消费者容易买到东西的时期。在1933—1937年之间，每年平均建房达34.5万所。汽车工业、电力、化学、纺织等康采恩继续发展。在米德兰如莱斯特、考文垂等城市都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生活上得到的改善更为明显。赫伯特·查普曼的阿森纳俱乐部的职业足球队员虽然工资低，却享受特种饮食包括牛排和香槟酒。在伦敦远郊区，"地铁"一直往北延伸至哈福德郡边缘的科克福斯特斯，往西则至白金汉郡边缘的阿斯布里奇，这就说明了白领人口中服务和专业人员的扩充。在亨登、哈罗、金斯伯雷等市郊社549 区，到处是时髦商店网、新电影院和足球场。中产阶级参差不齐的半独立房屋区在大马路两旁延伸出去直达郊区农村，但相对地不受城市四周环保计划保留的"绿色地带"的阻碍。伦敦市外的西大道成了代表无法控制发展的工业和住宅区的一个口头禅，这里的

① 指英国诗人贝杰曼于1933年出版的以建筑业为题材的书《最佳趣味》。——译者

厂房建筑质量低劣，杂乱不一，什么年代的都有(尽管很不恰当，后来一代人往往称之为现代艺术纪念碑之林)。如果说把30年代失业和不景气中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原因解释为老工业区缺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那么，另一种解释是要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郊区生活的需要，因为郊区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相对不受萧条年代的损害。

因此，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在30年代里显得特别稳定，当时的欧洲，极权主义包围着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而法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则混乱不堪。英国社会与文化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多大改变。议会、法庭以及以牛津、剑桥(它们几乎完全保持着旧公学的体制)为首的高等教育制度，都和以前一样享有很高的威信。君主制巧妙地响应貌似大民主的小改革以保持其尊严：例如，乔治五世出席温布利杯决赛之年度工人阶级节。1935年英王统治25周年纪念也掀起全国欢庆。甚至与爱德华八世退位有密切关系的短暂危机也未能损害君主政体分毫。英国安稳地保持着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隔绝的地位。在欧洲住着的是英国人不大了解的远方人民。 556

在文艺方面，30年代是多方面极其繁荣和创新的时期。在诗歌方面，T.S.艾略特仍然是个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信奉保守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教徒，从1930年起陆续发表《四个四重奏》。实际上，自写出抨击托马斯·贝克特受难的剧作《大教堂凶杀案》(1935)起，艾略特就越来越发现戏剧是他更喜爱的艺术创作形式。不过，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们都强烈反对20年代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那种超然的艺术气质。在时代大洪流中，年轻诗人如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塞西尔·戴·刘易斯和路易斯·麦克尼斯等都反映当时的政治动乱。奥登在西班牙内战的短期服役中得到启发，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1937)，它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文艺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年轻诗人，如果实际上没

有加入共产党，却在卖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当时有两位较有才能的年轻小说家，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尽管政治及其他观点很不相同，却都皈依罗马天主教。英国音乐这时还比较稳定，虽说霍尔斯特和戴流士的浪漫情调不得不对抗斯特拉文斯基和舍恩伯格的追随者们的实验性、无调性、甚至无结构音乐。沃恩·威廉斯是运用全音阶创作技巧的当代音乐家，但是他仍依赖传统的曲调和主题，说明他骨子里是英国派，他证明了新式的东西完全可以和本土音乐传统相协调。在视觉艺术方面，30 年代是雕塑和绘画大发展和创新的时期。亨利·穆尔的作品首先给英国雕塑灌输了新的活力。他出生于约克郡矿工家庭，是爱泼斯坦的弟子。另一位开拓者是画家本·尼科尔森之妻巴巴拉·赫普沃思。英国绘画界在这一时期也特别活跃，出现了斯坦利·斯潘塞朴实基督教象征主义，还有保罗·纳什成功地接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一般来说，英国在 30 年代是个外表较好看的国家，它 551 在建筑设计方面进行了许多必要的革新，那是 1914 年前自诺曼·肖、沃伊齐以及麦金托什的鼎盛时期以来不曾有过的。从体现格罗皮厄斯和德国人鲍豪斯影响的成套公共建筑到装饰新颖的厂房和影院，直至皮克和霍尔登为伦敦交通修建引人入胜的新型地铁车站，这都说明英国在建筑上取得了许多进展，同时真正解放了思想。这时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有皇家学院演出反映新生活的戏剧，和亨利·伍德爵士在伦敦举办的“无座音乐会”一类的流行艺术节，如果还不能说它是一场文化革命，但显示出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的进展。

因此，除较老的工业区外，30 年代英国在各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文化上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但是在 1937 年情况突然开始改变，这不是直接由于国内不团结或意见分歧而是外交事务上的外来影响引起的。20 和 30 年代英国国内的和谐大部分是建立在息

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上。这时，1919年由凯恩斯掀起的那股情绪，亦即1922年迫使劳合乔治下台的情绪，已弥漫全社会。右翼人士不肯参加海外军事冒险，与之相反，左翼则深信1919年的和约实质上是报复，是精神上解除防卫，与其说它是谋求世界和平，不如说是使民族和英帝国四面受敌的产物。在20年代里，英国的防卫力量已渐渐削弱，那时群众抗议不多，因为大家都以为“十年”内不会发生大战。在这时期尤其削减的是战舰，对此事当时任财政大臣的邱吉尔最为卖力。在新加坡新建的巨型海军基地刚刚完工就似乎已经过时。当时主要的军事任务是保护在印度的统治，但是由于与甘地及其国大党运动逐渐求得部分和解，英国在次大陆的驻军就可以从1925年57 000人逐渐削减到1938年51 000人。与此相同，英国与爱尔兰自由邦日益和谐的关系以1936年的“协定”为其顶峰，爱尔兰实际上把全部债款偿还英国，这又是减少陆、海军困难的另一潜在因素。群众情绪在30年代初，甚至在1933年1月德国出现了希特勒之后，仍然是消极的。英国的劳工运动倾向于和平主义，只有运输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等几个例外。它代表国民政府右翼，反对军备预算付之表决。在社会主义左翼，有人民阵线的鼓吹者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迫切要求英国与苏联结成联盟，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真正办法。与此相反，保守党人大多数不愿意采取冒险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鲍德温对人民保证过未来战争不需要真正的防卫，因为它多数将取决于空中力量。轰炸机总是通行无阻的。在1931年满洲沦陷或1935 552 月埃塞俄比亚失守时，保守党人对支持国际联盟也就缺乏热情了。在右翼，还有些报界的权贵，扬言大不列颠与希特勒德国有共同之点，即条顿民族出身和反共把两国连结在一起。于是，一群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乌合之众就在泰晤士河畔克莱维登的阿斯特子爵夫妇的宅第中找到了避风港。有许多人相信这些同路人的意见可

以左右外交部的方针。

当采取行动的时机到来，群众舆论却有所抵触。1936年初，希特勒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协定，进军莱茵兰。呼吁大不列颠出兵抵抗的只有孤立和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等寥寥几人。在此之前，英国公众即便很尴尬却已普遍接受了外交部在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之后采取的绥靖政策。英国实际上给予经济上或军事上极少的干预，只许意大利人占领非洲半岛上这一古国。英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方面又作了些正式许诺，但是作用不大。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在埃塞俄比亚事件中是供群众谴责的牺牲品，但很明显，对墨索里尼意大利采取的绥靖政策是政府的集体决定。现在可以查到的内阁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怎样，几个月之后，霍尔经过小小的争议又重新在政府中任职。在西班牙，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共和政府遭受佛朗哥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颠覆，后来还有意大利、德国的军事援助，英国政府竟坚持采取"不干涉"政策，尽管因此导致西班牙民主政权的覆灭。1937年10月出现一位得力人物内维尔·张伯伦，他与鲍德温消极绥靖作风相反，积极主张采取行动，谋求与法西斯独裁者调停，这就肯定了英国在欧洲采取不干涉政策不断高涨的情绪。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文职人员有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驻柏林大使）等人。

然而，公众情绪在不同程度上突然开始转变。甚至政府也开始考虑有必要奋起直追加强国防，尤其是空中防卫了。从1935年起，开始建立一支以战斗机为基础的新式空军力量，并用最新技术装备"雷达"和其他高射炮以及防卫系统为后盾。科学改革之声通过类似蒂泽德及其劲敌林德曼等人在权贵之间又偶或可闻。到1937年，重振军备计划已指日可待，尽管财政部施加压力，认为要注意军费对开支平衡的影响。这时，私下里大家都知道已和美国

建立了较广泛的金融关系，只有这样，英国在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时推行军备计划才能使美国同意负担。从更广的方面看，公众心553 理深受西班牙内战事件的刺激。不仅诗人如奥登或散文家如乔治·奥威尔，还有许多英国工人阶级志愿人员参加国际纵队一起战斗，奔赴那儿承担国际主义的义务。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把希特勒统治下的现状和反犹太主义情况真实地传播给英国舆论界。连工党左翼工会领袖贝文、西特林等人也猛烈反对新和平主义的工党政治家，因为他们拒绝武装援助在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受到打击的工会和劳工团体。作为一位非常缺乏灵活手腕的首相，张伯伦就更难以保持他的平衡状态了。

1938 年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继而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诡称代表波希米亚西边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利益，造成民族良心上的一次危机。张伯伦立刻采取果断的决策。1938 年 9 月他先后去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终于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实际上，他允许德军随时吞并苏台德而不受英法武装干涉。在短期内，这一投降政策似乎反映出大众的愿望。张伯伦凯旋归来，用554 不祥之语宣布我们的时代定能太平无事。但是这种放弃责任的做法再也得不到充分的承认了。原来认为张伯伦寻找喘息时机是为了使英国将来可以更有效地在军事上与德国较量的人，再也没有在内阁审议记录中找到支持了。那些针对邱吉尔及其同僚，连同对安东尼·艾登（他因反对张伯伦在外交事务上的态度刚从外交部辞职）的批评这时和群众情绪更趋一致。到 1938 年末，真相大白，原来慕尼黑协定实际上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屈就于武装侵略，因此全国舆论哗然。几个月之前，张伯伦还是个无懈可击的人物，是 1916 年劳合乔治以来最能干的首相，这时忽然间变成了众矢之的。重振军备又提到日程上来，试图促进军火和飞机生产又与机械工会进行新的谈判。1939 年 3 月，希特勒终于进犯布

拉格，舆论哗然。张伯伦因外界压力采取军事行动保卫波兰，那是远离英国海岸的东欧国家，而苏联是否会保卫波兰东部边疆却毫 555 无保证。自1812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结束后一百年来英国对欧洲几乎一直采取不干涉政策，这时突然间反其道而行之。政府被群众舆论吓得惊慌失措，甚至想正式采取措施与苏联结盟，只是事态进展缓慢，结果苏联于8月反而与德国缔结一项条约。夏季期间，全国总动员决心抵抗德国侵略的情绪是明显的。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迈出了致命的一步。张伯伦再三努力争取妥协到最后一分钟亦无济于事，于9月3日才在广播中宣布英国对德宣战。这时，几乎没有任何异议，连同小小的共产党，其中许多领导人是反对莫斯科官方路线的，也都投入反法西斯斗争。在下议院里，一位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代表英格兰发言"，而事后证明他的言论实际上代表全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所有的自治领。

在有关绥靖政策论争的后期阶段，公开讨论的气氛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30年代初的自满情绪已搁置一旁。国民政府与工党之间，在解决失业困难、发放救济金中徇私舞弊以及实行对救济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等问题上继续对立。从右面加深这一对立的是"慕尼黑人士"，张伯伦、西蒙、霍尔及其随从、以及以邱吉尔为首的民族主义批评家，他们指责懦弱的绥靖政策有失尊严。后来许多事件，诸如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深远影响等，促使左右两翼联合起来反抗，而西班牙内战或埃塞俄比亚事件却未能促成这一步。这时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成混乱的一团。张伯伦这位30年代繁荣的主将，郊区中产阶级的泰斗，显赫十载的领袖，突然间变成万众痛恨的政治骗子代表。在1940年一场激烈论战中，他被迈克尔·富特和弗兰克·欧文两位激进记者出色地指责为头号"罪人"，他们编写的政治小册子也许是自威尔克斯成名以来最卓越的

功绩。

在这样的时期，任何一个由内维尔·张伯伦统治的社会都会发现在共同事业的背后难以取得统一。然而，1914 年 8 月，英国居然统一了。1939 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各地区、各阶级也确实完全取得一致。如同 1914 年，大战被公开描述为被压迫民族、受奴役种族而进行的神圣战争——而这次大战确实比 1914 年规模更大，更理直气壮。中产阶级、职员、资本家、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党人都出于不同的动机或不同的政治考虑参加战争。但是广泛的迫切要求仍然是要取得新的一致认识。如同 20 年前，在大战的骚乱和挑战中英国以国家利益为重，恢复了思想认识的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

556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的群众情绪显然不如 1914 年 8 月以后那么激动、高昂。上一阶段重振军备或和平主义的矛盾这时已无反响。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大战头几个月有些令人奇怪的特点。从所谓“虚假的战争”时期到 1940 年 4 月，这场战争似是遥远的近乎学术上开展的论战。大战初期那种手忙脚乱的状态在伊夫林·沃的小说《多升几面旗》中有很好的写照。到处采取大规模的防空措施，公园里挖防空壕，公共建筑上悬挂阻塞气球，安装高射炮；给男女老少发放防毒面具达 3800 万具，成千上万的儿童从大城市疏散到外地，据说是较安全的农村地区（虽然有许多人后来陆续返回城市）；食品、衣服、汽油和其他生活供应采取配给制，突然成为通常的惯例。战事发展平淡无奇，只有在 1939 年末三只英国小舰艇在蒙特维的亚港口外的里普拉特河三角湾重创德国战舰“斯佩伯爵”号时，才大举欢庆英国海军胜利，这才有一番传统的娱乐。政府举棋不定反映出群众情绪的不稳定。内阁虽是重新组成，

邱吉尔本人又和1914年一样，回来就任海军大臣，政府里仍是原班人马，亦即1931年的国民政府的扩大形式而已。工会看到政府里仍然是他们的死对头和阶级敌人张伯伦带头执政就特别怀疑。接着，1940年4月，冷战转为火拼阶段。德军进犯挪威时，在纳尔维克一路扫荡，肃清英国海军和陆军。不久之后，荷兰、比利时沦陷，法军大败，匆忙撤退。英伦三岛的安全顿时告急。

30年代的旧政权再也保持不住了。1940年5月7—8日，下议院分裂，80名保守党议员反对张伯伦的领导。两天之后，他辞职，由温斯顿·邱吉尔出任战时首相，成立工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首相的更换一般与1916年12月的阴谋事件无关。邱吉尔确实在新闻界和议会里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还有陆海空三军更多的高级将领效忠于他，这是劳合乔治望尘莫及的。邱吉尔体现了传统的一致爱国精神，这也是他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战争给他的事业带来了生机和启发。他在电台和下议院中所作的感人的演讲，选择了“最好的时刻”为国家唤醒新的民族意志。他居然能把英军从敦刻尔克可耻的撤退说成是英国足智多谋的胜利。到6月中旬，当法国向德军投降时，英国的领土安全受到威胁，其严重程度是1804年拿破仑一世时代以来所未有的。

559

英国准备好用陆海军防卫国土，其防卫力量到底有多大是值得讨论的。在国内方面，除动员的后备力量外，由平民组成的“英国国民军”后来被人耻笑为随便混日子的业余“雇佣兵”。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幸亏从来没有考验过。真正的战役是空战，新闻界巨头、这时任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立即建立喷火式、飓风式战斗机的后备力量。从8月中旬起，德国空军发动闪电战，连续袭击，先是英国机场、军用机制造厂，后来则是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大城市。令人惊奇的是平民士气和国防力量都坚定地顶住了如此猛烈的轰炸。在空战中，传

奇般的英国喷火式、飓风式战斗机飞行员，以少胜多，于8—10月终于使德国空军付出重大代价。到圣诞节，大规模进犯的威胁已成过去，虽然零星空袭伦敦和其他地方仍然继续。邱吉尔的个人威信大大提高了，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也随之抖擞起来。关于敦刻尔克和英国空战，流传出许多神话传说。它们助长了英国内在的孤立主义和不正当的民族自满情绪，从而导致战后对西欧的统一不闻不问。英国人认为，正如他们从1066年以来的一惯做法，他们是参战的西方民主势力中唯一避免敌人占领的国家。尽管如此，1940年"最好的时刻"这一修饰词却捕捉住英国人在取得卓越的历史成就时那种骄傲的心情。

后来战事在陆地上，尤其是海上和空中的进展对大不列颠在国际上及其属地上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与欧洲历来有传统的矛盾，英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西方势力均衡，已开始在北海和北大西洋大量部署英国海军以控制英伦海峡和防犯敌人从西岸入侵。实际上，到1941年夏，在德军进犯英国的威胁消除(对此希特勒一直是举棋不定)以及摧毁了德国空军一连串的袭击之后，战事在这方面已取得成功的进展。随着英国商船发生作用，和(1941年初)美国租借法保证战争后期食品和原料供应充足，英伦三岛除了偶或被德国U—潜艇击沉船只外，不再受到严重的威胁。邱吉尔密切注视着中立的爱尔兰自由邦的港口以及它反英的总理德·瓦勒拉。后来，1944年夏天和秋天，德军从荷兰基地用V-1、V-2喷气发动机射来的导弹，虽使英国东南部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同时引起了深深的震惊，但也未能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然而，从1940年后期，战事即迅速大大铺开。原来只限于保住欧洲中西部免遭德国法西斯蹂躏的小战争，这时立即转入大范围保卫英联邦及其属地，因为它们已接受英国统治几十年。那些 560

尚未加入战争的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犹豫不决的南非——都出借原料、军舰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支援英国。还有源源不断从印度、尤其是从埃及取得贷款，即所谓"英镑平衡"（在战后引起了许多问题）对帮助英国支付物资供应、补救部分海外资产的损失和"无形"收入的下降起了重要作用。1941 年 6 月，苏联参战，接着同年 12 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队之后，美国也加入了战争；这就使大战扩展到全世界，甚至到每一大洲、每一海洋，因而英帝国的广大版图也会立即遭到威胁。

英国把海陆空三军的大部分力量用来维持中东传统的交通线，即集中在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及其内陆的大型油库基地之上。1940 年 8 月，意大利参战之后，英军节节获胜，对侵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兰的意军施加压力，十分成功，后来又用许多兵力保卫埃及和北非沿岸。1941 年在韦维尔领导下英军攻克了全部昔兰尼加并挺进到的黎波里，但是后来又被迫向埃及撤退。1942 年初，托布鲁克陷落导致国内严重政治危机，使邱吉尔的地位动摇。1942 年后期最重要军事行动是英国第八军先后在奥金莱克和蒙哥马利率领下抵抗德军对开罗和苏伊士的进攻。然而，1942 年 11 月蒙哥马利终于攻破阿拉曼，使英军长驱直入现在的利比亚，穿过的黎波里直达突尼斯。蒙哥马利就在这里与布拉德利上将率领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然后往东挺进的美军汇合。此后盟军的战役，包括攻克西西里，长途行军，穿过意大利，从安齐奥滩头堡到阿尔卑斯山，都和英帝国的战略交通线以及控制地中海东部有密切关系。那些认为 1943 年应该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以缓和苏联红军受到的压力的人对重视地中海很不理解，甚至愤怒。不过，邱吉尔的地中海方案占了上风。1944 年英军又在希腊登陆，肃清德军同时挫败希腊本土的左翼运动，即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

在远东，战事的发展牵涉到急需从根本上支持英帝国。日本侵

略中国继而进犯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①，并占领美国在菲律宾的全部基地，这就促使邱吉尔把远东的军事设防包括印度次 561 大陆的布署看得比中东更重要和优先。英国在远东的损失惨重。最严重的是1941年12月10日，战列舰"威尔士王子"号和"无畏"号被日本炸弹和鱼雷击沉。其后，日军长驱直入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迫使80000以上的英军和英联邦军投降。这次失败归咎于指挥官珀西瓦尔上将和邱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本的战斗力）严重失策，首相在下议院中称之为"英国史上最糟的投降。"这次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例如，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宁可靠美国保卫太平洋也不再靠宗主国了。不过，此后英军再也没打过败仗。日军进犯缅甸被遏止，那是奥德·温盖特少将组织的"钦敦人"(Chindits)部队立下的汗马功劳。英国仍然继续统治印度，虽然国大党运动对它不欢迎，日军进犯缅甸也使它受到威胁。到1944年末，虽然失去了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甚至还要依靠美国陆海军的援助，英国在东亚及太平洋的地位仍然是巩固的。

最后，1944年6月，盟军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 562 从诺曼底登陆，开进了法国，大战又转到欧洲方面。最后这一阶段，英国的军事战略，特别是关于英军挺进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时迟缓，曾引起军事史学家的争议。尽管在阿纳姆的空降失败，这次战役最后却速战速决。1945年5月9日，蒙哥马利将军在吕讷堡灌木丛正式接受德军无条件投降。在这几天之前，希特勒自杀身亡。不久之后，两枚原子弹洗劫广岛和长崎，造成11万多人死亡。紧接着，日本于8月15日投降。

这次大战对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自始至终没有引起1914—1918年大战时那种疑虑，或沙文主义的欢快情绪。最令人满意的是二次大战六年的伤亡比1914—1918四年缓慢的

① 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诸岛。——译者



邱吉尔在阿拉曼与澳大利亚军人交谈(1942年8月)

阵地战要轻得多。这次服役军人在六年中总共损失27万人,在德国空袭英国本土中死难的平民达6万人以上。战役一直在边缘地带间歇地进行,最后则是在军备技术优良的基础上加上指挥有方。甚至连和平运动老将、哲学家伯纳德·罗素也感到这次对英国似乎是很好的战争。与此同时,所有围绕着英国外交任务的尖锐问题全都留着没有解决。即使英国恢复控制亚洲的领土——如香港、沙捞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在中东和远东,英帝国的殖民地制度仍十分紧张。在战时各种会议和1945年7—8月举行的波茨坦和会上,美国都表示十分关心,要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邱吉尔这时焦急万分,生怕自己领导打了六年可怕的大战之后又成为促使大英帝国瓦解的一位大臣。但是,他的看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

在国内方面,大战的影响几乎不大重要。正如在上次大战中,人口结构和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集中和国

家控制来调节社会和经济生活。不过，与1914—1918年不同的是，这次国家机器似乎运转得更为公正合理——而这一势头在战后世界中可能还继续发展。大战显然造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平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英国史上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乔治·奥威尔感到正要发生一场社会革命。配给簿、煤气、身份证和其他战时控制物品平均发给人民，同时贯彻"公平份额"分配的精神。连在空袭期间患难与共也是如此。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其他城市疏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社区去避难的"疏散人员"和学生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第一次使国内各地的人互相接触。从城市 563 贫民区疏散儿童的医药和食品供应量可以说明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智力都有很大的增进。对于他们的父母，经过30年代大萧条之后，战争神奇地意味着重新恢复充分就业。平均主义还促进对社会计划产生新的信心，尽管商店铺面、矿井口与伦敦下层官僚的旨意之间的联系不一定明显。不过，其结果是战时的团结一致和奉献平等的精神开始对社会政策提出新问题。在部队里同样产生一种深刻的信念：这次这块"使英雄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不会像1918年以后的年代普遍感到的那样被人置之不顾。汤姆·霍普金森主编的战时画报《画邮》，报纸《每日镜报》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利斯特莱在电台的广播演说（他那道地科贝特式的激进主义很受欢迎）都准确地捕捉住这一情绪并加以反映。

反映这一情绪最精彩的文件是贝弗里奇在1942年11月的报告。这位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中概括地写出一份颇得人心的社会保险计划，要求从中央税收中拨款资助孕妇福利、儿童津贴、社会保健、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死亡抚恤金等等。因此当时就传出了"从摇篮到坟墓"供养制这一口头语。兴高采烈的群众把这位平凡的贝弗里奇誉为另一位"人民的威廉"，从此社会政策连同其他项目，诸如全国免费保健服务等优先列入战后的公共议事日

程。巴洛报告(实际发表于1940年)已详尽地分析了陷于停滞的"萧条地区"的全面情况。后来1945年工业布局法开始采取经济基础结构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办法把一些地区如英国东北部和威尔士南部的长期经济衰退的周期扭转过来。1942年厄希沃特报告提出一项新的城市规划:在主要卫星城周围建立"绿色地带",重新控制使用土地,并在过于拥挤的旧城市附近发展"新城"。在所有这些战时的蓝图下面,最根本的一项是全面就业的措施,它已在1943年度预算和1944年度政府白皮书中提出来了。许多社区在30年代蒙受停滞之灾、满目疮痍的状况再也不会来了。于是反失业游行的发言人,如贾罗市议员"赤色埃伦"·威尔金森这位1936年反饥饿游行的领袖等人这时在政府中很活跃。财政政策改革连同扭转工业生产周期的政策、人力预算和供应管理等都是巩固社会革新的措施。这些措施连战时的老大臣如金斯利·伍德和约翰·安德森子爵等人都推行过。凯恩斯亲自在财政部任职并极力对强大的内阁经济处施加影响。当年批评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主

564

将凯恩斯如今成了重要人物,他不仅制订国内预算方案,还主管国外金融安排,包括通过勃雷顿森林协议调节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当时在固定的团体里提出最激进的方案有:主要工业部门和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征收资产继承税;国家领导的医疗业实行工资制。这些方案引起了保守党和工党内阁大臣之间的不断争论,其中还夹杂着后座议员、直率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欣韦尔和出色的威尔士退休矿工安奈林·贝文等人愤怒的补充发言。在战时老领袖邱吉尔主持下举行这一次社交界和知识界的大论争,比1917—1918年"重建"的讨论获得更广泛的好评和更准确的见解。这次论争确实是一种新气象的迹象。

在文化艺术方面,大战给旧价值观带来了新的活力。文学的价值不再按1914—1918年的标准来衡量;一切都与上一代"战争

诗人"毫无相似之处。在这次大战中，艺术家们得到鼓励，官方资助他们反映空袭和其他经历：亨利·穆尔、约翰·派珀、格雷厄姆·萨瑟里是三个突出的例子。有趣的是音乐，它是当时鼓励大力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可以得到战时成立的音乐与艺术促进委员会(CEMA)的资助。在伦敦空袭期间，戴姆·迈拉·赫斯举行的午间钢琴音乐会重新激发起群众对音乐的爱好。接着写出力作响应的作曲家有：迈克尔·蒂皮特(一位和平主义者，曾写出娓婉动人的《我们时代之子》)和本杰明·布里顿。后者的作品《彼得·格里姆斯》在1945年6月首次演出，给英国歌剧增添了新的活力，他这部作品大部分仍然受50年前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合写的轻歌剧的影响。在大战期间，电影也成为更受人欢迎的一种新的艺术。例如，《我们服务的地方》、《短暂的相遇》等影片都以战争为题材——离愁别恨、伤逝、牺牲——虽有现实主义色彩却充满了迎合商业的趣味。不过，在所有文化通讯媒介中，以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在大众心目中占最大的位置。喜剧演员如汤米·汉德利，流行歌星如维拉·林恩，战讯广播员如理查德·丁布尔比和温德福·沃恩·托马斯都成了当时颇受群众欢迎的人。在一个深受新的社会思想和理性观点影响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保守、可靠的机构，它忠于上帝、国王和王室，相信生命的无穷和民族遗产的永恒。凡此种种，看来都是六年大战浩劫中广大群众所渴求和需要的。

不管怎样，人民大众越来越了解事务，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1918年以来英国教育还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改革；1922年格迪斯的经济政策残酷地遏止教育事业的扩展。因此大部分工人阶级社区还完全没有设立中等学校，而直至1939年进入大学或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就特别小，几乎仅限于有钱的或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只有威尔士除外。自1944年巴特勒教育法(战 565

争年代的另一社会里程碑)颁布后，为全民建立了新型的基础中等教育制度，像高卢人那样分三种：现代中学、普通中学和技术中学。与此同时，由于这项法令给普通中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又给未来校舍和教学设备订出大规模的投资规划，从而保证了人民文化程度和社会福利的大大提高，以及职业选择的灵活性。在战后的世界里，肯定会出现一代接受普通中学教育的青年男女，不管对“现代”中学的水平有多少怀疑，大多数成绩较差的人都会去念这类学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恢复传统价值和观念的正式要求，尽管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领域里，人民群众仍热衷于社会改革，甚至热衷于社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使理想完全脱离现实。实际上，人民大众对改革的要求与官方私下承认战前社会十分不公正和处于分裂状态已统一起来，这是二次大战留给英国人民最重要的遗产。举个主要例子：这时工会和1918年以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他们不再是政府以外的人了。当时最杰出的工会领袖，运输和杂务工工会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在1940年5月被邱吉尔委任为劳工大臣后，就成了政府里主管国内事务的一名得力大臣了。在他领导下，工会与政府共同调整工作条例，改善工业条件，制订经济计划的策略方针，其关系之密切为前所未有。职工大会书记沃尔特·西特林实际上已成为政府的一名助理成员。二次大战期间确实还有罢工，突出的有1942年肯特矿工罢工，1941年学徒工在克莱德和1942—1943年在威尔士南部举行的罢工。但是与广泛的一致认识相比，它们是比较次要的事件。到1945年大战末尾，职工大会起草了一份关于社会事业优先的修正名单，包括大工业和社会服务事业国有化，保持全面就业，遵循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的路线建设福利国家，在战时“公平份额”精神的基础上实行更平均主义的财政政策。

566

这种感情在各阶层中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1940—1945年间，英国可以说向左转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在政府里，邱吉尔出任首相时，他的工党大臣在国内显赫一时。欧内斯特·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格林伍德和多尔顿等人都成为极受信仰的人物。他们代表战后实现重建家园理想的吉祥象征。还有主张改革的保守党大臣，如教育法的发起人R. A. 巴特勒等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观点与新的正统观念的制定人（其中许多人是自由党理论家，如凯恩斯或贝弗里奇，或干脆不问政治的专家治国论者）很投合。但是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范围以外，群众显然越来越激进——至少应该清楚的是，这是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因为这一点已刊载在报纸上有关美国盖洛普的民意测验里，虽然同时代人很少注意这些陌生的社会学实例。在补缺选举中，宗旨不大明确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共有财产党也取得几次胜利。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胜继而挺进柏林之后，在群众中获得广泛的好感。据说，左翼或新思想正在时事小组和形势讨论会中传播。在西方沙漠和远东服役的军人也在家书里发出要求在战后改善待遇的愤怒呼吁。

于是在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恢复建设已迫在眉睫，同时也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1918年，许多蓝图不是被人轻视，就是在财政部里石沉大海。这次大战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人民的战 587
争。这样的称呼不但更准确而且有更民主的推动力和更明智的潜在因素。大战一旦结束，其后果就立刻鲜明地暴露出来了。1945年5月，德军投降之后几天，远东仍在继续抗日的时候，邱吉尔的联合政府忽然意外地垮台了。令邱吉尔沮丧的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表达平民愿望时坚决要求工党大臣辞去政府职务。7月举行政府大选。1918年的“联票选举”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做法。即使没有被歇斯底里“吊死德国皇帝”的沙文主义叫嚣污染到凯恩斯

所说的程度，但是那种因素无疑是存在的。全体爱国人民欢庆大战胜利，使像1918年11—12月那样的大选运动难以引导群众的情绪。不过，1945年6—7月，人民的头脑比较清醒，更集中注意住房、卫生、全面就业、工业更新以及战后紧急的社会问题，而不大注意国外和英帝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使保守党很尴尬，但与尊敬的战争领袖邱吉尔的权力和威信毫不相干。普遍感到惊讶的是，大选结果出现1906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政治上一边倒的局势。工党比上次大选增加了203名议席，总共获得394席，保守党获得210席。平凡、沉默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作为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府首脑，被人簇拥着引进唐宁街10号。在他身旁的是富有经验的人物如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财政大臣休·多尔顿、贸易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大选的结果对战争年代的气氛是个尖锐的批判，对30年代的苦难，包括慕尼黑、西班牙、贾罗以及反饥饿游行等痛苦的回忆，无疑也是个迟来的结论。英国呈现出一片停顿、脱节的景象，这是英国史上罕见的时刻。这使大臣们和广大的选民在高兴之余感到迷惑不解，正如一位新上任的工党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思深感困惑时感叹："此后——会有什么？"

战后的世界

实际上，每一发展阶段总是逐一接踵而来的。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在六年执政期间赢得国内许多人支持（偶或也有逆境）的同时，还贯彻一种新的统一意志，即在多种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从而使英国顺利地渡过艰难的战后改革时期，并长期保持下去直至下一代或更长的时间。战后时期由艾德礼奠定基础的统一意志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气候转变时才面临着挑战。在此之前，1945年后的政权所贯彻的革新

和稳定局面看来很合大家的心愿。

艾德礼政府确实在一个方面推行了一项出色的长期改革活动 568 的计划。大工业和大机构都划归国有——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航、煤气、电力、电报、还有英格兰银行。国家工业有20%完全划归"公共部门"。边区私人资本家贸易团体都由边区官方社会贸易委员会所代替。还没等到1948—1949年钢铁工业实行国有化导致政府内部分歧表面化时，1945年工党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国有大企业就面临着挑战。国家资助的社会福利也有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被通称为"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引起争议最大的一项是1946年安奈林·贝文提倡的国民保健服务，于1948年7月付之实行。当时这项保健服务之所以引起许多争论和医生的反对是因为他们生怕会取缔私人医生营业，把他们变为国家雇员，实行领取工资制。然而，战后社会统一意志之强，足以迫使这项法案通过，从而实行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其他值得注意的措施有：1946年大部分根据贝弗里奇在战时建议的路线贯彻的国民保险制度；推行国家津贴的"地方当局营造"房屋新计划，到1952年它提供新房与临时住宅在100万间以上；提高养老金；提高中途停学的学生年龄和儿童津贴。这些措施当时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完全获得一致的欢迎。政府对反对这些措施的人作了许多让步。贝文本人也不得不允许职业医生保留私营诊所和在国有化医院里保留"收费病床"，这是典型英国式的妥协。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与国立普通中学平行发展。不错，194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统治年代确实使伊顿公学和其他私人捐助的教育机构空前繁荣，因为国内税收保护了它们接受捐助的地位。公共住房计划在鼓励私房出售和"财产私有的民主"原则的压力下削减了。不过，尽管有许多局限，福利国家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支持，而且被人看作对以后20多年的稳定、体察民情的社会的一大贡献。尽管1951年4月由于假牙和

眼镜收费问题引起大臣之间发生激烈争执，导致安奈林·贝文和其他两名大臣的辞职，社会支持、全面福利国家的内在原则大部分不受损害地保存下来了。此外，全面就业的措施和新的地方政策(改善一度无人管理的地区如威尔士山谷、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中部工业地带)也是如此。有了这些福利，工会工员就能忍受工资冻结、货币贬值以及令人不快的艰苦了。他们对本国政府的忠诚经受得起一切考验。

569 后来的传说把这一时期说成是紧缩和普遍暗淡的时代。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如此。从一开始，英国就面临庞大的战后债款。原料和基本食品供应继续短缺，美元的缺乏又使这更为严重。而美元短缺又导致与北美贸易严重不平衡。这时还有一些紧急的恐慌时刻，如1947年7月，实行外汇兑换交易之后出现英镑挤兑风潮；1949年9月实行英镑与美元比价贬值；1951年7—8月朝鲜战争期间支付结算困难。食品、衣服、汽油以及许多生活必需品配给供应一直持续到1954年。计划、控制供应都由白厅不露面的官僚掌握(同时还受到"私贩"、"黑市"包围截击)已是当时司空见惯之事。尽管如此，多数工人，亦即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把1945年以后的年代普遍看作是维多利亚后期鼎盛以来最好的时期。工资增长超过1938年水平的30%，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保证就业，有更满意的环境和教育设施。另外，在流行踢足球、打板球、随时可以上电影院和舞厅的社会里，丰富生活的各种娱乐都样样供应齐全；诸如海伯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足球场，每周吸引球迷观众(而且全场很平和)达60 000人以上。1951年，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工党政府举办了一次不列颠节庆，纪念1851年博览会一百周年。在经济紧缩、海外事务阴影笼罩的时候，在某些偏激的批评家看来，这

570 简直不是举办全国欢庆节日的好时机。但是节日办得很成功。在各种收入中，以原来无人问津的泰晤士南岸新建的超级节日大厅

最为可观，因为它集中举办音乐会和其他艺术展览。这就给建筑师、雕塑家、设计师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与此同时，它还使英国人民发挥技术和制造的潜力。在泰晤士沿岸巴特西建设的游乐场是个独创的多种娱乐场所。这次节日对人民证明英国仍然保持着活跃的文化，国内仍然太平无事并保存着它的遗产。

实际上，直到1951年以后仍被保守党保持着的并不只是不列颠节庆蕴藏着的活力。从1951年至1964年托利党连续执政时期的首相邱吉尔、艾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一直执行社会安定政策。工会一般都得到许可，可以发展他们的自由以及在战争 571 期间加强集体与资方谈判的力量。这时发生几次大罢工，但在国内没有酿成暴动，甚至连北爱尔兰也是如此。福利国家又添了几条新条例使之进一步巩固。全面就业仍然高居各种福利事业之首；据说它在凯恩斯需求管理办法中列为永久权利，体现出"巴茨克尔先生"的纲领（混合托利党人巴特勒与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的姓名而成，标志着当时的中间路线政策）。1959—1960年，当失业重新抬头，保守党人于是又效法前任工党人士，大肆采取干涉主义的地区政策。这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毁誉参半的）左翼报纸漫画家"维基"誉为"超级麦克"。在1951年和1964年之间，没有出现过偏离艾德礼式的统一意志的重大倾向。1964年以危险多数获胜、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重新上台的另一工党政府——1966年获较大多数连任——也没有对过去20年来被人广泛接受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提出过重大修改建议。

国内政治上的和谐使艺术获得了实验和创新的广阔天地。经过40年代的10年荒芜，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在50年代写出了重要作品，其中有几位作家在战前就开始写作的：乔伊斯·卡雷、劳伦斯·达雷尔、安格斯·威尔逊和艾里斯·默多克等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家。英国戏剧也在这时期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出现了

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哈罗德·品特的先锋派作品，还有像约翰·奥斯本一类具有社会现实主义倾向的剧作家。奥斯本的剧作《愤怒的回顾》(1955)在斯隆广场的皇家宫廷剧院这一激进的大本营演出时，由于它轻蔑地否定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变革，引起了轰动。接着又出现"愤怒青年"左右摇摆、光怪陆离的现象。科林·威尔逊在《局外人》中捕捉住异化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主要通过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诗歌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53年托马斯到美国旅行，因饮酒过度，在纽约逝世。在北爱尔兰，还有"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在海外，到美国访问的英国人注意到英国戏剧家和演员几乎独霸百老汇。这一景象使人们深信，尽管它有许多经济弱点和技术落后，英国仍然能通过其文化成果繁荣美国，其作用犹如希腊文化之于罗马一样。

英国音乐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布里顿，他不仅作曲，还写歌剧，而老音乐家如沃尔顿，也十分积极。也许更令人鼓舞的是音乐创作明显地呈现出不再局限于小范围或中产阶级活动的迹象。学校乐队和业余音乐团体繁荣起来了。地方音乐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以1947年爱丁堡音乐节最著名。凡此种种，其主要因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给予支持，尽管该委员会的存在和作用引起过很大争论。在这一时期里，可惜发展不明显的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规划。"新城"几乎成了严肃的、斯大林式的千篇一律的绰号，而重建被空袭破坏的旧城的计划往往落空，最明显的例子是曼彻斯特和圣保罗教堂附近的伦敦城。丑陋的高层公寓高耸入云。新的民用楼房和大学校舍则往往严肃、呆板。"平板玻璃"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于是都市的市中心设计和旧式庄严典雅的城市就因此遭殃了。

572

在艺术界其他部门，英国广播公司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创新的迹象。从1946年起开设的第三套节目有

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戏剧的发展。1950 年以后，电视普及全国，尽管它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却在向国内观众介绍本国情况方面承担了一项有用的社会任务。英国广播公司另一贡献是迎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少数人的兴趣，充当威尔士、亚洲及其他有色移民的代言人。电影也逐渐成为艺术革新实验的媒介。它得到广大观众的支持，因为收费低、场地大众化便于吸引观众，可与随时直接收看的电视竞争。40年代末最引人注意的电影是艾林制片厂投放的喜剧片，它们专门以幽默含蓄的风格再现英国传统的主题。《往皮力科的通行证》和《好心肠与头饰》等这类片子都是反映英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凝聚力之作。在英国阶级制度的影响下，还拍制出无数趣味性较差的影片，它们以同情、支持的口吻和不易懂的词句（但是东区的电影观众却历来熟悉）描绘工人阶级。外国人则往往被写成是可疑或干脆就是滑稽的人物（如同这时伊妮德·布莱顿大量出版的儿童读物里的外国人一样）。在影片《蓝灯》或电视连续剧里经久不衰地出现的形象，如和善的农村“警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更明显的是，50 年代后期席卷法国、意大利和（在某种程度上波及）美国电影的某些新浪潮对英国电影也有一些影响。社会现实主义浪潮的影片往往带有对社会的尖锐批判，暗示着文化思想的转变。影片《蜜的滋味》和《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探索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人性关系，体现了英国电影达到新的深度和灵敏度。这就从更广的方面说明在这一历史过渡时期里英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573

国内的稳定大都由对外政策方面太平无事所促进的。1947 年，英国仍然是一大强国，是国际和平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这就表明英国有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能力。直到经济衰退日益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表面现象仍维持到 1963 年在莫斯科订立禁止试验原子弹条约为止。英国已拥有自己强大的防卫系

统、自已据认为有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流通领域、秘密的战略、贸易以及维系着虽正在瓦解却仍然强大的帝国财政关系。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先驱弗莱明、弗洛里、克里克和沃森等人都认为，英国在医学、物理和化学方面仍然是非常卓越的。

不过，由于英帝国在战后时期面临着逐渐而必然的瓦解，英国的国际地位就受到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温斯顿·邱吉尔如此一位老练的帝国主义者执政时期，帝国的瓦解仍是个严酷的过程。1947—1949 年，艾德礼政府批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自治就是移交政权的关键时刻。这就明确地说明英国在军事上、财政上不稳定，总之是缺乏用武力维护远处领土的决心。随着东非、西非和其他地方的领土获得独立，还有肯尼亚、塞浦路斯在当地民族抵抗力量发生流血冲突之后相继独立之后，殖民地的瓦解过程在 50 年代最迅速。在非洲南部，1963 年中非联邦终于解散，就意味着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到 60 年代初，只剩下一小撮零星的属地——英属洪都拉斯、福克兰群岛上的荒地、直布罗陀、香港、亚丁、斐济以及其他几个前哨 574 ——仍在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这时对帝国的眷恋情绪已很淡漠。英帝国节[①]已从国立学校的日程表中消失；印度的文职人员隐名匿姓地回国；国王不再当印度皇帝。接着，1956 年 10 月，当时的首相安东尼·艾登在埃及宣布苏伊士主要航道国有化之后公然暗中勾结法国和以色列出兵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世界舆论甚至美国的谴责。于是英镑受到威胁；石油供应断绝，由于联合国的谴责，英国部队不光彩地撤出苏伊士。群众对此事长期不满之声时有所闻，而老牌帝国主义的声音却相对地哑了。在 1959 年大选中，保守党在国内繁荣的基础上轻而易举地获胜——用麦克米伦 575 的话说，“你们从来也没有这么顺利过。”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丹

① 英帝国节，时间为 5 月 24 日，现称英联邦节。——译者

尼尔·英伊尼汉却载文赞扬英国在亚非第三世界中重新获得威信，因为它把占世界人口比例相当大的地区解放出来而没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或比利时在刚果要经过那番痛苦的经历。一度对边沁、李嘉图、密尔顿和格拉德斯通的开明言论言听计从的社会，如今得俯就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和托尼、《新政治家》以及工党(甚至在处于反对党的地位)等所宣称的社会民主纲领了。

在英帝国的后期，由于它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不稳定，英国已进一步成为反馈力量。随着联邦关系渐趋正规化——虽也有帝国对联邦优惠的产物如奶油和肉类等重要的实惠——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好坏参半，但比以前大大突出。自1949年起，美国与英国在战略上、地域政治上、北大西洋组织上已连成一体。不久之后，东南亚专门成立另一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从此，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美的政策总是密切配合。英国人自豪地认为这是说英语的人民建立平等的"特别"关系。不过，实际上很明显，这一关系使英国涉入拼命保持虚幻的独立姿态的挣扎之中。在朝鲜战争中与共产主义中国交锋（而不是正式承认中国)，在中东，首先在欧洲面临苏联的威胁的时候，英美的政策，如果不是完全相同，却是相似的。偶然企图以武力手段镇压叛乱，比如1956年英国干涉苏伊士的军事行动，但事态很快就了结了。纳索协定导致防卫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比前更为突出。

576

在英国本土附近，从1947年起几次酝酿成立西欧政治经济联盟。战后这种思想一开始萌芽，英国政府就表示怀疑，虽说没有公开反对。他们列举种种理由：与联邦的关系，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立宪和法律制度的特殊性，英国社会主义计划自主等等。更有力的理由是，大部分英国人民都把其他西欧人看作不好理解的外国人，他们和英伦海峡彼岸只有寥寥可数的自然联系。1963年

英国一表示要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就遭到法国戴高乐总统的拒绝，许多年之后才又作第二次努力。这不能说英国人因未能加入这一个将使物价高涨和国家主权受威胁的外国机构而抱有任何不满情绪。亲欧分子是在群众舆论的清澈洪流中逆流而上。

在这个自给的、多少有些保守的社会里，总的模式是按消费者利益为主导而设计的。透过表面，经济学家、时代的新预言家已窥见生产率增长缓慢和生产能力逐渐下降的趋势。社会学家们挖掘出阻碍“停滞社会”现代化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的现象。英国人却以极其得意的姿态恪守英国的惯例和习俗。对英国人来说，这时生活似乎已显著改善。出生率下降，家庭收入有所增加。家庭生活设备更齐全。拥有汽车的家庭有所增长，他们可以用抵押低息贷款买房子；每个夏天都可以设法到海外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去旅游度假。这种不断改善的生活享受并不仅限于郊区拥有半独立房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也可享受集体乘飞机到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海岸度假，由于工资提高，工作时间缩短，他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条件：举行宴会、上酒馆、俱乐部还是其他地方去消遣。随着通俗文化的扩展，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因为生活方式比较奇特也就成577 为社会学家和传统摇头派专门喜欢攻击的目标。例如，留长发的体育健将、北爱尔兰和曼彻斯特联队足球队员乔治·贝斯特，他的价值观就和20年代杰克·霍布斯等人大不相同。60年代初，由利物浦青年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在音乐上有所突破，使英国成为理应“开放”的社会的先驱，在这里酗酒、吸毒方便自由，亦可随便穿较短的裙子，性的限制也明显放宽。1966年英国足球队荣获世界杯又给这新的一代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辉。

另外，在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等人的乐观精神的促进下，以及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开明思想纵容下，中产阶级改良家对社会改革也有所开拓。性犯罪、同性恋等等已不大采用法律

制裁。堕胎和堕胎药品以及其他容易购买的避孕药为无数性放纵者提供了方便，离婚和单亲家庭从而增多。一时青春的崇拜风靡英国本土，据说这是由美国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掀起来的。特别是，英国大学里各种文化混杂在一起。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和同时代更大胆妄为的中产阶级青年结合在一起，光靠人数众多就可以维护青春少年的爱好。1963年以后10年内许多大学如雨后春笋地兴建起来，与此同时旧的大学也扩大了许多。“多了就降低质量”，有的批评家抱怨说。其他人则反对说，这对英国的潜力丝毫无损，因为接受类似高等教育的人只占相当年龄的群体的5%。既然生活的基本问题通过经济富裕显然得到解决，那么能说会道的青年大学生就可以把他们的精力转向新的运动了。

禁止核武器运动在50年代后期大大归功于中产阶级青年的理想主义。这一运动一时有颠覆政府中一个有潜力的党派——工党的威胁。在60年代后期，这种激情发展到抗议美国参加越南的战争。在海外伯克利大学或巴黎大学也很常见的学生运动，在英国的大学校园里只不过短暂地吵闹一阵，然后神秘地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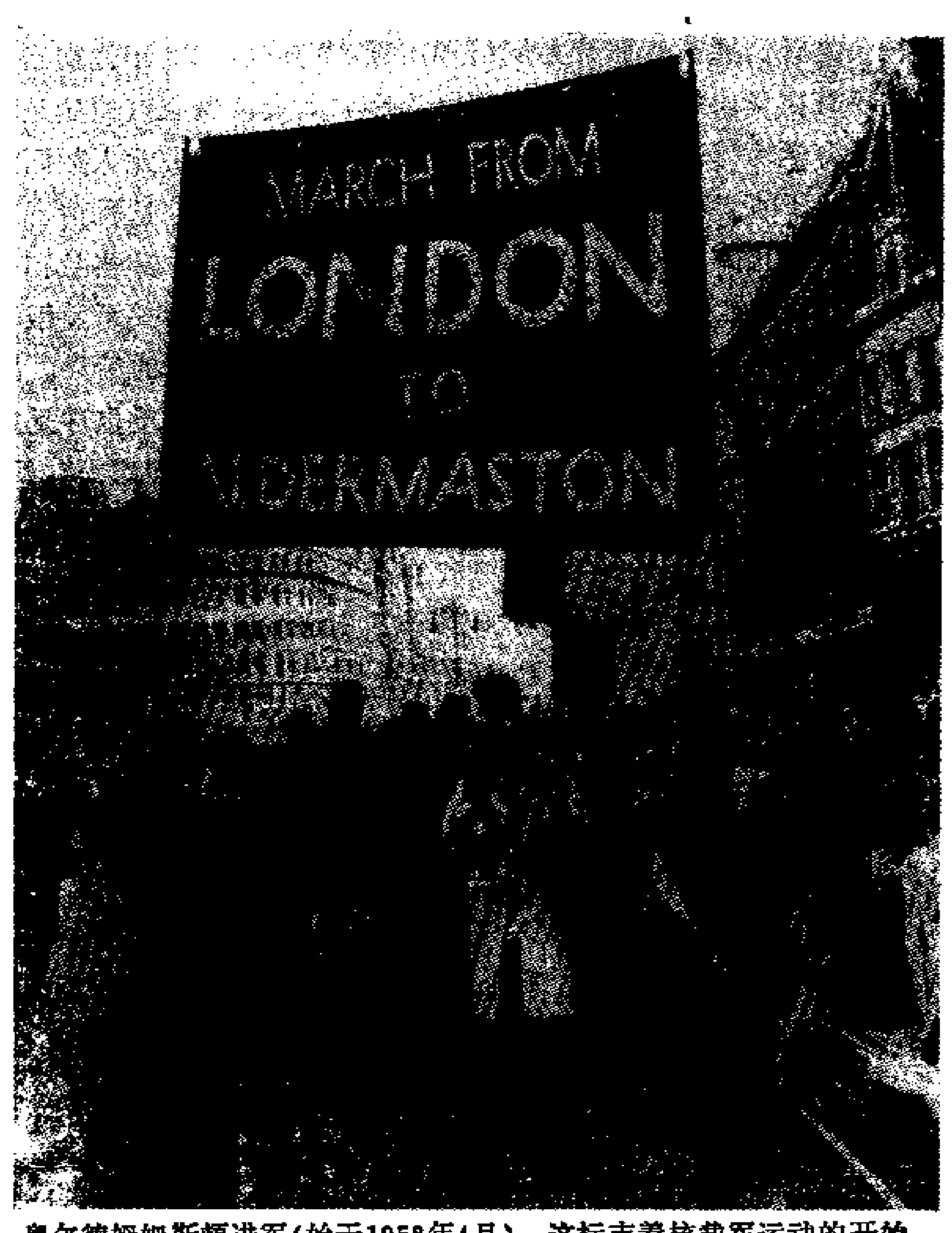
这些运动有更广的含义。在社会满足的表皮下面，实际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各种分裂势力。在哈罗德·威尔逊第一次出任首相（1964—1970）期间，就有各种不同的团体举行暴乱。正如已目睹的情况，在一个生态正在被破坏、生存受武器恐怖威胁的社会里，青年人正发现消费主义和国教的价值不受欢迎。在其他地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青年人掀起了民族抗议的浪潮，其性质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或说法语的魁北克的起义相似。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没有充分享受到50年代的经济繁荣。为苏格兰和后来（1964）为威尔士设立的事务部等正式机构几乎没有实现他们的民族抱负。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公正地抱怨说，伊丽莎白二世的头衔在他们的 572

国家里使用不当。在威尔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论题，即古代语言和文化在与英语化的"大众"文化进行的不平等斗争中面临绝灭的威胁。1966 年，在卡马森补缺选举中威尔士民族党取得胜利，其后发生代表威尔士语的平民骚乱(还企图放炸弹)。在苏格兰，民族党人夺得哈密尔顿行政区的席位以及几处地方权力机构；于是高原和低地掀起一股新的反英情绪。1950 年以来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西非、西印度群岛的黑色人种或黄色人种移民超过一百万人，这些少数民族对公民权利的要求不多，态度也温和。他们住危楼破房，就业中遭受种族歧视，(有时)还操纵在警察手里，此外再加上旧城市地区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这次骚乱是由持不同政见的右翼"卡桑德拉"① 伊诺克·鲍威尔在演说中巧嘴利舌地煽动起来的。英国城市从美国发生的种族暴乱的路线中预见到"流血成河"的情况了。

北爱尔兰是自 1920 年起由信奉新教的大多数人控制的人为省份，这时也发生更多的骚乱。代表罗马天主教徒(往往还有民族主义分子)的少数民族掀起了一次强大的民权运动。但是实际上保持宗教和种族和谐的努力显然已经落空。部队开进了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去维持秩序。炸弹袭击英国城市的引起震惊的浪潮，表明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把旧时代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推上新的险恶阶段。在 60 年代后期，随着少数民族从布里克斯顿游行到贝尔法斯特，开明统一的英国似乎正在崩溃，情况几乎如同1910—1914 年一样。

到此为止，社会结构至少还保持着一部分完整无损的，因为全体公民享有较高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水准。但是 60 年代不断增加

① 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人物，具有预卜吉凶的本领，但预言不为人相信。1968 年鲍威尔在演说中第一次提出英国的种族问题，并预言移民的大量涌入将引起一场血腥的种族战争。——译者



奥尔德姆姆斯顿进军（始于1958年4月）。这标志着核裁军运动的开始。

的明显的实例表明，日益增强的经济压力导致新的社会紧张。在这困难的10年里，英国步履艰难地从一次财政困难迈向另一次，其中还经常发生支付结算危机和英镑挤兑。1967年英镑贬值亦

非长久之计。通货膨胀开始明显地出现，尤其是在70年代初当保守党政府在爱德华·希思领导下鲁莽地扩大货币供应（纯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错误翻版）的时候。但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人数同时增长推翻了凯恩斯经济学家们的一切预言。一开始，这种情况仅限于英国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较老的工业区。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民族起义与煤矿、工厂关闭、工人罢工有密切关系。但是到1973年才清楚的是，英国的经济问题还有更为深远的后果。随着分担世界贸易和生产，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出现严重也许是定期的衰退。英国似乎要取代土耳其充当传说中的"欧洲病夫"了。

580 工会用工业上集体的力量来抵抗生活水准的下降。罢工不断增加，在煤矿中的情况尤为尖锐。1972年2月发动的全国性矿工罢工取得全面胜利。尽管50年代以来煤矿工业陷于全面紧缩，希思政府仍然经历了矿工全力以赴去破坏全国生产和供应的时期。1974年2月又有一起矿工罢工，促使政府以"谁来统治英国?"为题召开选举。选举结果工党获得微弱多数，于是政府及时换班。矿工又在工资表上赢得全部要求和合适的地位。正当英国在面对国际新秩序的种种陌生的挑战时刚刚尝到一点短暂"富裕"的甜头之时，又出现了下述不祥的预兆——日益扩大的不满情绪之背景，不肯接受传统的约束和纪律，工会为对抗生产下降而强行实行的措施等。

581 **七十年代及其以后**

在最近的阶段里，英国已为宏观经济学和社会问题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个长期的痛苦范例。如果与所有其他发展国家有关方面相比较，甚至与本国早些时候的生产水平用绝对数字比较，英国的经济衰退还在继续。1973—1974年，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因为中东石油价格增长四倍而蒙受损失，结果使能源状况突然发生变化，

英国的经济衰退就更为严重。这也促使英国在这十年里自力更生开发北海的油田和天然气。由于拥有核电站和水力发电系统以及大量的煤炭供应，英国在许多方面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更好的条件解决面临的新困难。但是石油价格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使通货膨胀达到1919年以来所未有的程度。由于工会施加压力，使庞大的工资额直至1975年后期增长了30%，通货膨胀也就更为严重。英国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在历史高水平上，在1980年还有一个时候超过20%，到1982—1983年间才下降到不及最高水平的一半，达到比较能控制的程度。随着物价高涨，来自工资的压力以及其他大批的开支，失业又重新成为国内最棘手的问题。到1980年，失业人数超过200万，达到3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总数。随着政府投资和资金供应的削减，到1983年春，失业人数发展到大大超过300万。这时在经济上英国似已病入膏肓，社会福利事业稳步紧缩使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是十来岁的青少年或青年人注定长期靠国家救济过活。虽然人口继续增长，从1951年5 000多万发展到1981年5 600多万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975—1978年间实际上有所下降。出生率在经济衰退期间骤然下降，而人口大部分人是老龄就使社会服务更为紧张，老年人不得不依靠正在就业的青壮年人所创造的财富来供养。

这样的结果大大破坏了社会的结构。1974—1975年当通货膨胀开始失控的时候，接着出现1975—1978年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政府先后与工会谈判订立所谓“社会契约”的困难时期，遏止了通货膨胀。工会同意把工资要求放低以换取政府合乎他们的需要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关于职业保护。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至1978—1979年出现所谓“不满的冬天”，包括市政挖墓工在内的公务员举行一连串罢工，帮助了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此后，工会继续举行强调“工作权利”的示威以抗议公共经费的削减和失业

582 率的增长。失业率超过15%的，不仅是苏格兰、默西赛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等传统贫瘠地区，还有米德兰西部等一度繁荣的地区。在炼钢工业方面，像康塞特、肖顿和柯比等大型工厂从此永远关闭了。更间接受影响的是，由于卫生和教育设施(包括大学)投资削减，艺术和环境方面经费紧缩，造成生活单调乏味。这时英国以工业衰退和高度通货膨胀双管齐下给后凯恩斯经济学上的"滞胀"现象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这些经济压力还严重地影响到70年代社会的稳定。它们加剧了原已出现的其他社会、社团或种族集团的紧张关系。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仍然是北爱尔兰，那里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也因为联合王国失业率急剧上升而加剧。70年代自始至终，北爱尔兰的状况越来越令人震惊。民权运动的成功取代了老牌统一党人占优势的位置；结果1973年斯托蒙特会议赞成直接归威斯敏斯特管辖。但是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发动暴力反抗，与此同时还有伊恩·佩斯利牧师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煽动性的宣传。斯托蒙特会议的结果肯定不能使当地趋于平静。部队继续在博格赛德和福尔斯路上巡逻。北爱尔兰和南部爱尔兰共和联邦在边界上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共和军通过边境获得款项和武器。北爱尔兰当地的暴力偶或延伸过海，以恐吓方式用炸弹袭击英国城市甚至暗杀政治家。长达六个世纪的爱尔兰种族长期争斗是不会在1983年接近媾和的。

这一时期其他的紧张关系虽不算激烈，但也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虽然通常采取合法的形式，却继续表现出来。在1979年"移交权力"措施失败之后，克尔特人的民族主义似乎有所收敛，但是，特别是在威尔士，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冲突仍然很多。保卫威尔士语的斗争仍然吸引许多忠心耿耿的人参加，甚至连爱国者也义愤填膺地威胁要绝食至死。在威尔士农村拥有

“第二家园”的英格兰人有时会发现它被当地纵火者焚毁。不过，威尔士和苏格兰与他们对海的克尔特邻居相比，仍然是比较安定太平的社会，受到的民族主义分裂的磨难也较少。更令人震惊的是广大黑人社区的问题，他们多数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旧的黑人区里。在伦敦诺丁山区和布里斯托尔圣保罗教堂区也发生过零星的骚乱。1981 年夏天，英国看来一度经历着美国式的种族起义的全面恐怖，利物浦托兹特希区和伦敦南部布里斯顿区的黑人青年发动长期的暴乱，全部情况都有电视的实况报道(也许拍摄得仓促一些)。移民社区与警察部队之间缺乏信任是这些事件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但是，青年黑人失业问题特别严重，他们找工作、租 583 房子、和享受社会福利待遇方面处处遇到种族歧视的刁难，因此种族之间的关系应该愈来愈引起关注和警惕。

其他问题逐渐增多。例如，工会抗议，反对伦敦北部格伦维克工厂的示威，其强烈程度远远超出通常的工业抗议限度。青少年观众无意间的捣乱常常破坏了足球赛和其他运动项目比赛的进行。因此，英国传统的稳定局面已日益陷入四面受敌、多方责难的困境。一位美国议员曾忧郁地说，英国将变成像“智利那样无法管理”，它是美国人前车之鉴。后来证明这一说法未免过于夸张。如果有的社会能泰然自若地度过高失业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公共事业紧缩，那么英国同样也能如此。尽管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渐渐不如过去那样受人尊重——牛津大学必然首当其冲，警察、法官、教会领袖(以及足球裁判)都不能保持他们原来的权力，甚至 584 连王室也经常受到公众批评和骚扰——广大的公共机构和市民生活结构还是巩固的。但是，毫无疑问，摩擦之点和瓦解的潜在因素如此之多，传统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就得重新审查和另行规定才能使英国文明继续发展。

在这一略有动乱的时期里，英国对国外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

内省的阶段。实际上，根深蒂固的岛国偏狭心理正如1918年以来经常起作用的那样，支配着大众的看法。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英国与美国的正式联盟继续发展，但对承担义务的热情却不足。不错，70年代后期又重新掀起裁减核武器运动，那是当时唯一的和平形式的抗议，表明这一联盟对该相当可怕的日益扩大的核武器库的依赖会引起社会大骚乱。建议发展的潜艇导弹引起的骚乱更大。经过许多外交上的暗斗，1973年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市场。1975年独一无二的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大多数，几乎是全体公民三分之二的人，都赞成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英国人感兴趣的"欧洲"，大部分不是在政治方面。去欧洲大陆集体度假，欧洲汽车和食品在英国流行，在欧洲举行足球赛等等都未能使英国人更热爱他们海峡对岸的邻居一些。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的态度在1975年后继续受到敌对观点的支配；民意测验结果一致反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管怎样，远远设立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组织——它由缺乏民主约束、为数众多的无名官僚包揽组成——是很难赢得像英国那样独立国家的公民喜爱的。自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就懂得廉价食品政策的英国人民，不可避免地广泛谴责与共同市场发生关系引起的食品价格高昂、黄油如山、酒成湖的现象。英国人是难对付的欧洲人，犹如他们是难对付的大西洋人一样。然而，联邦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了。有色人无论是移民进入英国城市或是到安蒂波迪斯群岛参加板球决赛，都会引起摩擦而不是好感。

从帝国属地的撤退没有引起群众多大的不满。经济上、军事上的软弱支配着有节制的撤退政策。最困难的遗留问题是南罗得西亚，由于它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接壤，因此很容易发生种族大屠杀。1979年12月，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竟一反常态，不顾当地白种移民的抗议，批准罗得西亚成立自治政府（后改名为

津巴布韦)。英国议会和公众对这次撤退表示热烈欢迎。基普林和罗兹的精神① 终于被驱除了。看来帝国不会再干扰英国人的心理了。后来，远处荒芜的前哨基地、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3月下 586 旬意外地遭到阿根廷人入侵。公众舆论哗然。英国政府在群众强烈要求下采取了报复行动。两艘航空母舰、十几艘战艇、许多战斗机以及一万名武装部队立即召集起来接受任务，开往8000英里以外波涛汹涌的南大西洋。经过速战速决，这些岛屿收复了；6月14日，英国米字旗又在斯丹利港上方飘扬。福克兰群岛的战役大受群众欢迎；这时持不同政见者、裁减核武器运动等等都得不到合适的申诉机会。与此同时，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是，收复这些几乎毫无价值的遥远前哨阵地——在这次战役之前，英国人除了在邮票上看到它们的名字之外几乎无人知道这些地方——就会煽起复兴神奇的帝国荣誉。这次战役之后，普遍迫切要求加强大西洋南部的财政拨款或海军实力的呼声空前高涨。福克兰群岛事件证实了英国人民当中淤积着日益增长的偏狭思潮。在国际上的怀疑主义面前，英国仍然能表现出大国强权的身份，显示出陆军、海军和技术上超越于阿根廷共和国那样的法西斯独裁政府。民族自豪感又重新焕发出光辉。但是福克兰群岛上的沙文主义几乎和开始一样很快就枯竭了。英国又回到它原来熟悉的国内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的状况，1984年3月发生的矿工大罢工就是个例子。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看来是20世纪中英国最右的政府，因此80年代初的这些问题变得更尖锐。与此同时，工党以托尼·本为首发动宣扬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群众运动②，似乎同样地过于左倾。全国统一意志看来已经消失。学究们引用W. B. 叶

① 指他们二人颂扬的英帝国主义的精神。——译者

② 指托尼·本，197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经济已告崩溃，因此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大量公共投资、公共开支及公共所有制，并与工厂自主权及公共政治相结合。——译者

芝的话以证明“佼佼者丧失一切信心，居下游者却满怀激情。”有的人则在工党持不同政见的右翼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中寻找慰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它信仰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宣扬收入政策①、欧洲主义和大西洋联盟。尽管经济上惨败，在1983年6月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竟然大获胜利。他们获得议席397、工党为209（势力显然减弱），自由党17，社会民主党6。然而，对走中间道路的恐惧在其他更有希望发展的大洪流中被冲洗掉，经济改革在这个国家里不是毫无收效的。从局部来说，随着北海石油供应可以自足，英国在能源基地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国民经济有所改善。支付结算突然转为（直至1983年）大量源源不断的赢余。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从此在英国经济中不再占有支配地位。当然，技术革新如石油、电子、宇航、协和飞机、亨伯桥、高速火车以及微型电脑化的微型集成电路时代，说明英国本土的革新潜力和科学独创性没有枯竭。

587

这一段经济和社会困难时期同样未能证明英国在文化或学术上是块贫瘠荒芜之地。英国诗人和小说家仍然有卓越的贡献。英国音乐以80年代初最为繁荣，伦敦当时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利兹、加的夫以及其他城市在交响乐团和歌剧方面都有重大发展。英国的文艺周刊保持着独特的学术水平。英国广播公司也仍然是世界最著名的通讯社。大学尽管有许多财政困难，但是人文科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仍然保持稳定的卓越成绩。美国评论家伯纳德·诺西特甚至说，英国在表面衰退和失业的掩盖下存在着很有希望的东西——创造性地利用闲暇；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大规模的自动化工作的压榨下和反抗不断增加生产定额当中找到更大的自由。这一看法也许太乐观了，它忽视了古已有之的工作实践和

① 指政府通过限制工资和物价上涨的办法，达到控制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目的。——译者

管理习惯长期遵循着的传统，它们维持经济发展而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社会。但是，这一看法却坚信英国人的才能足以应付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和财政衰退，而且并不比承担前几世纪的商业领导和国际霸权的重担更差。

英国在80年代里呈现出瓦解与安定因素相互纠结并存的局面。瓦解破坏的势力再明显不过。在北爱尔兰、工业地区以及城市黑人居住区里，不时发生骚乱并造成伤亡。以托尼·本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半法西斯民族阵线的种族主义暴徒、或则有时摆出贵族老爷姿态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各种伪装之下对统一的政治思想形成一种新的挑战。传统的人际关系——年轻人对待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待丈夫、工人对待雇主和工会领导、学生对待老师、公民对待法律监护人和法律秩序——似乎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英国正在灭亡吗?”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一本书籍的标题。与此相反，英国的稳定局面也常常体现在对古代典仪或祖先祭礼近乎宗教的尊崇，比如对王室的尊崇，这在1983年如同英国史上其他任何时候一样狂热。

不过，骚乱似乎再也无法控制了。相对来说，在动荡的世纪里，英国还算是个平静的国家，在这里，古老的制度和准则备受尊重和拥护。在某方面，确实继60年代“随意”实验主义的岁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追求传统标准和价值：尽职尽守、过正常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具有爱国心等等。甚至连宗教生活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在80年代的动乱里，英国仍然远不是无法管理的。面 588 对所有的实例和新闻媒介渲染的黑暗，民意测验记录却显示出鲜明的例子，证明人民普遍赞成英国生活，对自已的国家有深厚的感情，这是西方世界里罕见的现象。只要对地方、传说和神话有共同的深厚感情，分歧是可以克服的。还有更庄严的方面，如对王室的拥戴，实质上包含着恪尽职守，而恪尽职守是连来自西印度群岛及

其它地区的新移民都会响应的。

也许英国事实上自1914年到1983年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有两次大战、30年代的大量失业、70年代的社会动乱，大不列颠的表面如同斯诺多尼亚或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埃顿荒原一样，只是表面上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地质结构仍保持原来一样。1983年如同1914年，英国人保持着真正不卑不亢的姿态。效忠于伦敦或“北方”、东英吉利或康沃尔，对于威尔士、苏格兰不同的民族来说，仍然是当前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这个国家的居民形形色色，差别很大。从地区范围来说，乡村或小城镇生活的自动交流和繁荣往往会意外地转变为更大的卫星城。80年代的英国仍然是个真正和睦的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是英国人经常表达对自己历史的深厚感情。即使在20世纪后期动荡的日子里，古老的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历史传统的关注：如达勒姆矿工节、威尔士全地区的“艾斯特福德”(eisteddford)①、苏格兰高地田径运动会等。君主制和议会也蕴藏着这种历史感；而战争危机和外来威胁也会更痛苦地孕育出人民的刚毅意志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或电影放映历史纪录片，也再现神奇的古代英国的面貌，正如通过广播服务的有力工具，也能传播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民族自我意识。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几乎不可忍受的动乱，英国仍然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严密的社会，并有能力自我振兴。国内每一种形式的抗议——裁减核武器运动——往往证明英国人固有的忍让、温和、尊重个性、癖好，反对高压强制和硬性统一。“自由之树”正在1983年得到培育，如同得到平等派或潘恩培养一样。在20世纪后期犹如已往显赫、繁荣的时期一样，英国人的社会准则仍然被人赞成和持久不变。那么，在未来的世纪里，它们可能还是如此。

---

① “艾斯特福德”，威尔士诗歌吟诵会，每年夏季轮流在南、北威尔士的一个场所举行，现已扩大到包括音乐、散文、戏剧和艺术等授奖。——译者

附　录

一　大事年表

公元前 55—54　凯撒远征

49　**凯撒击败庞培；罗马共和国结束；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公元前 27——公元 68 年）①**

34—26　奥古斯都策划远征

两次入侵之间的不列颠；政治和经济发生变化的时期

约 12　**罗马人在莱茵建立永久性基地**

公元 40　盖约远征被取消

克劳狄（41—54）

约 43　库诺贝利努斯去世

43　克劳狄入侵

约 47　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完全被征服

49　科尔切斯特成立

约 50　伦敦建立

51　卡拉塔库斯战败被俘

尼禄（54—68）

61　布迪克起义

68—69　**“四皇帝时代”**

弗拉维王朝（69—96）

70—84　威尔士和北部地区完全被征服

苏格兰被征服

图拉真（98—117）

约 100　苏格兰暂时失守；泰恩—索尔韦疆界

哈德良（117—138）

---

① 文中用黑体排的部分是指属于罗马帝国的事件。

122	哈德良访问不列颠;修建长城
	安敦尼王朝(138—192)
	安敦尼·庇乌斯(138—161)
140—3	安敦尼进军苏格兰;143年安敦尼长城开始建造
约158	北方大骚乱
约160	一度重占安敦尼长城
	马可·奥里略(161—180);多瑙河上的几次主要战争
约163	重建哈德良长城
193	克洛迪乌斯·阿尔比乌斯在不列颠称帝
	塞维鲁王朝(193—235)
196—213	不列颠分为两个行省
208—211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在苏格兰的战役
235—270	**罗马帝国的危机,内战和来自东西方的入侵**
260—273	**"高卢帝国"**
3世纪70年代	不列颠的复兴
	戴克里先(284—305)
	"四帝统治"
287—296	克劳希乌斯和阿利克塔斯
296	君士坦提乌斯重新控制不列颠
296年以后	不列颠成为四大行政区中的一部分
	君士坦丁王朝(305—363)
306	在苏格兰爆发的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战役,君士坦丁大帝在约克称帝
324	**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建立君士坦丁堡**
340—69	严峻的考验,内战和蛮族的骚扰
350	**马格嫩提乌斯在高卢称帝**
353	**君士坦丁二世**
353	高卢人的不断斗争
	瓦伦斯王朝(364—392)
367—369	"蛮族阴谋",老狄奥多西平定不列颠
	狄奥多西王朝(379—455)

	狄奥多西大帝(379—95)
383	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在不列颠称帝;战胜皮克特人
	霍诺里乌斯(395—423)
398—400	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战败
400—402	斯提利科的撤军打算
402—403	**西罗马帝国的宫廷从米兰迁到拉韦那**
406	不列颠人民反对霍诺里乌斯的斗争;两个皇帝称帝
407	君士坦丁三世在不列颠称帝
	君士坦丁三世从阿尔勒进行统治(407—411)
409	不列颠反对君士坦丁三世的斗争;罗马结束对不列颠的统治
410	"霍诺里乌斯敕令"给不列颠人的信(?),有争议的影响
429	圣格尔马努斯访问不列颠
约450	勇敢的撒克逊人;亨吉斯特和霍萨在肯特定居(传统上认为的日期)
455	亨吉斯特反抗沃尔蒂格恩的斗争(传统上认为的日期)
477	撒克逊人在苏塞克斯定居(传统上认为的日期)
495	萨克逊人在韦塞克斯定居(传统上认为的日期)
约500	蒙斯巴多尼库斯战役
560	艾特尔伯特(后来的霸主)成为肯特的国王
577	西撒克逊人占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
597	圣奥古斯丁使团到达肯特
616	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霸主,扶植埃德温为诺森伯里亚国王
约624	雷德沃尔德去世,据传葬在萨顿·胡古墓
627	埃德温和诺森伯里亚宫廷皈依基督教
633	海汶菲尔德战役;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成为霸主
635	韦塞克斯国王辛尼吉尔斯皈依基督教
642	奥斯瓦尔德在奥斯韦斯特里被迈西亚国王彭达刺杀
655	彭达在温维德与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威的战斗中战败身亡;奥斯威成为霸主

664	惠特比宗教会议
669	西奥多大主教到达英国
672	赫特福德宗教会议，特伦特战役，标志着迈西亚王国的崛起
685—688	锡德瓦拉统治时期韦塞克斯王国的扩张，版图包括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
716	艾特尔鲍尔德成为迈西亚国王
731	比德完成《教会史》
746—747	科洛非索的第一个议会
757	艾特尔鲍尔德去世，奥法成为迈西亚国王
786	奥法主持下的使节会议
793—795	丹麦人袭击林第斯法恩、加罗和艾奥那
796	奥法去世
825	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击败迈西亚，吞并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
835	丹麦人对肯特的大规模袭击
865	丹麦"大军"登陆
867	丹麦人占领诺森伯里亚
870	丹麦人占领东盎格利亚；圣埃德蒙被谋杀
871	丹麦人进攻韦塞克斯；阿尔弗雷德成为国王
874	丹麦人占领迈西亚
878.3	丹麦人将阿尔弗雷德逼入萨默塞特沼泽
878.5	阿尔弗雷德在爱丁堡击败丹麦人；古特伦受洗礼
899	阿尔弗雷德去世；"长者"爱德华成为韦塞克斯国王
910—920	爱德华和艾特尔弗莱德重新收复大部分丹麦区
919	雷格拉尔德在约克建立挪威人王国
924	爱德华去世，阿瑟尔斯坦成为国王
937	阿瑟尔斯坦在布鲁朗布击败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
939	阿瑟尔斯坦去世；埃德蒙称王
940	邓斯坦开始重建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
946	埃德蒙去世

954	约克的末代国王被废黜
959	埃德加成为国王
960	邓斯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约970	《教会和睦论》出版
973	埃德加加冕，领圣职，不列颠各王国归顺
975	埃德加去世；“殉难者”爱德华成为国王
979	爱德华被谋杀；“无主见的”艾特尔雷德任国王
991	丹麦人击败伯特努德郡长；埃塞克斯在莫尔顿征税；英格兰与诺曼底条约
1002	艾特尔雷德下令屠杀在英格兰的丹麦人
1003	丹麦国王斯汶率军入侵不列颠
1013	斯汶率领新军重返不列颠，丹麦区任他为王
1014	斯汶去世；驻英格兰的丹麦军队选举克努特为王
1016.4	艾特尔雷德去世；“无畏者”埃德蒙成为国王
1016(秋)	克努特在阿欣顿击败埃德蒙；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1017	克努特将英格兰分为4个伯爵领地
1035	克努特去世
1037	哈罗德成为国王
1040	哈罗德去世；哈塔克努特成为国王
1042	哈塔克努特去世；“忏悔者”爱德华成为国王
1051—2	爱德华国王与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之间的冲突
1053	戈德温去世，其子哈罗德成为韦塞克斯伯爵
1064—1065	哈罗德伯爵访问诺曼底的威廉公爵
1066.1	爱德华国王去世；哈罗德伯爵继承王位
1066.9	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德桥战役中杀死挪威国王哈罗德
1066.10	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
1066.12	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
1067—1070	英格兰起义
1069—1070	北方骚扰

1086	进行“末日审判”
1087	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位
1088	支持罗伯特·柯索斯的人起事
1093	安塞尔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6	罗伯特将诺曼底抵押给威廉二世
1100	威廉二世去世；亨利一世继位
1101	罗伯特·柯索斯入侵
1106	坦什布雷战役，柯索斯被俘；亨利一世接管诺曼底
1107	英格兰有关授职仪式的争论得到解决
1120	白船失事
1128	玛蒂尔达女王与安茹的若弗勒结婚
1135	亨利一世去世；斯蒂芬继位
1139—1153	英格兰内战
1141	林肯战役，斯蒂芬被俘；后来以格洛斯特的罗伯特换回
1141—1145	安茹的若弗勒征服诺曼底
1149	诺森伯里亚割让给苏格兰的戴维
1152	安茹的亨利（后来的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利诺结婚
1153	亨利入侵英格兰；与斯蒂芬达成协议
1154	斯蒂芬去世；亨利二世继位
1157	亨利重获诺森伯里亚
1162	贝克特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164	克拉伦敦议会和宪法；贝克特被流放
1166	克拉伦敦审判
1169—1172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开始
1170	年轻的国王加冕；谋杀贝克特
1173—1174	反对亨利二世的起义；“狮子”威廉（苏格兰国王）入侵英格兰北部地区
1183	年轻国王去世
1189	亨利二世去世；理查德一世继位
1190—1192	理查德一世进行十字军远征
1193—1194	理查德一世在德国坐牢

1193—1205	休伯特・沃尔特,坎特伯雷大主教(1194—1198法官;1199—1205 大法官)
1197	德赫巴思的赖斯去世
1199	理查德一世去世;约翰继位;建立法院卷册
1203—1204	菲利普・奥古斯都征服安茹和诺曼底
1208—1214	英格兰被停止宗教活动
1214	布汶战役;法国的胜利
1215	大宪章;英格兰内战
1216	路易(后来的路易八世)入侵;约翰去世;亨利三世继位
1217	林肯和多佛战役;路易撤军
1221—4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道士到达英国
1224	路易八世完全征服普瓦图
1232	休伯德・德・伯格被解职
1240	大卢埃林去世
1254	亨利三世接受教皇赠送的西西里王位
1258	贵族接管政府;牛津条例
1259	英法巴黎条约
1264	刘易斯战役;亨利三世被俘;西蒙・德・孟福尔政府
1265	埃文沙姆战役;西蒙・德・孟福尔被杀
1267	亨利承认卢埃林・阿鲁・格里菲斯为威尔士亲王
1272	亨利三世去世;爱德华一世继位
1276—1277	第一次威尔士战争
1282—1283	爱德华征服威尔士
1286—1289	爱德华一世在加斯科尼
1291	爱德华宣布对苏格兰拥有主权
1294	对法战争开始
1295	法国与苏格兰结盟
1296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他与教会的冲突
1297	爱德华一世与实力人物的冲突;他对佛兰德的远征
1306	罗伯特・布鲁斯起义
1307	爱德华一世去世;爱德华二世继位

1314	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赢得胜利
1315—1316	大饥荒
1321—1322	英格兰内战
1327	爱德华二世被废黜，去世；爱德华三世继位
1330	爱德华三世控制政府
1337	百年战争开始
1339—1341	英格兰政治危机
1346	英军在克雷西和纳维尔斯·克罗斯战斗中获胜
1347	英军占领加莱
1348	瘟疫在英格兰首次出现
1356	英军在普瓦提埃获胜
1361	瘟疫第二次席卷英国
1376	“好议会”召开；爱德华去世，黑太子
1377	爱德华三世去世；理查德二世继位
1381	农民起义
1382	约翰·威克利夫著作遭贬责
1388	“无情议会”召开，反对苏格兰人的奥特本战役
1389	理查德二世宣布成年
1394—1395	理查德二世远征爱尔兰
1396	英法条约
1397—1399	理查德二世的“暴政”
1399	废黜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继位
1400	欧文·格伦道尔起义开始(到 1410)
1403	亨利在什鲁斯伯里被击败
1405	约克的斯克罗普大主教被处决
1408	诺森伯兰伯爵在布拉姆霍姆荒原被击败
1413	亨利四世去世；亨利五世继位
1415	英军赢得阿让库尔战役
1419—1420	英军征服诺曼底
1420	英法特鲁瓦条约
1422	亨利五世去世

1435	贝特福特公爵约翰去世;法国—勃艮第签订阿勒斯条约
1436—1437	亨利六世成年
1445	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
1449—1450	法军占领诺曼底
1450	萨福克公爵被谋杀;约翰·凯德起义
1453	法军占领加斯科尼;亨利六世生病
1455	约克公爵理查德反对国王军队的圣奥尔本战役
1459	约克公爵在布洛尔荒原和卢德福德桥战役中被击败
1461	亨利六世被废黜;爱德华四世继位
1465	亨利六世被俘
1469	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起义
1470	爱德华四世被废黜;亨利六世复位
1471	爱德华四世复位;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去世,亨利六世去世
1475	爱德华四世远征法国;英法签订皮基尼条约
1477	威廉·卡克斯顿在英格兰首次印刷出版书籍
1483	爱德华四世去世;爱德华五世继位,被废黜和去世;理查德三世继位;白金汉公爵亨利起义
1485	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去世;亨利七世继位
1487	兰伯特·西姆内尔起义
1491	亨利王子出世
1509	亨利八世继位
1510	恩普森和达德利被处决
1512	与法国、苏格兰的战争
1513	弗洛登战役:英军战胜苏格兰军队
1515	沃尔西任大法官
1522	对法战争
1525	与法国缔结和约
1527	离婚危机出现
1528	对西班牙战争
1529	坎布雷和约;沃尔西垮台;托马斯·莫尔爵士接任大法官
1532	莫尔辞职

1533	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结婚；上诉法；伊丽莎白公主去世
1534	至尊法规
1535	处决莫尔和费希尔
1536	解散寺院；朝圣叛乱；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
1542	索尔韦沼泽地战役，英军打败入侵的苏格兰军队
1543	对法战争
1547	爱德华六世继位；萨默塞特摄政的崛起；平卡叶战役，英军战胜苏格兰军队
1549	第一部公众祈祷书；诺森伯兰政变
1553	玛丽继位
1554	波尔回国，与罗马重新建交；怀亚特起义
1555	开始迫害新教徒
1557	对法战争
1558	新利率书；伊丽莎白一世继位
1559	卡托-堪布累齐和约；英格兰的宗教解决方法
1566	帕克大主教的《启事》要求实行宗教划一
1568	玛丽·斯图亚特逃往英格兰
1569	北方叛乱
1570	教皇训令革除伊丽莎白的教籍
1580	耶稣使团到达英格兰
1585	对西班牙战争
1587	处决玛丽·斯图亚特
1588	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1594	农业歉收
1601	埃塞克斯造反
1603	伊丽莎白去世；苏格兰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称詹姆斯一世；爱尔兰和平；清教徒千年福音派请愿
1604	与西班牙休战（伦敦条约）；汉普顿宫会议（国王、主教、清教徒）
1605	火药阴谋，天主教徒最后一次大阴谋
1606—1607	詹姆斯一世统一王国的计划失败

1607	弗吉尼亚拓殖
1609	爱尔兰北方伯爵叛乱；苏格兰人和英格兰清教徒开始开发北爱尔兰
1610	大契约失败(王室财政改革)
1611	官方批准的圣经出版(国教徒—清教徒合作)
1612	詹姆斯才华卓越的大儿子，亨利王子去世
1613	伊丽莎白公主与帕拉丁选侯结婚，新教狂热，不列颠卷入欧洲政治
1617—1629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兴盛一时
1619—1622	伊尼戈·琼斯设计宴会厅，这是自亨利八世以来王室的第一个重要建筑
1620	首批新教徒出于宗教原因迁居新英格兰
1622—1623	查尔斯王子和白金汉前往西班牙向西班牙公主求婚，但遭到拒绝
1624—1630	对西班牙战争
1625	詹姆斯一世去世；查理一世继位，并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结婚
1626—1629	对法战争
1628	权力请愿书；哈维论血液循环的著作出版；白金汉被谋杀
1629	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决心执行无议会统治
1630	开始向美洲马萨诸塞大规模移民
1633	威廉·劳德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634—1640	船税案
1637	汉普顿法院裁决，支持查理一世有权征收船税
1637—1640	查理失去对苏格兰的控制，他两次动用武力企图实现自己的愿望
1640	长期议会召开
1641	英格兰和苏格兰政府改组，废除调解法庭，废除特殊税收，三年法案，大抗议书；北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
1642	国王企图迫害5个议员，国王撤离伦敦；19条建议；诉诸武力，内战

1643	王军优势；苏格兰人出兵支持议会
1644	议会军的优势，赢得决定性的马斯顿草原战役的胜利（6月）
1645	中立武装"棒民"崛起，威胁双方；王军瓦解，议会军改组（新模范军）
1646	国王向苏格兰人投降，废除主教和公众祈祷书；长老派教会建立
1647	军队造反，批评议会专制的激进主义运动；国王用谎言搪塞
1648	第二次内战，苏格兰人支持国王，但被击败；一些郡起义（肯特、科尔切斯特、南威尔士、约克等）被镇压
1649	审判和处决查理，英格兰成立共和国
1649—1653	一院制统治，清洗议会中的王党议员和温和派议员"残阙议会"
1649—1650	奥弗·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德罗伊达屠杀）
1650—1652	奥利弗·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邓巴尔和伍斯特战役）
1651	托玛斯·霍布斯《利维坦》出版
1652—1654	第一次英荷战争
1653	克伦威尔解散残阙议会，指定议员，召开新议会，即贝尔朋议会，议会将权力归还给克伦威尔，根据一纸宪法（政府文件），克伦威尔任护国公
1655—1660	对西班牙战争
1655	王党叛乱（彭鲁多克起义）彻底失败
1657	议会制定的宪法取代政府文件，虔诚的请愿书，克伦威尔拒绝王位，仍做护国公，他提出上院组成名单
1658	克伦威尔去世，儿子理查德继位
1659	理查德被军队赶下台；恢复残阙议会，军队中许多人对此不满
1660	查理二世复辟
1662	恢复国教；皇家团体获得特许状
1663	国王实行宗教宽容的企图失败
1665—1667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	大瘟疫（最后一次爆发）

1666	伦敦大火
1667	弥尔顿《失乐园》出版
1672—1673	国王第二次实行宗教宽容的努力失败
1672—1674	第三次英荷战争
1674	政府奖励粮食生产(英格兰粮食自给自足)
1678	泰特斯·奥茨和天主教阴谋;布尼安《天路历程》第一部出版
1679—1681	排斥危机,辉格党和托利党出现
1683	酒店阴谋;排斥辉格党人
1685	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二世继位;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信奉新教的蒙默斯公爵造反失败
1687	詹姆斯二世"宗教宽容宣言";排斥托利党人;牛顿《数学定理》出版
1688	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出生
1688	奥伦治·威廉入侵;詹姆斯二世出逃,威廉三世(奥伦治)和玛丽继位
1689	权力法案解决王位继承问题,谴责各种违法行为;宽容法使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新教徒享有各种权力
1690	博伊恩战役;威廉三世击败爱尔兰和法国军队
1694	英格兰银行成立,玛丽女王去世,三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不得超过3年
1695	终止新闻检查法
1697	奥格斯堡同盟国与法国签定赖斯维克和约;年俸法规定王室费用
1701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继承法案确定王位由汉诺威的索菲亚的后裔继承
1702	威廉三世去世;安妮继位
1704	布莱尼姆战役,英、荷、德、奥军队击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英军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直布罗陀
1707	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
1710	指控萨谢弗雷尔博士;哈利内阁

1713	乌特勒支和约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1714	安妮去世；乔治一世继位
1715	詹姆斯分子叛乱，企图阻止汉诺威继承王位，但遭到失败
1716	七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以7年为限
1717	辉格党分裂；暂停评议会活动
1720	南海泡沫：许多投资者在南海公司的股票投机中彻底破产
1721	沃波尔内阁
1722	阿特贝里阴谋，詹姆斯王党分子最大的阴谋
1726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出版
1727	乔治一世去世；乔治二世继位
1729	亚历山大·蒲柏《愚人记》出版
1730	沃波尔与汤森德分裂
1733	货物税危机：沃波尔被迫取消改革关税和货物税计划
1737	卡罗琳王后去世
1738	沃尔西皈依基督教，卫理公会出现
1739	詹金斯耳朵之战，英格兰，西班牙海战
1740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41	塞缪尔·理查森《帕米拉》出版
1742	沃波尔垮台
1744	佩勒姆内阁
1745	查利领导的詹姆斯分子叛乱
1746	卡洛登战役，坎布兰公爵击溃詹姆斯军队
1748	缔造亚琛条约，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结束
1752	采用格雷戈利年历
1753	犹太人国籍法
1754	纽卡斯尔内阁
1756	七年战争，不列颠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结盟反对法、奥、俄
1757	皮特—纽卡斯尔内阁；普拉西战役，英军打败孟加拉军队
1759	占领魁北克，英军打败法军
1760	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继位

1761	劳伦斯·斯特恩《特里斯川·香迪》出版
1762	布特内阁
1763	巴黎和约，七年战争结束；格伦威尔内阁；威尔克斯和总搜查令
1765	罗金厄姆内阁，美洲印花票法案企图维护美洲殖民地独立的金融财政，1766年取消
1766	查塔姆内阁
1768	格拉夫顿内阁；米德尔塞克斯选举危机
1769	詹姆斯·瓦特蒸汽机获得专利
1770	诺斯勋爵内阁；埃德蒙·伯克《对目前不满的反思》出版；福克兰群岛危机
1773	波士顿茶会；美洲殖民地人民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出口到美洲的茶叶贸易
1774	通过一系列压制法案报复波士顿茶会
1776	美国独立宣言；爱德华·吉本《衰亡史》、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
1779	威维尔联合运动
1780	反对解放天主教徒法案，戈登骚乱，从游行到向议会请愿
1781	约克镇英军投降，美洲殖民地人民打败英军
1782	罗金厄姆第二届内阁
1783	谢尔本内阁，凡尔赛和约承认美洲殖民地独立，福克斯—诺斯联合政府小皮特内阁
1784	东印度法案
1785	皮特议会改革法案未能通过
1786	与法国签定伊登商业条约
1789	法国革命
1790	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出版
1791	托玛斯·潘恩《人权宣言》发表
1792	煤气灯；玛丽·沃尔斯顿克拉福特《为妇女权力辩护》一书出版
1793	对法战争爆发；自愿性的农业委员会成立；商业萧条

1795	成立斯品汉姆兰救济体系，使工资收入与支出费用相等
1796	采用防天花种疫苗
1798	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对收入超过200英镑者征收10%的税
1799	镇压工会；拿破仑任法国第一执政
1799—1801	商业繁荣
1801	与爱尔兰合并，第一次全英国人口普查
1802	与法缔和；皮尔通过第一个工厂法
1803	对法战争；全面圈地法案简化公地的圈占过程
1805	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
1809—1810	商业繁荣
1811	会议命令造成的萧条；诺丁汉郡、约克郡的"卢德"骚乱；威尔士亲王乔治任摄政
1813	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
1815	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谷物法将谷物价格规定为每夸特80先令
1815—1817	商业繁荣
1817	商业萧条；纺织工游行和其它骚乱
1819	彼得卢大屠杀：军队干涉群众要求改革的集会，11人被杀，400人受伤
1820	乔治三世去世；乔治四世继位
1821—1823	爱尔兰饥荒
1824	商业繁荣
1825	承认工会合法；斯多克顿至达林顿铁路开通；商业萧条
1829	解放天主教徒：赋予天主教徒各项权力，包括财产权，和任公职的权力
1830	乔治四世去世，威廉四世继位；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开通
1830—1832	第一次大的霍乱流行，以格雷为首的辉格党人掌权
1831	一些农村爆发反对农业机械化的"斯文"骚乱
1832	议会改革法案形成政治改革的高潮，扩大选举权，重新划分议席

1833	工厂法限制使用童工;教会内部开展牛津运动
1834	废除不列颠帝国内的奴隶制;成立教区济贫院;罗伯特·欧文成立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政府反对工联主义的非法誓言的提案促使联合会失败,6个"托尔巴德尔殉道者"被流放
1835	市政改革法案使地方政府的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的纳税者
1835—1836	商业繁荣:"小"铁路建设浪潮
1837	威廉四世去世;维多利亚女王继位
1838	反谷物法同盟成立;起草人民宪章
1839	宪章运动骚乱
1840	成立便士邮站
1841	托利党掌权:皮尔内阁
1844	银行特许状法案:罗奇代尔合作社成立;王家城镇卫生委员会成立
1844—1845	铁路建设浪潮:对铁路的大量投资使得5000英里的铁路得以建成;爱尔兰出现土豆饥荒
1846	废除谷物法;辉格党掌权
1848	欧洲革命:公共卫生法
1851	博览会
1852	德比第一个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52—1855	阿伯丁联合政府
1853	格拉德斯通的第一个预算
1854	诺思科特—特里威廉文官服务报告
1854—6	克里米亚战争,反对俄国,保卫欧洲在中东的利益
1855	帕默斯顿的第一届政府
1857—185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欧洲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
1858—9	德比的第二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58	印度兵变和印度法案
1859	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
1859—1865	帕麦斯顿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0	英法科布登条约;格拉德斯通的预算法案:扩大自由贸易的原则

1861	康索特亲王艾伯特去世
1862	有限债务法案大大促进了股份资金的积累
1865	帕默斯顿去世(10月)
1865—1866	罗素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6	罗素—格拉德斯通温和的改革法案失败
1866—1868	德比第三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67	迪斯累利改革法案,加拿大自治领法案
1868	迪斯累利接替德比任首相
1868—1874	格拉德斯通第一届自由党政府
1869	苏伊士运河通航;解散爱尔兰教会
1870	爱尔兰土地法,福斯特—里本英国初等教育法案,已婚妇女财产法案使已婚妇女享有权力
1872	苏格兰教育法
1873	格拉德斯通政府在爱尔兰大学法案被否决后辞职;迪斯累利拒绝任职
1874—1880	迪斯累利第二届保守党政府
1875	迪斯累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英国控制运河
1875	农业萧条加剧
1875—1876	通过克罗斯保守的社会改革计划
1876	维多利亚任印度女皇;土耳其人控制下的保加利亚发生屠杀基督教徒的事件,格拉德斯通领导下的反土耳其的运动
1877	在南非出现英国人与布尔人的联盟
1878	柏林会议:迪斯累利宣布"光荣的和平"
1879	商业贸易萧条;祖鲁战争:英军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被击败,但在乌伦底战役中取胜
1879—1880	格拉德斯通在中洛锡安运动中谴责帝国主义者在阿富汗和南非的行径
1880—1885	格拉德斯通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80—1881	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1	爱尔兰土地和强制条例
1882	英国占领埃及,德奥意三国同盟

1884—1885	议会改革和重新分配法案
1885	戈登在喀士穆被杀；吞并缅甸；索尔兹伯里第一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86	赋予王家黑人公司特许状；德兰士瓦发现金矿；格拉德斯通第三届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一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自由党分裂
1886—1892	索尔兹伯里第二届政府（保守党—自由党—统一党）
1887	不列颠东非公司获特许状
1888	郡议会法案确定郡代表的权力
1889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英国南非公司获特许状
1892—1894	格拉德斯通第四届自由党政府（少数派）
1893	上院否决第二个自治法案；独立工党成立
1894—1895	罗斯伯里少数派自由党政府
1895—1902	索尔兹伯里第三届统一党人内阁
1896—1898	征服苏丹
1898	德国开始海军扩张
1899—1902	第二次英布战争
1899秋	英国在南非的灾难
1900	索尔兹伯里赢得卡其选举；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法案
1901	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爱德华七世继位
1902	贝尔福教育法案；英日联盟
1902—5	贝尔福反爱尔兰自治者政府
1903	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开始
1904	英法条约
1905—1908	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政府
1906	自由党赢得大选（1月）；工党成立
1907	英俄条约
1908—1915	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
1908	阿斯奎斯提出养老金计划
1909	邱吉尔就业交换提案，上院否决劳合乔治的预算
1910，1	大选；自由党执政

5	爱德华七世去世，乔治五世继位
12	大选，自由党政府再度执政
1911	议会法案削减上院权力，规定5年选举一次，劳合乔治的家国保险法案，摩洛哥危机
1911—1912	铁路、煤矿以及其它矿山工人罢工
1912	英德海军谈判破裂
1912—1914	通过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取消威尔士教会法案，但暂缓施行
1914.6.28	斐迪南王子在萨拉热窝被暗杀
8.4	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1916	达达尼尔海峡远征，以英军从加里波第撤出而告终
1916	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海战；劳合乔治继阿斯奎斯任首相
1917	帕尚达埃勒战役
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乔治劳合联合政府赢得"联票选举"，(12月)再度执政
1919	凡尔赛和约确定欧洲和平
1921	矿工在大罢工中寻求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三方同盟")；黑色星期五，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退缩，联盟破裂；劳合乔治与新芬社缔结条约
1922	劳合乔治垮台；博纳·劳领导保守党政府
1923	鲍德温成为保守党首相；大选
1924.1	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
11	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再度掌权
1925	不列颠重新施行金本位制
1926	大罢工(5月3日—12日)
1929	大选，麦克唐纳第二届工党政府
1931	金融危机，英镑受影响；英国废除金本位制；麦克唐纳辞职，但在选举中获胜，领导国民政府
1932	渥太华帝国贸易会议制定关税保护政策
1935	保守党赢得大选，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有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霍尔—拉伐尔条约；印度政府法案

1936	国王乔治五世去世；爱德华八世退位，乔治六世成为国王
1937	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任保守党首相
1938	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会见希特勒
1939	英国向波兰保证；英帝国向德国宣战(9月3日)
1940	邱吉尔接替张伯伦任首相；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列颠战役
1941	许多英国城市遭到空袭；苏联和美国参加
1942	新加坡失守；蒙哥马利获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贝弗里奇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
1943	北非战役取得胜利；英美联军进入意大利
1944.6.6	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巴特勒教育法
1945	欧洲战争结束(5.8)；远东战争结束(8.15)；大选，工党获得巨大胜利，艾德礼任首相
1947	煤矿和其它一些企业国有化；兑换危机；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
1949	北约组织成立；英镑贬值
1950	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保住权力；朝鲜战争爆发
1951	不列颠节；大选；保守党击败工党，邱吉尔再度成为首相
1952	乔治四世去世；伊丽莎白二世继位
1954	英军从埃及撤军
1955	艾登成为首相；保守党赢得大选
1956	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
1957	艾登辞职，麦克米伦任首相
1959	大选；保守党获得绝对多数
1963	法国投票否决英国要求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限制核试验的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道格拉斯-霍姆接替麦克米伦任首相
1964	大选；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
1966	大选，工党以绝对多数获胜
1967	英镑贬值
1970	大选；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执政
1972	全国矿工罢工

1973　不列颠进入欧洲共同体；废除北爱尔兰斯托蒙政府

1974　全国矿工罢工；两次大选；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均以微弱多数获胜

1975　英国公民投票的表决结果，英国成为欧洲共同市场成员

1976　经济危机：英国从国际基金会得到帮助

1979　威尔士和苏格兰关于地方分权的公民表决；大选；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执政；津巴布韦（罗得西亚）获得独立

1980　北海石油使英国自给自足

1981　社会民主党成立

1982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击败阿根廷

1983　大选：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获得多数，再度执政；安装巡航导弹

1984　矿工罢工

三　历届首相（1721——1984）

罗伯特·沃波尔	1721年4月
威尔明登伯爵	1741年2月
亨利·佩勒姆	1743年8月
纽卡斯尔公爵	1754年3月
德文希尔公爵	1756年11月
纽卡斯尔公爵	1757年7月
布特伯爵	1762年5月
乔治·格伦维尔	1763年4月
罗金厄姆侯爵	1765年7月
查塔姆伯爵	1766年7月
格拉夫顿公爵	1768年10月
诺思勋爵	1770年1月
罗金厄姆侯爵	1782年3月
谢尔本伯爵	1782年7月
波特兰公爵	1783年4月
威廉·皮特	1783年12月
亨利·阿丁顿	1801年3月
威廉·皮特	1804年5月
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	1806年2月
波特兰公爵	1807年3月
斯潘塞·珀西瓦尔	1809年10月
利物浦伯爵	1812年6月
乔治·坎宁	1827年4月
戈德里奇子爵	1827年8月
威灵顿公爵	1828年1月
格雷伯爵	1830年11月
墨尔本子爵	1834年7月
威灵顿公爵	1834年11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1834年12月
墨尔本子爵	1835年4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1841年8月

约翰·罗素勋爵	1846年6月
德比伯爵	1852年2月
阿伯丁伯爵	1852年12月
帕麦斯顿子爵	1855年2月
德比伯爵	1858年2月
帕麦斯顿子爵	1859年6月
罗素伯爵	1865年10月
德比伯爵	1866年6月
本杰明·迪斯累利	1868年2月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1868年12月
本杰明·迪斯累利	1874年2月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1880年4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85年6月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1886年2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86年7月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1892年8月
罗斯伯里伯爵	1894年3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95年6月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1902年7月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1905年12月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1908年4月
戴维·劳合乔治	1916年12月
安德鲁·博纳·劳	1922年10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23年5月
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4年1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24年11月
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9年6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35年6月
内维尔·张伯伦	1937年5月
温斯顿·邱吉尔	1940年5月
克莱门特·艾德礼	1945年6月
温斯顿·邱吉尔	1951年10月

安东尼·艾登爵士	1955 年 4 月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7 年 1 月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1963 年 10 月
哈罗德·威尔逊	1964 年 10 月
爱德华·希思	1970 年 6 月
哈罗德·威尔逊	1974 年 2 月
詹姆斯·卡拉汉	1976 年 4 月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79 年 5 月

索　引

（下面页码系原书页码，印在中译本切口一边）

① 原书有误，应为第四代白金汉公爵。——译者